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

月頭尾  
續

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

## 目錄

序·寫在田野之上：給台大人類學系全體記錄者的信.....	吳連進	3
前言.....	黃郁茜	7
主題一：淤積的漁港		
紙上漁港：箔子寮漁港的治理失能與未竟的發展藍圖.....	蘇穎欣	15
潮起潮落之際：箔子寮漁港的停滯與韌性.....	林建志、 王莉晴	75
主題二：「社區如何動起來」		
彩繪的浪潮——箔子寮藝術社造的社區想像重構.....	陳冠儒	103
回來的人：四湖沿海的地方發展軌跡.....	張瑜真、 方宇祥、 周哲璋	153
回家生活：箔子寮善水咖啡與雲林海線返鄉青年創生實踐...	陳思捷、 鄭靜蓉、 溫顥宜	187
風中扎根：箔子寮的社會永續路徑與挑戰.....	洪浥青、 胡善翔	217
插曲		
在風頭水尾生活：箔子寮攝影集.....	洪浥青	253
試說箔子寮之箔？.....	吳文貴	265
三條崙地名由來.....	吳文貴	266
主題三：生活在「風頭水尾」		
海風中未來藍圖：三條崙孩童與「文化不利」的交織書寫...	林庭如、 黃于瑄	269
大是大非：抗爭中的道德與責任.....	胡景堯	289
箔子寮海廢中的環境符應：再利用的垃圾人類學初探.....	黃則鳴	315
自海而食：箔子寮人如何透過飲食與交換回應在地環境.....	陳弘祐、 劉湛湛	347
明天有明天的風吹：	吳佩珍、	379
刮著大風的道路上，箔子寮居民如何生活.....	陳禹翔、 楊依婕	
跋·風頭水尾中，田野的田野：記 2025 年寒假文化田野課程實習	涂峻清	421



## 序·寫在田野之上：一封給台大人類學系全體記錄者的公開信

吳連進（四湖反風吹自救會會長）

各位在場的來賓、親愛的人類學系同學們，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齊聚在四湖鄉箔子寮，在建陽國小這間多功能教室裡。對我而言，這不僅是一場成果發表會，更像是一場記憶的集體重建。

因為你們今天所做的，不只是呈現資料、報告研究；而是一次集體回望，一次深刻傾聽—傾聽土地的聲音、海風的呢喃，還有那些平凡卻真實的村民故事。你們參與了一場低聲卻堅定的行動：為一片土地留下名字，為一群人證明他們曾經存在。

今年——2025年，是台大人類學系第113屆《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發表會》。這也是黃教授連續第二年親自帶領學生，來到這片土地——四湖鄉。

兩年來，你們走進箔子寮。你們在廟埕、在港邊、在海風吹拂的巷弄裡，與長輩閒話家常，與返鄉青年深談。你們不只是訪談、紀錄、分析，你們用耳朵傾聽、用雙腳丈量，並用筆與心書寫下那些官方檔案永遠無法完整記錄的碎語與沉默。

你們記錄了〈紙上漁港〉，寫下那座早已沉默的漁港，如何在治理失靈的斷層中緩慢荒廢，而那些未竟的藍圖，如今仍漂浮在居民眼中，等待著被重新書寫。

你們寫下了〈潮起潮落之際〉，看見一個被時代推擠的海村，如何不被浪潮沖走，因為有人選擇留下，有人選擇守護，有人仍在等待風平浪靜。

你們描繪了〈彩繪的浪潮〉，追索藝術如何在村屋牆面之間重生，不是為了裝飾，而是為了記得，為了在顏料與筆觸中，召喚出失語的集體記憶。

你們理解了〈風中扎根〉，知道「永續」從來不只是政策口號，而是一條必須穿過風、踩進泥濘，才能走出的生活實踐。

你們發現了〈回來的人〉，那些不是逃離，而是折返的身影。他們不高調、不喧嘩，只是默默把青春，種回家鄉的土壤中。

你們走入了〈回家生活〉，看見一杯咖啡、一間小店，如何撐起夢想、養活生活，也讓地方重新有了溫度與輪廓。

你們觸及了〈明天有明天的風吹〉，在那條強風吹襲的道路上，你們看見有人依舊煮飯，孩子依舊上學，一切照舊，只因人們不曾退縮。

你們追問了〈自海而食〉，從每一道菜、每一次交換，探問人與自然的關係、環境的變化，以及飲食如何成為對消失資源最深情的回應。

你們走進了〈箔子寮海廢中的環境符應〉，不只是研究廢棄物，更是在探問，人如何面對被丟棄的東西，又如何學會不輕易丟棄彼此的價值與關係。

你們聽見了〈海風中未來藍圖〉，在三條崙，那些資源不均的角落裡，孩子們提筆，寫下自己的世界，他們用語言與夢想，抵抗沉默的命運。

你們也試圖理解〈抗爭中的道德與責任〉，在一場地方對抗之中，看見良知如何挺立，集體如何選擇，在壓力與矛盾之下，鍛造出一種屬於地方的倫理光芒。

這些報告，不是期末作業，也不是學術例行。它們是一份回禮，是你們給這片土地的傾聽與回應，是你們願意與地方共感、共書、共生的明證，是你們走過田野後，寫下的真相。

而這樣的書寫，才是真正的田野。這樣的聆聽，才配得上所謂的「人類學」。

而我自己，從事的也是一種田野——但我的田野，是行動與對抗。

幾年前，當蔡英文政府計畫在四湖鄉設置陸域風機時，我站了出來。我不是因為有職責，而是因為這裡，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知道，若我不說話，風將奪走的不只是聲音，還有這塊土地僅存的尊嚴。

我反對風機入侵，是因為我知道，一旦土地的靈魂被機器吞噬，這裡的聲音將不再被聽見。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抗爭，而是四湖鄉整體的公民運動。

這些年，我也走進口湖、元長兩地，協助地方反對變電站、反對太陽能設施入侵農村生活圈。如今，這些能源工程暫時停擺。我們沒有勝利的歡呼，只有安靜地守住了家鄉。

我想把這段經歷，送給今天的每一位學生。

你們曾走進這片土地，寫下別人，也看見自己。我想請你們，未來無論走得有多遠——請記得你們曾經在這裡。請記得四湖的海風，請記得那些與你們分享人生的阿公阿嬤，請記得那些年輕人努力返鄉的故事。也請你們，繼續熱愛自己的家鄉。

更重要的，是當有人向你們伸出手、請求幫助時，請不要猶豫。

人類學，不只是記錄；它是一種責任，一種感同身受的能力，一種願意挺身而出  
的倫理。

願你們未來的每一次田野，不只是對知識的追尋，更是對人與土地深切的回  
應。

願你們在風中行走，腳步穩健、眼神清明。

願我們都能不畏風，不怕雨，不忘初衷。

謝謝大家。

我是「四湖反風吹自救會」會長——吳連進

2025年6月8日敬上



## 前言

黃郁茜（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在雲林縣四湖鄉箔子寮進行。田野調查日期為 2025 年 1 月 6 日至 2025 年 1 月 17 日，共計十二日十一夜。十一篇研究報告於 2025 年 5 月 22 日及 6 月 8 日，分別在人類學系水源校區與箔子寮建陽國小舉行成果發表會。經評論人與鄉親惠賜意見後，逐篇修訂，輯印成冊。

臺大人類學系的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為大學三年級必修課程。同學們在上學期學習研究方法，自行選定主題，在寒假實習期間蒐集材料，下學期完成民族誌研究報告，並在人類學系以研討會形式公開發表。自 112 學年度以來，本課程增設「地方成果發表會」，讓學生回到實習地點，向鄉親報告田野成果，獲得熱烈支持與回應，特此致謝。

本屆研究主題各異，包含：漁港建設、地方韌性、社區再造、青年返鄉、永續發展、藝術村、教育、道路、飲食文化、海廢再利用，以及人物側寫。以下分三大主題，分別介紹。

主題一「淤積的漁港」聚焦於攸關四湖繁榮興衰的箔子寮漁港。漁港於 1971 年興建試驗堤，1976 年開港，1980 年竣工，一度是西海岸最大的二類（近海漁業）漁港。1990 年代中後期逐漸淤積。漁港繁華時的榮景以及沒落後的蕭條，是半世紀以來箔子寮居民的深刻回憶。

蘇穎欣〈紙上漁港：箔子寮漁港的治理失能與未竟的發展藍圖〉分析漁港主管機關面臨嚴重漂沙問題，歷年提出多項改造計畫，但漁民生計始終未獲改善。本文從「敘事治理」、「懸置願景」與「官僚困境」三個層面，揭示箔子寮漁港「敘事中前進、現實中停滯」的治理僵局。林建志、王莉晴〈潮起潮落之際：箔子寮漁港的停滯與韌性〉則在產業沒落背景下，透過回鄉經營烏魚子加工的阿利老闆與港口檳榔攤「媽祖婆」蔡蜂阿姨的故事，勾勒出停滯表象下的在地生機。兩篇文章分別從治理困境與地方韌性的視角，為「淤積的漁港」提供了立體而生動的書寫。

第二個主題「社區如何動起來」，反映了社區行動者的關切與同學們的共同興趣，共收錄四篇文章。陳冠儒〈彩繪的浪潮——箔子寮藝術社造的社區想像重構〉探討 2016-2018 年的彩繪藝術村計畫，即村內隨處可見的民間傳說彩繪與黑



熊雕塑，討論彩繪村社造如何改造地方空間並重塑社區想像。張瑜真、方宇祥、周哲璋〈回來的人：四湖沿海的地方發展軌跡〉，則訪問了箔子寮、三條崙、林厝寮三個聚落不同世代的社區發展工作者與回鄉實驗小型產業的人士，探討個人生命經驗如何影響他們回鄉之後的實作，進而形塑了他們談論地方的方式(敘事)與形構「地方感」。陳思捷、鄭靜蓉、溫顯宜的〈回家生活：箔子寮善水咖啡與雲林海線返鄉青年創生實踐〉，聚焦箔子寮善水咖啡以及海線返鄉青年朋友們的創業歷程，探討返鄉青年如何將咖啡館作為「第三場所」(Third Place)，凝聚社群並推動地方公共事務，在對返鄉青年不盡友善的政策環境下，和朋友們一同努力為雲林海線帶來活力。洪滄青、胡善翔的〈風中紮根：箔子寮的社會永續路徑與挑戰〉，探討在鄉村中的「社會永續」現況，呈現居民對「永續」的多元想像與詮釋，以實例回應既有社會永續文獻中著重自然災害而忽視社會信任與凝聚力的侷限，反思在台灣鄉村社會推動永續發展時，面臨資源有限、人口流失、社會信任不足時的挑戰。

主題三：「生活在『風頭水尾』」，收錄五篇文章，涵蓋教育、抗爭、海廢再利用、飲食文化、基礎建設等不同面向。

林庭如、黃于瑄〈海風中未來藍圖：三條崙孩童與「文化不利」的交織書寫〉，呈現三條崙學童在文化、教育與家庭資源匱乏下的成長處境與未來想像，反省教育學中「文化不利」的概念，並主張應綜合考量地區歷史、社會文化結構與多元生活可能，減緩文化不利帶來的影響。胡景堯的〈大是大非：抗爭中的道德與責任〉，描寫四湖反風吹自救會會長吳連進先生目睹家鄉劇變，返鄉抗爭風機與光電開發案的行動與信念。透過道德人類學視角，分析吳會長在家鄉、土地、國家之間所承擔的道德責任與行動意義。黃則鳴的〈箔子寮海廢中的環境符應：再利用的垃圾人類學初探〉探討居民如何將海廢物件轉化為生活與景觀的一部分，反映了人與環境之間的「符應」(correspondence)，使廢棄物成為社區記憶與地方再生的媒介。陳弘祐、劉湛湛的〈自海而食：箔子寮人如何透過飲食與交換回應在地環境〉，探討居民如何運用地方環境知識(Loc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在不穩定的濱海生態與人口外移壓力中形塑極具韌性的飲食與交換實踐。蘊含風土性的「食物」透過感官、技術與關係三重韌性迴路，連結了環境、勞動與情感。吳佩珍、陳宇翔、楊依婕〈明天有明天的風吹：刮著大風的道路上，箔子寮居民如何生活〉，則以宛如紙上電影的鮮活鏡頭，帶我們經歷居民如何在冬季的強勁東北季風中前行。運用 Tim Ingold 的「踐行(wayfaring)」概念，分析風、基礎設施與身體感知的互動，展現居民如何迎風而行、在大風中生活。

本屆成果論文集有幾項創舉。首先，特別感謝在地方成果發表會上致詞的吳連進先生。吳先生用心良苦，寄深刻期望於致詞之中，同學們深受感動，特別將吳連進先生的致詞收入論文集的序言。

其次，收錄三條崙資深文史工作者，虎尾國中吳文貴老師的兩篇「必也正名乎」的短文。首先是〈試說箔子寮之箔？〉，追溯「箔子寮」地名的由來與和漁業文化的關聯。第二篇〈正名三條崙派出所倡議〉細數「三條崙」地名的歷史意義與自然地貌來源。衷心感謝前輩的指教，特別收錄在論文集之中。

論文集還收錄了洪浥青同學的田野攝影集〈在風頭水尾生活〉。在田野實習期間，浥青背著相機，拍攝了漁港邊無處不在的怪手、綿延的沙袋、村落裡晾曬紅潤肥美的烏魚子、老人家日常勞動的串蚵殼、陪伴同學們的療癒犬阿黃，以及作為逃脫田野壓力的善水咖啡（第三場所）。影像紀錄深具意義，特此收錄。

涂峻清〈風頭水尾中，田野的田野〉則記錄了作者隨實習課程進入箔子寮的十二天經驗。以類似《南海舡人》的筆法，記錄了課程中的時間節律、空間安排、社群運作，反思田野課程作為人類學訓練的意義。這篇小記的結尾，揭示出本課程做為文化田野方法論訓練，側重學術能力的培養，卻相對忽視了更為務實的人類學應用層面。峻清的小記很可以提醒我們田野之於社會的意義，在此特別摘錄：

……對許多（且是課程中的大多數）不會繼續讀人類學研究所並以田野工作的學術工作為業的學生們而言，田野課可以留下什麼？這堂課有學生想做設計，想做永續工作，做商業工作、做社造，想讀其他學科研究所，或想離開人類學，那麼田野課程的訓練留下什麼？

我認為這才是人類學最可以發揮影響力且留下意義的地方，就是透過實作的訓練，在心性跟方法上，讓人類學的精神帶到其他領域中，這遠比理論意義、文獻熟悉、好的研究問題與解釋來得重要。具體而言，我認為對設計的人來說，能透過田野觀察和訪談，來理解使用者的感受與經驗，進而為使用者而設計，就能擴散田野的精神；或是永續工作中，重視在地人的感受，同時也具有轉換位置、去熟悉化情境、訪談與收集資料的能力，就讓人類學田野工作的訓練是有留下影響的。希望這些實作或應用層面的訓練，可以在人類系的田野課程中被跟高度學術性的訓練並置甚至受到同樣的肯認，讓同學們更意識到這部分的練習，以及想像未來的工作有哪些是可以受益於人類學訓練的，讓人類學可以對這個世界更有助益（涂峻清 2025〈風頭水尾中，田野的田野〉）。

## 感謝協助我們的鄉親、師長、助教與朋友們

本屆文化田野能順利進行，竭誠感謝箔子寮鄉親的協助。蔡茂昌先生於 113 年秋季再度來到人類學系為同學介紹社區，協助聯絡受訪者。箔東村蔡心娜村長為我們引介受訪對象，繼續發揮高超手藝，在寒風中親自前來民宿現煮海鮮麵和火鍋，還經常幫我們加菜。春天民宿老闆蔡文進與老闆娘周招伶每日補充零食餅乾熱茶與水果，讓我們在春天民宿與西天寺的各個空間安心開會討論。善水咖啡在田野期間繼續作為同學們的溫暖避難所與「解憂咖啡店」；老闆王柏惟與老闆娘丁俞伶費心張羅週日的休息同樂，以及成果發表會下午的「當我們淨灘同樂趣」活動，為同學們帶來溫馨難忘的回憶。福建熱炒店蔡福建夫婦為同學烹煮熱騰騰的紅豆湯。吳連進先生、蔡文進老闆、周招伶女士、蔡心娜村長共同招待田野實習結束前的豐盛晚宴，銘感五內。蔡茂昌先生在成果發表會當日悉心招待午餐，誠懇鼓勵我們，特此致謝。謝謝蔡茂源先生、蔡搖先生始終支持人類學系的田野實習調查。心娜村長長年投入基層社區工作，格外辛勞，願這份致謝能傳達我們的一分敬意。

特別感謝四湖鄉長吳勁葦兩年來的支持與勉勵，以及在田野期間的諸多協助。同時感謝口湖鄉長李龍飛抽空受訪，並撥冗出席發表會致詞，給予同學鼓舞與肯定。誠摯感謝普天宮蔡明璋主委、蔡瑞泉總幹事、王隆智先生與會計高淳斐女士的大力協助；建陽國小陳智冠校長出借多功能教室作為地方成果發表會場地；吳連進先生委請善水咖啡布置精緻茶點。謝謝蔡心娜村長、蔡茂源先生、蔡茂昌先生、吳志勇先生、蔡宗豪律師、朱德義先生、吳連進先生在成果發表會上慷慨分享心得感言，以及您們賦予團隊的包容與信任。您們的付出，我們點滴銘記於心。

本年度的文化田野，仰賴兩位助教盧佳秀與郭天祐的大力協助。兩人曾於 112 學年度修習本課程，並於 113 學年度擔任助教。佳秀與天祐發揮超強行政與諮商能力，密集與同學討論，協助同學將雜亂的經驗慢慢整理為有意義的現象，更在大家極為焦慮脆弱的春季寫作階段擔任堅實後盾。收稿之後，從論文格式到田野倫理逐一細心檢查。天祐負責繁瑣的校訂與排版工作，佳秀挑起繁重的行政雜務。若本屆文化田野能對同學、對地方帶來些許意義，兩位助教功不可沒。特別感謝鄭靜蓉同學設計極富美感與巧思的發表會海報與論文集封面，以及蔡卓霖適勁有力的題字。

謝謝人類學系成果發表會的評論人：田昺、蔡卓霖、饒祐睿、李橋河、涂峻清、鄧教東耐心閱讀同學們的論文，惠賜剴切意見。也謝謝呂欣怡老師撥冗參與，提出具體實際的建議。特別感謝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學系林崇熙老師前來參加建陽國小成果發表會，於會後多次與我們討論教學方向，並專程前往 2025 年人類學與民族學年會，擔任雲林場次的評論人，給予極富洞見的建議。謝謝蔡

宗豪律師，在發表會之後和我深入分享年輕世代的心得，讓我更了解海線生活的悲欣與美麗。謝謝斗六米地書店許菁珊、林厝國小教師黃筱雯、曾任職觀樹教育基金會長駐成龍濕地的郭淑貞，多年來為我介紹雲林沿海，並且無償擔任緊急後勤支援。感謝劉蕙瑄助教、蘇殷甲助教、王梅霞主任、鄧教東先生在行政上的全力支持。此次田野，台大社會所碩士涂峻清全程參與，一同開會，為同學們的研究方向提供建議，也協助處理行政事項，特此感謝。

本研究受臺大人類學系以及臺大文學院「新世紀臺灣人文學研究」子計畫「從文化多樣性、島嶼世界到諸多世界」的補助，謹致謝忱。

最後，謹向讀者說明：本屆各篇報告均附同學們的精美攝影，惟受經費所限，僅能保留部分彩印。歡迎讀者參考電子版論文集（<https://ntuyunlin.org>）。

黃郁茜 謹誌於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2025 年 10 月 7 日

## 致謝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課程，感謝所有幫助我們的鄉親與先進：

四湖鄉長吳勁葦先生、口湖鄉長李龍飛先生、箔東村村長蔡心娜女士、蔡茂源大哥、蔡茂昌大哥、善水咖啡王柏惟先生、丁俞伶女士、吳連進先生、蔡搖先生、普天宮蔡瑞泉先生、蔡明璋先生、王隆智先生、高淳斐女士、許麗雪女士、游清琇女士、春天民宿老闆蔡文進先生、周招伶女士、船長黃正鎮先生、福建熱炒老闆夫婦、雲林區漁會同仁、飛沙派出所同仁、海漁基金會同仁、建設課吳昂謹課長、四湖鄉清潔隊隊長吳秀珍女士、蔡宗豪律師、博幼基金會吳怡慧老師、博幼基金會林嫻敏社工師、荒涼驛吳志勇先生、海口蒜林焯智先生、向天歌蔡英地先生、黃梓鉸先生、海清宮林彩雲女士、吳雙喜理事長、朱德義先生、吳媽媽烏魚子、王琴芳女士、三崙國小陳仕祥校長、蘇少亭主任、張承祐老師、陳佳莉老師、三崙國小同學們、建陽國小陳智冠校長、鄭杏如主任、施慧霜女士、吳冠佑先生、石頭屋黃玄胤先生、紀郁綺小姐、紀連東先生、吉品玉米吳文吉先生、福家草莓吳一庭先生、志忠鴨肉羹老闆、盈來越南美食、蔡峰女士、張永明先生、鄭俊利先生、張景山先生、吳文華先生、吳克敏女士、蔡慶良先生、蔡秀華女士、蔡吳金女士、蔡忠誠先生。

深深感謝所有箔子寮居民們對本次田野團隊的熱情招待與友善協助。

主題一：  
淤積的漁港





## 紙上漁港：箔子寮漁港的治理失能與未竟的發展藍圖<sup>1</sup>

蘇穎欣（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一年級）

### 摘要

本研究聚焦臺灣雲林四湖鄉箔子寮漁港，旨在揭示該漁港及地方發展長期受困的深層結構性因素。本文挑戰將地方停滯簡化為資源匱乏或政策失誤的觀點，主張其背後是由敘事治理（narrative governance）、懸置願景（suspended aspirations）、基層官僚的實作困境（bureaucratic predicament）交織而成的治理失能僵局。研究指出，箔子寮的發展藍圖歷經多次重啟與改版，從「漁港特區」到各式觀光願景，始終停留於紙上構想。由上而下的政策敘事持續描繪地方發展圖景，但多數規劃缺乏實質部署，不僅受限於選舉週期，也與在地條件脫節，難以有效落實。同時，基層機關在權責不明、資源受限的結構中，往往淪為預算與上級指令的被動執行者，缺乏自主規劃與執行動能，僅能象徵性回應民意，導致計畫長期停滯於紙上作業。最終，地方居民在一再落空的發展承諾中，陷入持續的等待、失望與情感懸置。

關鍵字：敘事治理（narrative governance）、懸置願景（suspended aspirations）、基層官僚實作困境（bureaucratic predicament）、未實現的計畫（unactualized planning）

---

<sup>1</sup> 本文為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課程之期末報告。特別感謝黃郁茜教授，以及郭天祐、盧佳秀兩位助教的悉心指導與帶領。誠摯感謝箔子寮居民蔡搖大哥、蔡茂昌大哥、蔡茂源先生、蔡瑞泉大哥、蔡文進先生（春天民宿）、李龍飛先生（口湖鄉長）、黃正鎮先生，好幾位盛情款待卻謙虛不願具名的前輩、以及所有在箔子寮對我們友善相待的居民朋友們，感謝你們的支持與分享，使本次田野得以順利進行。亦感謝饒祐睿學長對本文所提供的寶貴建議與評論。最後，謝謝所有一同參與田野的同學，在這段過程中彼此扶持、共同完成這份學習成果。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 前言

初次走進箔子寮漁港，是在一個冬日清晨。提起漁港，原本在腦海中浮現的，是一幅充滿漁獲、商販與觀光人潮的圖像。但眼前天氣陰沈，港內寧靜得幾近凝止。沒有魚市場的喧囂，沒有漁船歸港的急促腳步聲。

雲林對我而言，是一個既遙遠又模糊的地名。筆者非台灣長大，對這塊土地的理解，多半來自轉述與網路上零散的資訊，更別說是沿海一隅的箔子寮漁港。出發前，我試著透過網路拼湊出這座漁港的樣貌。新聞上充斥著對箔子寮漁港的描繪：堤防延伸、觀光魚市、漁港轉型，如火如荼的發展圖景，在新聞標題與公部門簡報中輪番上陣，彷彿一場即將到來的變身正在此處醞釀。然而，真正映入眼簾的，卻是漁港淤積嚴重、設施老舊、以及廢棄船隻靜靜停泊的寂寞港景。眼前的畫面，與筆者原先想像大相逕庭，港面平如止水，連一絲騷動的鹹味都欠缺。

這種強烈的落差感，成為田野工作的第一重衝擊。與村民、漁民的閒談中，逐漸浮現的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但人人皆知的停滯狀態。他們說「說了很多年，還沒開始。」、「有啦，是有在規劃啦，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做。」各人話語輕淡，語氣無奈，其中夾雜著對未來的期盼，也堆積著被反覆失信的疲乏。

筆者遂意識到，這並非單一工程的拖延，也不是偶發政策落空的結果，而是長年堆疊下的結構性停滯，一種治理敘事持續前進、現實卻原地踏步的治理樣態。這份研究正是從這樣一種「總是在等待，卻從未真正開始」的矛盾狀態出發，試圖釐清箔子寮漁港發展長期「堵住」的深層機制。



圖 1 箔子寮漁港  
(筆者攝)

## 一、在治理敘述中前進，在現實中停滯

走進箔子寮漁港，會看見岸邊靜靜停著幾艘老舊的船，停泊位置很淺，靠潮水高漲才能勉強出入。漁民說：「這邊船早就進出不方便了，港口淤沙這麼嚴重，怎麼觀光？」這句話，點出了政策規劃與地方實況之間的落差。

### （一） 治理失能：漁港發展為何「堵住」？

這樣的落差，或許可以回到 James C. Scott 對「高現代主義」的批判來理解。在他筆下的 *Seeing Like a State* (1998) 指出，現代國家治理的一大特徵，是建立在高現代主義 (high modernism) 信仰之上。這種意識形態相信只要掌握足夠的科學知識、技術工具與制度手段，就能透過理性規劃重塑社會秩序。在這樣的邏輯下，城市、港口、農田、道路等基礎設施都能以幾何化、模組化的方式重新設計，進而實現效率、整齊與現代性的想像。Scott 對高現代主義的批判指出，這種信仰往往假借科學與技術的正當性，卻缺乏對在地知識、歷史脈絡與社會複雜性的理解與尊重。正如他所寫：「高現代主義不應與科學實作混為一談，它是一種信仰，藉用科學的權威，卻對全面規劃的可能性抱持不加批判、甚至過度樂觀的態度。」(Scott 1998: 4)

箔子寮漁港的治理與發展，正展現出理性規劃與在地實踐之間的張力。從「港口外移」到「觀光轉型」，政策設計者所提出的計畫與藍圖，無不體現一種「看得見的秩序」：功能分區、分年預算、精密的工程規劃、逐項條列的效益預測等。這些規劃表面上理性、完善，卻往往忽略了漁業生產的彈性勞動模式、漁民的日常操作習慣、地方組織間的協調困難，乃至於漁港自身長年累積的生態變化與基礎建設疲弱的現實。儘管規劃圖冊鋪陳出一幅又一幅的未來景象，從水產加工大樓到漁港外移工程，卻難掩基礎設施老化、淤沙嚴重、漁船日益稀少的事實。換言之，這些政策看似合理，實則卡關、停滯、懸置，反映的不只是資源不足或行政效能問題，更顯示出高現代治理邏輯在地實踐中的失靈，也是一種根植於治理視野中的「治理幻象」：政策語言不斷前進，但地方行動始終停滯。

這種由規劃主導的治理幻象，雖形塑了發展的視覺語言，卻也為執行端留下難以實現的任務，將無法落地的藍圖轉化為可執行的行動。這正是基層組織在日常運作中所面臨的治理張力，亦是下一節將延續討論的核心。

### （二） 敘述治理

正如 Scott 所說的「理性設計幻象」，政策設計者看重的是規劃的圖像完整性，而非在地實作的可行性。當計畫優先考慮外顯的視覺化秩序與敘事治理，而

非建築於地方條件之上，治理實踐就容易淪為紙上談兵，難以推動真正的改變。為了更深入理解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以及這些前瞻性的發展藍圖如何在地方治理中發揮作用，接下來，我們將引入敘事學中的概念“prolepsis”，探討其在治理語境下的意義與效力。

Prolepsis 原是敘事學中的一個時間性概念，意指敘事中「先於時間而述說」（telling before time）的表達方式，亦即尚未發生的未來被提前說出、形構為敘事的一部分（Bridgeman 2005: 125）。

在環境人文學中，Martens 與 Vermeulen（2021）將此詞延伸為 *infrastructural prolepsis*，指涉當代基礎建設如何預先假定一個可以到達的未來，並據此建構行動方案與資源配置邏輯。*prolepsis* 在此成為一種治理手段，使尚未發生的未來得以被語言化與物質化，並進一步引導當前的選擇與實作。

延續這樣的脈絡，Webb 與 Gulson（2020）將 *prolepsis* 引入政策研究語境中，提出「政策預擬」（*policy prolepsis*）的概念，指出政策並非一個明確、已完成的治理實體，而是一個持續「成為」（*becoming*）的過程。政策的效力不在執行，而在於它如何被感知並預先引發行動。正如作者所言：「政策預擬是一種尚未發展成熟的政策倡議或實施中所產生的實作行動，是政策成為（*becoming-policy*）的一種形式」（Webb & Gulson 2020: 54）。

這種觀點挑戰了傳統政策研究中「政策、執行、效果」的線性模型，強調政策在尚未被正式執行時，便已透過視覺圖像、文字承諾與情感氛圍，在地方治理場域中產生真實效力。地方行動者基於對未來政策的預測，可能調整自身策略、展開資源動員，甚至進行前置性實作，使得政策藍圖成為象徵性秩序的載體與情感動員的工具，而非單純的規劃說明。

本研究正是以此視角出發，思考漁港治理中那些尚未開始施作卻已產生治理效應的政策藍圖。這些政策之所以持續被提出，並非具備執行條件，而是作為象徵性敘述，維繫治理的正當性與秩序。

為了理解漁港治理中那些「始終存在於語言中、卻未真正落地的政策藍圖」，筆者借用 Anjaria（2016）對 Björkman 孟買研究（2015）的再詮釋，將這類現象理解為一種「未實現的計畫」（*unactualized project*）。

Anjaria 在探討孟買街頭經濟與城市空間權利的研究中指出，許多基礎建設政策與新自由主義治理模式「存在於政策文本與願景藍圖中，但並未真正實現」，它們“*exist as unactualized projects rather than as new forms of governance*”（Anjaria 2016: 15）。這類政策透過反覆出現在地方會議記錄、新聞稿與官員口述中，持續生成一種「政策正在推動」、「改變即將發生」的治理氛圍。正如 Anjaria 認為這

些藍圖更像是「開發者的夢想」而非真正的治理實作，反映了語言治理與地方社會之間的落差與不對稱。

### （三） 基層官僚的再轉譯

正是在這樣一個語言前行、實作停滯的結構性格局中，地方的基層官僚體系，包括鄉公所與漁會等末端治理單位，承接中央政策語言與地方張力的中介。雖然他們形式上肩負政策落實之責，實際上卻往往處於「被動等待核定」、「只能配合預算時程」與「無從改變結構限制」的執行困境之中。因此，若要更細緻理解治理失能的生成過程，必須進一步將目光轉向這些基層官僚的實作邏輯與因應策略。

Lipsky (1980) 指出，所謂「基層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s) 並非僅是政策的末端執行者，而是在具體實作中，透過高度自由裁量權與日常實務慣例，實質形塑政策效果的關鍵行動者。這一視角有理解基層組織在資源有限、責任模糊下的日常實作與策略運作。

這也說明，治理失能不僅是一種制度設計的斷裂，更是日常操作中不斷被選擇與再生產的實踐結果。例如，在風場開發爭議中，漁民組成自救協會以爭取權益，正是因為作為基層組織的漁會長期缺乏實質作為，未能有效代表漁民發聲與協商。這正是 Lipsky 所強調的核心，政策在實作中被建構、扭轉，乃至凍結，正是治理失能的動態所在。

### （四） 懸置的地方願望

如果說敘事治理構築出「正在進行」的發展假象，而基層官僚則在語言與現實之間尋求生存與平衡，地方居民是治理語言最長期的承受者，身處發展敘事的包圍中，卻反覆見證政策落空，於是產生一種既不甘放棄、又無力相信的矛盾心態：一種懸置的願望 (suspended aspirations)。

這種懸置並非簡單的失望或幻滅，而是一種反覆被激發又被冷卻的情感循環。Björkman (2015) 與 Anjaria (2009) 對未完成基礎設施的分析指出，那些始終未能實作的工程，反而更強烈地存在於地方語言、圖像與記憶中。正因如此，政策藍圖與發展敘事即便未能轉化為物質行動，卻仍舊能透過語言與記憶維持其治理效力，使地方人民不斷回憶、批判、寄望與等待。

這種懸置狀態既是一種治理結果，也是一種治理資源。它讓治理得以延續正當性，讓政策承諾得以不被清算，也讓居民在無法改變現實的情境中，擁有一絲象徵性的未來依靠。然而，這樣的希望若無法兌現，最終將轉化為對制度的疏離與冷感，構成地方政治信任斷裂的根源之一。

## 二、 區域文獻回顧

箔子寮漁港的發展經歷呈現了其從繁榮到衰退的歷史軌跡。本節將從兩個面向探討：首先，梳理漁港的歷史興衰，揭示環境與經濟結構變遷的影響；其次，探討地方需求與政策規劃間的差異。

### (一) 箔子寮漁港興衰記

雲林縣的近代化漁業於 1950 年代開始興起，並在 1975 年左右達到巔峰，帶動沿海地區漁業設施的快速發展。由於國庫資金有限，麥寮、臺西、四湖和口湖等地方士紳與民意代表為爭取建港經費展開激烈競爭（林國賢 2011：16）。箔子寮漁港位於雲林縣四湖鄉，地處外傘頂洲北端，與澎湖縣隔海相望。當地沙泥底質是底棲魚類、蝦類和貝類的理想棲息地，自然形成優良漁場（臺灣漁業及海洋技術顧問社編 1988：6）。箔子寮最初只是當地漁民泊船的簡易處所，但因濁水溪漂沙問題阻塞了雲林其他漁港的航道如三條崙、臺西、青蚶等，使箔子寮因其有利地理條件成為漁船的理想停泊地，逐步發展為雲林縣的重要漁港。（林國賢 2011：53）。

漁港建設於 1971 年啟動，經過數年的分期施工，至 1980 年完成主要設施，包括 682 公尺的防波堤、1074 公尺的淺水碼頭、217 公尺的深水碼頭和 4.7 公頃的泊地，並配備魚市場與檢查哨。同年 10 月 26 日，漁港正式啟用，成為雲林縣重要的漁業基地，亦為當時規模最大的漁港之一（臺灣漁業及海洋技術顧問社編 2003：22）。隨著漁港運行多年，港口與航道因沿岸漂沙影響逐漸淤積，船隻進出愈發困難。1985 年至 1986 年間，雖進行防波堤延長與局部疏浚，但漂沙問題始終無法根治。此外，六輕工業區的設置進一步衝擊了當地漁業，導致超過 30 種魚類消失，烏魚更完全滅絕（劉曜華等編 2006：180）。

外傘頂洲的形成曾為漁港提供天然屏障，但隨著年代變遷和環境變化，外傘頂洲逐漸成為阻礙漁民進出航道的因素。加上北堤沙灘地層下陷與沙灘流失問題，港口功能進一步受限，船舶停靠數量驟減，漁民收入銳減。如今，船隻僅能在漲潮滿水位期間進出，作業效率顯著降低，箔子寮漁港曾經的繁榮景象已不復存在。（郭天祐和劉曉語 202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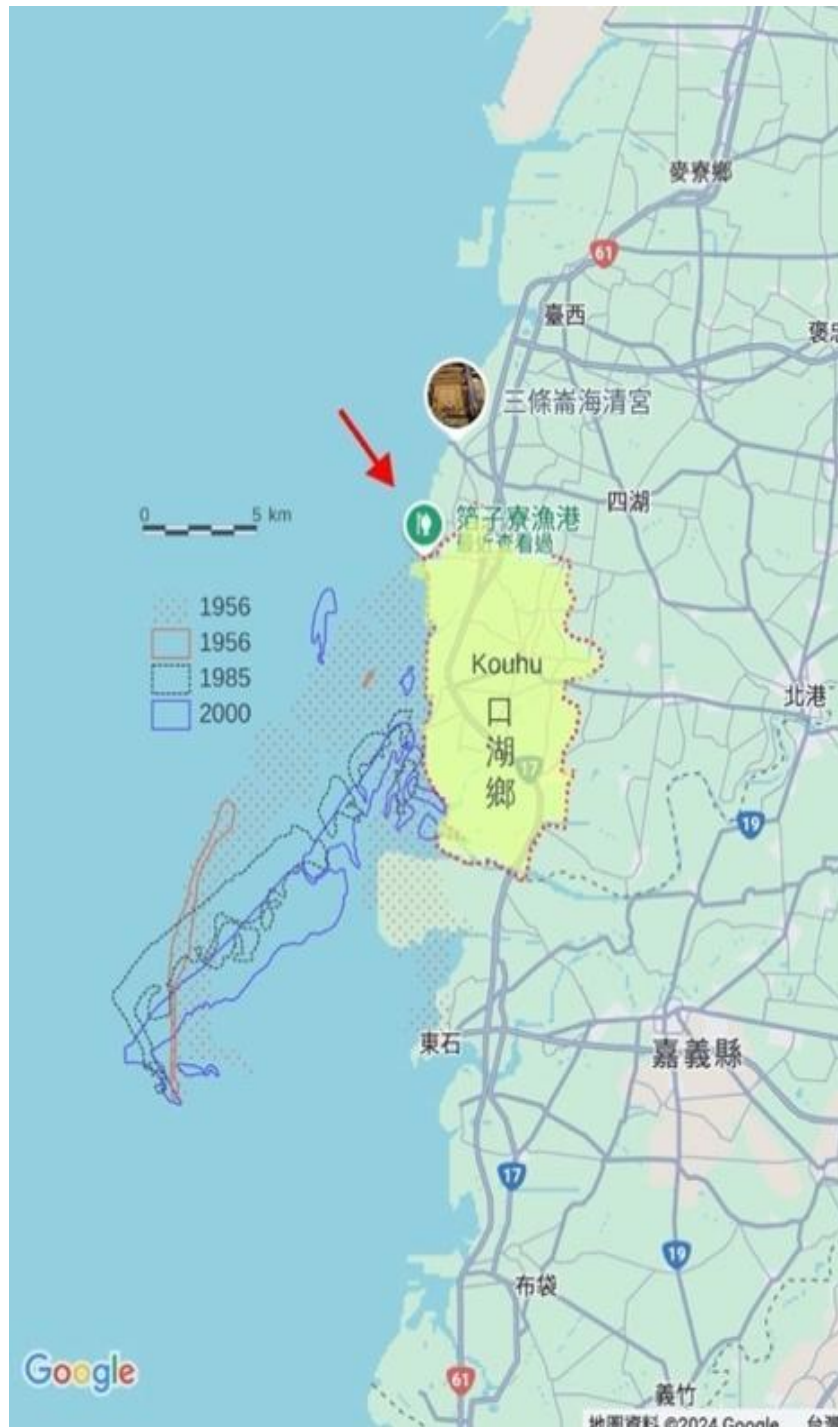


圖 2 箔子寮漁港及外傘頂洲於 1956 至 2000 年間的變化相對位置重疊圖<sup>2</sup>  
(箭頭標誌及圖片重疊為蘇穎欣所製)  
(資料來源： Google Maps 2024 及 Commons Wikimedia 2024)

<sup>2</sup> 圖中標示之 1956 年包含兩種圖徵：紅色點點區域表示當時沙洲可能出現或堆積的範圍，涵蓋裸露乾沙洲、潮間帶及曾有沙體覆蓋之區域；紅色實線輪廓則代表 1956 年沙洲實體的邊界。

## （二） 發展觀光

面對環境變化挑戰，僅靠堤防加高與疏浚工程無法解決根本問題。部分漁民期盼透過抽沙填海造陸，將漁港腹地向外延伸，以徹底解決淤積問題，並提升箔子寮的地理優勢，使其具備發展觀光魚市的潛力。根據周麗蘭（2024）報導，口湖鄉長李龍飛表示：「箔子寮是雲林的命脈，漁民的最終期待是將漁港外移……它具備成為觀光漁港的潛力！」然而，外移計畫涉及龐大的資金需求與潛在的環境影響，仍需詳細評估其可行性。

就筆者田野所見，箔子寮漁港目前僅剩三艘仍固定出海的漁船，港內淤沙情形嚴重，即便是僅約四五噸的小型漁船，也難以在非漲潮時段安全進出。

港內的基礎設施亦長期失修，堤防老舊、泊區泥沙淤積嚴重。整體而言，漁港遠未具備支撐大型觀光開發或水產加工產業進駐的基本條件。在此情境下，縣政府帶頭在新聞媒體所宣示的「港口外移」與「觀光轉型」藍圖顯得格外抽象且難以落實。雖然縣府多次強調將推動漁港整建，實際上卻缺乏具體的時程規劃、資源挹注與權責協調，致使地方陷入一種「等待規劃實現、卻遲遲未啟動」的治理困局。這正是本文所關注的治理失能現象：發展藍圖在語言中不斷再生，卻無法在現實中轉化為行動，形塑出一種以未來為名、卻始終未到來的敘事治理。

## （三） 轉型藍圖

在上一章節所述的象徵藍圖背後，實則隱藏著一段龐大的政策規劃歷史。「離島工業區」作為雲林沿海長期以來最具代表性的轉型藍圖之一，不僅反覆被重新命名與包裝，也不斷在國家與地方發展話語中被喚起、延宕與放棄，成為一種難以落實的治理想像。

### 1. 離島工業區

1990 年代初，經濟部工業局提出「雲林離島工業區發展為自由貿易區」的構想，計畫透過填海造陸，在沿海沙洲打造重工業基地。雲林縣政府在其中積極推動，幾乎可視為時任縣長廖泉裕奔走協調的成果（許冠澤 2024：26）。該構想於 1994 年具體成形，規劃中將麥寮、新興、臺西與四湖劃為四大工業區，總面積達 7,428 公頃，依地理條件分別設置煉油、鋼鐵與自由貿易港等設施（劉曜華等編 2006：199），體現當時重工業與出口導向的國家發展策略。

在行政執行層面，四個工業區分別由不同單位負責規劃與開發：麥寮由臺塑集團主導，新興區由榮工處承辦，臺西由雲林縣政府負責，四湖則完成了工業用地編定，預計打造完整的產業聚落。然而，除了麥寮的六輕計畫最終落地執行，其餘地區皆面臨不同程度的停滯與轉向。

以新興區為例，許冠澤指出，臺西區與新興區原預定由國營事業進駐開發，但隨著國家政策轉向、公營企業市場地位弱化，藍圖迅速失去實踐條件。中油、中鋼、臺電等企業雖一度聲稱擁有大面積用地需求，並投入規劃經費，卻不到五年便相繼退出。這不僅與市場自由化、民營化浪潮有關，更反映出地方抗爭、環評制度與新興環境法規對大型開發構想的限制，終結了過去「想去哪就去哪」的國家工程邏輯（許冠澤 2024：58–60）。

此外，作為政策支撐背景的「六年國建」計畫本身，也因規劃粗糙與財政來源不明而淪為政治口號。這些計畫看似宏大，實則缺乏具體財源與執行機制，最終「像家具行目錄」般成為政權轉移與選舉操作所用的語言工程（ibid: 66–68）。

四湖工業區的命運則更加曲折。該區位於整體開發計畫的南端，儘管早於1991年即完成工業用地編定，並陸續規劃設置煉油、鋼鐵、自由貿易區與工業港等用途，卻歷經如「臺塑汽車城」、「離島經貿園區」等開發構想皆未具體落實。最終，四湖鄉原訂工業用地於2004年解編，2005年行政院正式同意終止開發。這段沉寂的歷程，構成雲林離島工業區計畫中所謂「低度發展」的一頁，也映照出臺灣自解嚴後大型開發政策推進的落差與區域治理的不均衡（黃郁茜 2024: ii–iii）。

如同媒體報導所指出的：「歷時17年，僅六輕設置……這項國土改造計畫幾乎宣告失敗」，除臺塑六輕外，其他子計畫全數停擺，原編定的工業區土地長期閒置，甚至反過來限制地方災害應變與土地使用，地層下陷與年年淹水問題仍未解決，原訂的多項企業投資案亦皆停留於紙上（林國賢 2009）。

這些「未實現的發展藍圖」最終轉化為地方政治語言與象徵治理的素材，正如 Lisa Björkman（2015：232）所言，許多發展計畫所建構的「語言上的未來」（a future in language）經常與「物質上的失效」並存，卻仍擁有政治上的象徵資本（unrealized projects with real symbolic capital）。對地方而言，藍圖從來不只是政策工具，而是一種治理的象徵遺產，即便無法實現，它仍深植於居民的未來想像與當代批判之中。

在前兩節中，我梳理了箔子寮漁港的歷史興衰軌跡，並聚焦於兩階段的發展藍圖如何在政策層面歷經構想、轉向與懸置，從「離島工業區」到「水產精品加值園區」，反映出台灣沿海治理長期存在的高空描繪與落實落差。這些政策計畫雖然以振興地方為名，卻常停留於紙上構想，實質改變有限。



以下三節將進入本研究的核心民族誌材料，透過在地田野觀察與訪談，具體呈現這些未實現藍圖如何被地方居民感知、詮釋與經驗。第三節〈敘事治理與未竟的藍圖〉將探討淤沙治理如何在制度運作與地方知識之間失效，並分析政策語言如何主導治理而與現場脫節；第四節〈懸置的願望〉則聚焦地方居民如何看待那些「有治理計畫，卻沒有實際進展」的情況，以及這些懸置現象所帶來的情緒與期待；第五節〈治理的轉譯與基層實作〉會進一步討論縣政府、鄉公所與漁會三個單位在回應地方問題與承接上級政策時，如何在制度限制下進行治理實作與角色調整。透過這些民族誌素材，本文將分析治理語言如何進入地方、失效於現場，並在制度與行動者之間被重新轉譯、應對與折返。

### 三、 敘事治理與未竟的藍圖（narrative governance）

在臺灣地方治理的脈絡中，「藍圖」長期作為發展治理的核心象徵。過去，「藍圖」常與建設畫上等號，代表一項實質工程即將啟動的標誌，是政府執行力與空間治理能力的體現。然而，進入 21 世紀以來，尤其在地方資源緊縮、基層行政能量受限的背景，「藍圖」逐漸轉化為治理敘事的一環，成為政策說帖與選舉的核心素材，並不一定對應具體的工程進度或執行計畫。從實體建設到語言治理的轉變，反映的不只是治理條件的改變，也體現出治理者觀念的轉向，從「造得出來」轉為「說得出來」，從對空間的技術治理轉向對未來的敘事建構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其實並非始終處於被動接受治理語言的角色。有地方人士提及，箔子寮漁港的設立即是地方早年主動向中央陳情爭取的結果，顯示出地方過去確曾具備一定的政治動員與爭取能力。這樣的歷史經驗提醒我們，「藍圖」並非一開始就是懸置的象徵，它曾經是地方實現基礎建設的重要手段。然而，本文所關注的，是在治理語言日益主導政策實作的當代脈絡中，這種能動性如何逐步被消解與取代。

這樣的轉變也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才是「好的治理」？過去的發展理想著重於建設能量與產業成果，如今則更傾向於展現規劃藍圖、敘述願景與操作媒體話語。地方政府透過規劃案、簡報與政策語言來形構治理正當性，雖然有助於維持「治理正在進行」的象徵印象，卻往往難以轉化為場域內可感的改善行動。箔子寮的個案正提供了觀察此一治理轉向的重要視角。當語言主導治理、藍圖取代工程，地方不再只是等待建設的對象，而是持續承受「說了很多、做得很少」的治理懸置狀態。政策藍圖雖未被實現，其遺緒卻未曾消失。當年為工業區徵收的大量土地，至今仍由雲林縣政府託管，大多荒廢無用。

## (一) 有治理計畫，沒實際進展

### 1. 紙上談「變」

2019 年雲林縣政府發布的《變更箔子寮漁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以下簡稱「2019 年主要計畫案」)可視為地方政府對原有都市發展藍圖的再調整與重新定位。該計畫明確指出原計畫面對的人口萎縮、土地閒置與設施未開闢等結構性困境，並以「結合水產養殖帶動產業轉型」為主要發展定位，透過大規模土地使用分區的變更(如將工業區與漁會專用區轉為產業專用區)，以及公共設施配置的檢討(如刪除學校用地、改設公園與市場)，試圖重新重塑地方發展的可能性。

然則，當筆者回顧雲林縣政府發布 2022 年所發布的《箔子寮漁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書》(以下簡稱「2022 年細部計畫書」)時，所見卻並非這些願景的具體落實，而是一種對政策藍圖進一步「技術化」、「中性化」的語言包裝。雖然在空間配置上，細部計畫大致延續了主要計畫中的土地使用變更結果，如確實劃設了面積超過 24 公頃的產業專用區，並重新調整了公園、兒童遊樂場、廣場與停車場用地的位置與面積，但從公共設施使用現況與土地開闢情形來看，多數區塊仍處於「閒置或荒廢」狀態。細部計畫雖強調「落實發展願景」、「提升土地使用效率」、「強化防災韌性」等執行語言，但實際內容更多是對區劃邊界、設施面積與建蔽容積率的精細設定，而非對發展落差的實質回應。

更進一步地，2019 年主要計畫案所描繪的發展預測本身就已顯示治理語言的預設性與與現實的脫節。例如原始計畫人口規模為 7,000 人，通盤檢討時已調降至 3,800 人，而細部計畫則再次下修為 2,000 人，顯示計畫在形式上不斷「修正」，但仍維持一種發展邏輯的再肯定。此外，2019 年主要計畫案中所提出的「產業導入」與「觀光休憩結合」構想，亦未在 2022 年細部計畫書中具體呈現其推動策略，僅以設施類別上的安排(如市場用地、廣場、人行步道)象徵性地回應前者語言，進一步體現出象徵治理的典型機制：政策語言得以持續，但實作條件未曾建構。

這種從主要計畫到細部計畫的過程，並非發展願景的實踐化歷程，細部計畫將上層語言進一步轉譯為區塊、面積、設施編號與建築規定，使治理失能轉化為形式完整的規劃結果，而規劃本身則成為紙上治理的具體實作形式。藉由敘事治理，地方發展的想像不斷被語言所預設，卻始終停留在圖紙上。

## 2. 鋪陳「水產精品加值園區」願景

在發展治理中，政策語言本身即是一種治理方式。針對雲林縣政府於 2019 年提出、並於 2022 年續行的「箔子寮水產精品加值園區」計畫，本節主張，此案所展現的並非單純的政策推動過程，而是一場典型的象徵性治理工程。

2019 年《變更箔子寮漁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七章，是整份文件中象徵治理展演最為集中的部分。縣府在此描繪出一套宏大的發展藍圖，並將整體計畫區重新命名與定位為「水產精品加值園區」，企圖在箔子寮漁港功能逐漸被取代、土地呈現閒置狀態的背景下，重塑其發展定位。

整體規劃亦延續這種敘事操作邏輯，描繪出一座以「智慧養殖」與「一條龍水產加工」為核心的產業示範場域，結合冷鏈物流、研發中心與加工設施，試圖打造科技與傳統交織的新產業模式。計畫文本反覆出現如「挹注科技能量」、「帶動地方產業轉型」、「形塑競合關係」、「配合綠能政策」等語彙，藉此將長期間置的土地重新塑造為充滿潛能與未來性的象徵場域。

2022 年，縣府更進一步提出「箔子寮水產精品加值產業園區」計畫，將原住宅與工業用地轉型為產業專用區，期望引入水產與機械加工業者，以帶動港區經濟與地方發展（雲林縣政府 2022）。為此，特別劃設了包含第一種與第二種產業專用區共約 24 公頃的土地作為產業發展基地，並以「智慧養殖漁業」與「精品加值」為核心口號，希冀形成技術與服務整合的一條龍產業鏈（雲林縣政府 2022：2）。

在空間規劃上，計畫將港埠、產業、觀光與生活空間明確區分為功能分區，如「關聯性產業區」、「休閒便利商業區」、「生活居住區」、「防風綠帶軸」等，展現出一種以都市治理邏輯進行土地秩序化與功能化的實作。這類空間分類不僅體現行政技術，也是一種將未來秩序「視覺化」的象徵治理策略，試圖將漁港及其腹地轉化為等待開發的潛能場域。

然而，這樣的願景敘事對於在地條件的具體回應卻相當薄弱。雖然計畫中提及地層下陷、氣候變遷與漁業人口老化等結構性問題，但這些現實挑戰多半僅作為發展轉型的論述資源出現，具體政策並沒有回應這些現實挑戰該如何解決。於是，「問題」與「願景」並非彼此對立（「理想願景」並沒有要解決「現實問題」），兩者在政策語言中奇妙地相互增強，強化轉型的必要性，同時遮蔽轉型的難題。

根據縣府說法，該計畫已通過內政部審議，並將每坪標售底價自 6 萬元調降至 1.5 萬元，以吸引業者進駐。官方宣稱園區將整合「智慧養殖」、「一條龍水產加工」、「冷鏈物流」、「產官學研合作」、「永續用地模式」等多重功能，並

於 2024 年舉辦招商說明會，推出四塊整地地塊對外標售（雲林縣政府 2024）。張麗善縣長更以「再造箔子寮榮景」為口號，將本案定位為「九大產業園區」之一的旗艦示範亮點。

然而，在這套看似完整的願景藍圖背後，港區的基礎性困境，特別是長期未解的淤沙問題卻始終未獲根本回應。也就是說，在航道尚未疏濬、港埠功能未恢復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卻優先鋪陳充滿想像力的產業願景，造成紙上規劃與場域現實之間的斷裂。下一節將以「紙上疏濬」為例，分析這種語言治理如何遮蔽基礎問題，進而形構一種懸置性的治理實作。

### 3. 紙上疏濬

「沙」作為地方治理問題中最直觀也最具體的阻礙，在田野中處處可見：它漂進漁港、堆積船道、掩埋蚵棚、阻斷水流，成為地方行動者口中反覆出現的關鍵詞。然而，在政策文件與規劃藍圖中，這些漂沙與淤積的日常經驗，卻往往以抽象的「災害潛勢」、「港埠功能」或「可及性改善」等語彙淡化處理。沙既是阻礙，也是測試治理效能的試金石：它的持續存在，揭露了政策語言與工程行動之間的錯位與懸置。

2022 年細部計畫書中對災害潛勢的描述，揭示了箔子寮漁港面臨的基礎性風險，尤其在第三章〈環境發展現況〉中，清楚指出該港「深受地層下陷影響，颱風時期暴潮位常越過碼頭面，港區地面及道路於颱風豪雨時亦常淹水」（雲林縣政府 2022：13）。從計畫書圖 3-4 災害潛勢區位示意圖來看，漁港所在地亦被劃定為「海嘯溢淹潛勢區」與「超過 1.5 公尺的高風險淹水區域」。這類圖面與敘述，構築出一種明確的風險圖像，也間接表明港區設施功能已明顯不足，應需配套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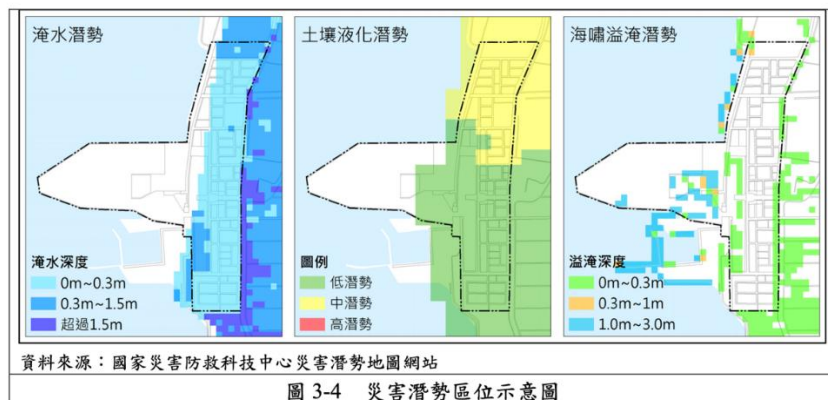


圖 3-4 災害潛勢區位示意圖

圖 3 箔子寮地區災害潛勢區位示意圖

資料來源：雲林縣政府（2022：13）

雖然文本指出政府曾「分年補助雲林縣政府辦理港區碼頭與道路加高工程」，並提及「滯洪池與抽水站」等防災基礎設施的設置，但語句之後卻立即承認「墊高後仍無法有效解決淹水困境」（雲林縣政府 2022：13），並未提出後續補強方案與責任單位，呈現出防災治理語言的自我折返：一方面強調風險存在與治理努力，另一方面又以模糊性的敘述暫時迴避行動責任。

更關鍵的是，整段文字雖圍繞災害風險展開，卻從未正面提及「淤沙」或「漂沙」這個在地方經驗中最直接、最常出現的干擾物。

沙明明存在於港區的水面與底部、存在於漁民的出海經驗中，卻被政策語言包裹進「災害潛勢」這一模糊語彙裡，失去具體技術性名稱，也失去對應的工程實作方案。在此語言治理架構中，沙不再是一個可以處理的對象，而僅是一個被符號化、可被承認卻不可行動的存在。

## （二） 淤沙治理的失效

箔子寮漁港的「疏濬」與「整建」，多年來在地方政策語言中反覆出現，筆者在田野現場觀察到的，卻是另一種情景：港口長年淤積、堤防老舊未修，疏濬工程未見實施。部分捕撈漁民選擇改至三條崙港出海，或甚至退出捕魚行列，另謀生計。仍選擇留在箔子寮的漁民，也只能以小型漁船作業，依賴潮汐時機艱難出港。本章將從捕撈與養殖兩個面向出發，追蹤沙如何在治理制度的懸置中，展示「政策有聲、現場無感」的落差，揭示出一種懸置式的治理模式：治理持續以語言與圖面在紙上推進，卻無法在物質現實中落地實現。

### 1. 出不了海的港口

箔子寮漁港自 1971 年動工、1980 年代初建設完成以來，一度是雲林沿海最具規模的漁港。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與港灣優勢，使其在 1970 至 1980 年代吸引大量漁船進出，成為北來南往船隻的重要停泊點。然而，這段榮景並未持續太久。

1986 年韋恩颱風重創港區，1990 年代六輕工業區的設立，更加劇漂沙堆積，改變海岸地形，導致港區淤積日益嚴重。再加上氣候變遷所引發的海平面上升與強降雨，使原本的天然優勢迅速退場。此一環境惡化與勞動人口高齡化、產業轉型等結構性問題交織，使箔子寮漁港逐步走向沒落。當我們實地踏入漁港時，眼

前已非昔日漁船雲集、魚貨鼎盛的景象，而是一座僅剩三艘固定出海船隻的蕭條港灣。

過去十多年來，箔子寮漁港的淤沙問題持續惡化，港口前方逐漸堆積成沙洲，原本筆直通往外海的航道被阻斷，漁民被迫繞行更遠的水道出海。在箔子寮未見大規模整建或疏濬工程啟動，堤防未見延伸、碼頭亦未修復，僅有一兩台怪手在港邊進行零星的挖沙作業。漁民口中的「北堤延伸」、「水道開挖」與「抽沙上岸」等具體需求，至今未在空間上留下明確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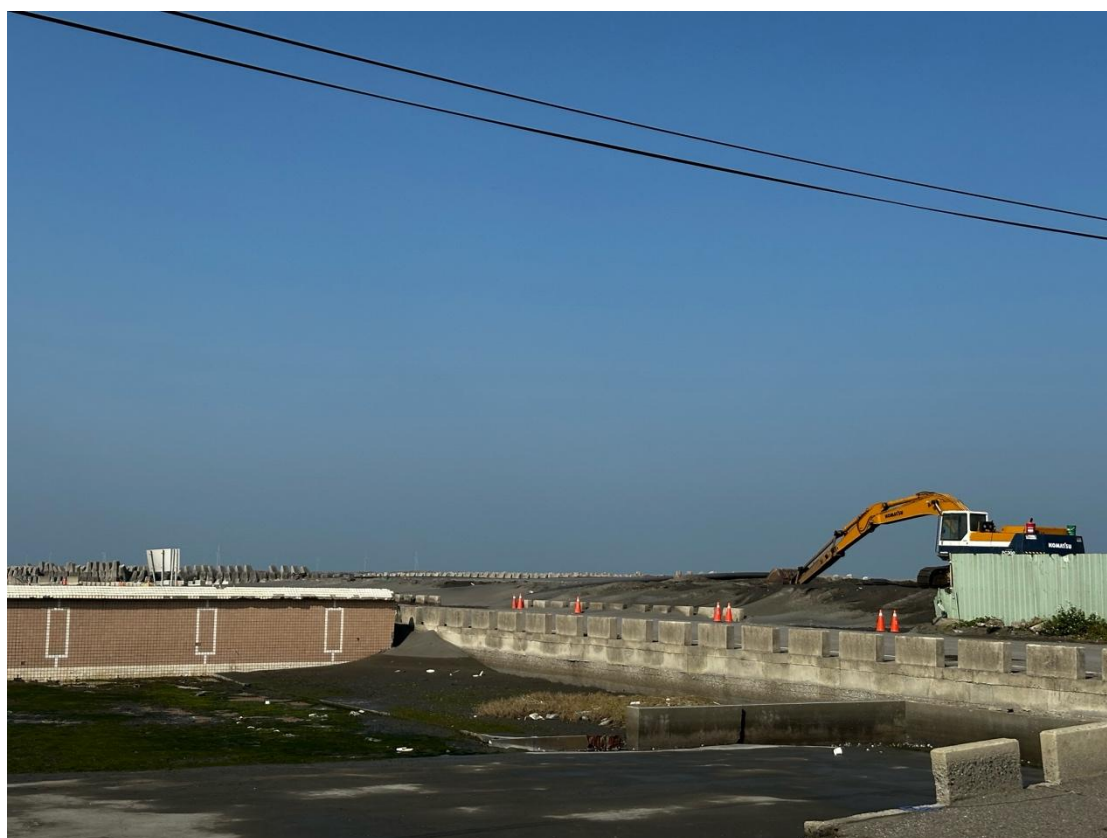


圖 4 箔子寮漁港岸邊只見小小的一架怪手在挖淤沙  
(筆者攝)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從十幾歲就開始隨父親捕魚的楊船長的經驗為我們提供了理解港口退化的切入點<sup>3</sup>。以下，筆者將透過他的敘述與訪談內容，梳理淤沙問題對漁業活動的具體影響。

我有印象沙差不多從二零零幾年就開始淤積，那時港口前面就有一條沙帶，裡面還勉強有一條溝。淤沙很嚴重，完全不能直接開出海，只能往南

<sup>3</sup> 本文所提及的報導人除地方公眾人物如口湖鄉長李龍飛外，皆做了一定程度的匿名化處理，以保障報導人的利益。

邊繞道出去。現在我們出海，都要往台子村那邊走出去。往南出海，將近要一個小時才能到外海。(田野筆記，楊船長，2025/01/10)

他回憶過去曾使用更大型的船隻作業，並僱用四至五名移工協助，但因淤沙加劇導致出入困難，不得不改用較小型的 CT0 型船隻<sup>4</sup>。

之前的船是比較大的，是因為那個淤沙問題，不好出海不好出入啦，就換小的，反而比較好<sup>5</sup>。(田野筆記，楊船長，2025/01/10)

如今，他的船隻僅聘請一名移工與他一起出海作業，整體作業規模已大幅縮減。淤沙影響之下，漁民都得抓緊時間選擇最適時機出海捕魚。楊船長說明每次出海的時間需「剛好抓準潮汐」。

漲潮開始退，我們就出海；等到下一個漲潮再回來。低水位就在海邊，能進港我們就回來了。所以差不多是八小時、六小時這樣子，有時候十幾個小時也有啊，不一定啦。因為我們這邊抓魚的話，都是季節性的。看季風啦，出海時間看潮汐，所以有漲潮就出海。(田野筆記，楊船長，2025/01/10)

這些看似日常的出海節奏，其實已被港口淤積的問題深刻改變，勞動的節奏不僅取決於天候與海象，也被迫納入對基礎設施功能失調的調適。

除了作業時間的延長，港口設施的老化與維修工程的延宕，也是漁民不斷提出的困擾。楊船長多次強調，若要真正解決淤沙問題，北堤的延伸與港口內的抽沙作業是不可或缺的基礎工程。原本期待由政府主導的整治工程，最後多數都流於無聲無息，許多改善作業最後只能靠漁民自力救濟。

(淤沙)是他們自己移的啊，中央都沒在管，所以造成港口堵塞。沙是活沙，它會漂流，就慢慢從港口擱淺來。(如果)再來弄一條打一條那個水道出來，打一條水道出來的話，它就慢慢拓開，沙就慢慢往南邊跑了，我們港口這邊的淤沙就慢慢流走了。

你北堤延伸出去才能擋沙嘛，港口這邊的積沙再抽掉，這樣就不會影響到漁船的出入。建設計畫後來喊卡了，說是疫情，但那是藉口啦，什麼疫情不疫情的，那個都找藉口。自己移的啊，中央都沒有在管啦，所以說造成港口堵塞。(田野筆記，楊船長，2025/01/10)

<sup>4</sup> CT0 為一艘小型一支釣漁船，總噸位為 2.9 噸，船身長約為 28 尺 7 吋，由 5 位船員共同操作。其作業範圍涵蓋我國近海及沿岸海域，主要進行一支釣漁業，屬於高操作技巧且具選擇性的捕魚方式，適用於針對性捕撈特定魚種。

<sup>5</sup> 此段資料為筆者與黃則鳴同學共同訪談報導人之口述資料，感謝黃同學慷慨提供引用。

這更根本的淤積來源，與六輕工業區的抽沙作業密切相關。為維持港深以利大型貨輪進出，六輕港區常年進行抽沙工程，但抽起的沙並未帶回岸上，而是傾倒於外海，最終在潮流推動下漂回沿岸，形成「清一港、淤一港」的惡性循環。

比如港口，他們都有固定的大型船在那邊抽沙、抽船，往外把它抽起來，他們港口才會有深度。他們的貨輪才能自由進出。抽沙往外海倒，往外海到的話，他們就會隨著潮流往岸邊流，所以說就會造成這樣，每個港口都這樣……他們現在都往外海倒，抽沙船都 24 小時在抽沙。（田野筆記，楊船長，2025/01/10）

即便短期「有幫助」，卻無法根本解決淤積的結構性問題。船長補充道：「今天如果有拿上岸，沙就會減少，現在是縣府有四千多萬，有標出去了。」但截至目前，整體成效依然有限。漁港航道仍舊阻塞、設施持續老舊，治理工程看似啟動，卻缺乏系統化落實與明確時程，終至成為紙上作業的「語言工程」，難以轉化為居民實際可感的治理實作。

大船因吃水深、轉彎空間大，早已無法穿越日漸堆積的港口沙洲，只能停靠閒置；而竹筏因為低浮力與底部易碰觸積沙，亦難以出入，成為最先被淘汰的工具。當地僅剩下少數像是楊船長四至五噸的 CT0 型小船，尚能憑藉漲潮水位的短暫高峰勉強進出港口。不僅中大型漁船受其所限，連以往用於近岸捕撈的竹筏，也在這波環境與治理的雙重壓力下難以生存。在各類船型中，竹筏作為最輕盈、最貼近水面的漁撈工具，其操作對地形與水文變化極為敏感，正是其吃水淺、推力小的特性，一旦碰上沙洲便寸步難行，成為第一個被迫退場的技術型態。

前捕撈漁民蔡清風回憶，過去使用竹筏在港區外圍捕捉螃蟹，但近年沙洲逐漸推擠至港口前緣，阻斷外海螃蟹進入沿岸，導致捕獲量銳減。

那個沙已經跑到前面來了，攔到那個外面的螃蟹跑不進來，所以我們都在比較靠沿岸的地方捕。我們那個是小竹筏，所以不能出去……因為那個已經積到那個港口了，要清這個航道才能出去，沒辦法啦。（田野筆記，蔡清風，2025/01/12）

他強調，這並非長期以來的狀況，而是近六七年來才明顯惡化。此外，淤沙導致港口水道封閉，也讓以竹筏為主的小型船隻難以在非漲潮時出入，嚴重限制作業時間與空間。清風大哥更指出，港內原本用於綁蚵仔的蚵棚也因沙流入港而被掩埋，導致蚵棚無法固定。

蚵仔現在也沒辦法在那邊，對啊。沒有，沒辦法了，都已經平了。所以就是改種蒜頭，做蒜頭，就是改行啦。（田野筆記，蔡清風，2025/01/12）



竹筏的退出，並不只是工具淘汰，更是象徵一整套近岸捕撈生產知識的崩解。即便政策文本將疏濬納入港埠用地的附屬機能，實際上卻缺乏具體執行與工程回應，使「不能出去捕魚」成為許多漁民共同的日常治理經驗。

在這些話語中，「沙」不只是物質現象，更成為治理懸置的見證。漁船出不去，治理語言持續浮現，工程卻始終未動身。沙成為地方發展無法啟動的沉積物，也成為漁民日常與國家治理的衝突介面。

## 2. 養不下去的魚塭

除了港內捕撈活動受阻外，「漂沙」對於箔子寮的影響，也深刻滲入了養殖業的生態環境與生產條件。箔子寮除了近海漁業之外，長年以來亦是西南沿海文蛤與蚵仔養殖的重要據點，曾經與臺南七股形成南北分工的養殖體系，前者育苗、後者養成。然而，從漂沙改變海底地貌與水流結構，到地方政策與水利設施規範的調整，一連串變動導致箔子寮的養殖條件快速惡化。地方居民不是離開、就是無以為繼，留下的只是地景與記憶的退潮痕跡。

根據郭天祐與劉曉語（2024）的調查，2008 在箔子寮抽水站與蓄洪池的興建，再次改變了當地的土地使用與養殖條件。蓄洪設施為因應淹水問題而設，周邊地區則被劃為「禁抽地下水區」。這項規定雖有其防災上的合理性，卻也限制了養殖戶長期以來仰賴的海淡混合灌溉方式，導致許多養殖戶因水源不足而被迫停業。

種種政策與市場的交疊效應，使得箔子寮的養殖產業在短短數十年間由盛轉衰。箔子寮港邊原本數十戶的養殖戶如今僅剩三戶仍持續經營，其餘僅有少部分分布於箔東村東南方的低地，數量零星。過往魚塭連片、水路交織的地景，如今多已荒蕪或轉為他用，留下的，不只是產業的流失，更是地方生活樣貌的改變與治理失能的印記（郭天祐和劉曉語 2024：17）

在這片退潮之地，留下來的人們仍試圖與變動的沙、水質、氣候與制度周旋。文蛤養殖戶蔡墨文大哥，便是其中一位仍未選擇離開的堅持者。

「這幾年真的一年比一年差。」墨文大哥邊泡著茶，一邊淡淡地說。除了經營民宿，他也在下崙有幾口魚塭，從事文蛤養殖。他說，今年最嚴重，文蛤一池池地死，有些養殖戶整個月都沒收成，而主要原因來自六輕工業區的污水排放。

這個水質跟氣候都很明顯，問題越來越多了。聽說它有一個大的水管，深入到深海很遠的地方，什麼時候排、排在哪裡很少人知道，也找不到。(田野筆記，蔡墨文，2025/01/16)

他坦言，自己還算幸運，魚塢沒離開家太遠。但周圍有不少人早就搬去臺西、彰化一帶繼續養殖。「可是那邊也沒比較好，今年都死的很多。」(田野筆記，蔡墨文，2025/01/16) 這種「搬了也沒好轉」的感覺，讓養殖戶們進退兩難，只能咬牙撐著。

但對某些人來說，留下已不再是可能的選項。箔子寮環境的惡化迫使他們另尋他路，遠赴他鄉，繼續維持原本的勞動方式。柯大哥原本在箔子寮外海從事養蚵，如今不得不轉往臺南，他的故事，便是一個「不得不走」的例證。

沙子一直撞進來，蓋掉你就沒地方了。(田野筆記，柯大哥，2025/01/08)

柯大哥坐在港邊的椅子上，點著菸說這話的時候臉上沒什麼表情，但話裡有種說不出口的無奈。他是住在箔子寮附近的養蚵人，幾年前因為港邊水質變差，蚵仔養不起來，只能把蚵棚移到臺南去。現在每天早上從雲林出發，一路往南跑，到臺南那邊巡蚵棚，傍晚再開回來。他說得淡淡的，好像只是多跑一段路，但每天這樣來回，背後其實是整個漁港環境無法再支持他養蚵的現實。

柯大哥說。他原本的蚵棚就在箔子寮外海，但六輕設立後，海水變得混濁、含氧量低，加上淤沙嚴重，讓蚵仔的成長變得困難。

現在這邊沒辦法養了，只能去臺南。水質變了，蚵就長不好，長不大。你養下去也是浪費時間。沙子都跑到外面去了，冬天浪一來就撞進來，撞到裡面，整片都進來了。以前有一條海溝很大耶，我們都養在那裡。阿現在海溝都沒有了。(田野筆記，柯大哥，2025/01/08)

過去港內有一條大海溝，夠深、夠穩，蚵棚可以扎實地綁在裡面，靠著濁水溪出海口帶來的沙子，自然淤積形成保護帶，養殖條件不錯。但六輕工業區蓋下去後，整個水流和沙的走向都變了。那條原本穩定堆積的沙帶，如今變成一股持續推擠的力量，把沙子一層一層地堆進內海，把蚵棚底下的「壑」蓋住，讓養蚵的空間越來越小。漂沙的侵入，不只讓港口堵塞，也讓養殖戶逐漸失去可用的水域空間。這不只是地理範圍的縮減，更是一種生產可能性的退場。

這種說法，在地方也常常聽到。在地很多人都說，六輕來之後「什麼都變了」，水質變差、蚵仔長不大、連海的樣子都不一樣了。原本可以在港邊養到成熟的蚵，現在只能當育苗場，養一段時間後，得拉去外地才能長成。

水質變化不只是科學數據，而是蚵農每天用手、用腳、用眼睛感受到的。他們下水時，手指摸得出水的濁度，蚵殼刷起來有沒有異常的黏滑，蚵肉是否發軟，這些都不是檢驗報告能反映的。「你看水的顏色，就知道現在不能養。」（田野筆記，柯大哥，2025/01/08）

水變了，土地也就變了。除了蚵仔養不起來，連過去在內陸池子養蛤蜊的人，也都一個個放棄了。林大姊是林厝寮的居民，幾年前曾在村邊的水池從事蛤蜊養殖。她熟悉這一帶的水路，也對水質變化特別敏感。那天，她帶著我們沿著林厝寮大排走到防潮閘門，指著閘門說：「就是這個，不開，水流就不動，水就壞了。」（田野筆記，林大姊，2025/01/08）

她認為，這幾年水質變差，除了六輕以外，與這座防潮閘門的管理有直接關係。

現在水利處都是接到抗議才會來開，平常都不動的。我那幾個池子啊，前幾年就沒再養了，水太壞了啦。（田野筆記，林大姊，2025/01/08）

照理說，這種閘門應該依照潮汐與季節變化定時開關，保持水流暢通，水一旦不流，裡頭就發臭、變黑，養殖也就無法進行。

縣政府都沒有要管這裡的啦。（田野筆記，林大姊，2025/01/08）

這句話她講得不疾不徐，但句尾藏著長年累積的不滿。她知道政府偶爾會整治，但她的感受是：不抗議不會動，平常的問題根本沒人在理。

林大姊的敘述，讓我們看到水質惡化不只是六輕的影響，也跟地方治理細節密切相關，像是閘門開不開、排水通不通，這些聽來像是技術問題的事，其實對地方養殖業的生死有決定性影響。

她的話語裡沒有技術術語，只有對失去可用水域的惋惜與憤懣。她沒有離開村子，但也不得不放棄原本的勞動。像柯大哥那樣「走出去」的人，也許還能養蚵，但像林大姊這樣「留在地方但無事可做」的情況，才是這個地方水變壞之後最常見的樣貌。

政策的斷裂、工程的延宕、閘門的失靈與漂沙的推擠，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交織形成的一張治理失能的網。無論是走出去的柯大哥，還是留下卻無事可做的林大姊，都深刻體會到：當地方無法再掌握水與土地的邊界，養殖便也不再是一種可以持續的生計技術，而只能成為回憶中的勞動經驗。

漁港與魚塢的命運，最終都被漂沙這個緩慢卻堆疊的力量所定義。它不只是物理上的堵塞，更是一種治理上的懸置與退讓。從國家到地方，從計畫語言到工程行動，皆未能及時回應沙對空間、生計與地方秩序的全面性侵蝕。

#### 四、 懸置的願望（Suspended Aspirations）

不斷延宕的敘事治理，並非僅存在於政策文件或官方語言中，它更深刻地滲入地方居民的生活空間與記憶之中。對許多在地人而言，那些未曾實現的計畫，早已不只是發展的技術圖紙，而是日常生活中不斷被看見、回憶、甚至懷抱希望的象徵物。

##### （一） 還掛在牆上的未來

在筆者的田野中，報導人蔡文大哥家中就掛著一張歷史悠久的發展藍圖，它不僅是過去政治承諾的見證，也成為今日地方對未來想像的延續與投射。

已過花甲之年的蔡文大哥是箔子寮在地人，年輕時離開家鄉，到臺北唸書，在臺大完成大學學業後進入外商公司工作。幾年前為了陪伴年邁的母親，他辭去臺北的工作，回到箔子寮生活。他不像多數長輩那樣始終留在地方，也不像多數年輕人選擇離開後便不再回來。對他而言，返鄉是一種照顧，也是一種重新對地方作出選擇的方式。也因此，他對地方治理與發展語言的看法，與多數長期生活在地的居民略有不同。



圖 5 蔡文大哥家中懸掛的《大雲林改造計畫》發展藍圖  
（筆者攝）

踏入蔡文大哥家的客廳，抬頭便能看見牆上，掛著一張用壓克力板封存的大型彩色規劃圖。邊框為深木色，歷經歲月已微微泛霧。這份圖像來自 1980 年代末，標題以醒目的紅字寫著《2010 大雲林改造計畫》，是當時縣府為規劃未來 20 年的發展藍圖所繪製，預計在 2010 年前完成各項設施建設。圖面上密密麻麻地標示著深水港、機場、高速公路、工業區與醫療設施的位置，構築出一座幾近烏托邦的海港城市模型。圖下方印有「雲林縣政府編製」字樣，左側則列出當時縣長、議長與副議長的姓名，旁邊一行「敬贈」，像是一份地方與政府共構的許諾書。這張藍圖不僅是行政規劃的視覺呈現，更承載著那個時代對發展的渴望與形式化的承諾。

這張圖也成為他日常生活的空間坐標之一。他站在圖前，身子微微前傾，語速不快，卻句句清楚，像是在導覽一張他早就記得滾瓜爛熟的地圖，一邊指、一邊慢慢回憶：「這裡本來要蓋機場，這邊是深水港，醫院當初設在這裡……什麼都有，結果後來沒做。」（田野筆記，蔡文大哥，2025/01/08）

他的手指移動得小心，沿著圖上的標示一點點過去，彷彿深怕漏了哪一處細節。語氣雖然平穩，卻難掩語句中滲出的遺憾與無奈。他的語調與手勢，並不像是在單純回憶過去，更像是在提醒一個尚未結束的未來。對他而言，這張圖並非一紙歷史文件，而是一張至今仍在生活中發揮作用的「空間記憶框架」，一張地方未竟之夢的載體。

該藍圖出自 1987 年雲林縣政府推動的「大雲林改造計畫」，並曾短暫納入中央發展體系。由第 12 屆縣長廖泉裕任內主導，核心即為「雲林離島工業區」的開發案，對地方工商業的未來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第 13 屆縣長蘇文雄接任後延續規劃，並積極爭取中央資源，陸續提出雲林科技工業區、絲織專業區與離島式工業設施等項目。

蔡大哥家中懸掛的這張圖，正是蘇文雄縣長所贈。然而多年過去，政局更替，圖上的許多構想皆未落實，當年推動藍圖的政治人物也多已淡出、甚至離世，僅剩蔡大哥仍守著這張圖，像守著一種不願撤退的期盼。

然而，對蔡大哥而言，那張藍圖從來不只是掛在牆上的回憶。它是一個未竟計畫的起點，也是一段個人承擔與行動的開始。

「所以我這十幾年回來，就是要把箔子寮漁港重新開發。」（田野筆記，蔡文大哥，2025/01/08）

他不只是回望那個時代的承諾，更是親自走入現實的阻力中，試圖再次把圖上的藍線變成地上的道路。從圖紙到政策、從構想至實踐，他曾親自向總統

爭取，也一度試圖透過選舉進入體制。他相信，只要有人願意把這些事情再做一次，地方還是有希望的，哪怕這過程伴隨的是重重阻力與反對。

差不多五年前，我跟小英總統報告，她也同意要做。但是地方人們反對，因為已經沒落這麼久了，漁船就跑掉了，所有靠漁業生產的人就跑了，所以整個港幾乎要把它廢掉了。所以在六年前我跟小英總統說，一定要把它恢復。

我們的縣長、我們的漁會堅持不要，他說你恢復沒有用。但我們一定要把漁港變成一個複合性的港口，就是觀光、娛樂、漁業對不對，這樣比較完整。現在漁獲少，你可以再用觀光恢復人流。（田野筆記，蔡文大哥，2025/01/08）

他的想法不只是口號，而是具體又縝密的地方願景構想。他想要的不只是漁港重啟，而是一整套地方產業再生的系統，包括教育、產業鏈、人才培育。這些年，他曾爭取國立海洋大學來設立分校。

那時候要引進四個科系：航海工程、食品加工、養殖，還有休閒系。為什麼一定要四個科系？因為臺灣的養殖業，口湖這邊都是養殖業。然後我們西部的養殖業，養殖的龍頭就是國立海洋大學。所有的水產都是國立海洋大學出來的。

航海工程要處理排水、防止海水倒灌；養殖科系是來幫助產業；食品加工可以讓 40 公頃的加工區重新啟動生產；休閒系就設計海洋藝場活動。你不用跑臺南了，這裡就可以辦。從臺中以南都可以來，嘉義過來、澎湖過來，都只要四十分鐘。（田野筆記，蔡文大哥，2025/01/08）

但這樣的願景最後卻一再卡關，卡在地方反對、派系封鎖、制度真空，選舉的現實又是一記重擊。

本來都要做了，都已經籌備一年多了，地方人士就反對……所以就中斷了。漁會的總幹事是黑道，縣長也是，鄉長也是。他們就只為了自己的利益。他才不管你這些東西。他不會配合你，還會找人反對你。我沒有官方的身份，所以你要做什麼事都很難……所以三年前我跟總統說我要選村長，起碼用村長的名義……。（田野筆記，蔡文大哥，2025/01/08）

這樣的語句是來自一個清楚知道結構問題的人，一個仍然堅持要去做事的人。儘管他的藍圖暫時被擱置，但他從未真正放棄。

在箔子寮，並不乏對未來有想像、有規劃的人。他們深知制度難動、現實阻力重重，卻仍然願意開口描繪那些可能發生的事。蔡曜大哥便是其中之一。

他年輕時去台北工作，退休後才回來住。他不是一直待在箔子寮的人，但對這裡的生活和變化都有很深的感情。

年屆花甲的蔡曜大哥是地方上少數對制度問題看得最透徹的人。他知道淤沙工程為什麼總是卡住，也知道縣政府與漁會的權責推諉早已成為地方治理的一部份現實。但即便如此，他說起對漁港未來的想像時，語氣中仍然充滿熱情。

那人進來，我們要怎麼去保留住這些人？這麼多人進來，他們需要有休閒的地方嘛。所以，我們考慮從箔子寮漁港開始，利用蓄洪池的 20 公頃，把它挖掘成夏天可以舉辦海洋音樂祭的場地。再來，防風林到林厝寮這一帶有 8.5 公里的天然資源，只要把淤沙清掉，海沙平整，就能打造出一條 8.5 公里的光雕景觀。你想想，從 61 線高速公路一眼望去，看到這片光雕景觀，肯定會吸引人下來參觀。還可以提供露營區等活動設施<sup>6</sup>。(田野筆記，蔡曜大哥，2025/01/08)

這些計畫聽起來像是城市規劃師的草圖，但每一個細節，其實都出自他對這片土地的熟稔與長期觀察。他甚至已經想好怎麼設計水深、怎麼創造工作機會。

我們也可以設計一個內海水上樂園，約 15 公頃，作為第二個系統。在這裡上班的人，可以帶著小孩來玩。內海可以透過堤防設計控制水深，比如 60 公分或 70 公分，適合各種水上活動，就像烏來的水上遊樂園那樣，可以有滑水道、滑板等設施。這樣的構想，不僅吸引人潮，還能立即創造許多工作機會。

現在的年輕人，如果在臺北工作賺五六萬，但生活壓力大，也許更願意回到家鄉，賺三萬，但住自己的老宅，免去房租壓力，還能陪伴家人。有了這樣的環境，青年返鄉就不再是夢想。有新的思維、新的活力進來，地方一定會改變，整個社區就有了重新發展的機會。(田野筆記，蔡曜大哥，2025/01/08)

他的構想，不只是要吸引觀光客，而是替地方青年描繪一條可行的回家路。他知道這些願景並不容易實現，也明白現實中會有太多掣肘，但還是願意一步步去思考、去說明，試著在有限的條件中，描出一個讓人願意留下的未來。

---

<sup>6</sup> 此段資料為筆者與陳冠儒同學共同訪談報導人之口述資料，感謝陳同學慷慨提供引用。

## (二) 淤塞未解卻推觀光

在港區設施長年未獲維護、基礎航道依舊淤塞的背景下，地方與中央政府卻不時推出各式觀光招商計畫，規劃往往訴諸空間美學與觀光敘事，卻對當地實際困境的基礎改善缺乏具體對應，最終使政策語言與場域經驗之間產生巨大落差。以下將會說明「彩虹橋」與「水產精品加值園區」兩個例子。

### 1. 沒人知道的水產加工園區

你說水產的園區，啊如果那個漁港船不能進來，能推得動嗎？（田野筆記，藍姐，2025/01/07）

前面提到，雲林縣政府於 2019 年提出《變更箔子寮漁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該計畫書第七章對港區做了整體規劃，其中包含「水產精品加值園區」。縣政府在 2022 年進一步提出「箔子寮水產精品加值產業園區」計畫，主張以「智慧養殖漁業」與「精品加值」為特色的一條龍產業鏈（雲林縣政府 2022：2）。然而，在筆者的田野中，政策繽紛願景敘事多半停留於政策文本與媒體話語中，並未轉化為具體實作。園區所在地仍面臨交通不便、水患頻繁、基礎設施不足、產業鏈條斷裂等問題，無法支撐「智慧養殖鏈結」與「產官學研合作」等高階治理語彙。即便縣府強調園區已備妥水電設施並提供稅賦優惠，實際進駐的廠商至今僅有兩家，整體開發進度仍十分緩慢。

從筆者的田野觀察與訪談資料中顯示，多數地方居民對該計畫全然不知情，而在我介紹縣政府的計畫後，當地人都表示在漁港最基礎的疏濬與船隻通行問題尚未解決之前，所有產業願景的推動幾乎都淪為「紙上談兵」。即便政策文本中條列了產業分區、公共設施與開發願景的多項細節，也難以掩蓋其作為象徵治理話語的性質。

「水產精品加值園區」的空間配置與政策敘事如此完備，實際推動情形卻顯得異常冷清。截至目前，進駐廠商只有兩家，園區整體仍處於整地初期階段，幾無實質開發跡象。

這種落差，在筆者訪談家族長年從事水產加工的藍姐時尤為明顯。藍姐的兒子在五六年前曾計畫返鄉於箔子寮設立加工廠，並親自來現勘場地。但他最終選擇放棄，理由是交通不便、人力不足、水電基礎設施未齊全，難以支撐實際運作。即便政府近年積極宣傳園區政策，藍姐一家卻從未接獲任何說明或參與邀請。



我們家做水產這麼多年了，他們要辦這個計畫，怎麼一點訊息都沒有？(田野筆記，藍姐，2025/01/07)

儘管地方媒體與縣府網站曾多次宣傳，實際上的在地溝通與說明卻明顯不足，這不僅是資訊傳遞的落空，更凸顯了象徵治理與在地產業需求的隔閡，即便有心回鄉創業的居民，也因資訊落差和對實際營運環境的擔憂而卻步。

養殖漁民大哥甚至直言：「我們這邊根本沒人會去標那種地啦，建商建起來的沒有人要買，那都是有錢人早就知道的事。」(田野筆記，蔡清風，2025/01/12)

此類話語透露出對政策透明度與土地分配正當性的深層懷疑，也為後續地方社群對此計畫的批判性解讀埋下伏筆。



圖 6：彩虹橋總體鳥瞰構想圖，橋身橫跨港口、連接觀景階梯與植栽平台

圖 7-8：近距離觀景平台與裝置設計，強調「橋不只是橋」的複合功能性

圖 9：設計中的竹筏體驗、水岸活動空間與裝置藝術

(來源：立建築 ambi studio，2025/1/6 取得。)

## 2. 懸浮於未來的「彩虹橋」

在這樣一個尚無明確港埠疏濬與維護時程的地方，雲林縣府卻於 2022 年透過城鄉發展處新聞報導對外宣示將於箔子寮設置一座名為「彩虹橋」的景觀跨橋，期望藉由觀光亮點活化港區發展。官員視察漁港的畫面以及彩虹橋的構想圖頻繁出現在新聞稿與媒體版面，成為縣府宣揚港區「轉型進展」的象徵圖像。此舉對當地居民而言，並未引起期待，反而凸顯治理優先順序的錯置。根據縣府與建築師團隊公布的設計構想，彩虹橋將橫跨港灣，橋身如綠浪般蜿蜒，設有觀景亭、木棧道與步道植栽，並搭配情人座椅與活動空間，強調其藝術性與觀光潛力。圖像中還呈現周邊設有獨木舟區、市集平台與水岸空間，構築出一幅兼具娛樂、文化與美感的「港區新地景」。

然而，這樣一套充滿設計敘事的未來想像，從未真正落地。就筆者田野所見，漁港有在進行的工程就只有零散幾臺怪手挖沙清淤，至今尚未見彩虹橋動工，相關配套設施亦無實質規劃進展。而田野訪談中。每當筆者提起漁港的建設，當地居民普遍認為彩虹橋認為這類建設「荒謬」，在地方尚無法解決出海困難、漁船停靠與基礎維修問題的當下，橋的設想反倒強化了一種「紙上治理」的象徵效果，一種空轉但聲量巨大的發展語言。

筆者坐在楊船長家門前的矮凳上，船長雙腳踩在粗糙的水泥地上，手裡夾著一根香菸，一口一口吐出煙霧，煙氣在濕潤的空氣中緩緩升起，把我看向港口的視線也弄得迷迷濛濛。遠方那座「彩虹橋」像是半浮在霧裡一樣，既突兀又遙遠。

他伸手指了指那塊尚未整修的港區，手指的弧度慢慢劃過天邊的堤線，語氣不急不徐，卻字字堅定。他的聲音不大，卻像是經過長年海風吹蝕後仍不碎裂的木樁，沒有怒火，沒有口號，只有一種讓人無法忽視的冷靜與刺痛。

他們沒有在做對的事情，你設備那麼多也沒有用，你不能帶動整個箔子寮的發展，只是弄一座橋，有什麼用？你告訴我，有什麼用！你讓漁船能自由進出，自然就會帶動人流，才會帶來觀光、帶來經濟。（田野筆記，2025/01/10）

煙霧繞在我們之間，他說的那些話，不像臨時起意，更像是壓在心底很久、終於吐出來的失望。他的眼神越過我的肩膀，看向那個他幾十年來進出無數次、如今卻淤塞荒蕪的港灣。那是他的港，也是他的問句留給這座地方的：「你說蓋一座橋有什麼用？」

同樣的批判，也出現在一位返鄉嘗試振興地方的蔡文大哥言談中。當筆者問起縣政府的漁港改造計畫，他原本放鬆的語氣忽然一緊，語速也明顯加快，話語裡混雜著懷疑與怒氣。

你再看，張麗善也不推這些計畫了。漁會本來有個拍賣場，在對面，現在都關起來了。如果那個拍賣場有運作的話，這邊不是很好嗎？！但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她那時候在媒體前說要蓋彩虹橋，還請人畫圖。

記者隔天就來問我，我說：你蓋那個彩虹橋跨過漁港，有什麼意義？你有沒有走過去看？那邊就只是個海堤，雖然夕陽很漂亮，但你有餐廳嗎？有廁所嗎？有其他公共設施嗎？如果都沒有，人來這裡幹什麼？我說得很直接：『你每天有三百人來看夕陽，那又怎樣？你沒有地方吃海鮮、沒有地方買魚，那來這裡拍照有個屁用！』（田野筆記，2025/01/10）

他口中說的「只是海堤」那個地方，我也曾去過。風景的確很美，夕陽映在水面上，整個海岸都染上了金紅色的光。諷刺的是，蔡大哥其實是一位熱愛攝影的人。我們訪談時，他常拿出手機，給我看他拍的四湖風景：藍天、農田、夕陽。我的 Line 裡，至今時不時還會大哥收到傳來照片，像是某種溫柔的提醒，叫我別忘了這塊地方的美。

所以，當他說出「來這裡拍照有個屁用！」這句話時，是在對那種只剩下觀看、卻無法生活的地方未來的深層挫敗。他的憤怒裡，似乎裝著「眼睜睜看著家鄉一步步沒落，卻什麼也改變不了」的痛。

我理解他不是罵那座橋，而是在質問它背後整套治理的荒謬：當地方的漁港、拍賣場、漁業勞動環境都已崩解，當人還沒能留下、船還進不來時，一座存在於政策圖面、設計圖稿與媒體簡報裡的彩虹橋，就顯得既不真實，也不誠懇。

彩虹橋作為一個從未真正現身、卻持續被提起的建設構想，像是盤旋在漁港上空的鬼影，它從未落地，卻總在政治語言中被召喚，在地方記憶中徘徊不去。這個從未存在、卻被一再預告的「未來建設」，不僅構成敘事治理的象徵性標誌，更如同 Avery Gordon 所指出的：haunting 是一種關於未竟政治的現身形式，那些從未實現的承諾與被壓抑的記憶，會以「幽靈般的未來性」持續出沒於當代社會之中。彩虹橋正是一種這樣的幽靈治理（ghostly governance），一種持續被言說、卻無法實現的政治語言殘影（Gordon 1997）<sup>7</sup>。它不只是缺席的，而是以「被預期卻未來臨」的形式，在治理語言中盤旋，在地方場域裡留下斷裂的痕跡。

---

<sup>7</sup> 正如 Avery Gordon 在 *Ghostly Matters: Haunting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中所指出，haunting 是一種深具政治性的現象，它不單純是懷舊或心理陰影，而是「那些被歷史壓抑、被權力排除之事物的現身形式」。在她的詮釋中，幽靈不僅是逝去者的回返，更是社會結構中裂痕與不正義的痕跡，是「一種社會與歷史未竟之事的幽靈般回聲」。這種「幽靈般的未來性」



圖 10 蔡文大哥於海提拍攝作品

## 五、 治理的轉譯與基層實作（Bureaucracy）

要理解箔子寮漁港治理的實際樣貌，不能只看政策文件或願景藍圖，更必須回到那些在制度末端執行與轉譯的基層官僚身上。在地的治理操作，往往是在「無資源」、「無權限」與「高期待」的三重夾縫中展開，許多執行細節與地方回應，都繫於這些基層單位的行動選擇與因應策略。

根據農業部漁業署的《漁港法》（1992年公布，歷經多次修正），各級漁港的主管機關在縣市層級由縣（市）政府負責，而第十三條明訂：「各漁港公共設施管理及維護工作，並得委託漁港所在地漁會、其他法人或團體管理及維護」。換言之，在制度設計上，縣政府是第一責任主體，漁會則常以受委託的執行單位身分進入港區治理。

鄉公所是台灣現行地方制度下最靠近村里層級的行政機關，雖不具漁港主責地位，卻因地理鄰近與民眾期待，時常被迫回應與轉介漁港相關問題。作為一個「直接面對基層、卻缺乏管轄權」的單位，鄉公所經常處在「說得出問題，卻無法解決」的制度邊緣地帶。

這三個制度單位：縣政府、鄉公所、漁會，共同構成地方漁港治理的制度格局。它們分別主導不同治理語境與敘事風格：縣府偏好以宏大願景與指標工程展現政策作為；鄉公所則更多時候以「承接轉述者」角色出現；漁會則以中介語言自我定位為「反映者」、「幫忙爭取」的協調者。這些角色與話語彼此錯位、重疊又互相推諉，正是構成地方治理失能的重要結構條件。

---

（ghostly futurity）讓我們意識到，許多看似遺忘的過去，其實從未真正離去，而是以無形的方式制約著當代政治選擇與未來想像（Gordon 1997）。

因此，本節將分別探討縣政府、鄉公所與區漁會這三個治理單位的角色、限制與實作方式，試圖還原漁港治理在制度與地方現場之間的轉譯實況。這些單位之間既有分工，也有重疊，更經常出現責任懸置與互相推諉的情況，正是構成地方治理失能的核心結構之一。

## （一） 縣政府

在箔子寮漁港治理網絡中，不同治理單位因制度定位、法規授權與資源掌握的差異，發展出各自的敘事風格與治理策略。整體來看，雲林縣政府主導漁港空間的轉型規劃與招商計畫，偏好以「產業園區」與「發展藍圖」構築治理正當性。

在上一章節中，我們看到「彩虹橋」與「水產精品增值園區」等計畫如何透過精心構築的政策語言，成為地方治理的象徵性工程。這些計畫雖披著未來感與空間美學的糖衣，實際進展卻長期懸而未決。儘管未能轉化為具體設施，其高度語意化的敘事仍深度介入治理資源與權力的再分配，更是一場圍繞土地、開發與回饋制度的權益競逐。

本節將聚焦雲林縣政府在箔子寮漁港治理中的角色。它不僅是政策推動者或資源分配者，更是透過象徵性計畫操作治理正當性的行動者，同時在制度實作中展現出「失聯中介」與結構性斷裂的特徵。為理解這一治理模式，以下將從三個層面切入：首先，以研究者自身聯絡縣府未果的經驗，揭示縣府作為失聯中介的常態實作；其次，分析「水產精品增值園區」如何成為象徵性炒作工程的案例；最後，探討地方派系壟斷如何構成治理失能的制度性根源。

### 1. 打不通的電話

你研究的這個是縣府的那個水利處在規劃。你可以洽詢雲林縣政府，縣長如果知道，他也會很樂意接待你們……但滿意的答覆跟實際不一樣，你們一定要分別，你們去聽了很高興，實際上未必是會這樣做。（田野筆記，在鄉公所任職的前輩，2025/01/13）

治理失能，並不總是以大型工程的延宕或預算卡關的形式呈現。更多時候，它是潛藏在日常行政回應的「不可及性」裡，一種不被回應、無從接觸的

制度空洞。那是一種你明明知道該由誰負責，卻怎麼都聯絡不到的無力感。這不只是地方居民的挫折，我自己在田野工作時，也親身體會到治理鏈條的斷裂。

根據雲林縣政府組織架構，水利處主要負責河川、漁港與排水設施的工程與維護，其中防洪維護科與水利工程科為具體承辦箔子寮疏濬工程的單位。然在實務上，這些單位常因案量龐大、人力不足與內部協調不順，使基層需求無法順利銜接，也讓制度回應機制形同失效。

在田野實習期間，筆者試圖聯絡雲林縣政府水利處，想要詢問關於箔子寮漁港的疏濬進度與相關規劃與具體情況。電話接通後，接線人員的回應如同預期般客氣，承諾協助轉接，隨即響起一段悠然的音樂，但這空洞的旋律在我耳邊盤旋近三分鐘後，線路卻戛然而止。

我再次嘗試撥打，這次甚至連轉接都省去了，電話直接被掛斷，彷彿一扇無形的門在我面前緊閉。我便嘗試聯絡另一個科室，結果被告知「負責人不在」，對方記下我的聯絡方式說會請他回電，也給了我一位技正的直線電話。抱著一線希望，我撥打了那個號碼，接下來兩天，聽筒傳來的依舊是那句令人無奈的「負責人不在」。這種彷彿鬼打牆般的聯繫過程，持續而無果，即便對於早已抱持批判性視角的我而言，仍舊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挫敗。

當時的我並不特別焦慮，只是感到奇怪，這麼具體的問題，怎麼會沒有人可以問？後來，我把這段經驗記錄在筆記裡，才意識到：這其實就是我田野中多次聽見當地人所說的「求助無門」日常。「鄉公所叫你找縣政府、縣政府叫你找中央」，最終只是層層轉介，卻沒有人真正負責的結果<sup>8</sup>。

「治理」有時並非拒絕你，而是讓你找不到人。這種行政上的「不可及性」，看似是技術性延遲，實則反映了制度性的缺席：負責人永遠不在，資料永遠不明確，問題永遠無從追問。這不只是研究者的不便，更是居民長年面對治理困境的日常寫照。當政策文件與政府新聞稿高舉「地方振興」、「智慧養殖」、「區域治理」等願景時，基層卻連一通打得通的電話都沒有。

這類行政斷裂，從個人經驗延伸開來，是一種結構性的失能。它讓人不得不問：在地方發展的實踐中，究竟有多少計畫只是停留在公告與圖紙上，而沒

---

<sup>8</sup> 筆者實際撥打電話聯繫雲林縣政府水利處的時間為 2025 年 1 月 13 日至 16 日之間，期間嘗試多次聯絡不同單位與人員，未獲有效回應。由於本報告撰寫時間為 2025 年 1 月中旬至 6 月初，在此期間未再持續追蹤相關聯繫結果，亦不排除未來仍有機會取得負責人聯絡。但本文所書寫之觀察與分析，乃根據筆者在實地田野與報告撰寫期間的具體經驗與制度回應情境。

有任何接地的機制與人力？又有多少基層聲音，從一開始就找不到能聽的耳朵？

縣府在此並非單純缺席，而是以「不回應」的形式，使治理責任懸置，將行政斷裂制度化，讓治理失能成為一種日常實作。如同 Lipsky (1980) 所言，基層官僚體系往往具有高度的「行政遮蔽性」，而這種看似技術性的延遲與轉介，也呼應了 Björkman (2015) 所指出的「治理的空殼化」現象。

## 2. 權力與利益的競逐

正因為縣府在日常行政中的「不回應」，讓人們對其治理意圖產生質疑，而這種制度性缺席，並不意味著它全然無所作為。相反地，縣政府在其他場域特別是「政策敘事的產製」與「土地治理的操演」中展現出極為積極的能動性。

根據 2023 年天下城市論壇的公開報導，縣政府擘劃九大園區，合計將招商 2,188 家廠商、創造 38,500 個就業機會，並帶動雲林經濟「大躍進」(雲林縣政府 2023)。在這樣的發展敘事中，「產業園區」不僅象徵一種地方振興的未來圖像，也承載著縣府對外展示治理成果的政治工程。縣府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水產精品加值園區」為「九大產業園區」的示範基地之一。

「水產精品加值產業園區」於 2022 年完成土地變更程序後，開始進行土地標售與招商說明。儘管縣府強調已有廠商進駐，筆者於現場觀察卻發現主出入口鐵門深鎖，施工設施凌亂，毫無實質營運跡象。周邊既無車輛出入，也未見任何建築或營運進行中的跡象。據當地居民表示，雖曾聽聞有「廠商得標」，但園區內始終「看不出有什麼在做」，更有當地人直言：

我們當然非常歡迎改造成觀光漁港，但問題是政府只是說說，沒有真正執行。像水產加工園區這個計劃說了好幾年，但招商效果不好，最後可能不了了之。那麼多年都沒有進展。我覺得這只是政治操作。現在的漁港幾乎沒有漁船，也沒有經濟效益，誰會花 30 億來做這個？講講而已。」(田野筆記，2025/01/07)

在筆者田野所接觸的地方報導人與知情者看來，這類計畫往往更像是一場「圈地、變更、等待增值」的治理操作。曾在雲林縣政府工作的阿章便直言：

「啊就是炒地皮啦。九大產業園區其實重點不在於產業發展，而在於土地圈定後的價值炒作。圈地後變更地目，從農業用地轉為工業用地，再轉為商業或住宅用地，土地價值就上來了。」(田野筆記 2025/01/10)。

這種以變更地目為手段、透過政策語言包裝土地價值的操作，在地方治理中早已不是秘密，計畫的重點可能不在於提升漁港功能，而是地方派系在土地利益分配中的操作。正如阿章指出，箔子寮的發展計畫之所以遲遲無法啟動，並非技術問題或財務困難，而是地方派系與縣府間存在高度的權力競逐與資源分配鬥爭。

漁港轉型跟水產園區表面看是振興漁業，實際上可能只是政治選票與派系協商的一環。（田野筆記，阿章，2025/01/10）

此種批判觀點也與多位漁民的經驗呼應。在他們眼中，縣政府的種種計畫常常「畫了很多餅」、「射後不理」，但對實際生活毫無影響。他們反覆強調：「漁港什麼都沒變，有的只是公告出來的新計畫、新名字。」

在利益與象徵治理的輪迴中，真正的產業發展與公共利益反而被排除在可見的治理空間之外。其在當初的計畫書便是有不少蛛絲馬跡可尋，根據 2022 年細部計畫書所載：

鑒於市地重劃完成後土地長期間置未開發，為促進土地利用發展，故變更為產業專用區，藉以活絡漁業發展……考量實施市地重劃地區已辦理開發公共設施及費用負擔完竣，為避免土地產生重複負擔情形……標售本區產業專用區後所得價款，應全數作為增添重劃區公共設施建設費用之方式辦理。（雲林縣政府 2022：9）

這段政策說明透露出幾個關鍵現象：將原本的住宅區變更為產業專用區，為名為產業轉型，實則處理閒置土地、回收市地重劃成本；其次，官方明言未來將透過標售所得補貼公共設施建設，顯示該計畫實際上扮演了資金回收與行政支出的工具角色；最後，雖然文本中強調「智慧養殖」與「加工」等高層次產業方向，但並未對實際招商對象、土地使用誘因與在地產業需求進行具體評估與回應，留下極大模糊空間。

換言之，這是一個高度語言化但又隱含資本邏輯的治理實例：它不只製造未來的發展願景，也為現實中的財政補洞與資源配置提供正當性包裝。從這個角度來看，「水產精品加工園區」並非單一失敗的地方計畫，而是一種懸置治理的具體實例。政策語言持續更新、圖面不斷出現新規劃，土地使用類別變更、招商簡報熱鬧進行，但實際進駐廠商屈指可數、基礎設施停滯不前、漁民對園區內容一無所悉。



### 3. 派系壟斷與制度僵化

縣長的計畫可能只是畫餅拉票，同時涉及地方派系利益分配。漁民認為縣政府的預算分配偏向派系利益，計畫本身推動動力不足。(田野筆記，阿章，2025/01/10)

承接前一小節對雲林縣政府在政策語言與土地治理上展現積極性的分析，我們進一步將視角轉向潛藏在這股治理力量背後的權力結構。在箔子寮漁港發展的議題上，縣府的作為不僅僅是行政部門的決策或政策規劃的失誤，更與雲林地方政治長期存在的派系壟斷現象密不可分。本小節的核心論點在於，正是這種盤根錯節的派系勢力，以及由此衍生的制度僵化，深刻地影響了包括箔子寮漁港在內的治理資源分配邏輯，並成為阻礙地方發展的結構性因素。

#### (1) 盤根錯節的家族勢力

雲林的地方政治長期由特定家族派系掌握，使治理模式呈現出高度統一卻僵化的特徵。在田野訪談中，地方耆老多次指出派系執政太久，所有的思維與做法都已經固化，使地方治理難以因應結構轉變或提出新的發展藍圖。

為什麼我們鄉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推動永續，沒有一些配套措施能真正落實？原因之一是地方派系執政太久，導致所有的思維與做法產生固化。這種固化讓地方治理失去了靈活性和創新性<sup>9</sup>。(田野筆記，地方耆老，2025/01/10)

這種政治壟斷亦深刻影響地方人才的吸納與政治更新的可能。

長期執政的地方派系，執政後不會吸納真正的人才。他們只願意任用聽話的奴才，而不是有見解的人才。某些地方勢力甚至已在當地主導政治超過數十年，導致年輕人沒有工作機會，只剩老人留在鄉下。我不是針對誰，而是針對這種現象。這樣的用人方式，對於雲林的整體發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礙。(田野筆記，地方耆老，2025/01/10)

除了讓地方派系把持地方政治之外，受限於中央與地方政黨不同調的政治現實，雲林的基礎建設與發展資源更陷入一種惡性循環。這種你來我往的政黨輪替，原本應該體現民主制衡的制度設計，卻在地方治理實踐中轉化為互相抵

---

<sup>9</sup> 此段資料為筆者與洪浥青及胡善翔同學共同訪談報導人之口述資料，感謝兩位同學慷慨提供引用。

制、互不信任的資源封鎖邏輯。政策因此被切割、計畫被重啟甚至擱置，使得一個本可持續推進的公共工程，變成反覆在不同執政者間徘徊的選舉口號。

我長期在觀察，之前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民進黨來擔任雲林縣的縣長，所以這個在政治上就有點矛盾、有點衝突，中央也不給你地方的一個很好的經費建設。後來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現在又是國民黨當縣長，所以就產生一個政治上的惡性循環。漁港計畫進度慢的原因有很多，像是民進黨執政時，雲林縣的政績被國民黨拿去收割，所以中央經費撥得不那麼多，導致地方發展的困難。這是一個很悲哀的情況，這樣的矛盾就很大。

理論上是你政治歸政治、建設歸建設，應該要這樣。在選舉過了以後，大家好好把雲林這個算是非常弱勢的一個縣市，好好去做規劃、做建設。

一個有作為、有能力的行政首長，看到鄉民有這一些這麼好的一個想法，理論上，要是我今天行政首長，我主動去找好的構想啊。大家為了鄉鎮的一個建設，大家提出一個方案好好討論，這樣才是在做事情。但現實是（如果）你這個方案太好了，有可能會對他產生威脅或是怎樣，他情願把這個關掉。問題就是在這裡。

現在臺灣很多建設牽涉到政治因素——我當總統、我做政策，但不會真正交給專業團隊來組合推動。就變成我當政八年，換屆後被別人清算土地怎麼用、政策是為了誰，導致大家都不敢做長遠規劃。

（田野筆記，地方耆老，2025/01/10）

在這樣的治理情境下，基層行政單位往往難以發揮規劃與整合的實質功能。即便有具備可行性的地方提案，也常因無法納入中央資源或獲得穩定政策支持而夭折，或者更甚，成為選舉期間的「畫餅政績」。

## （2） 選舉

筆者在訪談時，曾忍不住問出困擾許久的疑惑：如果地方代表與首長皆是由選票產生，那麼為何這些派系勢力能夠長年盤踞、難以撼動？為何鮮少出現挑戰成功的案例？這樣的提問，其實不僅僅是出於對民主政治制度的理性探究，更深層的原因是源於我在田野調查中反覆感受到的那股「無力感」。在箔子寮，無論是與辛勤的漁民、樸實的村民，還是滿懷希望卻又略顯徬徨的返鄉青年交談，當話題觸及地方公部門與政治生態時，他們往往只是搖頭苦笑，語氣中交織著既有不滿、又似乎早已習慣的無奈。這份集體性的無力感強烈地衝

擊著我：既然當地民眾對執政者有所不滿，為何不透過手中的選票來選擇改變呢？

地方耆老們的回應比我預期更直接。他們點出選舉如何透過行政資源的分配、臨時性就業機會與地方人情網絡的運作，使權力得以穩固：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他們會用一些臨時性的工資，比如臨時工或短期津貼，來收買人心，讓人不敢提出異議。這樣的情況非常悲哀。(他們)有行政資源，今天你要打掃一個環境，有一些所謂的臨時職位，去工作、去掃地啦，或是環境整理啦，就有一個一萬八千塊多少錢。那鄉下一個月一萬八千塊，他就可以活下去。這是一個工作機會，對，短暫的工作機會。像我們海邊那個水閘門，你聽話就給你一個工作機會啊。水閘門是一個月有幾千塊那個啊，但是去綁這一些人啊。(田野筆記，地方耆老，2025/01/10)

這種透過短期利益交換選票的方式，不僅扭曲了民主選舉的本質，更使得長期把持地方資源的派系得以延續其統治，阻礙了真正能為地方帶來改變的新力量的崛起。報導人也不諱言選舉文化本身已成為一種制度性壓力：

再來我們這邊的選舉文化非常糟糕嘛。選舉除了臺北市以外，我想臺灣整個選舉了，到了選舉就買票啦什麼啦。很多人就是，其實就是到了選舉拿了這一點錢，不投給他不好意思啊什麼什麼。所以說，他整個把持就被他把持住了。(田野筆記，地方耆老，2025/01/08)

他進一步指出，即使年輕人具備熱情與能力，也難以在這樣的制度中突圍：

像你們年輕人，假設說你們今天非常有能力，很想做事情，但是年輕。所以我們想說，年輕人，除了年輕人有時候他的經濟上就跟不上，你要花錢都跟不上。所以如果說有能力的，然後這邊又有很多年輕人進來，你只要有能力，人家就會支持你上來當行政首長...所以這也是一個很難翻轉的機會。(田野筆記，地方耆老，2025/01/08)

### (3) 惡性循環

除此以外，這種以短期利益和延續政治權力為主要目標的治理文化，最終導致縣政與鄉政之間責任不清、權能落差，使得治理資源的分配缺乏長遠規劃和系統性的制度整合。當地人尖銳指出：「現在很多地方的建設，往往是為了宣傳，把表面功夫做好就結束了，沒有從國家的角度進行長遠規劃。」短期計畫、一年一政績的操作模式，使得真正需要長期投入的基礎建設與制度設計，往往被擱置、延宕甚至被用來「換票」。

在這樣的結構中，像箔子寮漁港這樣本具地理與產業發展潛力的區域，也因行政主體缺席與制度設計不全而被長期卡住。

即便地方居民有發展意願，卻面臨無法跨越的制度門檻，對當地人而言，制度成為排除機制，而非發展工具。

我們連一個農產合作社都沒有。你不成立合作社，就拿不到政府資源，申請不到補助。所以你問我為什麼地方民眾對政府失望？就是因為制度根本沒鋪好，他們找也找不到門路。（田野筆記，蔡曜大哥，2025/01/08）

更進一步地，資訊與資源的壟斷亦使在地發展機會集中於少數人手中。也有當地人點出「現在的問題是，有人知道方法，有人掌握資源，但不願分享。比如你有預算、有補助、有關係，就整包自己做起來。」（田野筆記，蔡曜大哥，2025/01/08）這樣的閉鎖型治理模式，削弱了社群的共同參與與公平競爭的空間，也阻礙了年輕人返鄉、在地產業創新的可能性。

#### （4） 資訊落差

除了派系壟斷與預算排擠造成的結構性不公，資訊傳遞的不對稱亦加劇了政策實踐中的斷裂。漁民與基層官員常常無法接收到完整的發展規劃或補助資訊，使得地方對「政策為何失靈」的理解更加破碎而情緒化。正如蔡曜大哥直言：

這邊的捕魚人長期住在這裡，我們講的就是所謂「資訊平台不對稱」。他們問的問題，或是他們想要了解的問題，沒有辦法很深入。所以動不動就牽涉到政治、派系，然後這個事情就這樣結束了。但其實不是這樣。（田野筆記，蔡曜大哥，2025/01/08）

這種誤解與資訊落差不僅存在於民間，也在基層與上級政治之間反覆出現。一方面，議會與政府部門常將問題歸咎於民眾不關心建設、缺乏配合；另一方面，地方居民則感受到被「畫大餅」、被政治利用卻未實質受益的失望。

議會這邊雖然希望先宣導，或者開會解釋，但漁民只關心自己的生計，對地方建設的關注不多。他們沒有提供一個很好的建設方案去引導或說服漁民，因此就產生了認識上的落差。這也是問題的根本所在。一個議員只有八百萬的經費，他能幫助你什麼呢？……其實，不是議員不想幫，而是他無能為力。然而，縣議員又不會說清楚這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於是就產生了這種矛盾和誤解。（田野筆記，蔡曜大哥，2025/01/08）

縣議員與立委成為民間求助的對象，卻常因制度設計與資源限制，無法實質回應基層需求。制度的複雜性與資訊門檻進一步將無法書寫企劃案的基層居民排除在資源分配之外。

要取得這些建設經費，就必須寫一個完整的企劃案，透過地方政府、立法委員，再提交到中央，才能獲得完整的經費。如果你懂得寫企劃案，不管是誰在執政，有一點手腕、有一點技巧，就能運作到中央去要經費。（田野筆記，蔡曜大哥，2025/01/08）

對基層而言，不只是沒有門路，更沒有門票。這種制度上的複雜性與資訊門檻，在缺乏有效協助的情況下，無疑將資源更傾向於少數能夠掌握資訊和資源的人手中，這也可能與地方派系為了維持自身利益而刻意設置障礙有關。當上層決策缺乏回饋機制，基層需求無法精準表達，形成治理的雙向斷裂。

我們的地方首長常常缺乏想法，素質不夠.....而捕魚人員也沒辦法跟議會好好溝通。像我們箔子寮的漁會，基本上是最底層的單位.....你想要通過他們來爭取什麼，也沒什麼用。（田野筆記，耆老，2025/01/08）

這責任並不集中在單一單位或個人身上，而是在一整套治理體系中逐步累積的斷裂：上級決策難以回應基層現場，基層聲音也難以被有效傳遞。地方人民無門可敲，官員有心無力，而制度則冷冰冰地以「企劃案與核銷表格」劃定參與的資格門檻。治理，最終成為少數人能理解並操作的語言工程，留下廣大基層民眾在制度邊緣徘徊，實際需求與華麗的政策口號之間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鴻溝。

## （一） 鄉公所

相較於縣政府作為《漁港法》所規定的主責機關，負責漁港設施與發展計畫的規劃與核定，以及區漁會作為多數情況下受託執行設施維護與提供漁民服務的協辦單位，鄉公所並非漁港治理的核心機關。依據《地方制度法》<sup>10</sup>，鄉屬地方自治公法人，鄉長對外代表該鄉，負責行政執行、政策推動及承辦上級交辦事項，但其治理權限相對有限。在這套地方治理架構中，鄉公所多扮演執行端的行政角色，並在地理鄰近與常態業務往來的背景下，時常成為地方民眾諮詢與抱怨的對象。然而，民意的正式承接與反映，實際上應由具有立法職能

---

<sup>10</sup> 依《地方制度法》第2條，鄉（鎮、市）為地方自治團體，鄉長綜理鄉政，負責行政執行、政策推動與承辦上級機關交辦事項，並非立法機關。民意代表職權則由鄉民代表會行使。

的鄉民代表會來負責。因此，鄉公所的角色較可視為地方治理中處於「高可見度、低權限」的基層行政單位，其所面對的制度困境，來自於必須回應多元需求，卻無足夠權限推動政策或改變資源配置。

在中央與縣府的治理體系之間，鄉公所往往被視為地方意見的「傳聲筒」，卻難以主動介入或推動實質變革。以箔子寮漁港為例，鄉公所一方面被民眾期待能解決漁港失修、漁業困境等迫切問題，另一方面卻因漁港與海岸線分別屬於縣府與中央主管機關所轄，制度性地被排除在政策形成與資源調度之外，成為一個被動反映、卻無法執行的「夾縫治理者」。

## 1. 治理模糊

最能體現箔子寮漁港治理模糊性的場景，發生在筆者與口湖鄉鄉長李龍飛的訪談現場。當筆者試圖向第一線行政人員釐清這座位於四湖與口湖鄉交界處的箔子寮漁港，其實際管轄單位與權責分配時，鄉長一邊聽取問題，一邊轉向開放式辦公空間中的助理與秘書。幾位同仁迅速聚集過來，現場隨即展開一場熱絡但略帶猶疑的討論。行政人員彼此互相補充，試圖釐清這項制度上確實複雜的問題。然而，由於漁港與海岸線分別隸屬縣府與中央不同主管機關，制度上亦無單一窗口統籌，權責邊界曖昧不清，現場一度出現語意遲疑與角色混淆的情況：

筆者問：「箔子寮漁港的管轄是怎麼分配的？」

秘書：「那個海岸線應該算是中央和漁港，應該是雲林縣政府的。」

鄉長點頭：「喔對，我們海岸線的管轄應該是中央的管轄。」

秘書補充：「海岸巡測也有分的，大概五十或一百公尺以內……以外是海巡署，以內還是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

鄉長確認：「對，應該是中央。那邊要來，它的管轄要屬中央就對了。漁港是縣政府的——這是三級漁港，就海岸線屬中央啦，漁港屬縣府就對了……那裡的理政喔，他的管理單位。」（田野筆記，2025/01/13）

此外，面對鄉鎮管轄交界所可能引發的治理責任爭議，鄉長強調兩鄉之間「互動沒問題」，以日常交辦與人情互助形式維持行政操作的順暢：「我們兩個鄉鎮公所的互動就是說，如果是四湖鄉的業務，我們會交辦四湖；四湖鄉遇到口湖的業務，他們也會把業務移交過來我們這邊辦。」

漁港儘管與人民生計息息相關，但並非鄉公所的日常業務，在權責劃分下愛莫能助。這種角色的模糊性，亦可從鄉公所對於重大政策計畫的缺席中觀察得出。當筆者詢問鄉長是否參與「漁港外移」的評估與規劃時，他明言：

沒有，因為這部分是各司其職。我們的期待是把地方的心聲反映給縣府。特別是漁港外移和整個海岸線的整治。我們希望縣府在進行規劃之前能多聽聽地方的意見。畢竟漁民是長期在這裡、世代在這裡生活，他們對海岸線和海流的狀況非常清楚，他們的意見可以作為規劃的參考因素。

現在那個漁港的管轄權是縣市政府……目前嚴格來講我們是沒有什麼作為啦。（田野筆記，鄉長，2025/01/13）

當權責被切割與上移，鄉公所便陷入一種「被（人民）期待卻難以作為」的治理夾縫中，它能回應民意，卻無法促成改變；能出席會議，卻不被納入決策。於是，治理的落差不僅體現在港區基礎設施的停滯，也存在於制度邏輯所生成的實踐落空之中。

從這個意義上說，鄉公所是地方自治團體，卻無權掌握方向盤。其失位的結構性無力，構成了治理失能中最難被可視化的一環，也正是筆者在田野現場最深刻的感知之一。

## 2. 有心無力

在此結構下，鄉公所多以「反映」取代「推動」，角色定位如同一座行政化的中繼站：負責轉達意見、召開公聽會、配合產業推廣，卻無涉核心決策。類似的定位亦可見於其對中央規劃的參與方式，鄉長強調，縣府與規劃公司會在設計前召開公聽會，作為形式上的民意徵詢。

我們會拜託縣府規劃單位，如果要做規劃之前，希望他們到地方來聽聽基層的聲音。會開，就是類似規劃設計之前，會開公聽會聽聽地方的聲音。（田野筆記，2025/01/13）

這樣的漁港治理模式，實際上將鄉公所定位為陳報單位。擁有核定、備查下級機關全權負責業務並往上陳報的責任。在制度設計中，這類向上反映或施壓的政治行動，亦常由具立法職權的民意代表擔任。然而，當民代缺席、制度斷裂，鄉公所便成為地方民怨集中承接的前線，卻無足夠權限回應其所承載的治理期待。

在談及港區規劃推動的現況時，鄉長進一步指出地方推動大型計畫的結構困難：

這種事情應該由中央統籌來規劃，這才是正確的方向。中央應該重視中部地區的資源開發，而不是僅僅重北輕南。可是我們地方層級有時候會覺得有心無力，無法推動這樣的大規模計畫。其實需要中央主導。我們鄉鎮沒有這麼大的能量去做這些事情。……你說你要做一個幾億、幾十億的計畫，那規劃費都要上百萬，這些我們哪裡拿得出來？我們只能盡力反映，然後就是靠議員、靠立委去講，或者媒體寫出來，有人注意了，上面也許就會比較重視。這種大規模的東西，你要鄉公所做，是做不起來的。（田野筆記，2025/01/13）

訪談當下，我明確感受到鄉長話語中流露出的無力感。他一方面展現出對中央資源結構與治理分工的清晰認知，另一方面受限於地方制度法，也反覆自我定位為「只能反映、無力推動」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表述並不代表其在制度上的權限邊緣化。根據《地方制度法》，鄉長實際上肩負綜理鄉政、執行政策、承接與回應上級指令的重要職責。但在實務中，地方資源結構、行政慣例與長期的政治文化，往往使基層行政首長難以主動形塑政策方向。

這種心態，亦體現在他對縣府與中央政策的觀察上。面對漁港清淤與加工園區等長期懸置的議題，鄉長以「看看就好、聽聽就好」作為回應，不僅透露出對上級部門的不信任，也反映地方對施政成果的根本性懷疑：

很多我們政府做的事情，很多你要看看就好，聽聽就好……他們是在寫給人家看的，沒有真的要實行。每隔幾年就花個幾千萬幫漁民清一條航道……問題是過了一兩年又不能用了。造成雲林整個河岸線嚴重淤積，這應該是原因，所以我們現在這裡沒有辦法建造大的這應該是原因啦……每年政府相關單位都會編列幾千萬的經費進行清淤，但這治標不治本。沙子清了又回來，航道還是無法維持暢通。（田野筆記，2025/01/13）

在這些話語中，鄉公所是清醒的治理觀察者：見證政策的短期循環，知曉計畫的選舉邏輯，然而無從介入也無力翻轉。其所能執行者，多為形式性的會議與象徵性的活動；而其所無法介入者，則是政策形成、資源整合與制度變革的關鍵環節。這樣的治理處境，讓「治理能動性」只能以替代性的、偶發性的方式出現，而非持續的、結構性的參與。

箔子寮漁港位於口湖鄉與四湖鄉交界處，屬於縣級漁港，由縣政府管轄。然而，對於漁港淤積、設施失修與漁民生計問題最為熟悉的，卻往往是長期深耕地方、直接與居民互動的口湖鄉與四湖鄉公所。諷刺的是，在地方自治體系中，最理解現況的基層自治單位無管轄實權，而有管轄實權的雲林縣政府則規劃之後即「鞭長莫及」。



在這樣的現狀中，被賦予「接受人民請願」，並可以議決政府提案的民意代表，究竟發揮什麼作用呢？根據《地方制度法》第三十六與三十七條，無論是縣市議會或鄉鎮市民代表會，皆被賦予預算審議、政府提案決議與接受請願等實質職權，是地方治理中具有政治能動性的關鍵角色。儘管如此，地方耆老在先前談及地方選舉時，卻揭露了另一層現實困境：地方選舉透過短期行政資源分配，加上四年一輪的選舉週期，往往將政治動員集中在短期資源分配與選區經營，反而讓原應進行長期規劃與整治的箔子寮漁港，不斷被擱置與延宕。民意代表固然具有制度權限，但在派系運作與選舉文化的扭曲下，其角色經常游移於「制度性問責者」與「派系協商者」之間，難以實踐對公共政策的長期監督。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與田野範圍，尚未能深入探討縣議會與代表會的實質運作與派系分布。然而未來若能進一步連結制度權責、政黨派系與選區治理的交織脈絡，將更有助於理解箔子寮漁港長期懸置問題的政治根源。

### 3. 替代策略

在上述分析中，我們已見鄉公所因制度設計與資源配置的侷限，無法真正介入漁港治理的政策形成與實質執行。儘管如此，這並不意味著鄉公所全然喪失治理能動性。事實上，面對制度邊緣的位置與「有責無權」的困境，鄉公所仍嘗試透過象徵行動與非正式溝通機制，爭取政策關注與行政響應。這些策略性行動雖然無法改變治理結構的根本侷限，卻呈現出地方治理者如何在體制縫隙中尋求發聲與參與的空間。

訪談中，鄉長多次提及媒體作為「引起上級關注」的重要非正式渠道，透露出地方官僚在制度受限下所採取的策略性回應。當筆者問及公所如何在發展過程中扮演角色時，鄉長坦言：

我們的政府很有趣你知道，他們是在看媒體在施政的啦。他們有的時候，媒體議論會影響他的實踐……我印象前一兩年，去年還是前一年，我們那個超級藍月的時候<sup>11</sup>。鄉鎮長有的時候適當的時候，做適當事情。也不是怒斥，這個事情反映那麼多次你完全不處理。到那個災情發生，我們去的時候已經反映，包括說我們縣市政府還有中央說，這個海岸線如果有溢堤、潰堤的危險，希望他們要重視，來幫我們改善。結果一而再再而三就是公文來往，希望他們注重這個。

---

<sup>11</sup> 鄉長此處所指的「超級藍月」，是指 2023 年 7 月與 8 月間連續兩次因強降雨與潮汐重疊而導致箔子寮漁港區域海水倒灌、淹水的事件。根據媒體報導，2023 年 8 月箔子寮再度發生嚴重淹水災情，地方多次向上級政府反映，但遲遲未見具體改善作為，口湖鄉長李龍飛在受訪時質疑政府治理失能：「政府還要這塊土地嗎？」（劉奕璇、羅代章、吳建宏 2023）。

有的時候適當的媒體記者他們有需要，他們就是喜歡，你那個，就是把你放大說，那個口湖鄉長怒斥中央還是縣委沒做什麼什麼。其實這樣會引發他們的重視上面，就是媒體的曝光以後，我們的行政院長什麼，他們也會下來重視。(田野筆記，2025/01/13)

由此可見，鄉公所在實務中經常被動等待上級回應，但也會選擇在特定時機「放大聲量」，藉由媒體報導製造政治壓力。媒體成為一種象徵性發聲工具，使得地方官員得以暫時突破制度邊陲的無力處境。然而，這種策略並非出自公所的喜好或常態做法，鄉長也直言：

我們是不喜歡這種方式的。我們希望把問題解決，也不是說要靠媒體去讓政府做什麼。所以其實正常的管道也是有，我們也是有跟縣府跟中央溝通。(田野筆記，2025/01/13)

此番言論揭示了治理能動性的兩難：一方面鄉公所希望透過正式制度管道與上級單位對話，另一方面，當正式管道失靈或回應緩慢時，媒體便成為一種象徵性但有效的「治理替代術」(governing workaroud)。正如李龍飛鄉長所言，無論是中央部會還是縣府體系，常需透過媒體「提點」才會有所動作，顯示基層不得不依賴輿論施壓，取代制度內部的正式回應機制。然而，這類透過媒體放大的策略行動，雖有助於暫時喚起上級注意、爭取特定設備改善或漁港整修工程，卻也可能反過來強化「治理已有作為」的敘事假象。治理困境被包裝為零碎修補的政策成果，掩蓋了問題背後更深層的結構性失能。因此，這類治理替代策略，雖展現了基層官僚的生存智慧與應變彈性，卻也在無形中鞏固了政策「假大空」的敘事效果。

#### 4. 願景與現實的落差

儘管前述分析揭示了鄉公所在制度分工與資源結構下的治理侷限，但這並不代表地方治理者缺乏對未來發展的想像。事實上，在與鄉長的訪談中，筆者多次聽見他提出極具視野與野心的發展構想，從打造「全世界最大的光電案場」、建設「亞洲第一的觀光魚市」，到整合雲林沿海觀光資源、接引宗教人潮並進行「海岸轉型」，這些論述展現出一種超越當前治理現實的理想性規劃語言。

然而，也正是在這些宏大願景與制度現實的強烈反差之間，我深刻感受到「象徵性願景」在地方治理中的張力與侷限。

如果把我們這裡打造一個地標，臺灣最好的觀光漁市，那個漁港改造應該會有誘因啦。我們國家臺灣人好像沒有什麼志氣。你如果做成一個亞洲最

好的漁港，我們海洋資源很豐富。你如果有辦法把西部、我們西海岸雲林的漁港改造成一個全世界最好的觀光魚市，可以帶動我們地方。我們的漁獲是全國最好的，所以我們的物流、未來的發展都可以依此規劃。我們應該讓箔子寮這整個漁港變成觀光漁港，然後由政府推動替代能源的開發。

希望你們做全世界最好的觀光魚市。這樣，世界觀光客才會有誘因來臺灣看全世界最好的觀光魚市。我們政府的野心與企圖心不足，所以我們只能退而求其次。但你們如果有這個企圖心，應該帶領臺灣向前。你們如果有那個企圖心，要臺灣，你們是領導人。你們領導臺灣向前，不要像那一輩那樣，大家毫無信心，唯唯諾諾，沒什麼企圖心。讓你來做，我要求你做全世界最好的觀光魚市在這裡。(田野筆記，2025/01/13)

這類願景所強調的，不只是地方經濟活化，更是一種「放眼世界」的志氣與國家企圖。這些話語既充滿熱情，也隱含批判。對中央政府的「野心不足」、對國家建設的「志氣缺乏」，在語言中轉化為對年輕世代的投射與期許。然而，正如前節分析，鄉公所作為制度邊陲，其能調動的資源和對政策的影響力卻微乎其微，無獨立預算、無規劃權限、無部會協調機制。這使得這些美好的藍圖更像是一種無法兌現的願景性言說，一種語言上的許諾，卻缺乏對應的制度實力。這樣的落差，也體現在其對替代能源與光電案場的構想上。

還有就是我們的海岸線，做替代能源，就是把預計的所有沙都抽起來。廢物利用，我們是一個應用，抽起來就對了，抽起來那些沙就對了，做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光電案場。

這樣也能讓遊客說，那個最好的觀光漁場旁邊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光電案場。就是政府下去主導。你看那個整個漁港的規劃，還有填海、造路，把那個替代能源案場。這個有觀光效益。我們如果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光電案場，由臺灣的政府主導，又沒有官商勾結，又沒有民眾抗爭。外國的觀光客也會到我們這邊來參觀一個，影響到別的国家，也是找全世界最有的、最好的、最大的什麼，就是去觀光，把民眾引流到雲林中部這個區塊。(田野筆記，2025/01/13)

在這些話語中，筆者聽到的，不僅是願景的描繪，更是一種情感的託付與自我激勵。這種象徵性願景，在我看來，並非僅是地方治理無力的掩飾，更是一種補償性的語言敘事。當鄉公所長期被排除於政策核心時，「說願景」成為唯一仍可握有的能動性形式。

正因如此，這類語言反而更顯動人。它是一種基層治理者對「被看見」的渴望，也是一種對制度困境的逆向呼喊。地方有想像、卻無資源；有責任、卻無權限；有語言、卻無實作。這也正是治理失能在地方層級最隱微卻最根本的體現。

鄉公所在治理場域中的角色，正介於「無權之責」與「被動參與」之間。它所展現的象徵性語言與媒體操作，固然揭示了基層治理者的調適策略與生存智慧，但也暴露出制度設計中對地方行政單位長期「看得到、用不到」的治理安排。下一節將進一步分析區漁會的角色，作為介於官僚與漁民之間的制度節點，其又如何透過中介語言與經濟控制發揮其獨特的治理功能。

## （一） 漁會

### 1. 法定角色

依據漁會法，漁會是法人（公益社團法人）為漁民服務的人民團體<sup>12</sup>。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區漁會在漁港治理中被賦予特定的法律角色。《漁會法》第十四條規定，漁港的一般設施應優先由所在地漁會提出投資計畫，得以價購或租用方式取得土地，負責興建與經營，並擁有地上物的所有權。若漁會因人力、物力不足，無法自行推動，則可公告徵求民間投資人參與興建與營運，或者由主管機關提供土地供其建設，期滿後再將設施移轉予政府。這意味著，理論上漁會不僅僅是行政協辦單位，更被賦予投資與經營漁港設施的可能性與優先權。然而，在現實運作中，這些法律上的積極授權，往往因地方漁會資源與能量有限，難以實現。

### 2. 官方定位及組織自述

以雲林區漁會為例，其官方網站強調「保障漁民權益、提升知識技能、改善生活品質、促進現代化」為核心宗旨，並設有完整的執行組織，包括會務、推廣、供銷、會計、信用與保險等部門。根據統計資料，雲林區漁會擁有超過三萬六千名甲類會員<sup>13</sup>，並維持一定規模的代表制度與理事會、監事會運作。如此的組織規模與制度設計，表面上構成一套完善的治理架構，卻在實際執行中出現明顯落差。

---

<sup>12</sup> 根據《漁會法》第二條，漁會為依法設立、以服務漁民為宗旨之公益社團法人，具有法人地位。其性質與農會相同，係為農（漁）民設立之人民團體，依據行政院與內政部函釋，其性質明確屬於公益社團法人。

<sup>13</sup> 依據《漁業法》第二條，甲類會員係指「從事漁業之自然人」。此類會員為漁會的基本成員，具備選舉與被選舉權，是漁會民主制度運作的重要參與者。與之相對的乙類會員，則為與漁業有關之法人、團體或未直接從事漁業者，權利義務有所不同。

在漁港治理的制度場域中，漁會經常自我定位為「中間橋樑」，強調自己是連結政府與漁民之間的溝通者、協助者、反映者。漁會知情人士表示，漁會是幫忙反映，評估覺得可行就幫忙爭取，工程進度不透明就幫忙解釋給漁民聽。

這樣的語言透露出制度語彙與實作權限之間的錯位，漁會積極參與話語場（discursive field），但在關鍵政策如港口疏濬與風場補償分配等議題中，卻往往處於「有名無實」的曖昧位置。舉例而言，漁會時常出現在漁港治理的「話語場」中，透過參與縣府召開的說明會、接受媒體採訪、發送陳情公文，甚至擔任地方意見的代言人，試圖表達漁民的立場與訴求。然而，這樣的發聲往往僅止於象徵性的制度參與，無法真正介入如港口疏濬、風場補償分配等重大決策過程，暴露出地方治理中「能說而不能作」的結構性困境。

### 3. 地方眼中的漁會

在筆者的田野觀察中，漁會雖自我定位為「協助反映」、「中間橋樑」，但在政策落實與基層溝通的角色實踐上，更多時候僅止於資訊傳遞與程序配合，並未發揮其在法規中所承載的主動治理潛力。

這種模糊角色在風場開發爭議中顯得尤為突出。漁會雖代表漁民與開發單位進行協調，但實際過程中缺乏與基層充分溝通，導致補償分配爭議叢生。楊船長語帶憤怒地說：

沒有！漁會完全沒有幫助。所以才成立這個（自救協會）。對，自力更生啦。我們這個協會裡面有兩百多個律師，所以說有時候遇到什麼事情，律師會出來幫我們。（田野筆記，楊船長，2025/01/12）

當代表機構無法有效發聲，漁民便轉向自組行動來爭取發言權，漁會在此過程中喪失部分集體協商平台的地位與信任基礎。

不僅如此，漁會還透過信用部貸款等金融機制，在無形中介入漁民的經濟與行動自由。在某些漁民眼中，漁會已不再只是協調單位，而成為一個照顧與牽制並存的機構：「貸款卡死漁民，怎麼敢吭聲？」（田野筆記，蔡曜大哥，2025/01/16）

對仰賴信用部資源維生的基層漁民而言，這樣的制度安排構成一種無法說不的依賴關係，使漁會得以透過財務結構穩定其治理位置，卻也削弱了地方的批判與改革動能。

最終，漁會作為地方治理中的「半治理者」，既無法脫離制度責任，又難以主動塑造未來，長期維持在一種「介入但不承擔」的中介狀態之中。這樣的定位，正是箔子寮治理困局的縮影。

## （二）小結

這樣的治理曖昧不僅限於漁會本身，也與更廣泛的制度斷裂與權責錯置有關。漁會難以主導建設或分配資源，基層官員無力整合計畫、上級機關推諉責任，最終形成一種多重卸責、象徵參與卻實質失能的治理結構。以下以蔡曜大哥的一段話，勾勒出此種盤根錯節的失能結構：

漁港一直延宕下去、一直沒落。在這裡生活的人，他只能去找議員、找鄉長，但這些人其實也無能為力。他們根本不懂怎麼整合出一個完整的建設企劃案。對鄉長來說，漁港不是他能處理的事，他會直接說：「這是中央的事」。

你去縣政府反應，他們也會說一樣的話：「不是我們的權限，是中央的事。」所以大家都在「一推三五六」，互相卸責。再加上有些政治色彩，例如地方是藍的，中央是綠的，縣府就說：「中央的事我不管」。這樣搞到最後，地方矛盾被升高，建設卻始終無解。

但我告訴你，如果今天下來一個建設案，譬如說一年五千萬，他們馬上就會學會怎麼運作，怎麼送案、怎麼協調。這不是不會，是「不做」。（田野筆記，蔡曜，2025/01/16）

這番話揭示出，漁會僅是整體治理失靈體系中的一環。其行動的受限與權責的模糊，不應簡化為單一組織的怠惰，而需放入地方治理場域中的權力錯置、制度設計與政治現實之中加以理解。下一節將進入全文的綜合討論，回到本研究對治理失能的核心關懷。

## 六、 討論

本章節將整合前文所呈現的田野材料與理論視角，嘗試從三個層面切入對箔子寮漁港治理失能現象的理解：（一）治理與政策敘事的運作（*narrative governance*）；（二）基層官僚（*bureaucracy*）的困境；（三）地方對未來的懸置願景與情感政治（*suspended aspirations*）。這三個層次彼此交織，共同構成

一種「敘事先行、實作斷裂、願景懸置」的治理狀態，也揭示了地方如何在治理語言充斥卻行動缺席的矛盾中艱難生存。

### (一) 治理敘事 (narrative governance) 的運作

在箔子寮，治理並不以行動為先，發展政策往往擁有完整的藍圖、簡報與提案流程，卻遲遲無法轉化為實際工程或制度性改革。政策存在於話語中，卻缺席於現場行動，形構出一種「計畫正在推進」的假象。

筆者在網路上可看到各計畫擁有完備的會議紀錄與階段性進度，但在實際田野中，漁民與居民普遍以「有人在講」、「還沒開始」、「聽說在規劃中」來描述其狀態，反映政策敘事先行、行動缺席的治理邏輯。

在筆者田野所聽聞的多場簡報、公聽會與跨層級會勘中尤為明顯。這些程序形式上回應「參與」與「共識」，但當地人往往無法參與計畫的構思與推動，產製的是一種無法實現的治理想像。正如 Björkman (2015) 所觀察，規劃語言經常與基礎條件脫節，其主要產物並非可執行的工程，而是一種「未來指涉」的技術產出 (future referent)，它延續了政策的話語生命，卻中止了具體的治理實踐。

Björkman 指出，許多政策計畫並非為實行而設計，而是作為「預先建構未來」的話語操作 (Björkman 2015: 146)。這些計畫營造出「未來已在進行」的感受，即便實質停滯，仍能對外呈現出治理正在運作的幻象。在箔子寮，這類「幻象性治理」在官民語言中屢見不鮮。居民普遍表示：「都有在講，但沒有真的要。」這類語境揭示：政策藍圖的存在，反而成為延宕責任、穩定秩序的治理手段，而非推動改變的起點。

治理失能的根本，不在於個別官員的怠惰，而是現行結構下慣於以敘事主導未來，卻缺乏將其落實的條件與動能。政策藍圖成為「延後的承諾」與「懸置的進行式」，使地方長期陷入「總在等待，但從未到來」的狀態。更值得注意的是，高現代主義式的治理往往伴隨「未來導向」的語言策略。例如，箔子寮縣政府或在簡報中強調「未來五年內完成」、「2028 年前完成招商」、「成為全國第一個示範園區」，這些語言建構出一種未來已被設計、改變正在發生的治理幻象，但這些預期往往缺乏落實的時程、財源與權責配置，使得地方社群始終處於等待中。

因此，高現代主義的治理邏輯不僅是設計思維的偏誤，更是一種治理失能的結構性根源。它將未來視為可被建構與預設的對象，卻忽略治理的關鍵基礎，也就是與地方社會之間的協調、協商與共構能力。從上而下、圖像主導的規劃想像，

在漁港治理的實際操作中，往往淪為未竟之志，留下諸多語言性的藍圖與未完成的承諾。

筆者將此現象稱為「紙上談兵式的治理斷裂」，指的是當治理話語不斷生成未來願景，卻無法有效轉化為具體實作與責任承擔時，治理實踐遂陷入「空口講白話」式的政策空轉與行動停滯的雙重困境。這種失能，並非治理機制的消極或缺位，而是源於治理邏輯本身的結構性矛盾，亦即語言與物質、願景與執行之間的深層斷裂。此現象在筆者的田野觀察中尤為明顯，體現在多項政策雖具完整藍圖與程序，卻長期停留於語言層次，無法落實於地方治理的實踐場域之中。

回望箔子寮港區內那條早已佈滿淤沙的航道、閒置已久的卸魚平台與門可羅雀的冷藏倉庫，正如 Larkin (2013) 所指出，基礎設施不僅是物質系統或技術網絡，它更是一種政治實作與文化形式的結合體。這些物件是「讓其他事物得以移動的物質」，也是權力、認可與關係的中介。正如 Lisa Björkman 所指出，當規劃邏輯受到市場導向驅動，制度往往傾向抽象化處理物質條件，使藍圖脫離實地限制，最終以「外部性」形式呈現其後果——如水壓不足、排水錯置等治理斷裂的具體體現。她批判：「市場正在重繪孟買的面貌，卻未徵詢水管的意見」（Björkman 2015: 12），點出制度設計忽略基礎現實所造成的責任鬆動。

這種懸置並非抽象想像，而有具體後果。港區長期未能疏濬，漁民只能冒險出海或被迫轉行，養殖戶則陸續退場。當捕撈與養殖都無法正常維持，關於加工園區與觀光漁市的發展更顯遙不可及。「未實現的藍圖」不僅是一種治理語言的殘響，也是地方社群日復一日生活的現實阻礙。

## （二） 基層官僚的困境 (bureaucratic predicament)

在箔子寮，治理語言雖持續在場，但具體行動卻屢屢停滯。政策規劃與在地條件之間的制度性斷裂，加上權責不清，導致地方官僚常以語言維持表面進展，卻難以推動實質改變。當政策語言的生成快於實地落實，治理遂轉向依賴地方實作者（如村里長、漁會、鄉公所）進行再詮釋與再協調。

在台灣的地方治理體系中，鄉公所作為基層行政機關，雖肩負日常行政與民意回應的任務，卻並不具備主導大型公共建設或港口治理的法定權限。正因如此，鄉公所在漁港治理中的角色顯得曖昧：一方面其地理位置最接近居民，日常生活與地方情境的掌握也最為直接，使其成為居民表達訴求的第一窗口；但另一方面，在實質政策協調與資源分配上，鄉公所卻無從插手，僅能作為傳



達民意的象徵性機構。這種「能見卻無力」的狀態，成為基層治理的制度性困境。

更進一步地，台灣地方政治採取行政與立法分立的制度設計，鄉公所與民意代表在組織上彼此獨立，卻又常因資源有限而相互掣肘。理應發揮監督與倡議作用的代表會，卻在實際運作中受制於派系壟斷與選舉利益盤算，難以形成有效的長期規劃動能。在此情況下，基層行政與地方立法皆淪為短期政治操作的場域，無法為如漁港淤沙這類需長期治理的議題提供制度性解方。正如本研究呈現的地方敘述，許多民眾對於選舉不滿與「畫大餅」的批評，指向的正是這種制度性失能的惡性循環。

此外，漁港的議題本身在政治結構中便處於邊緣位置：既不是高可見度的選舉政見，也難以透過短期政策立刻見效。港區淤沙、水質惡化與漁船出入困難等問題，需倚賴長時間的規劃、協調與技術執行，卻無法轉化為立竿見影的選票利益。於是，在選舉導向的治理邏輯下，這些問題便持續被「擱置」：沒有誰真正負責，但所有人都象徵性地「關心」；沒有真正的治理資源進駐，但官方回應與政策敘述卻不斷重複出現。

在這樣的制度結構與政治文化下，鄉公所的困境並非源自單一層級的能力不足，而是長期政治邏輯與治理結構所形塑出的制度性懸置。它既不是政策的制定者，也無法作為資源的調配者，卻時常成為地方不滿的出氣口。這樣的處境，使鄉公所在港區發展議題中，成為一個象徵性責任的承擔者，一個回應民意卻無法實現願景的制度邊陲者。這也凸顯出，在基層官僚困境的分析框架下，我們必須理解基層治理單位不只是行政機構，更是被政治體制與情感期待共同塑造的治理主體。

相比之下，漁會作為法人人民團體，表面上依法被賦予漁港設施經營與投資的優先權，實際上卻長期缺乏資源與自主性。《漁會法》第十四條明訂漁會得優先提出港區設施之投資與經營計畫，具有一定程度的政策主動權與空間。然而，這樣的法源授權在實務中往往無法落實，原因不僅是人力與資源的限制，更牽涉到地方政治網絡與制度運作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在地方治理場域中，漁會多以「幫忙反映」、「說明給漁民聽」等技術性語言參與決策程序，鮮少主動協調或提出實質倡議。這種回應模式雖看似是資源短缺所致，實則展現出制度性「最小治理」邏輯。正如 Lipsky 所言，基層實務工作者在資源不足、問題複雜的情境下，常以「回報上級」、「等待命令」的慣例化操作進行心理簡化，以降低風險與行政負擔。更複雜的是，漁會

同時也是地方經濟權力結構的一環，透過如信用部貸款等制度設計，與漁民形成既互賴又制衡的關係。

漁會既承載政策執行的期待，也肩負部分治理責任，但在制度設計、政治現實與地方信任不足的多重掣肘下，難以有效履職。最終，它延續著這種矛盾性：雖介入治理場域，卻無法真正行動或負責。這樣一種懸置的中介角色，也映照出箔子寮漁港治理難以突破的深層困境。

以「港口外移計畫」為例，縣府多年委託研究評估，卻遲無時程、機關與經費。鄉公所僅回應「尚未接獲上級指令」，無從展開後續作業。政策存在，但缺乏承接者，形成空轉。正如鄉長所言：「這是中央的事」，反映出其作為「反映單位」卻「無能為力」。

在這樣的空隙中，基層官僚成為承壓的中介角色。為了維持地方運作，他們不得不扮演「說明者」、「調解者」、甚至「非正式執行者」，依靠地方網絡與彈性手段，勉力維持最基本的秩序。治理的重擔，遂轉移至制度邊緣、資源有限的末端單位。

此外，這類藍圖之懸置並非單純技術落差，也深受選舉政治牽動。正如許冠澤（2024）指出，許多「具有未來性」的發展願景，常在選前被強調為施政亮點，以爭取資源與選票；政權更替後，為切割前朝或因應新承諾，這些計畫又被擱置。政策遂從「可落實的藍圖」轉化為「語言性的象徵操作」，淪為政治週期的一部分。

因此，治理語言持續生產，但實作停滯。這不僅削弱居民對國家承諾的信任，也讓「未實現的藍圖」成為語言治理、技術幻象與選舉節奏交織下的治理產物。

在此結構下，鄉公所與漁會雖同處治理前線，卻各陷制度困境。鄉公所名義上需回應民意，實則僅能轉達訴求，難以主動整合資源；漁會則多扮演「協助反映」角色，參與往往流於象徵，缺乏實權與資源介入決策。這些錯位與侷限，形塑出責任轉移與象徵參與的治理邏輯，使地方未來益加模糊。

正如 Lipsky（1980）所指出，基層官僚並非僅是政策終端，而是透過自由裁量與日常實作，形塑政策效果的關鍵行動者。他們在資源有限、責任模糊的情境中，以務實策略試圖支撐一個早已脫軌的治理系統。

### (三) 懸置的願景 (suspended aspirations)

正如 Lisa Björkman (2015) 所言，發展計畫構築的「語言上的未來」(a future in language) 與「物質上的失效」之間的張力，並不會隨著計畫終止而消失，反而會成為治理語言反覆使用的資源。在箔子寮，從「離島工業區」、「經貿園區」到「加值園區」，這些從未落實的政策構想不斷被喚起、轉化與再包裝，形構出一連串「未被實現的轉向」(unactualized transitions)。它們不只影響空間規劃，也深刻地塑造了地方對政策語言的認識與情感。

這些歷程並非單純的技術錯誤，而是反映出當國家發展語言面對地方現實的阻力與限制時，治理便傾向在敘事中前進、在現實中停滯。那些「說了很多年但從未實現」的過去，成為地方集體記憶中的懸置歷史，也構成治理語言持續運作的象徵資本。

在筆者的田野中，這些未竟之語常以遺留物的形式存在「懸置願景」不僅影響居民的未來想像，也滲入情感政治的日常。箔子寮的居民並非單純的被動接受者，他們質疑、調侃，卻仍懷有未竟的期待。他們口中說著「早知道就不要信了」，但每當新政策名稱出現、每當選舉將近，這些懸置的願景便再度被喚起。這種情感不是單純的錯愕，而是制度性失能下的「習慣希望」：即便希望一再落空，人們仍持續相信「總有一天會輪到我們」。

正如地方耆老所指出，政策在不同治理層級之間踢皮球，形成推諉卸責的邏輯，也讓地方建設長期懸宕、無以為繼。因此，治理失能不只是語言與制度的斷裂，更是一種懸置中的情感結構。那些未來藍圖的重複再現，不再只是發展的指標，而是構成地方經驗與政治感受的核心素材。在這樣的狀態下，「未來」始終被說出口，卻從未真正抵達。

## 七、 結論

在這份研究中，我以箔子寮漁港為田野場域，從治理語言、基層實作與地方情感三個面向，探討漁港發展「堵住」的深層結構與日常機制。這裡所謂的「堵住」，不只是硬體工程的延宕，也不僅是資源配置的失衡，而是一種由政策語言的過度產製、治理制度的責任錯置，以及居民對未來想像的懸置所交織出的治理失能狀態。

本研究提出三個核心概念來解構此一治理困境的生成過程。首先，在敘事治理層面，我指出政策文件與發展藍圖不僅是技術性的執行計畫，更是一種治理技

術：它們透過不斷重申未來可能性，在敘事中營造出「治理正在發生」的假象。政策不斷在語言中「進行中」，但行動上卻持續懸置，形成語言先於行動的治理邏輯。簡報、里程碑與進度報告的視覺呈現製造出治理有作為的幻象，卻掩蓋了行動的停滯與責任的卸除。藍圖遂成為一種懸置的進行式，不斷在語言層面生產「未來感」，卻難以真正落實於地方現實，構成一種紙上談兵式的治理斷裂。

其次，從基層官僚的實作困境出發，我分析縣政府、鄉公所與漁會等基層單位如何在中央語言與地方現實之間，他們被期待回應民意，卻缺乏實際資源與權限，在政策懸置的體系中，只能透過象徵性行動與非正式協調維持運作秩序。他們就像被綁住手腳的傳聲筒，只能說不能動，成為制度運作中被動的中介者，只能靠地方人脈、媒體曝光、或者私下協調，來試圖推動一點進展。這些努力看似有動作，但其實只是勉強讓事情不至於完全停擺，是一種最小限度、不得已的治理維持術。

最後，懸置願景揭示地方居民如何在一再延宕的政策藍圖中，持續投注希望、卻也積累失望與不信任。像是「離島工業區」、「水產加值園區」等發展構想，雖未實現，卻長期存在於人們的語言、圖像與記憶中，不再只是過去的殘影，而是構成「將來的現實」，一種讓地方持續批判、回憶並重新想像未來的情感資源。這些願景的懸置，並非遺忘，而是一種被反覆引用、再命名、再包裝的治理語言，其象徵力量與情感張力仍在地方持續發酵。

箔子寮漁港的「堵住」，因此並非治理的終點，而是一個不斷再生產的動態過程。政策語言雖不斷前行，卻難以牽引現實的改變；基層官僚日復一日的實作，也難以修補制度斷裂；而地方居民對未來的期待，既是支撐社群的情感力量，也是持續遭遇挫敗的風險來源。治理失能，於是成為一種結構性懸置的總和。

雖然本研究聚焦於「治理失能」與「未實現藍圖」兩大主軸，但在田野過程中，我也隱約捕捉到一些更深層的現象。例如：地方行動者如何主動扮演象徵治理的說話者與轉譯者；未實現藍圖如何轉化為一種情感性未來的集體想像；以及治理失能如何在日常互動中逐步生成、內化並常態化。這些觀察尚未在本論文中獲得系統性的展開，但已為未來研究指向提供了啟發性的線索。我期待能在後續的工作中，進一步追問：在這些被懸置的治理場域中，人們究竟如何持續生活、調動資源、重組秩序，又如何在「治理已失效」的現實中，想像與實踐另一種可能的未來。

## 八、 參考資料

### 英文學術著作與文章

Anand, Nikhil

2017 *Hydraulic City: Water and the Infrastructures of Citizenship in Mumbai*.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Anjaria, Jonathan Shapiro

2016 *The Slow Boil: Street Food, Rights, and Public Space in Mumb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jörkman, Lisa

2015 *Pipe Politics, Contested Waters: Embedded Infrastructures of Millennial Mumbai*.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Bridgeman, Teresa

2005 Thinking Ahead: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Prolepsis. *Narrative* 13(2):  
125–159.

Chatterjee, Partha

2004 *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 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ordon, Avery

1997 *Ghostly Matters: Haunting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Foreword  
by Janice Radwa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agner, Michael, and Hans-Jörg Rheinberger

2003 Prolepsis: Considerations for Histories of Science after 2000. *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oking Back, Ahead*. Bernard Joerges, and Helga Nowotny, ed. Pp. 211–228.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Jameson, Fredric

- 1998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Larkin, Brian

-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 327–343.

Lipsky, Michael

- 1980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Dilemmas of the Individual in Public Servic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Martens, Reuben, and Pieter Vermeulen

- 2021 Infrastructural Prolepsis. *Resilience: A Journal of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8(3): 15–39.

Scott, James C.

-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ebb, P., and Kalervo Gulson

- 2020 Policy Prolepsis in Education: Encounters, Becomings, and Phantasms. *In The Education Assemblage*. Greg Thompson, eds. London: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701652-9>.

## 中文書籍與論文

劉曜華等編

- 2006 《四湖鄉志》。雲林：四湖鄉公所。

臺灣漁業及海洋技術顧問社編

- 1988 《雲林縣漁港》。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03 《雲林縣漁港》。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林國賢

- 2011 《討海人的故事：雲林漁業誌》。雲林：雲林縣文化局。

饒祐睿

- 2004 《「自由」的時間：一個對當代靠海生活技藝的民族誌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

郭沛軒

- 2016 《劫後漁生：雲林靠海村落的人、水與魚》。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冠澤

- 2024 《邁向後發展型國家：「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與臺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政偉

- 2020 〈以資源基礎理論建立休閒漁業發展策略之研究〉。《休閒產業管理學刊》13(2)：19-44。

林雅萍、楊文慧

- 2017 〈傳統農漁村轉型休閒觀光意願之初探—以枋山鄉為例〉。《臺北海洋科技大學學報》9(1)：20-35。

吳映青

- 2019 〈海路：從人類學視角看臺灣近海漁業〉。《中國飲食文化》15(2)：7-53。

黃書緯

- 2019 〈來去蚵仔寮買現撈：魚種、漁法，與魚市場的再拼裝〉。《中國飲食文化》15(2)：157-197。

郭天祐和劉曉語

- 2024 〈All Actions are Re-actions：箔子寮人們對水的感知、互動與關係〉。刊於《風頭水尾——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頁 1-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張睿寧

- 2021 《制度及場域的不對稱邏輯：我國離岸風場環評與漁業補償關聯的發展與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卓霖

- 2024 〈原野的呼聲——四湖鄉再生能源地景的論述與想像〉。刊於《風頭水尾——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頁 47-11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 新聞與網路資料

王威雄

- 2024 〈箔子寮漁港特定區都計轉型 盼帶動雲林沿海產業發展〉。「公視新聞網」，<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96824>，2024 年 5 月 25 日上線。

周麗蘭

- 2024 〈雲林箔子寮漁港溢堤解決 漁民期待的卻是另 1 事〉。「中時」，<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40922002387-260421?chdtv>，2024 年 9 月 22 日上線。

農業部漁業署

- 2016 〈漁港法〉。「農業部漁業署」，[https://www.fa.gov.tw/view.php?theme=FishingPortAct\\_LAW&subtheme=&id=13](https://www.fa.gov.tw/view.php?theme=FishingPortAct_LAW&subtheme=&id=13)，2025 年 6 月 10 日取用。

雲林區漁會

- 無年份 〈雲林區漁會全球資訊網〉。「雲林區漁會」，<http://www.ylfish.com.tw/index.asp?main=M1>，2025 年 6 月 10 日取用。

雲林縣政府

- 1997 《雲林文獻》第四十一輯。雲林：雲林縣政府。



- 2018 《變更箔子寮漁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公展書》。雲林：雲林縣政府。
- 2020 〈縣府積極爭取中央補助 疏通箔子寮漁港航道淤積困境 活化漁港保障漁民生計〉。「雲林縣政府官網」，  
[https://www.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1244&s=282814](https://www.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1244&s=282814)，  
2020 年 3 月 3 日上線。
- 2022 〈擬定箔子寮漁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書〉，「城鄉發展整合資訊查詢」，  
<https://urbangis.yunlin.gov.tw/YLCITYGIS/InfoArea/PeopleView/Work.aspx?Type=1A>，取用日期：2024 年 12 月 4 日。
- 2023 〈張麗善出席天下城市論壇 擘劃九大產業園區盼青年回流.留住人才〉。「雲林縣政府官網」，  
[https://www.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1244&s=425281](https://www.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1244&s=425281)，  
2022 年 8 月 8 日上線。

#### 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

- 2024 〈麥寮戶政事務所人口統計資料〉。「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  
<https://mailiao.household.yunlin.gov.tw/popul01/List.aspx?Parser=99,5,40,,,,,,,,,,,,,1,,,,,18>，2024 年 11 月 22 日取用。

#### 劉奕璇、羅代章、吳建宏

- 2023 〈箔子寮漁港海水倒灌大淹水 鄉長怒：20 年來最嚴重〉。「華視」  
<https://tw.news.yahoo.com/%E7%AE%94%E5%AD%90%E5%AF%AE%E6%BC%81%E6%B8%AF%E6%B5%B7%E6%B0%B4%E5%80%92%E7%81%8C%E5%A4%A7%E6%B7%B9%E6%B0%B4%E9%84%89%E9%95%B7%E6%80%92-20%E5%B9%B4%E4%BE%86%E6%9C%80%E5%9A%B4%E9%87%8D-110200306.html>，2023 年 8 月 31 日上線。

#### ambi studio

- 2025 〈立建築 ambi studio 箔子寮漁港景觀跨橋全案設計構想〉，「立建築」  
<https://ambi.com.tw/project/30>，2025 年 1 月 16 日取用。

## Google Maps

- 2024 〈箔子寮〉。「Google Maps」，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E7%AE%94%E5%AD%90%E5%AF%AE%E6%BC%81%E6%B8%AF/@23.62542,120.1308872,14.91z/data=!4m6!3m5!1s0x346c1fc0677feec9:0x14e073814d732146!8m2!3d23.6190137!4d120.1370676!16s%2Fg%2F1q6fyckd1?entry=ttu>，  
accessed November 22, 2024.

## Commons Wikimedia

- 2024 〈Waisanding-Sandbank 1956–2000.svg〉。「Commons Wikimedi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Waisanding-Sandbank\\_1956-2000.sv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Waisanding-Sandbank_1956-2000.svg)，  
accessed November 22, 2024。



## 潮起潮落之際：箔子寮漁港的停滯與韌性<sup>1</sup>

林建志（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王莉晴（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 摘要

本研究聚焦於雲林縣四湖鄉的箔子寮漁港，探討該地在漁業式微與都市發展邊緣化的脈絡下，如何經歷產業、政治等社會各層面之停滯，並展現出地方韌性與空間再生的可能性。透過田野調查、深度訪談與地方歷史脈絡分析，本文指出，箔子寮漁港雖長期面臨遠洋漁業衰退、人口外流與政策邊緣化等多重挑戰，其發展進程呈現出一種非線性的停滯狀態。然而，在地居民與社群透過烏魚子加工產業的經濟活動、箔子寮漁港歷史記憶再造，逐步形塑出具備文化與社會韌性的地方回應機制。箔子寮漁港的空間變遷過程，體現出停滯中的動態所潛藏之能動性，為理解箔子寮該沿海漁村在全球化與地方性張力下的生存策略。

關鍵詞：箔子寮漁港、停滯、韌性

---

<sup>1</sup> 本文為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課程期末報告，特別感謝黃郁茜老師與盧佳秀、郭天祐助教的指導與帶領。也謝謝箔子寮居民鄭俊利老闆、蔡峰女士、張永明主管、李龍飛鄉長、雲林縣四湖鄉農會箔子辦事處吳經辦、林主任、高淳斐姐姐(灣灣姐)、舊港偶遇的釣客、在檳榔攤遇見的人們、海巡署人員、魚販大哥、雲林區漁會吳股長、善水咖啡老闆及老闆娘、春天民宿老闆及老闆娘等人對我們親切的招待和協助，還有一起努力的同學們及在箔子寮相遇的所有人，讓我們能夠順利甚至幸福的度過田野期間並完成這份報告。也感謝饒祐睿對於本文的評論和建議。惟文責由二位作者自負。

## 一、前言

走進冬日的茆子寮漁港，映在眼中的是靜謐、甚至相當蕭條的港邊景象：漁會大樓的輪廓淹沒在雜草叢裡，南側的新港也沒有明顯的使用痕跡，招標不成的水產加工園區也是名存實亡，很難讓人相信這裡曾經是熙來攘往的魚市。初步期待能在此地觀察到漁民與環境互動的活力，以及社區內部的動態。但實地走訪卻是顯示出與我們想像截然不同的「停滯」狀態。十二日的田野調查，場域為雲林縣四湖鄉茆子寮漁港。原先期待以漁業為切入點，觀察當地人與自然的互動，但田野中的經驗都導向了對一個逐漸凋零漁村的深層關注。茆子寮，作為曾經榮景一時的二類漁港，在歷經淤沙、政策失效、人口外移等結構性因素的交織下，逐步走向一種近乎凍結的時間感——一種介於過去榮光與未來未知之間的「停滯」。而在這片看似寂寥的土地上，我們也看見了屬於茆子寮獨特的韌性。阿蜂阿姨的檳榔攤，一間坐落於漁港邊的鐵皮小屋，成為了我們觀察茆子寮生活韌性的關鍵場域。每天清晨，養殖漁民、退休漁民、海巡署人員在此聚首，聊天、泡茶，分享彼此的生活與記憶。這個小小空間所凝聚的，不僅是人與人的情誼，更是一種對地方的持續投入與微小但真實的生活實踐。

茆子寮漁港的現況，無疑呈現出一種「停滯」的圖像。無論是漁業的式微、基礎建設的停頓，抑或人口老化與青年外流所帶來的社區活力衰退，皆使得當地居民對未來抱持一種近乎無力的情緒。然而，在這樣的停滯當中，我們也觀察到居民透過日常的社交實踐——尤其以阿蜂阿姨的檳榔攤為代表——持續地維繫著人際網絡、重構地方感，並展現出某種生活韌性。

我們研究關注的核心問題在於：在一個處於發展邊緣、瀰漫停滯感的漁村中，居民如何透過阿蜂阿姨的檳榔攤、阿利老闆的烏魚子加工廠實踐地方上的情感、產業連結？這樣的社會互動是否可能提供另一種地方為主體，持續存在、發展的可能，挑戰主流以建設與經濟為核心的敘事？

過去的漁村研究多半聚焦於產業變遷、國家政策如何影響地方發展，或是全球化如何改變漁民的生計策略。但茆子寮作為一個「發展嚴重受阻」的漁村是較少被關注的對象，居民如何在結構性困境下持續維繫社區，並透過日常互動建構出一套應對現況的生活方式。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茆子寮的案例，補充現有漁村研究中對「停滯中的動態」與「地方韌性」的理解，並進一步探討當地人如何在地方脈絡下展現主體性（*subjectivity*），亦即經驗歷史變遷、政治行動等事物（*object*）的觀點。

## 二、文獻回顧

### (一)、漁村社會變遷研究及區域文獻回顧

郭沛軒 (2016) 對於雲林縣口湖鄉沿海村落興衰的歷史進行了詳細的回顧。雲林靠海早年以農業為主，但卻面臨了嚴峻的環境惡化。1950 年代，國家的生產計畫在制定時，沒有充分考量到地方的地理與環境特性，這導致的後果包括地層下陷和海水入侵。面對農業的頹勢，靠海村落的居民展現了適應性，轉向發展水產養殖業。但這並非意味著環境問題就此消失。在 1980 年代初期，第一波養殖熱潮以高密度的草蝦養殖為主，但由於疾病的爆發，草蝦產業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同時鰻苗的數量也開始下降，被認為與過度捕撈和整體自然環境的變遷有關。這些經驗都說明了，即使產業能夠轉型，環境變遷仍然是影響當地經濟發展相當重要的因素。

而饒祐睿 (2024) 同樣是對雲林西南方沿海村落的研究，則更著重於海洋環境本身的動態性。文中特別提到了被當地漁民稱為「活沙」(uáh-sua) 的沙的持續流動和變化。這種「活沙」構成的海底和海岸地形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不斷地移動和重塑，這直接地影響了漁民的捕魚和養蚵活動。漁民必須憑藉長期的經驗和細膩的觀察，才能去理解並和活沙「對拍」(attunement)，以在這種難以預測的環境變化下，有效地進行漁撈作業。正是因為在受到環境條件限制的狀態下捕魚，同時讓他們創造價值並維持生計，使他們能夠實現時間自主安排的「自由」。漁港的淤沙問題就是「活沙」變動的一個具體體現，它會阻礙漁船的進出，迫使漁民發展出相應的應對策略，例如調整漁船類型或改變出海時間。

在閱讀這些文獻時，總會認為環境因素所導致的困境能夠透過產業轉型，或人與環境的關係切入，去看見一絲轉機，也是我們一開始在尚未進入田野地之前所單純的認知，但在箔子寮的案例中，產業的發展卻是呈現近乎「停滯」的狀態，仍在從事漁業的人更是屈指可數，不見青年漁民的蹤影。這就連結到了漁業衰退的另一項因素——人口。人口外移是漁村衰退的常見現象，不僅導致勞動力減少、人口老化，也使得社區活力下降，加劇了「停滯感」。周辰諭 (2007) 指出，1980 年代末期，由於養殖漁業地下水超抽之問題浮現，使得雲林沿海地區地層下陷，加上 1986 年韋恩颱風侵襲，使農漁業生產沒落，當地產業發展受限，以及年輕一代接手傳統農漁業的意願較低，人口逐漸外移。最後在 1991 年麥寮鄉六輕工業區的設立，更象徵雲林地區產業結構朝向工業化目標前進，雲林縣農漁業生產地區沒落，人口大量外移至都市、工業密集之地區。鄉村的高齡化及產業發展問題油然而生，正如我們的田野地——雲林縣四湖鄉箔子寮地區。

政策落差也可能加劇漁村的衰退和停滯感。林瑋嬪（2023）指出在戰地政務時期，馬祖的漁民受到許多限制，出海捕魚的時間和地點都受到管制，捕獲的黃魚甚至還有可能被軍方以「囤積物資」為由沒收。這些政策都直接壓制了漁民的生計，加速了當地產業的衰退。政策的力量可以是助力，也可以成為阻力，雖然箔子寮的情況與戰地政務不同，但在人口老化、外流及淤沙堆積的現況下，政策上的缺乏作為也同樣加速了當地漁業發展的衰退。

在梁宸維、王安珩（2024）的研究中，箔子寮的 A 阿伯對長照政策的質疑，認為利益都被私人公司賺走，並未回歸到村子裡，也反映出了政策無法有效解決地方需求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加劇居民的無力感和停滯感。我們在田野期間與當地居民談及淤沙時，也聽過居民質疑公部門計畫與實行上存在落差。雖然在田野期間我們沒有能力釐清事件的真相，但這些發現都指出了箔子寮漁港發展受困的現況牽涉了複雜的結構性因素，僅靠地方的力量是難以改變現狀的。

綜上所述，箔子寮漁港的衰退和我們在二（二）小節將討論的「停滯感」，是產業及生態環境變遷導致漁業生產受限，年輕人口外移造成社區活力下降，以及政策制定與地方需求之間存在落差等多重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而這些因素也共同塑造了箔子寮當前的困境。

## （二）、危機研究中停滯（stagnation）概念

20 世紀中，人類學開始進行危機（crisis）的研究，而通過儀式的研究對危機時期的概念化具有根本性的影響。在這裡，危機指的是一種不連續性，在這種中斷，未來並不可預測。危機的研究主題廣泛，包含自然環境災害、流行病傳播、飢荒、暴力與恐怖攻擊，以及經濟政策所造成的貧窮、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Visacovsky 2017）。社會危機是種閾限階段（liminal moments），換言之，既定的秩序反覆崩潰，因此應當被摧毀並由另一種秩序取而代之（Stewart & Harding 1999）。

以箔子寮的政經發展狀況來看，我們能窺見箔子寮在經濟政策方面，如何在臺灣當代社會上缺席，尤其在居民賴以為生的傳統漁業沒落之下，無論是地方創生及城鄉發展的無法永續、漁港改造計畫的延宕，所造成當地人、來箔子寮的人們所感知到的時間連續性（temporal continuity）斷裂或凍結。我們能將危機理解為時間經驗的特殊案例。當我們從經驗上認識到不連續性或斷裂已經發生，意即危機時，時間被視為「停滯」、「凍結」。

### （三）、韌性（resilience）概念回顧

韌性的詞意為物質被彎曲、延展或壓迫後能回到原有形狀的能力，延伸至人在面對逆境時，能適應、調適，並保持穩定的能力。人類學對「韌性」(resilience)的討論，近年來逐漸從單一功能性的理解，轉向關注其在特定社會歷史脈絡中的建構與實踐。韌性往往並非一種自然存在的「適應力」，而是鑲嵌於地方知識、社會關係與政治經濟結構中的複雜實踐。Dunn (2014) 探討喬治亞戰後難民營中的生活條件，顯示出在國際人道救援機構介入下，韌性如何被制度化為一種治理手段。他指出，「韌性」被政策語言轉化為個人或社區的責任，實際上模糊了國家責任與制度失能，導致地方社群被迫承擔應對危機的主體角色。Norwood (2020) 則透過對荷蘭安寧照護與安樂死實踐的民族誌研究，提出「社會韌性」(social resilience) 的概念。在面對生命終結的情境中，個體與其社會網絡如何透過日常對話、倫理協商與情感支持，維持尊嚴與生活的意義。這種韌性體現於人際關係實踐中，顯示出韌性不只是面對外在災變的應對力，更是一種維持社會與倫理秩序的方式。

康舒雅(2024)則以故鄉彰化縣台西村為田野地，描繪沿海漁村高齡化之下，所存在的高齡者的生活慣習、生理退化感知以及相互的照護模式，並且探討在偏鄉的環境之下，長者如何安老？共同築起的社會記憶如何讓長者們成為「留下來的人」？在箔子寮漁港活動的人們，亦展現此社會韌性，而這些我們的報導者，便在阿蜂阿姨檳榔攤實踐他們的社會互助，無論是情感、物資交換或是生理上的健康照護，呈現出箔子寮成為地理、政治邊陲地帶所培養出的韌性。

後勁居民在面對工業發展的衝擊時所展現的韌性，也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觀察視角。呂欣怡(2021)指出，在都市發展的夾縫中，後勁的居民並未完全被邊緣化，而是找到機會佔據工業隙縫中的空間，並透過植物培育重新形塑生活方式。這使盆栽園不僅只是經濟生產的場域，更成為勞動、知識與社群關係的交會點，讓後勁居民即使身處在不利的環境，仍然能夠維繫地方感。研究也透過「寓居」與「符應」的概念，強調了地方社群如何在受限的條件下，透過與植物的共作來尋找生存之道。這種與環境的積極互動與調適，正是社會韌性的具體展現。同時也啟示我們，即使面對看似難以克服的外部壓力，地方社群仍可能透過自身的創意與集體行動，發展出新的生存模式，展現其適應能力。總而言之，社會韌性體現在多種面向，它不僅包含著面對困境時的調適與應變能力，也體現在深耕地方知識與文化、積極建立社會網絡，以及善用外部資源與新科技等不同方面。



### 三、箔子寮漁港的歷史變遷與當代困境

#### (一)、漁港的興衰歷史：早期發展、漁業政策的影響、產業結構的轉變

箔子寮漁港位於雲林縣四湖鄉西側，面對臺灣海峽。這個靠海村落在過去的年代，海域提供了村民賴以維生的資源，漁港曾是地方社會的生命中樞。在港邊遇見的釣客也不吝嗇地分享過去漁港的景象，年紀約莫六十歲左右的他，描述著那段生態環境還很好的日子：

以前生態環境還很好的時候漁港還不是用水泥蓋的，地面主要是土溝，用土溝圍起來，冬天時隨便搭個網子就能抓到不少螃蟹，小時候常常和朋友們到港邊抓螃蟹來玩，港邊非常熱鬧，常有人在港邊賣漁貨，就直接在地上擺攤。(2025.01.10 田野筆記)

地方居民如同一部記憶的錄音機，記錄著這裡的繁華與變遷。善水咖啡的老闆娘在談話中道：「雲林從北邊下來『麥臺四口』——麥寮、臺西、四湖、口湖，以前是一日遊的熱門行程啊。那時候還有國旅補助，很多人會來玩。」。但今日的箔子寮，已不復當年景象。在與我們的訪談中，漁會的張主管一語道破轉變的癥結：「像我們這邊水產加工園區做不起來，最主要就是地價、交通、人口老化這些結構性問題。」

詢問水產加工園區名存實亡的現況，背後是有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他指出，當初招商規劃時並未明確設定加工標的：「什麼樣的水產，進口的、近海捕撈、養殖的……哪一種是主要的加工目標，在規劃這個園區時其實根本也沒有設定，這個地方就是有著水產加工園區的名字，但細部的、具體上的執行都沒辦法做。」更進一步地，主管指出這塊土地雖名為「水產加工園區」，但實際上無論基礎設施還是營運配套都未完善。

我們接著詢問當地是否有觀光發展計畫，主管很直接乾脆地回答：「沒有。」隨後補充：「縣府是有意願，明後年有在想，但要怎麼做都還不知道，還是要等之後有專業人士的協助才會比較清楚。」講到觀光，張主管接續說明了他認為觀光要做起來最重要的三個因素——人、景點、交通。「交通很重要，道路用好，又有景點，人自然就會進來，就很簡單，只是這裡也沒什麼景點啊，沒有經費去建設。」語氣中透露著無奈。

我們進一步請他假設若經費不是問題，他會怎麼做。他思考後回答：「我會做 BOT 案啊，蓋個海生館、水族館，這樣不就有景點了？或者新港那邊現在沒在停船，那是不是可以找遊艇公司合作？這樣人就會進來。」但語畢又說：「講

是講啦，經費還是卡在那邊。現在這邊漁獲量不多，承運數量不足，交通、資源取得也都很不方便，在這樣的條件下硬要做的話，成本與效益也不成比例。」

在談話的過程中也逐漸能察覺到，箔子寮的沒落不是單一事件或個別決策的結果，而是一連串結構性問題積累而成的產物。從政策設計錯置、經費短缺、產業轉型停滯，到政府與地方之間的治理斷裂、青年外流與在地知識的邊緣化。正如張主管所言，漁業的辛勞與缺乏前景使年輕人不再願意返鄉，而政府也未提供足夠的支持與想像力來協助地方再生。箔子寮的歷史與現況，映照出了臺灣漁村發展中的困境，更揭露國家治理邏輯與地方生活之間的斷裂。

大多數漁民認為政府不重視這個地方，只會操作一些政治選舉手法而已，對中央、地方政府抱持著消極態度。訪問口湖鄉公所之時，發現鄉公所也夾在縣政府、漁會、漁民不同立場之間，無奈指出：

雲林鄉親旅外，剩 65 萬左右，旅外超過 200 萬人，因就業機會少，沒有一個很好的環境，而政府有在推動地方創生。六都也是有他們的問題，土壤液化、人口過度密集等，而雲林/箔子寮漁港要解決的是海岸線整治、觀光漁港、漁民能夠出入，像規劃觀光漁市，雲林漁業資源豐富，是政府沒有規劃好。（2025.01.13 口湖鄉公所訪談）

口湖鄉長進一步表明，打造好箔子寮觀光漁市，雲林的漁港打造好，就會推動地方；淤積也未必不是好事，像日本、新加坡填海造陸擴大用地；無法種作，能源政策講求替代能源，做好光電也會發展很好。箔子寮漁港觀光化、淤積沙洲做光電發電地，西海岸做一個全世界、全臺灣最好漁港的決心，不要像上一代畏縮。這些是口湖鄉長的期許，但鄉長提出許多建設藍圖後，面對現實層面，還是僅能採取見招拆招，苦於位在較被動的狀態。我們能看見建設、發展主導權仍在中央、縣政府手上，也知建設的實施與選舉制度有關，有時建設的落成，會在後續任期而非自己任內，故地方政府不太積極推動長期計畫，尤其經費有限，速成效益導向的政策實施及規劃，才會對政治有利，進而使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建設的箔子寮就這樣被擱置在旁，自行面對種種困境。

漁港重劃但沒有漁民進駐，因漁港不可使用。輔導這些產業，要解決之前，業者自己會評估，開發不起來就是沒有誘因。（2025.01.13 口湖鄉公所訪談）

政府政策與地方連結的落差，不只在鄉長的言談中窺見，與漁會張主管談話，每每談得越多語氣越發沈重：「我們現在要報檢驗、寫報告，一堆規定。但這些方案真的會被看到嗎？不會啦。政府只是做表面功夫，不會真的想讓地方變好。」他舉例說到，很多學校包括臺大、高科大、海大來這裡做研究、寫企劃案，最後也都沒通過。「講永續？沒錢、沒改變，人怎麼回來？剩下的漁民也老了，講永

續根本不切實際。」張主管另延伸到漁業的現狀，像是冬天漁獲量小但經濟價值高，卻因生態改變、海洋資源枯竭與過度捕撈等因素影響，愈來愈難維持。他說：「現在海產價格高，但污染看不見，也很難檢測出來。問題很多，但要對症下藥太難，沒人會真的負責。」找不到人負責，政府也沒有積極的作為，就這樣困在這個現狀了。

聽著聽著，漁港的沒落好像是個難以解決的結構性問題，我們就問了主管，漁業的沒落好像很難避免，會不會覺得很可惜，還是有想過可以怎麼保存？張主管回答，出海的人越來越少，漁業不多，政府不注重漁業青年，沒有去輔導近海或觀光漁船，年輕人沒有賺錢機會就不會回來。而且漁業辛苦，父母也不希望做這個行業，現在大家都想乾乾淨淨的在辦公室上班。

這些言談無論是不同立場的說詞、心聲，還是權責劃分不清的後果，事實便是政策實施、生態、人口結構的窘境確實的發生在箔子寮當中，擺在我們眼前。鄉公所、漁會等行政單位又無中央、縣政府權力能制定相關政策、調撥經費，只能看事辦事，心有餘而力不足。在這個曾經熱鬧非凡的漁港，我們看見的不僅是地景的轉變，更是一整個產業結構、地方政策與居民日常生活的深層掙扎與無聲抗議。

## （二）、生態困境：淤沙問題、過度捕撈等環境變遷的影響

除了政策與建設上的困境，箔子寮漁港面臨的另一項重大挑戰來自自然環境的變化。對於箔子寮漁港的衰退原因，只要是詢問箔子寮的人們，大家第一個指向都是漁港淤積。漁會的張主管給了我們詳盡的回覆，他坦言便是整體漁港沒整治，淤沙嚴重，歹出入 (*pháinn-tshut-jip*)。對於淤沙問題的源頭，不少人認為是六輕拋沙入海造成的，但濁水溪流向往南的淤沙也一定有，整個雲嘉南地區的地形地貌本身就也有影響，從 1994 年麥寮六輕進駐雲林，60 幾公里海岸線水流變化、濁水溪沙量多、水溫水流、方位走勢，等等因素都參雜其中，也沒有任何明確的證據能認定誰才是造成淤沙的主要原因，整個淤沙問題是難以歸因於任何單一因素的。

提到整治的辦法，主管回覆平常每年都會申請抽沙，但是都是治標不治本，沒辦法防止淤沙一直流入。若真的要從根本解決淤沙問題，就是要改建加長堤防，不然就是重建漁港，但重建本身就需要大筆經費，興建堤防對生態可能造成的影響也需要經過多次評估。可能是考量到箔子寮漁港投入經費後能回收的效益不大，一直以來這個地方都得不到足夠的經費去執行能治本的行動。

張主管認為，漁業消失是很可惜，但要怎麼興起是問題，法律規定越來越多，魚類資源也越來越少。他認為漁業的困境包含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生態問題、漁獲量減少、地形地貌變化以及氣溫改變，特別是過度捕撈的影響，使得海洋資源日益枯竭，養殖漁業就逐漸取代近海漁業。如前一小節所述，海產價格偏高能夠獲取利潤，但海洋污染問題卻不易被發現，因此海洋資源的枯竭也很難找到誰要負責、很難去對症下藥解決問題。

談到永續，主管說沒有什麼永續，沒有經費做出改變，環境不會改善，人不會回來，剩下的漁民也都年事已高，所以現在要永續很難。對於地方居民而言，這些結構性的生態困境逐漸轉化成一種日常中的無力感——看得到問題，卻無從處理，長年累積的不是具體改變，而是習慣性的「等不到資源」。那種「知道答案卻沒有人理你」的日常，也讓地方和「永續」這個詞產生了距離感。

在人為與生態的錯縱關係中，呈現出地方上一種複雜卻難以改變的停滯狀態。地方居民知道問題在哪，卻無力處理；政策方案或許存在，但落地的機會渺茫。箔子寮的生態困境不是單純的自然災害，也不是地方治理的偶發瑕疵，而是長期下來，政治與制度擱置、不給答案的結果。當我們坐在漁會辦公室、聽著主管列出一項項做不到的修復計畫，聽著他的語氣從陳述轉為無奈，那不是對某個問題的失望，而是對整體體制的疲憊。對箔子寮而言，生態困境已經不是突發的例外狀況，而是日復一日的現實。

### （三）、強欲散庄：人口結構變遷

箔子寮目前除了上述之外所面臨的政策、生態困境，我們在田野第二天遇到農會的林主任，再向我們逕直點出這個村莊的兩點問題：人口老化、人才流失。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24）〈雲林縣統計通報第 113-04 號雲林縣青年人口遷徙情形〉，民國 112 年雲林縣青年人口遷入 3801 人，遷出 5792 人，淨遷徙人數呈現負成長。其中，遷出率又以四湖鄉 41.30% 最高，同時青年之社會增加率更以四湖鄉-23.07% 敬陪末座。觀察近五年資料，雲林縣淨遷徙人數皆為負值，顯示青年人口持續外流，成為雲林縣人口問題的最大因素，四湖鄉更是。而民國 114 年 5 月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人口統計數據指出，四湖鄉當年度人口高齡化比例高達 25.79%、人口自然成長率負成長 6.808%，在青年人口大量外移之下，超高齡社會的人口結構也成為不可避免之現象。

年輕人為什麼不在箔子寮呢？「我們這邊最缺少的就是工作機會嘛！」農會的吳經辦破題地說，也解釋箔子寮漁港現在沒有港口功能了，因為泥沙淤積。六

輕建廠也造成水流變更，加上前述港口問題，近海漁業人口不多了，漁港附近雜草叢生，漁會大樓除了面對漁港的前側，左右和後側都被雜草覆蓋。談到傳統產業，尤其是漁業，吳經辦說年輕人也不太能做，年輕人喜歡輕鬆、比較不髒的工作，自然少了回鄉從事漁業的誘因。

我們進一步詢問是否有年輕人曾就讀相關科系後選擇返鄉投入漁業時，吳經辦搖頭說沒有。他語重心長地補充，這一行平常非常閒，但一忙起來又非常辛苦，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這樣的工作節奏。「現在年輕人怕吃苦啊，不想做這樣的工作。」他的話也呼應了漁會張主管對不同世代工作價值觀差異的描述。

顯而易見的，最主要的經濟產業因生態環境惡化不再運作，又苦無政策資源協助產業轉型、在地青年就業，環環相扣變成了箔子寮如今寂寥的地景樣貌。在檳榔攤遇到的一位大哥是這麼說的：「年輕人要有可以生存的空間才會想回來，地方用好才有空間生存，沒得生存就吃東北季風就好了啊！」大哥張大嘴巴示意並笑著說，而這句半開玩笑的話語，卻道出了地方發展與青年返鄉最根本的矛盾與無奈。

## 四、箔子寮經濟產業——烏魚子加工

### (一)、阿利老闆的烏魚子加工廠

漫步在冬日箔子、箔東村中，相較漁港周遭寂寥的景象，可以看到以普天宮為中心的社區人際互動、產業活絡了不少（蔡耀陞、何昀瑄 2024），我們發現尤以烏魚子的交易／交換充斥在箔子寮冬日的居民互動中，無論是許多家戶、店鋪門口曝曬的烏魚子作為象徵，或是街道上烏魚子的招牌、販賣文宣一一陳列。而從普天宮走入箔子村的主要道路，能發現一處豎立許多水產加工的正紅色旗幟，門前空地置滿上百片的烏魚子，形成一種整齊、重覆的美感。在小小的箔子寮中，看來特別顯眼，這便是阿利老闆的加工廠。阿利老闆本名鄭俊利，年約六十五歲，見到他之時總是和員工們一同處理烏魚子的分塊、包裝，凡事親力親為，也向我們介紹到他十二歲至十七歲的討海生活，以及近期的出海經歷。



圖一、阿利老闆加工廠  
(筆者林建志 攝)

田野期間適逢農曆年前，加工廠的人忙進忙出，老闆仍然熱情、不厭其煩地回應我們的諸多疑問。問到阿利老闆為什麼選擇做烏魚子加工？老闆說到餐廳越開越多的時候，他在餐飲業做二十多年便想轉行，一開始是先做大閘蟹，從中國大陸進貨，大閘蟹有季節性，臺灣人會想吃，不管有錢沒錢都想要買，而烏魚子，以前是專心在做批發，沒有像現在做乾貨。阿利老闆驕傲的說著，臺灣西部沿海如果要拿烏魚子都是他在做的，而烏魚子的來源大部分都是大陸貨，臺灣的只看有多少再留著回來處理。阿利老闆解釋從美國、大陸、世界不同地方運進來才有足夠的量販賣，後來是因為做得沒有很理想，因為在批發烏魚子，人家出來就是要跟你殺價，殺到沒有什麼錢可以賺，才自己開加工廠來曬。

了解阿利老闆對於水產批發、進出口的熟悉，我們好奇箔子寮漁港過往是否是烏魚子加工這高經濟價值產業的重要交通樞紐，再問到老闆一開始從事烏魚子批發是否由箔子寮漁港進貨？老闆則說都是從高雄港還有新竹南寮漁港，早期都沒有開放，只有南寮漁港才開放，而「大陸子 (tāi-liòk-tsí)」現在臺灣沿海都不開放了。南寮漁港開放後才慢慢有在一整尾的烏魚在臺灣殺。我們問到，所以都要從高雄進，不行從三條崙或箔子寮進？老闆回應沒辦法，因為漁船進貨到南寮比較近，而從箔子寮這邊去比較遠。箔子寮是對澎湖比較近，像嘉義布袋港因為航道關係還要再跑到箔子寮再轉出去。

除了阿利老闆的自述，我們在與其他報導人談話時，也了解社區民眾對烏魚子加工產業的認識。農會的林主任說，以前在中國大陸烏魚都當飼料，而烏魚子的加工技術是臺灣人去教的，學完技術後在中國渤海那邊將烏魚「閘牢」(tsáh-tiâu，中文語意為攔住) 九成多。討論到臺灣烏魚子加工產業的市場競爭增加，主任和經辦更進一步講述同為烏魚洄游航線的東南亞區域對臺灣烏魚子產業的影響，吳經辦認為，東南亞因為飲食習慣不同，所以他們沒有做，也提及他們也

有遠洋漁船，要做應該就會做了；林主任則不認同，他以東南亞漁業政策對於漁獲量會有配額的問題，遠洋漁船則有海域的限制才沒有做。而兩者雖然用不同角度看烏魚子的國際貿易現象，不過他們都一直指涉臺灣烏魚子產業的收入降低，主因是臺灣將烏魚子加工技術傳授至中國大陸。

## (二)、談箔子寮漁港的變與不變

延續著先前段落討論到箔子寮及其漁港是如何在幾十年來，由繁榮的交通要道，逐漸在社會各層面黯然失色，成為地理、政治、產業邊緣。箔子寮漁港的鉅變藉由阿利老闆的敘事，我們可以一探究竟在箔子寮漁港進行經濟活動的當地人，是如何認知箔子寮漁港的停滯。

首先從生態困境、環境變遷切入，阿利老闆以出海次數減少，描繪漁港淤積，造成的不便：

較早是漁船隨時會當出去，好天就會當出去。啊阮遮的漁船就，你共看彼个潮水，潮水若退潮，有魚你嘛毋通出去掠。你共講今仔日會用掠兩改出海，啊阮遮著干焦會當掠一改爾。（2025.01.07 田野錄音）

而從政策層面來看，阿利老闆向我們娓娓道來漁業政策的改變，以及部分進行調整後的政策如何阻礙箔子寮漁業發展。船員證的發放便是一大改變，阿利老闆向我們分享近期要考船員證的擔憂。問到在阿利老闆十幾歲出海時，出海的許可是如何取得，老闆說到以前也是要出海證，但是若出海幾次，自然就會分發下來。現在則需要考試，獲得政府認證才得以獲得證照，然而對於出海經驗豐富的船長則感到無必要性：

這毋是政府規定，彼就一坵團體的利益啦！啊遮的團體伊就 kah 遐，根本就「退潮、漲潮」幾點伊都猶毋知，啊就愛教阮這捌的。啊你就去遐讀冊。啊讀三工才發這牌子你。其實發彼，有啥物意義？彼「形式」爾。（2025.01.07 田野錄音）

政策的理想與漁業實務產生的矛盾，阿利老闆更氣憤地指出，現今漁港的停駐規則，在這一兩年改成非該港口的漁船只能停靠，不能長駐，靠港了之後要快速出去，除非遇到颱風要買菜加油這些比較緊急的狀況。若在不太方便的港口的話，仍舊一定要回到原本漁船申請的港口。

少年仔你這個漁港袂當自由出入啊、釣魚啊創啥的，少年仔就毋轉來矣，這個莊強欲無人矣。（2025.01.07 田野錄音）

講述了許多政策、生態環境的改變，阿利老闆也向我們訴說箔子寮漁港無法改變的無奈。

伊政府著是無愛恰這個魚港--honnh，建設嘛。（2025.01.07 田野錄音）

阿利老闆以他的魚貨批發的朋友為例，從澎湖那邊載魚，要停靠在這邊（箔子寮漁港）比較近，他後來去停靠嘉義布袋港，再後來去停靠臺南將軍港。老闆說布袋港也難出入，箔子寮這邊是原本最好的出入口的地方，結果後來漁港也因淤積不能使用，顧慮退潮難出入的問題，後來也沒有停靠這邊，則去停靠臺南將軍港。但去到將軍港就要多兩三小時，從箔子寮到將軍港走水路的話，要再多兩三小時，才說箔子寮漁港就是不要整理而已，如果整理好的話，什麼時候都可以進出，像是澎湖的船要停靠一定是到這邊比較近，要不然就是要跑到臺中港。

漁港要發展，就剩下漁港疏通，然後將飲食做好，便到處會有人來，這是做了二十幾年餐飲業的阿利老闆的看法。但事實上，我們依然看到的現況是社群成員嚴正指出政府做什麼做了很多規劃，但是都沒有實施半項，只有選舉就很多紙上談兵了……

### （三）、箔子寮不再人財兩失

第三小節中分析了箔子寮不同層面的困難，我們了解其現處於不同結構性問題交織而成的窘境。然而，看似停滯的箔子寮、箔子寮漁港難道只能一直處於被動的環境之下，見招拆招嗎？以下我們以阿利老闆的敘事，看見箔子寮人如何保有自身經濟能動性。

阿利老闆的從業經歷由起初少年時期十二至十七歲的討海生活，再至餐飲業做二十多年，最後進入批發與加工業。批發的品項挑選季節性商品的大閘蟹、烏魚子，商品單價高，帶來箔子寮當地經濟效益。在多次與他訪談的過程中，我們逐漸理解他對地方的認同並非以語言宣示，而是透過每天的身體勞動與商品流動來實踐。阿利老闆的烏魚子加工產業鏈，是以箔子寮為基地，曝曬、加工不同品項的漁獲，再由加工廠直銷，或運送至臺中店面販賣出去。問到為何臺中、箔子寮這樣舟車勞頓，而不在臺中設廠即可。阿利老闆解釋因箔子寮氣候濕度、溫度適宜，最適合曬烏魚子，但其實還有一大部分是出海是阿利老闆的興趣，烏魚子加工做完這季之後，他要準備來跟他的船長出海。

箔子寮氣候條件，是一種地方價值的再聲明，同時阿利老闆不依賴主流環境穩定的制度支持，也不是與公部門合作，如雲林區漁會在漁會對面的魚市場有自營品牌。阿利老闆靠著自己建立起箔子寮至臺中的上下游網絡，從在地曝曬、手工加工，到北上配送至臺中直營店販售，甚至推出一口吃烏魚子、一口小章魚等



精緻包裝產品，將水產加工食品打入現代市場與觀光客層。在漁港功能退化、公共建設停滯的條件下，阿利老闆的加工廠創造就業機會，成為社區生活的支撐。加工廠內工作人員含阿利老闆約有八位，其中非老年人口約四人，佔整體一半。儘管這樣的數量稱不上規模，但在地方傳統產業凋敝的背景下，已是難能可貴。我們看見阿利老闆如何和產業環境相互協調，與個人行動力展現的經濟韌性，用臺語來說便是「躉鑽」(ng-tsng)。

如三(三)小節所述，箔子寮產業沒落、就業機會不足導致人口外流嚴重。阿利老闆也常把「強欲散庄」(kiōng-beh suànn tsng)掛在嘴邊，但我們發現除了加工廠外，還是有年輕人回來了箔子寮，而又是為何回、來到箔子寮呢？港邊遇到的海巡署人員，向我們提到傳統近海漁業從業人口結構現況，問他這邊一天會有多少人出海。他說五、六艘船差不多，都是中老年人口，中壯年人口在口湖鄉臺子村那邊比較多。在雲林沿海小村莊，在外地工作得差不多，就會回來接家族事業了，海巡署人員講述了他對雲林沿海地區回流青年的認識。他的觀察揭開箔子寮的青年勞動人口的結構性空缺：不是青年不在，而是青年不再以傳統的討海或農務為勞動主體。結構性失業背後，是整體沿海經濟模式的瓦解。從中央到地方，從港口設施的退化、公共建設停滯，再到政策未能有效連結地方產業與青年的需求，形成一種「青年留不下，長輩撐不起」的困境。

普天宮灣灣姐則和我們娓娓道來他與丈夫來到箔子寮的原由。夫妻倆之前在五股的工廠工作，住也住在工廠。但前年的時候老闆投資失利，工廠面臨財務危機，老闆就捲款潛逃。夫妻兩人由於臺北房價太貴，就選擇回到丈夫的家鄉箔子寮生活。灣灣姐的丈夫，在箔子寮出生長大，爸爸是以耕農為生，前幾年已經退休。自己則是國中畢業後就到臺中的洗衣工廠工作，十九歲當完兵後繼續回來洗衣工廠工作，之後在北部發展十幾年，接者一樣就是五股工廠倒閉的那件事了。灣灣姐丈夫回想他國小國中的同學，也有現在生活在箔子寮的青年。有做水泥的，回來箔子寮的比他還要早；還有一位在水利署工作的朋友，是剛好因為工作分配的地區在附近所以生活在此；建陽國小家長會裡也有一位是之前的同學。但聽了一輪還是會發現，他所能講出來箔子寮內有哪些青年、返鄉青年，以當時學校一班四、五十人的比例而言，確實仍是非常少。

善水咖啡的老闆與老闆娘，是為數不多箔子寮在地青年。一日午後，在善水咖啡與老闆談話，也突然有感而發，和我們分享他的生活態度。他說：「該好好工作，該好好休息，就做哪件事，不要為了多賺那一點錢，讓自己累到不行，還要家人聽自己的一堆抱怨，要好好規劃想做的事情。」除了多數結構性失業的人們回到箔子寮，還是有極少部分的人們，無論是善水咖啡老闆與老闆娘返鄉創業的決心，或是阿利老闆願意臺中、箔子寮往返奔波的毅力，是懷著對家鄉的情感、認同，甚至可說是浪漫的性格回到箔子寮。

語畢，一名約十二歲左右的弟弟來幫媽媽買熱拿鐵，老闆要去做咖啡，就把手中的棒球手遊交給弟弟玩，並說著：「幫我揮棒，輸贏沒關係！」或許要回到箔子寮生活，也需要善水咖啡、阿利老闆這般的瀟灑、放膽嘗試的心態。對遊戲、對生活……

## 五、檳榔攤

### （一）、沒落漁港中的一畝綠洲：檳榔攤的空間與日常

那是來到箔子寮的第四天午後，雖然讀過的文獻和資料都讓我們對箔子寮漁港的脈絡有了一定的了解。但走遍整個漁港，眼前的景像卻是比想像中的沒落還要再更沒落的樣貌。生鏽的鐵皮屋、門上褪色的檳榔冷飲字樣、窗上泛黃的魚類圖鑑海報，單看外觀還以為是沒有營業、沒有人的舊店面，這樣老舊的一間小檳榔攤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靠近窗戶往裡頭看，才發現阿蜂阿姨坐在裡面，他向我們示意以後，我們才打開大門進去他待的小房間裡。阿蜂阿姨說我們要什麼自己拿，他則一直坐在同個位子上吃他的午餐，人非常親切。想起漁會的吳股長曾和我們說，許多漁民早上都會在這間店泡茶聊天，我們就問了阿蜂阿姨早上是不是都有漁民來這裡泡茶。他說對啊，今天早上才來過，大概 8、9 點的時候有五六個人，不過都是沒在跑船的老歲仔（lāu-huè-á）啦。這是我們與阿蜂阿姨和檳榔攤的初見。



圖（二）、阿蜂阿姨檳榔攤外觀  
（左，筆者林建志 攝）



圖（三）、檳榔攤內聚會空間（右，  
筆者林建志 攝）

檳榔攤在茆子寮漁港的角色，比起巡窟仔、漁民、漁港工作人員工作空檔的休息站，更是退休漁民、漁會人員的聚會場所，年齡層分布廣，但人員都曾在茆子寮漁港周邊工作過。彼此熟識，談天說地，較為年輕的海巡署人員即使身穿制服，也能很快地融入檳榔攤的氛圍，與裡面的阿姨和大哥們熟絡地交談。面對我們的提問與好奇，檳榔攤內的人們也是不厭其煩地回覆。這種特殊的包容性，讓我們在第一次訪問時就對這間檳榔攤印象深刻，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人們，都可以在這裡找到一個可以放鬆、交流的空間。在檳榔攤聚會也都不會特別約好，展現了社群成員他們之間的默契，及相互陪伴及照護的互動模式。

經過與檳榔攤的初見，接下來的幾天我們都一早前往檳榔攤，想要見見早晨檳榔攤熱鬧的景象。兩、三次的觀察下，都是男性來互動，總共有四個六十到八十歲之間的男性來到檳榔攤。在茆子寮漁港這個場域，只有阿姨一個女性。有問到阿姨有沒有其他也有開檳榔攤的。阿姨說原本這一條路上有兩三間、都收了。我繼續問到，他為什麼繼續做，阿姨則回原本他也不要做了，但「茶罌泡」(tê bóng-phàu)，就繼續下去。

會在檳榔攤聚集的長者們有一個談話的默契在，雖然節奏不是很快，但在聊天的過程中不太有空檔。這種不太有空檔是指他們聊很專屬於他們日常、街坊的大小事，會講到當地的物價、村內某個人的生命故事或近況，而這些是我們不同年齡層、不同居住地而無法加入的話題。

一位七十多歲的阿伯起身拿了一包菸，並將錢從外套口袋掏了出來放在桌上，阿姨左邊抽屜拿錢，並將找的零錢直接放到桌上，交易過程中沒有一句話，行動中卻也透露出阿峰阿姨與其他長者間的默契。

## (二)、阿峰阿姨的媽祖廟

一工伊去蹠院一個月，哇，逐家走無路 (tsáu-bô-lōo) 矣！啊走無路就講彼間廟欲關起來，無通泡茶矣，我就叫伊媽祖婆，逐家攏講遐是媽祖廟。(2025.01.15 田野錄音)

一次訪問烏魚子加工廠鄭老闆時，我們詢問了鄭老闆知不知道阿峰阿姨的檳榔攤，鄭老闆是這樣回覆的。阿姨住院一個禮拜，檳榔攤大門關著沒得泡茶，人心惶惶，好像阿峰阿姨真的是媽祖婆一樣。大家戲稱阿峰阿姨是「媽祖婆」，他的檳榔攤是「媽祖廟」——雖是笑談，卻也看得出來他與社群間緊密的情感連結。

有一次，來訪的張先生是一位約五十五歲的縣政府公務員，自述從事公職已三十五年。他提到自己在民國 81 年調到農務課，一邊翻公文範例學怎麼寫，一

邊慢慢學怎麼當公務員。阿姨聽了後說：「現在的公務員都做單一的工作，哪像以前，什麼都要會做。」對話中可以看見兩個時代間的落差與接續，不爭論誰好誰壞，而是默默地、靜靜地對比與感慨，抒發著對於記憶與時間的情懷。

在這裡，一次聚會的時間以「一泡茶」作為單位，泡完一泡後，阿姨便會問大家是否還要再來一泡。茶就這樣泡到第二泡，話題也慢慢流到了其他處。

阿姨對於漁業事務也熟悉，可能因為他長年在漁港邊生活，也從在地人的對談中自然吸收了許多知識。其他人對於漁業事務皆有共鳴，顯現他們曾經從事漁業的專業。當大家談起物價上漲時，話題便轉向各種魚類的價格變動，例如肉鯽仔（bā-tsit-á）從一斤兩百漲到三百元。談到豬肉、排骨的價格，從一斤一百多元漲至將近一百九十元。

這些討論不僅止於數字或消費抱怨，也延伸到日常的生活經驗與知識。話題一直是非常流暢、沒有間隔在轉變的，像是流水一樣自然。阿姨又接著提到肉用烤的的皮會變硬，所以他偏好用煎、蒸的方式，或者將豬肉與蛋、炸豆乾滷煮，甚至會搭配南瓜料理。

下個話題，他們開始討論村裡某個人的豬寮若出租一年可以有多少收入，現在沒租給人實在可惜。但七十幾歲的大哥算一算也沒算完，就又到下個話題了。提到藥店 lóng 的老婆是越南的，是一個不錯的女生，結果心肌梗塞，在藥店 lóng 去修摩托車要回來吃飯的時候，就走了。

從魚肉、料理方式到村裡大小事，這些對話涵蓋著漁業、經濟與家庭，流轉在大家熟悉的日常之中，顯示初這個空間是資訊流通與情感共享的重要平臺。這些交談就像是箔子寮漁港的一湧活水，讓情感和記憶能夠在社群中循環，像水一樣滲透每個角落。

某天早晨，詢問阿姨當天下雨是否還會有人來訪，阿姨說下雨天比較少人，但並未明確回答是否還會有人來。這時其他人注意到筆者建志穿得不多，便關心地問會不會冷。建志回說已經穿了三件衣服，不怕冷。阿姨也笑著說：「這邊再冷也就這樣啦」，但又不忘囑咐坐窗邊的阿伯別「展勇」（tián-ióng），因為他有高血壓，提醒他不要硬撐。

時間來到 8:30，阿姨熟練地拿出茶具，邊聊天邊泡茶。他會主動將茶具遞到每個人的面前，對於不喝茶或不方便喝茶的人，則貼心地倒熱水代替。主動觀察每個人的需求，替不能喝茶的人倒熱水，這種「客製化的照顧」並非出於職責，而是根植於長期的互動默契與地方倫理。在這裡，泡茶的行為不只是提供飲品，而是一種持續進行的關係建構，象徵著彼此對存在的承認。

9:30 時，一位七十多歲的阿伯起身離開。阿姨向我們解釋，他中午要洗腎，得先去吃飯，再趕往麥寮長庚醫院。另一位靠窗的阿伯也在稍後離開，阿姨說他會去村長蔡心娜那邊坐坐。他們離開後，我們問到阿姨現在漁港不如從前熱鬧，為何還繼續顧檳榔攤，答道：「顧心適的 (kòo sim-sik--ê)」。這個攤位對他與常客來說，是一個讓人「心適」的空間，提供陪伴與交流。當我追問為什麼不是去廟口等其他地方，阿姨說：「彼引攏是查埔囡仔 (男性) 泡茶、跋笏 (puáh-kiáu)，彼嘛是「變心適的」(pinn sim-sik--ê)。」沒有用「賺錢」來經營檳榔攤的理由，而是以「心適」來說明這個場域的意義。這種說法突顯了地方空間不僅是物理空間，更是被情感與記憶形塑的情感地景。阿姨的身影，就像地方的媽祖婆，在香煙與熱茶之中，守護著地方居民的身體與心靈。

### (三)、檳榔攤作為長者互動的主要場所：歷史記憶、地方情感與照護意義

問到過去箔子寮漁港的情景，阿峰阿姨回憶，以前這間店很有名啊，漁港對面的空地曾經也有魚市，車在這裡都沒得過，非常熱鬧。我們好奇的問了阿姨，以前大家也都來裡泡茶嗎，阿姨就回說，以前哪有人來泡茶，漁民都嘛忙著工作。餐廳那時候也還有四間，人潮很多，所以店裡生意很好，還要被政府收稅，一間店有兩個菸酒牌照。但現在餐廳只剩下兩間，出海的漁民也少很多了啦。

阿姨一邊泡茶，一邊笑著說：「閒就泡茶，之前邊賣邊泡，啊現在就都可以泡茶了，沒什麼客人。」這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話語，透露出地方經濟活動的變遷，也凸顯了這個小小攤位，在當地人社交與情感維繫中的特殊地位。

從一早的觀察中可以發現，即便外界少有人經過，村內長者們卻會特意走到阿姨的攤位來泡茶。我們詢問阿姨，為何大家不在家門口泡就好，他回說：「遮有人啊。」但實際上，是「來這裡就對了」這種習慣，將人召喚至這個空間。這種日常的地點選擇，其實體現了一種深層的地方慣習：不是因為人多而來，而是因為「本來就在這裡」。

這些聚會同時也充滿了地方照護的實踐，泡茶不只是聊天，也是一種身體上的自我照料。阿姨說：「早上來我自己就喝一罐水了。」另一位大哥說多喝茶有利尿作用，有助排便順暢。一位男性送來地瓜時，阿峰阿姨特地裝了一袋給即將離開的另一位客人，得知他婆婆也喜歡吃後，又說那要多裝一些。茶桌上也時常聊到長照議題。當大家談到是否可以申請幫忙洗澡服務時，一位年長者說他不習慣讓別人幫洗，阿姨則回應：「等到那個歲數，就不是適不適應的問題了。」從這些這些互動中都可以看到，照顧的意涵不只是個人的身體健康，也包括互相餽贈、互相關心。

「大家找不到人都會打來這裡問呢！」我們打趣的對阿蜂阿姨說。在某次聚會結束後，一通電話打到檳榔攤，找的正是剛剛在場的某位大哥。檳榔攤成為了「尋人」的節點，這個小小的檳榔攤，就這樣串起了箔子寮的人、記憶與情感。

## 六、在停滯中尋求生機

### (一)、行動與支持網絡：檳榔攤內部的互助與支持

在箔子寮這個經歷漁港凋零與產業變遷的地方，阿蜂阿姨經營的檳榔攤所展現出的功能早已超越其作為小型經濟單位的角色。這個檳榔攤販賣商品、檳榔已經不是這個場域的核心，這個小小的空間更是一個供人泡茶、找人、聊天的社會節點，在看似停滯的結構縫隙中，持續發展出具高度韌性的社會支持網絡。

每天早上，數位長者便會聚集於此，他們大多是曾從事漁業或與箔子寮港口有深厚連結的當地人。泡茶的活動成為維繫身心健康與情感連結的重要儀式。聚會中有人提及茶有利尿功能，有人提醒彼此注意保暖、喝水養身；也有人提到長期身體病痛與療程，從盲腸手術到洗腎。表面上是交換彼此的身體和生活資訊，但在長期的互動中，彼此之間也形成了生活照護的微型社群。

這樣的日常實踐，映照出 Norwood (2020) 所說的「社會韌性」概念：韌性不僅是對外在災變的回應力，更是透過情感支持、倫理協商與關係維繫，維持個人與社群生活意義的方式。檳榔攤內的日常互動，如倒茶、換水、提醒注意健康，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為，實則構成了地方社會秩序持續的一部分。正如康舒雅 (2024) 在漁村研究中所指出，高齡社群中的照護實踐往往是藉由日常節奏與互助機制所累積出來的，而非制度化醫療體系所能全面涵蓋。

在這裡「一泡茶」成為了聚會時間單位，一泡茶可能是某人忙碌之間的喘息，或是休閒時間的陪伴。這讓我們看到另一種時間的制度——不是以鐘點或日程劃分，而是以社交節奏為主的時間感。這種「泡茶時間」，讓人們能夠用一種非線性、非生產性的方式與他人共處，與現代社會中高效、標準化的時間邏輯形成對比。

更進一步來看，這樣的聚會不僅展現了對身體的關懷，也成為對抗「停滯」的一種節奏安排。在箔子寮漁業式微、就業機會稀少的情況下，檳榔攤成為了地方長者重新組織生活時間、感知社群歸屬的重要節點。檳榔攤之於他們，不只是休憩地，更是讓生活持續流動、日常得以安放的所在，使人在變動與停滯之間，

仍得以定位自身。當阿蜂阿姨因住院而短暫停業時，當地人甚至以「走無路」形容那段無法前往泡茶的感受，並戲稱他是「媽祖婆」，檳榔攤是「媽祖廟」。這樣的稱呼雖半開玩笑，卻也真實反映了他在社群中所扮演的象徵角色與情感依附。

這種地方韌性，正如 Castillejo Cuéllar (2014) 所言，並非單純地回復原狀，而是在秩序崩解或停滯中，重新創造出生活的可行節奏。阿蜂阿姨所建構的互助網絡，不靠外來政策介入，也不依賴市場機制，而是深植於在地關係與日常實踐之中。這樣的韌性既具延續性也具創造性，是地方社群面對生活不確定性與結構性資源缺乏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創造出來的生存策略。

因此，將檳榔攤視為地方社群中的「微型照護節點」也不為過，這些節點雖無法解決漁村長期凋敝的根本問題，卻在象徵與實質層面提供了地方維生的基本支持。這也是箔子寮之所以仍能「活著」的原因之一——它活在這些關係之中，也活在泡茶、聊天與身體照護這樣的日常律動裡。解決資本主義重大生態和政治危機而設想的過渡方案，並不一定會引導人們走向新的社會；相反，新的社會必須通過協商一致的方式，以過渡遠非預先確定，而是想像、強加和執行的未來 (Castillejo Cuéllar 2014; Visacovsky & Guber 2005)。

## (二)、韌性的不同體現：阿利老闆的烏魚子加工廠

若說阿蜂阿姨的檳榔攤展現的是一種植根於日常關係與照護實踐中的社群韌性，那麼阿利老闆的烏魚子加工廠則代表了另一種面向——在結構困境下以產業調適與個人行動力所展現的經濟韌性。這兩種韌性並非彼此對立，而是在一個發展停滯、政策支援有限的漁村中，分別從不同路徑撐起生活的可能。

阿利老闆所面對的是更為結構性的產業問題。他坦言在臺灣當地捕撈的烏魚已經較為稀少，價格也較為高昂，所以加工廠的貨源都是從南寮或高雄牽進口烏魚回來加工；地方既無原料，也缺乏人力與運輸條件，年節期間要排工班，平時則幾乎是一人作業。「今天從半夜已經做十八小時了」，這句話透露的不只是勞動強度，更是對於自身產業持續性的焦慮。在地產業環境凋零的背景下，他並未選擇離開，而是藉由調整販售策略與自我品牌經營，找出屬於自己的空間。

這樣的實踐正是 Visacovsky (2017) 所指出的那種「在無法回到過去的情況下，對未來的主動建構」。阿利老闆沒有回復過去的漁港榮景，而是選擇打造符合當代需求的一口吃烏魚子，面對觀光型消費市場、與遊覽車司機打交道，將產業主體從本地出港漁民，轉向加工與服務端口。他所展現的韌性並不來自穩定制度或社群網絡的支撐，而是來自個人對市場與產業的觀察能力與靈活調整。

與阿蜂阿姨的韌性實踐相比，阿利老闆的行動更符合 Dunn (2014) 所批判的「責任下放」式韌性模型——國家機制缺席之下，地方個人被動成為危機的承擔者，必須自行設法「活下來」。與其說這種韌性是被迫承擔，不如說它呈現了地方在無支援條件下仍然試圖尋找縫隙、重組產業的主動性。這不只是「撐著做下去」，更是一種試圖重構產業意義的行動。

若回到韌性的來源來看，阿利老闆所仰賴的，是他個人從事餐飲業二十餘年的經驗積累、對市場敏銳度的養成，以及對產品形象與顧客習慣的掌握。不只加工烏魚子，也包辦了銷售和行銷策略、選擇販售時機與對象，並調整內容物的尺寸與價格來應對不同顧客群。這樣的彈性經營邏輯，展現了個人與社群在經濟停滯與發展的真空中，如何透過不同的策略與節奏，使生活得以繼續。

與檳榔攤的社群韌性互相對照，阿利老闆的生產型韌性指出了箔子寮另一條可行的生存路線。在地方公共建設懸而未決、漁港轉型無著落的條件下，經濟上的自主性與彈性，提供了維持生活的重要支撐。雖然這樣的策略無法回應結構性的缺陷，卻展現了地方在缺乏條件下，如何透過行動創造新的空間，也補上了制度性韌性所無法提供的缺口。

阿蜂阿姨與阿利老闆，一者以關係撐起社群，一者以產品撐起產業。兩種韌性在箔子寮此刻的停滯之中，共同維繫了地方的社會與經濟節奏，也顯示出在多重危機交疊下，地方仍有自身對未來的想像與因應方式。

### (三)、當地人對未來發展的想像與期望

箔子寮的發展似乎陷入長期停滯，但面對人口外移、缺乏建設與海岸環境變遷等結構性挑戰，當地居民並未完全陷於無力感。在與居民交談的過程中，我們觀察到當地人的想法中，都存在著一種既現實又充滿想像力的地方未來圖像。

某日早晨，我們在海邊與幾位當地人閒聊，談到新港與舊港的差異時，海巡署人員提到，因新港淤沙嚴重，大型漁船已轉往臺南將軍靠岸，舊港這裡只剩小型膠筏停泊。他指著堤岸說：「那邊的沙子都是從港那邊抽出來的，不知道還會做多久。」語氣透露出一種對漁港未來的不確定與無奈。但他們不曾隱藏自己對箔子寮的感情，凝視著傍晚陽光灑落在海平面上的風景，他也淡淡的對我們說：「這裡真的很美。」

這樣的情感不只出現從外地前來工作的公職人員口中。在漁會辦公室裡，張主任談到過去一年年申請抽沙，但總是治標不治本，淤積仍年年累積。他坦言「沒



有工作機會年輕人就不會回來」，而政府的政策模糊、資金不足，也讓地方發展始終無法突破。他語氣平穩，但字裡行間卻有種熟悉的疲憊與克制的期待。

而在舊港旁的檳榔攤，我們也遇見了一位身穿紅色外套大哥，一位曾經跑船、現在改賣魚蝦、偶爾製作烏魚子的中年漁民。這天他原本只是在一旁泡茶，但當我們問起對地方發展的想法時，他語氣忽然轉為興奮，甚至帶些激動。他說：「一個社區、一個觀光區，才有那個工作權，有工作權才有生活空間。」對他而言，「發展」不是一種政治口號，而是攸關生存的根本問題。

見我們對他的觀點有所好奇，他進一步向我們描繪了他的構想藍圖——利用抽出的淤沙延伸黑森林步道，打造沙灘、遊樂園與休憩設施結合的觀光景點。他說這樣既解決淤沙問題，又能創造地方遊憩機能，是一技兩用。他的語氣幽默、有些激昂，卻又帶著現實的鋒芒，即使可行性難以斷言，但這也展現出一種壓力下仍願想像的韌性。

大哥的想像是建基於對過去的清晰記憶與地方場域的深刻體會。二十多年前這裡曾有餐廳營業，還有客輪能直通澎湖。但如今因淤沙惡化與港區功能退化，這些都已成過去。海巡署人員提到導致當今現況最主要的淤沙問題也補充，北堤延伸工程「根本沒用」，而早年其實就有彩虹橋與觀光魚市的計畫，但即便撥款到位，到了 2022 年也從未落實。「沒有人潮怎麼會有錢潮？」這句話，既像是對觀光政策的質疑，也折射出地方居民對治理空轉的質疑。

在另一側的檳榔攤裡，經營六十多年的阿蜂阿姨一邊泡茶，一邊感慨道：「我們這邊要不是沒人開發，不然一定是最好的，因為不會塞車。」這種玩笑式的真話，總是能看見當地居民對發展困境的某種幽默回應——他們知道問題所在，也知道不能太認真，否則只會讓生活更沉重。

這些日常對話與未來想像，並不是高談闊論的開發願景，而是一種從地方實際經驗中延展出的行動構想與批判意識。也不僅只是願景描述，更是一種在地能動性的展現。這些都體現在社群如何將過去的記憶、當下的資源與未來的感知連結起來，從而形成一種地方再生的潛在動能。比起說是冷靜的成本效益分析，更是一種鑲嵌於情感、回憶與人際連結中，對於地方可能性的相信與積極看待，從而形成的一種抱持可能性的言說。

## 七、結論

危機研究所提出之停滯（stagnation），在本文中用以形塑箔子寮作為一個處於發展邊緣的漁村，在近四十年來所面臨的狀態，無論是傳統漁業的衰頹、政策制定的被遺忘，亦或是人口的流失。漁港作為漁村重要的地景象徵，卻因生態環境、治理成效不彰等結構性因素，導致了港口功能不再，連帶大量的人口與產業外移。失能的漁港，如同向漁村的經濟產業宣判死刑，然而，我們發現透過箔子寮漁港做為歷史記憶的載體，仍能看見與漁港相關的人物、故事展演出韌性（resilience）。

阿蜂阿姨的檳榔攤見證了箔子寮漁港榮景及衰頹，四十幾年來為漁港周遭活動、有濃厚情感的人們，從原本販賣飲品和小食、提供情感支持，至今也建立起高齡者的相互照護模式，形成漁港周遭的支持網絡，讓寂寥的漁港保有一隅生機。阿利老闆的烏魚子加工廠則藉由地理、氣候、市場熟悉等優勢，將箔子寮的經濟產業－烏魚子加工發揮出極大效能，類比 Dunn（2014）所提及的「責任下放」式韌性模型，阿利老闆在經濟、政治實踐空轉的停滯環境下，試圖並成功重構產業的活力與能動性。呼應先前提出之問題，社會互動是否可能提供另一種地方為主體，持續存在、發展的可能，挑戰主流以建設與經濟為核心的敘事？以阿蜂阿姨、阿利老闆兩者的敘事及行動來看，的確都是以箔子寮為主體，繼續讓該地及漁港在社會上繼續撐著的重要因素。

看不見好轉之日的現狀中，在訪談過程中還是流露出箔子寮人對於基礎建設、經濟發展、人口回流還存有一定想望。小至道路建設改善、漁港淤沙清除，大至水族館、遊樂園與休憩設施結合的觀光空間。這些當地人未來想像，其實盡是體現在居民如何將過往榮景，投射對未來的感知，形成箔子寮復甦的潛能。幾十年的理性、經濟導向分析，指涉著箔子寮一再於主流社會上失聲的結果，但植根於情感、回憶與人際連結中，抱持可能性的言說，即使條件不利，居民仍以幽默、創意、回憶與批判組合出一種在地的未來圖景。這些未來不是來自外部專家的規劃，而是在日常生活、泡茶閒聊、甚至抱怨之間，一點一滴地形成與擴散。箔子寮的未來，也許正潛伏在這些話語之中。

## 八、參考資料

郭沛軒

- 2016 《劫後漁生：雲林靠海村落的人、水與魚》。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饒祐睿

- 2024 《「自由」的時間：一個對當代靠海生活技藝的民族誌研究》。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辰諭

- 2007 《雲林縣口湖地區土地利用與農漁業產值變遷相關性之研究》。逢甲大學景觀與遊憩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瑋嬪

- 2023 《島嶼幻想曲：戰地馬祖的想像主體與未來》。臺北：春山。

康舒雅

- 2024 《留下來的人：偏鄉高齡者的生命記事》。臺北：游擊文化。

梁宸維、王安珩

- 2024 〈何謂「健康」？如何「照護」？雲林箔子寮高齡者的照護實踐〉。《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215–237。

呂欣怡

- 2021 〈工業隙縫裡的盆栽景觀：人與樹在失調環境中的符應與共生〉。《考古人類學刊》95：1–43。

蔡耀陞、何昀瑄

- 2024 〈「也要神，也要人」：神人的地域關係與民間信仰變遷後宮廟再中心化的神人想像——以箔子寮普天宮祭祀圈為例〉。《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113–164。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024 〈雲林縣統計通報第 113-04 號雲林縣青年人口遷徙情形〉。雲林：雲林縣政府主計處。

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

- 2025 〈四湖鄉地區統計〉。「性別年齡人口數」，  
<https://mailiao.household.yunlin.gov.tw/popul01/Statistics.aspx?Parser=99,5,42,,,,,,,,,,,,,1,,,,18>，2025 年 6 月 13 日上線。

Dunn, E. C

- 2014 Humanitarianism, Displace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Nothing in Postwar Georgia. *Slavic Review* 73 (2) : 287–306.

Stewart, Kathleen, and Susan Harding

- 1999 Bad Endings: American Apocalyps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8: 285–310.

Visacovsky, Sergio E

- 2017 When Time Freezes: Socio-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Social Crises. *Iberoamericana – Nordic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46 (1) : 6–16.





主題二：  
社區如何動起來



## 彩繪的浪潮——箔子寮藝術社造的社區想像重構

陳冠儒（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四年級）<sup>1</sup>

### 摘要

恬靜質樸的濱海村落中，一幅幅漢人民間傳說的彩繪與臺灣黑熊雕塑靜靜佇立其間，構築了箔子寮社區獨有的藝術社造景觀。本文以雲林四湖鄉箔子寮社區的彩繪藝術村為田野場域，從「藝術介入」與「想像主體」此二概念分析箔子寮藝術社造自緣起、興盛至退潮的歷程，並試圖詮釋彩繪藝術作為外來觸媒，如何影響社造領導人與居民對社區未來的想像與實踐。本研究發現有二，首先，彩繪藝術村的歷程展現了社區營造的動態性與藝術介入過程中社區的能動性，箔子寮社區並非被動接受藝術介入，而是透過衝突、協商與再創造，使藝術社造此一外來概念轉化為地方可實踐的社區事務。第二，藝術社造不僅改變了社區景觀，更將彩繪觀光的发展願景，從藝術團隊、社造領導人推延至地方居民，形成對地方未來的集體想像，三方的交互與共作，使得藝術社造的浪潮在箔子寮湧動，亦使箔子寮社區的想像主體逐步浮現。

關鍵詞：彩繪藝術（mural art）、藝術介入（artistic intervention）、社區營造（community building）、地方想像主體（local imagined subjectivity）

---

<sup>1</sup> 本文係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課程之期末報告，特別感謝黃郁茜老師與盧佳秀、郭天祐助教的指導與帶領，以及修課同儕的相互校閱。也感謝箔子寮居民蔡心娜女士、蔡瑞泉先生、蔡茂昌先生、蔡搖先生、蔡茂源先生、春天民宿老闆夫婦、福建熱炒老闆夫婦等人對本研究的報導及對本次田野團隊的熱情招待。亦感謝陳柏丞、龔郁婷、張雅琪提供研究資訊及讀者觀點，以及李橋河學長對於本文的評論和建議。惟文責由筆者自負。



## 一、前言

「茆子寮喔熊藝術村」。

這是筆者最初開啟線上地圖探索茆子寮時，第一個印入眼簾的地點名稱。從文化田野實習的第一堂課開始，要做什麼方向、要選擇什麼主題，此類的問題就不斷糾纏著筆者。茆子寮位居雲林的靠海村落，與筆者過往所進行的田野或研究場域與生活經歷相比都遙遠不少，甚至有些難以想像當地的生活樣態，於是筆者只能從地圖上慢慢摸索。在偶然中，看到宮廟與住家外牆上的彩繪，巨大的盤古開天闢地彩繪（圖一）與卡通畫風的臺灣黑熊雕塑，與周遭恬靜樸實的漁村風貌格格不入，也引發筆者對於此一彩繪地景的好奇。



圖一 盤古開天闢地彩繪  
（作者拍攝）

「應該是吸引觀光客的手法吧。」

筆者嘗試如此說服自己，並繼續瀏覽。卻在往後的幾天內，不斷想到那無法令人忽視的、活生生的牆面彩繪。畫面揮之不去，深深嵌入腦中，也讓筆者聯想起去年回鄉時的一段經歷。

筆者生長於臺東知本的建和 (Kasavakan) 部落。部落在 1998 年開始接受「振興地方傳統產業計畫」補助，設立建和木雕藝術村，因此，小時候在部落裡跑跳時，總會看到街角的木雕與矮牆上的圖騰。筆者的 mumu (祖父)，亦是部落的頭目——哈古，便是這些木雕藝術的創作者。每尊木雕的製作過程都蘊含著部落過

去的傳說，mumu 總會邊雕刻邊向筆者低聲訴說。對筆者而言，散佈在部落中的木雕不僅是藝術或觀光的噱頭，更是真實存在的記憶與故事。

然而，當筆者多年後再度回到部落，卻發現過往那些熟悉的木雕與故事逐漸斑駁與模糊。雖然記憶中的圖像已難以回憶，但留在部落的族人卻開始講述木雕的新故事：哪尊木雕在颱風中被捲倒、哪尊木雕成為部落教室的教材，甚至哪尊木雕在分家時成了劃地的標尺。筆者驚覺，部落中作為藝術地景的木雕，並未如當時社區規劃中所想像般靜止地「保存文化」，而是在時間流動中被重新詮釋、參與進族人的日常生活中。這段親身與藝術社造共存的經歷，使筆者意識到，藝術社造在靜態展示之外，具有一種不斷變動、被社區重新詮釋的可能，成為筆者理解箔子寮彩繪藝術村的重要起點。

在開始進行田野調查前，筆者試圖透過文獻初探來理解彩繪藝術村在臺灣的實踐樣貌，而過往相關研究大多聚焦於觀光旅遊經濟效益、藝術團隊介入策略或社區營造操作經驗。從學術論文到官方出版品，對於彩繪藝術介入社區營造的成效多抱持肯定態度，並以形塑地方品牌、提升文化能見度為主要文化政策建議。然而，在這些論述中，筆者卻感受到一種持續缺席的聲音——「當地居民」如何理解這些彩繪藝術？又如何回應此一發生在社區內的改變？

下田野前的研究計畫，筆者以「箔子寮在地居民與藝術村共同生活的樣貌」為問題意識，並以人與物關係、氛圍研究作為主要對話理論。但進入田野後，當問起社區內的彩繪，報導人總會說起以前發生的故事，而非當下與彩繪共同生活的感受。隨著筆者以訪談與觀察追尋著這些藝術社造所內蘊的故事，自身也逐漸意識到藝術村對於在地居民而言，不僅是空間上共同生活的存在，更是發生在箔子寮的事件。

如此的理解，促使筆者在田野調查中嘗試以時間線的方式梳理筆記與材料，將資料搜集的重心轉移至箔子寮藝術村與相關藝術社造如何影響在地居民、社造領導人對於箔子寮的想像，並在田野期間提出「藝術村計畫與藝術社造如何影響箔子寮當地居民？」之研究問題。經過田野資料分析後，筆者發覺無論是對社造領導人或居民而言，藝術村計畫之引入皆重構並整合眾人對於社區未來的想像，並進而增強箔子寮的社造動能。因此，筆者以「藝術」、「社造」與「想像」作為本文的三大主軸，並提出核心研究問題：「藝術社造如何影響箔子寮居民對社區的想像？」

## 二、文獻回顧及區域脈絡

本節中，筆者將首先进入文獻回顧，闡述人社學界對臺灣當前社區與社造相關研究，提出當前學界對於社區與社造相關研究之共見，並試圖定義本報告中所論述「社造」之研究取向。再談藝術介入，闡述當前學界如何看待藝術與社區之互動。再回顧想像主體與想像媒介相關研究，進一步探討，個體如何以藝術物質性作為想像媒介，並進一步影響群體的地方想像。最後，筆者將介紹「茆子寮喔熊藝術村」的發展沿革，並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 (一) 臺灣社造相關研究

關於「社區總體營造」(社造)的起源要追溯到 1994 年，當時臺灣文建會主委申學庸於施政報告中提出此一名詞，以「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識、建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來作為一類文化行政的新思維與政策」作為目標，主要目的是為了整合「人、文、地、景、產」五大社區發展面向。而其背後的理論基礎則來自臺灣社造推手陳其南先生的早期作品，認為傳統漢人社會是以血緣為基礎，缺少關心公共事務的傳統，而社區總體營造則是要在家族與國家之間建立一個居民可以共同參與討論的新公共領域(呂欣怡 2014: 260)。

呂欣怡(2014)回顧近年來臺灣學界對於社區營造之相關研究，並按照理論基礎區分為：「將社區營造視為對抗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地方運動」、「將社區視為公民社會的基礎」、「從文化商品化的批判觀點切入的建構論取向」以及「在地文化觀點」四大取向。其中，在地文化觀點指出地方具有其獨特的社會文化脈絡，而社區營造作為外來的政治經濟想像必須透過在地意義體系與社會關係之中介才能發揮效用(Sahlins 2000，轉引自呂欣怡 2014)，亦是本研究所採取之社造研究取向。

將視角聚焦於藝術社造，綜觀過往臺灣學界對於彩繪藝術村與藝術社造之研究，均以觀光旅遊、藝術分析及社區營造為主。相關之論文集與官方資料，亦多聚焦於藝術社造如何在當地文化脈絡中被生產，以及如何能促進在地社區的觀光為主。如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08)所編纂之《在地美學實踐社區 VS. 藝術研討會論文集》，雖談及藝術如何介入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文化產業，但絕大部分文章均以藝術團隊及藝術行政之觀點書寫，鮮少以當地居民或社區觀點談論藝術社造對在地之影響。而少數有談及彩繪與當地居民互動的研究，大多是原住民部落如何應對社區營造的過程——如蔡念澄(2019)專注深談幾米彩繪計畫進到比

西里岸部落後，部落居民如何看待彩繪，並衍生出向彩繪潑漆與居民自己畫出部落版幾米之事件。但在漢人聚落研究中，談及彩繪與當地居民互動的研究卻寥寥無幾。

而箔子寮作為漢人聚落，在社造發展之始便接觸到藝術村計畫，後續也有相關的藝術社造發展，筆者認為是了解藝術如何介入與影響社區、社區又如何看待藝術社造的獨特案例，值得進一步討論及研究。

## （二）藝術介入

「藝術介入」意旨將藝術視為外來之物，而「藝術家是異質性的存在體」，並將藝術植入社會架構或公共空間，以達成促進雙邊對話與互動關係之目的（張晴文 2020：41）。陳其南在文化建設委員會主委任內（2004-2006）推動「公民美學運動」，文建會而後亦推動「臺灣生活美學運動計畫」（2008-2012），將藝術介入作為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地方文化產業的工具（張晴文 2020：55）。

藝術介入是近年來公共藝術與文化政策的重要方向，特別是在地方治理與社造的脈絡下，藝術被賦予了促進地方活化、創造文化認同的功能（張晴文 2011）。而呂欣怡（2014），則闡述催動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行動的主要觸媒大多來自「社區」地域界線之外，這些「外來者」可能會影響社區想像與內涵的構築，筆者認為藝術學界對於藝術異質性存在的詮釋與社造研究中外來者的說詞不謀而合，因此採用藝術介入的觀點，進一步了解藝術與社區的互動。

那麼藝術如何介入社區？吳瑪俐（2007）指出，藝術介入社區的過程，往往涉及居民的參與與互動；然而，藝術與地方居民的關係並非總是平衡，藝術可能成為地方治理的工具，也可能成為抵抗主流敘事的媒介。蔡榕娣（2010）與曾少千（2008）的研究則說明藝術在社區中既是象徵性，也具有物質性。藝術介入不僅是傳達文化意涵，也影響了地方空間的再生規劃，陳泓易（2011）所研究的寶藏巖藝術改造過程，即反映了地方記憶、藝術實踐與都市空間發展的交錯關係。

上述文獻展現了藝術介入在臺灣作為治理手段與文化政策實踐的案例，然而對於介入過程中「地方如何回應外來的藝術改革」，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以下將延續此脈絡，從媒介與想像主體理論談及藝術介入下的地方轉變。

### (三) 想像主體與想像媒介

臺灣人類學界對媒介與媒體的討論，主要受 Miller (1987) 對人與物關係的詮釋影響。其提出，人在不斷與物質互動的過程中，不僅僅是創造物質，亦再造自身。文化與社會關係並不先於物質世界，而是透過人與物質的不斷互動被重構 (林瑋嬪 2018)。此外，亦受到另一位物質文化理論先驅 Gell (1998; 1999) 討論物之能動性的來源，意圖從物質所在的社會脈絡了解其能動性如何被賦予之理論所啟發。如林瑋嬪 (2018) 主編之《媒介宗教：音樂、影像、物與新媒體》，分析宗教如何透過物質媒介與新媒體進行重組，闡釋人與物如何透過媒介化 (mediation) 交互建構新的主體性與社群想像，進而拓展既有的宗教範疇。林瑋嬪與黃克先 (2022) 主編《氛圍的感染》中延展了宗教的物質性研究，透過氛圍 (ambience) 揭示人與非人之間的滲透性連結，呈現不同「氛圍」如何以感官經驗與物質互動塑造人、神與非人之關係。

至於「藝術」如何作為媒介？可溯源回 Gell (1992) 的說法，他認為具物質性的藝術或藝術品 (物) 是嵌入進社會關係網路中的，社會關係賦予了藝術之物以能動性。藝術之物也作為生成社會關係的仲介，在這一過程中，藝術施展了猶如巫術般的「魅力」(enchantment) (馮莎、張志培 2024: 173)。到底其中的「魅力」為何？Gell 所稱的「魅力」並非僅指藝術物自身的美學價值，而是在其被嵌入特定社會脈絡後，所生成的社會關係與感知轉化。這使得藝術物不再只是靜態的展示對象，而成為引發社群互動與想像變動的能動媒介。如 Bourriaud (2002) 於《關係美學》中所提出，藝術的力量在於構成一種「可被共同經驗」的關係場域，使人們得以在其中生成對生活世界的感知與再想像。亦如 Jane Bennett (2001) 在 *The Enchantment of Modern Life* 指出，藝術的「魅力」並非單純的美學，而是一種當人與物之間發生感應時所產生的驚異 (wonder) 與情感牽動，此經驗使人「感到被捲入、被牽引，從而重新思考自身與世界的關係」(Bennett 2001: 5)。因此，藝術作為媒介所能喚起的，不只是群眾對藝術物的凝視，亦是從觀看、感知與關係性連結所創發的想像。

林瑋嬪 (2023) 所著之《島嶼幻想曲：戰地馬祖的想像主體與未來》以馬祖為主要田野地，探討當代社會中想像主體如何透過各式媒介技術將其個人想像滲入群體。在理論方面，其提出有別於先前學者對於想像「從上自下」的論述，而是採用 Moore 對於主體化過程的論述。Moore (2011) 認為不同媒介是重塑自我成為「不同可能的形式」，他以新媒體感技術為例，說明它們如何增強、放大內在的意義與情感，補充與延展了人的感官經驗與情感，帶來新的能動、連結與想像 (Moore 2011: 116, 轉引自林瑋嬪 2023)。而林瑋嬪 (2023) 對馬祖建廟歷程的物質化過程分析，使用實際案例展現媒介如何成為重構地方想像與社群關係的可能，如牛角建廟歷程中神龕安排實則展現牛角村內不同區塊整合的成功 (林瑋

嬪 2023：258)。因此，筆者亦從上述理論基礎出發，分析藝術村計畫的物質化過程，以說明藝術社造的物質化步驟如何提供一種有別於社區原有的媒介技術，吸引居民關注、提升社造動能，並注入對於社區未來的嶄新想像。

以上回顧三類藝術社造之相關文獻。首先，臺灣社造研究指出社區總體營造需透過在地文化脈絡與社會關係的中介，才能發揮實效，並強調在地性的重要性。其次，藝術介入相關研究則闡述藝術如何作為外來媒介進入社區空間，並產生治理、互動與物質化的社會效應。最後，想像主體與想像媒介相關研究則提供藝術如何與個體想像結合作為能動媒介，以形塑社會關係與集體想像的理論視角。本文即綜合以上研究路徑，作為後續分析之理論基礎。

#### (四) 茆子寮喔熊藝術村之發展沿革

本研究以雲林縣四湖鄉茆子寮之「茆子寮喔熊藝術村」為研究區域(圖 2)。四湖鄉茆子寮位於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由茆東村、茆子村與新厝三聚落組成，其地名源於早期居民的遷徙歷史。據說，乾隆年間，來自泉州的移民因海難漂流至此，初居於靠近外傘頂洲的沙洲，但因海水侵蝕而多次搬遷，最終定居於現址(茆東社區發展協會 2024)。茆子寮周邊地形以海岸沙洲和漁港為主，鄰近以木麻黃組成的防風林(當地稱之「黑森林」)。村內主要產業包括漁業和農業，尤以野生烏魚子和沙蝦乾的生產而聞名( *ibid.* )。

而在茆子寮的靠海漁村的圖像當中，卻有著與當地風景格格不入的大型 3D 彩繪與藝術裝置，這便是本次的研究區域「茆子寮喔熊藝術村」(圖二)。



圖二 箔子寮喔熊藝術村  
(Google Maps 2025)

箔子寮喔熊藝術村為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雲嘉南風管處）、四湖鄉公所及箔子寮城鄉發展協會於 2016 年共同打造之觀光地景，以箔子寮普天宮為中心，邀請藝術家曾進成執筆，以詼諧方式重新詮釋東方中國神話，呼應當地廟宇的傳奇色彩，如嫦娥、盤古開天、牛郎與織女等耳熟能詳的神話人物為彩繪主題，欲透過 3D 藝術之趣味性為當地挹注活力（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2024）。2018 年，為了讓箔子寮更具特色，在創作藝術作品的概念中，曾進成加入更能凸顯在地色彩的漁村元素與觀光局吉祥物「喔熊組長」，以 4D 立體雕塑打造「喔熊藝術村」以活絡在地氛圍，意圖吸引遊客前來拍照打卡（ibid.）。以下，筆者將彙整雲嘉南一帶觀光彩繪村之緣起，藉由回顧四湖鄉鄉刊與先前訪談箔子寮城鄉社區發展協會執行長蔡茂昌先生之記錄，梳理「箔子寮喔熊藝術村」之發展沿革。

承接自交通部觀光局於 2015 年頒布之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交通部觀光局 2015），雲嘉南風管處於 2016 年起，為推動雲嘉南漁村觀光發展與社區營造，在雲嘉南濱海一帶設置漁村戶外美術館系列，邀請彩墨軒工作室藝術家曾進成操刀，以 3D 彩繪手法融合當地入在地文史意象及景觀紋理，打造 3D 彩繪

村(顏新訓 2018:7)。如嘉義縣布袋鎮好美里之「好美 3D 海洋世界」與臺南市將軍區平沙里之「馬沙溝 3D 彩繪村」(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2024)。

同屬雲嘉南濱海漁村觀光發展計畫之地區,茆子寮城鄉發展協會於 2016 年,與四湖鄉公所及雲嘉南風管處接洽,開始著手策劃茆子寮的 3D 彩繪景點(四湖鄉公所 2016)。雲嘉南風管處再度邀請先前為好美里執筆的曾進成進行設計與繪製。曾進成於 2016 年帶領工作室團隊——彩墨軒在茆子寮進行約莫兩週之田野調查,深掘茆子寮在地風貌與特色,當時藝術家曾進成亦受到外國友人提出臺灣彩繪村難以看見東方元素之影響,因此決意以民間宗教為主題進行彩繪設計,如嫦娥、盤古等,並命名為「茆子寮神仙 3D 彩繪村」(訪談筆記,蔡茂昌,2024/12/13)。

隔年卻因政策改動,需重新為茆子寮神仙 3D 彩繪村之彩繪工程招標,而原本合作的彩墨軒工作室因此無法繼續配合。當年度(2017)再招之外包廠商卻在彩繪風格上與原有之彩繪產生差異,導致彩繪設計難以整合。因此,雲嘉南風管處於 2018 年介入,中止與外包廠商的相關合作,重啟與彩墨軒工作室的合作,並配合交通部觀光局對於 3D 彩繪的禁令,引進觀光局吉祥物「喔熊組長」,以 4D 立體雕塑重新整合不同的彩繪風格(訪談筆記,2024/12/13),並重新正名為「茆子寮喔熊藝術村」(四湖鄉公所 2018)。

回顧先前於茆子寮之彩繪與社造相關研究,蔡耀陞與何昀瑄(2024)的研究談及喔熊彩繪藝術村中關於普天宮與溫府千歲故事之彩繪,並闡述彩繪如何作為媒介以內蘊「神與人」關係之想像;華叡民、蔡嘉軒與江冠瑩(2024)則深入訪談不同年齡層的社區營造參與者,描摹茆子寮社區營造之困境、地方情感與未來可能。如同前言中所提及,目前臺灣學界對於彩繪藝術村的研究鮮少觸及當地居民與藝術社造的連結。藝術社造的推行,是否真正促進了居民對地方的情感認同,或僅僅淪為短期吸引遊客的「打卡熱點」,仍有待深入研究。

茆子寮居民對於當地藝術社造具有不同於政府治理的觀點,從上述研究中可見一斑。而「茆子寮喔熊藝術村」作為臺灣彩繪藝術村的一環,內部不同調性、風格的彩繪雜揉,亦呈現出政府觀光政策與地方想像的錯位。因此,筆者希望透過此研究,探討「藝術社造如何影響茆子寮在地居民的地方想像?」之問題。

本節主要介紹茆子寮彩繪藝術村發展沿革,此計畫並非茆子寮當地自主發展的社區營造規劃,而是與雲嘉南整體觀光規劃有所關連,並以雲嘉南風管處為主導,與彩墨軒工作室合作推動彩繪於雲嘉南各地之改造工程。而下節中,筆者欲將時間線回溯至彩繪計畫前,從茆子寮城鄉發展協會創始背景開始談起,敘述三位茆子寮社區營造的重要領導人——蔡心娜村長、蔡瑞泉總幹事及蔡茂昌執行長,在返鄉後進行社區營造的動機,訴說茆子寮社區營造的開端。



### 三、風動——「做」社區，三位社造領導人的回鄉之路

臺灣早期社區發展以改善鄉村社區為主，社區發展較偏向物質建設，較未關注社區居民參與社區事務之能力，為政府主導「由上而下」的官方主導模式（王靜儀 2010）。1991 年，政府修訂「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並頒布實施，將原有「社區理事會」改為「社區發展協會」，不僅適用人民團體法的規定，可登記為法人，社區發展工作也轉為民間主導，政府則從旁協助，此後「社區發展」一詞也轉向「社區總體營造」。而後於 1994 年，文建會進一步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主要核心係達成鄉土認同，促使社區自主經營，使社區文化生根，帶動社區發展（文建會 1999）。在此社區政策背景與雲林縣政府、四湖鄉公所的輔導下，箔子、箔東此二行政村遂成立箔子社區發展協會及箔東社區發展協會。根據筆者與箔子寮居民的訪談，兩村之社區發展協會在成立早期並沒有推動社區事務。

在箔子社區發展協會與箔東社區發展協會成立初期，理事一職都掛在村長辦公室，由村長或辦公室內職員兼任。由於地方政府僅是為了達成政策目標而輔導立案，並沒有後續針對社區發展營造的相關輔導政策，當時村內亦無人接觸過相關計畫，因此箔子及箔東社區發展協會在 1995 年立案到 2015 年間，鮮少推行社區總體營造之計畫案，在居民的記憶中也十分模糊<sup>2</sup>。三位回鄉的社造領導人均談及當時回到箔子寮後對於在地社區的看法，其中，兩位都共同提到當時箔子寮社區「沒有在動」：

「那時候剛回來。在我父親的辦公室那邊幫忙一些文書工作，啊因為那時候選上村長<sup>3</sup>嘛！在辦公室就跟村裡的人變得越來越熟。那時候這邊社區根本沒有在動，就想說可以做一些活動來，（停頓）一方面也是幫到村長辦公室啦！」（田野錄音，蔡心娜，2025/01/09）

「阿剛回來的時候，退休了嘛！也沒有什麼事好做，這邊的社區又沒有什麼活動，就想說可以來弄」（田野錄音，蔡瑞泉，2025/01/08）

箔子寮如何從「沒有在動」的社區，走向能承接地方觀光改造計畫的社區組織，便要談到從 2015 年到 2021 年主要籌辦社區活動與社造運作的兩個組織——箔子寮城鄉社區發展協會及箔東社區發展協會，以及其中三位社造領導人——箔子寮城鄉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與箔子寮村長蔡心娜、前箔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蔡瑞泉及箔子寮城鄉社區發展協會執行長蔡茂昌的生命經驗。三位返鄉後持續參

<sup>2</sup> 本研究主要受訪者多為 2010 年後返鄉之社區參與者，年齡層集中於四、五十歲世代。談及 1995 年至 2010 年間的社區營造歷程，因受訪者時值外出工作或就學階段，對當時社區動態的記憶較為模糊。本研究所謂「社區沒有在動」之觀察，亦應理解為反映特定世代的回鄉後印象，而非對該時期社區活動之全面否定。

<sup>3</sup> 蔡心娜村長的父親為箔東村前村長。

與地方事務的社造領導人，無論是在組織協會、接洽政府資源，或在藝術介入的過程中皆扮演協調與連結的中介者角色，是推動箔子寮社區營造與藝術社造歷程的關鍵人物。因此，筆者以三人的回鄉經歷與社造實踐出發，追溯箔子寮藝術社造的起點，並梳理地方想像如何在他們的行動中逐漸浮現。

### （一）箔子寮城鄉社區發展協會執行長 蔡茂昌

初次與蔡茂昌執行長見面是在上學期的文化田野課堂上。蔡茂昌執行長受到邀請來到課堂上，為即將前往箔子寮進行田野的人類系學生介紹箔子寮的歷史、生態與風土民情。從《四湖鄉志》、飲食文化到水土風景，執行長用豐富多彩的照片呈現為我們開啟對箔子寮的想像，在言談間，亦可以感受到執行長對這片土地的熱愛。

在出發的前一晚，筆者與蔡茂昌執行長在線上進行訪談。面對筆者對於藝術村發展的提問，執行長總能清晰的回答藝術村建置的時間年分與施工工期，對於藝術村的發展脈絡與計畫內容也瞭若指掌，甚至連彩墨軒當時預期的彩繪面數都能具體說出數字。但對於實際在彩繪過程中，箔子寮發生的事件卻不太知悉。執行長也說道：

「因為我人大部分時間都在北部，比較細節的，跟居民溝通之類的事，都會交給蔡心娜跟蔡瑞泉來協調，你到箔子寮後也可以再找他們詢問看看，會比較清楚。」（田野錄音，蔡茂昌，2025/01/05）

蔡茂昌執行長出生於箔子寮，在少年時便對去到大都市工作生活抱有憧憬，之後也到城市中工作並定居到現在。雖然對箔子寮抱持著濃厚的情感，但由於已經在北部成家，下一代也已在臺北組建家庭，退休後便繼續在臺北定居。兄長蔡茂源則是在退休後，因為照顧年邁的母親而回到箔子寮定居。在 2015 年左右，執行長也因照顧母親的原因較常回到箔子寮。都市參與展覽與社區課程的經歷、對於家鄉的情感，驅使他投身社區營造之路。

在與執行長訪談的過程中，他提到發展社區營造是希望透過政府資源挹注，提升箔子寮的硬體設備條件、藝術文化觀光，進而帶動經濟，加強生活便利。居民也能從社區營造了解到地方豐富的文化與資源，而願意參與社區事務，提升社區動能。而社區營造的活動，如 2016 年舉辦的「黑金烏魚子——烏倉寮的記憶大專院校體驗營」目標則是吸引青年認識到箔子寮的潛力並返鄉。

執行長對於箔子寮社區營造有著清晰且宏大的願景，不僅是社區內部成員的投入，更希望透過社區營造取得地方政府的協助與資源，使箔子寮能在經濟條件、便利性與工作機會上有所提升，並能吸引青年返鄉。

## （二）前箔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蔡瑞泉

初到田野的午後。在蔡心娜村長的安排下，我們跟著蔡瑞泉與蔡茂源兩位大哥的導覽繞著箔子寮走了一圈，作為認識箔子寮的第一步，也是筆者第一次見到蔡瑞泉總幹事。我們自西天寺旁的春天民宿逆著藝術村的路線行走，從西天寺停車場走向箔東村低矮的樓房，再向著普天宮走去。一路上，蔡瑞泉總幹事親切的介紹路旁富有民間傳說色彩的彩繪與裝置，從周文王拉牛車裝置的典故、凹雕如來佛像的觀看方式、到如何與牆面上的貓咪拳擊手彩繪互動合照。蔡瑞泉總幹事在解說之餘，也時不時加入幽默風趣的笑話與動作，整趟導覽行雲流水。

兩天後，筆者與目前任職普天宮廟委會總幹事的蔡瑞泉先生約在普天宮進行訪談。他一早便騎著機車到普天宮前，與普天宮管理處的大哥大姐討論接下來廟裡的預算跟過年要採購的物品。看到筆者走近後，便招呼筆者到普天宮右側的接待處坐坐。接待處偌大的造型木桌上擺著茶具與煙灰缸，總幹事坐在主位上，並讓筆者坐在一旁較低矮的椅子上。訪談到一半，剛好他國中同學來訪，一群人笑鬧著，原本生硬的氣氛也漸漸活絡。在友人走後，他點起了菸，在煙霧繚繞中，緩緩吐露自己過去身為箔東社區協會理事長與參與藝術村計畫的過往。筆者才知道，原來先前精彩的導覽，是他親身參與彩繪工程與藝術村導覽員培訓的心血結晶。他在訪談中穩重、熱情且和藹，言語間中文、臺語、苦笑參雜，總是會提到廟方在不同時間與事件中扮演如何的角色。隨著訪談結束，總幹事也回到管理處，繼續張羅、指揮廟裡的庶務運行。

蔡瑞泉總幹事出生於箔子寮，在國中時到新北蘆洲讀書，畢業後在臺北與臺南生活都生活過一陣子，進行與塑膠輸出有關的工作。在民國 101 年退休後，與妻子回到自己的家鄉箔子寮定居養老。當時因為沒有什麼事好做，發現箔東社區沒有在運作，就與蔡茂昌、蔡茂源兄弟與蔡心娜村長一同將社區接起來做，擔任箔東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當筆者詢問投身社區營造的原因，蔡瑞泉總幹事則說道：

「就回來之後。（停頓）想說可以來改造一下社區，不要讓這裡這麼單調，才會『有人欲來（ū lâng beh lái）』嘛！你看像剛剛朋友來，有彩繪可以看，啊有一些特產可以給他們。（停頓）也是想說讓大家可以多多認識箔子寮，有人來才會熱鬧...」（田野錄音，蔡瑞泉，2025/01/08）

蔡瑞泉總幹事返鄉後，投身社區營造與彩繪藝術村導覽等事務，不僅展現出對地方的熟悉與熱情，也透過幽默風趣的導覽風格，讓茆子寮的地方文化與藝術彩繪被具體呈現於遊客眼前。從參與協會運作到導覽的親身投入，蔡瑞泉總幹事的行動不僅體現他對家鄉的深厚情感，也反映出他希望透過改造與再敘述，使茆子寮「有人欲來（ū lâng beh lái）」——讓地方重新被看見的願望。

### （三）茆東村村長 蔡心娜

下田野的第三天，筆者一大早就接到來自蔡心娜村長的電話，電話那頭傳來爽朗宏亮的聲音，因為有他校的醫療團來協調事宜，便請筆者先到對面的福建小吃，領她所訂的烏魚子炒飯，再到檳榔攤等著。位於普天宮前的小檳榔攤，不僅賣檳榔，也賣烏魚子跟蝦乾等茆子寮名產，有聚會用的桌椅，也有完整的廚房，平日可以看到三三兩兩的居民在其中聚會聊天。約莫等了十分鐘後，筆者一度想說要不要走到村長家看看，扭頭卻看到村長遠遠的騎著摩托車往這邊騎過來。見到筆者後，便熱情的招呼筆者坐下先吃剛剛領的炒飯，而她則「先去沒間（sing khi bô-îng）」。為人爽朗、熱情、具感染力的微笑是筆者對村長的第一印象。原先冷清的檳榔攤，也因為村長的到來，而開始有三三兩兩的人群聚於此。除了村長的身份，她也經營檳榔攤與烏魚子的事業，訪問期間村長不僅一邊忙生意、接電話，甚至偶爾要騎機車出去拿或送東西，但總是有條不紊的處理每件事。

蔡心娜村長是土生土長的茆子寮人，於民國 67 年出生於茆東村，童年也在茆東村度過。之後有一段時間離開茆子寮到臺北打拼，結束在臺北的工作後，便與丈夫一同回丈夫老家——嘉義東石生活。回到茆子寮的契機是因為父親當上村長，為了協助當時年邁的父親而到茆東村村辦公室進行文書作業。而後因為父親離世，她便投入村長參選，欲將父親的村長任期完成。在她回來的那段時間，發現茆子寮社區都根本沒有在動，便在民國 104 年時與蔡茂昌、蔡瑞泉一起開始「做社區」。

「一開始其實我也不熟其他兩個人，啊是蔡茂昌回來茆子寮後想要找人一起弄，剛好我剛好那時候在村辦公室，有認識鄉公所的人，也比較熟這個地方，所以才會一起合作。」（田野錄音，蔡心娜，2025/01/09）

「社區如果都沒有人來保存地方文化跟推動發展，這個地方就很難有人能看見。」（田野錄音，蔡心娜，2025/01/09）

在投入社區營造的動機上，蔡心娜村長與蔡茂昌執行長論述中所提到——透過發展社區總體營造，以推動觀光經濟，進而使青年願意返鄉的想望不同。對心

娜村長而言，「做社區」是希望社區內部可以長久發展，在保存茆子寮地方文化的同時，也喚起茆子寮居民對地方的關心。

從三位藝術社造主要推手的訪談與經歷中，不難發現三位對於茆子寮社區營造的想像與動機都有所不同，蔡茂昌執行長以提升茆子寮的經濟條件並吸引青年返鄉為目的；蔡心娜村長注重社區的長久發展與居民參與；蔡瑞泉總幹事則希望能透過社區營造打響知名度，吸引更多人注意到茆子寮這塊土地。三者對於社區營造的不同想望也或多或少源自其自身的經歷——蔡茂昌執行長在都市的生活與工作，培養其著重地方經濟發展的視角；蔡心娜村長在茆子寮地方治理上的深耕，使其傾向關注社區居民的參與；蔡瑞泉總幹事回鄉後感受到地方的「沒有在動」與退休後的空閒，則使其想要透過社區營造，讓居民想要一起參與社區改造，也吸引遊客來活絡、熱鬧茆子寮。

在後續的茆子寮藝術村計畫與藝術社造的過程中，三位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而茆子寮城鄉社區發展協會的成立原因與三位實際上的合作模式，蔡心娜村長在訪談中提及：

「當時我在茆東村村辦時，要推動各項活動要跟茆東、茆子跟新厝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跟總幹事借章跟證件比較麻煩。那時候就有我一個在鄉公所的某個當代理科長的朋友建議說可以成立自己社區的財團法人組織。後來才会有茆子寮城鄉發展協會的出現，啊那時候蔡茂昌負責計畫書撰寫來跟縣政府或中央單位申請經費，因為只有他比較會寫一些提案書那種要給政府的文件。蔡瑞泉跟我就負責社區內的活動辦理跟推動。」（田野錄音，蔡心娜，2025/01/09）

茆子寮城鄉社區發展協會作為層級更高的財團法人組織，不同於茆子、茆東社區發展協會有四湖鄉公所作為上級，茆子寮城鄉社區發展協會上級為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城鄉發展分署。蔡心娜村長及蔡茂昌執行長都有提及茆子寮城鄉社區發展協會相較於原有的社區發展協會更能與中央申請到經費與資源，也會省去許多繁瑣的行政程序。從與蔡心娜村長的訪談材料中，可以看到三人在社區營造當中所扮演的不同要角，蔡茂昌執行長負責計畫書撰寫與經費申請，而蔡心娜村長與蔡瑞泉總幹事則負責茆子寮社區內部社區營造活動的籌辦與推動。此亦與蔡茂昌執行長在訪談中所提及藝術村計畫執行期間的分工相符。

#### 四、潮起：茆子寮藝術社造開端

承接上節對於茆子寮社造開端的敘事。本節將會關注茆子寮社區營造與「彩繪藝術」相遇的過程，社造領導人如何與雲嘉南觀光政策接軌、又如何認識到彩

繪觀光的風潮，並透過自身行動推行彩繪藝術村計畫。其中，「藝術」、「彩繪觀光」等概念隨著彩繪藝術村計畫而進入箔子寮，作為由國家話語及專業知識建構出的「外來觸媒」(呂欣怡 2014)，催動著箔子寮的彩繪藝術村計畫發展。接著，筆者將會描述當地居民如何接觸到第一期之彩繪藝術村計畫。而此過程中，藝術並非一帆風順的被社區所接納，在進入箔子寮之時也遭遇諸多阻礙。

## (一) 藝術村計畫緣起

在訪談中，筆者分別詢問三位社造領導人箔子寮接觸彩繪藝術村計畫的緣起。其中，蔡心娜村長與蔡瑞泉總幹事都提到當時四湖鄉鄉長蘇國瓏曾組織過一場考察，邀請四湖鄉鄉內各村長與社區發展協會理事共同前往嘉義好美里彩繪村參觀。而在訪問蔡茂昌執行長時，他表示：

「在 105 年時雲嘉南風管處與觀光署來到雲林縣視察，當時管理處長希望可以借鑑好美里的觀光彩繪成功案例，就跟當時四湖鄉長蘇國瓏與雲林縣議員聯絡，在雲林縣選點。」(田野錄音，蔡茂昌，2025/01/05)

從執行長的敘述可以了解藝術村計畫的背景源自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管理處與觀光署對雲嘉南濱海村落的觀光規劃。如前一節所回顧，為雲嘉南風管處承接交通部觀光署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後，為了推動雲嘉南漁村觀光發展與社區營造而進行之「漁村戶外美術館」彩繪計畫。該計畫於 2015 年時，雲嘉南風管處與曾進成彩繪藝術家首度於嘉義縣布袋鎮好美里執行，而後為好美里帶來行銷地方、活化觀光之目的。相比其他觀光景點的建設資金巨大，彩繪工程的成本相對較低，而在好美里案例中卻帶來可觀的觀光效益(顏新訓 2018)。延續嘉義好美里的成功案例，雲嘉南風管處也開始在雲林縣的選點。

回到四湖鄉長規劃的考察行程，蔡心娜村長與蔡瑞泉總幹事說道：

「當時是鄉長有帶我們跟村長到好美里看那邊的立體彩繪，那時候也有跟曾(進成)老師接觸到。」(田野錄音，蔡瑞泉，2025/01/08)

「其實當時鄉長不只有邀請箔東，也有邀請其他村落的村長跟社區協會理事一同去好美里考察，但當時我爸爸(前箔東村村長)就有跟鄉長爭取到這個機會來建設箔東這邊。」(田野錄音，蔡心娜，2025/01/09)

筆者也在訪談中詢問兩人對於此趟考察的想法。蔡心娜村長表示因為有一些居住嘉義的親戚好友，去好美里前就多多少少有聽聞當地 3D 彩繪的盛況，但卻沒有覺得有甚麼特別值得去看的地方。但在到好美里後，看到栩栩如生的 3D 海

洋生物彩繪跟當地的老房結合，才發覺此種（3D）彩繪的魅力跟趣味。蔡心娜村長也提及，曾老師的彩繪主題都跟當地靠海的漁村風景具有連結，不像是其他去過的彩繪村，許多都是跟地方毫不相關的卡通彩繪塗鴉。好美里的海洋彩繪的確有讓整個社區更美化，遊客也絡繹不絕。

蔡瑞泉總幹事則提到，自己在聽到曾老師講解整體海洋元素彩繪之規劃設計跟社區文化的結合後，有在想同樣靠海、特產明確且地方文化豐富的箔子寮是不是也可以進行類似的藝術計劃。在考察結束後，四湖鄉長便詢問箔子寮有沒有意願參加這個計畫，當時村長與幾位社區協會理事討論同意後，蘇鄉長就與雲嘉南風管處聯絡開始接洽承接此計劃。

## （二）箔子寮對彩繪藝術的初識與回應

如同脈絡回顧一節中所述，箔子寮城鄉社區發展協會及箔東社區發展協會於 2016 年自雲嘉南風管處與四湖鄉公所承接彩繪計畫。雲嘉南風管處也邀請繪製好美里海洋彩繪的曾進成藝術家及其工作團隊——彩墨軒，作為箔子寮彩繪的設計與工程團隊。在進行彩繪工程前，需經歷一系列的考察與行政程序，包含藝術村前期規劃、彩繪母題構想與牆面彩繪同意書之簽署，以下將關注藝術村前期規劃與同意書簽署的過程，並試圖詮釋箔子寮居民如何面對彩繪藝術的介入。

當談及彩繪藝術村計畫的開端，蔡心娜村長表示雲嘉南風管處與曾進成老師有先來勘查箔東、箔子一帶，規劃與預想彩繪村的動線。蔡瑞泉總幹事則說規劃藝術村的第一步就是「路線」：

「當時在好美里的時候，曾老師就有提到要有比較明確的路線，不然不好去規劃。所以計畫一開始就有弄出一條環繞箔東、箔子兩個社區的那個，比較方便去走的路線。啊現在你看這邊（彩繪藝術村）有很明確的一條路線，一路上也有很多箭頭去告訴去指引遊客怎麼走。」（田野錄音，蔡瑞泉，2025/01/08）

動線規劃完後，便由彩墨軒團隊進行選址工作。第一期的彩繪計劃多選址在箔東村內。據蔡心娜村長的說法，箔東村內恰巧有一條住宅與素色牆面較為密集的道路，因此便以此作為主要的彩繪場域。蔡茂昌執行長亦提及曾老師選址的主要考量除了動線規劃與觀看體驗，也會依據牆面的高度、強度進行考量。

從藝術村前期規劃的執行可以看到，箔子寮的彩繪藝術村在前期的規劃上，仍由具有彩繪藝術村建置經驗的雲嘉南風管處與彩墨軒團隊作為決策角色。社造領導人對於彩繪藝術村的規劃與想像，如路線規劃上，亦是以好美里為範本。

路線規劃、選址都結束後，便進到彩繪同意書簽署的階段。當談到同意書的簽署過程，其中一位筆者的報導人——蔡搖先生說道：

「當時因為曾老師的工作團隊（彩墨軒）尚未進駐到茆子寮，所以通常是村長、社區理事在幫忙進行彩繪的同意書簽署。」（田野錄音，蔡搖，2025/01/10）

不同於前述規劃以風管處及彩墨軒進行主導，在彩繪同意書的簽署過程中，更多涉及到社造領導人的推展與中介，以及地方居民對彩繪藝術村計劃的理解與反應。接下來筆者將分析不同報導人對於同意書簽署過程的敘事，試圖訴說「彩繪藝術」介入茆子寮的故事。

首先，社造領導人方面，時任茆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蔡瑞泉總幹事在訪談中提到：

「有些老人會不願意，覺得不要讓別人來亂畫自己家的牆壁，這時候我們就會去找老人的子女來疏通，跟老人家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做。啊雖然有很多老人雖然還是不知道是在『變哈𩵮（pinn-siánn-báng）』（搞甚麼），但態度都有軟化，也有成功說服不少戶來簽同意書。」（田野錄音，蔡瑞泉，2025/01/09）

而蔡茂昌執行長則表示：

「當時是村長與茆東/茆子社區發展協會的幹部在居中協調此事。一開始會由風管處與曾進成老師來選址，並會去詢問居民意願填寫同意書。（笑了幾聲）當時其實有些住戶是不同意彩繪，覺得自己家的牆壁有可能會被亂畫。但因為彩繪會需要把舊牆重新粉刷與上底漆，也會做防水塗料，等於是免費的修繕跟整治，對茆子寮這個房齡較大的社區是一大福利。（停頓）開始動工後，當時拒絕的住戶就後悔了，還去問說不能再安排彩繪，但計畫已經通過，也沒辦法再增添了。」（田野錄音，蔡茂昌，2025/01/05）

從上述兩位社造領導人對同意書簽署的描述，可以看到當時居民對於彩繪藝術村計劃並非全然接受，甚至會擔心自家牆壁是否會被「亂畫」。蔡心娜村長在訪談中也提及當時都有跟居民講解整體彩繪藝術村規劃，也有說到彩繪對社區美化及地方觀光的提升。但當時居住在茆東社區內彩繪密集分布區的住民許多都為六、七十歲的長輩，較難理解社區營造與彩繪計畫，因此便需要社造領導人聯絡其子女進行溝通，才能使其態度軟化。另一方面，從蔡茂昌執行長的描述中可以發現，當時茆子寮居民對於參與社區營造與美化的接受度可能不高，而更注



重社區營造是否會對自家產生利益，而彩繪所帶來的免費修繕與整治則成為居民考量是否同意的關鍵之一。

居住於茆東村蔡搖先生表示：

「當時的同意書大概有寫到牆面可能會需要借出五年進行彩繪跟相關工程，同意書內也有列出相關若居民破壞彩繪的相關賠償事宜。一開始居民有被同意書的賠償內容給嚇到，也不太願意出借出自家的牆壁進行彩繪工程，但透過村長、社協理事疏通後，開始有人願意簽署同意書，有一戶同意之後，其他戶也漸漸地就同意，整個藝術村的推動也有比較順利。」（田野錄音，蔡搖，2025/01/10）

在茆東社區西天寺旁經營春天民宿的蔡文進老闆則說：

「當時是風管處與村長一同來跟他洽談彩繪事宜。我那時候是想說反正可以帶來更多客人，就有答應。啊每一座彩繪都要簽一份同意書，前面停車場都是我們家的地嘛，所以也是簽了好幾份同意書。」（田野錄音，蔡文進，2025/01/07）

從蔡搖先生所提到，同意書上羅列的條約及賠償內容使得茆子寮居民產生疑慮與卻步，亦可以發現茆子寮居民一開始並不了解彩繪藝術村計劃，擔憂其可能帶來的法律責任。而蔡心娜村長與蔡瑞泉總幹事則負責與各家各戶說明整體計劃與同意書內容之釋疑，才漸漸使居民接受計劃並同意簽署。除了住戶，蔡文進老闆作為茆子寮在地的民宿經營者，則更著重彩繪藝術村計劃所能帶來的觀光人流，展現出與地方居民不同的理解。

綜合兩方描述，在同意書簽署階段中社造領導人——蔡心娜村長與蔡瑞泉總幹事，從前期規劃的輔助角色轉變為計劃的主要推動者，需要不斷與住戶進行溝通說服住戶簽署彩繪同意書，無論是聯絡其子女，或是說明整體彩繪藝術村之計劃內容。從兩位社造領導人的行動中，可以發覺上一階段中「彩繪藝術」與社區營造相連的整體架構已經注入茆子寮的社造行動當中，從想像中的規劃走向實際的社區行動。

從觀光局與雲嘉南風管處的政策視角可見，彩繪藝術村計畫的預期達成的目標，不僅是美化社區景觀，更希望藉由 3D 彩繪熱潮提升觀光流量，進而帶動地方經濟。對於社造領導人而言，藝術社造則被視為引發社區活化的可能。蔡茂昌執行長提及，希望透過藝術彩繪讓青年看到家鄉的潛力，進而返鄉投入發展；蔡瑞泉總幹事則多次提及「有人欲來」的願望，顯示他們對社區「動起來」的期待。

但對於茆子寮居民而言，無論是彩繪或社區營造，都並非其日常生活中所關注的事物。社區住民更注重簽署同意書所帶來的利（免費修繕整治）與害（可能

的賠償)，商家則注重彩繪藝術村計劃所能帶來的觀光人流與潛在的地方經濟刺激。因此，在此階段中，已經接觸過彩繪藝術社造的社造領導人與尚未與彩繪相遇的居民呈現出對地方的不同想像，但透過社造領導人的行動，居民漸漸了解到茆子寮未來可能的變動，藝術社造的浪亦隨著計劃推進緩緩漲潮。

## 五、浪湧：茆子寮藝術社造歷程

延續上節彩繪藝術村計劃之推進，本節將從彩繪藝術社造的物質化過程出發，發掘在茆子寮社區與彩繪藝術團隊在彩繪母題與彩繪過程中的衝突與合作，並說明作為「外來觸媒」的彩繪藝術社造如何與社群原有的人文地景結合，型塑出茆子寮獨有的彩繪藝術社造。接著，筆者將闡述彩繪過程中藝術如何作為想像的媒介，茆子寮居民透過觀看、參與彩繪過程，凝聚對於地方之關注，重構對於社區未來的想像。最後，筆者將描述彩繪工程完成後的導覽員培訓、居民社區參與，以及後續藝術社造推動，闡述彩繪藝術所重構的地方想像如何使茆子寮湧現新的社造動能。

### （一）藝術村的物質化過程（2016年—2018年）

在2016年，經歷前期動線規劃、選址與同意書簽署後，彩繪藝術村計畫便進入彩繪主題與內容訂定及彩繪工程執行此一階段。從前期規劃開始，由曾進成老師為主導的彩墨軒工作室便時常在茆子寮社區出入，並進行動線策畫與選址，同時也為後續的彩繪主題與彩繪工程進行考察。前一節中，雖然談及到彩繪藝術的浪潮漸漸在茆子寮湧現，但藝術家與藝術團隊則尚未在茆子寮現身，社造領導人以外的居民也幾乎不認識曾老師及其團隊。而談到曾老師及其團隊進到茆子寮的過往，蔡搖先生說道：

「曾老師他們一開始來茆子寮有遇到居住跟管銷的問題。因為進行彩繪工程不是只有曾老師一個人嘛，還有其他彩繪工人跟助理，這麼多人要吃要住的花銷也不少。後來是普天宮有提供住宿的地方，管銷問題才有解決。」（田野錄音，蔡搖，2025/01/10）

而在普天宮旁經營福建熱炒的老闆，亦在訪談中提到曾老師與其他團隊成員在居住茆子寮期間經常到福建熱炒用餐，有時也會跟廟方人員一起前往。

從上述訪談可見，兩方的接觸是直到曾老師與其團隊因彩繪工程執行而在茆子寮住下後，才漸漸從日常生活中產生交集。不過，後續的彩繪藝術村計畫中，兩方也在彩繪主題選擇與彩繪工程執行之過程中發生許多衝突與協調。

以下，筆者將著重討論彩繪的「物質化過程」。「物質化過程」一詞受到林瑋嬪《島嶼幻想曲》(2023)中提到馬祖建廟歷程的物質化過程之分析所啟發，她以馬祖牛角建廟過程中，廟址與神龕、建築形式、步道海灣與舊廟，三種不同的廟宇物質化過程，分述牛角的不同世代、姓氏群體如何協調、溝通，以新廟建立為媒介重新凝聚社群意識。而本文中，筆者將彩繪藝術村計畫的物質化過程分為兩部分：一為彩繪主題的選定，二為彩繪工程的實際執行，試圖描述在彩繪藝術介入茆子寮社區後，藝術社造的物質化步驟如何提供一種有別於社區原有的媒介技術。而在此過程中，當地居民如何與「外來」的藝術家團隊互動？社造領導人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又造成如何的後續影響？

## 1. 籌備：彩繪主題與表現形式

先前在區域脈絡回顧一節梳理茆子寮彩繪藝術村計畫時，曾提及曾進成老師因受到友人提出臺灣彩繪藝術難以看見東方元素之影響，而決意以漢人民間宗教為主題進行第一期(2016)的彩繪創作，並將第一期的彩繪藝術村命名為「茆子寮神仙 3D 彩繪村」。而在筆者與不同社造領導人與居民的訪談中，眾人對於曾老師在彩繪藝術村第一期的神話風格彩繪主題都相當熟悉，同時也提出曾進成老師在進行主題考察時，曾前往普天宮與西天寺。如蔡搖先生與蔡茂昌執行長在訪談中提到：

「曾老師因為住在普天宮，之前也有到西天寺去看，很多靈感都受到茆子寮當地宮廟影響，整個藝術村也是以宗教為基礎進行彩繪的設計。」  
(田野筆記，蔡搖，2025/01/10)

「在接觸到普天宮歷史悠久的溫府千歲信仰後，曾進成就決定以漢人民間信仰為主作為彩繪要素。」(田野筆記，蔡茂昌，2025/01/10)

從上述兩位的敘述可以發現當曾老師在選定彩繪主題時，並非只是挪移其他彩繪藝術的過往經驗，而是經過地方文化之訪察，而茆子寮帶給曾老師的啟發便在於悠久的民間信仰。在訪查與居住在茆子寮的這段日子裡，曾老師也與普天宮的廟方人員建立深厚關係，福建熱炒老闆則表示，曾進成老師尤其與普天宮前任廟公關係極好。另外，不僅是第一期彩繪藝術村計畫受到茆子寮的漢人民間宗教

所影響，在第二期（2018）結合 3D 彩繪與雕塑裝置的「茆子寮喔熊藝術村」計畫中，更有結合茆子寮普天宮與西天寺兩座廟宇不同宗教氛圍的彩繪案例。

不同於第一期彩繪以漢人民間神話作為整體彩繪的主題，第二期彩繪在主題上較為發散，包含茆子寮特產——蝦乾與烏魚子，漢人民間傳說元素——如西遊記，以及交通部觀光署吉祥物「喔熊組長」（圖三）等。在形式上，比起第一期統一以 3D 彩繪形式表達，第二期增添了雕塑、現成物之表現媒材，也使得第二期的彩繪雕塑作品相較第一期更能呈現不同的樣態。以下將先訴說第一期（2016）彩繪主題訂定時，彩繪團隊與地方居民因彩繪內容所發生之衝突，如何透過社造領導人的中介協調而化解。再來，將講述第二期（2018）彩繪雕塑作品中與地方信仰相連的兩區彩繪雕塑之物質化過程，一為茆子寮喔熊藝術村停車場的兩座溫府千歲雕塑，一為西天寺停車場的漢人信仰與神話彩繪雕塑群，說明「彩繪藝術」能如何與茆子寮的地方信仰產生連結，地方居民又如何回應彩繪藝術的介入。



圖三 烏魚子喔熊組長雕塑  
（作者拍攝）

### （1）衝突與協調：從「鍾馗打鬼」到「牛郎織女」

在田野中的某天下午，筆者與蔡瑞泉總幹事順著彩繪藝術村的路線在茆子寮社區中走訪，就在我們走到茆東社區內的小巷時，遇到一位目測年紀 80 多歲的外省腔老先生，他很好奇總幹事帶著筆者在社區中間晃做甚麼，總幹事便用回說在「帶小朋友看彩繪」。與老先生揮手告別後，老先生與攙扶他的外籍看護緩緩

走進繪有牛郎織女彩繪（圖四）的家戶。大門一關上，總幹事就低聲地在筆者耳邊輕聲說道老先生與他家牆上牛郎織女彩繪的故事：

總幹事表示牆上的牛郎織女圖其實原本曾老師預計要繪製的是鍾馗打鬼圖，但老先生當時非常不滿意，覺得會「觸霉頭」。所以在藝術團隊進行彩繪工程時就出來咆哮，並把曾老師當時作畫的工具丟出去。後來是老先生的兒子從臺北回來後，才跟老先生、曾老師跟時任茆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的總幹事坐下來談，並以將彩繪主題換成「牛郎織女」作結。在繪製結束後，老先生也相當滿意，稱讚曾老師「畫得栩栩如生」。

（田野筆記，2025/01/14）

如同先前在同意書簽署階段所遇到的困難，茆東社區內部年長的居民對於彩繪藝術村整體計畫並不了解，而更注重自家牆壁上的彩繪內容與呈現。從「鍾馗打鬼」到「牛郎織女」，不僅是彩繪內容的衝突與更換，更涉及藝術團隊與地方居民對彩繪藝術社造時的不同觀點與詮釋，以及社造領導人居中協調的行動。三方協調與重繪的過程中，也軟化老先生原先強硬的態度，並重新建立藝術團隊、社造領導人與地方居民的連結。



圖四 牛郎織女彩繪  
（作者拍攝）

## （2）與地方「很合」：西天寺停車場「凹雕如來佛像」

本次田野的居所位於茆子寮西天寺旁的春天民宿。民宿前方的西天寺停車場，便是整個彩繪藝術村中彩繪雕塑分布最為密集的一區，下田野第一天蔡瑞泉總幹事所帶領的茆子寮社區導覽，亦是由此出發。西天寺停車場內的彩繪包含西遊記

(圖五)、佛陀(圖六)、達摩(圖七)與周文王(圖八)的故事，雖主題繁多但整體風格與調性卻不衝突。傳統三合院建築、通天爐、高聳壯觀的佛像、鑲著「西天佛國三天樓」的白色中式塔樓(圖九)層層環繞在停車場周邊，與具有民間神話與佛道教色彩的彩繪雕塑相互呼應，呈現出漢人宗教圖像與地景共構的視覺秩序。如此與周邊人文地景嵌合的彩繪雕塑背後又有如何的故事？在上一節中所提到的經營春天民宿，同時也是西天寺停車場地主的蔡文進老闆，在訪談中說道：

蔡老闆說當時曾老師有到西天寺看看，也有因為西天寺的關係（老闆：曾老師有感受到佛法的一個「氣(khui)」）而製作佛祖的凹雕。蔡老闆也提到文王拉牛車雕塑的牛車，是從爸爸當時建西天寺的時候就留下來的，但當時曾老師剛好看到牛車，便詢問老闆是否可以用來做雕塑，老闆也欣然答應。（田野筆記，2025/01/07）

有別於溫府千歲的彩繪雕塑可以明確看到廟方在彩繪選題中的參與，西天寺停車場的彩繪雕塑靈感更多與曾老師到訪參拜西天寺的經驗相關。在媒材選用上則展現彩繪雕塑與原有地方現成物的結合。在後續與蔡老闆的訪談中，筆者問到他對於西天寺停車場彩繪雕塑的感受，蔡老闆表示自己很滿意，這些彩繪雕塑跟西天寺還有春天民宿「很合」<sup>4</sup>，也很喜歡把牛車納入彩繪雕塑的做法，讓「舊東西的精神可以延續下去」。

---

<sup>4</sup> 經過筆者進一步詢問，蔡老闆所謂的「很合」，指的是彩繪與既有宗教氛圍的協調。



圖五 西遊記主題彩繪  
(作者拍攝)



圖六 佛陀凹雕  
(作者拍攝)



圖七 達摩彩繪  
(作者拍攝)



圖八 周文王拉牛車彩繪雕塑  
(作者拍攝)



圖九 西天寺周邊彩繪地景  
(作者拍攝，左為西天寺，西天寺旁邊的白色建築為春天民宿。  
右一為佛陀凹雕，右二為西遊記主題彩繪。)



### (3) 「神明都看在眼裡」：箔子寮喔熊藝術村停車場「溫府千歲拉王船」

接續先前筆者與蔡瑞泉總幹事順著彩繪藝術村路線在箔子寮社區內的走動訪談，而走訪的第一站便是位於雲 131-2 線旁的箔子寮喔熊藝術村停車場，見到「溫府千歲拉王船」（圖十）與「溫府千歲凹雕」（圖十一）兩座彩繪雕塑後，他便說起兩件彩繪背後的選題故事：

溫府千歲是當地的信仰，以前也曾有過王船出巡的儀式，但後來因為人口外移、漁港沒落，箔子寮的居民跟香客都少了非常多，因此盛大的王船儀式就沒有再舉辦。當時曾進成老師在普天宮時，其實有跟廟裡當時的舊廟公討論普天宮的沿革，因此就將王船儀式製作成這幅有立體浮雕的彩繪。接著，蔡瑞泉總幹事便帶著筆者到停車場的門口，介紹說門口的凹雕也是溫府千歲，凹雕的表現手法使得觀看者在移動時，溫府千歲會不斷望向觀看者，蔡瑞泉總幹事說這是要表達「一舉一動神明都看在眼裡」。（田野筆記，2025/01/15）

關於溫府千歲與箔子寮的宗教研究，去年的臺大人類學系文化與田野成果冊中蔡耀陞與何昀瑄（2024）的「神與人」研究有較完整的介紹，他們也指出溫府千歲信仰在箔子寮歷經了長時間的建構與鞏固，已成為當地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安定力量，兩位作者亦於文中將這兩座彩繪雕塑視為內蘊「神與人」關係想像的媒介（*ibid.*）。從蔡瑞泉總幹事的敘述可以看見，在彩繪主題選擇上，並非是曾老師獨自決策，而是經過箔子寮地方信仰的考察，廟方也在此一過程中參與進主題選定的討論中。普天宮曾經繁盛的「王船儀式」，也透過藝術社造的形式再次重現在箔子寮。在藝術表現手法上，溫府千歲凹雕所帶來的觀看體驗，產生如總幹事所述——「一舉一動神明都看在眼裡」的感受，也貼合溫府千歲長久以來看顧箔子寮的人神想像。

上述兩例實則展現箔子寮如何以原有的地方信仰轉化外來的彩繪藝術社造框架。溫府千歲的兩座彩繪雕塑是藝術團隊與箔子寮普天宮共同商討的成果，西天寺停車場則是藝術團隊受西天寺宗教氛圍啟發後的作品。筆者認為，這些彩繪雕塑作品不僅如同先前蔡耀陞與何昀瑄（2024）所述，內蘊箔子寮的人神關係想像，同時箔子寮居民與藝術團隊在物質化過程中的合作協調，亦是促成彩繪此「外來觸媒」能蘊含箔子寮在地信仰觀點的重要關鍵。

本段從三則彩繪主題與表現形式的故事出發，訴說箔子寮當地彩繪物質化過程的故事。無論是因居民不滿「鍾馗打鬼」而更換為「牛郎織女」的協調過程、由普天宮共同參與的溫府千歲雕塑，亦或是曾老師從西天寺感受「佛法之氣」而發想的雕塑創作，都展現彩繪藝術與社區營造的框架並非單向「介入」箔子寮，

而是經過藝術團隊、社造領導人與地方居民三方的協商、衝突，以及地方宗教氛圍、藝術表現手法的多重互動，才使原先社區場域之外的「彩繪藝術」能逐步展現出具有地方文化脈絡的樣態。



圖十 溫府千歲拉王船彩繪雕塑  
(作者拍攝)



圖十一 溫府千歲凹雕  
(作者拍攝)

## 2. 彩繪工程執行

延續前段對彩繪主題與風格的探討，本段將聚焦於彩繪工程的實際執行階段，觀察藝術團隊、社造領導人與地方居民三方在具體施作過程中的互動與協商，並描繪彩繪藝術如何催動茆子寮居民對地方的關注與投入。

### (1) 頓挫：彩繪工程團隊更換

在脈絡回顧一節中，曾提及在彩繪藝術村計劃的三年間（2016-2018），更換過一次彩繪工程團隊。當時因政策改動，需重新為茆子寮神仙 3D 彩繪村之彩繪工程招標，而原本合作的彩墨軒工作室因此無法繼續配合。在訪談蔡茂昌執行長時，他提到：

「在 106 年時，彩墨軒卻意外沒有標到彩繪工程，而另一家的彩繪工程因為畫風與風格與原先彩繪藝術村計畫及曾老師的彩繪風格相去甚遠，因此遭到居民反對跟抗議，社區不認同，社區發展協會便與風管處聯絡，提出意見，而風管處也隨即與該家工程行解約，並更換工程負責單位回彩墨軒。」（田野錄音，蔡茂昌，2025/01/05）

蔡心娜村長也在訪談中提到此事：

「當時就是有遊客跟這邊的居民反應說其他畫的很美，怎麼會這個畫得那麼醜，所以後來就由我們（社造領導人）跟曾老師一起向風管處反應，才把廠商換回彩墨軒。」（田野錄音，蔡心娜，2025/01/09）

下圖（圖十二）中的彩繪為中途更換的彩繪工程團隊所繪製，可以發現無論是在藝術表現或彩繪風格上都與先前案例中曾老師所帶領的彩墨軒工作室之作品相差甚遠，也鮮少有與融入當地人文地景元素的創作成分。

從上述的彩繪工程團隊更換事件可以發現茆子寮地方居民並非單純接受外來的彩繪藝術社造，而是在與彩墨軒藝術團隊互動的過程中漸漸肯認其為地方帶來的改變，並透過彩繪藝術揉合兩方對於社區營造與社區地景的想像，形塑出具有地方色彩的藝術社造。中途接手的彩繪工程團隊則缺乏如此與在地的連結，且風格與技法上也與原先的彩墨軒團隊截然不同，當無法延續這種在地感時，便激起了社區的質疑與排拒。

另一方面，此段經歷亦反映出彩繪藝術已不再只是由藝術團隊與社造領導人主導的社區營造計畫，而逐漸內化為地方居民可辨識、評斷與回應的公共事務。居民不但開始關注彩繪藝術的好壞，也願意透過社造領導人向政府表達意見。與

此同時，社造領導人亦發揮其在地中介者的功能，協調官方與地方的認知落差，促成彩墨軒藝術團隊後續的回歸。



圖十二 中途更換的工程團隊繪製之溫府千歲彩繪  
(作者拍攝)

## (2) 接續：地方出力

在彩繪執行過程中，投入地方藝術社造工作的不僅僅是藝術團隊，在彩繪藝術村計劃第二期時，因為有大量的立體牆面彩繪、彩繪雕塑創作，茆子寮當地居民與社造領導人也參與了其中的建造工程（圖十三）。在與蔡瑞泉總幹事走訪茆子寮社區的路途上時，他便與筆者提到：

彩繪藝術村內有許多立體浮雕、雕塑基座，甚至是彩繪的牆面，都是當時（普天宮）廟委會裡的水泥工匠來做得，而且也有牆面是廟委會的大家一起幫忙砌出來的。（田野筆記，蔡瑞泉，2025/01/15）

當筆者問到為什麼普天宮廟委會會來幫忙，蔡瑞泉總幹事則說：

「普天宮的前廟公跟曾老師關係很好，曾老師住在普天宮也很常會跟廟委會的成員一起吃飯喝酒抽菸，因此彼此都很熟，看到曾老師對茆子寮的用心，也覺得需要甚麼都會盡量提供，算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田野筆記，蔡瑞泉，2025/01/15）

行走在彩繪間，蔡瑞泉總幹事比起坐在普天宮內多了一些自在與微笑，言談間也流露出對於彩繪藝術村計劃的驕傲。一面在夕陽下緩緩走過一座座彩繪雕塑，他一面說著彩繪背後社區付出的心血。

「只有箔子寮才有這樣的彩繪」

「當時大家齊心協力才把這面牆壁砌起來，花了很多天，但曾老師也有給我們賀咗（ho-ló）」

（田野筆記，蔡瑞泉，2025/01/15）

筆者認為，從上述蔡瑞泉總幹事的敘述可以發現到，在彩繪的物質化過程中，箔子寮居民的位置已從計畫初期的旁觀者、主題選定階段的協力者，逐步走向實際參與彩繪工程的行動者。此一轉變的背後，實則奠基於曾老師及其團隊與普天宮廟方之間長期累積的情感聯繫，亦反映出地方居民對藝術團隊於箔子寮投注心力的認可與回應。在藝術創作過程中，藝術團隊對居民技藝與協力的讚賞（如曾老師的「賀咗（ho-ló）」），以及彩繪雕塑完成後共同經歷的成就感，亦進一步促動地方社群對彩繪藝術的主動關注，成為凝聚社區參與及提升社區動能的重要契機。行文至此，原先社區明確的內外邊界變得模糊，點狀的彩繪雕塑形塑出彩繪藝術村的社區圖像（圖十四），箔子寮的藝術社造浪潮也隨之翻湧了起來。



圖十三 曾進成及居民合作彩繪砌牆工程  
（曾進成彩墨軒工作室 2018）



圖十四 箔子寮彩繪藝術村路線與彩繪位置<sup>5</sup>  
(Google Earth 2025, 標點與路線為筆者自製)

## (二) 地方想像重構

延續上一小節對於彩繪藝術社造物質化過程之描繪。本小節以「想像媒介」與「想像重構」作為主要分析概念，試圖訴說彩繪藝術如何作為重構箔子寮社區想像的媒介基礎。

隨著彩繪雕塑一座座落定於箔子寮社區，彩繪藝術村計劃也走向尾聲。從上一段地方居民於彩繪藝術村的行動轉變，可以發現箔子寮居民隨著計劃推進，漸漸接受彩繪藝術介入社區。在此轉變過程中，居民到底是如何被彩繪吸引，而願意讓彩繪進入社區，甚至主動參與彩繪藝術的創造過程？

以下，筆者將從地方居民於彩繪過程中的觀看經驗與互動，說明彩繪藝術如何成為地方想像重構的基礎媒介。接著，筆者將從彩繪藝術村建置完成後，箔子寮居民與社造領導人對於彩繪藝術村所帶來觀光熱潮的反應出發，試圖描繪彩繪藝術如何重構箔子寮社區的地方想像。

<sup>5</sup> 圖中橘色線段為彩繪藝術村觀看路線，藍色標點為彩繪藝術村第一期（2016）所繪製之彩繪，紅色標點為彩繪藝術村第二期（2018）所繪製之彩繪，綠色標點則為兩期工程間更換的彩繪工程團隊所繪製之彩繪。

## 1. 藝術作為地方想像媒介

每當筆者在田野中問到地方居民與藝術團隊的關係，報導人總會提及地方居民觀看藝術團隊彩繪過程的日常。如蔡心娜村長曾與筆者說到：

「當時曾老師在畫的時候也會有一些居民去看，很多居民也會買飲料跟送食物過去給團隊，曾老師也不是只畫白天，晚上 7、8 點也會打燈畫，但我那時候都在忙，也沒有什麼機會去看。」（田野錄音，蔡心娜，2025/01/09）

蔡茂昌執行長也在訪談中提到：

「彩繪工程進行時，附近居民也會圍觀曾進成老師與彩墨軒團隊工作，兩方也會針對彩繪內容聊天，主要是曾老師會跟居民聊他創作意圖與畫作意涵。而居民也在熱天拿冰飲料出來請團隊，並提供家中廁所給團隊成員使用。」（田野錄音，蔡茂昌，2025/01/07）

從蔡心娜村長與蔡茂昌執行長的敘述可以發現，居民大多都對曾老師與其團隊的彩繪內容跟藝術創作過程感到好奇，而會圍觀彩繪工程、與藝術團隊互動，甚至送上飲料、點心，彩繪藝術的魅力成為藝術團隊與地方居民建立互動的媒介。不僅如此，從部分居民的訪談中，也能發現彩繪藝術正默默轉變居民對社區的想像，如福建熱炒老闆娘在訪談中談到自身觀看彩繪的經驗：

老闆娘表示當時彩繪藝術村第一期時，有去看四湖地圖行政圖的彩繪，表示自己覺得很驚奇，沒想到會有藝術家來到箔子寮彩繪，而且畫得這麼好。至於盤古開天，也就是第一幅彩繪，老闆娘有提到雖然沒有看到作畫過程，但自己去看過之後覺得很壯闊，之前從來不覺得箔子寮是一個可以有藝術的地方。

「那時候就有覺得彩繪齣，或多或少啦！有在改變、美化箔子寮這裡。」

（田野筆記及錄音，福建熱炒老闆娘，2025/01/14）

從前面兩位社造領導人的敘述與福建熱炒老闆娘的分享可以發現，彩繪藝術進入社區後所激發的「觀看」經驗，不只是對牆面圖像的短暫驚豔，而是一種日常感知的再聚焦。那些曾經熟悉至視而不見的街角與牆面，因彩繪的渲染而被賦予了全新的觀看角度與敘事可能。對居民而言，這樣的變化不僅是視覺上的，也重構了他們對地方的理解與想像。以熱炒店老闆娘為例，她驚訝於原本無人注目的村落竟能吸引外人駐足，也開始重新評估箔子寮在觀光發展上的可能。此一觀看經驗正如 Gell（1998）所論述，藝術之物能作為人際與社會關係的仲介者——

它們不只是可被凝視的形象，更在凝視過程中形構新的關係與意義。在此，彩繪不僅是藝術介入社區的手段，更是地方想像得以生成與擴展的媒介。

## 2. 遊覽盛況：彩繪藝術喚起的地方想像

隨著彩繪藝術村的建置完成，大批遊客也湧入這個原本寧靜的沿海村落。在筆者的訪談中，許多報導人都提及當時的盛況，如蔡瑞泉總幹事在訪談中表示：

「剛開始時，真的會有七、八台遊覽車到普天宮的停車場，廟裡也會配合提供茶（放在奉茶的地方）啊，開放廁所給遊客跟香客用，那時候來了很多遊客跟香客，很鬧熱（lāu-jiát）。」（田野錄音，蔡瑞泉，2025/01/08）

蔡瑞泉總幹事也在後續的訪談中提到，如此的熱鬧盛況，自箔子寮漁港沒落後就十分少見。他也提到在見到絡繹不絕的遊客後，便覺得箔子寮也能像好美里一樣成為觀光亮點，於是作為社造領導人的他，便帶頭投身後續的彩繪藝術村導覽員培訓<sup>6</sup>。彩繪藝術帶來的觀光熱潮，不僅提供箔子寮新的生機，也重新打開居民對於地方未來的想像。

而在地方發展長期停滯的境況中，彩繪藝術的介入不只是社區美化，而成為地方轉型的潛在觸媒。正如蔡瑞泉總幹事所說：

「當時曾老師來，也算是給地方打開一些希望，不然怎麼會有人來看？」（田野錄音，蔡瑞泉，2025/01/14）。

筆者認為，蔡瑞泉總幹事口中的「希望」，不只來自外來觀看者的注視，更是地方居民對於自身生活環境重構想像的表達。彩繪藝術所帶來的並非單一的經濟刺激，而是啟動了一種想像重構的可能。而曾進成老師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亦不只是藝術家，更是一位積極介入地方未來想像的行動者。他不僅參與彩繪創作，更主動與地方居民交流，提出各種對社區空間與發展的設想，試圖將藝術轉化為地方改變的推力。如福建熱炒的老闆在訪談中回憶道：

「曾老師那時候從普天宮廣場另一家熱炒——歪頭仔，聽到我有計畫要開店，就有提出想要跟我合夥把店開大，也鼓勵我勸，說箔子寮普天宮附近要有一間具有規模的餐廳，來的遊客才可以能有機會留久一點。」（田野錄音，福建熱炒老闆，2025/01/14）

然而，如此來自外部的想像，也未必能與地方居民的經驗與理解立即接軌。根據蔡搖先生的說法，雖然曾老師的彩繪技術與整體規劃能力令人敬佩，但地方

<sup>6</sup> 「彩繪藝術村導覽員」一事將在下一小節中詳細說明。



居民在面對藝術語言時，常因資訊落差與生活背景的差異，而難以即時理解其中意圖：

「曾老師其實對於整個彩繪村的規劃跟設計都非常用心，畫的技術也很厲害，有自己的藝術家個性，但很多時候當地人可能在看彩繪村的時，因為整個資訊不對等，沒辦法跟上曾進成老師那種去想怎麼用藝術吸引遊客的觀點。」（田野錄音，蔡搖，2025/01/10）

曾老師也對蔡搖先生坦言，希望藝術村建成後，每月能吸引三百輛遊覽車進入茆子寮。這樣的話語透露出一種與地方當下經驗有所落差的想像遠景，也展現當藝術介入社區時，常伴隨的張力與摩擦。然而，這種落差亦非純然的對立，更可能是引發在地居民思考「在地可能性」的契機。當茆子寮被曾老師以不同的方式觀看與想像時，居民亦開始反思：我們是否真能成為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從上述的社區轉變可以發現，彩繪藝術帶來的不只是可被拍照的景觀，而是一種介入地方想像的實踐。透過藝術家與地方居民之間的碰撞與對話，一種新的地方想像逐漸浮現——不再只是過去的漁村與信仰地景，而是一個能引發觀光熱潮、具有發展前景的彩繪藝術村。

### （三）藝術社造新動能

延續前一小節所論的地方想像重構，茆子寮社區不僅經歷了從觀看到理解的過程，也在彩繪藝術所引發的集體想像中，逐步展現出新的社造動能。當觀光人潮湧入、地方被外部視線聚焦的同時，社區內部亦產生了回應這波變動的行動。以下，筆者將關注彩繪藝術村的導覽與藝術社造的延續，說明彩繪藝術村所帶來的想像重構如何引發一股社造新動能。

#### 1. 藝術村導覽員培訓

前文曾提到蔡瑞泉總幹事精湛彩繪導覽與他投身彩繪藝術村導覽員培訓的經歷。而為何會有彩繪藝術村導覽員的出現，蔡茂昌執行長在訪談中表示：

在彩繪藝術村建置完成後，風管處有指導茆東社區發展協會與茆子寮城鄉社區發展協會培訓社區導覽員，主要是針對彩繪藝術村與社區特產進行導覽教學。（田野筆記，蔡茂昌，2025/01/07）

而蔡茂昌執行長也在後續訪談中提到，此次的導覽課程，一開始有十幾位居民參加，也有大學生回鄉接受培訓，而最後通過導覽培訓的是六位，其中，蔡茂

昌執行長、蔡心娜村長、蔡瑞泉總幹事都是通過培訓的導覽員，但並非通過培訓的導覽員都能於平日隨時開始導覽。蔡心娜村長也提到：

筆者進一步問最近是否還有導覽的服務，村長則表示她的手機就是藝術村的聯絡電話，現在比較少會需要導覽大團遊客，但有的話她會接下來，請蔡瑞泉總幹事導覽，自己則因為事務繁重比較難有時間導覽。  
(田野筆記，蔡心娜，2025/01/09)

在田野期間，筆者除了下田野第一天有機會聽到蔡瑞泉總幹事的導覽，後續也有與他共同走過一遍彩繪藝術村的路線。而蔡瑞泉總幹事在訪談中，亦提到自己參加導覽員培訓與實際導覽的經歷：

蔡瑞泉總幹事表示培訓是風管處主辦，上課內容就是請一些遊客服務跟觀光專業的老師來上課，每天就是跟著課程學，曾老師也會帶著他們繞整個藝術村走，並一幅一幅跟他們解釋背後的故事、要如何導覽、要如何跟彩繪互動，最後會有一個公眾的導覽給大家（居民）看這樣。在藝術村剛建成時，蔡瑞泉總幹事也真的有下去進行導覽，村長、村長女兒跟茂昌大哥都是導覽員之一。當時導覽是一位導覽員帶 40 位遊客進行藝術村的導覽，一趟的薪水是 1200 元。他笑著說：「這樣的薪水在這裡還不差勒」。(田野筆記，2025/01/08)

蔡瑞泉總幹事表示自己對遊客的導覽都是講要怎麼拍照，跟彩繪背後的神話故事而已。筆者也順便問到他在路途上沒有彩繪時會如何填補，他則表示會跟遊客說明箔子寮的特產有哪些，產季是甚麼時候等等的(田野筆記，2025/01/14)

而當筆者在田野期間與蔡瑞泉總幹事一同漫步於彩繪藝術村中時，他則與筆者分享許多與彩繪互動的方法及彩繪背後的典故。如在「貓咪拳擊手彩繪」的牆面前，他笑著模仿遊客拍照時的姿勢，輕敲牆面作勢對打，並說：「這幅最受年輕人歡迎，很多人都會這樣拍」(田野錄音，蔡瑞泉，2025/01/15) 而來到「盤古開天」的彩繪時，他則用雙手比劃出捧水的樣子，說到：「你看，這邊拍起來像是接神水，寓意也很好」(田野錄音，蔡瑞泉，2025/01/15)。

在與蔡瑞泉總幹事走訪彩繪藝術村的過程中，筆者感受到他散發著與前次訪談截然不同的情緒氛圍，比起先前較為嚴肅的訪談，走動談話間，他更多了微笑與從容。不單單是訴說彩繪的故事，走訪過程中蔡瑞泉總幹事對每一幅彩繪雕塑的熟悉與投入，更流露一種筆者稱之為「自豪」的情緒。他亦在走動間談到：

「只有箔子寮才有這樣的彩繪」

「當時大家齊心協力才把這面牆壁砌起來，花了很多天，但曾老師也有給我們賀咗（ho-l6）」

（田野筆記，蔡瑞泉，2025/01/15）

這些話語展現蔡瑞泉總幹事對藝術村建置過程的親身投入，也道出他對這段藝術社造深刻的情感。

從蔡瑞泉總幹事的敘述，可以發現彩繪藝術村導覽員的出現，不僅是回應觀光需求的實用安排，更是社造實踐從視覺景觀延伸至居民行動的重要體現。導覽行為讓居民不再只是彩繪的觀看者與接受者，亦成為詮釋者與敘事者，是將地方轉化為可以被述說與理解對象的關鍵角色。而蔡瑞泉總幹事在導覽過程中展現的自豪與熟練，則說明「彩繪藝術村導覽」不僅是彩繪藝術與地方記憶的橋梁，亦使藝術社造不隨著牆面完工而結束，而更透過地方居民的訴說，繼續在日常中延續其意義。

彩繪藝術村的導覽不只是功能性的解說，更是一場地方意義的再生產。導覽員在面對遊客的時刻，實則也在與社區進行對話。如何說、說什麼、在哪些地方停留、在哪裡強調拍照或互動，這些選擇實際上共同組成了箔子寮社區與彩繪藝術村被觀看與記憶的方式。導覽也延續了藝術社造的生命，讓原本靜置於社區空間中的彩繪藝術獲得能動性，進而轉化為地方敘事的一部分。

居民投入社區導覽，也象徵社造能量的另一種轉換。當地方的想像不再僅存於彩繪完成當下的視覺衝擊，而是透過一次次導覽與交流，持續被講述與分享，居民的參與也不再只是接受與維護，更是主動推動的過程，並在無形之中重新塑造出社區的想像主體，讓藝術介入所開啟的地方想像，得以在箔子寮的社造浪潮中延續下去。

## 2. 藝術社造的延續

而當筆者問到彩繪藝術社造所帶來的動能，是否有在箔子寮引發其他社區行動？蔡瑞泉總幹事與蔡心娜村長在訪談中是這麼說的：

蔡瑞泉總幹事表示，箔子寮畫完後真的有「卡嬌（khah-suí）」，真的有美化社區，打出一些「名聲（miâ-siann）」，讓比較多人知道有箔子寮。也讓居民因為有人來看會更自動自發整理環境，很多本來比較髒亂的地方，都是藝術村建設時，社區裡一起清潔的。（田野筆記，蔡瑞泉，2025/01/08）

當筆者詢問到藝術村在社造脈絡中的定位，村長表示藝術村的確是近年來最大的社造計畫，也是比較早開始運作的計畫，並且後續也有讓 107、108 年實施的長青食堂跟茆子寮廟前廣場美化計畫比較能凝聚居民的向心力而開展，以上兩個活動也有拿到雲林縣社區 PK 賽的冠軍，一直延續到茆東社協辦的樂活居、大專院校體驗營等等。（田野筆記，蔡心娜，2025/01/09）

可見彩繪藝術所為茆子寮帶來的改變，並未隨著彩繪工程的完成而終止。地方想像重構後，也在居民的日常行動中持續發酵。社區不再以彩繪藝術為唯一主角，卻展現出以地方為主體的實踐動能。這些行動雖未必以「藝術」為名，卻可視為彩繪介入後，地方社造能量的一種延伸。如此的延續行動，顯示茆子寮的社區營造不再倚賴外部藝術團隊的主導，彩繪藝術所激發的地方想像，已經轉化為居民自身可執行的社造行動力。從主動整理環境，到延伸出更多社造提案與組織動員，居民的參與已不再只是對外來計畫的回應，而是逐漸形構出一種以地方為核心的社造動力。

從彩繪藝術村導覽員、居民自主社區環境整理，到後續的社造活動。如此具有延續性的行動與實踐，使我們得以看見一場由外而內、由他者凝視轉向自我實踐的地方轉變歷程。彩繪藝術不僅為茆子寮打開了被看見的窗口，更開啟了一段居民重新看見自身、並投入地方建構的契機。社區也不再只是彩繪藝術的承載空間，而在經歷觀看、敘事與實踐的多重歷程中，逐漸生成出屬於茆子寮在地的社造脈動。自此，茆子寮的社造新動能——承接著彩繪藝術所重構的想像浪潮，也在日常生活與公共行動中，持續湧現茆子寮作為地方主體的新可能。

## 六、潮落：茆子寮藝術社造現況

承接前節對於社造動能湧現的描繪，本節將視角拉回至茆子寮彩繪藝術村的當下現況。彩繪藝術曾為茆子寮帶來短暫而絢爛的注視，也曾激發一段社區集體投入的時刻。然而幾年之後，當外部資源撤離、觀光政策轉向，地方的日常也再度回歸安靜。

隨著彩繪藝術村計畫於 2018 年完成後，觀光熱潮逐漸退去，筆者進行田野的兩週間，也只見到兩、三組遊客在參觀彩繪藝術村。而在訪談中，報導人亦時常提到近年彩繪藝術觀光的失效，蔡瑞泉總幹事與筆者走訪藝術村途中回憶道：

「現在真的沒甚麼人來看了，比起以前遊覽車都會一車一車把人載來，現在都只剩下很零散的遊客在看……」（田野錄音，蔡瑞泉，2025/01/14）

本節將從彩繪藝術村當前境況與居民對彩繪觀光沒落的敘述出發，討論其逐漸失效的原因與對地方之影響，進而分析箔子寮社造動能的逐步停歇，並試圖釐清在箔子寮這個濱海村落中，彩繪藝術所重構的地方想像如何在治理資源、觀光機制與地方張力之間，逐步退潮。在本節中，筆者不欲將此現象簡化為地方的挫敗，而是希望透過分析藝術社造發展漸弱的過程，描繪一場由「湧動」轉為「沉靜」的社造動能節奏——那並非終止，而是一段社造歷程中的起伏波動。

### （一）彩繪藝術村的失效

隨著時間推進，2020 年以來，彩繪藝術村逐漸從箔子寮居民與外來遊客的視線中淡出。而當筆者走入彩繪藝術村，不難發現彩繪牆面已有褪色斑駁的痕跡，部分作品無人維護，甚至出現破損與鏽蝕；整體氛圍則沒有蔡瑞泉總幹事所描述過往的人潮喧騰與彩繪藝術村剛建置的新鮮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逐漸退潮的靜謐。如此的景況，地方並非無人感知。在與地方居民的訪談中，筆者聽見了對這段「退潮」歷程的多種理解與說法，以下將分為四點敘述。

首先，蔡瑞泉總幹事談及 2019 年時，疫情爆發的影響，他笑著說：「疫情大家「驚巖驚死啊！（kiann-lóng-kiann-sí ah）」，連臺北回來的（居民），村長都要叫他不要出門了，當然也沒有遊客會再來」（田野錄音，蔡瑞泉，2025/01/08）。可見疫情對觀光產業仍在發展中的箔子寮而言，是彩繪熱潮衰退的因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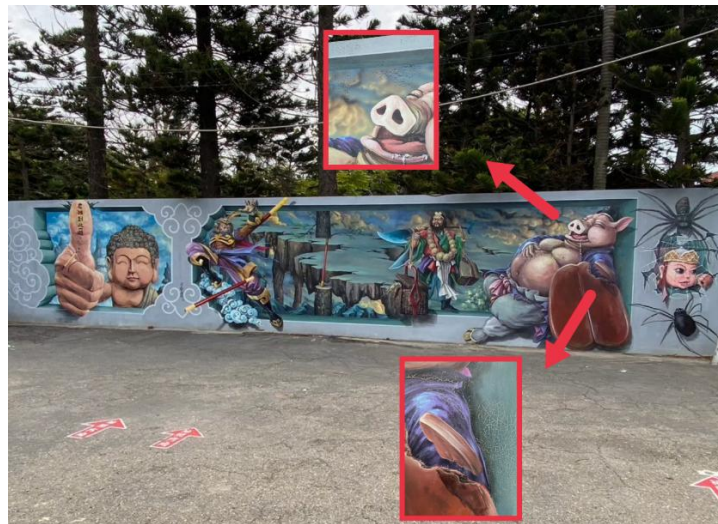
第二，彩繪藝術村的觀光發展，在治理政策斷裂後便難以延續。蔡心娜村長坦言，於 2022 年時，她曾與文化觀光處合作，規劃從斗六到箔子寮的旅遊路線，但因為家庭事務繁忙，計畫最終中止。更關鍵的是，當時（2022）風管處處長異動，原本願意投注資源的處長卸任後，後續無人接手，計畫與資金也隨之斷裂：「後來政府也不支持彩繪村的任何計畫，連彩繪跟雕塑的維護跟修繕都沒辦法申請經費」（田野錄音，蔡心娜，2025/01/09）。

第三，春天民宿老闆蔡文進於訪談中提到——藝術村計畫在剛完成時的確吸引過不少遊客，但隨著時間推移，遊客逐漸減少，現在只會「來二十分鐘走走就離開」（田野錄音，蔡文進，2025/01/07）。他進一步說道：「箔子寮只靠彩繪，留不住人。」藝術村出發點雖好，但「附近沒地方玩，也沒攤販，紅不起來」，沒有觀光配套措施，難以撐起長期的人流與熱度。蔡瑞泉總幹事也於訪談中提及類似

的觀察。他表示現在就算有兩三台遊覽車進來，也不會留下來吃飯，廟旁的熱炒店也容納不了整車人數。

最後，原訂持續於 2019 年發展的第三期彩繪藝術村計畫，也因理念落差與資金問題未能推動。蔡搖先生提到，雖然曾老師後來有畫鼠年與牛年彩繪，但因廟方擔心遊客踩踏，將作品封起來，這與曾老師希望大家能拍照打卡的想法產生衝突。而廟前的鼠年與牛年彩繪皆為第二期（2018）彩繪藝術村工程落幕後，廟方自行眾籌後邀請曾進成所繪製。沒有地方政府的穩定預算來源，亦使得第三期彩繪藝術村計畫難以發展。蔡搖先生進一步說到：「這種計畫有時候只是風管處要消化預算，不一定隔年還有辦法再撥款下來」(田野錄音，蔡搖，2025/01/10)。

而在人流散失之外，筆者亦觀察到彩繪藝術村的多幅牆面彩繪與雕塑，已有顯著剝落、斑駁與生鏽現象。例如原先位於西天寺停車場的「西遊記主題彩繪」部分區塊已因風雨侵蝕而出現裂痕（圖十五）；而彩繪藝術村中的雕塑亦多有剝落、鏽蝕的情況。瑞泉總幹事則表示，自藝術村建立以來，鮮少有人來進行後續的修繕與保養，多由社區自主進行簡單清潔，也難達成彩繪所需的專業維護需求。此一現象，不僅是藝術社造退潮的物質痕跡，也反映出台灣多數藝術社造在後續經費與配套不足時，社區所會面臨的維護困難。



圖十五 西遊記主題彩繪龜裂  
(作者拍攝)

以上，箔子寮居民的敘述共同構築出一幅彩繪藝術村從「熱潮」到「潮退」的歷程。在資源與制度支持抽離之後，地方無力單靠自身支撐彩繪村的運作；而原本彩繪觀光所重構的地方想像，也在熱潮消退後展現出現實落差。箔子寮彩繪藝術村的失效，並非某個單一錯誤導致的終結，而是在政策改變、配套不足等多重因素的交錯下，漸漸走入沉寂的歷程。

## (二) 社造動能的漸停

除了外部政策支持與觀光配套的失效，茆子寮社區內部的參與能量亦出現鬆動與疲乏。在上一節的敘述中，彩繪藝術曾激起地方的想像重構，並延續社區營造動能的上漲，然而當外部關注逐漸淡去，原先被期待承接這波熱潮的居民，卻難以持續行動。地方想像的斷裂，亦使後續的社造動能隨之消退，茆子寮的社造浪潮進入停滯。

本小節將承續第三節對三位社造領導人返鄉與參與社造歷程的描述，並聚焦於蔡心娜村長的觀點。作為長期深耕社區的社造領導人，蔡心娜的敘述不僅展現其對居民參與熱度消退的體察，也反映出藝術社造觀光失效後，地方社造領導人所面對的困境與內部矛盾。透過其視角，筆者試圖描繪社造動能從高峰走向漸停的轉折過程。

蔡心娜村長於訪談中回憶，藝術村剛建成時的确曾引來曾老師與地方對未來發展的期待，但社區中「沒有人願意出來做生意。」(田野錄音，蔡心娜，2025/01/09)，居民普遍不相信茆子寮真的有機會「紅起來」。即便蔡心娜村長試圖與文化觀光處合作推動旅遊行程，也因個人家庭負擔無法持續投入而中止。她也坦言，居民對於彩繪雖然有興趣，頂多只是整理家門口，避免被遊客「笑」，但這種基於「被觀看」而產生的維護行為，難以構成長期的社區參與動力。

除了地方參與的減弱，社造幹部之間的能量與關係也出現裂縫。蔡心娜村長表示，雖然當初她與蔡瑞泉、蔡茂昌兩位一同努力推動社造，但「做久了心也會變」(田野錄音，蔡心娜，2025/01/09)，蔡瑞泉總幹事後來將心力集中於廟務，理事長也轉由其妻接任；蔡茂昌執行長長期不在當地，提出的計畫也無法順利執行。她自身也因擔任村長與照顧家人分身乏術，難以全心投入社區事務。

除了現實的時間與人力限制，蔡心娜村長也提到社造工作的「吃力不討好」。她談到有一次某社造幹部因被社區居民質疑「辦活動是不是又賺了多少錢」而情緒激動，差點發生肢體衝突。蔡心娜村長說起這段時幾乎停下手邊事務，臉上滿是無奈與感嘆。她亦直言：「雖然有彩繪是不錯啦，但一直都沒有人要出來扛這個位置，怎麼會有向心力。」(田野錄音，蔡心娜，2025/01/09)筆者在場時明顯感受到她語氣中的疲憊，那不只是對一項社區工作的失望，更是一種對茆子寮居民反饋感到心酸的肺腑之言。

當地方對未來的想像漸趨模糊、居民日常回歸沉靜，社造幹部的人力與情感也逐漸耗損，茆子寮社區便進入一段難以言說的凝滯時期。這不是因為地方毫無潛能或居民缺乏意願，而是當外部條件逐一抽離，內部關係無法再支撐整體動能時，社造實踐便也逐漸失去能量。

綜觀箔子寮彩繪藝術村的當下景況，其「退潮」既非單一事件所致，也無法簡化為某種地方「失敗」的結果。相反地，我們應將其視為一段地方動能變化的複雜歷程。在政策資源逐漸抽離、觀光動線難以延續的條件下，藝術村作為地方想像的承載體，也逐步失去其原有的吸引力與實踐動能。與此同時，原先因彩繪熱潮而聚合起來的居民參與與社造關係，亦隨著想像的斷裂與組織能量的消耗而出現鬆動與疲乏。

## 七、結論：承載想像的藝術社造

在前述彩繪藝術村的民族誌書寫中，筆者描繪了箔子寮藝術社造的歷程，以及在彩繪浪潮翻湧起伏之間逐漸浮現的社區想像。本文最後將回到問題意識——「藝術社造如何重構地方想像」，從「想像」與「社造」兩個面向出發，與理論文獻對話，分別討論彩繪藝術介入下所形構的社區想像主體，以及藝術社造所引發的社造動能起伏。最後，將以本文的浪潮意象詮釋為全文總結。

### （一）藝術介入社區的想像重構

以下，筆者將綜整箔子寮彩繪藝術村從緣起到建成的民族誌內容，並與當前的藝術介入、社區營造及想像主體理論研究對話，試圖詮釋箔子寮社區想像主體如何在藝術介入下逐步形塑。

首先，「彩繪藝術」如何作為「外來觸媒」滲入社造領導人對於地方之想像？在第四節中，在四湖鄉長的規劃下，蔡瑞泉總幹事、蔡心娜村長及村長父親前往好美里進行彩繪觀光考察，了解到彩繪如何與地方風土文化連結，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促進觀光經濟的可能。

張晴文（2020）將「藝術介入」表述為一種「由外而內」的藝術實踐行動。吳瑪俐（2007）則提出臺灣文化政策時常將「藝術介入」視為治理工具，作為地方觀光與社區營造的執行手段。筆者認為，雲嘉南風管處自 2015 年以來在雲嘉南沿海一帶所推行之彩繪藝術村計劃，包含在觀光上帶動風潮的「好美里海洋 3D 海洋世界戶外美術館」，及後續之「馬沙溝 3D 彩繪村」、「箔子寮喔熊藝術村」等，便是以「彩繪藝術」作為手法以達成「藝術介入」的社造行動。在過往「藝術介入」的研究中，多以藝術家或文化政策角度理解其運作模式，卻忽略社區與地方居民如何理解作為「外來者」的藝術。而地方如何去轉化社區總體營造與其



推展媒介之論述，恰恰是臺灣社造研究中所側重的，如黃宣衛（2022）在《成為池上》一書中談及大坡池居民藉由身體實作轉譯社造與環保的公共論述，可能形成「邊做邊改的在地美學效應」（黃宣衛 2022：110）。

而自訪談中可以發現，此趟考察不僅僅只是箔子寮接下彩繪藝術村計劃的契機，兩位社造領導人在考察時，所受到曾老師彩繪作品吸引，感受到有別於先前觀看彩繪作品之表現形式（3D 彩繪）以及深嵌在地方脈絡當中的藝術設計元素所能帶來的社造新可能，實則亦影響了其想像箔子寮能如何發展的地方未來。

接著，「當地居民」如何接納作為外來觸媒的「彩繪藝術」、如何將「彩繪藝術」納入對於社區的想像並投身實踐？

在第五節中，筆者爬梳箔子寮彩繪物質化過程的兩階段——「彩繪主題與表現形式」及「彩繪工程執行」。從彩繪形塑的物質化步驟出發，關注藝術團隊、社造領導人與地方居民三方如何在不同物質化課題上衝突、協商與合作。

楊弘任（2011）提出臺灣社造運動的重要基礎為小尺度村落中——血緣、地緣、祭祀圈所構成的明確邊界與歸屬感，而形成在地性認同的邊界，同時也將「在地」與「外來」劃分開來，兩方各有其實作邏輯。而社造運動便是在「邊界維繫」與「社會改革」的雙重行動下開展（楊弘任 2011）。筆者認為，從彩繪主題中內蘊地方人神關係的雕塑、經社造領導人協調而化解的衝突，或工程階段中居民的實作投入，都能看見箔子寮彩繪的物質化過程實則呈現了原先作為「外來」的藝術團隊與「在地」居民所各自具有的實作邏輯，如何透過社造領導人的橋接與協調逐漸彌合。

最後，「彩繪藝術」如何作為想像媒介，並形塑社區的想像主體？這要回到第五節中，地方居民觀看藝術團隊彩繪過程的日常。彩繪藝術作為媒介所引發的「觀看」經驗，並非只是曇花一現的感動，而是一種地方日常被重新聚焦的過程。彩繪工程的介入，使原本稀鬆平常的街角牆面、熟悉到幾乎透明的社區風景，被彩繪藝術渲染出新的可能。如此的觀看經驗，也使得居民逐漸意識到自己身處的社區正在轉變，對於福建熱炒老闆娘而言，原本稀鬆平常的鄉村風景，在彩繪介入後竟能吸引外人駐足，不僅打破箔子寮「不是藝術之地」的認知，也開啟了她對地方潛力的重新思索與投射。正如 Gell（1998）所言，藝術物不僅是表象的呈現，更是社會關係的仲介者。彩繪作為能動的藝術媒介，不僅引導居民重新觀看地方，更促成他們在觀看中參與了對地方的再定義與想像重構。

正如林瑋嬪（2023）所指出，地方主體的形成與想像的建構，往往因新技術或媒介的介入而得以開展。彩繪藝術不僅是介入社區的改革手法，更作為一種感知的技術與想像的觸媒，使地方居民得以在觀看與互動中，重新思索自身與所在之地的可能。同時，如 Moore（2011）所言，媒介所開啟的並非單向的感知輸出，

而是超越個體、激發集體情感與未來想像的生成機制。曾進成老師與彩墨軒的彩繪藝術實踐，以及其所帶來的嶄新想像，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中，成為地方重新認識自我、重構想像的重要媒介。

而彩繪藝術所帶來的新社造動能也說明想像主體形塑不僅體現於地景轉變，更深刻地表現在居民逐步主動參與導覽、美化環境、迎接遊客等行動中。社造領導人擔任導覽角色，不只作為藝術團隊與當地居民的中介角色，更成為彩繪藝術社造的敘說者；而自行整修門面、維護牆面彩繪等行動，也展現了居民對社區想像的肯認與投入。他們不只是被動接受彩繪藝術社造的社區居民，而是成為共同形塑社區想像主體的行動者。

## （二）社造動能的消退

從第三節所敘述的三位社造領導人經歷可見，茆子寮藝術社造之所以得以起步，乃是仰賴三位返鄉後持續耕耘地方事務的重要推手們，於地方組織、資源協調與公共溝通中不斷斡旋。他們不僅促成社區與政府、藝術團隊的連結，也成為引領居民參與的關鍵中介。然而，正如蔡心娜村長在訪談中所提及，當外部資源逐漸抽離、居民參與動能減退，過往那段齊心協力的社造經歷，也逐步轉為難以延續的回憶。本節將回顧茆子寮藝術社造的歷程，追溯社造能量消退的軌跡，並探討此一困境背後所蘊含的社造邏輯與潛在可能。

回望茆子寮藝術社造的發展歷程，當藝術進入茆子寮，在政策、資源與地方組織的共同推動下，社區不僅迎來了物質空間的轉化，也形塑出一種嶄新的地方想像。無論是導覽活動的展開、居民自發進行環境美化，皆可視為藝術社造所激發的地方動能具體表現。這股潮湧不僅促成了社區想像的重構，也使社造動能得以在藝術社造的實踐中逐漸升高。然而，這股動能並未恆常持續。隨著計畫期程的推進與政策焦點的轉移，彩繪藝術村逐步面臨資源撤離、觀光熱潮消退與居民參與流失的多重挑戰。原本因彩繪工程而形成的社造凝聚力，開始因未來想像的斷裂與組織能量的衰退而逐漸散去。

此一現象亦呼應呂欣怡（2014）對社造邏輯的觀察。她指出，當社造行動進入文化產業與觀光化的實作場域時，往往需在「道德秩序」（如社群價值、在地認同）與「市場秩序」（如觀光導向、經濟效益）之間來回斡旋。一旦兩者無法妥善調和，便易於導致內部矛盾與組織衝突，最終演變為「組織人事的更迭與衝突」（呂欣怡 2014：278）。茆子寮的案例中，無論是彩繪觀光效益的遞減、維護資源的斷裂，或是居民與社造幹部間協作關係的消耗與流失，皆可視為此一秩序張力的具體反映。

然而，退潮不代表結束。從潮起的動能匯聚，到退潮時的協作疲乏，其間所牽動的，是一種關於未來可能性的集體想像如何被建構、承載，最終又如何能在現實條件下遭遇張力與轉折的過程。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跳脫成功與失敗的二分敘事，重新思考社區營造作為想像主體所蘊含的動態性質。筆者亦主張，藝術社造所留下的不只是物理空間上的彩繪，更推動了社區內部的參與動能與關係網絡。無論是彩繪工程的投入、導覽員培訓，或居民自行美化門面、維持環境整潔，皆展現出藝術介入所牽動的社造實踐不僅限於藝術本身，而是延伸至社區內人與人的互助與共同實踐。而這些建立起的社區網絡，也為日後如大專營隊、其他社區活動提供了可動員的基礎。即使藝術社造無法為箔子寮社區帶來市場效益，其所激盪出的想像與經驗仍可能殘留於居民的記憶與地方物質場景之中，成為未來再啟地方實踐的潛在資源。

### （三）結語：社造之浪

離開田野的前一天傍晚，筆者同夥伴去到箔子寮漁港觀賞落日海景。坐在海邊的堤防上，望著晚風揚起被夕陽染紅的浪，波光粼粼的翻騰湧動著，直到撞上岸邊的消波塊，化為白沫再歸於海面，只留下沿岸被海水被侵蝕的刻印。回望田野的十二天，筆者從不同報導人的訪談中，追溯彩繪藝術在箔子寮曾翻湧的浪潮；也從對藝術社造的物質觀察，發掘彩繪藝術在箔子寮留下的痕跡。

本文中，筆者試圖以社造領導人及當地居民視角回顧箔子寮藝術社造的發展歷程，並以「藝術介入」、「物質化過程」與「想像主體」等分析概念，詮釋彩繪藝術如何介入箔子寮的社區營造，重構當地居民對於社區的想像，引發社造動能的起伏。受限於有限的田野時間與資料，本文僅針對箔子寮的「藝術」社造進行討論，並未討論箔子寮社區於 2018 至 2021 年間所舉辦的多項社區營造企劃與活動，如長青食堂、大專院校體驗營等。在研究面向上也有諸多未竟之處，如未能完整描繪藝術進駐前後不同居民世代的想像差異，或以藝術團隊視角討論箔子寮的藝術社造歷程。

然而，回顧當前學界之藝術社造研究以觀光經濟、地方治理與藝術家視角為主流，筆者嘗試提出一種從當地居民角度出發，將藝術社造視為動態過程的理解方式。如呂欣怡（2007）提出——社區總是「正在變成」（in becoming）但未完成的社會主體；亦如陳其南（2011）所述——社會是一個流動的過程，無法被凍結

或固定<sup>7</sup>。筆者認為茆子寮藝術社造的歷程——想像主體之形塑與社造動能之起伏，實則呈現了社區營造的動態過程。

正如蔡瑞泉總幹事所說：

「當時曾老師來，也算是給地方打開一些希望，不然怎麼會有人來看」  
(田野錄音，蔡瑞泉，2025/01/14)。

如浪亦如潮，那場由彩繪激起的浪湧，或許未能長久維繫，但其曾捲動的想像和希望，仍在茆子寮社區的記憶與地景中潛伏，等待未來某次風起，再次掀波。

## 參考文獻

Bennett, Jane

2001 *The Enchantment of Modern Life: Attachments, Crossings, and Eth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urriaud, Nicolas

2002 *Relational Aesthetics*. Paris: Les Presses du Reel.

Google Maps

2025 茆子寮喔熊藝術村 <https://maps.app.goo.gl/NEy8RAGLF9UMJsrV6>,  
accessed May 13, 2025.

Google Earth

2025 茆子寮喔熊藝術村彩繪地圖  
[https://earth.google.com/web/@23.62868144,120.15137596,2.34792734a,559.68655045d,35y,-67.42133518h,49.54458343t,0r/data=CgRCAggBMikKJwolCiExdnBBM293Y0RTN2hxTGswTWJCSXIYNmU4VHJNOWJhaUEgAToDCgEwQgIIAEoICKj\\_y9gBEAE](https://earth.google.com/web/@23.62868144,120.15137596,2.34792734a,559.68655045d,35y,-67.42133518h,49.54458343t,0r/data=CgRCAggBMikKJwolCiExdnBBM293Y0RTN2hxTGswTWJCSXIYNmU4VHJNOWJhaUEgAToDCgEwQgIIAEoICKj_y9gBEAE), accessed June 14, 2025.

---

<sup>7</sup> 此為呂欣怡(2014)〈地方文化的再創造：從社區總體營造到社區文化產業〉263頁所提，陳其南先生於2011/11/19「重讀台灣：人類學的視野」研討會中針對〈地方文化的再創造：從社區總體營造到社區文化產業〉一文之口頭評論。

Gell, Alfred

- 1992 The Technology of Enchantment and the Enchantment of Technology. In Anthropology, Art and Aesthetics. Jeremy Coote and Anthony Shelton, eds. Pp. 40-6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98 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 1999 The Art of Anthropology: Essays and Diagrams. E. Hirsch, ed. London: Athlone.

Miller, Daniel

- 1987 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 Oxford: Blackwell.

Moore, Henrietta L

- 2011 Still Life: Hopes, Desires and Satisfaction. London: Polity Press.

Sahlins, Marshall

- 2000 Cosmologies of Capitalism: The Trans-Pacific Sector of "The World System". In Culture in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Pp. 415-469. New York, NY: Zone Books.

文化建設委員會

- 1999 《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新北：文化部。

王靜儀

- 2010 〈從社區發展到社區營造：臺中縣的個案研究（1965~2005）〉。刊於《臺灣文獻》，61（4）：299 - 326。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四湖鄉公所

- 2016 〈箔子寮 3D 彩繪 打造社區新亮點〉。《四湖鄉情》，1：3。
- 2018 〈箔子寮好神氣 3D 藝術彩繪〉。《四湖鄉情》，5：14。

交通部觀光局

- 2015 《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105-108 年)》。「觀光署行政資訊網」，<https://admin.taiwan.net.tw/swcoast-nsa/BusinessInfoSwcoast/Articles?a=6725>，2023 年 12 月 8 日上線。

吳瑪俐

- 2007 《藝術與公共領域：藝術進入社區》。臺北：遠流出版。

呂欣怡

- 2014 〈地方文化的再創造：從社區總體營造到社區文化產業〉。刊於《重讀台灣：人類學的視野》，林淑蓉、陳中民編，頁 253-290，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林瑋嬪

- 2018 《媒介宗教：音樂、影像、物與新媒體》。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2023 《島嶼幻想曲：戰地馬祖的想像主體與未來》。臺北：春山出版。

林瑋嬪與黃克先

- 2022 《氛圍的感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陳泓易

- 2011 〈藝術介入空間或者空間介入藝術〉。《藝術觀點》45：4。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 2008 《在地美學實踐社區 VS.藝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張晴文

- 2011 〈1990 年代以降台灣文化政策的「公共性」——以公共藝術政策為中心〉。博士論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
- 2020 〈「藝術介入」的意涵與在地脈絡〉。刊於《清華藝術學報》，國立清華大學藝術學院編，2：37-62。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藝術學院。

曾少千

- 2008 〈空間故事與美學之用：寶藏巖泡茶照相館〉。《現代美術學報》15：11-38。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

曾進成彩墨軒工作室

- 2018 〈新秘境！〉。「曾進成彩墨軒工作室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FEWGD1jSV/>，2018 年 9 月 22  
號上線。

箔東社區發展協會

- 2024 〈雲林縣四湖鄉箔東村社區簡述〉。「文化部臺灣社區通」，  
<https://communitytaiwan.moc.gov.tw/Villages/CommunityFind/CommunityInfo/?vID=45970A3C-F19E-460C-ADFE-795AC418354B&vM=7330D634-938C-4E7E-8879-2EDE90178DA0>，  
2024 年 11 月 23 號取用。

華叡民、蔡嘉軒與江冠瑩

- 2024 《何以擺脫無未來？海洋教育與社區發展的能與不能——以箔子寮  
和三條崙為例》。刊於《風頭水尾——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  
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人類學系編，頁  
360-394。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2024 a. 〈好美里 3D 海洋世界戶外美術館〉。「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https://www.swcoast-nsa.gov.tw/zh-  
tw/attraction/details/492](https://www.swcoast-nsa.gov.tw/zh-tw/attraction/details/492)，2024 年 5 月 30 號上線。
- 2024 b. 〈馬沙溝 3D 彩繪村〉。「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https://www.swcoast-nsa.gov.tw/zh-tw/attraction/details/517>，2024 年 8  
月 27 號上線。
- 2024 c. 〈箔子寮「喔熊藝術村」〉。「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https://www.swcoast-nsa.gov.tw/zh-tw/attraction/details/518>，2024 年 8  
月 28 號上線。

馮莎、張志培

- 2024 〈「當代藝術的民族誌轉向」？藝術介入社會的實踐及其理論〉。  
《臺灣人類學刊》22（1）：165-208。

黃宣衛

- 2022 《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新北市：左岸出版社。

楊弘任

- 2011 〈何謂在地性？：從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出發〉。《思與言》49(4)：5-29。臺北：思與言人文社會學社。

蔡念澄

- 2019 〈Kayakay（搭橋的人）：比西里岸部落觀光與文化復振的民族誌〉。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蔡榕娣

- 2010 〈空間、記憶與民眾的溝通橋樑——關於文建會「藝術介入空間」計畫〉。《藝術家》424：142-145。臺北：藝術家雜誌社。

蔡耀陞、何昀瑄

- 2024 《「也要神，也要人」：神人的地域關係與民間信仰變遷後宮廟再中心化的神人想像——以箔子寮普天宮祭祀圈為例》。刊於《風頭水尾——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人類學系編，頁 113-163。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顏新訓

- 2018 《探討彩繪對社區之影響－以布袋鎮好美里為例》。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回來的人：四湖沿海的地方發展軌跡<sup>1</sup>

張瑜真（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方宇祥（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周哲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五年級）

### 摘要

本文探討雲林縣四湖鄉沿海（主要聚焦於箔子寮、三條崙、林厝寮）面臨人口老化、青年外流等問題下，透過參與觀察及訪談法捕捉在地居民參與地方發展事務的行動歷程，並分析這些行動者的個人生命經驗如何影響他們選擇的地方發展模式，以及進一步影響他們如何談論地方。嘗試論證他們的個人生命經驗形塑了地方發展的實踐樣貌，且地方發展所承載且試圖執行的異質論述，經由實踐作為而豐富了「在地敘事」的內涵，呈現了參與者對切身關心的土地的記憶、經驗、認同、想像或情感。我們運用 Tim Cresswell 的社會建構論與 Doreen Massey 的動態地方觀點，探討前述行動者的個人生命經驗與地方發展的論述規劃、具體實踐，及在地敘事，皆深刻影響著地方的形塑，呈現四湖鄉沿海所具有的多元樣貌為動態、非同質化的存在，也被各種社會關係所建構與再生產。

關鍵詞：四湖沿海、社區營造、地方創生、地方的社會建構、論述與敘事

---

<sup>1</sup> 本文的完成，首要感謝箔子寮居民的照顧，也謝謝黃郁茜老師與盧佳秀、郭天祐助教的指導與帶領。感謝箔子寮居民蔡茂昌大哥、蔡茂源大哥、蔡心娜女士、黃梓鉸先生、黃正鎮先生、蔡瑞泉先生、蔡文進先生、周招伶女士、蔡英地先生，與吳雙喜先生、王柏惟先生、吳志勇先生、林煌智先生等人的熱情招待與協助，也再次感謝田野期間每位居民對我們的關照。特別感謝涂峻清學長對於本文的評論和建議，惟文責由作者自負。另外也謝謝箔子寮可愛的阿黃，整趟田野日日陪伴我們。

## 一、前言

位於箔子寮村子中心、普天宮前方的一塊廣場，是 2019 年那一波社區營造而出現的「彩虹廣場」。廣場旁的店家呈兩側對稱排列，鮮豔多彩的招牌，除了如其名地有各種顏色妝點，也盡力展現著各自店家特色，在灰白色調的村子裡格外顯眼。我們在箔子寮的兩週，最常拜訪廣場一側的無名早餐店。早餐店的招牌僅寫著「早餐」，一旁以花朵的圖像點綴。



圖一、無名早餐店招牌  
(周哲瑋攝)

某日早晨，我們和老闆娘聊起她的過往，無意間得知她並非本地人，在箔子寮卻已經待了三十餘年。老闆娘說當年來這裡做生意時，箔子寮非常熱鬧，談起當時的熱鬧盛況不免感嘆。這三十年間，因為各種產業結構的轉變，以及人口外移、村內長輩逝世等等，現在村裡常住居民寥寥無幾，偶有一批觀光遊覽車團到訪，但很快便離去。老闆娘從最初的貨車開始經營，到現在轉移至廣場上的店面，顯見曾經有過的一段盛況。我們刻意問起店面上方的招牌，老闆娘表示招牌有點小、沒有名字，有些可惜，不容易讓人注意到。她提到曾經有位客人天天上班路過此地，卻不知道這一排商店中有賣早餐，直到和同事聊起早餐店才發現。而在廣場另一端的彩繪村，屬於箔子寮社區營造中最顯著的建設，然而老闆娘表示自己時常忙於工作，對店門口對面的「社區營造」藝術沒什麼關心，但就她所見沒什麼人來，更反問我們對彩繪村的看法。

如同上述與早餐店老闆娘的對談，村內不少人對「社區營造」有類似的想法。有些人認為平時不容易注意到，有些人表示對觀光、經濟效益沒有太大幫助。這便是我們在田野調查時發現的矛盾之處：箔子寮的社區營造曾經有過一段蓬勃發

展的時期，集結村內各式人力、人才協力打造理想的社區；然而因為社會產業結構與人口的轉變，村內的人口組成與收入來源也隨之起伏變動，致使村民們面臨了更龐大、複雜的問題。政府推行下的「社區營造」逐漸衰微、無力，在此已無法解決這類問題，需要朝向穩固經濟基礎、人才培育等方向，才可能在當前困境下有所突破。而 2017 年左右湧現的一批青年返鄉浪潮，則為四湖沿海一帶的地方發展注入了新動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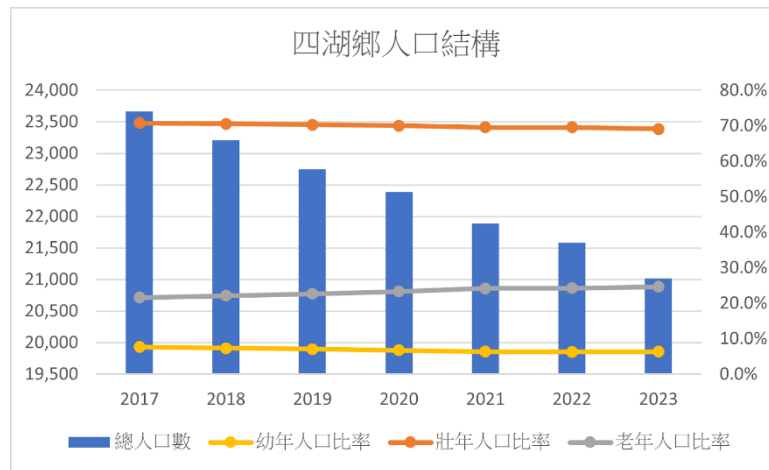
在箔子寮村內屬於年輕一代的善水咖啡老闆，以及由箔子寮沿著海線一路往北的三條崙、林厝寮，則出現了荒涼騎驛咖啡、海味蒜的林煌智等返鄉青年，在近五到十年內回到了家鄉發展事業。我們觀察到這群人在家鄉或外地發展事業之餘，也有意投入於家鄉的地方發展，例如幫助地方的農民突破當前市場困境，也藉由自營的咖啡館空間，與社區居民、其他返鄉者連結，構成了綿密交織的人際網絡。

四湖鄉多樣的地方發展圖像，引起我們探究本地人離鄉與回鄉經驗的興趣，以及他們又如何重新聚集在這裡，共同合作實踐、突破地方發展的困境。本文嘗試以 Cresswell (2006[2004]) 的社會建構論立場理解四湖沿海地區，不同的行動者（從事社區營造者、自營推動地方事務者）如何透過他們所採取的行動模式理解地方、論述地方；以及不同模式與各個行動者之間，存在對地方什麼樣的實踐與論述差異，而這些差異如何建構對地方更動態的認識。換言之，本文意圖探討四湖鄉沿海的各村落，如何透過不同的行動者，建構出多重的「地方」樣貌與想像。同時，也以 Massey (1994) 重新定義的地方性質，討論四湖沿海此地，從事地方發展者如何透過其「離鄉」與「回鄉」與個人生命經驗，建構他們心中的「地方」。

綜上所述，本文試圖回答以下問題：四湖沿海（箔子寮、三條崙、林厝寮）參與地方發展事務者的個人生命經驗，如何影響其所選擇的地方發展模式（社區營造、自營推動）？其所踐行的地方發展模式，又如何影響他們談論地方？

## 二、田野地背景介紹

雲林縣四湖鄉是位於臺灣西南沿海的鄉鎮。據雲林縣政府統計資訊網(2023)資料顯示，近七年來，四湖鄉的人口持續減少，直至 2023 年，已減少至約兩萬一千人。此外，此地老年人口比率也逐年增長，2023 年已來到 24.6%，逼近超高齡社會的 25% 門檻，壯年與幼年人口比率則連年下降。圖一結合了兩項數據，呈現四湖鄉除人口流失嚴重外，也正面臨人口老化的現象。在〈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所列的優先推動地區清單中，我們也發現四湖鄉屬於農山漁村一類，以僅有約兩萬三千名的人口數名列其中（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9：18）。



圖二、四湖鄉人口結構圖（周哲瑋製）  
（資料來源：雲林縣政府統計資訊網）

劉曜華主編（2006：242）將四湖鄉人口逐年遞減的歸因於未開發工業區，能容納的就業人口有限，學子畢業後須前往外地謀生。本文的田野地箔子寮、三條崙與林厝寮，在華叡民、蔡嘉軒、江冠瑩（2024：363）文中，說明箔子寮與三條崙地處臺灣西南沿海，因地利之便適合發展漁業與養殖漁業，兩處皆曾因養蚵、烏魚產業興盛而繁榮，惟箔子寮與三條崙漁港近年淤積日益嚴重，難以回復往日榮景。三條崙地區在日治時期曾有中南部最大的海水浴場，但後來也因缺乏管理而沒落。

即使人口成長的前景嚴峻，四湖鄉在第一級產業方面仍有亮眼的表現。當地海風強勁，適合種蒜，2023 年全台蒜頭產量共計 49841 公噸，光是雲林縣就出產 47267 公噸，其中四湖鄉更貢獻了 9968 公噸，是全國鄉鎮之最（農業部農糧署 2024）。相當於全臺灣每五顆蒜頭，就有一顆來自四湖鄉，穩居隱形冠軍寶座。此外，四湖的畜牧業也不容小覷，當地不僅養雞、鵝等家禽，還養豬。僅僅是三條崙地區中的崙北村，就有 26 間養豬場，在四湖鄉登記立案的 110 間養豬場中，佔比逾 20%，可見養豬業在三條崙——尤其是崙北村——相當盛行（劉曜華主編 2006：183-186）。

### 三、文獻回顧

此節旨在針對我們預計採用的理論框架和相關地方發展的政策緣起作一簡要的文獻回顧，包括人文地理學者如何理論化「地方」這個概念，及社區營造和地方創生的官方政策論述，與針對地方發展的學術研究，如何使用「論述」與「敘事」兩個語彙，來分析研究現象。

## （一）「地方」的形塑

「地方」(place) 是人文地理學者研究的重要基本概念，其指涉除了物理的空間範圍外，更涵蓋了人與空間環境的關係，尤其是人對地方的情感與記憶等等。在當今複雜且高速變動的時代，人文地理學賦予「地方」容納變動性的可能。Doreen Massey (1994) 針對全球化下時空壓縮的現象，拓展了「地方」的內涵。她除了批判「地方」與「社群」(community) 的同一性質外，也提出了幾個進步地方可以參考的核心論點：(一)「地方」並非靜止的，而是動態的「過程」。(二)「地方」不必透過與外界劃定邊界來定義自身；反之，「外界」與地方相連，是構成地方的一部分。(三) 地方沒有單一、獨特的「認同」，其內部存在著認同的衝突。(四) 地方的特殊性並非來自其內在的歷史，而是藉由不同尺度交會而成的社會關係所形成，並且會不斷再生產。

Tim Cresswell (2006[2004]) 在《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一書中，討論了不同人文地理學者界定「地方」如何存在：David Harvey (1996) 主張「地方」是經由多重的社會過程所建構，Cresswell 進一步解釋其建構內涵包括意義與物質性 (materiality)，即人們如何經驗地方、賦予地方意義，乃至於所有物質性的環境建築、景觀、植栽等等；然而 Robert Sack (1997) 和 J. E. Malpas (1999) 秉持不同的觀點，他們認為「地方」並非社會所建構，而是先於意義與社會建構，已然存有的一切根基，Malpas 甚至進一步點出社會需要「地方」才能呈現與形成 (轉引自 Cresswell 2006[2004])。Cresswell 批判持「存有」觀點的論述，認為該理論僅停留在想像階段，難以套用到實際案例解釋，甚至無法解釋地方週期性的社會動盪。

在此，本文並不會深入討論建構論與存有論觀點間的差異與內涵，但是會以 Cresswell 最後所總結的論點來進一步討論。Cresswell 的立場則偏向社會建構論，他認為「地方」與人類共同存在，亦即人類的生存必要，「地方」必定會被建構，但是他擴大社會建構論的內涵，含括了一切早已存在，以及從地方衍生而成的事物。

針對 Cresswell 社會建構論的爬梳，將使我們的研究強調「地方」在建構過程的多元性與動態性。箔子寮或四湖沿海或許能不單從田野地背景介紹所勾勒的，人口發展和產業脈絡等內部歷史來理解，而關乎近些年來地方發展的實踐經歷，尤其這些實踐可能產製地方的不同樣貌或想像。本文即除了回應問題意識之外，試圖以地方發展實踐者的「在地敘事」生成過程來說明這一點。於後文分析會揭示，該過程係涉及每個參與者的生命經驗、地方發展的論述、執行論述的實踐作為，這些最終導致了對地方的新敘事，有別於四湖沿海的既存面貌。

## (二) 社區營造

臺灣的社區營造（以下簡稱社造）已邁入第三個十年，從 1994 年社區總體營造政策、2002 年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一期計畫、2008 年新故鄉社區營造暨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再到 2016 年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2022 年啟動社區營造四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社區營造從文建會的政策、擴大到其他政府部門、變成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甚至擴大參與主題（李晏佐 2023：31）。簡言之，社造旨在促成區域均衡發展，並透過由下而上的公民參與來凝聚社區意識，發揮在地活力與深耕文化的同時，以回應社會的快速變遷（周芳怡 2024：48）。

然而官方所推行的、遍及全臺各地的社造並非突然冒出，實關乎不少國家視角下的政經環境變革，且更早期的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社區發展工作等，即開始塑造國家政策與社區動員兩者之間的對話關係。社造所重拾的「社區」一概念，涉及國家因應外交困境、政黨競爭跟社運風潮的發展論述，尤其是藉生命共同體的文化意義型態以回應民間，及透過行政分配，在社區議題取得霸權，建構新國家的文化主調（黃麗玲 1995）。黃麗玲（1995）注意到文建會於社造剛起步時所援引「社區」一詞，訴諸了怎樣的社區共同體論述，並藉此與時任李登輝總統處理民間對公部門失望下提出的生命共同體相呼應，建立一種人民同質化的民主圖像。

回到作為田野地的箔子寮，當地社造行動者的軌跡大致是從 2015、2016 年開始，到 2022 年都有在「做社區」，所以此處梳理四湖沿海發展時經歷的國家社造計畫，以社區營造三／四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為主。賴柄樹（2022）梳理了該階段的計畫目標與各種政策特徵，此處僅呈現與我們田野地相關的部份。以第三期（2016-2021）為例，目標上是擴大藝文扎根、均衡城鄉發展、分層輔導培力以強化行政動能，想應對的現實問題以文化權利意識的崛起、高齡少子化、青年對未來的憂慮、城鄉發展失衡為主，核心關懷為地方的認同與光榮感、強調在地性的自發集體行動，計畫預算來源由主管單位——行政院文化部專款補助，議題種類涵蓋人、文、地、產、景五大類，行動範圍是鄰、里或社區，由個人或社區單位來提案，主要偏重第一、三部門的執行，較少培力鄉鎮區公所，較忽略企業力量（賴柄樹 2022：96-99）。至於第四期（2022-2027）的階段，周芳怡（2024）立基於政府以社區為場域來應對社會環境變遷，整理了該時期社造政策所欲解決的問題、政策系絡並政策工具，除深化民主治理並擴大公民參與的努力外，計畫往社會改造的目標執行，採取許多跨社區界線的行動，如作為子項目的社造跨界共創計畫，且從上而下和從下而上的線性關係開始轉變為網絡式的互動參與。需提及的是，田野地報導人口中的社造經驗，主要是第三期下的實踐。第四期的時間雖貼合了田野地的社造進程，但相關政策特點，除箔子寮城鄉發展協會產生跨社區協作的效應之外，在田野地較未觀察到。

縱使從上而下宏觀地審視臺灣社造隱含的國族論述整編，或許得發現其對各地社造的發展方向產生影響。但考慮到研究範圍所關注到的社造實限定於箔子寮一帶，我們對此處社造的民族誌敘事，更著墨於具體施為者的微觀實踐經驗和如何談論自己的行動，與其對「社區」的期許及看法。

另外，正是對田野地社造的關注，尤其是參與社造的報導人在論及箔子寮時，有時以「社區」代稱，又時而講述為這個「地方」，使得我們需回過頭來梳理「社區」的意義指涉，特別是「社區」與「地方」兩詞彙的關鍵性差異。黃麗玲（1995）強調 1994 年開始的社區總體營造，文建會<sup>2</sup>所指「社區」一詞，非單純的空間地域單位，而是有其社群或共同體的內涵，是一群有社會共識的社會單位。而呂欣怡（2014）則點出，「社區」一詞從 1960 年代的聯合國發展方案而引進臺灣地方社會，經過不少中介者的引介與轉譯，得以在地方文化邏輯成為有意義的概念。因此社造或社區發展的觸媒往往位於官定社區的地域界限之外，且社區的想像或內涵實有賴外來者與在地人士的共構，社造所發揚的地方認同實涉及了國家話語及專業知識相互建構的動態系統（呂欣怡 2014：255-256）。由此觀之，社造進行中的「社區」，其意義非僅指地理上的空間，且意涵的來源有著不同尺度的多元性，既有關一群有著集體社會意識的人，也受到相關國家政策行動者的影響。而田野中報導人時常提到「做社區」，也會談論箔子寮這個「地方」，但往往重疊行政的劃分。且我們的研究主題及問題意識論及地方發展一詞，但同時指涉社造與自營推動兩種，後者不一定使用「社區」一詞。遂此，本研究所用「社區」與「地方」大抵是相同的概念，尤其是描述性地借指一定範圍的地理空間。針對報導者如何回應這些詞彙或表達了何種看法，會於後面的書寫進一步釐清。

### （三）地方創生

田野期間，我們除看到投入社造的「做社區」參與者，也見到數位選擇自營事業，同時嘗試推動地方發展，不以社造為主軸的其他人士。其中，至少有一位報導人認為自己正在從事的事務屬於地方創生，因此接下來我們將嘗試梳理地方創生是怎麼樣的地方發展模式、何以不同於社區營造。

「地方創生」一詞源於日本。面對二戰後歷經快速的工業化發展，為解決經濟高速成長導致的城鄉差距問題，日本政府提出地域性活化政策加以因應（李長晏 2020：19）。而「地方創生」正是在日本已有長足地方治理政策的脈絡下，設計出的新治理架構，始由安倍晉三政府作為正式政策推動，目的是解決人口減少且過度集中於東京的問題，與發展地域經濟（張正衡 2021：259-260）。李晏佐分析行政院國發會所列舉的政策目標與重點發展地區，認為臺灣的地方創生著

<sup>2</sup> 配合中央政府組織改造，2012 年改制為文化部。



重於非六都的中南部與東部地區，尤以經濟產業發展、獲利生財為主。指出我國政府藉人口轉型過程引入地方創生政策，惟不同於日本側重於減緩人口減少，更加看重區域均衡發展（2023：26-28）。由此，我們發現雖地方創生起源於日本，引進臺灣後因側重不同，而有自己的發展方向。

目前談論地方創生的書籍與資料，常是整理各地的地方創生發展案例，較少直接明確定義「何謂地方創生」。綜前所述，地方創生在日本與臺灣的興起有著相似的社會發展背景，不過因所處地點與施行目的不同，兩者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方向。是而本文聚焦地方創生在臺灣的政策形成脈絡，主要依據當時地方創生政策主要推手——時任國發會主委陳美伶於 2021 年出版的《美伶姐的台灣地方創生故事》一書，並結合其他成功案例，整理出地方創生在臺灣的實踐中，具備三大要素：鼓勵青壯年返鄉、發展地方產業、強調在地者主導參與。另外，陳美伶（2021：38）提及臺灣地方創生政策還有一重點：將科技導入地方創生，透過數位基礎建設彌平城鄉發展差異。此雖為臺灣版地方創生自行新增的特色，惟主要行動者是政府，不在本文討論範圍，故僅敘明而不展開論述。

首先，鼓勵青年返鄉，促進人口流動，以解決人口轉型過程中，年輕人口集中於都市，與城鄉發展不均衡的問題，是地方創生政策的一大主軸。臺灣的地方創生政策更將促進城市人口回鄉作為最大目的，故不以年輕人作為唯一目標，也鼓勵壯年返鄉（*ibid.*：37）。接著，陳美伶說明應發展地方產業的原因，引日本地方知名地方創生企業家木下齊認為「補助是毒藥」（*ibid.*：39），不能作為永續經營的解方，在地方發展產業、創造經濟誘因，才是從根本解決地方因工作機會不足而缺乏人口拉力的關鍵。臺灣版的地方創生正視地方的經濟因素，認為地方產業與資金投入須永續並存，近似於「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道理。實務上，國發會在獎勵投入地方創生的相關計畫中，仍無法避免提供補助與培力資源；不過，這些補助的目的並不在於長期金援地方，而是協助地方建立能永續發展、自行營利的地方產業。最後，地方創生旨在解決地方面臨的問題，由於沒有比在地者更認識地方問題，又熟悉該地特色、優劣勢的參與者，因此必得讓在地者主導參與，方能找到地方的主體性，並且讓地方特色極大化（*ibid.*：42、47）以利吸引投資，並將資源以最適切的方式用在刀口上。上述體現地方創生在解決城鄉人口失衡的大目標下，期望在地方建立永續的經濟產業，來吸引青壯年返鄉，三大要點一環緊扣一環。

地方創生在臺灣的實踐，與過往的社區營造政策不同。相較前文討論社造核心關懷為在地認同與光榮感，地方創生強調引入企業資源、發展地方特色產品與品牌（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9：4-5），「經濟」面向得到更多關注。由於政策目標是吸引青年返鄉，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9-10）也關注青年培力，透過提供諮詢與輔導機制，協助青年留鄉或返鄉發展地方創生事業。地方創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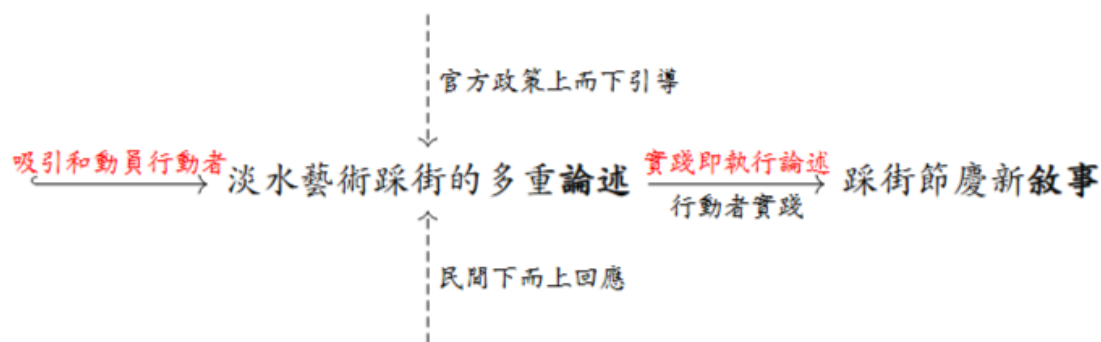
政策定位是國家總體戰略層級，並未成立專責部會，透過「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的形式，跨部會地整合資源，顯見其靈活彈性，也提倡網路治理(張皓鈞 2020)。

#### (四) 「論述」(discourse) 與「敘事」(narrative)

基於我們對地方發展從事者如何談論他們所關懷的「地方」，此處須梳理既有的關懷在地性的研究、社造研究和相關地方發展的討論中，學者怎麼使用「論述」(discourse)、「敘事」(narrative)兩種互相關聯語彙，去表達在地人士的策略、願景、實踐、地方故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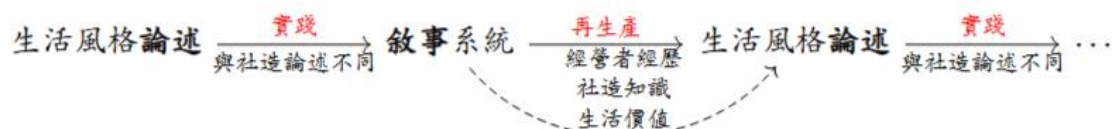
陳重成(2010)啟發自哲學家 Michel de Certeau，認可個體與他人對在地故事的情感分享，得建立集體意識，也讓個人在過去的歷史中找到定位和認同。且一個有意義的、具獨特性的地方，會有段令人迷戀且又回味無窮的在地敘事故事(local narrative)，述說斯民對斯土深刻動容的所有回憶與盼望(陳重成 2010: 55)。而本文試圖界定「敘事」一詞，來指涉地方發展的參與者們，藉著實踐作為而對地方的記憶、想像、情感、認同，這些即構成產生地方感的「在地敘事」故事。

關於「論述」(discourse)的定義，我們援引以下兩位學者的研究來思考。首先，關注臺中市市民組織爭取城市權的黃子倫(2016)，將不同城市運動者的策略論述、城市權利論述，到據以形成的開發下的抗爭，錨定為一種公共性的宣稱，且更為關注這些論述與地方的隔閡(市民沒有形成對城市的想像，或者持續參與政治性行動)，如何透過文化轉譯來克服，尤其是諸如社區發展協會的社區型組織，要在尋求經費和地方權利爭取上取得平衡，以回應地方公共性的訴求。而林建宇(2011)從文化治理的角度來審視淡水藝術踩街行動時，很好的區分出「論述」、行動、「敘事」彼此的關係。這個地方節慶的「論述」形成過程，涉及上而下的政策引導和民間下而上的回應，相關活動即是在執行「論述」，吸引和動員行動者的也是「論述」本身(林建宇 2011: 100-101)。且「論述」關乎權力運作的觀點，即節慶主導者和一處於權力邊陲的人如何協商資源的投入和活動的進行(ibid.: 30-31)。正是制定政策的官僚和地方人士形成出的多重「論述」和可能出現的衝突，透過實踐而生產出新的敘事(narrative)(ibid.: 12)。



圖三、淡水藝術踩街的論述與敘事（方宇祥製）<sup>3</sup>  
（資料來源：林建宇 2011）

但「論述」和「敘事」的區辨和形塑方式並非截然二分。研究重疊社造風潮的臺灣民宿發展的黃舒楣（2004），指出民宿主人建構出充實個人認同的生活論述，雖受制於旅遊發展的需求，但能夠詮釋地方意義，促成新的地方感。儘管和社造的「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論述有些目標上的不同，社造的工具和手段卻能成為民宿業者援引的資源（黃舒楣 2004：4）。甚至民宿經營和地方發展之間，要有社造過程才能互利共生，搭上政策潮流的同時，透過個人和地方的實踐，形塑了相比觀光生活化或文化產業化等論述口號不同的地方意義詮釋（ibid.：5）。具體而言，民宿業者的生活風格論述的生成，是來自於一個龐雜的敘事系統，一個充滿生活風格符號的經營者的故事，包括經歷歷程、社造知識的吸納、生活價值的判斷等（ibid.：115-123）。而這些地方敘事和所觸及的實踐作為，會回過頭來再生產論述，足見「論述」和「敘事」間交織的情景。



圖四、民宿業者的生活風格論述與敘事的關係（方宇祥製）<sup>4</sup>  
（資料來源：黃舒楣 2004）

從這些既有文獻的爬梳，加上我們關懷報導人的地方發展實踐怎麼影響他們談論地方的方式，後文篇幅會呈現地方發展「論述」的跡象，即號召各式參與者投身加入的公共性宣稱，或者地方發展實踐上的規劃與安排。另外也有實踐行動後所生發的表徵地方認同或情感歸屬的「在地敘事」，那些對發展成果的回憶、評價、對地方未來的想像與期待等。儘管前段文獻回顧已指出「論述」與「敘事」間交織及彼此形塑的可能性，但後續的分析上，對「論述」和「敘事」的區分使

<sup>3</sup> 該圖所指涉踩街節慶論述的幾個性質，諸如動員參與者、多重的來源，及實踐後產製敘事，感激黃郁茜老師在我們修改文稿時提點，讓我們得以釐清「論述」這一概念，並進一步參照後續我們所提的理論模型，謹致謝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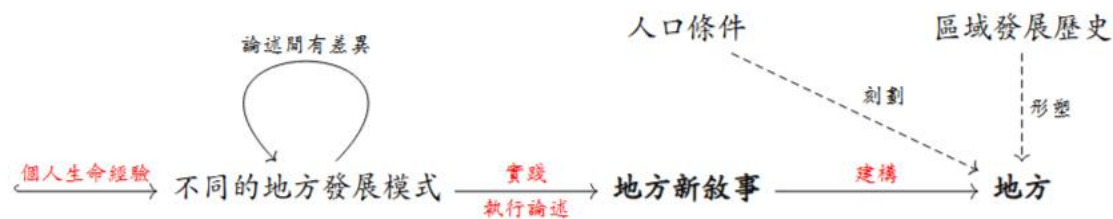
<sup>4</sup> 該圖呈現民宿業主的生活風格論述，其中「論述」來源的幾個面向，和「敘事」再生產「論述」的效果，感謝黃郁茜老師於本文編修時透過圖解的方式向我們說明，以利我們大致繪製該圖，謹致謝忱。

得我們會著重討論，發展論述間的不同在經由實踐後產生了如何的在地敘事（如前所提，實踐即是在執行論述），以從論述上的不同去適當回應並解釋「地方發展實踐影響報導人談論地方的方式」這一問題意識，即四湖沿海的執行各種「論述」的地方發展實踐，產製了怎樣的「在地新敘事」。

### （五）小結

在四個面向的文獻回顧中，社造與地方創生兩節，可發覺前者重視社區居民的公共參與，後者更帶入經濟面向的考量，並有助於青年留鄉或返鄉的目標。這些觀察將有助於為後續所描述之地方發展實踐提供背景資訊，據此挖掘出不論是推行社造事務的，還是貼近地方創生精神的地方發展人士的實踐重點和關心的事務，甚至是可能面臨的困境。至於另外兩節給予我們理論基礎及分析概念的文獻梳理，得讓我們思考四湖沿海這個地方並非靜止不變的，不能單單從人口概況或產業結構來理解，或許能以後文所重點呈現的地方發展實踐，來審視四湖沿海的地方建構和形塑。且之後民族誌材料所揭示的地方發展實踐，可觀察到報導人的行動規劃，和開始實踐之後而對地方的言說談論。正如前面所約定的，我們會界定報導人對地方發展的規劃安排為論述，行動後而對地方的認同、情感、記憶、未來的想像等為在地敘事。

簡言之，我們除了好奇地方發展人士的生命經驗，如何影響到他們所選擇的地方發展實踐，也同等關注他們執行論述（公共性宣稱、地方發展規劃）的實踐經歷，怎樣豐富了他們談論地方的方式（在地敘事）。



圖五、我們的理論模型（方宇祥製）

## 四、箔子寮社造來由、現況與困境

這一節，我們將先從箔子寮一度相當活躍的社區營造工作開始談起，從主導角色箔子寮城鄉發展協會切入，探討箔子寮的居民們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參與社區營造這項地方發展工作，並在其中用什麼樣的角色和其他人互動。

## (一) 茆子寮城鄉社區發展協會

瀏覽「台灣社區通」網站(2025)，可以觀察到許多社區協會曾經在此活躍。類似於部落格的功能，社區能在網站上保留活動紀錄，以及對外宣傳社區特色，而茆子寮城鄉發展協會也不例外。踏入田野地前，我們對於茆子寮的第一印象，除了來自蔡茂昌大哥過去在課堂上的介紹，便是從「茆子寮城鄉發展協會」的臉書與網站產生了初步輪廓。

茆子寮城鄉發展協會(以下簡稱城鄉協會)的成立日期為 2015 年 4 月 12 日，於同年 12 月 31 日開始推行社區營造事務(2025/1/8 田野筆記)。根據茆東村長蔡心娜的介紹，城鄉協會為人民團體的性質，與一般社區中的社區發展協會有所差異，但目標同為推行社區發展事務。端詳台灣社區通網站上的紀錄，可以觀察到城鄉協會活躍於 2017 年至 2020 年，這段期間頻繁地記錄城鄉協會舉辦的計畫，以及宣傳其特色名產。

前文提及政府推行的「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主要目標為擴大藝文扎根、擴大民間參與，以及分層輔導培力以強化行政動能，從城鄉協會過去的紀錄，便可見官方政策對於地方事務推行的主導性。城鄉協會除了協助製作廣受歡迎的喔熊藝術村外，也曾於 2018 至 2022 年期間，針對地方的文史記憶，舉辦結合青年回流的農村創生計畫。其內容除了重現與再造茆子寮的特色竹筏和烏倉寮，也以青年夏令營的形式，培養地方青年保留與傳承地方文史與記憶(台灣社區通 2025)。



圖六、茆子寮城鄉發展協會網站記錄  
(資料來源：文化部台灣社區通)

由上述粗略的整理與網站記錄可知，城鄉協會不僅曾積極投入社區發展，也配合著官方政策來書寫與實踐計畫，可以觀察到他們遵循著社區營造第三期計畫的前二指標：擴大藝文扎根及擴大民間參與，將社區發展事務著重於地方文史記憶與藝文發展。

## （二）蔡茂昌

在我們訪談過的茆子寮社造推行者中，包含了目前城鄉發展協會的前執行長——蔡茂昌。現年 70 歲的蔡茂昌目前主要生活在臺北，從事花卉相關的事業，有著不少與客戶打交道的工作經驗。在 2015 年因照顧家人的需要而定期回鄉後，已投入社區發展近十年。雖其於協會中的職位名為執行長，但他自稱是其他人的「義務規劃師」，凸顯了和政府部門申請計畫及撰寫相關計畫書的職分。

和我們所遇到的其他報導人相對比，蔡茂昌也有著類似的離鄉經歷。一開始即就讀外鄉鎮的中學，再因著高中選址而正式前去外地。在中部讀完大學後就在臺北積累了蠻多工作的經驗，直到從親戚學做貿易，再後來接觸花卉產業，甚而前往國內大學及國外學習植栽與園藝的技術，大致奠定了蔡茂昌目前的事業基礎。但回鄉所見的茆子寮讓他自覺社區改變不大，因此接近退休之際，他試圖以專業來貢獻於社區的改變：

「經過這樣差不多有四十年時間，我發現到這個社區從我離開到六十歲回來都沒有改變……當時我離開社區、村莊的那十幾歲，那時就有許一個願。就是說，當以後有一天我學有所成，我退休了以後，我要回來出生的地方，幫助出生的地方，以我自己的專業做一點事情」

（2025.01.11 田野錄音）

蔡茂昌自述了其對茆子寮社造階段的年份劃分，每三年即有一個步驟。剛開始的第一個三年，2016 到 2018 年是做老屋活化、美化環境，期間他有與雲嘉南濱海風景管理處協調彩繪村的事宜，也促成了喔熊藝術村的設立。作為主責計畫書寫的要角，他曾於 2017 年進行了人文地產景調查，發揮其早些年在設計顧問公司的專長。緊接著的 2019 到 2021 年，他定位為地方創生的方向，希望茆子寮能成為休閒、觀光的夢幻漁村，更帶起青年的回流機會。此階段具體的事例為茆子寮友善環境樂活居，他負責和縣府申請計畫跟部分設計的方面。相比該社造成果過了期限就沒人管，更為代表性的烏倉寮的夏令營，則從 2018 年每年一次舉辦至 2022 年，從文化層面來做社區，也讓社區的年長者投身參與。而第三個時程即為 2022 年至現今。儘管城鄉發展協會此時的運作動能不如以往，但蔡茂昌開始關注永續發展目標及企業的社會責任，遂有不少無法納入傳統社造範疇或超出社區邊界的目標。這包含了 2022 年曾找農委會水土保持局<sup>5</sup>商議雲嘉濱海藝術廊道的建造，還有實現護土固碳的實驗農場和平地造林的計畫。蔡茂昌針對他的行動評價道：「我現在要做的腳步很快」（2025.01.11 田野錄音）。

縱使現階段難以藉由城鄉發展協會與茆東社區發展協會的名義來申請經費，但蔡茂昌除了致力於永續理念的貫徹，在社造事務上仍舊勤勉不懈。不只是維持

<sup>5</sup> 配合中央政府組織改造，2023 年改制為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烏倉寮營隊的熱度與嘗試完成繼 2017 年之後第二次的人文地產景調查，更希望有年輕人接替自己的位子，以回應公部門對社區不再申請計畫的疑惑。

上述社造進程的概況描繪，是以蔡茂昌的視角所勾勒，不免稍微著墨於尋求經費挹注和接觸公部門的面向。對於社造的具體實踐情形，須從其他我們訪談的報導人來一窺究竟。像是擔任過城鄉發展協會理事長的茆東村村長蔡心娜、前年卸任茆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普天宮總幹事蔡瑞泉，兩者於社造的第一個三年所實際執行的工作。尚有社造推行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志願工作者，也就是那些來幫忙的人，如現任城鄉發展協會總幹事黃正鎮船長、蔡心娜的舅舅阿昇，尤其是他們在烏倉寮夏令營興辦時的貢獻。

### （三）美化社區環境

2016 年至 2018 年在蔡茂昌口中是老屋活化、美化環境的階段，此間進行的地方發展事務，先後包含彩繪村與喔熊藝術村：前者是邀請原先在嘉義好美里繪製 3D 地景彩繪的曾進成老師也至茆子寮作畫；後者則是 2018 年後開始，引入交通部觀光署設計的臺灣觀光吉祥物「喔熊」，在茆子寮各處設立裝置藝術。當時與蔡茂昌一同構思如何「做社區」，並在茆子寮組織人手、推動社區發展的夥伴，還有蔡心娜與蔡瑞泉二人。在茆子寮的社區營造中，這三人是最為重要的領導者角色。

也再次祝福楊專中秋愉快，闔家平安，也預祝接下來的國慶活動籌備順利~在普天宮廟埕前金爐邊、雲 131 與雲 131-2 縣道這兩條主要幹道交匯的三岔路口，阿春檳榔攤坐落於茆子寮聚落的正中心，有一道身影騎著白色摩托車，載著一籃又一籃的烏魚子來到此處。接著，早已在此等候的婆媽們，搬開摺疊桌椅、各就各位，一人坐在爐邊，負責用噴槍將烏魚子表面燒炙焦香；先前搬運烏魚子的身影，則從檳榔攤中拿出刀、坐定位，身旁堆著烤好的烏魚子，將烏魚子片成適合入口的小塊；一人負責將一塊塊烏魚子塞進印著「一口烏魚子」的塑膠套中，並依次在籃中疊好。三人邊聊天，邊加工這些趕著今日出貨的一口烏魚子。不時有村民或停留駐足，或騎著摩托車緩慢經過，望向三人，此時坐在三人中央的蔡心娜，便抬起頭來，或回話，或日常招呼道：「你這個時間敢毋是咧做工課？（你這時間不是該在工作嗎？）」（2025/1/8 田野筆記）。身為現任茆東村村長，蔡心娜與村人熟稔並非一兩日，先前由於擔任村長的父親不識字，現年 47 歲的蔡心娜早在爸爸任內，就已負責分擔不少事務。其中，也包含與蔡茂昌、蔡瑞泉一同投入社區營造。

從蔡心娜村長的視角而言，負責撰寫企畫書的蔡茂昌是領導角色，自己與蔡瑞泉多是「聽命行事」，「做社區」是「三人行」（2025/1/8 田野筆記）。每年參與

雲林縣的社區營造 PK 競賽時，根據該年想推動的項目，選擇該報名環境組或觀光組參賽，曾經改造過三合院的古厝，也曾與旅行社合作，帶觀光客來箔子寮數日遊。蔡心娜說「做社區」一定需要「動員」，而她正是「三人行」中最能動員村中人力者。除舉辦活動時，肯定需要在地居民投入外，在活動籌辦期間，也需要湊足一定人數的社區居民參加政府舉辦的培訓課程，才能滿足經費發放的要求。也就是從事社造，必定需要社區眾人的投入，與社造政策期望培養社區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目的正好切合（陳美伶 2021：57-58）

儘管認真「做社區」，不過仍有居民不理解，誤會蔡心娜等人是以政府經費賺錢，她因而會為自己投入的心力覺得心寒，得到的「稱讚少、血汗多」。目前社造因為村長家庭因素，自己與瑞泉又都事務龐雜而停擺。蔡心娜也坦言已從事社造數年，向蔡茂昌詢問今年該做什麼時，已經「變無撚（pinn-bô-lián：想不出解決之道，一籌莫展）」，會有不知道該繼續做什麼的困擾（2025/1/8 田野筆記）。

與蔡茂昌、蔡瑞泉於 2015 年合作成立箔子寮城鄉發展協會的原因，是相較箔東村、箔子村與新厝的社區發展協會各行其是、自負盈虧，城鄉發展協會統合了三處，能夠申請經費來自縣府，層級較隸屬於鄉鎮市的社區發展協會更高，有較多資源、能動員更多人手，有利在社區總體營造的相關競賽中脫穎而出。

## 1. 蔡瑞泉總幹事

拜訪蔡瑞泉總幹事時，只見他從普天宮的會議室中鑽出，有些靦腆地與我們打招呼，接著與正和他談天喝茶的友人要了茶後，領著我們到一旁用來接待進香團的空間，接受訪談。現年 63 歲的蔡瑞泉目前任職普天宮委員會總幹事，國中畢業後即到新北闖蕩，在工業領域中流連，直到 12 年前因父母年邁而返鄉，不過對他而言，這並非退休。返鄉後，蔡瑞泉跟著爸爸一起養鰻魚，當時「社區都沒有在動」（2025/1/9 田野筆記），直到被鄉長帶領至好美里參觀彩繪藝術，邀請曾進城老師至箔子寮作畫，成為開始的契機。對他而言，開始「做社區」是他與蔡茂昌、蔡心娜共同主導，三人之間彼此討論後，再由蔡茂昌負責寫企劃。蔡瑞泉曾經身體力行投入彩繪藝術村的工程，也接受培訓，成為箔子寮彩繪藝術村的導覽員。他認為彩繪藝術村是個起頭，後續還要維護環境清潔、帶導覽，才能讓社區「動起來」（ibid.）。

蔡瑞泉也曾經擔任兩屆箔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一職，卸任後接任普天宮總幹事，忙碌於廟裡的大小事務，更需要張羅香客來訪事宜，為到訪的進香團安排食宿，若香客們在緊湊行程間有餘裕，他也會領著來人穿梭於社區間為其導覽。現階段由於自己與蔡心娜事務繁雜，沒有多餘的心力參與社造比賽，做社區因而停擺。



#### (四) 地方特色發展

蔡茂昌口中「做社區」的「三年為一期」計畫，其中第二個三年時間從 2019 年至 2021 年，將社區發展定位於「地方創生」的方向，希望讓凋零的箔子寮再生，鼓勵居民做烏魚子、農產品、小吃等地方特色產品，期望改變舊漁村、農村的形象，將箔子寮打造成「休閒的、能玩的、打卡的、看夕陽的(地方)」(2025/1/11 田野筆記)。此階段的具體實作，除了舉辦數年的烏倉寮夏令營，也有包含樂活居的整理與活化。這些社區事務的推動在前執行長的提出與爭取經費後，也需要大量人手一起合作，因此從上課(社區營造的計畫前導課程)、製作竹筏到設計工藝等過程中，都能讓地方居民以「志工」的角色參與，成為「做社區」的一份子。

##### 1. 阿昇

烏倉寮夏令營與海上竹筏製作夏令營，不僅需要大量勞動人力支援，也需要專業的技術人員，而這也是志工阿昇加入「做社區」的契機之一。

現年 55 歲的阿昇，居住在離箔東村不遠的新厝，與村長家為親戚關係，因此經常在社區人力短缺時，前來支援活動籌備與製作。與村內多數人的經驗相似，阿昇國中畢業後即上台北工作，主要做中央空調與冷氣相關，婚後因家庭因素搬遷回箔子寮，已經回鄉約莫二、三十年了。回鄉的十幾年後，村長開始動手「做社區」，而阿昇也是從 2017 年開始被找來當志工幫忙。憶起「做社區」的時光，阿昇形容：「大家都好朋友」(2025/1/13 田野筆記)。

由於具備在台北工作的相關經驗，阿昇在做社區時經常被指派專業任務，例如他曾因為看得懂設計圖，被指派電焊與木工的技術工作；以及社區舉辦烏倉寮與竹筏夏令營時，作為向耆老學習第一手技術的第一批人。談及做社區的過程與成果，阿昇認為需要額外撥出時間才能做，且做社區需要向政府申請經費，若「沒空就沒去報」；另一方面，他對做社區的成果給予正向的評價，認為不僅吸引更多觀光客、讓社區更熱鬧，也因為「看了嬌嬌(suí-suí，意指很漂亮)」受到更多村民肯定(2025/1/13 田野筆記)。

##### 2. 黃正鎮船長

同樣為社區無償付出，還有現任城鄉協會總幹事黃正鎮。村裡的人經常叫他「船長」，而正因為黃船長至今還會定時出海，依然維持著過去盛行的「討海」

習慣，才有這令人印象深刻的稱號。黃船長並非年輕時就成為討海人，他國中畢業時曾經上台北討生活，專做沙發事業，後因為在外地工作艱困，約莫在二十年前回來箔子寮。黃船長固定會早晨出海，下午會回到箔子寮，現居北港。

黃船長在城鄉協會成立兩年後便擔任總幹事，談到做社區，黃船長表示自己做社區時就像擔任雜工的角色，會盡力「能幫忙就幫忙」。例如製作彩繪村的時候，他會去關心來畫畫的老師；烏倉寮夏令營則同樣以志工的身分幫忙做事，不會拿錢，「懂的地方就下去做，不懂的地方就跟別人學」（2025/1/13 田野筆記）。

對於做社區的成效，黃船長對夏令營的舉辦表達肯定，他認為讓年輕人親自體驗過去人的生活、傳承文化生活，才有機會再造地方繁榮。夏令營的體驗內容除了烏倉寮與竹筏製作外，他們也規劃海洋體驗，如捕魚、學習運用蛇籠等等，想讓年輕人傳承過去關於海的生活記憶。然而，黃船長認為僅只有這些並不足夠，他強調現在的建設只能讓觀光客短暫停留，應該要多發展具地方特色的商家或建設，才能讓觀光客有長期駐足的機會，也才有繁榮的可能。

## 五、想像對比現況

在前一節，我們看到了箔子寮不同居民，滿懷熱情地參與社區營造的實踐，不過當他們談及社區營造的成果、與談論箔子寮這個地方時，我們捕捉到報導人們不約而同地提及「留不住人」這一點，並不完全如參與進社區營造時的正向、熱情，而有些失望與無力。本節將梳理箔子寮居民們在談論社區營造的實踐與談論地方現況之間的落差。

### （一）本地人留不住：資源與人力不足

於箔子寮城鄉社區發展協會的台灣社區通網站上，可見其自述工作重點外，也提及了發展困境，即缺乏青年人投入與企業經營不足。除點明社造較易忽視企業力量外（賴柄樹 2022：98），我們也從田野中捕捉到當地人對資源不足和留不住年輕人的擔憂。

從資源匱乏的方面來看，以眾多報導人所談近些年城鄉協會發展受挫為例，即可見雖蔡茂昌或蔡瑞泉在自身領域有些對地方帶來影響力的事項開展，但以協會名義向政府申請計畫及經費的停擺，仍造成以社造方式進行地方發展的無以為繼。這實凸顯了社造仰賴資源挹注的性質，而社造的暫時停滯即表現地方資源不夠的境地。

當地青年出走的情形，不免影響社造持續運作的動力，而不少從事過社造的報導人都闡述了為何難有下一代人回來家鄉。蔡心娜認為「年輕人還是以工作賺錢為主」，且年紀更小的「小孩子對土地沒什麼感情」(2025/1/8 田野筆記)。相對應工作的需求，蔡瑞泉覺得留在當地是沒有工作機會的，又以漁港漁船銳減的情勢和種田維生的環境阻礙為例證。類似地，阿昇認為年輕世代回來箔子寮，需有滿足生計的工作。而黃船長則覺得青年是否回鄉，要看他們自己的意願。

上述對地方現況的觀察不只見於社造參與者的口述，也是其他經歷過社造階段的在地人士的部分看法。主要應對觀光客住宿需求的民宿老闆蔡文進，自覺地方上的年輕一輩在一定年齡後就會出走，甚至後代並非土生土長，沒有情感因素驅使他們返鄉。有關年輕人流失的處境，國小四年級即離開箔子寮的蔡茂源，進一步解釋為家長將子女往外送的現實。

同樣地，我們也從這些報導人的離鄉經歷得見他們都是先到外地長時間的求學、工作與生活，才因家庭因素或工作艱困而萌生回鄉念頭。如此現象一定程度指出之後現在的年輕人離開本地的大致情況，也帶出目前地方老年人口居多的樣貌。

## (二) 外地人留不住：沒有串連與配套

箔子寮居民認知到相較於都市，本地的的工作機會與選擇都較為受限，且會用「沒在動」、「沒有改變」等語加以形容(2025/1/9、2025/1/11 田野筆記)。蔡瑞泉對香客旅遊模式的觀察是，在他們「做社區」以前，箔子寮的觀光客比較少，如果沒有景點，「人家來箔子寮看什麼？」(2025/1/9 田野筆記)。蔡茂昌的野心更大，期望將箔子寮打造成「休閒、夢幻漁村」。在在顯示箔子寮投入社區營造者，透過「做社區」嘗試改變社區原本樣貌，並嘗試發展觀光，吸引外地遊客到來。前文的箔子寮彩繪藝術村、喔熊裝置藝術，便是為箔子寮增設可能的觀光景點。

不過，在經歷過社造的箔子寮在地人士口中，我們也聽到發展觀光上的難點。在箔子寮經營民宿的蔡文進與周招伶提到彩繪村剛畫完時，曾經有很多遊覽車帶來觀光客，但只留下垃圾，卻留不住人，「沒有帶來任何的經濟效益」，認為只有彩繪藝術村一個景點其實不夠，沒辦法拉長遊客的停留時間，也缺乏配套措施，無法滿足遊客的飲食、消費與如廁需求(2025/1/10 田野筆記)。普天宮斜對面經營福建熱炒的老闆也說，箔子寮缺乏更多的商家與景點。在箔子寮「做社區」的蔡瑞泉也就其觀察，說觀光客在箔子寮逛藝術村、買飲料，至多停留兩小時，觀光流程「沒有串連起來」，難以發揮經濟效益。「沒有串連」是我們在田野期間最

常聽到報導人提起的困境，指涉茆子寮除了彩繪與裝置藝術外，附近沒有其他景點，亦沒有能滿足觀光客需求的周邊設施。

對於這點，報導人心中的解方多是期望政府投入更多資源。前段的兩位民宿老闆，就希望政府能夠配合撥下更多經費來建設地方。蔡茂昌論及未來規劃時，也提及想報名其他政府計劃。這凸顯了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目標是鼓勵社區居民參與在地公共事務（陳美伶 2021：58），未考量經濟因素。

從報導人的回應，我們發現茆子寮的社造從事者不約而同地提及，他們「做社區」是沒有賺錢的。蔡心娜針對村民質疑她領政府的錢中飽私囊，澄清「做社區」其實賺不了什麼錢，也在提到和不同社區發展協會合作時，提到辦活動有賠錢的可能。蔡瑞泉也說「做社區需要自己墊錢」，儘管政府一開始會提供一筆資金（約兩萬或四萬，不同計畫有相異補助金額），不過超出的部分就需要參與者先行墊付，再向政府核銷。曾協助招牌金工與烏倉寮搭設的阿昇更表示，會來幫忙「做社區」的人，雖然有領錢，但金額較市場上的行情價相對微薄，實際上類似於做義工，因為「大家都是好朋友」，所以他才來幫忙。這體現了社區營造的困境，仰賴參與者自行投入心力與資源，但缺乏經濟誘因。

### （三）小結

本節我們梳理了不同報導人的生命經驗，以及他們如何投入於茆子寮城鄉協會的社區事務中。在茆子寮，「做社區」不僅需要動員各處人力，也需要資金等資源挹注，並非憑一己之力就能讓社區蓬勃發展。面臨人口老化的茆子寮，在「做社區」的過程中逐漸遇到青壯年人口流失的阻礙，我們能從報導人口中得知，在他們的認知中，早已預設年輕人必定會離鄉，也期望年輕人能出去獲得更好的發展；此外，茆子寮的地方發展資源不足，不僅是促使年輕人離鄉的因素之一，也進而使茆子寮人「做社區」的實踐造成限制。

另外，我們從報導人的訪談中，可以看見他們在一邊做社區的同時，也一邊建立了他們對地方的連結與想像；然而資源與人力的不足，使社區發展有所限制，導致做社區的成效不如預期，他們在論述社區發展時，也會談及不足之處、景點缺乏「串連」，而造成觀光客的流失與經濟效益缺失。

過去政府推行社區營造計畫的目標，實施重點經常忽略企業進駐與經濟面向，導致像茆子寮這樣的社區，雖然有意願且已投入大量的社區實踐，卻未能看見顯著改善，甚至面臨組織與地方的停擺。然而，面對困境重重的地方發展，我們仍然能看見不同報導人生動的生命故事與彼此的情感連結，包含他們大部分人都共同經驗的「離鄉」與「回鄉」經驗，以及因為血緣與交情等關係而投入的實踐。這些皆交織出內部有些異質，卻邁向同一個方向的地方想像。

## 六、自營推動的湧現

此節呈現了不同於社造，而是自營推動地方發展的人的實踐與個人生命故事。本文以「自營推動」指稱不同於社造人士的發展模式，他們多藉由自營事業或其他事業為基礎發展，然非所有報導人都認同自己的實踐屬於地方創生範疇，因此即使實踐方式與目標和地方創生相近，我們仍不直接以「地方創生者」稱之，僅將政策的影響力帶入討論。我們實際訪談了在箔子寮養鵝的向天歌農業執行長蔡英地與善水咖啡老闆王柏惟，以及三條崙荒涼騎驛農場的吳志勇，與在林厝寮種蒜的林煌智。惟本文礙於篇幅，僅能重點呈現後兩位報導人的個人生命經驗與實踐細節，而前兩位報導人的經驗會穿插於後面的綜合分析以佐證相關論點。

### (一) 箔子寮的自營推動者

平日午後，建陽國小的學生放學了，常會三三兩兩地徒步回家，數名學生沿著穿越箔子寮的主要幹道雲 131，往南向著聚落中心前進，途中嗅到右手邊飄來陣陣咖啡香。此時，善水咖啡老闆王柏惟會拉開玻璃窗，在吧檯裡熱情地和路過的小朋友打招呼、小聊幾句，甚至邀請孩子們進店裡試吃剛出爐的小點心。在箔子寮經營善水咖啡的王柏惟，一樣有離鄉求學的經驗，大學畢業後也曾留在高屏生活。但偶然間，他發現自己孤身在外地的生活「有點空虛寂寞覺得冷」(2025/1/9 田野筆記)，想陪伴家人的念頭縈繞於心，又因為與老婆共同有著經營咖啡廳的夢想，而選擇回鄉開店。王柏惟的人生態度相當豁達，「走一步，算一步」，他回鄉的主要目的並不在賺錢，而是專注於自己當下想做的事情，包含陪伴家人，與透過實際的行動讓家鄉更好。他樂觀地說「這邊缺什麼，就自己創造」(ibid.)，所以我們看見王柏惟回鄉後，除了想在箔子寮經營一間「能被大家記住」(2025/1/16 田野筆記)的咖啡廳，還結交同在雲林的返鄉青年，形成在地青年的社交網絡，並共同籌辦「海口郎創意市集」，期望透過社群平台引起話題，讓更多人知道箔子寮、也意圖吸引人流，讓此處熱鬧起來。此外，他更帶著箔子寮的小朋友們(多是建陽國小學生)到海邊寫生、泡水、淨灘，進行海洋教育，希望在孩子們心中種下對地方的深刻印象，長大後能「記得我曾經在箔子寮做過什麼」，進而有回鄉發展的機會(2025/1/9 田野筆記)。

同為箔子寮返鄉青年，1976 年生的蔡英地，國中畢業考上台北市成功高中，就此開始離鄉生活，大學就讀中興大學法商學院(今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又在政大會計所取得碩士學位。考取會計師執照後，蔡英地更曾任上市公司財務長，在旁人看來，他簡直是平步青雲，但他卻覺得自己正面臨職涯關鍵點，待在公司就只會日復一日地工作直到退休。於是不想就此固定職涯，又已然看見市場對養鵝場需求的蔡英地，正好藉著禽流感肆虐，家中鵝場需要幫忙的契機，毅然

決然辭職，決定回鄉養鵝、創立向天歌創新農業，開啟自己的「人生下半場」（2025/1/15 田野筆記）。小時候，蔡英地家中以養鵝維生，童年他曾幫忙分擔部分工作，直到升上國中被禁止、要求專心讀書，不過他始終認為自己是「農村子弟」（ibid.）。回鄉後，他從箔子寮的眾多空屋，觀察到農村往往為都市培養人才，導致人口流失的問題，且當子女長大、父母年邁，分居兩地難以解決照護問題。蔡英地認為理想狀態應是在家鄉頤養天年，於是立志在地方做出能讓青年在地安心發展的產業，他以實際的市場需求說服原先不認同其放棄外地職位的父親，支持其嘗試回鄉養鵝，甚至讓爸爸和具有機械系背景的弟弟在他回鄉前，就先協助投入建置科技化鵝場的前置工作。蔡英地也不忘記感謝過程中他人給予的幫助，笑著說他的鵝場有賴於先前工作中一路經營至今的人際網絡：技術上，他向中興大學退休教授許振忠，學習密閉式養鵝的實務經驗；設備上，則因先前工作累積的人脈資源，以實惠的價格購入水簾與風機等必要裝置。目前事業已漸漸上軌道的蔡英地，透過向天歌創新農業提供「一村一舍」輔導青年返鄉創業方案，希望把自己成功的事業模式推廣到他處，吸引更多年輕人回到各自家鄉，達到他的理想「人回來很好，不要出去更好，（讓年輕人）在地就可以賺到錢」（ibid.）。蔡英地坦言，回鄉前並不清楚地方創生的概念，「有沒有地方創生這個名詞，我們要做的事都一樣」，他只是在按部就班實現理想的過程中，剛好和地方創生的概念有「match（契合、配對）」（ibid.）。

## （二）荒涼騎驛吳志勇

從箔子寮往北開車約五分鐘，會抵達三條崙社區，如若繼續向北，即將駛出聚落範圍時，見著路旁的棕色路標拐進左側的小巷，沿著寬度僅能容納一台車的田間巷弄行駛，會在大片的空置田地與田舍零星錯落中，遠遠見到明顯有整理過的兩落紅磚屋，很容易就能辨識出這是我們要找的荒涼騎驛農場。頂著冬天四湖沿海猛烈的風，走過做為停車空間的狹長草坪，店員親切地在紅磚屋內為我們開門，映入眼簾的是簡潔的黑白色調吧台，與後方寬廣的座位區，中間隔著無門版的小門框，稍稍向前，即能一眼望穿整個長方形的寬敞空間，左側是架高的木製和式平台，右側則有沙發椅、長木桌等不同座位搭配，整體色調以大地色系為主，搭配著輕柔的爵士音樂。我們在週五下午，與吳先生約定訪問的前一日，首次到訪荒涼騎驛，捕捉到約二十幾歲的年輕情侶坐在沙發區，享受兩人世界；與一組可能住在附近的中年婆婆媽媽，相約到此喝咖啡、配著小點，聊聊生活。荒涼騎驛雖說是農場，但給我們的第一印象更像是咖啡館。



圖七、荒涼騎驛農場  
(張瑜真攝)

吳志勇先生於 1968 年出生，中學時還在斗南、大埤附近求學，大學就北上就讀淡江大學航太工程學系，最後畢業於清華大學核工所。他曾參與相關研究計畫，但認為自己不適合公部門，而輾轉至竹科工作，現在則在台中生活、經營自己的小公司，大概每兩周會回到三條崙一次。他說自己離鄉後仍會「來來回回」地回家，沒有一直留在這裡，很希望退休後可以回來（2025/1/10 田野筆記）。

興起回鄉開咖啡館的念頭，是在吳志勇 45 歲以後，家庭與事業都已穩定，才因個人喜愛咖啡而起心動念；同時因父親生病，想回鄉陪伴家人，所以決定著手實踐，慢慢開始提早佈局自己想回鄉過的退休生活。吳志勇饒富興致地和我們分享，現在荒涼騎驛這兩落紅磚建築，就是早年家中的豬舍，源於約莫民國 65（1976）年時，三條崙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養豬，畜牧業相當興盛，是此地居民的共同記憶。他從 2017 年開始著手改造傳統豬舍，發現因為過於破敗老舊，新建其實比修復更難，但對他而言，重要的是保存與家人共享的地方記憶，新建物則沒有意義，即使需要花費更多時間與金錢，他也願意投入。

荒涼騎驛另一落紅磚屋的整理還在持續進行中，先行整理好的咖啡館則在兩年前正式開業，不論硬體格局或軟體經營，處處可見他融入的諸多巧思與理念。荒涼騎驛北面有一道橫亙駐車空間至咖啡館本體的圍牆，用意在稍微抵擋強勁的東北季風，本體是由輕鋼架打造，但是仔細一看，會發現在牆上有小豬從出生、長大、到被賣出的生命歷程，吳志勇委託藝術家特意製作豬隻在養豬戶的生命歷程，回顧了他童年與家人的回憶，也呈現三條崙社區的集體記憶。

經營上，吳志勇採取重視「品質」的策略。咖啡館內，他堅持只提供簡單輕食，避免油煙與氣味干擾顧客的空間氛圍體驗。吳志勇在對地方發展未來的想像中，將荒涼騎驛視為一個輕鬆、可以停留的平台，他說現在假日多有重機騎士團

在此停留，期望讓更多人認識四湖、認識三條崙。吳志勇的理想是若將來附近有社區發展，希望自己是創始的一間店。他也期許未來能設計出串連地方的「一日行程」，如走訪沿海的黑森林自行車道、觀察季節性招潮蟹、沿海品嚐海鮮等微旅行模式。這些設計除了吸引消費，更重要的，是試圖讓來訪者真正停留與認識四湖。

地方串連亦在吳志勇的實踐中悄然展開。他帶著我們去看建物後的一小片蒜頭田，笑說這裡是他的「實驗農場」，嘗試用有機方式種蒜，他有一種生態永續的責任感。吳志勇強調有機耕作的重要性、反對過度商業性的開發，認為環境雖然「看不到，但我心裡覺得是最重要的」(ibid.)。這些有機蒜頭也在地方發展的土壤中緩緩發芽。吳志勇在臉書粉絲專頁上小規模販售自種的有機蒜，在因緣際會下，被在隔壁聚落林厝寮種植蒜頭的林煌智看到，說他對有機蒜訂的價格實在太便宜、簡直「破壞行情」(2025/1/14 田野筆記)，兩人因而結識，逐漸建立起友好的合作關係。如林煌智曾私下估算吳志勇的咖啡館營收狀況，發現目前營運成本高機率大於獲利，因而積極為其介紹客人；也在舉辦拔蒜體驗活動時，選擇荒涼騎驛的咖啡館空間與其後小片蒜田作為活動場地。吳志勇也在店內的「荒涼微市集」區域，上架林煌智的蒜頭製品與海味蒜繪本，協助推銷友人的在地故事與自製農產品。這種連結並非計畫性的結盟，而是基於同樣在地發展的實踐，經由社群媒體認識的非正式關係。吳志勇形容這是「機緣」的產物(2025/1/10 田野筆記)，而我們認為這種自發而鬆散的網絡，更顯現了地方發展中每個實踐者微小但持續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吳志勇本人認為自己與社區組織連結不深，實際上，他所經營的荒涼騎驛已成為附近居民聚會、交流甚至辦理活動的一處據點：店內陳設著村民媽媽捐贈的縫紉機、鄰村青年林煌智的蒜加工品與海味蒜繪本，又或是地方警察借此處舉行工作事項布達會議。這種既是個人經營、又滲透社區脈絡的特性，使荒涼騎驛不僅是一間咖啡館，更是一個由個人生命經驗延伸出來的地方發展節點。

吳志勇從個人生涯規劃出發，談論回到三條崙經營荒涼騎驛時，並沒有把自己投身的事業歸入地方創生中，只是希望看到更多年輕人回鄉發展，期許若有更多人回到地方，荒涼騎驛能是地方創生的一顆「種子」(ibid.)。他的地方論述與實踐，不是寄望於大型資本或政府主導的劇烈改造，而是出於一種深信「生活即實踐」的信念。這種信念，可能由他多年來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穿梭的生活經驗淬鍊而成，也形塑了他今日在四湖的具體行動。地方，在他的故事裡，不僅是空間，也是一種緩慢但堅定的生活實踐。



### (三) 海味蒜農林煌智

林厝寮是同樣位於四湖鄉內、箔子寮往北，開車距離約莫十分鐘的社區。我們到訪林厝寮的那天，可以看見路邊因為施工而劃分通行區域，以及附近剛落成、即將開張的便利商店。依循著吳志勇先生給的地址前往，我們來到路旁的一處三合院，院前搭著棚，拉上「雲林縣四湖鄉林厝寮永續發展協會」的斑駁紅布條，牆上還有長青食堂的壁畫、孩子們的沙畫與勞作作品。再三確認後，發現約定的地點是在隔壁的三連式三層房屋，門口周邊有不少年長者在休憩。詢問在門口涼亭乘涼的阿伯後，便確認是位於中間、門口懸掛「林厝村辦公室」木牌的那一戶。

到訪時，林煌智還在前來的路上，他的父親林建益便先引導我們入內。客廳後段有一張辦公桌，我們圍著放在客廳前段的會議桌就坐，牆上掛著諸多匾額，有的是恭喜林煌志獲得百大青農，也有恭喜林建益當選村長。從家外空間、居民的駐足，到客廳內的佈置，可以看出林煌智家在社區中佔有一定的份量，擁有一定的人脈以及居民們的信任。

在拜訪林煌智先生前，我們便注意到他在臉書經營著活躍的粉絲專頁「來去鄉下吃自己」，除了分享他平時的種蒜日常，還有關於自銷產品的宣傳、相關活動分享等等，推測是他與受眾互動的重要平台，且交流熱絡。訪談過程中，林煌智先生也一再提及該粉絲專頁成立早於他返鄉種蒜的時間，最初目的是為了經營民宿，讓長期待在都市，需要一些喘息空間的人，能來到鄉下放空。

出生於 1979 年的林煌智先生，與箔子寮人擁有相似經驗，他在高中時因成績優秀北上讀書，而後從台大心理系、東吳企管碩士畢業。問及是如何從心理跳到企管領域，林煌智表示他也不知道，並認為「我人生一向不是線性的」(2025/1/14 田野筆記)。這樣依靠機緣、不強求的人生態度，也展現在他畢業後的人生走向。他在回鄉前陸續做過許多不同類型的工作或投資，如加盟連鎖飲料店、健康瘦身產業等等。他用水庫形容自己的事業，水庫低的時候水就會自己進來(快沒錢的時候就會自動又進賺)。

回鄉種蒜的契機，源於他和家鄉的長輩聊天，發現蒜頭市場長期被盤商寡占，農民的收益幾乎都被收進盤商口袋；此外，蒜頭市場也容易因價格與供應量波動大而崩盤。大盤商能夠操控市場，農民們接收到的資訊不對稱，只能任由盤商掌控。抱持著社會責任的林煌智，了解問題癥結後決心投入，利用自己過去所學的專長幫助農民。他先後與農民來回了多次的溝通，向他們提出「合作社」的理念，但不受農民信賴，因此家中不曾務農的他，決心開啟親自種蒜的人生。而後林煌智陸續建立了合作社、蒜頭的分級制度與引進機械化，幫助農民獲得更實質的收益外，他也研發不同的蒜頭產品，如黑蒜麵、蒜頭禮盒等等(楊語芸 2023)。他形容自己就是「打顆種子到他們腦子裡去」(2025/1/14 田野筆記)，嘗試扭轉蒜農們的被動心態，不知道什麼時候有用，就等到萌芽那刻。

林煌智自認另一方面是以做地方創生的角度回鄉，也因此投入前有深入了解四湖的蒜頭產業，認為蒜頭很適合作為青年回鄉發展的媒介。為了活化地方創生的動能，林煌智長期積極舉辦活動，如 2020 年籌辦的「裝蒜節」，他不只參與產業行銷活動、找經費，更善用媒體行銷方面的人脈，找來許多傳統／網路媒體宣揚該活動，談及這些人脈的運用，他也忍不住讚嘆「緣分真的太奇妙」(2025/1/14 田野筆記)；他也舉辦過 2022 年路跑活動「蒜你厲害」以及「星光饗宴」，在饗宴中聯合附近各屆百大青農，大約有十位，還有台西、四湖青農聯誼會的會長，請台西總鋪師用他們的產品入菜，讓百大青農有機會介紹自家的農產品，並設計農產品入菜。這些與在地、農民和青年有關的活動，皆為了「加強和在地的連結」。

談及他在種蒜領域的下一步，他認為如果蒜頭產業更健康，年輕人才會願意回來。林煌智也經常和有意改善聯合壟斷局面的人交流、連結，並藉由網路行銷的方式，讓農民能賣好的價錢。林煌智對於地方產業的期待與想像，皆反映在他的實踐上，他不僅活用自己離鄉後所學習與累積的知識，也親自下田勞動、收集產業第一線資訊。林煌智在地方的論述與實踐，展現人民在政府政策的依賴之外，轉而靠自身動員、合作的個體能動性，也能因此在困境中有所突破。



圖八、林煌智活躍的粉絲專頁  
(圖片來源：來去鄉下吃自己)



圖九、2024 年星光辦桌  
(資料來源：黃淑麗 2024)

#### (四) 小結

從以上四位自營者的故事，我們發現不同於前述篇章的社區營造，這些返鄉青年選擇更彈性靈活、具長期支持策略的地方發展模式，突破了社區營造面臨的資源與人才不足問題，共同交織出四湖沿海多重的地方論述。

吳志勇與林煌智皆擁有離鄉讀書與工作的經驗，他們靈活地運用在外獲得的知識與資源，如事業累積的資本，或是求學時的專業背景，有意或無意的回饋於家鄉。此外，與社區營造者較大的差異，在於自營者勤於經營社群平台帳號，習慣頻繁地在社群上分享日常生活、與顧客互動，為此累積了固定的粉絲社群，為他們的事業發展奠基穩固基礎。

又因在地方經營事業，自營推動者無論是否有其他正職或副業收入，都著眼於經濟面向，在營利上有著希望至少能做到自給自足的目標。從經營社群媒體、串連其他在地青年，到舉辦特別活動（如王柏惟舉辦市集、林煌智舉辦裝蒜節），無一不是希望能讓更多人看見自己，在為商品或服務拓展市場同時，也吸引旁人關注自己投入在地方上的實踐，對這塊土地的關懷，乃至理念。

從吳志勇與林煌智對地方發展的敘述與實踐中可知，他們與其他的返鄉青年相近，如善水咖啡老闆王柏惟以及向天歌創新農業執行長蔡英地，雖然不一定有意識地在做「地方創生」，但他們的投入皆串連起地方資源與人才，同時為有意返鄉的青年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在對地方的敘事上，也對未來發展抱持著正面積極的想像。

### 七、綜合分析<sup>6</sup>

以上正文部分呈現了關乎地方發展實踐的資訊與各個參與行動者的個人生命經驗，並他們對地方或地方發展現況與未來的看法。以下內容即是試圖回答我們的問題意識，再提出我們對箔子寮或者更廣泛的四湖沿海，其地方形塑和建構的看法。

為了回答問題意識，此處首先解釋社造與自營兩組報導人，個人生命經驗影響所抉擇地方發展模式的因果關係。先從箔子寮社造一節所敘述的各報導人投身社造的經驗與歷程來看，可發覺他們求學時即離鄉，到外地發展及工作的普遍規律，如蔡瑞泉、阿昇、黃正鎮三人皆自國中離鄉，而蔡茂昌也自高中始出走當地。如此生命經驗側面映證了當地工作機會與求學資源的稀缺，所遭致的青年離鄉的現況。而這些現實也見於受訪對象們對地方過去與前景的說詞，凸顯了他們所經驗到的區域發展的歷史脈絡。也正是當地社造萌芽前所呈現的地方發展不甚充足，

---

<sup>6</sup> 分析上，感謝盧佳秀助教建議從論述上的不同和實踐後的新敘事著手與思考，謹致謝忱。

才有蔡茂昌立下改變社區的志向，進一步有了社造分期執行的藍圖構想。但僅僅是蔡茂昌的個人生命經驗，是不足以促成社造的實際啟動，尚須配合其他報導人們因著照顧家人而返鄉的契機。而媒合蔡茂昌改變在地的願景和其他參與者投身社造的實踐作為，是因著當地資源不足，人們必須共同合作、彼此動員，才能讓地方發展的論述與實際面貌付諸實行。進一步地，個人能力的不同能貢獻於社造執行的不同層面，如蔡茂昌撰寫計劃書的才能，到阿昇過去工作經驗而能助於工藝設計面的任務。簡言之，我們可說個人生命經驗，亦即蔡茂昌離／返鄉而催生對在地的關懷、實例化地方資源匱乏的其他報導人離鄉經歷、返鄉機遇、不同報導人的相異能力，造就了箔子寮以社造來進行地方發展的特殊面貌。

從多位自營者的生命故事來看，可發覺他們所選擇的地方發展模式，和個人生命經驗有著極大的關係。荒涼驕驛吳志勇依循著兒時的農村記憶與情感，因而將豬舍改建咖啡廳，使童年記憶得以安放；海味蒜農林煌智運用求學與離鄉工作的知識和經驗，為家鄉的老蒜農改善產業生態，打造利於青年返鄉的環境，並持續開展出一連串的地方創生實踐；王柏惟希望箔子寮有一個讓大家可以記得的咖啡廳，才有了相關行動；蔡英地覺得財務長的工作繼續做，職涯就固定了，但回來還會有人生下半場，所以就有了回來養鵝的契機。自營者和社造發展樣態最大的不同，即是前者無法取得政府的經費補助款，是以自營人士皆需透過自身累積的財產來鞏固地方發展的財源和資本。如林煌智獲致百大青農殊榮的前提即是種蒜土地的生產工具，而他也在訪談中提及他曾計算過吳志勇開咖啡廳的成本利潤，直呼一定虧錢，遂吳志勇需藉自身離鄉所學專業而投身的正職工作所得，來平衡咖啡廳的支出。同樣地，蔡英地剛回來時也需要弟弟與爸爸先行處理設備跟場地的問題。但能讓自營者的地方發展實踐面貌如此與眾不同，是在於他們個人生命經驗的其他要素，即人脈的養成與社群媒體的使用。他們都各別希冀著地方景點串連與在地連結形成，因此他們的人脈促成了不同地方發展人士的共同互動與協作，深化地方的風貌。如吳志勇店面設置的小市集，有著林煌智所種海口蒜的相關產品，或者林煌智與吳志勇等人都有著互相舉辦跟協辦各式活動的案例，兩者都讓自身地方發展的內涵更加多元。且蔡英地和王柏惟都有著建立回鄉青年網絡的舉措正在開展，從固定聚會到市集的設立。再者，社群媒體的運用，既幫助各自發展地方時擴大影響力與推播給各樣的受眾，甚而提供串連不同自營發展者的機會，林煌智和吳志勇的合作關係即是最佳的範例。所以這兩位報導人所選定的地方發展實踐，實受到個人生命經驗的積極影響，不論是離鄉在外地成長的過去、所受到家鄉給予的協助，還是人際網絡的培養、網路工具的實作。

另外，在我們的問題意識中，我們同等關心從異質個人生命經驗所激發的社造實踐與自營推動兩種地方發展模式，如何影響從事者去談論身處的地方，即怎樣造就了「在地新敘事」。地方發展人士內部的多重與不同的「論述」，可能藉著

執行「論述」的實踐而產生新的「在地敘事」<sup>7</sup>。以下分析社造與自營之間論述的差異，及社造內部與自營內部各自存在的論述上的歧異，這些如何經由實踐作為而構建出在地獨有的特色敘事，傳遞了認同、想像、情感的內涵。嗣後，再試著藉 Cresswell (2006[2004]) 的社會建構論立場收束，呈現四湖沿海這塊地方樣貌的形塑，係涉及了各式行動者的個人生命經驗，也肯認了不同地方發展論述、實踐與繼而生成的地方敘事的各自建構性影響。

從前面的民族誌材料可觀察到兩種地方發展型態之間「論述」的不同，既在公共性宣稱有別，地方發展規劃上也迥然不同。以「想像對比現況」一節的內容來審視，可發覺社造人士與經歷社造的在地住民多數嘆息景點規劃未串連在一起，凸顯了社造是鼓勵社區居民參與在地公共事務（陳美伶 2021：58），特徵化為未考量經濟因素的公共性宣稱。反而自營人士對於連結在地與地方創生節點的銜接，構成了他們發展規劃的一環。同時社造政策和地方創生方案的關注點本身就不同，尤其是青年返鄉的目標在後者更受到重視，甚而是投入自營的報導人所重點關心，且融為行動規劃的要素。不論是吳志勇持續利用自身咖啡館來與其他自營人士達成合作關係，還是林煌智對蒜業產銷的無微不至，或者蔡英地建立的系統化鵝業養殖，有助於打造青年返鄉的基地，及王柏惟與其他同為返鄉的青年合作。如此論述間的有別，已影響關於地方前景的敘事。如做社區的人留意到人口外流的必然，自營人士卻對青年返鄉有著堅決的目標，抱持正向的想像和期待。

更為細緻地從「論述」的角度出發，以下探詢社造內部和自營內部各別呈現的論述上的不同，藉此得結合前述兩種地方發展方式間論述的對比，以描繪據以成形的多元地方敘事。先從社造這個切面來看，除了已多次提及的社造規劃和實際現況的斷裂外，三人行中每個人著重的實踐方向也無全然相同的版本。蔡茂昌在地方發展有更多長遠的規劃，蔡心娜基於自身茆東村村長的身分而更在意村內的發展，而蔡瑞泉更偏向觀光方向的努力。如此可見茆子寮社造歷程中，地方人士所呈現的「論述」上的不盡相同，即發展規劃的差異。

若從自營人士的角度來觀之，「論述」間的差異最直接起源自每個從事者各有各的行動規劃與安排。有秉持著對於品質的訴求，專注在鑲嵌於鄉下景觀的咖啡館的吳志勇，也有積極扶持蒜農利益，善用網路行銷來提升在地農民所得的林煌智，跟搭起老農與青農共同協力養鵝之橋梁並積極尋求企業投資的蔡英地，或是對小朋友的海洋教育著力甚深，辦理兒童夏令營的王柏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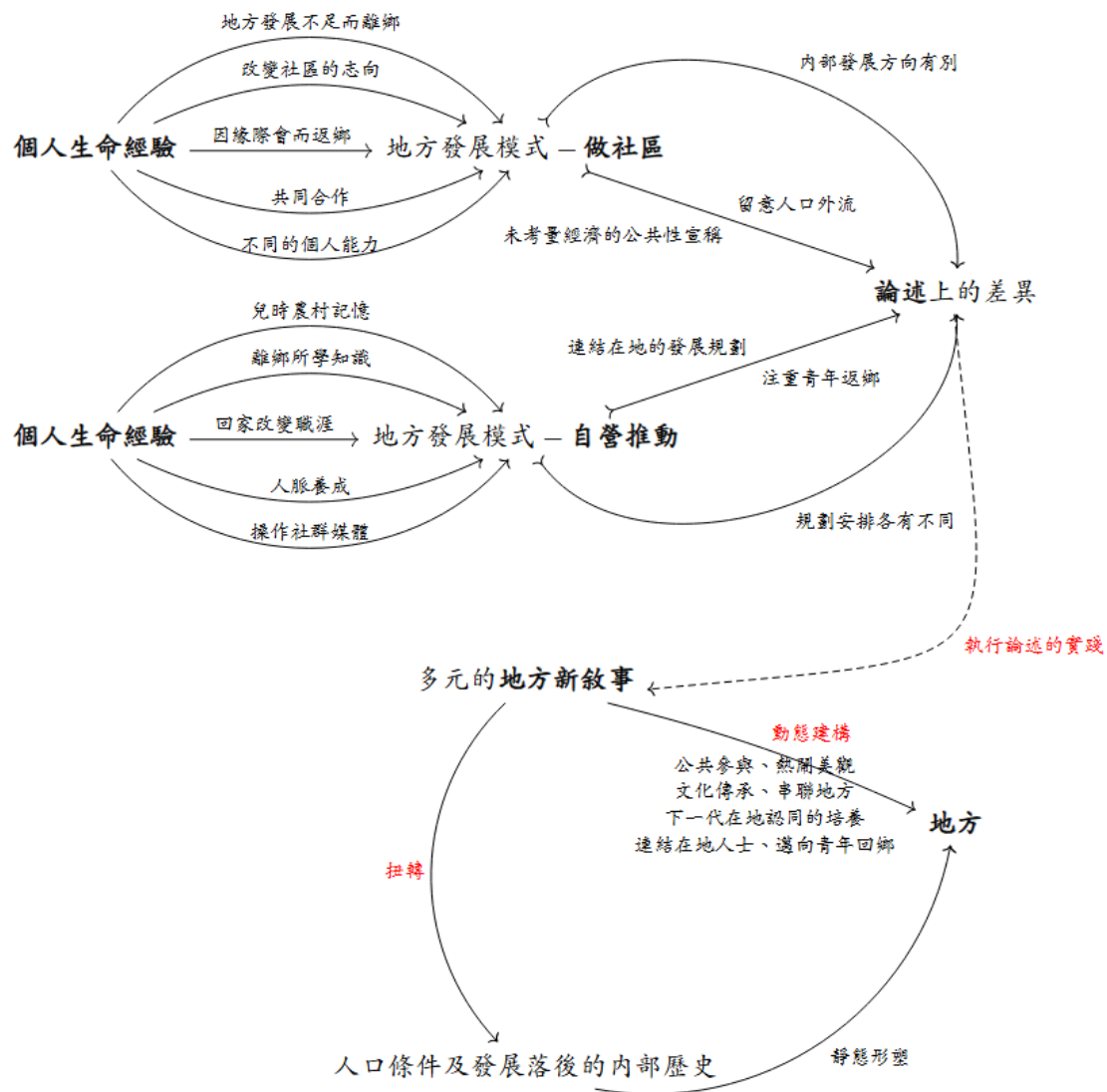
正是這些不同地方發展模式間及內部存在的、論述間的不一致，呈現了不同話語互動下的地方發展情景，而多重論述下的不同實踐遂迸發出在地獨有的多元「敘事」。如社造人士多談到在社造運作前，社區改變不大或者沒在動，而經過

---

<sup>7</sup> 此觀點系啟發自前面文獻回顧所提及的林建宇的論點，惟不同之處在於其也論及政策官僚的論述，且探討的是新、舊論述間的衝突，會透過實踐產生新的敘事（林建宇 2011：12）。

不同論述交織的實踐作為後，每個參與者都產生了對地方的認同、情感。如蔡心娜很著墨在社區人民的共同參與與動員，阿昇感到社區變得熱鬧美觀，也有人來社區看看，黃正鎮則是肯定傳承文化的貢獻。而這些述說了地方樣貌的敘事也混雜著對現況的擔憂和未來的想像，諸如人口外流的窘境和景點沒串連下的觀光客銳減。可是對於茆子寮或者更廣泛的四湖沿海而言，充斥著的不光是這些未來前景不明朗的想像，而是有著自營者對於發展的樂觀敘事，更加凸顯這裡在地敘事的多元樣貌。像是吳志勇意建立有質感的在地咖啡館，且針對在地觀光行程的串連有著深刻的想像。而林煌智從蒜農處境出發，到現在積極串起不同地方發展人士的交流，與策劃在地連結的方式。類似的精神也見於蔡英地鞏固第一級產業的發展，希冀青年回到在地，與王柏惟對小孩的在地認同的培養，期望在孩子心中種下回鄉的種子。透過這些地方發展論述的爬梳，與描繪實踐過後的在地敘事有著怎樣的異質風貌，承載著了不同行動者對這塊土地的回憶、認同、歸屬、情感與想像，得大致解釋地方發展實踐影響了報導人去談論地方，即各種新「敘事」的產生。

以上篇幅大致書寫了個人生命經驗影響下的地方發展實踐，與其可能呈現的異質論述，和在實踐之後所激發的地方新敘事。而這樣的論點所涵蓋的要素，即個人生命經驗、地方發展的論述、其實踐、其產生的多元敘事，實緊密影響著「地方」的形塑。具體而言，從茆子寮到四湖沿海這個地方，並非靜止不動，如同田野地背景介紹一節標明的人口條件及發展落後，而是與地方發展人士多年下來的行動積極互動，呈現了地方內涵不斷的轉化與更新，部分扭轉了城鄉發展不均的情形，地方須被理解為一動態過程。此外，茆子寮或四湖沿海這塊土地，並不是同質化的存在，任何認同、想像、情感都可能不同，甚或衝突。這一點已然可從前面所揭示的異質生命經驗、發展論述的不一致到敘事的多元性來理解。所以從 Massey (1994) 的說法與 Cresswell (2006[2004]) 的社會建構論來看，茆子寮或四湖沿海顯然被各種社會關係所建構與再生產。即各個地方發展實踐，都藉著每個參與者互動下的生命經驗、地方發展的論述、實踐作為、對地方的敘事，構作著他們所關懷與在意的那塊土地。而不斷被建構的多元地方樣貌及想像，也涉及了內部的歷史，與社區營造和自營推動出現前既已存在的事物，即我們在田野地背景介紹所部分提及的內容。



圖十、理論框架與民族誌實例的結合（方宇祥製）

總體而言，以上分析藉著民族誌實例回應了我們問題意識所好奇的發問，即個人生命經驗如何影響具體的地方發展實踐，又這些異質實踐與背後的多元論述下，怎麼導致地方人士去談論地方，也就是我們所辨識出的在地敘事。在回答這些問題的同時，詮釋了田野地作為一個參與者們所深切注視的地方，其形塑怎麼交織著不同尺度下的社會互動並內部獨特的歷史脈絡，且個人生命經驗、實踐論述、多重在地敘事也積極參與著地方的動態建構，箔子寮或更廣闊的四湖沿海遂有著多重的樣貌與不可化約的內涵。

## 八、結論

本文基於十二天的田野，透過訪談的研究方法捕捉在箔子寮從事社造的人與在四湖沿海自營推動地方發展的人，他們的個人生命經驗與地方發展的論述規劃、

具體實踐，及如何談論他們身處的地方，嘗試論證他們的個人生命經驗形塑了地方發展的實踐樣貌，且地方發展所承載且試圖執行的異質論述，經由實踐作為而豐富了「在地敘事」的內涵，表徵了參與者對切身關心的土地的記憶、經驗、認同、想像或情感。再將回應問題意識的這些論點，結合區域文獻回顧的資料，透過 Massey (1994) 對地方的批判性觀點與 Cresswell (2006[2004]) 的社會建構論，解釋茆子寮這個地方和更廣泛的四湖沿海這個地理空間兩者的建構，並非單純受到內在的人口條件與區域發展的歷史脈絡所決定。各地方發展從事者的生命經驗、發展論述、具體實踐、產生地方感的在地敘事都深刻影響著地方的形塑，而呈現田野地所具有的多元樣貌，既非靜態、也非同質化的存在，更是被各種社會關係所建構與再生產。

過去社造或者地方創生的相關研究，部分是從政策面的討論來評估發展的效益，建議未來政策的修改方向和努力的目標（賴炳樹 2022；周芳怡 2024；李晏佐 2023），或是從國家層級的角度來審視這些策略隱含的國族論述（黃麗玲 1995）。而勾勒地方發展行動者具體實踐的著作絕大多數，可能呈現的是與政策論述的對比，或者偏向單一的個案研究，未同時涵蓋社造與地方創生的案例，甚至相互參照比對這些實例。本文即是透過人類學特長的田野觀察及訪談諸多報導人，來蒐集地方發展的微觀實踐與個人的生命故事、對地方現況和前景的看法。也正是基於此，來論證有關地方敘事及地方建構的相關命題。而本文的意義更在於捕捉了存在於不同時間的社造及近似地方創生精神的自營推動，透過彼此論述間的不同，和實踐後的在地敘事有別，嘗試在這兩者間做一初步的比較分析，而非分開來講述特定的地方發展模式如何影響地方內涵的形塑。

但我們仍須承認研究的限制與不足之處，與建議研究可向前推進的方向。首先即是駐足田野地的時間因素，使得我們雖大致訪談了茆子寮社造的多個關鍵人物，與四位的自營人士，但所蒐集的資料仍有很大程度的侷限。一方面是田野中數次修改訪談大綱與問題細項，不斷確認我們所欲蒐集的資料，致使往往會面臨針對已訪談過的報導人，缺少相關問題的詢問和資料的捕捉。如離鄉與回鄉之外的個人生命經驗。再者，我們礙於篇幅和分析民族誌材料的考量，一些我們訪談的報導人鮮少或者未被納入此文，如蔡茂昌的哥哥蔡茂源、沙崙湖文史關懷協會的吳雙喜。同樣重要的是，基於我們對報導人個人生命背景的重視，而較少觸及政經脈絡的爬梳，如地方經歷農工轉型的經濟軌跡，及城鄉移動指涉的戰後經濟變革。這些都有助於推敲文中報導人離鄉和回鄉的社會背景，但我們僅在田野地背景介紹之中，簡略勾勒人口外移的現象和農漁業的發展概況，未詳盡梳理大環境的歷史情勢<sup>8</sup>。因此綜合來看，我們對本文案例的全面性和分析上的嚴謹性仍力有未逮，還望讀者諒解。

---

<sup>8</sup> 此研究不足之處，感謝地方成果發表會中，有歷史學和社會學背景的涂峻清評論人提供，謹致謝忱。



最後，茆子寮的社造和該地的自營推動，或者四湖沿海的自營推動，彼此間有互動往來與潛在合作的可能性，且我們也有詢問報導人對其他地方發展從事者的看法，然而我們未能有效地捕捉兩種地方發展具體合作的實踐樣貌，儘管這對我們分析實踐後的新敘事有著一定程度的重要性。此外，蔡茂昌這樣的行動者，實有跨越兩種地方發展類型的行動經驗，一開始從事社造，現階段接軌自營推動。則讀者可以質疑我們對社造和自營推動的邊界劃分，是否僅是分析上的區辨，致使忽略在地人的認知<sup>9</sup>。這些值得進一步深思並釐清的問題，或許是以後研究者在探討地方發展時可以注意的方向。

## 九、參考資料

Cresswell, Tim

- 2006[2004]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徐蒼玲、王志弘譯。臺北：群學出版社。

Massey, Doreen

- 1994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In Space, Place, and Gender*. NED-New, edition. Pp. 146–56.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文化部

- 2025 〈茆子寮城鄉發展協會〉。「台灣社區通」，  
<https://communitytaiwan.moc.gov.tw/Villages/CommunityFind/CommunityInfo/?vID=594BF44F-88FC-4F48-9A37-963F686AECD9&vM=none>，最後存取於 2025 年 5 月 13 日。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 2019 〈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國家發展委員會」，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icon=..pdf&n=MTA4MDEwM%2BmZouaguOWumi3lnLDmlrnlbXnlJ%2FlnIvIrrbmiLDnlaXoqIjnlaso5qC45a6a5pysKS5wZGY%3D&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xMTUwMC9lOTkzMjYyOC1mNzY4LTQ5N2EtODE3OS1iMDA1MjU3MGEwNGYucGRm>。2019 年 1 月 3 日上線。
- 2020 〈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國家發展委員會」，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icon=..pdf&n=5Yqg6YCF5o6o5YUv5Zyw5pa55Ym155Sf6KiI55Wr6Zmi5qC45a6a5pysLnBkZg%3D%3D&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xMTUwMC84NjIxMmE4NS04YjZiLTQ1MzEtOThjMi1kN2FhMmY1YTA4NTcucGRm>。2020 年 9 月上線。

---

<sup>9</sup> 此盲點，同樣感謝涂峻清評論人的知會，謹致謝忱。

呂欣怡

- 2014 〈地方文化的再創造：從社區總體營造到社區文化產業〉。刊於《重讀臺灣：人類學的視野：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林淑蓉、陳中民、陳瑪玲編，頁 253-290。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李長晏

- 2020 〈地方創生政策理論與策略之建構：政策整合觀點〉。《中國地方自治》73(2)：18-35。

李晏佐

- 2023 〈在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之間：實踐的反思〉。《思與言》61(3)：11-62。

來去鄉下吃自己

- 2024 〈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惜食即期品〉。「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66tHL85HY/>。2024 年 12 月 13 日上線。

周芳怡

- 2024 〈社區營造、農村再生與地方創生之政策內容比較〉。《社區營造學報》3(2)：43-56。

林建宇

- 2011 《地方節慶的文化治理研究—以淡水藝術踩街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研究所。

張正衡

- 2021 〈寓居中的地方主體：日本地域營造運動的過去與未來〉。刊於《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運動》。黃應貴編，頁 217-351。臺北：群學。

張皓鈞

- 2020 《地方創生浪潮的發展政權重構與共利性演繹—以桃園大溪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美伶

- 2021 《美伶姐的台灣地方創生故事》。臺北：天下文化。

陳重成

- 2010 〈全球化語境下的本土化論述形式：建構多元地方感的彩虹文化〉。《遠景基金會季刊》11(4)：43-96。

雲林縣政府統計資訊服務網

- 2023 〈貳、人口〉。「雲林縣政府統計資訊服務網雲林縣統計年報」，<https://yunlin.dgbas.gov.tw/DgbasWeb/statfile2.aspx?mode=3&cateno=02>，最後瀏覽於 2025 年 3 月 28 日。

黃子倫

- 2016 〈城市權爭取—臺中市市民組織在地行動〉。《城市學學刊》7(1)：33-65。

黃淑麗

- 2024 〈【專欄】來去鄉下吃自己 返鄉青農為地方創生開啓標竿典範〉。「銳傳媒」，  
<https://vigormedia.tw/%E3%80%90%E5%B0%88%E6%AC%84%E3%80%91%E4%BE%86%E5%8E%BB%E9%84%89%E4%B8%8B%E5%90%83%E8%87%AA%E5%B7%B1-%E8%BF%94%E9%84%89%E9%9D%92%E8%BE%B2%E7%82%BA%E5%9C%B0%E6%96%B9%E5%89%B5%E7%94%9F%E9%96%8B%E5%95%93/>。2024 年 11 月 6 日上線。

黃舒楣

- 2004 《生活風格的創製：民宿狂潮中的意義生產與想像漂流》。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麗玲

- 1995 《新國家建構中社區角色的轉變——社區共同體的論述分析》。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華叡民、蔡嘉軒、江冠瑩

- 2024 〈何以擺脫無未來？海洋教育與社區發展的能與不能——以箔子寮和三條崙為例〉。刊於《風頭水尾——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頁 361-394。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楊語芸

- 2023 〈海口青年拯救海味蒜！林煌智當蒜農組合作社，打破寡佔市場，大推「長鬍鬚的蒜頭」〉。「上下游 News&Market」，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84671/>。2023 年 4 月 17 日上線。

農業部農糧署

- 2024 〈農情調查資訊查詢〉。「農情報告資源網」，  
[https://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https://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最後存取於 2025 年 5 月 3 日。

劉曜華主編

- 2006 《四湖鄉志》。雲林縣：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賴炳樹

- 2022 〈臺灣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政策之比較分析〉。《土地問題研究季刊》21(1)：96-10。

## 回家生活：箔子寮善水咖啡與雲林海線返鄉青年創生實踐<sup>1</sup>

陳思捷（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四年級）

鄭靜蓉（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溫顯宜（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 摘要

雲林海線近四十年來面臨嚴重的人口外移與高齡化課題。本文從雲林縣四湖鄉箔子寮善水咖啡兩位青年經營者的創業經驗出發，延伸至他們在雲林海線的青年朋友圈，探究這些青年回鄉的背景，及推動地方發展時面臨的挑戰。使用 Ray Oldenburg 的第三場所（third place）理論，分析善水咖啡如何營造如家般快樂溫暖的氛圍，提供人們締結關係、逃脫日常重擔、排憂解難的場域；亦積極馳援地方公共事物，與其青年朋友圈共同為雲林海線注入活水。

關鍵字：返鄉青年，地方創生，第三場所（third place）

---

<sup>1</sup> 本文為 2025 春季文化田野實習課程之課程成果。特別感謝善水咖啡老闆夫婦、善水咖啡顧客吳冠佑和施慧霜、石頭屋經營者、吉品烤玉米老闆、福家草莓園老闆、博幼基金會社工林嫻敏、志忠鴨肉羹老闆夫婦，以及蔡茂昌大哥、蔡茂源大哥與所有箔子寮居民的熱情招待。亦感謝黃郁茜老師與盧佳秀、郭天祐助教的指導與帶領，涂峻清學長的評論與指教，以及一起出田野、交換激盪想法的同學與組員。

## 一、前言

位於雲林四湖鄉的箔子寮以普天宮前面的道路為界，劃分箔東與箔子兩個行政村，廟口是箔子寮的中心，也是人們往來必經之地。在沒有任何超商的小漁村裡，廟口一帶就是居民吃飯、閒話、採購日常家用的地方。寒假田野我們到箔子寮的第二天，走經距離廟口三十公尺遠的雜貨店，想要探聽村子裡的年輕人平時都在哪些地方活動？雜貨店電視播著臺灣戲劇，顧店的阿姨低頭剝著花生，一邊和我們閒聊。聽到這個提問，她低頭擺擺手，說：「這裡沒有工作啦，回來都是養老。」（2025/01/07\_田野筆記）語調些微不耐，彷彿沒有年輕人是村子裡理所當然的事實，人人皆知的常態。

再隔一天早上，我們到廟口對面賣鴨肉羹的小店吃早餐，和老闆閒話店面四十年經營史和她的家庭，順勢提起店裡會不會遇見年輕人來吃飯？老闆想了一下，說：「有像是海巡署、軍警等等的會來，但在地年輕人很少。最近六輕工作機會也減少了。」（2025/01/08\_田野筆記）除了村子裡唯一的咖啡店「善水咖啡」經營夫妻，她舉不出其他箔子寮在地青年。

2018 年行政院在院長賴清德主持下，因應臺灣總人口減少，人口過度集中都會區，為促進人口回流，均衡臺灣城鄉發展，將隔年 2019 年訂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此國家安全策略層級的國家政策，點名 134 個人口流失嚴重，優先推動地方創生的鄉鎮。雲林海線四鄉中除了麥寮，臺西、四湖、口湖三鄉都名列優先推動清單當中。根據雲林縣政府的統計數據，雲林縣總人口自 1970 年代末期開始下滑，40 年間總人口減少了 11 萬人，2018 年雲林縣政府預測隨著低出生率、高死亡率的趨勢，至 2048 年，人口數將再減少 14 萬人（林倖妃 2020）。2023 年臺西、四湖、口湖的人口成長率皆低於 -14.65%，而箔子寮所在的四湖鄉，2023 年人口成長率更是只有 -26.53%，扶養比高至 35.65%，人口外流與高齡化顯著。

在這樣的人口結構背景下，箔子寮「善水咖啡」的存在便顯得十分特別，由 30 歲出頭的兩位年輕老闆於 2021 年疫情期間返鄉創業經營。咖啡廳坐落在距離廟口 50 公尺處，透明落地門窗，布置風格簡潔溫馨。店面來去的顧客群從箔子寮當地國小放學回家的學生、對門農會主任、在箔子寮長大的高中生、教育基金會社工，到雲林海線一帶的育兒家長、返鄉創業青年、工程師與遊客，形形色色難以勝數。善水咖啡如同一處外於家庭與職場，人們可以到此聚會談天、活動交往的「第三場所（Third place）」，孵育著海線大大小小的事情發生，陪伴人們的生活。

在這十二天的田野當中，我們在善水咖啡蹲點，希望討論善水兩位經營者與善水咖啡這個空間本身，所承載的角色與故事。善水的存在，對地方創造了哪些

意義與影響？從善水的經驗出發，也進一步思考，兩位經營者和他們在雲林海縣共同生活、推動地方事務的青年夥伴，鑲嵌在海線一系列社會人口結構與地方創生政策當中，他們如何在家鄉立命安身？打造理想家鄉樣貌的過程當中，他們又遇見了哪些挑戰？

## 二、雲林海線的青年發展課題

青年一直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在城鄉發展不均的情況下，許多年輕人往往因為就業機會與資源集中在都市而選擇離鄉，前往發展條件較佳的城市。這種現象導致部分中小城市與鄉村地區出現人口外流問題，進一步影響地方的產業結構與社會活力，並逐漸朝向高齡化社會發展。

以雲林沿海地區為例，葉惠中、傅鏗漩、高慶珍與李載鳴（2009）在〈土地利用變遷對社會結構之影響－以雲林沿海鄉鎮為例〉一文中指出，自 1993 年六輕工業區設立以來，當地的土地利用與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研究發現，工業區的擴張導致農地、魚塭、濕地及防風林面積大幅減少，進而改變了人口與產業結構。其中設有工業區的麥寮鄉因吸引外來人口與青年回流，經濟結構逐漸轉向工業與服務業。相對於麥寮，缺乏工業發展的口湖與箔子寮等地區，則持續面臨人口外流與高齡化問題，產業也仍以初級產業為主。

人口外流的情況亦可從統計數據中看出。根據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資料，四湖鄉從民國 104 年的人口總數 24,742 人，至 114 年降為 20,595 人，十年間減少了約 4,147 人，顯示地方人口流失情形相當明顯。這些變化，正是城鄉發展落差、產業機會不足與青年移出等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

更深層的問題則反映在青年對地方的認同感與發展意願上。當地方缺乏吸引青年的機會與資源，甚至連當地居民與家長都對未來感到無奈與失望時，便容易出現「家鄉沒有未來」的普遍認知。以雲林四湖鄉箔子寮一帶的海線地區為例，許多家長並不鼓勵子女留鄉發展，反而傾向支持他們離開，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華叡民、蔡嘉軒、江冠螢 2024）。這種態度深刻地影響了青年的地方感與未來規劃，也間接對當地的教育、產業與社會氛圍造成長遠的影響。故如何強化青年對家鄉的認同，創造能夠吸引青年留鄉發展的條件，也將是地方創生與均衡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

饒祐睿（2024）對雲林西南濱海「靠海村」的民族誌研究，提供了一種反向的觀察。文章指出在此村落仍有不少青年留在家鄉從事漁業相關工作，並以「自由」來描述他們對生活方式的選擇。這樣的「自由」不僅是工作時間上的彈性，更是與環境流變協調共處、在勞動中尋找生活節奏與意義的能力。作者主張靠海生活中的技藝實踐——無論是應對潮汐與風浪的變化，還是創造性地利用沙洲與

水產資源——構成一種對抗單一都市發展模式的地方實踐型態。這種以世界時間的測繪（world-time mapping）為基礎的生活形式，不僅維繫了地區的經濟，也創造了青年可感的生活價值與尊嚴。

在此脈絡下與其單純以工業化或都市化作為解方，我們從饒祐睿（2024）的研究中，理解青年如何在地方實踐「自由」，並強化其對地方生活的能動性，是另一種重新構思地方發展與青年留鄉可能性的關鍵路徑。當我們從「靠海生活技藝」中看到青年不只是被動承受地方困境，而是在具身實作中創造生活空間與社會位置，便能夠更深刻地理解地方創生所需的不僅是資源挹注，更是對地方生活意義的再發現與支持。

海線青年發展課題反映了偏鄉地區面臨的多重挑戰，這次我們尤其關注到雲林四湖鄉箔子寮一帶。總結上述葉惠中、傅鏗漩、高慶珍與李載鳴（2009）所提可知，隨著六輕工業進駐麥寮，資源與人口逐漸集中在特定地區，未能納入發展計畫的村落則面臨青年出走、人口老化與產業單一的困境。

當地青年對於留在家鄉發展的意願逐漸降低，並且受家長悲觀觀念影響，認為家鄉缺乏未來。教育體系也受到這些變遷影響，成為依賴個人努力的模式（華叡民、蔡嘉軒、江冠瑩 2024）。

### 三、文獻回顧

#### （一）從社造到地方創生

回應城鄉發展不均，並推動在地社群公共參與，近年「社區總體營造」與「地方創生」已成為臺灣人琅琅上口的概念。下述段落，我們要先回顧「地方」是什麼？臺灣人類學研究如何思考經常與地方共伴出現的「社區」概念？近三十年，臺灣推動地方經濟人口發展的政策典範，經歷了怎麼樣的轉向？後段文獻回顧，將回答這三個問題。

#### 1. 人類學的地方與社區研究

在全球化與地方發展交織的脈絡下，「地方」的概念已不再僅僅指涉一穩定的地理單位，而是一種不斷生成的社會實踐場域。Cresswell（2006〔2004〕）指出，地方並非如鞋子或汽車那般由工廠製造的成品，而是處於不斷生產與再生產的社會過程，在日常生活實踐與重複性活動下，持續被建構與再意義化。地方之間彼此關聯共構，導致了邊界、場地、選擇性連結、互動和定位。透過空間命名與日常生活安排，地方被鑲嵌進更大的文化敘事。除此之外，地方也是許多我們

用以經驗世界之媒介的組成成分，比如報紙、電影、音樂與文學，當代電子媒體正不斷重新中介和同質化我們在經驗的地方與世界範疇。

呂欣怡（2014）結合 Cresswell 的「地方建構論取向」與自身在臺灣的田野經驗，點出臺灣習慣使用的「社區」概念並無固定主體，「是一個正在形成（becoming）的過程，所有在此時空相會的人與論述，都可能成為它『未來的過去（the future's past）』的一部分（呂欣怡 2014：256）。」她回顧歷史，「社區」的概念於 1960 年代隨聯合國的發展方案引進臺灣地方社會，成為國家推動現代化願景的單位；1991 年內政部修訂「社區發展工作綱領」，將社區理事會改為社區發展協會，理監事等由會員投票選出，社區如同地方性的志願團體；1994 年，文化部前身文化建設委員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社區」被視為地方認同的依歸，也承接國家經費，負擔諸多地方治理職責（ibid.：258-259）。

「社區總體營造（簡稱社造）」政策包含「人、文、地、景、產」五大面向，期望透過文化與藝術發展地方特色，從下而上由民間組織規劃提案，培養居民歸屬感與公共事務參與熱情。社區總體營造作為起點，20 年間，臺灣推動的社區計畫不勝枚舉，例如 1997 年行政院經建會改造地方人文自然生活景觀的「創造城鄉新風貌方案」、2002 年滾動式整合各部會社造資源的「新故鄉社區營造」、2010 年農委會補助沒落農村活化的「農村再生計畫」等等（李永展 2019）。因著諸多政策框架、媒體用語、「做社區」的專業中介者轉譯、研究者論述，1990 往後 20 年，「社區」從陌生新穎的概念，轉為臺灣官方、學界與民間認識地方的尺度（scale），在多重話語體系中，動態構築地方的想像內涵（呂欣怡 2014：257）。

呂欣怡（2014）將臺灣既有社區／社造研究依研究者的理論關懷，分為四種取徑：第一，將社造視為對抗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地方運動，認為地方雖受都市空間商品化影響，但也具有集體動員對抗發展主義的動能；第二，將社區視為公民社會的基礎，在國與家之間建立一個居民可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公共領域；第三，檢視地方文化產業所造成的社區展演化與地方文化商品化問題；第四種則是上述 Cresswell 的「建構論取向」，以政治經濟因素分析社區成形過程。她舉出當時三項人類社區／社造文獻的缺口，一是研究者鮮少和地方社會（漢人親屬、宗教、原住民部落等）文獻銜接對話，二是尚未出現將社造現象置於全球地方發展脈絡進行討論，三是較少對於單一社區營造過程的長期觀察研究。

承接呂欣怡的反思，黃宣衛（2022）研究臺東池上的作品可視為近年社造研究的佳作。《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一書理論基礎同樣使用 Cresswell 的「建構論取向」，黃宣衛以「地方社會」的概念取代單一社區或社群，納入百年行政區位與街庄變遷，閩南、客家、原住民社群社會結構與族群治理政策，地方派系和漢人祭祀圈等多重面向，藉以說明池上的地方社會組構背景。除此之外，



書中將池上發展成功的關鍵，放入臺灣戰後米農政策和全球糧食市場結構進行討論，也將鏡頭一一對準池上官方及民間社造重要行動者，凸顯行動者們在池上一系列環境保育、產業發展、觀光文化工程中的角色，脈絡化池上以鄉為單位社造成功的特殊之處。

## 2. 「地方創生」與「社群性」的新概念典範

社造概念走到近十年，面對當今社會人口、物資、知識、金流高度遷徙流動，人們日常活動範圍擴張，地域發展持續失衡，政策與理論典範開始出現新一波反省。比如從政策的角度出發，李永展（2019）點出社區總體營造及其後的地方發展政策，侷限於社區尺度與在地居民身分，疏忽應對流動遷徙的人口需求；此外，硬體建設與空間改造鮮與地方經濟產業與社區需求銜接，不乏出現空間閒置狀況。

2019 年，臺灣行政院將「地方創生」核定為國家級的戰略計畫。地方創生的概念源自 2014 年九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激勵地方小經濟圈再生」（日語：ちほうそうせい；英語：regional revitalization）政策，回應鄉村地區面對高齡化與少子化，盼活絡地方經濟，創造地方產業特色，促進青年回流及文化保存（張力亞 2018）。在「地方創生」的願景下，行政院提出五大標的：企業投資故鄉、科技導入、整合部會創生資源、社會參與創生、品牌建立，從各層面切入創造地方生活意義，發掘地方宜居魅力，讓青年發揮所長，帶動人口流動（李永展 2019；王村煌 2019；陳建豪 2022）。

跳脫地理及行政劃分上的社區尺度，「青年」在地方創生的概念脈絡中，不限於地方原生長大的年輕人。林承毅與謝其濬（2020）在《二地居：地方創生未來式》一書中，提出四種建立人地關係的模式：與地區有情感而願意回訪的「關係人口」、在非長居地短暫經營副業的「流動創生」、城鄉兩地生活工作的「二地居」，以及新移住鄉村的工作者「移居／定居」。此四種人地關係（也可能在不同模式間過渡），有機會為地方注入新的能量，藉非長居者對地方的情感與凝視，為地方特殊性帶來不同的洞見。

而回到理論與研究方法的觀點，黃應貴（2016：15-16）在其主編的《21 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提出新的「社群性（sociality）」的概念，認為研究者可以藉由探問：人憑藉什麼與他人有所關聯？環繞個人生活實踐描繪社群關係網絡與地方感範疇。張正衡（2016：91）在書中收錄的〈根莖狀的社區：新自由主義下的日本地方社會〉，進一步將社區定義為「群體中的個人在共享的整體脈絡中一同活出來的社會形構」，包含對自然環境變化的體驗、以農產禮物交換織就的地方網絡等等，跨越不同聚落與族裔，在日常實作中組裝資源及關係。

### 3. 小結：地方政策與新自由主義

從「社區總體營造」走向「地方創生」，雖然看似國家下放權力，使民間草根力量有更大空間參與地方治理、打造地方產業，然背後隱含的新自由主義邏輯仍舊持續運作，影響著地方的發展動能。張正衡（2016）就提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強調應自我負責、自力更生，中央將原先統籌的稅賦轉由地方徵收，然可能忽略各區域自然與社會資源分布不均的現實狀況；地方立意發展特色經濟模式，卻往往離開不了觀光產業化及文化商品化的取徑。

Jamie Peck 和 Adam Tickell（2002）也在文獻整理觸及類似批判。他們將新自由主義化的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柴契爾夫人和雷根政府時期的「roll-back neoliberalism」，以小政府為導向，國家力量退位、去監管化，反對工會與社會福利計畫；第二階段「Roll-back neoliberalism」出現於 1990 年代後期，國家在犯罪、移民、福利改革、社會秩序等面向的干預增加，表面上經濟去政治化，但實際上將發展責任歸諸地方——都市創業主義（urban entrepreneurialism）讓地方通過補貼、推廣自身等方式，吸引流動的資本和資源，滿足政策原則、競逐資源的同時，如此的競爭邏輯也強化了超地方的規則體系，加劇地方間的落差。

在茆子寮與雲林海線，我們看見社區總體營造與地方創生兩股力量同時引導著地方的發展想像，青年在自身產業推動的發展因地方創生的政策觀點受挹注、關注；於此同時，青年也與社區中既有的行動勢力，無論是社造典範下的社區行動者或地方政治派系，彼此交手、相互協作。

從「社群性」的角度下看，我們發現因育兒、青年聚會、海線反風吹運動等不同原因產生連結的人們，在善水咖啡聚集，共同打造屬於他們的地方感與地方記憶，尋找地方公共議題出路。青年群體在地方的行動、論述與形象見報，共同參與了「海線」的地方想像內涵形構過程。然在地方新自由主義邏輯運作下，青年在地方的參與不懈卻始終受限。後續研究將詳述青年在地方的行動、影響及挑戰。

#### （二）第三場所（third place）

第三場所（third place）理論由美國社會學家 Ray Oldenburg（1989）提出，指介於家庭（第一場所）與工作場所（第二場所）之外的非正式社交場所，這類場所在社會互動、社群建立與公共生活中扮演關鍵角色。

第三場所作為非正式公共生活的核心環境（core settings），通常是「交誼場合」和「營業地點」，提供一個人人平等且皆有權使用的空間，滋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擴展各種人際互動的可能，人們也不必過於煩惱所處環境下的主客

關係，是至今少數能夠讓各種年齡層的人感受彼此陪伴的地方，而其存在的理由便是來自於跟日常生活中其他環境的差異。它的經典特性還包括開放時間長、容易出入、條理結構低、物理結構樸素、店內氣氛歡樂、如同另一個溫暖的家等，這些則是其不同於第一、第二空間的魅力之處。

第三場所存在於中立地帶（*neutral ground*），具多元功能性，包括同化（*assimilation*）提供新來者一個自然且無壓力融入的「入口」；交會場域（*sorting areas*）連結廣泛的人際網絡；活動舞台（*staging area*）在地方面臨困境時，給予的支援與政府機構同等甚至更為重要；可公開討論政治的場合（*political fora*）、知識交流的場域（*intellectual fora*）讓人們可自由且開放地談論各種議題，涵蓋時事政治、學術交流到日常瑣事；逃脫（*escape*）一個逃離家庭和工作的避風港；同伴感與群體支持，在聚集多人的場域可結識更多朋友，獲得歡樂與陪伴；成員身分（*membership*）讓人對社區產生歸屬感；開心（*fun*）/ 娛樂，不外乎是吸引人們不斷回訪的根本動力。

而 Ray Oldenburg 認為第三場所的開心（*fun*）/ 娛樂功能，是由人本身提供的，因為這裡聚集各式各樣的人、發生著各式各樣的對話，使每個獨特的個體互動、連結，豐富了彼此的人生，共創一個眾樂樂的氛圍場域。此外，Ray Oldenburg 也挖掘出「*joie de vivre*」（法文，指生活樂趣）的箇中精髓便是人們得以在公共場所中獲得樂趣，使他們可能會想天天去這些不需高消費而又可以自在待著的地方。

美國文化評論家 H. L. Mencken 對這些第三場所的看法與 Ray Oldenburg 相似，他形容當時享譽盛名的巴爾的摩小酒館是「安靜的避風港」和「免於俗世煩憂的療養院」。除了作為逃離現實的避風港，Ray Oldenburg 也認為第三場所提供了「家的感覺」（*homeness*），在書中引用美國地理學者 David Seamon 根據「另一個家」、「在家感」（*at-homeness*）提出的五項評估標準，分別是生根、占用（*appropriation*）、形成、社會、溫暖（*warmth*），其中溫暖又是五個特質中最難以捉摸的。

第三場所的理論發跡於美國都市中產階級男性生活脈絡，回到臺灣，人們社會生活有諸多非正式社交場所，同樣包含容易出入、氣氛歡快、沒有明確活動結構等條件，比如廟口聚會處、廊簷泡茶處、榕樹下下棋處。不過隨著社會變遷，不同世代偏好的社交場所風格或多或少也跟著改變，要在社區營造一塊讓所有人都想常常造訪、具上述多元功能的「第三場所」並非易事。

地方創生典範中，日本地方推動者齋藤保（2021）曾提出「社群咖啡廳（*community café*）」的概念，透過咖啡館在社區中凝聚人群，活化經濟、推動特產，也建立老幼照護網絡。除此之外，在社會工作的其中一個分支：社區工作，Littman（2020）曾將第三場所視為受刑人、年長者、無家者等社會移動／流動能

力受限，「空間倒塌 (collapsed places)」者重拾支持網絡的替代方案。在臺灣不乏可見相關例子，如陪伴無家者的「重修舊好」，支持非行兒少也提供咖啡師職業訓練的「未來咖啡」、「書屋花甲」等，都可視為當代第三場所的實踐。

在善水咖啡的這些日子，我們發現善水具備上述第三場所理論中的諸多元素；而善水在臺灣西岸濱海社區，也打破第三場所與第一、第二場所之間絕對的界線，從經營者自身對家庭、創業的展望出發，拓深到與社區多元公共的連結。

#### 四、「誰要在這裡開咖啡廳？」：善水咖啡的成立背景

提到箔子寮在地 15-25 歲區間與我們年齡相仿的人口，高二生冠佑大概是我們遇見的唯一一位。冠佑幼稚園時家裡從板橋搬回箔子寮，九成居民他都認識。自小接觸廟會文化，他打得一手好鼓，也是全中運角力選手。閒來無事常在廟口玩耍，或去口湖下崙全美超市找朋友。

2021 年疫情未退，雲 131 縣道一間平房敲敲打打。預計裝潢成咖啡廳的店址，距離四湖鄉海邊小漁村箔子寮信仰中心普天宮 150 公尺。圓招牌寫著「善水」，低調地從簷廊向電線桿與矮房舍夾住的藍天招手。

咖啡廳開幕第一天，13 歲的冠佑悠悠晃過去，心想：「到底是誰要在這裡開咖啡廳？」

殊不知，一去就是多年流連。咖啡廳成為他閒暇在箔子寮的落角處之一。他叫咖啡廳老闆「玎玎」，課後常常一個人跑到咖啡廳和玎玎「畫虎驪 (uē-hóo-lān：說話喜歡吹牛，誇大不實)」、打遊戲，玎玎教他怎麼泡咖啡、做拉花，他幫外出擺市集的玎玎收攤顧娃。開幕那年聖誕節，冠佑扮聖誕老公公，和玎玎沿著箔子寮彩繪村一整圈踩街報佳音。店面鐵門拉下，冠佑會拉著玎玎全家到其他咖啡店出遊，騎車帶玎玎的三歲兒子逛夜市；有時冠佑媽媽小霜煮飯過來，兩家人在店裡共進晚餐 (2025/01/13\_\_田野筆記)。進出之自然，宛若他們在箔子寮的第二間客廳。

究竟是誰會在箔子寮開咖啡廳？咖啡廳坐落的空間收納了什麼樣的地方故事？本節將講述善水的背景故事。

##### (一) 善男信女：兩位經營者的創業歷程

冠佑口中的善水老闆叫「玎玎」，但其實現在經營者無人名字含「玎」。善水創辦人夫妻倆一人姓王，一人姓丁。

玎玎是王老闆的小名，本名王柏惟<sup>1</sup>，從小在四湖鄉茆子寮長大，現在 30 出頭歲。咖啡廳店面坐落的房舍，正是他們家三代生活的舊厝，他是咖啡廳 50 公尺外建陽國小的畢業校友。T 恤、黑框眼鏡加一頂棒球帽，咧著大大的笑容，是玎玎的經典出場造型，陽光而隨性。

在雲林的高中念書時，柏惟認識了同班來自虎尾的丁俞伶，在日常朋友打鬧裏頭，感情慢慢堆疊升溫，畢業前夕開始交往，一同到嘉義南華大學就讀。柏惟念思考生死哲學、生命禮儀工作的生死學系，俞伶則是外文系學生。據俞伶回憶，高中時期柏惟很常擔任如班代、合唱團指揮等領導者角色，充滿責任感跟號召力。

大學畢業後，柏惟跟著同學去到屏東殯葬公司實習，但在家人的顧慮下，僅僅實習了一個多月，便轉往高雄大立百貨當銷售人員。銷售做了三年，因為感覺受雇工作處處受縛而決定辭職。在南臺灣接連嘗試了飼料業務、童書銷售，工作僅約一個月，都覺得沒興趣，而回到雲林，進到一間有機水果店工作協助販賣。一系列探索過程，他發現自己喜歡能夠與人互動的店面銷售位置，但作為受雇者，不時會因為經理管理方式和雇主產生分歧，因而悄悄埋下自立創業的心願。「用別人的環境、產業、商品，吃點虧學習怎麼當老闆。」懷抱這樣的心態到食品工廠觀察生產線如何安排，一邊加班工作一邊吸收工廠封裝、打錠等技術，做工三個月後，他離開食品工廠，開啟生命中的第一次創業——「大裕農牧場」。

大裕農牧場為 2017 年柏惟和兩個哥哥王裕升、王嗣文共同創立的蛋雞畜牧場，引進會誕下粉殼蛋的法國品種「伊莎」蛋雞做出市場區隔，並參考歐盟飼養法，採人道養殖，不使用抗生素，抱持「我們給牠吃什麼，它就會回饋我們什麼」理念經營。除大哥外，嗣文、柏惟兩弟弟沒有飼養相關專業背景，創業他們時四處求教有經驗者、翻查資料，了解養雞環境維護、疾病防治、營養補充、有機生態農地轉型等知識，也曾親身住進雞寮觀察母雞的習性與狀態變化，至口湖數位機會中心學習科技行銷技術，拍攝影片線上與受眾互動，打造品牌印象（蘇榮泉 2017）。

在柏惟的回憶敘事中，推動他返鄉自立創業的動機，除了對「自由」的追求，從受雇者轉為自雇者，擁有更多決策權上的自主權，實現對產品品質及生產過程的價值理念；家庭狀態以及對家人和鄉土的依戀情感，也是他重要的考量因素。兒時父母經營飼料廠時常忙碌到晚上九點、十點，柏惟由住在鄰近口湖鄉下崙村的外公外婆帶大。2017 年外婆肝病，希望陪外婆度過生命最後一段時間，讓他決定放下在他鄉的事業發展，回到雲林照顧住院的外婆。有回外婆去買雞蛋，被賣蛋老闆的熟客插隊，外婆據理力爭反被老闆斥責拒賣，看見外婆失落的神情，柏

---

<sup>1</sup> 若查找過往王柏惟接受媒體採訪的新聞報導或店家合作宣傳影片，大多以王玎維稱之，因為曾經改名。兒時他受外公取名王嗣維，大二改名王玎維；已逝母親希冀下，2024 年改為現名柏惟。妻子也一同改名，從丁慧喬改名丁俞伶。考量敘述連貫性，後文皆以現名柏惟、俞伶稱之。

惟決心乾脆自己養雞生蛋，不再讓外婆受委屈。2018 年外婆辭世，接續幾年外公、母親陸續生病、離開，家庭事業雙因素，把柏惟牽回雲林，留在風頭水尾的小村莊。

憶及外婆，柏惟向我們說故事時，隨手翻起放在店面書櫃由他朋友為雲林縣府製作的繪本，繪本畫著屬於「外婆」的餐桌味道。配合繪本出版，柏惟受邀為繪本創作詞曲，歌詞印在故事主線外，呼應著故事的情感。與繪本內容創作同時進行，柏惟的歌唱著離鄉打拼的遊子孤身在車站思家，空轉於茫茫城市中的孤寂、疲倦和惆悵，從另一個角度講述「家鄉」的意義：得以休憩安頓、與羈絆之人共同經營之所在。相似的主題，也反覆出現在他和其他返鄉友人的詞曲創作當中，在雲林市集或地方音樂節演唱。城市經驗的挫敗與對鄉間家庭生活的眷念，在料理、海風等雲林海線特色元素的象徵使用下，經過文本與樂曲媒介，成為一種基於共享經驗，在雲林青年中具有渲染性、裊裊不絕的回音。

因為各自專注發展事業分隔兩地，大學畢業後，柏惟和俞伶曾分手一段期間。柏惟去到南臺灣的同時，外文系的俞伶因為喜歡教小朋友，北上到臺北英語補習班工作一年，但工作環境對行政細節安排要求甚嚴，因為難以應付來自主管、家長與學生端的壓力，俞伶在臺北轉做 SPA 館按摩、美容業，又輾轉回到雲林工作。

2019 年，人生即將步入三十，柏惟得知俞伶回到雲林，一通電話撥去，以結婚為前提詢問高中初戀願不願意再次交往。Covid-19 疫情百工蕭索之際，柏惟與俞伶的感情花火復燃，隔年兩人快速步入禮堂，四處玩耍了一整年度蜜月。討論到未來共同生活安排，俞伶嚮往日劇般羅曼蒂克而溫暖可愛的生活畫面，柏惟於是跟俞伶說：「不然我們圓一個夢，回箔子寮開間咖啡廳吧！」

## （二）日臻完善：善水空間的前世今生

咖啡廳成立以前，距離村落信仰中心普天宮 50 公尺遠的善水的店址，是王家三代的住家和店鋪。



圖 1 善水咖啡社區位置圖  
(2025 年 6 月 16 號 取自 Google 地圖)

1976 年箔子寮漁港開港啟用，1980 年配合漁業發展，雲林縣漁會遷移至箔子寮漁業大樓辦公。箔子寮漁港曾是雲林縣境內唯一的三級（地方級，相對於中央、省層級）港口，船滿為患，尤其逢烏魚汛期，他區漁船亦會到箔子寮入船停泊（劉曜華主編 2006：193，208）。1970 至 1980 年代，可說是四湖鄉的盛世，人口從戰後 1949 年兩萬五千人，1970 年成長至頂峰四萬兩千人（ibid：242），而後逐年遞減，2025 年僅剩兩萬人。

1970 至 1980 年代因漁港帶來的繁景，仍是箔子寮年長居民心中鮮明的記憶。在廟口開賣羹逾 40 年的老闆娘向我們形容，每逢過年人潮聚集到廟口，一片喧鬧沸騰，「錢是用布袋裝的。」捕魚農事得閒，男人們會到彼此家中聚會開桌打四色牌、象棋與麻將（2025/01/08\_田野筆記）。

1970 年代善水所在的平房為村裡外省地主所有，正是其中一棟人們進出往來，聚集打牌的熱鬧空間。曾經對門（四湖鄉農會現址）專賣羊肉爐，三十步之外，開著快炒店與雜貨店，平房就坐落在村子的核心地帶。後來屋主輸錢變賣屋舍，被柏惟爺爺收購來經營食用油生意，使用海線種植的雜糧旱作黑芝麻與花生，榨成黑麻油與花生油販賣。

柏惟父母結婚後，這棟空間轉給年輕夫妻使用，既是家庭住所，也是柏惟父母經營飼料、米、油生意的店舖。柏惟家裡曾經蓋鵝舍養鵝，直至 2014 年禽流感養殖不易才撤除。累積一些營收利潤後，柏惟父母把原先的平房加蓋二樓，加高地面以防淹水，成為現在我們見到的房舍外觀。



圖 2 善水咖啡外觀  
(2025 年 1 月 8 號 洪滄青攝)

2021 年，柏惟跟俞伶決定返鄉開咖啡廳，重新漆裝一樓內室，以極簡風格出發。木造吧檯向門口那面設計側拉窗，外帶客人可以直接從窗口點餐；吧檯另一側以挑高桌面區分顧客座位和老闆工作空間，讓老闆能同時準備茶水咖啡又和顧客聊天。推開透明玻璃門口走入，會看見大約 20 多個座位區，呈 L 型包圍吧檯，輕巧的桌椅容易搬動，方便併桌或為各種活動改變空間動線。門口右手邊白色牆面掛著箔子寮的照片，像是夕陽、蚵架等等海線地景；轉角區是烤箱和書展架，不時可看到零星散置的童書或兒童玩具；再過去一些，正對吧檯的牆面由柏惟自己漆成藍色，以細麻繩懸掛著他帶客人去海邊觀測日蝕的活動照片。白色拉門區隔咖啡廳的前後臺，拉門背後是儲藏室兼兩人三歲兒子泓鈞的遊戲間，有道樓梯通向二樓住家；再往後是備料煮食用的廚房，客人老闆共用的廁所在最內側。



圖 3 善水咖啡內部空間  
(2025 年 1 月 8 號 洪滄青攝)





圖 4 善水咖啡吧檯  
(資料來源：Google Maps 2025)

之所以取名「善水」，是因為開店前某天柏惟做了個夢，夢裡他走在海邊路上，突然有顆球飛向他，時間慢速下來，他看到了個「善」字，想到咖啡是水做的，又想到「善良的人尚水」這句俗諺，決定用善水當店名。

開幕於疫情期間，善水最初提供麵包、吐司、咖啡與點心給鄰近居民和路過的旅客；數年過後，店裡裡基本菜單包含咖啡、柏惟特調飲品（巧克力牛奶、抹茶歐雷、蜂蜜牛奶），和俞伶看網路自學製作的點心，比如巴斯克蛋糕、檸檬蛋糕、蛋塔或提拉米蘇；過年期間，也會製作送禮自用兩相宜的堅果糖糕禮盒，頗受社區居民、尤其是有送禮需求的業務或公職人員喜愛。

室內空間雖以白色拉門區分前後臺，但實際界線常常不那麼嚴明。我們在善水的期間不時遇見拉門敞開，咖啡廳三歲小老闆和附近小朋友或幼稚園同學穿梭在拉門前後空間遊戲；又或是柏惟俞伶走進廚房為來者簡單煮一碗湯麵，再加入前台的聊天對話。整體空間沒有繁雜妝點，但乾淨敞亮，適合自在地交流活動，給人的感覺就像是柏惟形容影響他很深的空間故事——四湖鎮街上一間曾賣調酒、麵飯，幾年前已關店的餐廳「未央歌」。柏惟的經營理念是：「我覺得一間店的氛圍，應該要有種『坐在這裡就是一家人』。不會因為你是新的客人就被隔離。比如來客是設計師建築師，遇見有人要蓋房子，這間店馬上能就連結關係，協助排憂解難。不一定是解決問題，但可以提議。」(2025/01/10\_田野筆記)

善水做為一個空間，橫跨五十多年的生命，從過往漁民村人打牌聚會的場所，到而今成為海線居民與旅客的咖啡廳，是日常生活娛樂、休息換氣之地，也不斷創造新的機會與關係連結，紀錄著一代代箔子寮寓居勞動者的身影。

### (三) 小結：擇善固執

除卻最初羅曼蒂克的地方咖啡廳小店想像，在青壯年基數極低，少數在地青壯年人口大多從事公職、開餐廳、民宿或保險業務，過往一級產業為主，而今高齡化的茆子寮，要開咖啡廳並非易事。店面裝潢時，老闆們也曾聽到鄰人閒言碎語，不看好善水發展。

「那時候也有想過開早餐店，但想說這邊已經有些早餐店，一些長輩已經在做，就覺得可以開咖啡廳，提升文化質感，提供一個可以聊天、舒適的場所。是個多功能空間，彈性供各種活動使用。」俞伶說，是他們最初開店對善水定位的想像。(2025/01/13\_田野筆記)

創業迄今三年多，我們待在善水的某一天，善水咖啡 50 公尺外建陽國小的老師剛好傳訊息過來，和老闆夫妻分享國小課程帶孩子繪製社區地圖，善水咖啡出現在全班十位同學的地圖當中，被孩子認為是社區地方特產、文化特色。

林承毅(2020)在對臺灣地方創生未來想像的著書中，提出兩項他認為推動地方未來，對抗「地方消滅」的關鍵：打造地域品牌，以及發展地方自己的「關係人口」。前者意味著創造一處「在地人自信，憧憬者喜愛，旅居者認同，旁觀者期待」的希望之地；後者指的是建立對地方充滿依戀及歸屬感，但不居住在該地的人，這樣的「關係人口」有機會成為地方的支持，在地方展開副業、參與地域振興活動，甚至最終決定移居地方落地生根(林承毅 2020: 28, 42)。從茆子寮的尺度而言，善水咖啡的存在，就存在像這樣未地方注入活水的潛能，成為地方的記憶點，為地方創造帶有情感連結的關係社群。

回到本節開頭，「誰要在這裡(海邊人口外移的小村落)開咖啡廳？」返鄉創業背景的討論。同是海線留鄉青年經驗書寫，饒祐睿(2024)在他對雲林「靠海村」留鄉討海青年的民族誌中，指出能夠與沙海環境協調，創造有意義勞動與生活節奏的技藝，構成了青年討海人追求相對於受薪工作固定工時，「自由」生活安排的能動性來源。饒祐睿的研究，提供了我們一種單純階級複製之外，在工業化、都市化時代，理解青年留鄉投入地方產業工作的可能性。

善水兩位老闆柏惟與俞伶的返鄉創業歷程，投入的產業型態和近海漁業大相逕庭，但同樣展現出一種對「自由」的追求，脫離受雇異化的工作環境，和以市場薪酬邏輯計算的個人成功路徑。青年借助先前在外工作累積的經驗，拼裝各路學習資源與曝光機會：如網路教學影片、政府數位機會中心，和地方市集、公益活動、媒體採訪，累積創業資本，實踐自身對生活與產品的價值理念，以及從家到鄉的地方情懷。

本節提供善水咖啡兩位老闆的創業背景，和空間本身的前生今世。下一節將以我們田野的實際觀察，更進一步討論善水之於地方豐富的功能與意義。

## 五、多多益善：善水咖啡的多重角色

### (一) 逃脫 (escape)

在正式抵達箔子寮、拉開善水咖啡那扇木門之前，我們對善水的想像，僅停留在網路上零星的文字與影像之中，以及老師、助教和上屆學長姐們心照不宣的祕密「善水我們的解憂咖啡館」。

直到與善水產生交集，是從一則 Facebook 約訪訊息開始。一個月後的早晨，我們如約而至，還未進門，柏惟的熱情便先一步迎了上來，帶著如窗外陽光般燦爛的笑容，邀我們入座，奉上熱茶與點心。那樣的親切，彷彿不是初見，而是與臺大老朋友的久別重逢。

五天後，終於迎來了大家期盼已久的休息日，善水咖啡為同學們籌備一場小型派對。那天中午，我們稍晚抵達，一拉開門麻油雞的香氣便撲鼻而來，俞伶穿著圍裙在廚房忙進忙出，小霜騎到鎮上提了一隻金黃油亮的全雞回來，柏惟則熱情地招呼大家。這場派對不單只是文田同學、助教與教授的聚會，也吸引了不少在地的熟面孔，老顧客進門寒暄，街坊鄰里來串串門子。

柏惟熟練地架好卡拉 OK，伴奏一響便高歌開場，氣氛瞬間被炒熱，正式展開一場勁歌熱舞的接力。同學們輪番登台，有人深情對唱，有人隨節奏拍手、搖擺，還有人隨歌圍圈盡情起舞，小霜也不甘示弱，唱起她拿手的經典老歌。最後，我們用一首〈追追追〉安可曲熱血作結。

那天，時間彷彿刻意為我們放慢了腳步，研究進度條也不在身後步步追趕，然而，快樂總是輕盈，一眨眼，便消融在夜色與笑語中。派對尾聲，我們舉杯慶祝——敬的不只是田野生活中得來不易的喘息，更是人與人之間悄悄醞釀出的熟悉與信任。這些不需特意筆記也能銘記在心的點點滴滴，如熟成的老酒，靜靜沉澱在心底，再輕啜一口，仍足以溫暖一整個冬天。

猶記某個陽光明媚的午後，柏惟指向窗外對街的鐵門：「你們看，那道光斜斜灑落的角度，正是抓住夕陽尾巴的最佳時刻！」語畢，他回頭一笑，「走啊，載你們去海邊看夕陽？」。來不及闔上攤在桌面的田野筆記，我們一行人笑鬧著擠進柏惟的藍色小貨車，一路吹著風朝向岸邊奔去。

抵達時，天已染上橘紅。柏惟熟練地拉開後車門，我們和同行的同學，像是期待校外教學的小朋友，雀躍地一個接一個跳下車，追隨他的背影爬上天臺，遠方的海面平靜遼闊，夕陽近在眼前而一覽無遺。海風刮得肆意張狂，耳邊交織著浪聲、讚嘆聲和笑語，我們臉上迎著呼嘯而過的風，髮絲四散飛揚，那放鬆的喜悅，來自無需言語的信賴與靠近。柏惟舉起手機，咔嚓一聲，捕捉下我們一起在海邊溜達的身影。此刻，內心那些複雜、沉重、無以名狀的壓抑與情緒，不只被這片美景輕柔攤開，更被柏惟的溫暖陪伴所治癒。

傍晚返程，天色已暗，在門口迎接我們的是剛放學的泓鈞。隨後，柏惟提議說：「走啦，我載你們去下崙夜市，一起吃晚餐！」，我們笑著覆議，牽起泓鈞的手，再度坐上那台藍色小貨車，一路搖搖晃晃地往下崙駛去。夜市攤販的燈光交錯、香氣瀰漫，我們穿梭其中，提了三大袋食物滿載而歸，回到善水咖啡，並桌圍坐在一大張木質長桌旁，溫馨地共進晚餐。

善水的溫暖，不只流露於日復一日的互動，更驅動著那些難以言說而真切流動的情感。它不僅是田野工作時短暫的歇腳處，更是讓人卸下防備與不安、得以真誠相遇的空間，在這裡，我們也不再只是學生、研究者或顧客等單一角色，而是透過某種無形卻真實的情誼，在不知不覺中，共織出一張柔韌而飽有溫度的生活網。善水雖從未明言或定位自身扮演著什麼角色，卻總在不經意的日常間，悄悄成為大家在漂流生活中，靜靜停泊的避風港，如同第二個家。

某日傍晚，反風車自救會吳連進會長踏進善水，加入我們與柏惟的對話，侃侃而談他眼中的善水：「王老闆的興趣很廣，很會唱歌，是個多才多藝的人。他很用心，讓大家回鄉、有地方聊天，很舒適，有一種自己家的感覺。」(2025/01/10\_田野筆記)

綜上所述，善水之於我們，甚至於在地居民而言，早已不僅僅是一間「解憂咖啡館」，更像是「另一個家」。這樣的特質，正呼應 Ray Oldenburg (1989) 指出第三場所提供了「家的感覺」(homeness)，以及逃脫 (escape) 一功能性。同時，亦體現了 David Seamon 所提出「在家感」(at-homeness) 的五項評估標準中，最難以捉摸的一項——溫暖 (warmth)。

善水也不單只是我們的解憂咖啡館或研究場域，更在無形中形塑了我們接近田野、靠近地方的步調。我們不再只是被動地觀察、紀錄報導人的敘述，站在第三人稱的視角來感知善水與地方的連結，而是實實在在地生活於其中，與這裡的人一起過日子，透過第一人稱的身份融入地方，去感受、經歷、甚至共創當下發生的點點滴滴。

## (二) 交會場域 (sorting areas)

「阿蓉，吃飽了嗎？」、「這請你們吃～」俞伶和柏惟窩心的聲音總在不經意間溫柔地迴盪在我們耳邊；「玳玳，你要不要煮你的地獄料理請他們吃？」、「玳玳！我們熟嗎？」、「我們不熟啊～」冠佑與柏惟的日常互動，經常在話鋒一轉之間，切進畫虎廩 (uē-hóo-lān) 的頻道；「大姐，妳媽媽最近身體好嗎？」、「秉佑，你今天有去參加博幼基金會的課程嗎？」一聲聲噓寒問暖的話語穿梭於店裡。

在善水咖啡，各式各樣的對話不斷發生著，時而輕聲低語，時而笑語盈盈。某日午後，我們倚著吧臺閒聊，話題隨興地轉到了善男信女的婚禮，俞伶笑著指

向木櫃上擺放的相框，又掏出手機展示，那是一張張婚紗照，畫面中柏惟褪去衣物，幾近全裸，僅用一片綠葉遮蔽重要部位，單膝跪地、神情飽富愛意地望著俞伶。隨著眾人的歡笑聲與談話聲如牛奶注入黑咖啡般漸次散開，柏惟探出頭來，語氣靦腆而驕傲地說道：「她說，我若敢拍，她就敢嫁。」

這些自然流露的對話，正是關係慢慢發酵的溫床，如咖啡香一般瀰漫在善水，不只是吸引人們踏入與逗留的氣息，更是讓人願意反覆回訪、連結情感的開端，即 Ray Oldenburg (1989) 點出之第三場所不可或缺的溫暖與魅力所在，同時也呼應了第三場所的主要且持續的活動是對話 (conversation)，其認為對話不只是此類場所的迷人之處，更是一項必要條件 (*sine qua non*)。這裡的對話不以詞藻取勝，而重於風格與情感交流，相對第一場所和第二場所的公式化與功能性，第三場所中的語言更高品質、更活潑生動、更機智幽默。

Ray Oldenburg (1989) 亦認為有第三場所去的人，都會表現出規律拜訪的慣性，但並不會像上班或回家那樣準時或風雨無阻。然而，善水的常客冠佑一家卻是個例外。

某個微風輕拂的傍晚，冠佑一如往常，熟門熟路地走進善水咖啡，坐上吧台內側，赴約訪談，手中熟練地操作著磨豆機與濾杯，像半個主人般，詢問我們要不要來杯熱茶，又從吧台底下摸出一包地瓜酥，笑著分食給我們和泓鈞。訪談中他輕描淡寫地說起，有時早上十點，他已佇立在店外的鐵門前，若門扉遲遲未開，或遇上公休，他便會撥通柏惟的電話，請他起床開店。

除了冠佑，冠佑的媽媽小霜也每日造訪善水，她形容這裡是「一個無聊時可以來的地方」(2025/01/08\_田野筆記)，亦經常幫柏惟和俞伶遛小孩，載著泓鈞四處遊走。傍晚打烊後，鐵門拉下，有時她和冠佑會從家裡提著熱騰騰的飯菜過來，有時柏惟和俞伶會自廚房煮出幾道家常菜，大家一起圍聚在善水共享晚餐。偶爾，冠佑也會帶著柏惟去跑咖。

上述正呼應了 Ray Oldenburg (1989) 所言，常客會比路過客或一般客人有更多特權和所有權，檯面上或私底下可能有某個特別空間會被留給「本店之友」。

身為地頭蛇的冠佑，也會帶著一個又一個的朋友走進善水，有些人起初互不相識，卻在善水咖啡，因一場籃球 PK、一局傳說對決，開始彼此介紹、熟悉，幾次相遇後，他們和柏惟組成了「籃球傳說局」。在這裡，他們會聊聊近況、互相解惑，偶爾一起吃飯、打球、玩遊戲，甚至幫忙介紹工作和客人。善水咖啡如一片孕育緣分種子的沃土，滋養了人與人連結的大樹，枝幹在日常互動中悄悄伸展。每一次相遇都是澆水，每一句閒談都是光照，關係在相互陪伴中自然生長。

這樣的互動過程，正如 Ray Oldenburg (1989) 所言，真正吸引常客造訪第三場所的關鍵不在管理者，而是來自其他顧客同伴，除非有對的人讓那裡活絡起

來，否則第三場所也不過是個普通的場所，而這些人就是常客，他們讓空間活絡，賦予其個性，確保他人無論何時上門總能遇見熟悉的身影。第三場所多由常客主導，通常他們感到自在時，便會為該地方帶來友好的氛圍，其心情、態度和對新來者的接納程度感染著第三場所整體互動。

然而，我們認為柏惟和俞伶並不只是經營者一角色，更是那個「對的人」，也是吸引常客頻繁到訪的重要存在，他們的友善與熱情和常客共同創造了善水自在、歡樂的氛圍環境。

坐在店裡的我們，經常瞥見善水對街的農會林主任倚著窗口說：「一杯冰美式，外帶。」，聲音熟稔得像是每天都會上演的橋段。某日午後，在農會門口巧遇林主任，他一邊叨著菸，一邊笑說：「善水的咖啡實惠又好喝，用料也實在，和星巴克這類連鎖品牌相比，CP 值高太多了。老婆生日時，我也會來善水買一整顆的蛋糕回去，現已回購了兩年。」(2025/01/08\_田野筆記)語氣親切而自然，就像是在談一個老朋友，表示因平時工作繁忙，鮮少內用，若有開會需求才會踏進善水，喝杯咖啡、談些公事。除了林主任，研究離岸風電的工程師們以及一些做保險、飼料或是魚塢的業務，也會坐進善水開會議事。

疫情之後，愈來愈多城市人嚮往鄉下的靜謐，雲林的善水咖啡，成了外地遊客旅程中的一座小驛站。俞伶回憶起那對從桃園遠道而來的阿公阿嬤，帶著小朋友來露營，這裡是他們行程中的一站，雖然停留的時間不長，卻聊著許多善水的點滴，問起咖啡廳的經營故事。

在善水，這樣的邂逅並不少見。俞伶笑說：「善水最大的特色是很珍惜每一位來的客人，這裡的人情味，讓他們願意回訪。」(2025/01/13\_田野筆記)接著談起，有次柏惟參加日月潭泳渡活動，不慎曬傷，回來後客人們見狀便紛紛關切問候，表示善水與外地遊客的連結，絲毫不亞於在地居民，在善水舉辦的活動中，也總能見到這些特意從四面八方前來的熟悉面孔。他們與我們一起淨灘、守護這片土地，這份情誼如同冬日的一杯咖啡，溫熱而回甘。最後，俞伶感慨地說：「有人願意來這裡深度旅遊，了解地方的風土人情，真的讓人很感動。」(ibid.)

而善水與苕子寮的關係，也在日常互動間悄然滋長。有天，住在善水斜對面的牛牛買麵過來給柏惟，過幾天又拎了一袋花椰菜來，林主任也會幫忙送團購的雞蛋至窗口。這些在地方間流動的物品，不只是單純的物資交換，更像是生活間的牽繫與相伴。(2025/01/16\_田野筆記)

每到下午三四點，建陽國小的鐘聲響起，小學生們從學校放學回家，路過善水總會熱情地向柏惟揮揮手，禮貌地打聲招呼。那天，剛放學的小四生秉佑踏進善水，與俞伶寒暄幾句後，便熟門熟路地跑到柏惟旁邊向他點歌，唱跳起近期新學的熱門歌曲〈愛你真的梅辦法〉，稚嫩的聲音在空間裡迴盪，表演結束，秉佑一邊喝著柏惟獎勵他的飲品，一邊與我們閒聊。(2025/01/10\_田野筆記)

隔日下午，遠方傳來的是一陣陣尖叫聲，柏惟臉帶無奈地笑說：「泓鈞放學回來了。」下一秒，施恩的爸一手牽著施恩，一手牽著泓鈞，出現在窗外。兩個孩子興奮地蹦跳進店裡，卸下書包後，便迫不及待奔入玩具間，配上手槍、手鎗和哨子，兩位小警察正式上崗，騎著警車溜了出來，準備逮捕大家，同學們入戲地被追逐逃亡、中彈倒地，笑聲在善水裡此起彼落。柏惟和施恩的爸則坐在吧台前談天說地，俞伶從廚房走出來，插了兩瓶保久乳，遞給泓鈞和施恩：「喝完再繼續抓壞人喔！」（2025/01/11\_田野筆記）

泓鈞瞥了牛乳一眼，又緩緩溜走，似乎只想繼續投入未完的警匪槍戰。這個場景，讓我們不禁想起某個夜晚，柏惟千方百計地想餵食泓鈞，一把湯匙揆(tùh)到他嘴邊，泓鈞卻將臉別到一旁，嘴巴抿得緊緊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絲倔強與疲倦。此時，冠佑走了過來，放下手邊正在磨製的咖啡，溫聲細語地說：「玎玎，沒關係啦，讓我來試試看。」他緩緩坐到泓鈞旁，湊近他的耳邊：「泓鈞啊，吃完這口，哥哥之後才帶你出去玩喔！」但泓鈞只是低著頭，一聲不吭。冠佑看著他輕顫的眼睫，隨後淡淡地笑說：「玎玎，他是想睡覺了啦！」，柏惟回應道：「是齁！還是讓他睡一下？」

善水作為柏惟和俞伶口中的「多功能空間」，讓人們在這裡相遇、交流、停留、陪伴，點滿了 Ray Oldenburg（1989）指出之「第三場所」的功能性——交會場域（sorting areas），在這裡發生的一幕幕，串連起彼此的生活網絡。親子之間的拉扯與同樂、朋友間的默契交流、鄰里間的相互扶持、資訊的互通有無，乃至青壯年的連結，皆在此共構出獨特的社群網絡。

### （三）活動舞台（staging area）

善水的冰箱上貼著各式各樣的貼紙，湊近一看，好似歷史年表，五顏六色而俏皮地紀錄著善水的里程碑。柏惟逐一指著那些貼紙，向我們娓娓道來，有的是自己設計的，有的是參加活動時主辦方給的，還有的是與政府計畫合作的標章。作為雲林縣政府合作的婦女據點——「婦女好厝邊」，善水提供外借牛奶、衛生棉和廁所的服務，也曾舉辦口湖婦女會手作活動。

「因為箔子寮村附近沒什麼場地，因此善水變成居民有活動需求時的空間。」俞伶解釋道，並接著舉例，2023 年雲林縣四湖鄉的向天歌拿下「創業歸故里創新創業競賽」全國冠軍時，在善水辦了一場小型記者會，弄得很溫馨。（2025/01/13\_田野筆記）

善水不僅是提供服務的中繼站、活動租借的場地，還是箔子寮孩子們探索世界的小天地。「我們其實很關心這裡的孩子。鄉下地方資源不多，學才藝、補習的機會少。所以我們辦了很多活動，希望能給他們一些不同的體驗。」俞伶語帶

溫柔地說 (ibid.)。由此可見，善水咖啡之所以成為地方活動的舉辦地，不僅是因為店面本身提供的空間條件，更多的是源於柏惟和俞伶的想法、實踐與堅持，進而賦予了善水之於地方的意義和功能。

苕子寮的學童教育問題主要根源於地方的結構性困境，邊陲的地理位置和遲緩的經濟發展，使當地長期匱乏發展機會，青壯年人口大量外移尋求工作機會，導致人口連年遞減。學校的班級人數也隨著社區的沒落而減少，師資流動率高。許多孩子出生於多重弱勢家庭，家長因忙於工作，鮮少參與或為孩子規劃課餘時間。然而，雖然當地缺乏都市常見的教育資源，如安親班、才藝班和補習班等，但學校和社區組織，如博幼基金會，會透過舉辦冬令營、課後輔導等活動，積極介入並填補了課餘時間的空白，形成在地教育安全網 (李佳耘、盧佳秀、王雅竹 2024)。

善水咖啡作為社區協作者之一，分擔了學校師長與當地家長們的教育責任，在學童課餘時間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由於店面臨街且鄰近國小，柏惟和俞伶在面對馬路沖煮咖啡時，能夠將孩子們放學後的一舉一動盡收眼底，每當他們在過馬路未注意兩邊來車時，柏惟便會請違規的孩子進入店裡「罰站」並念誦幾頁書籍再離開，一方面藉機進行機會教育、宣導交通觀念，一方面培養孩子們的閱讀 (ibid.)。

善水咖啡不僅是孩子們的學習空間，也是一座遊樂園。在一場與飛盤教練在善水的相遇中，柏惟靈機一動，兩人於店裡談起合作，討論著如何讓小朋友可以參與活動，於是「第一屆西瓜盃」正式誕生了。在這場飛盤交流活動後，善水也開始找學校協辦更多兒童教育活動。

除了飛盤活動，善水也經常在寒暑假期間舉辦夏令營、冬令營，設計一系列富含創意與教育意涵的課程，讓孩子們探索世界。柏惟說：「希望透過這些活動讓孩子們有學習動機，但還是得靠自己。我們能做的也只是撒下種子，讓他們扎根、有了學習的感受。但每個人學習的狀態也不一樣，有些是學習，有些是好玩。」 (2025/01/10\_田野筆記)

而善水咖啡與博幼基金會的合作，也是源於「關懷兒童」的共同理念。在博幼基金會的社工小樹眼中，善水是一個為地方注入新活力的場所，聊到手中的個案，她說這些孩子偶爾會來善水待上一會兒，若柏惟和俞伶知曉並且看見他們的蹤跡，也會主動關注、幫忙留意並加入扶持的行列。假日時，博幼的老師會帶著孩子們來善水坐坐，孩子們在一旁玩玩具，大人們則喝咖啡、吐苦水或聊一些媽媽經。

「善水可以是地方驅動者，也可以是很棒的協助者。只要你有需求，我們都很願意傾囊相助。但若說完全的話，我們不敢當，還有很多前輩，如心娜姊、吳連進會長、蔡茂昌大哥等人跑在前面。」俞伶謙遜地笑著說。展望未來，俞伶希



望善水能籌辦更多元的活動，關懷長者、生態環境、新住民與兒童，感染更多人向善。(2025/01/13\_田野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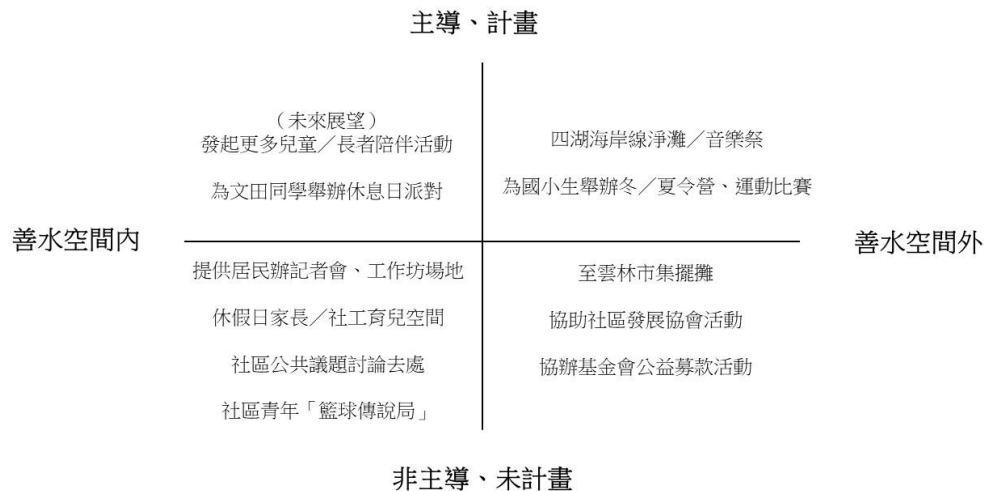


圖 5 田野期間記錄到善水曾在地方扮演的角色  
(鄭靜蓉、陳思捷繪)

## 六、海線青年的圈子及推動地方事務的經驗

返鄉創業，迎面而來的是一連串現實的挑戰——人潮少、資源有限，也需重新適應地方生活的節奏，慢慢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在善水咖啡創立以前，柏惟與大哥經營著大裕農牧場，時常到市集擺攤。也因此結識了一群回家打拼的青年——吉品烤玉米的玉米哥、福家草莓園的小吳，以及石頭屋夫婦郁綺和玄胤。「他們很頻繁的練團啊，肚子一團。」俞伶打趣這群青年的情誼。除了對音樂的熱愛，更因為共享一份對地方的想像與理想，這青年自然聚在了一起，成為彼此生活中的相互照顧、支持的夥伴。

這群青年在地方做了什麼？又面對到哪些挑戰？從柏惟的經驗延伸到他的青年朋友，呈現出雲林海線青年返鄉種種不易。

### (一) 驍勇善戰

玉米哥眼中為人熱情、真誠，投入許多活動的柏惟，被小吳視為「地方帶動者」，除了參與雲林古坑的臺灣咖啡節、雲西海洋音樂祭、虎尾驛市集、雲林四湖海青跨年市集、雲林海青暨海口鄉市集、家扶基金會的募款、正聲廣播公司雲

林台反詐騙宣導、鄧麗君出生地文化園區理事長交接等活動，也與雲林家扶中心、北港早療單位、建陽國小和南光國小合辦親子活動。

柏惟不只是參與者、協辦者和表演者，更是主辦者。他親自籌劃淨灘、善水咖啡週年慶小市集等多場活動，也曾找理事長合作，推動鄉下深度旅遊，欲帶動周邊鄉鎮的發展。

「當初回來時，其實沒有想這麼多。而是從過程中，慢慢感受，去嘗試這樣的生活，增加想做的事。」柏惟回憶起那年夏天，母親剛過世，心情低落的他 and 俞伶到海邊走走。那時，俞伶順手拿起腳邊的塑膠袋，彎腰撿拾沙灘上的垃圾，柏惟心裡納悶：「來這裡散步，卻撿起垃圾？」（2025/01/10\_田野筆記）

「撿一撿沒關係啊！」俞伶輕快地說，手中握著一個頑固難拔的玻璃瓶，柏惟上前幫忙，瓶身終於鬆動，卻露出底下更多的碎玻璃。兩人乾脆默默地繼續撿下去，直到夕陽完全落入海平線後，滿手沙粒，額頭上激出的汗水，彷彿那些深埋心底的哀傷，慢慢被釋放，也忘卻了當下的煩惱。「如果撿垃圾能帶走一些悲傷，那我要淨灘。」柏惟堅定地說（ibid.）。

這一撿，撿出了善水的第一場淨灘活動——「和平地球淨灘音樂市集」，2022年7月10日，在茆子寮海邊「老兵的家」登場，現場約100人湧入，善水的返青朋友圈如白水咖啡、吉品烤玉米等商家也有前來參加，大家一邊撿起沙灘上的散落的垃圾，一邊聽著現場樂隊的演奏。次年2023年3月10日，在雲林海青淨灘，舉辦了第二次淨灘活動——「雲西海洋音樂祭」，規模也擴大至300人。

張羅了兩次盛大的淨灘活動，柏惟語帶倦意地說：「第三次沒有辦很大，因為很累，要跑東跑西。」因此，第三次淨灘活動，改採半靜態的方式——小型DIY手作盆栽活動結合淨灘。問起一起淨灘的這些人是如何聚集而來時，柏惟笑了笑說：「因第一次感受很好，所以就有第二次。」參與者當中，有不少是曾經和善水結識外地遊客。即使在地居民的參與度不高，柏惟仍堅定地表示：「想做的人是自己，想參與的人是大家。你要改變別人讓他們行動嗎？有多少人做多少事，有多少錢就做多少資源。」（2025/01/10\_田野筆記）

對於這樣的堅持，吳連進會長在替善水感到惋惜之餘，也不禁流露出一絲佩服：「一個年輕人留在故鄉，在這邊生活真的不易，人口不多、氣候也不是特別好。在茆子寮開咖啡廳其實很難賺到錢，幸運的是王老闆的爸爸有留下房子，讓他沒有房租的壓力，經營起來比較輕鬆一點。」（2025/01/10\_田野筆記）然而，辦活動是燒錢的事，柏惟和俞伶坦言，幾乎每場活動都是自掏腰包，從營收裡扣出的經費。那些原本應該放進口袋、用於生活開銷的零錢，悄然流向了淨灘籌備、市集佈置，甚至是招待顧客的茶水點心。所幸，這些點滴付出終於慢慢被看見，外界也開始主動邀約合作、提供贊助，善水則拿出自己的場地和技術，換取些許資源，將活動一場接著一場地辦下去。

談及瓶頸，俞伶輕輕歎了口氣：「箔子寮的人口和商店少，資源也比較少，不像在都市，可以提計畫申請經費。但這邊也是有默默做事的一群人，像是心娜村長、茂昌大哥、理事長，如果他們有辦活動，我們也會協助配合。」(2025/01/13\_田野筆記)

## (二) 獨善其身

柏惟與一群同為返鄉的青年朋友之間，有著深厚而真摯的情誼，這份連結經常悄然顯現於日常生活之中。某日我們為俞伶拍攝剛烤出爐的提拉米蘇，發現她使用的正是小吳種的草莓，隔日下午拜訪玉米哥時，又看見廚房流理台上站著一個吃完的提拉米蘇空杯。

當玉米哥在事業上陷入低潮、難以獨立應對之際，掛心的柏惟也選擇陪伴在側，與其一同度過那段充滿考驗的日子。對郁綺而言，俞伶的出現亦如一道曙光，照亮了她產後的陰鬱，兩位產後媽媽在善水相伴、傾吐辛酸，重拾了力量與安定，俞伶也曾在談話間不自覺地落下淚來。偶爾，郁綺也會與柏惟聊起各自的創傷，面對「超矜(king)<sup>2</sup>」的柏惟，她理解其堅強的背後，是一位身為丈夫與父親的責任感，總是期望自己能夠成為妻兒的後盾和避風港，而不禁直言相勸：「其實你不用一直都表現得很正向。」(2025/01/11\_田野筆記)

小吳則笑說，他們幾個——柏惟、俞伶、玉米哥、郁綺、玄胤，有時會一起參加市集，有時也會邀請對方來自己籌辦的活動共襄盛舉，對音樂的熱愛也讓他們組起樂團，於各種場合即興演出。有次市集需要表演，柏惟和玉米哥便隨興取了團名「玉米蛋」，一搭一唱地登上舞台——「因為你賣玉米，我賣蛋。」而身為復刻樂團成員的郁綺和玄胤，本就具音樂底子，也常與柏惟同台演出。久而久之，這群青年逐漸成了為彼此站台的朋友。

2025年6月8日，我們返回箔子寮發表，並參與柏惟舉辦的淨灘，映入眼簾的正是這群返青朋友圈到場支援的身影，現場有玉米哥的烤玉米、小吳新開發的草莓冰糖葫蘆，以及在登台主持、獻唱的郁綺和玄胤。

他們的返鄉之路，不只是理想，更是真心的流露。回家打拼，對柏惟來說，是一種好好生活的方式；對玉米哥而言，是因為母親喜歡吃烤玉米，便投入了這門生意；而小吳專心經營草莓園，希望未來能蓋一座加工廠，為地方創造就業機會，讓更多離鄉的人有機會回來；郁綺和玄胤則將石頭屋打造成一個世代共聚的空間，讓二、三代的長輩與晚輩能夠於此相互認識交流，更作為日常生活與社區連結交錯的小聚點。然而，理想之外，現實也如影隨形地緊追在後。玉米哥創業

---

<sup>2</sup> 當時郁綺是以臺語超「矜(king)」表示。通常形容一個人很拘謹，不容易將自己的想法、感受表達出來。

初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資金短缺，後來透過向農會貸款才慢慢平衡，而真正讓其事業開始有起色的一大轉折是來自東森電視台的報導。當時，一位被他稱為老師的白水咖啡老闆，協助其將自家豬舍改造成工作室，吸引媒體前來關注和拍攝，成功為吉品烤玉米帶來了流量、曝光與商機。

在地方實踐的過程中，一群懷抱理想與共識的返鄉者組織了「海青協會」，推動著地方事務、描繪未來願景。正是這樣的契機，聚集了返青朋友圈，進而讓他們熟絡了起來。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理想與實踐之間的差距慢慢浮現。其中，柏惟是頭一個對組織氣氛感到遲疑的人，正如同郁綺的形容：「他很會在不同場合中扮演自己適合的角色。在朋友的聚會上，他明顯是氣氛領導者，但若在不喜歡的場合上，他便不會出聲。」（2025/01/15\_田野筆記）或許正因如此，柏惟在參與了幾場海青活動後，雖隱約有所覺察，卻因不忍澆熄大家對組織的熱情與期待，而選擇悄悄退場。隨之，小吳也默默淡出，而玉米哥和郁綺，則選擇留下，期盼為地方帶來一絲改變，翻轉現況。

### （三）來者不善

海青協會成立，據石頭屋的郁綺所說，源自一場將海線青年聚集起來的青創講座。那場講座的講師來自政府機構，當時任職於負責審查青年創業案的部門，對計畫申請流程運作極為熟悉。後來講師離開了公職，轉而成立一家承接企劃案的行銷公司，處理公司自身專案之餘，也承接政府青年創業相關計畫。

講師身兼公司負責人與協會召集者雙重角色，一如 Peck & Tickell (2002) 所言，新自由主義公部門「治理外包」(outsourced governance) 下，具備執行能力、行政經驗與計畫撰寫方法，擁有技術性資本與社會資本的中介實體。與其他地方青年所掌握的資訊與權力不對等，該位講師大幅影響了協會的走向。

原先青年們抱著為地方事務積極奮鬥的期待投入協會活動籌備，但隨著一次次活動的舉辦未能達到預期效益，且經常需自行負擔經費，青年們的能量逐漸耗損，組織發展也因此受限。

除了組織層面的挑戰外，上位地方創生政策與青年實際創業的需求之間也存在張力。玉米哥曾嘗試投入政府補助以增取資源，但並不擅長撰寫企畫書文件，加上經營生意本就繁忙，有些需要配合出席活動的計畫，讓他感到吃力。雖然計畫中常會搭配一些課程、媒合或協助曝光的機會，但玉米哥總覺得自己像是某個體制下的「KPI」，被寫進報表而非被真正理解，種種原因削弱了他參與政府培力活動的動力。而同樣身為返鄉青年的小吳，認為雲林縣政府相對有照顧到地方創生，不過他也認為政府只能算得上是「錦上添花」，通常還是需要靠自己有一定的規模，才有機會被看見。玉米哥「像 KPI 一樣被納入」的評論，呼應了 Peck

& Tickell (2002) 新自由主義地方發展中「績效治理」(performance-based governance) 的邏輯，地方治理看似下放，實則仍受績效導向操控，成為國家資源再分配的延伸手段。

雖然挑戰連連，這些並非完全的挫敗。正如林承毅和謝其浚(2020)強調「移居不是容易的事」，青年們在困境中形成「朋友圈」，主動籌辦市集、做彼此的心靈支柱，背後是青年們對地方深刻的情感連結，以行動實踐對地方的願景。

青年並非受某種政策績效驅使，而是在地方中建立關係、爭取喘息空間，持續開創「活下去」的具體生活策略。這些策略雖不被記錄，卻更貼近地方創生最原初的問題意識：如何讓人願意留下來？

對這群青年而言，地方創生是什麼？柏惟認為創生這件事是雙向的，既是生存的模式，也附加著商業行為，讓每個人在這個地方生活下去，創造並延續生命的方式。或許他們在不知不覺中，除了活下去以外，也帶出一定的地方影響力。玉米哥因為採訪以及網紅的參訪，而為四湖帶來了聲量。善水咖啡廳這個地方的功能性，都讓大家會想到這個空間。小吳也慢慢對草莓的經營得心應手了起來。小吳笑著說起海線青年們之於地方的定位：「我們這幾個，有時候是讓人來到四湖鄉就想找的標竿人物，覺得這個地方還有一群年輕人在做這件事情，還不錯，至少社區還有一點活力。」(2025/01/11\_田野筆記)

## 七、結論：青年如何回家生活？

2019 年起，「地方創生」成為臺灣國家安全戰略政策，中央至地方政府無不加緊推出各式各樣產業升級、數位轉型、打造地域品牌、文化產業的創生政策，強化地方吸引力，構築地方產業經濟圈，凝聚地方意識，以均衡臺灣總體發展。然而，在汲汲創造青年返鄉、入鄉拉力之前，或許我們也應該回頭關注，偏鄉青年起初為什麼會逆流回返家鄉？我們要如何創造支持系統，讓在鄉生活成為青年可以想像未來的選擇之一？

本篇以「回家生活」為題旨，可被單純閱讀為青年返鄉的客觀事實，但同時也在多重層次上，貼切地描述了善水咖啡兩位經營者及其雲林海線青年朋友圈，返鄉創業的決策背景、空間經營對地方帶來的影響，及他們在家鄉共同打拼的凝聚力。

在苕子寮善水咖啡案例中，兩位經營者柏惟俞伶從挫折的都會三級產業離開，脫離受雇狀態自立創業，兼顧家庭時間、興趣愛好與事業理念。在創業的前三年，返鄉的柏惟既是善水咖啡的經營者，外公、外婆、母親接續罹病，也使他身兼家庭照顧者的重擔；創業後三年至今有了小兒子，在自家住商混合的空間經營咖啡

廳，善水運用健康原型、鄰近產地的食材製作甜點，營造一處人人都可以自在走入坐下的多功能空間。柏惟俞伶實現他們對產品理念、營運價值的同時，也擁有更多餘裕與社區支持網絡來育兒，享受家庭時光。他們對「家」與「鄉」的情感難以單一切割，都是一處充滿熟悉的成長記憶，且異於嚴密勞動控制、異化受薪職場環境，得以與親近之人相互陪伴生活的地方。

咖啡廳的空間環境、氛圍與經營者理念，使善水不單是資本累積的生產場域，更是 Ray Oldenburg (1989) 筆下的「第三場所」，充滿多樣人際互動的可能，進入門檻低而調性歡快，陪伴滋養人們成長。善水就如同各方的人們在雲林的第二個「家」，提供一個暫時逃脫生活日常主線責任，卸卻愁煩，重拾力量的去處；除此之外也是四方人流的交會場域，在經營者與常客熱情的招呼活絡之下，人們在這個空間相遇相識，締結關係，陪伴長幼，討論地方未來，彼此分憂解難。人們憑藉善水與彼此持續產生連結，擁有社群歸屬，共享經驗與脈絡，構成彼此殊異又相互交集的地方感與地方認同內涵。

善水的經營者因為置身各路社群的核心交會節點，作為生活在地方的公民、居民、家長、校友，開始參與地方公共議題，從最初的協作角色，到而後成為主動發起活動的籌辦方。咖啡廳本身的空間特性、店面主打的咖啡茶水點心、經營者擅長的音樂表演，以及經營數年累積的社會、人脈、經濟資本，在在都成為柏惟和俞伶辦活動、跑活動的利器。在這個過程裡頭，可以看見青年從返鄉創業、自我實現的個體單位，逐漸被捲入公共網絡，晉升構築地方共生共榮潛能的堅實力量之一，在教育、娛樂、長照等諸多資源皆盡稀缺的偏鄉區域積極補位；留鄉、返鄉、來鄉之客也因此獲得源源不絕的支應，能夠好好「回家生活」，具備韌性面對生命、家庭及地方的種種難關。

放眼善水周遭同在雲林海線開創事業的青年朋友，和柏惟俞伶類近，因為照顧遷移、城市經驗受挫、職場壓力、家業繼承、自身事業理念等複數原因，外出求學工作後決定返鄉，運用過往專業背景、社區大學課程、網路教學、人脈經驗等正式與非正式管道，累積自身創業工具箱。這群朋友因為地方市集結識，現以各自方式為雲林青年人口開拓在這裡「活下來」的空間與典範，比如創造工作機會、開設才藝課程、打造地方產業亮點、舉辦市集活動。他們或曾參加政府以地方創生為名的帶狀培力補助計畫，然而這些競爭性、注重績效邏輯、報帳複雜的政策資源，卻排除了那些缺乏足夠文化資本，而無法適應制度性語言或滿足績效展演的地方實踐者。這群青年也曾組成協會報隊戰鬥，但卻因為理念不合、乏於日常營生、家庭照顧之必要勞動，青年好不容易組成的隊伍最終瓦解。在遇見我們的這個冬日，青年僅能在事業、資本有餘自掏腰包單打獨鬥，透過非正式互助網絡彼此合作、充場，實踐自身對地方未來的願景。一系列以地方創生為名的上位政策立意良善，但能資助青年們實際在地行動的部分卻有限。回家生活」對這

群青年而言，時常只堪足夠讓自己和家庭「活下來」，談及長期參與地方發展實踐，在缺乏穩定資金與配套政策支持下，便顯得左支右絀了。

本篇僅用短短十二天田野蹲點觀察與單次海線青年訪談寫作而成，難以全面捕捉善水咖啡生動的人際往來，及長時間對地方多角化的投入行動全貌；對於海線青年公共參與困境，也有待嵌入地方整體發展脈絡與政治結構再行深究。且盼本次的書寫作為起點，聚焦鎂光燈於這間小店與海線青年，顯現他們對地方帶來的影響，及相攜共同「回家生活」的行動實踐。

## 參考書目

### 中文書目

李永展

2019 〈地方創生與地方發展脈絡〉。《經濟前瞻》185：49-52。

呂欣怡

2014 〈地方文化的再創造：從社區總體營造到社區文化產業〉。刊於《重讀臺灣：人類學的視野：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林淑蓉、陳中民、陳瑪玲編，頁 253-290。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李佳耘、盧佳秀、王雅竹

2024 〈三分註定，七分靠「拼」：箔子寮多重教育網絡於學生課餘時間的實踐〉。刊於《風頭水尾——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頁 329-358。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林承毅、謝其濬

2020 《二地居：地方創生未來式》。天下文化。

黃宣衛

2022 《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新北市：左岸出版社。

華叡民、蔡嘉軒、江冠瑩

2024 〈何以擺脫無未來？海洋教育與社區發展的能與不能——以箔子寮和三條崙為例〉。刊於《風頭水尾——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頁 361-39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葉惠中、傅鏗漩、高慶珍、李載鳴

2009 〈土地利用變遷對社會結構之影響——以雲林沿海鄉鎮為例〉。《社會與區域發展學報》2（1）：1-22。

劉曜華主編

2006 《四湖鄉志》。雲林縣：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饒祐睿

2024 《「自由」的時間：一個對當代靠海生活技藝的民族誌研究》。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Cresswell, Tim

2006[2004]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王志弘、徐苔玲譯。台北：群學。

Oldenburg, Ray

2005 [1989] 《偉大的好所在：家與辦公室以外的第三場所》。賴彥如譯。行人出版社。

## 英文書目

Peck, Jamie and Adam Tickell

2002 Neoliberalizing Space. *Antipode*34(3) : 380-404.

Littman, D.M.

2020 Third place theory and social work: Considering collapsed places.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1(5), 1225-1242.

## 網路資料

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

2025 〈村里鄰人口數〉。「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https://mailiao.household.yunlin.gov.tw/>，最後瀏覽於 2025 年 3 月 28 日。

林倖妃

2020 〈「生」不如「死」的時代 七成人口住六都，地方快沒人怎麼辦？〉。「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2029>，2020 年 9 月 22 號上線。

張力亞

2018 〈社會設計的行動與未來：日本「地方創生」經驗教了台灣什麼？〉。「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5512>，2018 年 5 月 14 號上線。

陳建豪

2022 〈地方創生是什麼？定義、案例、行動一次掌握〉。「微笑台灣」，<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5145>，2022 年 1 月 10 號上線。



王村煌

2019 〈關於地方創生，我們三個臭皮匠的對談（一）地方創生與社區總體營造一樣？〉。「微笑台灣」，<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1462>，2019 年 2 月 13 號上線。

蘇榮泉

2017 〈雞蛋沒腥味該多好 大裕農牧場做到了〉。「NOWnews 今日新聞」，[https://www.nownews.com/news/2671735?srsltid=AfmBOoqkeQeDwtK\\_7mASt9WmlcBrjczpchADM-xMH818K\\_LTA\\_XgFBWI](https://www.nownews.com/news/2671735?srsltid=AfmBOoqkeQeDwtK_7mASt9WmlcBrjczpchADM-xMH818K_LTA_XgFBWI)，2017 年 12 月 30 號上線。

## 風中扎根：箔子寮的社會永續路徑與挑戰<sup>1</sup>

洪浥青（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五年級）

胡善翔（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 摘要

近年永續發展成為熱門議題，然而過去的相關討論多由國家層級的宏觀視野所主導，忽視了在地社區成員的具體認知與實踐經驗，故本文以雲林縣四湖鄉箔子寮作為研究地點，深入探索當地社區成員在自身位置與實踐經驗中如何形構其對於永續性的多元理解，進一步探討在鄉村社區中理想的社會永續關注核心及其意涵。此外，本文也藉由理解箔子寮社區的永續現況，據此進一步思考社會信任與凝聚力如何影響地方社區推動永續發展的多樣可能。過去社會永續性相關討論多著重於理論層面的多層次概念梳理及定義，從而忽視實務上鄉村社區內部人際網絡複雜性的影響力，以及鄉村中社會永續僅著重討論自然災害所帶來的社會衝擊，因此本文試圖透過箔子寮回應現有社會永續性討論的不足，探討在臺灣鄉村社區中推動永續發展面臨的可能挑戰。

關鍵字：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社會永續性 (social sustainability)、社會凝聚力 (social cohesion)、社會信任

---

<sup>1</sup> 本文為 2025 春季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之課程成果。特別感謝蔡心娜村長、蔡茂昌大哥、蔡茂源大哥、博幼基金會吳怡慧老師、林嫻敏社工師、蔡搖大哥、蔡瑞泉大哥、蔡明璋主委、春天民宿蔡文進老闆、黃正鎮船長，以及十分照顧我們的善水咖啡老闆夫婦與所有箔子寮中對我們友善的居民、不具名的社區前輩們。也要感謝郁茜老師、助教、學長姐們的指導與協助，最後感謝一起出田野、想法激盪、互相協助的同學們及組員。

## 一、緒論

一個永續發展的社會，在人們心目中會是怎樣的景象？過去在接觸永續發展論述時，我們常在腦海中建構出一個理想化的烏托邦：在那裡，環境整潔美麗，人們擁有自我實現的工作，享有優渥的生計，並維持著和諧的人際網絡。儘管我們看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及其細項所描繪的理想圖景，卻也認為這些全球性的倡議似乎與地方真實生活有所脫節。

正是這樣的認知促使我們開展本研究，透過深入的田野調查，去揭示永續發展的推動在地方實踐中的真實樣貌。我們觀察到當前永續發展的主流論述，大多源自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所推動的全球性治理架構，論述傾向由上而下的治理邏輯，並聚焦於環境與經濟層面的制度設計。然而永續發展並非只是於政策文件中的宏觀藍圖，而在於地方社區的實踐經常面臨價值落差與資源限制等挑戰。我們希望透過人類學的視角，了解地方居民對永續發展的理解與期盼。

茆子寮是一個溫馨舒適的小鎮。初次抵達田野的午後，陽光灑落在空曠的街道上，與城市喧鬧的大街截然不同，這裡最鮮明的感官經驗，是不曾停歇的風划過皮膚，這股來自海上的風訴說著沿海鄉村的故事，遠方緩緩轉動的風機承載著國家對永續發展的期待，卻與當地現實產生張力。我們看見許多民宅鐵門緊閉，顯示當地人口長期外流與地方活力的流失，在臺灣各地再生能源迅速建設的背景下，鄉村提供城市所需的能源，卻無法留住下一代。



圖一 轉動的風機與茆子寮漁港邊漫延的海沙  
(圖片來源：洪滄青攝)

這樣的情境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在這樣支撐國家能源轉型與永續發展政策的場域中，茆子寮自身的未來又該如何規劃？相關政策又是否考慮到地方社會內部多樣而細緻的生活節奏與期待？我們希望藉由田野調查中的觀察與訪談，深入探討居民的主體性如何展現，以及他們如何在實踐過程中重新詮釋永續發展的意義，提供一個更加貼近現實且多元的理解途徑。

我們關心政策與地方需求的斷裂，但在試圖定義「地方需求」之前，我們的田野資料反映地方社群異質的聲音，居民們各自懷抱理想，在不同實踐位置上對永續發展賦予多元意義，展現出與我們心中過去對永續發展宏觀且同質化的美好想像截然不同的風貌。這樣的理解途徑增添了真實世界的溫度，讓永續發展的藍圖不再停留於缺乏社會文化脈絡的討論，也正是因為如此，在田野調查與寫作期間，我們必須反問自己對永續發展的理解從何而來？促使我們開始批判與省思過去全盤吸收、崇尚的永續發展論調。

研究將從永續發展概念的起源出發，回顧全球與臺灣在永續發展政策的推動進程，我們從永續發展文獻的論述中進行批判性反思，點出永續發展概念的使用高度政治化，這樣的現象無助於永續發展本質的討論，接著我們以社會永續性（social sustainability）為分析概念，透過人類學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的調查方法在茆子寮收集田野資料，了解地方居民的觀點，探討實踐永續發展過程中個體的能動性與限制，期望透過永續發展詮釋、理想與現實的分析架構，提供貼近地方脈絡且具啟發性的永續發展討論視野。

## 二、文獻回顧

### （一）永續發展起源與定義

#### 1. 永續發展全球推廣進程

近年來，永續發展已成為政策設計與學術研究領域中的關鍵概念，並被視為引領全球發展方向的核心理念。永續發展的倡議可追溯至 1960 年代，1962 年美國生態學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發表《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喚醒國際社會對環境議題的關注，並由此開啟全球環境治理機制的建立。1972 年，聯合國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邀請各國政府共同討論當前環境挑戰的應對策略，並隨後成立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以協調和推動全球環境治理的工作（曾裕淇 2016）。

永續發展理念的廣泛普及則可追溯至 1987 年，當時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發布《布朗特蘭報告》（*The Brundtland Report*）。原名《我們共同的未來》（*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報告中，永續發展被定義為「滿足當前需求，但不危及未來世代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曾裕淇 2016）這一定義不僅延續了 1970 年代以來關注環境危機及未來世代生存權的全球性討論，也強調應該為未來世代提供平等的發展機會。透過此報告，永續發展的理念成功轉變為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議題，並對當代各級政策規劃與商業活動管理產生了深遠影響。

隨著全球環境和社會挑戰的日益增長，對永續發展的理解與需求促使永續發展目標的制定與更新，目前在各層級政策與企業管理策略中，最常見的莫過於聯合國 2015 年永續發展高峰會上通過的十七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強調永續發展需要調和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包容三大面向，旨在持續為各國政府提供了政策框架與行動指導，並引領全球共同努力，邁向永續發展的未來。

## 2. 永續發展在臺灣的推進

跟隨國際永續發展治理的趨勢，臺灣永續發展的政策與資源挹注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在組織管理上，臺灣政府於 1994 年成立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並於 1997 年提升為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作為執行永續發展的最高行政組織。同時，與永續發展相關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也迅速發展，研究重點涵蓋了國際永續發展概念的意義與實施策略，成為協助臺灣社會適應並轉化國際趨勢的重要途徑（曾裕淇 2016）。

隨著永續發展推動的深入，政策的推行由中央逐漸延伸至地方。包含臺北市政府於 2017 年研擬 SDGs 策略計劃，並在 2019 年宣布優先執行的永續發展目標，新北市也在 2019 年推出全臺第一份城市自願評估報告（未來城市編輯部 2024）。雲林縣政府則在 2021 年和 2023 年接連發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自願檢視報告，展現其對永續發展的承諾與行動（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2025）。

### （二）永續發展概念的歧異（ambiguity）與反思

永續發展一詞由「永續」與「發展」概念組成，兩者關注的焦點其實不盡相同，發展的概念（notion of development）強調的是要怎麼讓人們的生活過得更好，另一方面永續性（sustainability）則關注要怎麼維持人類既有的生活與發展路徑（林德昌 2005）。

Fikret Mazi（2005）文章中提及許多政策在談論永續發展時，將增長（growth）等同於發展（development），然而這兩者涵蓋的意義卻不盡然重疊。增長通常指

經濟增長，如國內生產總值（GDP）或人均收入的提升，然而發展則是一更廣泛的概念，除了涉及經濟增長以外，也包含生活質量、社會福祉與環境保護等維度。混淆的使用導致人們對永續發展產生誤解，容易將永續發展的焦點轉為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的抗衡，而忽視社會面向的議題。

Mazi (2005) 認為永續發展擁有許多重疊又互相衝突的解釋，缺乏清晰的定義導致行動效率不彰。不同群體根據自身訴求塑造與詮釋永續發展內涵，如資本家可能從捍衛經濟增長角度切入，而環境主義者則可能根據其立場，強調生態保護或技術發展的重要性。

政治性詮釋的基礎使得永續發展逐漸演變成一種政治工具，並被用來推動各種政策與利益。Yvon Pesqueux (2009) 也指出，儘管「永續發展」一詞被廣泛應用於各種情境中，但由於缺乏對其理論的共識，這一概念常常被不同行為者賦予不同的解釋與應用，成為無效的治理標語。Mazi (2005) 認為永續發展的概念尚未轉化為可應用於政策和決策的理論，導致其缺乏實證支持，無法構建出清晰明確的發展框架。

Mazi (2005) 談到，永續發展一詞的討論經常帶有特定的政治或意識形態立場，擷取特定議題來闡釋永續發展的意義，為既有的政策主張或行動提供論述基礎。延伸 Mazi (2005) 的論點，這種「先射箭再畫靶」的論述模式，雖可在短期內產生有力且明確的政策宣傳效果，但我們認為從永續發展研究發展的角度而言，這導致永續發展內涵持續模糊化，並進一步降低學術社群之間跨領域、跨研究脈絡的對話與討論品質，難以形成可系統性累積或比較的知識基礎。由於每個研究者或團體皆各自根據立場利益界定永續發展，使得相關文獻充斥著彼此難以溝通的論點，導致理論和實踐的斷裂日益加深。因此，要突破這樣的困境，必須重新回到更根本且更具批判性的問題意識：究竟何謂永續？我們為什麼需要永續？透過追問這些基本問題，本研究嘗試從在地實踐出發，深化對永續發展本質內涵的探討與反思。

在上述對永續發展概念歧異的檢視與反思後，本研究主張，一個有效深化永續發展內涵的方式，便是回到地方尺度 (local scale)，從真實存在的在地脈絡中，檢視人們如何理解、詮釋並實踐永續發展。當前主流的永續發展論述常以全球尺度為主軸，這樣的視角固然能統籌宏觀的資源分配與政策協調，但卻可能忽略在地的特殊性與複雜性，進而導致地方行動者難以對此概念產生真實共鳴，甚至排斥或懷疑永續政策的有效性與公平性。

本研究以苕子寮為田野，探討永續發展概念如何被地方行動者進行轉譯與落實。具體而言，本研究將揭示在產業沒落與政治現實的條件下，地方居民根據其生活脈絡、價值觀念與現實需求，重新詮釋永續的意涵，並在地方尺度開展具體的永續行動。此種地方尺度的分析不僅有助於補充既有永續發展文獻中忽略的社

會永續性 (social sustainability) 向度，更能回應永續發展研究中常被忽視的實踐落差 (implementation gap) 問題。

透過苜子寮個人化的永續實踐現象，本研究也希望強調，永續發展不應該只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引，而應該從真實世界的互動中形成，並累積概念的內涵。研究以經驗導向 (empirically-grounded) 的反思取徑，重新理解與展現永續發展的本質，在永續發展的討論裡提供鄉村的需求與視野。

### (三) 社會永續性 (social sustainability) 概念回顧

近年來，社會永續性 (social sustainability) 在永續發展論述中的角色逐漸受到重視，然而現有理論框架長期偏重於生態與環境維度，欠缺針對社會層面的系統性規範與實踐依據。Griessler and Littig (2005) 是學術上首度針對社會永續性進行定義，文中從「廣義需求」與「工作」兩大核心概念出發，嘗試建構一套更具批判性與規範性的社會永續性架構。他們主張，社會永續性是一種「社會的品質」(quality of society)，當一個社會能透過制度與工作安排，持續滿足人們從生存到自我實現的多層次需求，並同時實現自然資源保護、社會正義與人類尊嚴等價值時，方能稱為社會永續。Griessler and Littig (2005) 進一步提出「混合工作」(mixed work) 概念，納入無償工作、照護工作與社區服務等非傳統職業型態，呼籲對現行有償勞動制度進行改革，以實現更具包容性與環境意識的社會結構。其衡量社會永續性的三大指標——基本需求的滿足、生活品質的提升與社會凝聚力 (social cohesion) 的強化——進一步凸顯滿足基本需求與提升生活品質、保障平等機會以及加強社會凝聚力在實踐永續性上的關鍵地位。

Vallance et al. (2011) 則是將現有的社會永續性討論進行分類、概念釐清以及其中關注面向如何協同／衝突，此篇文獻有助於我們理解社會永續性的具體、多層次意涵。Vallance et al. (2011) 亦批判當前永續發展論述中社會面向的邊緣化，並提出「發展永續性」(development social sustainability)、「橋接永續性」(bridge social sustainability) 與「維持永續性」(maintenance social sustainability) 三種社會永續性分類，分別聚焦於基本需求的滿足、行為轉型以促進生態目標，以及文化與生活方式的延續。此三分法不僅揭示出不同類型社會永續性的定位，也進一步剖析其間潛在的矛盾與協同。Vallance et al. (2011) 主張，唯有在推動永續發展過程中正視這些不同社會永續性面向的張力與交錯關係，並整合社會文化、環境保護與基礎生活需求三者，才能實現兼具公平性與可行性的社會永續實踐。

進一步從區位面向延伸，Koning (2002) 區辨了當前對於農村與都市在社會永續性的關注重點上的差異。農村地區主要著眼於社會單元如何面對外在衝擊與壓力，並具備適應、利用與創造變革的能力，以維持在就業機會減少、收入下降、

氣候災害或市場崩潰等挑戰下的社會穩定與永續。而都市則因社會、經濟與環境問題高度集中，社會永續性討論更強調社會包容，尤其關注如何應對都市貧富差距、文化衝突與社會排斥等現象。Koning (2002) 明確指出，社會永續性既是發展目標也是實踐手段，無論在何種情境下，其核心均在於推動社會正義、平等與無排除，並確保每個人享有體面的生活品質或生計。

上述文獻雖然出發點不同，但皆一致指出單一維度的探討難以全面捕捉社會永續性的複雜性。Vallance et al. (2011) 則提出多層次的「發展」、「橋接」與「維持」分類架構，揭示不同社會永續性取向之間的張力與協同，提醒我們須在基本需求、行為轉型與文化維持間取得平衡；Koning (2002) 則提到現有社會永續性在農村與都市討論中關注的差異，強調面對不同社會處境時，應維持社會包容與體面生活品質。這些觀點共同展現社會永續性作為一種多層次的概念。

然而，我們也觀察到，Griessler and Littig (2005) 過度以歐洲福利國家為基礎強調工作制度上的改革，從而忽視在鄉村尺度的脈絡中的工作型態及需求的不同；Vallance et al. (2011) 則過於專注在分類現有社會永續性的討論，卻忽視了即便是在維持永續性 (maintenance sustainability) 裡，對於居民來說社會永續的概念如何被在地認知與理解；Koning (2002) 雖然提及了現有的農村社會永續討論，但更強調的是其面臨環境災害等問題如何維持基本需求及體面生計的關注，較少著墨農村社會永續的過程中的社區內部凝聚力如何成為重要的討論面向。

綜合上述，皆能夠看出現有文獻較少關注鄉村社區成員如何認知、將自己的地方實踐與社會永續性的概念連結，使得現有社區居民在日常行動中所展現的永續性觀點往往難以被理論語言充分捕捉，而這也是我們認為為何社會永續性仍舊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問題所在。因此，我們企圖透過田野工作與在地視角，回應現有理論與地方理解之間的落差，探索社區成員在自身位置與實踐經驗中如何形構其對於永續性理解，並進一步思考社會信任與凝聚力如何影響地方永續發展的多樣可能。

### 三、區域介紹

#### (一) 箔子寮人口及產業現況

雲林縣四湖鄉在戰後初期人口為 25,323 人，一路成長至 1970-1980 年期間仍維持在 40,000 人左右。然而，自 1981 年底開始，人口便連年下降，直至 2004 年底時人口降至 28,885 人。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當地未能發展出足夠的工業區，且現有的就業機會有限。當地的學校、農漁會及小型農工商業無法提供足夠的工作崗位，這使得大部分年輕人在當地學校畢業後必須離開家鄉尋找生計 (劉曜華編 2006: 242)。



將視角聚焦於本次田野研究範圍—茆子寮，該地區包含茆子村與茆東村，位處臺灣西南沿海。茆子村南方與口湖鄉下崙村交界的茆子寮漁港，以蚵仔養殖和烏魚子產業聞名，是雲林縣規模最大的漁港。過去，茆子寮的蚵仔養殖和漁業為當地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據當地居民回憶，漁港內曾停泊超過 100 艘漁船，從北方的南方澳至南方的高雄，每年都會吸引大量漁船停泊。特別是在烏魚季節，漁港內甚至有超過 500 艘漁船進駐（郭天祐與劉曉語 2024：9）。

然而，如今茆子寮漁港面臨嚴重的淤沙問題，漁船進出受阻，蚵田的維護變得更加困難，對當地產業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曾經是臺灣西南沿岸重要漁港的茆子寮漁港，現在的風光不再。目前，漁港區域除了雲林區漁會的零星建築，其他多為待開發的閒置土地。當地漁民亦指出，雲林離島工業區建設改變漂沙方向，導致茆子寮漁港的嚴重的海沙淤積現象。

## （二）再生能源發展與社區分歧

自 2009 年臺灣政府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並實施躉購費率制度以來，國內再生能源設施的建設蓬勃發展。其中四湖鄉沿海地區，包括茆子寮，也成為開發區域。大量風力發電機與光電板設施相繼進駐，顯著改變地方景觀與土地利用方式（蔡卓霖 2024）。

然而，隨著再生能源設施的進駐，茆子寮的社區內部出現了分歧。這些設施的建設，雖然帶來了外來資金與資源，但也引發了居民對環境與未來發展的擔憂。

企業在進駐時，未能與地方居民達成共識，居民對設施設置持保留甚至反對態度。以「四湖反風吹自救會」為例，該組織由地方居民組成，反對陸域風機的建設，擔心風機的噪音會影響健康，並對漁業活動造成不利影響。

並非所有地方居民皆持反對立場，我們也發現過去曾有地方人士希望透過企業資源的投入為地方發展帶來新契機。這類合作取向的態度往往也成為反對者質疑的對象，認為他們更關心個人或企業利益，擔憂此類立場迎合企業利益並犧牲地方長期利益與主體性，開啟社區內部的對立。

再生能源產業的進駐，不僅激化了社區與企業之間的矛盾，更暴露了居民對外來發展方案的信任危機。支持者與反對者對於「發展」的期待存在顯著差異，前者將其視為地方發展的新契機，後者則質疑這樣的發展是否會犧牲社區公共利益。這些矛盾進一步加深了地方發展的複雜性，也顯示了社區內部對「發展」本身的深刻分歧。

#### 四、永續發展的在地視角與理解邏輯

進入田野之前，我們原本擔心地方居民<sup>2</sup>可能不曾聽過「永續發展」這個抽象且廣泛的概念。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每當我們提起這個概念，茆子寮的每一位報導人都表示自己聽過，收集地方觀點的過程也異常順利。

事實上，不少當地人皆能侃侃而談，從「永續發展是什麼」到「如何實踐」等，都展現出豐富的想法。在茆子寮，我們遇見許多致力於地方事務的居民，他們的生命軌跡深深嵌入這片土地，因此居民們對永續的觀點並非來自抽象的概念，而是源於日常的實踐經驗與地方長久生活所累積的體會。在接下來的篇幅中，我們將以心娜村長、瑞泉大哥、黃船長與博幼基金會的怡慧老師的視角，分享地方居民對永續發展的詮釋。

我們認為，與其將茆子寮居民的看法簡單歸納為地方經濟、自然資源等面向，不如更近距離地從當地居民的生命經驗與價值觀出發，理解他們對永續發展的詮釋。本節將呈現不同的在地永續發展詮釋，儘管每位受訪者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然而在訪談中發現，地方視角對於永續發展本質的詮釋上，展現出相似的理解脈絡，即每個人皆以自身經歷為基礎，形塑出獨特或彼此呼應的永續發展內涵。

##### (一) 永續＝行動與計畫的延續

我們就是參加公部門的活動，他常常都會講到永續發展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啦。你做什麼有始有終，我覺得那就是永續啊。因為很廣嘛。你事業也是永續啊。你村務也是永續，不管你做公部門也是永續嘛。你看像我做烏魚子也是永續啊。就是你看你怎麼去發展其他的出路這樣子。（2025/01/14，蔡心娜村長，黑體為作者加註）**

茆東村村長蔡心娜過去曾擔任茆子寮城鄉發展協會理事長，和蔡茂昌大哥、蔡瑞泉大哥三人一起主導地方社區工作。她提到過去在做社區時與公部門互動常常提到永續發展這個詞彙，不過在她停止參與社區工作後就比較沒有在關注地方的永續發展，也不太知道社區要往哪一方面發展。

她從與地方政府接洽社區工作的過程中認識永續發展。對她來說，政府談論永續發展的原因是希望他們能持續發起社區活動，無論計畫是什麼名目，社區工作要持續推進、累積，不要半途而廢。因此當我們問起有什麼事情是永續的時候，比起談論哪些行動有助地方的永續發展，她強調的是過去做社區的態度：

---

<sup>2</sup> 為保護當地人權益及隱私，下文提及的部分報導人為化名。

沒有耶，因為我覺得說沒有想到做什麼工作是永續的...這就是你的基本功，要做就是要做，沒有什麼永續、不永續的問題。(2025/01/14，蔡心娜村長)

將永續發展與「延續」連結的不只有心娜村長，反風吹自救會的蔡曜明大哥長期關注地方政府在治理上的缺失，以喔熊藝術村計畫為例，他認為談永續時延續經營的理念很重要，現在政府以消耗編列預算的方式來維護彩繪會產生無法永續的問題，這導致藝術村雖然過去曾有每月 300 輛遊覽車造訪的盛景，但疫情後藝術村彩繪卻無法持續帶動箔子寮的經濟發展。

## (二) 不斷進步的永續觀

永續發展，就是要更好啦。應該是更好不是保持啦.....讓箔子寮更好，不是只有保持這樣啦。可是你要有那種要有那個能量，要有那個能量才會進步啊.....我現在在做廟裡，我們也是盡量做啊。(2025/01/15，蔡瑞泉大哥)

蔡瑞泉大哥目前擔任箔子寮普天宮的總幹事，過去曾是箔東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與心娜村長同為社區工作的執行者，但他的詮釋展現出不同於一般永續發展論述的面貌。有趣的是，他提到社區要進步、要發展，必須具備一股「能量」。雖然他在訪談中未多談過去的社區工作經驗，但我們推測，他對「能量」的強調，或許呼應了社區工作中需要匯聚多方支持與資源的實際經驗。

當問及一個永續發展的箔子寮長什麼樣子時，瑞泉大哥沒有描述自己期待的發展願景，而是認為，不管怎麼做，大致上也會與現在差不多。無論是過去在社區工作，或是現在擔任廟宇總幹事，他自己能做的就是盡力把事情做好。

瑞泉大哥的進步觀也體現在他對自身職責的期待之中。從普天宮總幹事的角色出發，他描繪出對廟宇經營與發展的具體想像：

永續發展，就是我跟你說的，可能這一塊地會做那個公園，然後蓋個餐廳漂漂亮亮這樣。然後就是這些宮廟看能不能更多來這邊進香，就這樣。(2025/01/15，蔡瑞泉大哥)

像廟也是一樣，就是一點一點去做這樣，譬如我去年來進香的有五十家，我們可能一年就多個十家.....就不要說保持，我說永續不是保持，至少要進步，如果退步了就糟了。(2025/01/15，蔡瑞泉大哥)

我們發現，在討論永續發展時，並非每位地方行動者都從「整體地方發展」的角度切入。更多時候，是從自己當下的職責與生活經驗，或是對特定產業與群體的關懷出發，作為行動的著力點，也因此形塑出每個人對永續發展獨特的詮釋思路。

田野資料顯示，地方居民對永續發展的理解，往往深深根植於他們當前的生活場域與實踐角色之中。瑞泉大哥的詮釋並非從整體地方發展的藍圖出發，而是

從自己能夠參與和實踐的範圍——宮廟經營著手，展現以個人實踐推動地方改變基礎的行動邏輯。

另外，他提到永續發展需要的「能量」，雖然這個詞彙沒有被瑞泉大哥明確定義，但我們從其過去的社區工作經驗為線索，將其理解為推動永續發展所需的集體動能與社會支持力量，反映出他對地方公共行動條件的敏銳意識。

### （三）漁業轉型與永續經營

作為在地漁民，黃船長在被問及是否聽過「永續發展」一詞時，並未直接回答自己對此概念的認識或定義，而是熱切地向我們分享對政府作為的不滿：

永續發展是有聽過矣，問題是你要這種東西的話，比如講你政府有沒有什麼立案來特優這些移民，對不對？你要發展這種事情是很好的，問題你總不可能叫一些漁民再另外花一把錢在那邊，到底會不會賺錢也不曉得……你中央（政府）能來輔導漁民，然後額外的一筆錢讓漁民來運作這些永續發展的東西嘛。（2025/01/09，黃船長）

黃船長從漁民的角度出發，將永續發展理解為產業轉型，且對政府推動產業轉型的方式頗有微詞，他認為政府應該要在經濟上支持沒有什麼本錢的漁民與農民，讓他們獲得在地方賺錢的機會，才有助於箔子寮跟四湖鄉的發展。

黃船長期待地方政府能協助發展自己的「老本行」，強調箔子寮漁港具有極高的發展潛力。他以「空間即資源」的觀點理解地方永續發展的可能性，並再次表達對政府忽略地方發展需求的不滿：

你全省臺灣省，你跟他走一圈就好了，只有箔子寮是最大、最有空間發展的……你看旁邊的空地不是很多嗎？超多，為什麼不來發展這邊呢？（2025/01/09，黃船長）

在我們所訪問的地方居民中，黃船長是唯一一位在討論永續發展時，主動將自然條件納入考量的人。他以自然資源——尚未開發的空間與漁獲，作為評估永續發展可能性的基礎，展現出從漁民經驗出發的獨特視角。

在他的理解中，箔子寮的海洋資源難以支撐所謂的「永續」，但陸地資源，特別是漁港周邊尚未充分利用的空間，則仍具有發展潛力。黃船長對於海上工作的「不可永續」認知，並非來自抽象的概念推論，而是源自其多年捕魚生涯的親身體驗：

我們很難永續，這個海水比較淺不像東部，要永續一定要深海的東西……漁民在抓魚不可能永續，永續的話抓魚的人沒得抓，雲林水太淺。（2025/01/09，黃船長）

黃船長以雲林沿海與東部、北部海域作對比，指出雲林沿海水域淺，海底缺乏足夠空間與魚群，因此無法支持漁業的永續發展。然而，陸地上可以永續是因為待開發的空間比較大，他尤其強調箔子寮漁港週遭的土地，憤慨地表示之前雖然有在漁會旁邊規畫一些工廠，但這些開發計劃卻沒有被落實。

黃船長關注的焦點並非自然資源的保護或生態平衡的維繫。他真正在意的是，能否透過合理運用空間資源，延續地方經濟活動，保障居民生計。

黃船長將「空間」視為「資源」的理解，反應過去政府依賴土地開發推動地方發展的歷史脈絡。漁港周邊尚未充分利用的空間，對他而言是地方未來可能自力更生的重要依據。然而，在開發計畫未能落實的情況下，這份對空間資源的期待，轉化為對地方治理失能的深刻不滿。

在訪談過程中黃船長多次提及地方政府與漁會組織不顧漁民聲音，只顧著維護自身的利益，言談中展現的憤慨情緒，揭示地方居民在長期發展失序中的挫折感與被忽略的經驗。他對未竟開發的憂慮，並不單純源於個人生計的考量，而是映照出一種集體性的焦慮：在資源日益匱乏，且地方漁民與政府機關之間溝通失靈的脈絡下，地方能否保有自主發展的可能性，成為更深層的永續發展課題。這種詮釋方式，將永續發展從抽象的概念，轉化為與在地生活需求密切相關的現實課題。

#### (四) 環境、人力資源與文化的創新與傳承

聽聞我們的研究主題後，善水咖啡老闆娘主動引介深耕偏鄉教育議題的博幼基金會的成員，怡慧老師與嫫敏社工師在繁忙的工作之間與我們分享對地方永續的看法。博幼基金會影響力遍佈全臺，其中基金會雲林中心剛好設置在口湖鄉下崙村，離箔子寮騎車僅五分鐘，因而與附近學校的老師、善水咖啡等關注教育議題的在地居民，逐漸建立起密切的合作與交流關係。

其中，目前任職於博幼基金會雲林據點的英文老師吳怡慧是箔子寮人。四年前因基金會在雲林釋出職缺，她選擇將臺中的工作辭去並返鄉就業。談及「永續發展」一詞時，她首先聯想到的是環境層面的永續。

怡慧老師認為箔子寮推動風力發電，對環境整體而言或許具有正面效益，但她坦言，自己對於風力發電設施是否真正利大於弊，仍抱持疑慮。訪談過程發現，她對反對再生能源的論述相當熟悉，特別提及風機運轉產生的噪音問題，不僅干擾居民日常生活，也可能影響海下魚群生態，進而衝擊以捕魚為生的居民生計。總結而言，怡慧對於環境永續與能源轉型議題，展現出遲疑、保守的態度。

怡慧老師主動提到，最初接觸到永續發展概念是在臺中就學期間曾經有人在路邊發放與海洋永續相關的宣傳資料。儘管如此，她對永續的理解並未局限於環境保護層面。

她坦言，最近開始意識到永續不只和環境議題有關，更涉及人力資源的延續與不足。以博幼基金會為例，近年來即長期面臨教師人力短缺的挑戰。她也提到，地方上如善水咖啡舉辦的淨灘活動，實際參與者大多為外地人士，反映社區缺乏凝聚力與行動力的現況。

永續發展就是一些能源，或者是資源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吧。(2025/01/13，吳怡慧老師)

怡慧老師對資源的理解，並不限於自然資源本身，也不僅關注其有限性與脆弱性。她從世代傳承的角度出發，詮釋永續發展的意涵，這種思考方式與《布朗特蘭報告》對永續發展的定義相呼應（曾裕淇 2016）。

在她看來，永續發展不應僅止於資源保護，更應涵蓋文化、教育、人力與經濟等多個層面的持續推動：

我覺得永續也是類似世代傳承吧就是一代代一代要傳下去.....而且你說要發展、發展，本來就是要各個層面去發展，不只是文化、環境、人力這些東西，還有經濟，我覺得本來就是應該帶起來。(2025/01/13，吳怡慧老師)

除了環境資源可能不會被過度消耗以外，然後其實文化跟教育方面可能是要提升、要創新、要有改變。(2025/01/13，吳怡慧老師)

在怡慧老師心中，最重要的議題其實是地方文化的延續。她回顧童年時期，記得那時箔子寮漁業興盛，每逢假日村莊總是熱鬧非凡。但是怡慧老師用著有些失落的語氣講現在捕魚的人變少了，捕魚的文化好像無法「永續」下去。我們認為，怡慧老師描述的「捕魚文化」，不僅是生產活動的懷舊，更是對產業生活方式及其社會連結的延續與傳承的關注。

總結而言，怡慧老師未將永續發展單純理解為自然資源的保護，而是將其視為涵蓋人力、文化、經濟等多重層面的連續性過程。這種理解體現出地方人士在全球永續發展話語下的主動詮釋與在地化思考，展現永續概念在地方脈絡中的多元變形與意義生成。

## (五) 小結

本節透過不同地方人士的觀點，呈現出茆子寮居民對永續發展的多元詮釋。從上文可知，地方居民所理解的永續發展並非抽象的概念，我們發現茆子寮居民所理解的永續發展與其自身的生活經驗、職責及在地關懷緊密連結，因此呈現出多層次且具體的地方永續發展詮釋。這些多層次的地方詮釋之所以值得我們關注，係因其能夠真實地反出永續發展概念在鄉村社區層面如何結合地方居民的實際需求與文化情境，同時也能夠呈現在鄉村社區探討、落實永續發展概念時所應關注的面向。我們也發現這些詮釋巧妙地呼應了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與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中的多個面向，例如提供優質教育 (SDG4)、確保全民擁有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 (SDG8)、建構包容和安全的永續城鄉 (SDG11) 以及保育海洋生態 (SDG14) 等 (陳芳毓、許鈺屏、李鈺 2025)。

茆子寮居民透過自身經驗所提出的多元在地詮釋，亦揭示了國際間宏觀永續目標在地方實踐時所需面對的多樣性與挑戰，如同黃船長從漁業轉型出發，認為政府若想推行永續海洋生態，在地居民的生計也應納入其討論之中，而怡慧老師所提到的文化與教育永續也深刻反映出臺灣鄉村普遍面臨人力資源缺乏的挑戰。因此，我們認為儘管國際與國家層級的永續發展目標提供了行動框架，但唯有將地方居民基於日常生活經驗而形成的永續詮釋納入考量，才能真正貼近實際且靈活地回應地方的真實需求，彰顯永續發展的真正價值。

在本節中，我們展現了在地居民如何認知並詮釋「永續」對他們的意涵。然而，當我們將焦點放回到茆子寮時，也觀察到居民們對於理想的永續社區有其一套觀點與條件。這些觀察為我們思考社會永續在鄉村社區中應關注的面向，提供了重要的線索與進路。

## 五、從理念到條件：地方永續的實踐基石

地方居民不僅描繪出對理想永續茆子寮的願景，有許多人透過實際行動朝向永續社會邁進，從訪談中也發現居民們將自身的地方實踐與永續概念相連。因此我們得以看見，永續發展的價值如何在在地生活脈絡中，轉化為個人的信念與具體實踐。

本章節我們將透過蔡曜明大哥、善水咖啡老闆與蔡茂源大哥的訪談內容，歸納出社區永續發展所依賴的三項關鍵條件：其一，打破僵固的地方政治結構並規劃具前瞻性的產業建設藍圖；其二，培養具備長遠眼光與行動力的在地心態；其三，促進在地與外部資源之間的協力合作。藉由這三項要素，我們得以具體描繪出在地方視角下，永續發展應包含的核心拼圖與行動基礎。

### （一）舊派系與新願景：地方產業建設的規劃困境

蔡曜明大哥不光是談社區計畫無法延續的問題，而是把地方永續發展的尺度提升到政治人物對地方產業建設的長期規劃。他認為現在有太多政策是為了宣傳與行銷，政治人物為了展現政績而將計畫時程短期一年、中期兩年、長期四年，時程的限制讓這些計畫沒辦法好好完成。

在蔡曜明大哥的觀察中，地方居民對外來者的不信任感也常造成產業輔導轉型的問題，我們發現大哥關注的仍是計畫能否延續：

這些農民會有先入為主的觀念，我一輩子作田……他會不會有點不相信學者？但學者跟你講的是理論，你怎麼會講他操作的一個細節，你看三年以後就沒辦法**永續**啊<sup>3</sup>。（2025/01/08，蔡曜明大哥，黑體為作者自行加註）

蔡曜明大哥認為箔子寮不能永續是因為僵化的政治結構，他提到雲林縣跟四湖鄉長期由地方派系把持，長期執政的人物無論是政治作為或想法都會固化且趨於保守，而無法提出新的產業建設規劃。

面對這樣的困境，蔡曜明大哥主動尋求機會，希望讓有理想、有能力的人回來重整四湖鄉的發展方向，他自己也投入在地方政治組織，實際協助四湖鄉的產業建設規劃。改變地方政治領導者是解決問題最快的途徑，以過去的口湖鄉長林哲凌為例，強調他的經營理念讓原本荒廢的滯洪池變成熱門的觀光景點，同時也串連了口湖鄉不同的觀光資源。

如果要人留在當地，就必須要有工作機會。箔子寮產業沒落、人口外流的現況讓許多人都和我們強調在地工作機會的重要性，蔡曜明大哥也從政治人物應積極規劃產業建設的角度，描繪地方邁向永續發展的路徑。另一方面，同樣關注「人」願不願意留下的議題，善水咖啡老闆與老闆娘向我們分享截然不同的切入點。

### （二）扎根人心的箔子寮記憶：共築展望的起點

善水咖啡廳，是一位返鄉青年在箔子寮創立的空間。老闆自小生長於此，歷經外地的求學與工作後選擇回流，在家鄉開展新生活。善水咖啡老闆認為把「人」留在箔子寮，是地方永續發展的重要條件，然而要讓人留下來，就必須有充分的理由。除了支撐生活的工作機會之外，個人對地方產生的情感連結，也是吸引年輕人的重要關鍵，而唯有年輕群體在地方出現，才有可能激盪出新的想法，為地方注入活力：

年輕的氣息不夠多。如果有一群，比如說這是你們這一群好了，就是一群年輕人願意在這邊停留……（2025/01/08，善水咖啡老闆）

<sup>3</sup> 此段資料為蘇穎欣同學與蔡曜明大哥訪談時所獲，感謝感謝蘇同學慷慨提供。



善水咖啡老闆將箔子寮永續發展的推動，分成兩個層次。最基本的條件，是地方必須「有人」，更精確地說，是要有年輕族群的投入。而當這些人聚集在一起，開始共同描繪地方的未來願景時，這種面向未來的心態，便成為地方永續發展最深層的根基；唯有根基穩固，地方才能持續成長與發展。

所以要永續這些事情，其實是人要先進來，然後人進來以後，我們可能可以一起改變這個心態這樣子……我們一起來展望未來這樣子。  
(2025/01/08，善水咖啡老闆)

善水咖啡老闆是箔子寮少數返鄉創業的年輕人之一，曾在外地生活打拼，目前已返鄉四年。由於自幼在箔子寮成長，他對地方懷有深厚的情感連結。訪談過程中，老闆與老闆娘多次提到，他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是：「我（善水咖啡）可以為這個地方做什麼？」

那所以從善水咖啡的角度來看，永續是一件事。一件叫做「我能夠種下種子」這件事情。我只能夠種下種子，我只是讓就是讓這些小朋友有印象、有印象的加深。(2025/01/08，善水咖啡老闆)

這些小朋友長大之後，雖然不一定會繼續生活在這裡，但是或許有一天，就像我一樣，有可能會再出一個或是一群……(2025/01/08，善水咖啡老闆)

善水咖啡老闆將自己的行動比喻為「種下種子」——在地方扎根、培養記憶與情感。即使無法確定孩子們未來的去留，但只要曾經留下深刻印象，為他們創建一個返鄉的理由，就有可能在未來的某個時刻被觸發，引導他們回到這片土地，延續地方活力。

在詢問善水咖啡老闆怎麼理解永續時，他先是回問什麼是永續，我們回答：「永續是有人一直在這裡生活。」延續著人的主題，他邀請我們試想自己如果是箔子寮人，每次回到這裡發現無事可做，還會想要回來嗎？

老闆的論點強調，在箔子寮生活的記憶如果在個人生命中無足輕重，沒有實際與地方培養感情，那麼在外求學、工作過後又怎麼會想到要回來這片土地呢？

因此善水咖啡老闆從地方教育的角度著手，像是平常照顧放學以後在外遊蕩的小朋友，提供環境讓他們寫功課跟看課外書，或鼓勵他們去廟口跟老人家互動。寒暑假期間，善水咖啡舉辦夏令營、冬令營，活動內容除了有餅乾烘培 DIY、烘咖啡豆等手作行程外，他們也有意識的加入培養地方文化認同的活動，像是帶小朋友去廟裡寫生，鼓勵他們畫出印象中的箔子寮等等。豐富小朋友平常在箔子寮的生活，加強他們對地方廟宇、老人之間的連結，這些活動雖然無法在短期內帶來劇烈改變，但透過日常的累積，為未來可能的地方再生播下種子：

我們要改變一點，這可能是 10 年、20 年、30 年的事情，我不曉得，但是我覺得至少我能做的永續就是不斷的播種……從這個咖啡廳出發的話，就是從散播

種子、當個影子而已啊，我沒辦法做出驚天動人的事情。(2025/01/08，善水咖啡老闆)

善水咖啡老闆指出，個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地方的永續發展，更需要一群人共同參與，彼此支持。他認為「一個人想做的事情，不如一群人想做的事情。」有了群體的行動基礎，地方才真正有可能迎向永續發展的未來。

### (三) 高等教育機構、企業、公部門多方協作的永續發展路徑

蔡茂源大哥是箔子寮當地大家族的一份子，過去曾在美國工作過，茂源大哥認為自己家族龐大就是有返鄉貢獻的義務，因此在9年前決定返鄉，回來後發現箔子寮發展停滯，因此下定決心要在家鄉重新扎根、振興地方。在我們訪談到箔子寮該如何永續時，茂源大哥曾言自己本身不具有任何官方公職，因此把自己視為一個平台，認為唯有將各方整合起來，地方才得以永續發展。

茂源大哥提到九年前甫回來時，想做的永續是延攬學術機構的進駐。認為唯有仰賴學術機構及其培育出來的人才，才有可能為地方發展注入能量，帶動產業發展。

9年前我請國立海洋大學設分校，引進四個科系河海工程、養殖、食品工程、休閒……國立海洋大學如果在這邊設，就能培養在地年輕人……這是我那時候想做的永續。(2025/01/08，蔡茂源大哥)

茂源大哥清楚的提及這些科系如何構成當地產業四角。他認為箔子寮漁港口淤積，需要有河海工程的專業人才負責處理，而養殖技術需要有人能夠指導、延續產業發展，食品加工可以利用當時規劃四十公頃的加工區讓漁業的產業鏈能夠被重新啟動，休閒系則可以用來規劃海水浴場的活動，使得當地可以創造出中部最完善的海水浴場，還能夠把臺中以南到嘉義、澎湖的休閒活動重新規劃、聯繫。由此可見茂源大哥對於社區永續發展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條件十分明確，且同時規劃完善也展現其對於地方發展的熱忱和遠見。不過這些規劃後來遭到反對，因此迫使籌備好的一切劃下句點。

雖遭遇挫折，但是茂源大哥仍保持著對於家鄉的熱愛和認同感，向能源企業尋求協助。茂源大哥原本預計要與企業在本地將閒置土地興建為老人復健中心，根據過往曾在外商企業工作的經驗，深知對於外國企業來說，重點不應該是向他們所求資金，而是具體的建設協助，然而達德能源過去曾與地方部分人士發生過能源建設相關衝突，因此再度受到地方部分聲音反對，一夕之間，過往協商談成的老人中心被迅速拆除。帶著一點惆悵，茂源大哥嘆氣著告示著這項努力又付諸東流。

不過令我們感到驚喜的是，茂源大哥迅速整頓好自己的心情，對著我們說他仍然對茆子寮充滿樂觀，現在又重振旗鼓決定要向外部學術單位與鄉公所協助。茂源大哥現在積極透過鄉公所農業課長及鄉長幫忙，同時也請與農村發展署有合作的逢甲大學協助規劃地方發展跟撰寫計劃、報告，申請茆子寮基礎建設等提案。

我要改變，……，我只是平民，我有能力……找某些人完成。營建發包是政府的事情，地方只是需要在這裡面做督導，就可以達到我要的目的。  
(2025/01/08，蔡茂源大哥)

茂源大哥認為自己不具有任何官方職位和權力，但是經年累月下來的人脈與政治資源，讓他重新看見希望，透過向外部尋求協助，為茆子寮的未來重新注入新的活水。茂源大哥也十分重視學術單位的作用，他曾言及「學術單位永遠不會倒，什麼東西都要靠學術單位」，可見其對於與學術單位協作的重視。

我們認為，茂源大哥字裡行間都充分展示了地方永續發展時，不僅需要內部的驅動力，同時向外部尋求協作和資源都十分重要。從訪談時得以看見，即便積極向外部尋求資源，社區內部的想法與認同也足以在一夜間將這些外部協作的努力給停滯。由此看來，與政府、高等教育機構協作不僅是社區永續的重要條件，社區內部的凝聚力及共識也是社區能否永續的重要因素。

#### (四) 小結

綜合上述三位地方居民的訪談，我們發現雖然每個人的關懷不同，對永續發展的實踐思想途徑也不一樣，然而其各自在所身處的位置、擁有的資源各自努力，我們得以從中分離、提出茆子寮居民認為永續發展應該具有的三項關鍵條件，包含突破僵固的政治結構、共同展望未來的心態以及促進內外部資源的協作。

首先，蔡曜明大哥指出的條件告訴我們，社區永續不僅限於計畫執行問題，更涉及到整體環境中的地方政治權力結構，政治在其中的角色應當是提供更長遠、全面的治理視野，而非淪為短期政績的工具。

其次，善水咖啡老闆從其過往地方實踐中提出，認為共同展望未來的心態是地方永續發展的根本基礎。我們也認為在談地方永續時不應只是關注在物質上或者經濟上的改善，培育社群凝聚力，扎根地方認同感，如此才能夠真正的在社區中匯集眾人的力量，轉變社區的現況。

最後，茂源大哥拓展了善水咖啡老闆的條件，認為地方永續必須有內外部資源整合與協作。在茂源過去在茆子寮所有的地方行動，皆可看出茂源大哥將自己視為外部資源與的一個媒合平台，企圖整合政府、企業、高等教育機構的相關資

源，注入到地方社區中，然而，我們同時也從茂源的實踐中發現，如若地方內外部間的信任與共識沒有先被建立，再多的外力協助也難以發揮真正的功效。

從此節來看，茆子寮居民所提出的永續發展條件，清楚揭露永續發展概念本質上涉及政治權力、地方信任與共識及內外部資源協作等多重層次的社會過程。同時，透過地方居民基於長期生活累積的經驗，我們能更精準地理解在地社區對理想永續條件的具體需求與期待。此外，根據報導人的論述也進一步凸顯出，推動茆子寮社區的永續發展時，居民間的信任、凝聚力及能動性等內部要素必須被充分重視。綜上所述，我們得以發現鄉村社區推動任何活動皆仰賴緊密的人際網絡，因此社區的永續性與內部網絡的緊密程度高度相關。只有細緻地探討茆子寮社區當前的整體經濟產業背景與內部人際互動與實踐脈絡，才能完整描繪出其永續發展的現況圖像，從而識別出在鄉村社區推動社會永續時，可能會面臨哪些困難之處。

## 六、願景與現實的斷裂：茆子寮永續發展的多重困境

在上一節中，我們已深入探討茆子寮居民所提出的永續發展條件，揭示永續發展不僅是資源與環境的問題，更是政治權力、地方信任以及內外部資源協作等多重層次交織的社會過程。這一節將進一步探討茆子寮當前在永續發展實踐中的具體困境與挑戰。地方人士存在對未來的憧憬與熱忱，卻因為缺乏有效協同與整合而難以凝聚成更強大、持久的推動力量。我們發現報導人們普遍認為茆子寮面臨產業活動低落、缺乏人力資源及內部向心力的問題，而居民不願參與、協作，更加劇地方永續發展的困境。

除了這些共通問題外，當我們深入探討社區營造的領導者之間的合作與分歧時，發現了更深層次的矛盾。儘管社區中不乏對未來充滿熱情與憧憬的人，但由於缺乏有效的整合，這股熱情無法轉化為持久的發展推動力。領導者在發展願景與實踐方式上的差異，揭示了返鄉菁英與地方居民之間的協作張力，也反映出社區內部對於發展路徑的根本歧見。

### （一）沒有產業就沒有人：茆子寮的人力困境與經濟現實

自 1981 年起，雲林縣四湖鄉即因工業區發展不足，導致就業機會匱乏，進而引發持續的人口外流（劉曜華編 2006：242）。在田野調查中，居民紛紛反映社區缺乏產業經濟誘因及人力資源，加上鄰近漁港因淤沙而不似從前繁榮，讓永續發展陷入停滯。

心娜村長與蔡曜明大哥指出，茆子寮的基礎經濟環境條件薄弱因而讓觀光活動帶來的經濟效益有限。過去嘗試以 3D 彩繪藝術村帶動觀光，雖然一度吸引遊客到來，卻因攤販與店家沒有進駐誘因，因而無法製造在地消費與持續收益。蔡曜明大哥也曾說，只有引進工業及觀光業並規劃一個完善的配套措施才能夠創造就業機會、吸引人返鄉，為地方的永續發展貢獻心力。由此可見，地方上如若缺乏商業經濟基礎條件即使社區擁有其亮點特色，也難以催生長效經濟。

另外，黃船長也強調，新世代去留茆子寮的關鍵在於政府應該協助地方打造具吸引力的經濟產業誘因。他認為地方政府應積極發展利於偏鄉弱勢的支持政策，為茆子寮引入更多就業機會，否則年輕人即便外出求職也頗為不易，鄰近現有的大型廠區如六輕工業區亦難以充分吸引當地人留在茆子寮。

缺乏工作機會的茆子寮，使得當地年輕人長大後漸漸出走尋找機會，如同瑞泉大哥提到現在年輕人除了去騎車要塞 40 分鐘才能到的六輕工業區，不然就是出走到更遠的都市發展，連自己也不見得會想叫自己的小孩回鄉，他同時也無奈地說：「現在要怎麼發展？年輕人都出去了……工作機會太少了，沒有工作機會啊。」

從上述報導人的分享而知，工作機會匱乏及缺乏經濟產業誘因，導致人口外流的現況持續加深，也讓茆子寮人口老化變得更加快速，地方上漸漸流失了能夠為地方永續發展注入活力的年輕人，也使得對於社區發展十分憧憬和熱忱的地方人士面臨最基礎的資源問題——人力不足。善水咖啡老闆曾言及茆子寮年輕氣息太少、發展人力不足，而茂昌大哥也更清楚的解構地方永續發展的現況要能夠改善，首先一定要有地方認同感的人，第二是有意願參與，第三則是要能夠經常接收到國家對社區發展相關的資訊。這些也在在強調人力匱乏是現在茆子寮所面臨的難題。

## （二）難以凝聚的共識：社區內部參與與信任的挑戰

從主觀的一個面向談，社區要活化要永續最重要的就是有長期居住在這裡的居民，有對這裏的認同感，第二個願意參與，第三個是人民能接收得到對國家社區建設相關資訊。這三項是這個社區最薄弱的地方。（2025/01/10，蔡茂昌大哥）

茂昌大哥指出，茆子寮永續發展停滯的三大關鍵要素中，第二項「參與意願」尤其值得關注。即便社區有人力，卻並非人人願意主動為地方出力，就算有志者，也往往各自耕耘，難以形成合力。社區行動由於多數皆屬無償勞動，要喚起廣大社區成員共同投入，必須仰賴緊密的人際網絡與凝聚向心力才可能達成社區的永續。然而現況卻貌似並非如此，真正行動者不僅人數有限，也未必朝向相同目標努力，因而難以推動社區向前。

心娜村長曾憶起過去在辦活動時所面臨的情況，她認為缺少人力導致社區無法動員成為了一個不良循環，同時也提及社區內部缺乏共識與動員機制。過去村長在推行社區發展時，僅有幾名志工願意參與，而且多數都是這邊年輕人居多，但有的志工現在都已經成年有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要兼顧社區參與和現實生活幾乎不太可能，反觀社區發展活動的性質是需要經年累月的，短期內不見得會有成效，但是社區成員只會想要看到成效後才能夠參與。

然而在人力缺少的情況下光要靠少數幾位對社區發展有熱忱的人士做出成效基本上是不大可能。且村長也曾提到過往在做社區時，村民大部分習慣被動參與、對公共事務有強烈的評論意識，而這樣的現況有時也與村民所屬的政治、黨派有關，有時也與居民們的資訊不對等有關。

後來停下來以後就很難啟動拉，……，你不做他就一直問。(2025/01/07，蔡心娜村長)

在心娜村長的眼中，永續的箔子寮需要改變，但現在是處在一個較為悲觀的情況下，認為不會改變的機率較高，社區裡其他人都各有各個工作及職責，村內總有聲音持續的對做社區提出反對，令熱心投入的人士備感挫折。

永續的箔子寮需要改變，我覺得不會改變的機會大於會改變，我們是本身有在做那件事情，……，但中年人有他們要做的事情，……，也不是贊同你做社區，做到後面就是不了了之這樣……。(2025/01/07，蔡心娜村長)

從此處得以看見，村民並非是對社區的發展視而不見或者漠不關心，相反卻十分關注這些行動是否持續以及行動成效，但是卻沒有人願意加入社區發展行動，更多的是在現有的活動中成為被動參與的角色。社區缺乏某種喚起大家共同為同一目標努力的機制和誘因，而像這樣的問題也並非是村長獨特的經歷。

像是善水咖啡老闆也曾提及，社區工作的挑戰是可見的，包含缺乏向心力和參與度。他提及在他們夫婦回來之前村長就有在做社區，然而因為人力不夠又或者缺少一個誘因去引導大家一同參與，且在鄉村要能夠做好事情，大多時候都必須仰賴高度的人際網絡才能夠順利進行。過去善水夫婦在推行一些社區活動時，也面臨社區的評論，然而善水咖啡老闆也提及這些評論會造成社區永續動力銳減。

就是就是當別人給你意見的時候，如果你每一句都在反駁他，比如說你，你你那個做那個不行啦。……就是一直反駁人家的時候，其實會挫折，其實就是你反而越生氣。(2025/01/08，善水咖啡老闆)

善水咖啡老闆在他的地方實踐中所獲得的想法，認為若社區要能夠永續，就應該要具有高度的集體性和向心力。當善水咖啡老闆談到社區缺乏集體共識時也說到：「與其去想自己一個人想做什麼事情，倒不如你們大家想做什麼，好好從這樣的方向去發展。」，然而社區現況卻告訴他，這離能夠順利讓社區動起來仍然有段距離。

在和怡慧老師訪談時，她也提到對於現況的滿足、社區內部成員凝聚力缺乏和人口老化成為了社區永續阻力的現況。怡慧認為，在這邊生活的大家會覺得自己的生活現況是很好的，不會有概念說一定要如何才能夠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反而不會去思考該如何更好，也不見得需要「更好」。另外就是社區自己內部的凝聚力也不夠，沒有把社區發展這件事情視為自己的使命或者責任，加上茆子寮現在面臨高度的人口老化，老人家的行動力也不如青壯年，因此社區也難以永續。

怡慧老師也舉出過往當地曾經有淨灘活動，雖然活動盛大有很多人響應，但當地居民就住在鄰近海灘的地方，卻沒有幾個人前去參加，反倒都是外地的民眾或親子前來參加。這些種種也能夠顯示出，在地居民對於公共事務的不夠積極。訪談時社工師嫫敏也認為缺乏共同的願景是茆子寮現在所缺乏的，但這同時也是社區永續的重要因素。社工師嫫敏也認為，地方上不應該在社區永續發展這件事情上分派系，應該要為了社區而有個共同的願景。

綜觀報導人們對於社區的觀察和親身經驗，我們發現皆指向的社區內部凝聚力缺乏以及社區居民雖然十分關注地方發展的行動，卻時常站在被動參與的角色。如前所述，永續發展需要多方攜手合作，儘管政府與外部資源的介入十分重要，社區成員的凝聚力同樣是驅動地方永續的核心因素。然而茆子寮中促進社區永續發展的相關人士也都提及，社區的成員貌似並沒有一個共同想像的願景，即便有，可能也缺乏動力和機制喚起社區成員在滿足日常基本需求的工作之餘，撥空共同為茆子寮的永續未來努力。

但值得更深入探討的是，社區成員的凝聚力之外，其實多數有具體地方實踐並為茆子寮社區永續所努力的發起者／領導者，也缺乏明確的共識和向心力，這亦構成了社區永續現況的難題，即使社區有對於未來十分憧憬、熱忱的一群人，但力量散佈在茆子寮各處，無從協同整合凝聚成一股更強大、持續的力量。

### （三）橋樑與裂縫：返鄉菁英在制度與地方之間的角色困境

出身自地方大家族的蔡茂源與蔡茂昌，在臺北的學業與職涯上皆取得顯著成就。儘管長年於外地生活，兄弟倆心上始終記掛著家鄉，帶著在城市累積的人脈與見識回到地方，是地方永續發展的重要推手。兩人在實踐心中理想的茆子寮過程中，採取不同的實踐位置並各自面臨挑戰。

接下來，本節將以「地方永續發展的資源橋接者」視角，揭示他們如何構思發展計畫，將自身定位為地方發展協會與政府、企業等外部資源之間的媒合者，積極在地方行動時遇到哪些困境。

## 1. 茆子寮社區營造歷程

和茂昌大哥第一次見面是在課堂上介紹茆子寮地區的族群歷史與產業文化，簡報列出濱海村落的問題與當前的永續發展行動。茂昌大哥對政策趨勢敏銳的觀察，於不同時期根據政府策略潮流，持續推出新時代的轉型發展計畫。如民國 110 年推動地方發展協會做地方創生，呼應民國 109 年雲林縣政府推動地方創生（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2024），最近因臺灣碳交易浪潮興起，積極投入在護土固碳實踐工作坊的準備工作，鼓勵企業提供農民種樹的資源並藉此獲得碳權。

對地方發展而言，掌握政策趨勢，無疑是獲得政治資源支持的重要基礎。茂昌大哥目前定居在臺北，過去從事園藝景觀產業，協助工程顧問公司調查生態環境並進行環境設計規劃，茂昌大哥在民國 105 年退休，當時經常回來茆子寮照顧家人，他感慨 40 年過去茆子寮不但沒有發展，還變得更老更舊，便開始研究政府補助計畫，並與當時的村長<sup>4</sup>聯繫。他提到自己過去在北部社區的社區營造設計規劃經驗豐富，當時覺得回到鄉下做應該更得心應手。

茂昌大哥是社區工作重要的推動者，長期由茂昌發想計畫並發號施令，當初也是茂昌大哥主動邀請蔡心娜村長一起做社區。心娜村長與瑞泉大哥是執行者，工作的方向與計畫書則由茂昌大哥撰寫，發想後三個人密切協作：

因為這件事情是蔡茂昌，他自己在想的，他想做什麼，但是他會問過我的意見之後，覺得可以我們再繼續做這樣……大家一起參與哪個需要改變、改進。（2025/01/07，蔡心娜村長）

推動社區營造過程中，茂昌大哥感受到要永續發展，除了地方居民要有認同感跟願意參與社區工作之外，民眾有沒有獲得國家對社會、社區發展規劃的資訊管道也很重要。回顧茆子寮的社區工作模式，少數人如茂昌大哥有管道跟能力轉化官方資訊，配合政策方向推出相應的計畫書。

茆子寮城鄉發展協會積極推動社區活化，並於民國 107 年度獲得雲林縣規劃師環境組銀獎的殊榮，然而這一路走來並不容易，三年前社區營造工作戛然而止，茂昌大哥對此沒有太多著墨，僅淡淡的表示因為協會人事的異動所以停了下來。

三年前心娜村長決定接續去世父親未竟的村長任期，並成功補選上茆東村村長一職，瑞泉大哥則轉任普天宮總幹事，後來的工作重心以接待進香團為主。彼此對地方發展方向的期待不同，社區工作的擱置是心娜村長、茂昌與瑞泉大哥在討論過後的結果，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並非一夕之間的轉變。長期不被地方居民認同而累積的挫折感，因為和能源企業——達德能源合作而與地方人士爆

---

<sup>4</sup> 前任村長為蔡心娜村長的父親，父親去世後，心娜村長決定完成父親的任期，參加村長補選。



發衝突後，改變瑞泉與茂昌大哥對社區工作的心態，村長自己也因為家人生病的緣故，三人討論過後，決定暫時放下社區營造的工作，直到現在。

## 2. 發展想像與在地實踐衝突：社區「領頭羊」的分化

「領頭羊」是心娜村長在談及過往社區營造工作領導者：茂昌大哥、瑞泉大哥與她自己時所使用的詞彙。茂昌大哥與心娜村長在分享茆子寮永續發展願景時，雖然都聚焦在社區營造工作，但關注的議題與發展態度上存在差異，這源自兩人分別生活在臺北與茆子寮，茂昌大哥在臺北接收政策趨勢的習慣與推行社區營造的豐富經驗，讓他傾向更宏大且具體的規劃，而心娜村長則因為深耕於地方，對當地的需求與人情網絡有更直觀的感受。

在本節討論中，我們希望呈現，儘管政策趨勢對社區計畫的內容與方向產生影響，地方依然難以完全實現政府期待的永續發展模式。即便有像茂昌大哥與茂源大哥兄弟倆這樣的菁英作為政府與地方之間溝通的橋樑，對接的社區營造工作者是否能接受並認同這些理想，仍是茆子寮面臨的主要挑戰。但我們也想再次強調茆子寮之所以能完成包含喔熊藝術村等重要的社區工作，是由茂昌大哥、心娜村長等人一起努力的成果，真實世界中的合作，本來就不是單一理想的實現，而是各方力量與需求在現實中進行調和的結果。

儘管心娜村長、茂昌大哥兩位社區營造的領導者心中的茆子寮發展藍圖在規模與重點有所不同，且同樣在地方受到居民的挑戰，但他們的合作依然是社區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兩人分別從地方計畫的實踐者與發想者的角色，回顧推動社區營造的困境。

因為他都在臺北，他不知道這些人的心態……我做這些事情，我可能會得罪到很多人，而且很多閒言閒語會出來，我說你都不會替我考慮一下。  
(2025/01/14, 蔡心娜村長)

心娜村長作為社區工作的執行者，他談到許多感到孤獨的時刻，因為茂昌大哥平常在臺北生活，對地方輿論的敏感度較低。此外茂昌大哥作為提出社區營造計畫想法的人，活動期間若是有什麼問題需要確認、解決，只能由人在茆子寮實行計畫的心娜村長跟瑞泉大哥來協調。

我在地生活多少年了，我就不敢說我要做什麼，你這種臺北來來去去的，你要跟我講說你要做什麼，人家怎麼會信？(2025/01/07, 蔡心娜村長)

茆子寮社區營造的的分工方式，凸顯制度化想像與地方實作之間的張力，茂昌大哥長期生活於臺北，熟悉政策走向與計畫申請邏輯，他所構思的社區發展藍圖帶有明確的制度化願景：透過計畫書撰寫、政策資源媒合與跨社區整合，為地方鋪設一種「由上而下」的永續發展路徑。

心娜村長另一方面則需要在地方面對權力關係與居民的日常懷疑，我們看見承受來自地方的輿論壓力，為計畫的成效負責以及處理臨場狀況等，這些都讓她承擔起不只是執行者的角色，更是社區營造計畫的協調者與代言人，試圖在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網中找出大家支持，甚至一起工作的可能性。

這兩種角色本應互補，但在現實中卻可能產生誤解與磨耗。茂昌大哥以城市觀點預想的鄉村社區動能，未必能如預期般被心娜村長等人迅速轉化為具體行動。反之，心娜村長面對的地方阻力與人際風險，也未必能被茂昌大哥充分感知與體諒。兩人各自在不同脈絡中成長與耕耘，一位透過政策語言建構出制度化的發展藍圖，一位則在地方實作中調度人脈與信任，試圖讓社區行動得以落地。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差異之中，協作的張力浮現，也揭示出制度邏輯與地方現實之間難以調和的落差。

這樣的張力不僅體現在跨地域分工的合作關係中，即使是長期返鄉、積極投入地方事務的茂源大哥，也同樣面對理念過於宏大而地方回應冷淡的困境。

### 3. 共鳴缺席與理想孤立：在地菁英的發展推動挑戰

我那個時候為了給村裡面的人，不要很骯髒（的賣東西），我弄了一個社區小舖，裡面有冷凍庫擺的很漂亮，你們可以拿東西來這賣，我也不收租金，你賣完就走了，就是說提升他的品質...他們不認同啊。（2025/01/08，蔡茂源大哥）

座落在旅人驛站旁的漁村小舖，是茂源大哥返鄉後親自籌設的計畫之一。這項看似簡單的舉措，實則承載著他對地方產業活動的期許。然而，即使提供免租金的販售條件，也未能換來地方的認同與參與。蔡茂源大哥坦言，計畫推出後不僅未獲支持，反而遭遇抵制與反彈，將其視為外來干擾。

這段經歷可被視為茂源大哥返鄉後地方實踐困境的縮影。雖然他具備連結中央政府資源的能力，並對地方產業轉型、人才教育與區域整體發展藍圖懷抱清晰構想，也多次試圖推行計畫，但無論是村長、社區發展協會成員，抑或一般居民，對其構想多半缺乏共鳴，面對中央政府人員參與的會議邀約亦常表現出冷淡甚至抗拒的態度。

在訪談中，茂源大哥多次提及自己成功邀請中央政府官員至箔子寮開會與實地視察。他認為地方具有公職身份者——無論是村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應該要把握機會直接跟中央政府溝通，積極爭取政治資源，這種期待反映了他對政府體制運作與資源回應能力的信任。他相信只要地方公職能夠有效對接中央，便能為地方帶來更多的發展機會。

然而，地方社群對政府的評價卻與他的信念形成鮮明對比。茆子寮居民普遍對政府缺乏信任，這種信任斷裂與地方產業長期的發展停滯、失靈的資源挹注與環境治理相關。在漁港實地觀察時遇見的蘇大哥強調，政府雖然承諾協助港區發展，但多年來始終停留在「規劃中」，懸著承諾至今仍未實現。

隨著時間推移，原本的失望情緒逐漸轉為冷漠。居民不再積極主動的表達需求，不期待政府會有所回應，不認為自己有能力促進地方發展。在這樣的情境中，發展疲乏成為一種普遍的地方情緒，並最終轉化為對政府機構持續性的不信任，使任何來自制度的介入與規劃在地方更難產生實質動能。

儘管如此，茂源大哥仍然對制度本身保持信任，他熟悉與中央政府對接的政治操作，在他的藍圖裡，由地方公職來統籌地方發展的需求，中央則負責給予技術與資源指導，他所扮演的是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橋樑角色，運用自己過往在體制內累積的行政經驗與人脈，協助地方取得支持所需的上層資源。

目前茂源大哥促成農業部農村發展署南投分署、四湖鄉公所還有逢甲大學三方的合作，協助規劃與申請茆子寮的基礎建設，訪談期間他談到南投分署署長一直在和他接洽，說要派團隊拜訪鄉公所，那他也很積極的想要幫署長來一起推動這項工作，不過它覺得這些工作應該是要地方公職的人要一起來做，而不是只有他自己在推進，在這裏，我們又再一次看到地方發展規劃領導人物的合作困境：

你應該比我閣較緊張乎？對不對，你要想盡辦法說我們去約公所，變成我在跑，我跑幹嘛，我不跑我也在過我(的生活)，我也在想。(2025/01/08，蔡茂源大哥)

茂源大哥在表達工作中的無力感時，也開始質疑自己為何要繼續投入地方事務。長期未獲支持的經歷讓他產生困惑，他開始思考，自己的努力是否真能帶來改變，抑或他也應該像大多數人一樣，選擇「過好自己的生活」就好？

為了實踐自己的理想，茂源大哥也曾嘗試投入地方公職選舉，參選村長一職。但他意識到在茆子寮的地方社群網絡中，臺大畢業的學歷背景不僅沒有幫他贏得更多選票，反而成為某種引人反感的標籤，這種情形透露出地方對於知識菁英的文化敏感性與權威的不信任。換言之，茂源大哥作為返鄉菁英所攜帶的，不僅是中央政府的資源與新式的發展理念，更是需要被轉譯並與地方重新協商的「文化資本」，茂源大哥自身需與地方組織或居民們建立具信賴關係的社會網路。

因此，茂源大哥在地方推動發展時，面臨的真正挑戰並非能力不被肯定。事實上，當地方有明確建設需求，希望取得中央政府補助時，會有人主動來找茂源。然而，茂源大哥並不完全認同這種透過單方面申請補助、仰賴「討錢」模式推動發展的作法。他更希望看到的是一種地方能夠主動承擔、自發且長期的發展策略，而非依賴政府撥款所形塑的發展模式。

我們認為，茂源大哥的觀點實則揭示出臺灣當前鄉村發展治理中的一項結構性矛盾：政府雖能透過資源挹注在短期內帶動社區營造與基礎建設，滿足地方發展的即時需求，但若地方無法同時培養自身的內在動能與穩定的社會網絡，這類「輸血式」的支援模式終將難以轉化為具持續性的行動力與社區活化基礎。我們也認為外部資源導向的推動方式，強化了對少數在地菁英個人的倚賴，使發展工作在缺乏集體承擔的條件下，淪為個體負重的孤立行動。

#### （四） 小結

本節旨在通過整理報導人對箔子寮地方永續發展困境的分析，層層深入，從宏觀的產業發展條件到微觀的社區居民的向心力，最終聚焦於社區發展的領導者在協作過程中的矛盾與孤立。我們認為，清晰界定箔子寮社區營造、基礎建設領域推行工作中的各層次困境，能有效為未來解決方案的制定提供切入點。永續發展並非單一組織或個體的職責，對地方發展的推動應當是集體協作的結果。因此，對於問題的質疑，雖然是了解現狀的一部分，但如果僅止於此，將無助於實際解決問題，相較於一味的批評，本研究更希望聚焦阻礙各方合作與互信建立的挑戰。

從箔子寮的經濟與產業發展狀況來看，我們發現居民普遍認為地方缺乏足夠的就業機會。漁業沒落與工業區開發失效，導致箔子寮地區缺乏經濟活動，年輕人只好離開家鄉，前往城市或工業區討生活，地方人力資源的斷層，是箔子寮永續發展面臨的第一層挑戰。

在與報導人深入交流後，我們發現箔子寮社區內部的向心力不足，是推動地方發展的核心困境。無論是村長還是其他積極參與社區發展人士，常常面對來自居民的質疑，這不僅加劇他們的無力感，也反映出社區對領導者與發展計劃的信任問題。缺乏信任的氛圍使得社區內部的合作與協作變得更加困難，進而影響永續發展的推進。

最後，我們將聚焦於那些在地方推動建設與社區營造的「領頭羊」。儘管茂昌大哥與茂源大哥兄弟帶著在臺北成功的社區營造經驗及良好的外部資源連結回到箔子寮，他們仍面臨如何將這些經驗有效轉譯到地方的挑戰，以及如何說服其他領導者支持他們的發展藍圖。在臺北長期生活與工作的茂昌大哥，熟悉政策走向與計劃申請的流程，因此由他來負責書寫計畫書，幫助箔子寮成功爭取到政府的補助。然而，儘管茂昌大哥能夠把握政策趨勢，並根據政策需求調整發展方向，與他合作的心娜村長，卻因為長期在地方工作而面臨來自人情網絡的壓力，無法持續投入到茂昌大哥的發展計劃中。

另一方面，茂源大哥懷抱著回饋家鄉的心態，積極提出地方經濟發展與建設的規劃，並嘗試運用自身在中央政府的人脈資源，為地方爭取政治機會，然而地

方公職如協會領導者卻對茂源的計畫興趣缺缺，我們發現核心問題並非茂源大哥的能力還是發展計畫的內容，作為返鄉的臺大畢業生，茂源大哥面臨地方對政府與知識權威的排斥，其知識與外部資源遂難以轉化為地方所需的社會資本與信任基礎。

茂源大哥對地方發展模式的態度也顯示出臺灣鄉村發展治理中的結構矛盾，由政府補助計畫來扶持地方發展，對內部發展動能的延續未能提供關鍵性的支持，使得地方發展變得更加依賴個人的努力，缺乏集體且持續的社會動力，使地方永續發展的路徑更加曲折且充滿挑戰。

## 七、綜合討論與分析

### (一) 永續發展是行動也是理解：地方觀點與理論的對話

本章綜合前述箔子寮的田野觀察，我們認為永續發展不能只是國家政府的紙上談兵，也不能僅透過單一發展模型在地方進行推動。真正能夠落地的永續實踐，必須從地方社群的生活方式、地方脈絡、政治經驗與情感認同中培育。因此，我們主張地方對永續發展的詮釋與實踐方式，正是當代全球永續話語中不可取代的一環。了解地方居民的聲音，有助於構築與理解箔子寮的永續發展路徑。唯有認真面對地方的社會網絡、信任關係，以及推動永續行動所倚賴的角色互動與集體協作條件，永續發展才能真正回應在地社群的需求與實踐邏輯。因此，相關政策與指引也應從社區的行動現實出發，使「社會永續」不再只是抽象想像，而能轉化為貼近脈絡、持續推動的地方實踐。

上述三節我們整理了箔子寮的社區成員的永續性觀點詮釋，理想中的永續發展又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最後則是回到地方真實尺度，一窺究竟箔子寮社區永續現況所面臨的不同挑戰。從詮釋、理想與現實的永續發展地方現況出發，我們希望別人看到的，不只是地方的困境，而是地方如何在資源不足與制度斷裂中，依然努力維持社群運作的實踐與集體想像的可能性。我們發現，對於當地人來說，永續從來都不只是一個空泛的概念，相對地，每個人的詮釋都跟自己所處的位置、地方行動經驗、個人關懷、擁有的資源有關，而這樣的詮釋其實也恰恰反映出對於當地人來說所謂永續發展究竟有何意義。

在心娜村長與蔡曜明大哥的理解中，永續的詮釋源自於長期與政府互動，這種計劃延續性的概念，其反映出政府在永續發展中的角色對於地方理解來說極為重要，而黃船長談永續時馬上點出政府在漁業轉型上提供不夠多的支持與配套措施，如此論述也在在顯示地方居民理解永續發展時與政府的連結極高，也顯示了政府在推動永續發展議題中的重要性。不過黃船長的論點特別之處為，其將永續與自身的生計相互連結，因此永續不僅僅只是關乎更崇高的自然資源永續、環境

保育，更應關注在社區個人層面，基本生計的需求是否能夠被滿足與保護。而瑞泉大哥提出進步觀點，然而這種看法認為需要在當地社區中要有足夠的能量才得以推動，與怡慧老師所提到的人力永續也回應了社區缺乏人力資源的情況下難以走向永續的茆子寮，兩位的觀點共同提到社區需要具有成員參與才得以永續。進一步怡慧提出永續必須也要顧及文化傳承與創新及教育提升層面，顯現地方在談論社會永續時不可忽視的更高層次的社會文化需求，這同時也呼應 Griessler and Littig (2005) 在討論社會永續時所提到的廣義需求，包含娛樂、教育等，反應當地居民對於地方發展更為廣義需求的關注。

在這些觀點詮釋裡頭，我們得以發現政府的支持與社區的動能足夠與否皆和社會永續議題密不可分，且更多居民意識到在談社會永續的意義時，也檢視自身當前社區應該要達成什麼樣的條件才得以邁向永續的茆子寮。包含第五節我們所談得打破僵化的政治結構、展望未來的共同心態及進行多方協作，三者共構成社區走向社會永續的基石。

## (二) 從理念到落差：地方的結構挑戰與張力

蔡曜明大哥所提出的突破僵固的政治結構反應了社會永續不僅僅只是技術性的問題，同時也涉及到整體環境中的政治權力結構，創新、開放的政治力量得以成為社區永續極大的基礎。而在善水咖啡老闆眼中，除了有政府在其中成為助力，更重要的是「自助」，社區內部必須要能夠建立成員間共同展望未來的心態，唯有在人們心中種下認同的種子，讓人們能夠留下共同想像願景，如此才能夠匯集眾人之力推動永續。最後則是茂源大哥認為必須要能夠多方協作才能達成永續，然而不僅僅是需要延攬包含政府、高等教育機構、企業等外部支持，更重要的是社區內部也要能夠協作，呼應善水咖啡老闆的觀點，社區成員的共同力量具有高度影響力，因而獲取內部民眾的信任與共識在推動任何社會永續的實踐就顯得在社區永續議題中格外重要。

從第四與第五節中得以知道在當地居民的永續觀點裡頭，不斷強調在茆子寮社區中，社區內部需有高度的凝聚力、共識與積極參與的態度，社會永續才有實踐的可能。然而第六節我們檢視了茆子寮社區的永續現況，從宏觀的經濟背景與人力外流，再聚焦到社區內部成員及社區營造領導者之間的凝聚力不足，勾勒出社區如何在社會永續的路上面臨挑戰。茆子寮當今面臨產業誘因不足導致人力外流，而留在茆子寮社區的居民雖然十分關注有助於社區發展相關行動，卻無法有一個機制喚起大家的向心力和積極參與的動能，且推進地方發展的領導者長期面臨民眾的質疑與不信任，不僅加劇領導者的無力感，同時也使得社區協作變得更加遙不可及。茂昌大哥在臺北接收政策趨勢的習慣與推行社區營造的豐富經驗，讓他傾向更宏大且具體的規劃，而與他合作的心娜村長卻因為長期在地方工作而

面臨來自人情網絡的壓力，無法持續投入到茂昌大哥的發展計劃中。我們從中得以看見，不論是民眾或是社區營造領導者，其實都高度關注社區的現況，然而各自耕耘的現況加上缺乏合作機制喚起社會凝聚動能，使得茆子寮走向社會永續的路上變得更加曲折。

我們看見，社區內部的合作與參與動能深受地方脈絡所影響，對於領導者的期待往往複雜而多重，不僅與其實際作為有關，也與其所處的社會密切相關。在田野過程中我們逐漸察覺，大眾對地方發展的領導者嚴格的審視，若深入探究其背後的不信任成因，會發現其中不乏源自性別等社會角色的文化期待。

某些角色的貢獻之所以難以被肯定，並非因其貢獻不足，而是因為他們的行動常被放置在一套預設的框架之下觀看。村莊中的公共事務看似開放參與，實則仍存在著不易言說的界線，這些隱而未顯的張力，是理解社區參與與合作困難的關鍵之一。正是因為如此，當我們談論永續發展時，不應僅聚焦於計劃的設計與資源的引入，更需要敏感地體察：哪些聲音容易被聽見與執行？哪些人需要更努力的付出才得以被承認？永續的實踐，不只是物質與技術的問題，也是一場關於社會關係的博弈。

### （三）理論對話與延伸：從茆子寮回望社會永續性討論

從田野資料中我們得以看見，茆子寮社區成員的永續性觀點及現況，如何補足了現有的社會永續性相關的討論。在 Vallance et al. (2011) 曾提及社會永續性的其中一個面向維持永續性 (maintenance social sustainability) 旨在關注社會與經濟變遷中，居民傳統生活習慣如何構成其生活品質、社會網絡及工作與休閒環境的重要基礎，而這使得人們在面對全球變革力量時可能會抵抗改變。維持永續性的討論固然重視在地居民文化與在行動邏輯，然而在茆子寮中，我們發現居民們並非不想改變，相反地，多數地方發展人士都希望比現在更好因而有了許多具體且有意義的認同感形塑及經濟建設計劃與實踐，但苦於社區缺乏凝聚力及共識而無法形塑出發展地方的動能，致使即便做了嘗試及努力也無法成功，這顯示出了地方社區的複雜性，居民與地方發展人士的聲音是異質的，然所有人都十分關注社區裡頭的各種促進地方永續的各種實踐，如何促進協調及合作機制或許會是未來的社區走向社會永續時得以思考的著力點。

Koning (2002) 對於現有鄉村社區中所有的社會永續性討論進行綜整發現，相關研究更重視鄉村面臨的天災影響的體面生計的維持。然而社會永續性不僅僅是只關乎生存的基本需求，從田野資料中也能夠得知，當地人也同時關注社會永續的廣義需求，如同 Griessler and Littig (2005) 所提到的包含教育、休閒、文化創新與延續等面向的關注。另外，鄉村中社會永續性討論不僅是只注重天災方面

所帶來的社會衝擊，在茆子寮中可見，社區凝聚力、社會信任如何在推動社會永續時成為一大挑戰，在田野中的報導人也時常提及鄉村社區裡頭任何活動運作皆極度仰賴社會凝聚及共識形塑，這使得在探討鄉村社區的社會永續性討論時應該要被更加重視的分析面向，如此才能夠理解如若要走向永續的茆子寮時，應該如何形塑共識及喚起合作機制致使永續實踐得以有成功的一絲曙光，而非僅僅是投注技術性資源及金錢資本，輸血式的政策路徑如若無法先行理解在地複雜性，也終將成為徒勞而使得社會永續希望變得更加渺茫。

#### (四) 從「家」的經營看永續：在柔韌連結中孕育未來想像

隨著我們深入分析田野材料，茆子寮如同一個「家」的意象越發鮮明。我們發現地方居民看似相異的關懷與實踐，構成了一張柔韌的網，默默支持著茆子寮邁向更永續的生活，讓這個家被延續與珍惜。

從一個家得以成立的核心「人」為出發點，心娜村長關注的是在茆子寮生活的老人家，關心他們是否吃飽、穿暖，她奔走於家戶之間，確保長輩們即使獨自生活也受到照顧；瑞泉大哥還有明璋主委則是守護著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普天宮，是這個家重要的精神支柱，只要信仰還在，對地方的認同就不會消散。

接著營運善水咖啡的老闆夫婦與博幼基金會的成員們則專注於這個家的下一代。推廣多元教育，讓孩子們能對未來有所想像與期待的同時，也注重在地記憶的滋養，這個家要持續存在，就必須讓下一代對其產生認同與歸屬感。然而我們也注意到這個家中壯年角色的缺席，讓家的傳承出現斷層，黃船長對地方環境資源的反思與政府無作為的批判，更彰顯這個家的發展困境。

為了改變中壯年被迫出走的困境，蔡曜明大哥從地方政治運作著手，希望喚醒政治人物對茆子寮的重視與回應。另一方面，茂昌大哥則在社區營造中投入心力，茂源大哥則積極連結中央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從不同制度路徑尋求活絡的可能。

經過這次調查，我們更加確信：即使是身處同一片土地的人們，也不應被單一視角所定義。茆子寮的居民們依據自身的生命經驗、需求與認同，去理解並實踐他們所相信的永續之道，或許永續發展的意義正是在這種差異與共同之間浮現，它不是一固定的行動目標，而是由一連串的溝通與磨合組成的過程。無論對茆子寮的居民對永續發展的理解為何，最終都回歸到「繼續在這裡生活」的初衷，當代的永續發展討論聚焦於「要如何永續發展」，但這篇文章則是希望後退一步，去理解與珍惜居民們對未來的想像與努力。



最後，就如同每一個家庭，茆子寮也有屬於它的矛盾與協作張力。有時人們在過程中感到疲憊，甚至迷惘，但沒有人真正停止思考或放棄行動。正是這份韌性，讓我們相信，茆子寮仍是一個未完的故事。

## 八、結論

過去有關社會永續性的討論，往往僅限於梳理其定義或多層次的概念（Griessler and Littig 2005；Vallance et al. 2011），或是針對鄉村社區中自然災害所帶來的社會衝擊進行探討（Koning 2002），但根據田野調查我們發現，在鄉村中的社會永續不單只是與自然災害有關，也因此關注在地居民如何認知和詮釋永續性的觀點極為重要。本文試圖從在地視角出發，真實呈現居民眼中永續的真正意義與關注焦點，從中我們得出，在鄉村社區中社會凝聚力、信任以及內部成員的能動性如何成為推動社區走向社會永續的重要力量，這些面向皆是值得深入關注的核心議題。社區成員皆意識到永續不僅是與環境層面有關，也與社會層面高度連結，政治力量在裡頭雖扮演重要的支持角色，然而僅僅依靠外部資源輸血式的技術性及資金支持，並無法成功導引社區走向社會永續，社區成員的認同、參與及凝聚才是具決定性的力量之一。

不過，Koning（2002）也指出過度強調社會網絡連結、信任的重要性可能會致使排斥外來者、對內部成員提出過高的要求，甚至限制個人自由等排他性和社會分裂等影響，而不是促進包容和共同發展。即便如此，我們仍希望能夠透過本篇研究嘗試擴展鄉村社會永續的討論面向，在社區尚未建立起社會凝聚的現況中，如何能夠重新凝聚社區中所有成員並建立共同展望未來的心，會是茆子寮社區前往社會永續的路上待解決的挑戰。

在研究限制上，本文雖然試圖探討茆子寮在地居民的永續性觀點及社區在社會永續的現況，然而訪談對象多數為地方發展重要人物及對地方地方發展有熱忱、想法的社區成員，未能夠訪問到那些無法積極參與的民眾如何看待茆子寮的永續性理解及社區現況的圖像，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意識到了這樣的限制會局限住我們探討社區永續現況的觀點。在地方發展具熱忱的社區成員中，多數人提及地方民眾過去未能積極參與地方發展的活動，社區缺乏共識及動能成為多數企圖為茆子寮邁向更好的未來行動挫敗的其一原因，但一般民眾眼中的茆子寮究竟為何，而對於他們而言社區永續具有何種意涵，我們未能夠在十二天的田野調查中搜集梳理，若能整合社區其他民眾的觀點進入研究中，必能夠將社區永續的圖像及想像描繪的更加立體。除此之外，我們亦未能針對地方派系政治如何影響社區動能及凝聚進行更深度的挖掘，而這些也是造成整體圖像更加清晰的重要因素，未來若有機會應皆能持續發展或期待其他研究者後續的努力。

接著回應及討論人類學在永續發展及社會永續議題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Hanchett (2016) 敘明人類學可以在永續發展成為當代重要議題中所能提供的貢獻，包含人類學民族誌研究法能夠使得學者及大眾更深入小規模的社區組織理解社會動力的相關討論，另外透過人類學質性研究的訓練也能夠使得在呈現社區成員真實觀點後將其所面臨的難題得以被更靈活地處理。Pierre McDonagh and Fiona Murphy (2016) 認為永續人類學 (Anthropology of Sustainability, AoS) 應當是道德樂觀主義的，但並不代表不具批判視角，而是儘管現實中存在諸多挑戰與衝突，仍然可以人為本的視角理解人們的行為，相信人類社會能夠朝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同時這種方式可以完全擁抱永續議題的複雜性。Tsing (2005) 提醒我們，儘管面對政治經濟、社會困境時，保持一種能夠改變現狀的希望是極為重要的。正如同箔子寮社區成員所展現的，每當我們問及社區成員對於箔子寮的未來是否樂觀，善水咖啡老闆、茂源和蔡曜明大哥皆朝氣蓬勃地樂觀看待箔子寮的永續。

最後我們想引用黃宣衛 (2024) 在接受「Peo Po 公民新聞」氣候變遷永續素養教育系列的訪談作結：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訴求，最後我們要怎麼樣去想辦法說找一個平衡點，找到一個妥協的方式……，大家可以一起共榮共存，……，我們只能在尊重多元文化差異、坦誠溝通，……，相互的協調與融合，才能共享社會永續的福祉。

許多不同的美要互相並存，如何在不同族群間的聲音和需求找到平衡點便是人類學可以貢獻之處，他認為唯有相互的協調與融合，才能共享社會永續的福祉。在箔子寮中，各方居民及社區發展人士的觀點都具有同等重要性，如何促進多方溝通，理解彼此的觀點與訴求進而齊聚一心，社區中的社會永續方能見到曙光。

## 參考資料

林德昌

2005 《永續發展與聯合國「廿一世紀議程」》。臺北：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郭天祐與劉曉語

2024 〈All Actions are Re-actions：箔子寮人們對水的感知、互動與關係〉刊於《風頭水尾——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人類學系編，頁 1-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曾裕淇、徐進鈺

2016 〈永續發展 一個都市政治生態學的批判性視角〉，《地理學報》82: 1-25。

劉曜華主編

2006 《四湖鄉志》。雲林：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蔡卓霖

- 2024 〈原野的呼聲——四湖鄉再生能源地景的論述與想像〉刊於《風頭水尾——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人類學系編，頁 47-88。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Griessler, Erich and Beate Littig

- 2005 Social sustainability: a catchword between political pragmatism and social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8(1-2): 65-79.

Hanchett, Suzanne

- 2016 Social Dynamics and Sustainability: Some Anthropological Insights. *In* Envisioning Sustainabilitie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Sustainability. Pierre McDonagh and Fiona Murphy, eds. Pp 3-19.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Koning, Juliette

- 2002 Social Sustainabilit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Context, Theory and Methodology Explor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ESCO/MOST Meeting, Hague, November 22-23.

Mazi, Fikret

- 2005 Understand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mbiguity and Conflict。會議宣讀論文，研討會名稱未詳。取自 <https://api.semanticscholar.org/CorpusID:54883204>，2025 年 5 月 14 日 取用。

McDonagh, Pierre and Fiona Murphy

- 2016 Introduction. *In* Envisioning Sustainabilitie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Sustainability. Pierre McDonagh and Fiona Murphy, eds. Pp xiii-xxix.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Pesqueux, Yvon

- 2009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vague and ambiguous “theory”. *Society and Business Review* 4(3): 231-245

Tsing, Anna

- 2005 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allance, Suzanne, Harvey C. Perkins and Jennifer E. Dixon

- 2011 What is social sustainability? A clarification of concepts. *Geoforum* 42(3): 342-348.

## 網路資料

### Jinny 的視鏡

- 2024 〈我們.你們.他們 永續人類學～與談黃宣衛教授。〉[影片]。  
「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oUkT0YOdAU>，  
2024 年 7 月 9 日上線。

### 不著撰人

- 2024 〈張麗善縣長頒獎表揚「地方創生最佳夥伴獎」並接受水利、計畫、農業處及雲林縣警察局獻獎〉。「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https://planning.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1113&s=450085](https://planning.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1113&s=450085)。  
2024 年 4 月 11 日上線

### 不著撰人

- 2025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雲林縣自願檢視報告〉。「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https://planning.yunlin.gov.tw/News.aspx?n=14192&sms=18000>。2025  
年 5 月 12 日上線

### 陳芳毓、許鈺屏、李鈺淇

- 2025 〈什麼是永續發展目標 SDGs？17 項目標一次掌握〉。「未來城市」，<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2025 年 1 月 14 日上線。

### 彭朝忠

- 2024 〈什麼是 SDGs 永續發展城市？為何台灣愈來愈多縣市在做 SDGs？〉。「未來城市」，<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837>。  
2024 年 1 月 10 日上線。





# 在風頭水尾生活

箔子寮攝影集

2025/01/06 - 2025/01/17

洪浥青







## 無處不在的怪手

漫步在箔子寮漁港，不難看見怪手的身影，它們在黑色的沙灘上挖啊挖，好像沒有挖盡的那一天。

搭配不停歌的海風，塵土飛揚，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潮濕的土壤味道。



## 港邊的養殖池

在港口的南側，有幾座飼養文蛤的養殖池，這天剛好遇見大哥正在翻土，為下一年的養殖做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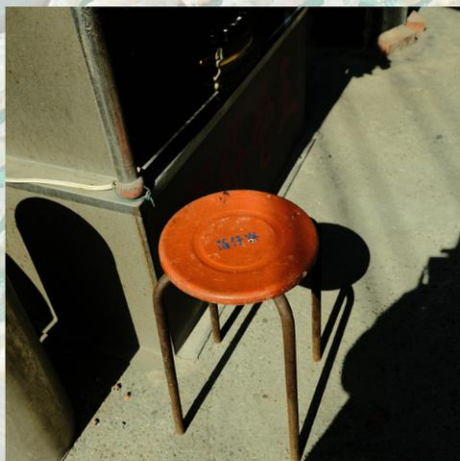
## 失控的沙子

箔子寮漁港是雲林縣規模最大的漁港，因地利之便，過去每到烏魚汛期變有大量漁船靠港。

然而，隨著人口老化，再加上淤沙問題，而導致漁業逐漸沒落。

偌大的港口堆著帶有編號的沙包，即使人們努力清運，突出的堤防路上仍堆起黑色的小山丘，掩埋部分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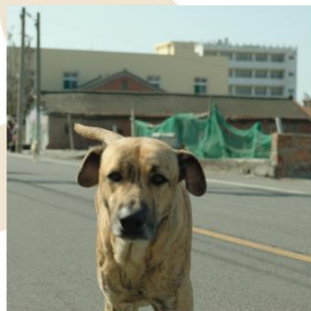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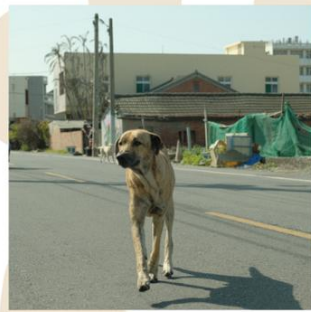




## 烏魚子與劍蝦乾

橘紅色的烏魚子，享受著冬季的太陽  
烏魚在捕撈上岸後，取出腹部的魚卵，再來抹上一層厚厚的粗鹽，平放在木板上，最上方以石塊加壓。據說想要得到好吃的烏魚子，就不能怕魚卵被壓壞。

除了烏魚子，這裡還有一種相當罕見的美味——劍蝦乾，這可是只有少數人才知道的獨特滋味。



## 有一隻狗叫 \_ \_

這裡有一隻眼神無辜的狗，我們都叫他阿黃，不過據說他有很多名字，你也可以取一個。

阿黃最喜歡看到人就湊上來撒嬌，有力的尾巴晃呀晃，打在摸狗的人腿上，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站在路口中間的阿黃



## 愛探險的阿黃

悠閒的阿黃，在村子裡到處閒晃，他也喜歡跟著我們一起到別人家串門子。





## 善良的人尚水-善水咖啡

在沒有便利商店的村莊裡，有一間咖啡廳。

善水咖啡由一對年輕夫妻經營，他們為學校老師、對面農會的主任，還有想找個地方聊天放鬆的居民，提供一個溫馨可愛的空間。







## 小孩子的遊樂場

雖然本業是咖啡廳（而且無論是咖啡還蛋糕都很美味），但善水咖啡其實也是許多當地小朋友放學後消磨時間的好去處。

在這裡，小朋友可以玩玩具、寫寫功課，隨時走進來跟老闆點一首自己喜歡的歌～這間咖啡廳根本就是孩子們專屬的最佳表演舞台啊！





## 夕陽漁港

橘紅色的晚霞，告示著歸於平靜的箔子寮日常。車上的人們，一邊留意著手機上的落日時間，一邊駛向西方。現實的是，當車輛抵達箔子寮港時，太陽早已隱沒於海平面下，灰藍色的天空下方，僅剩晚霞餘燼般的色彩。

來自海上的風時時掠過臉頰、髮絲，帶來一股冷冽的觸感。它與遠方模糊不清的離岸風機形成鮮明對比，儘管看不清楚扇葉的輪廓，卻有一種直覺的感受：它們仍機械地轉動著。

離岸風機的高度從海平面起算，突破了200公尺，更別提還有海平面底下打樁的基礎設施，海洋不再是無法掌握的神秘空間，而是當代人類最重視的開發標的，一片片潛力區域被政府匡列，包含箔子寮漁港西邊的近海，2025年1月雲林允能風場完成併網，是台灣少數正在營運的離岸風場之一。

海上的建設與港邊零星的工程痕跡交織，渺小的挖土機靜靜停在一旁，或孤獨地運作。海風，帶來無盡的轉機，也隱藏著潛在的危機。隨風而至的海沙，如同無根的漂浮物，難以管控，甚至無法穩定。箔子寮的居民，在這片風沙交織的土地上，尋覓著屬於自己的立足之地。

## 試說箔子寮之箔？

吳文貴（三條崙資深文史工作者）

箔是啥？泊有竹字及草字部首（有的字典裡找不到草字頭的泊），泊字有薄或輕之一意也。

先民釣魚的浮標或捕漁網的上綱繩會綁上整排‘泊仔’，早期泊子製品有草本或木質的，朴子（樸子）樹質輕‘應該’是製作泊仔的適當材料。我少年時有看到了竹頭質硬剖片切塊當泊仔，麻竹節製作（削皮粉光）成‘筒仔’（桶仔是大浮標），或走私船的黑話稱桶仔是有其涵義的。

咱四湖鄉的箔子寮（口湖鄉是下箔子寮？）的先民漁耕為生，或置放泊仔的‘資材室’我稱之箔子寮，可否？若如烏藏網置放的草蓆或竹簑等，我們稱之為烏藏簑，可否？

（2025,6,7）

## 三條崙地名由來：正名三條崙派出所倡議！

吳文貴（三條崙資深文史工作者）

三條崙係四湖地，南（下）有口湖下崙聚落，北（頂）有台西崙仔頂（崙豐）聚落，咱雲林沿海是北港溪與濁水（西螺）溪的衝積扇平原（冬東北季風與夏西南氣流年復一年）。祖先居此不出三百年，但三條崙南北沙崙及汕統內外汕（傘）沿海地型地貌，受風浪及濁水溪沙源減少等因素向內地侵襲，‘三條崙’好像只能停留在五十年前的記憶了！

三條崙海水浴場是很多人的共同記憶（日治時期全臺少數的海水浴場，南西子灣北福隆海水浴場），三條崙海清宮（包公祖廟）香火鼎盛靈感四方，還有縣160 進入三條崙莊頭的路牌及統聯客運站往三條崙的車站名了！

咱衷心希望主管有司（縣府）及地方民代們（蘇議員國瓏（註一）掛頭名提案及蘇俊豪議員，顏嘉葦議員，蔡永富議員等協助）能夠利用機會（三條崙派出所整新建落成）將三條崙派出所（註二）正名也，吾等是盼地方是幸！

三條崙與三崙字面與字意差很多，三條崙是三條（線）沙崙，三崙是三座（粒，個）山崙；三崙與二崙所在差真遠（不是在隔壁）；三崙三崙久而久之取代三條崙了，後人與現世不解或失去其真義也；法令無規定或限制行政機關及單位不可或不宜取名三個字也，若台東太麻里鄉及水林水燦林國小也，當然咱亦同時希望三條崙國小能夠正名也（時機再議）。

（2025,2,5）

註一，蘇國瓏議員於 2025（民國 114 年）雲林縣議會第 20 屆第五次定期會提案。

註二，雲林縣政府已核可於 2025,6,1 起更名三條崙派出所；並經內政部警政署 114 年 5 月 15 日警署行字第 114010514 號函同意備查在案。

主題三：生活在風頭水尾





## 海風中未來藍圖：三條崙孩童與「文化不利」的交織書寫

林庭如（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黃于瑄（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sup>1</sup>

### 摘要

本文以雲林四湖鄉三條崙地區為田野，探討孩童在「文化不利」情境下的成長處境與未來想像，並分析家庭、學校與社區如何共同形塑孩童的教育發展。基於兩位研究者個人生命經歷與長期服務偏鄉的經驗，觀察到三條崙地區因地理環境、產業狀況與人口外流，長期處於文化與教育資源缺乏的狀態，而家長對教育態度兩極化，進一步引發對「文化不利」內涵的省思。本文援引文化不利的概念，指出在教育不平等問題中，文化刺激的缺乏（如語言互動、學習期待、社交環境），使得孩童在學習動機與職涯想像上處於劣勢。然而，理解孩童的發展除了從教育制度或個人能力入手，更應綜合考量地區歷史、社會文化結構與多元生活經驗。若要減緩文化不利帶來的影響，需從家庭支持、學校教學與社區資源等多方面著手，營造支持性學習環境，使孩童能突破結構限制，擁有探索自我與實現未來的機會。

關鍵字：偏鄉教育、文化不利、家庭教育、在地組織、職涯探索

---

<sup>1</sup>本文為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課程期末報告，特別感謝黃郁茜老師指導，也感謝盧佳秀、郭天祐助教在一學年的文化田野實習課程中，給予建議並協助內容校訂。感謝所有在三崙國小協助我們的老師，沙崙湖文史關懷協會吳雙喜理事長、雲彩 Bar 朱德義先生及夫人、博幼基金會邱聖雯主任、宜芳學輔專員及林嫻敏社工師、蔡茂昌執行長、海清宮祭典組長劉定坤大哥、林嘉樺助理，兩位三崙國小四年級學生家長及家人，提供我們寶貴的報導及指教。也感謝善水咖啡老闆及老闆娘、春天民宿老闆及老闆娘、三條崙社區及苕子寮社區居民對我們的熱情款待。也感謝鄧教東學長給予評論和修正建議。

## 一、引言

平等教育的理想中，每一位孩童都應擁有追求自我發展與未來想像的機會，而社會結構與地理環境條件中，資源分配的不均，使得某些群體面臨更多限制與挑戰。特別是在偏鄉地區，由於我們兩人，一個人從小在偏鄉地區長大，看過各種不同的家庭，也聽過各種對孩子們的期許，但家長嘴上說的與實際作為總是不一樣，最後形成了一種輪迴，家庭狀況永遠沒辦法改善。另一個人有長期服務偏鄉部落的經驗，看見許多孩童從小因家庭經濟問題，而被迫在國中畢業就進入職場，而當地也因教育資源不足，導致孩童從小就落後於他人，且對未來並無想法，只覺得「可以賺錢」就好了。我們對於「偏鄉」都存在一定的認知與想像，也深知每個地區都存在非常大的不同，故以此好奇心為出發點，欲了解位於三條崙的小學的教育狀況與小孩的發展狀態為何。

在我們的田野調查中，發現家庭、學校、社區等多重面向深刻影響孩童對未來的想像與發展。偏鄉地區的孩童受限於家庭職業背景、經濟條件、社區文化與教育資源的匱乏，未來選擇往往受到框限。在這樣的環境下，「文化不利」現象格外明顯，影響孩童的學習動機與職涯想像。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樂詞網的資訊，「文化不利」並非由某位學者單一提出的理論傳統上，而是在 20 世紀中期，當時美國與英國社會開始廣泛關注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問題，「文化不利」是這時自然生成的概念，指的是孩童成長於缺乏文化刺激的環境，導致學習動機不足（陳淑絹、宋明順 n.d.）。

我們發現當地的家長對教育的態度呈現兩極化：部分家長願意投入資源，如將孩子送往私立學校，期待透過教育改變未來；但也有家長採取放任態度，無論孩子未來升學與否都不予干涉。這種選擇背後，反映出家長對階層流動的期待與無力感。此外，孩童對手機與網路的依賴程度較高，導致孩童長時間沉迷於娛樂，影響學習專注力。然而，3C 產品是否也可能讓孩童更能透過網路學習新知或拓展視野？這樣又是否能成為減弱文化不利影響的方法？（整合傳播部 2024）

我們的主題就是想更全面地理解「文化不利」的成因與影響，而不僅將其視為單一的教育問題。在偏鄉環境中，家庭、學校、社區、科技等多重因素共同影響孩童的未來發展。因此，若要弱化文化不利的影響，除了改善經濟條件，更需要關注文化刺激的多元來源，包括家庭教育、學校資源、社區支持與科技應用，讓孩子們對未來的想像不再受限於環境，而是能夠主動探索屬於自己的道路。



## 二、資料文獻回顧

### (一) 區域資料文獻回顧

三條崙隸屬於臺灣西南沿海的四湖鄉，北臨台西鄉，南接口湖鄉，是一個伴隨海風與潮汐而生的濱海聚落。三條崙社區包含崙北村與崙南村，地名與地形有關，「崙」代表著平原上的小山、小丘，沿海有三條南北縱向的大沙坵，因此取名為「三條崙」（李信政和吳雙喜 2013），後來因潮汐、環境變化，三條沙崙已不在原本位置。西南沿海鄉村地理位置特別，位處於濱海與平原之間，當地產業結構以漁業與農牧業為主，土地靠近沿海因此鹽分較高，多種植耐鹽分作物（蒜頭、花生等），漁業的部分有近海漁業、養殖漁業及漁業加工，由於沿海地形的限制、漁業資源枯竭及歷史因素，漁業的發展停滯不前，傳統產業（農漁業）規模也逐漸萎縮，農漁業難以提供穩定的生計，迫使許多青壯年背井離鄉，尋求外地的發展機會。

雲林縣沿海除了 1845 年農曆六月初七日發生捲走四湖、口湖居民三千多人的大海浪之外，事隔一百多年的 1961 年和 1972 年發生兩次大海難，共有十九艘漁船翻覆，八十位漁民死亡或失蹤（劉曜華主編 2006：252）。歷經了這兩次海難，三條崙漁民對於 1972 年海難事件中的記憶與敘事，不單呈現一場災難，更展露出這個沿海村落長久以來與海共存的文化底色與生命態度。漁民們以細膩的語言回憶當時的天候變化、作業流程與決策過程，「說穿了就是拿命去跟老天爺賭」，「家裡世代就是漁夫，除了打漁之外根本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就這樣傻傻的捕魚，一代一代傳下來。」吳份說。百年來，多少漁人喪命在這片海上，已經沒有人記得，也不願意去記得。（吳承紘 2017）。當時的許多人選擇到外地發展，「民國六十年代，村裡的壯丁都紛紛去外地找工作了。待在村裡不是捕魚就是種田。種田也只能種花生，地瓜或是甘蔗這些經濟效益不是很大的作物。」、「再怎樣，也總比在海上賭命好，不是嗎？」（吳承紘 2017）。而不同家庭面對災難的命運分野，牽動了對神明的信仰與個人抉擇的詮釋，吳連安因女兒一句話逃過一劫。後來，吳連安聽了吳王便的勸告，也很重視包公的指示，於是便辭去崙福興號的船員職務專農。沒想到，後來崙福興號真的在海難中沈沒，五人罹難（吳承紘 2017），轉而成為廟宇管理員的選擇，顯示了宗教與居民們之間關係密切。

宮廟文化在附近的鄉村皆為生活的一部分（李信政和吳雙喜 2013：79-85），其中「海清宮」為三條崙社區非常重要之存在。海清宮為全台唯一奉祀奉祀北宋龍圖閣大學士包拯的祖廟，包拯人稱「包青天」或「包公」，為官清正、鐵面無私，廣受後人景仰（李信政和吳雙喜 2013），而海清宮管理委員會的「祭典組」，

時常舉辦一些社區活動，成為老年人平時聚會處所，也提供學校孩童們獎學金補助。

本次田野主要聚焦於位於雲林縣四湖鄉崙南村的三崙國小。學校硬體設備完善，採取小班教學模式，校園內環境舒適，更因校址鄰近海洋，擁有豐富的海洋生態資源（三崙國小 2024）。學校課程因此結合在地特色，開設「好海課程」與「國際議題」等特色課程，致力於將地理優勢轉化為教學內容。該校創立於 1951 年，學生人數在 1970 年代達到高峰，1974 與 1976 年間曾突破千人。根據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的人口統計資料，三條崙社區人口數正以每年遞減的趨勢滑落，遷出與死亡的人數遠高於遷入與出生的人口，隨著港口淤積與工作機會減少，導致當地人口大量外移（華叡民、蔡嘉軒和江冠螢 2024：363）。至民國 113 學年度，三崙國小學生人數僅剩 44 人，教師 12 人，師生比例約為 1：3，較前一學年再度減少。而在學校背後的家庭支持系統方面，仍面臨諸多挑戰，學生中有相當比例來自隔代教養、單親或弱勢家庭，由於家庭功能薄弱，加上家長普遍對教育關注有限，部分學生出現學習困難、競爭環境相對單純（*ibid.*）。

## （二）理論基礎與理論回顧

### 1. 關鍵概念分析——文化不利

文化不利（Culture Deprivation）是一個教育學上的專有名詞，指的是孩童在家庭或社會文化環境中的文化刺激較少，進而影響其學習與發展。「文化」在此指的是抽象的「文化刺激」，包括父母的教養方式、父母與師長對孩子的期待、同儕之間的競爭與影響，以及生活環境的壓迫等。如果兒童缺乏這些文化刺激，可能會導致學習動機不足、社交能力較弱，甚至影響心理健康（陳淑絹、宋明順 n.d.）。

家庭在文化不利的影響中是關鍵因素。一個良好的家庭環境能夠提供穩定的支持，幫助兒童培養規律生活與健康習慣，並建立自尊心、學習動機與耐挫力。然而，文化不利的兒童往往成長在環境混亂的家庭，例如兒時缺乏語言與社交刺激，父母情緒管理不佳，採用暴力或溺愛式教養，導致孩子心理健康受影響；缺乏學習環境與榜樣，導致對學習無感。此外，父母也可能很少與孩子一起學習，這使得他們在語言發展和學業表現上處於劣勢。這些家庭還常常缺少能啟發智力的玩具和活動，孩子的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發展受到限制（Robert 1965）。

文化不利的現象與經濟條件密切相關，偏鄉地區因交通不便、產業發展受限，家庭文化不利的情況更為普遍。此外，學校、同儕與社會環境也缺乏足夠的文化刺激，使得學習表現與都市孩子有更大的落差。即便是家庭文化較好的公教子女，在文化不利地區中，仍可能因為缺乏適當的環境支持，而難以與都市學生競爭。在教育資本化的趨勢下，教育品質越來越取決於家庭環境，導致有資源的家庭投入私校，強化競爭優勢，而文化不利家庭的孩子則難以透過教育翻轉命運。這使得階級複製現象加劇，社會流動性降低（陳心慈等 2020）。

## 2. 家庭對於孩童成長的影響

家庭對兒童的正向發展非常重要，特別在情感、社交技能、執行任務的能力發展上扮演關鍵角色。兒童需要在一個回應其情感需求的環境中成長，以建立歸屬感與自我價值感，並學會應對焦慮、恐懼與挑戰。父母在這些過程中不僅是情感支持的來源，還是兒童學習自我控制、合作與社交技能的榜樣（Gadsden et al eds 2016）。

研究顯示，具備良好社交能力的兒童通常具有較高的自我控制能力、合作性及責任感，並能積極建立與維持人際關係。父母透過提供正向的互動與社交機會，幫助兒童發展這些技能，進一步協助其適應群體生活並在學業、職場等方面取得成功。實證研究表明，父母在情感與行為健康方面的支持，能夠顯著減少兒童的內化與外化問題，並促進其社交能力的提升（*ibid.*）。親職訓練同樣是提升兒童社交能力的重要手段，透過改變教養方式、減少負面管教、增加學習刺激，進而促進兒童社交與認知發展。

## 3. 學校對於孩童成長的重要性

Wentzel（1991b）指出，社會責任（遵守社會規範與角色期望）對學業知識與技能的習得具有重要作用，因為它能促進學生與教師及同儕的正向互動，並幫助學生遵守學習規範。Sylva（1994）也指出社會責任行為可直接提升學業表現，且社交地位對成就的影響亦受到社會責任的中介作用。然而，過度強調服從規範可能與內在學習動機相衝突。Wentzel（1991a）認為，學生可同時追求社會責任與學習目標，這種雙重取向有助於提升學業表現。進一步研究顯示，高成就學生通常兼顧責任感與學習，而低成就學生則較專注於社交與娛樂（Wentzel 1989）。

學校可透過關注學生在教育過渡期的社交網絡，特別是在入學初期，來幫助學生培養社會責任感。

#### 4. 社區對於孩童成長的影響

社區指的是孩子與家庭、教育者及更廣泛社會之間的聯繫網絡。當這些聯繫強大且積極時，能對家庭照顧與孩童經歷產生深遠且正向的影響。創造一個支持性和歡迎的環境，並與家庭共同確保每個孩子獲得最佳照顧（Eden Academy 2025）。這包括共享資訊、回饋與資源，並為孩子提供有教育意義和豐富的經歷。處於支持性社區中的孩子能發展良好的社會情感技能，也能幫助孩童建立對未來積極努力的態度。

#### 5. 民族誌研究

Annette Lareau (2011) 的《不平等的童年：拚教養能翻轉階級嗎？》(*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與藍佩嘉老師 (2019) 的《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的童年》，兩部民族誌性質的著作，分別透過美國與臺灣的案例，從社會階級差異、親職策略與教育不平等角度切入，深化對文化不利現象的理解。

Lareau (2011) 透過對 88 個家庭進行觀察與訪談，最終選取 12 個家庭進行長期田野，分析不同社會階級（中產階級、工人階級、貧困階級）家庭的教養方式。她提出「規劃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 與「自然成長」(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 兩種教養模式，前者透過積極安排課外活動、培養社交與語言能力，傳遞文化資本；後者則讓孩子自由發展，缺乏與制度互動優勢，進而影響社會適應與階級再製。Lareau 運用布迪厄的文化資本與社會再製理論，指出中產家庭透過有意識的教養策略累積子女優勢，而工人階級因缺乏文化資源，無法在教育體制中取得相對優勢，促成階級複製與社會流動停滯。

藍佩嘉 (2019) 則聚焦臺灣社會，選擇四所不同階級背景的小學（天龍國小、河岸國小、海濱國小、田園國小）與部分私立小學家長，透過非結構性深度訪談、參與觀察與家長書寫紀錄，探討全球化脈絡下的教養焦慮與階級不平等現象。她運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強調不同階級父母因共享相似社會經驗，傾向採取相似

教養策略。中產與菁英階級父母因掌握較多資源，能更積極參與子女教育，對教育品質、未來競爭與社會流動懷有高度焦慮；而勞工階層則因資源匱乏，無法投入相同程度的教育參與，進一步鞏固階級差距。

呼應本篇文章所要探討的主題，孩童的未來想像實際上受到家庭文化刺激、學校教學資源、社區文化環境與在地組織參與度的多重影響。文化不利的現象透過這些環節交織運作，決定了孩童能否在成長過程中接觸到足夠的文化資本與正向刺激，進而形塑他們對未來職涯的期待與可能性。因此，我們試圖以「文化不利」概念為分析主軸，從環境、家庭、學校與社區四個面向，探討這些結構性因素如何交互作用，建構出孩童的世界與未來想像。

##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材料源自於 2025 年 1 月 6 日至 2025 年 1 月 17 日，為期 12 天的田野調查實習，田野地點位於雲林四湖鄉崙南村與崙北村，主要採用參與式觀察與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進入當地學校、社區與家庭進行接觸觀察與訪談。

由於設定的研究對象為國小孩童，受限於其語言表達能力與認知成熟度，難以從孩童本人人口中獲得完整而穩定的敘述，因此與助教們討論後來決定轉以「大人」的視角為出發點。透過學校老師、學生家長與社區課輔老師等訪談者，間接了解孩童所處的文化環境與學習處境。本研究嘗試從家庭、學校、社區等多重面向探討孩童如何建構自己對未來的想像，並且更進一步探討「文化不利」，以及其如何影響孩童的學習動機、社交能力與心理狀態。本次田野調查我們訪談了許多與有互動的大人們，包括三位社區長輩、三崙國小教師、一位課後輔導的社區老師、三位博幼基金會老師，以及兩位三崙國小學生之家長，這些受訪者提供了我們關於孩童學習狀況、家庭支持、數位接觸頻率與社區文化刺激的第一手觀察與評價，同時，我們也參與了當地的社區課後活動，記錄學童在非正式學習環境中的互動模式與表現。透過文字紀錄、田野筆記與攝影方式保留觀察素材，並依照受訪者意願進行錄音，以確保資料的準確性與深度。此外，我們也蒐集相關政策資料與地方政府、學校所提供的資源統計資訊，尋找可以參考或使用的資源，並且對田野資料進行考證。

### 三、 孩子的想像與其成因探究

在三條崙地區，多位受訪者所提及的孩童未來發展受限的問題，並非單一教育資源不足所能概括，而是家庭、社區、學校與地理環境等多重因素交織所形成的結構性問題。田野中，我們發現，當地經濟型態與產業結構的轉變，對孩童的學習動機與未來想像產生了深刻影響。過去，漁業為三條崙地區的主要經濟支柱，然而，因為嚴重的泥沙淤積與兩次嚴重海難，導致漁業逐漸沒落。兩次的海難，不僅塑造了老一輩對漁業風險的高度敏感，也成為阻止年輕世代投入漁業的理由。環境因素所導致的產業萎縮，使大家將就業的目光看向外地，但現實的經濟條件與資源限制，卻使多數孩童難以跨出地域與階級的雙重困境。教育層面亦反映出此環境所形成的結構性不利。由於當地學校資源有限，課外活動與學習刺激不足，加上家庭職業多為農、漁、勞動型產業，孩童所接觸的職涯樣態狹窄，對未來的認識侷限於現有社會結構之中。受限於經濟條件，弱勢家庭缺乏將子女送往優質學校的能力，形成階級再製現象。

由於生活環境相對封閉且缺乏競爭壓力，孩童普遍處於被動學習狀態，缺乏探索外界的動機。偏鄉地區因地理距離與交通不便，限制了孩童參與外部資源與活動的機會，而這樣的生活也影響著一代一代的價值觀與生活態度。雖有機構或社區團體試圖介入，但若僅透過物資援助，未能同步改善環境與文化刺激來源，終究難以根本改變孩童的發展條件。

#### (一) 三崙國小

為了進一步理解這樣的不利如何在教育現場具體體現，我們將焦點轉向當地的學校——三崙國小。學校作為孩童日常生活中的學習場域，不僅能夠傳遞知識給孩子們，也肩負著社會化與價值觀塑造的責任。然而，當學校本身就處於資源匱乏、師資不足、與外界連結薄弱的狀態時，其本應扮演的中介與促進角色便顯得力不從心。

偏鄉的教育現場，學校資源的可得性與運用狀況，長期受到地理位置、家庭背景、產業結構與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等多重因素影響。三崙國小也不例外。雖然學校致力於開設如「國際議題課程」與「好海課程」等具地方特色的教學內容，試圖結合在地漁業文化與國際視野，然而受限於師資人力不足、專業師資難以進駐與交通不便等問題，仍無法全面落實多元課程與學習資源的普及。在三崙國小任教多年的總務主任更坦言：「這邊就是資源不足，缺的不是物資，缺的是有能

力的老師。」她進一步指出，許多進階課程如 AI、Scratch、設計思考等，因交通、經費與人力調度問題，幾乎無法進入三崙國小的教學現場。

雖然學校重視基礎學力的培養，並藉由政府政策推動平板學習，每位學生皆配有專屬平板，作為課堂學習輔助工具，但數位學習的應用情況與學童實際接觸多元知識與世界的機會依舊有限。其中一位班級導師天天老師<sup>2</sup>提到：「雲林縣政府很積極在推小朋友用平板學習，但我覺得小孩用久了，專注力跟耐心變差，也容易影響視力。再來是，國中升學後課程又不太用平板，反而很多學生會很不適應。」以我們的成長經驗去思考，小傑老師所說的缺點我們亦能夠理解。雖然我們小學時平板的運用並不頻繁，但為了因應現代化的科技潮流，也會有一些課程讓我們使用平板。然而，到了國中，學科內容的教學與學習仍然是紙本為主，確實會有些不習慣。另一方面，偏鄉學校與補教體系之間亦存在許多的不同與矛盾。三崙國小的主任便以英文學習為例指出：「我們的正式課程是三年級才開始教英文，但很多補習班低年級就開始偷跑，其實一開始學力就有差了。」主任認為都市地區學生從小即透過補教資源提前學習、參加比賽，累積成績優勢，而三條崙當地的學童因補習資源稀缺，學力差距於學齡初期便已出現，城鄉學力斷層成為必然的現象，教育階級複製問題愈趨嚴重。

在課程與活動規劃方面，某位師長也坦承：「我們學校活動真的不多，主要就是顧學力啦，其他就比較少。」這也使偏鄉孩童相較於都市孩童，缺乏多元體驗型課程與學習機會，例如藝文活動、科學實作或國際交流，導致其學習經驗多侷限於固定模式，與外界生活經驗落差擴大，進一步影響學童的視野與自我期許。值得注意的是，該位師長也點出了「福利依賴」(welfare dependency) 的問題。他以校內某經濟弱勢家庭的三位來自低收入戶家庭的孩子為例，表示該家庭常常能夠領到許多物質或金錢上的補助，像是棉被、鞋子、外套、食物……等，而孩子們也因此慢慢習慣「被幫助」。這樣可能會削弱家庭自主性，更可能養成孩童較為消極的學習與生活態度。

## (二) 三條崙社區在地組織

面對制度性不足與家庭資源匱乏的雙重挑戰，在地組織是否有能力建立支持系統，提供替代性學習資源與正向生活典範，也是值得探討的面向之一。在三條崙，我們觀察到包括博幼基金會、社區組織與熱心居民等多方力量，皆試圖以不同方式介入孩童生活。然而，這些組織在資源配置、介入方式與理念落實上，仍

---

<sup>2</sup> 本文所提及的報導人皆做了一定程度的匿名化處理，以保障報導人的利益。

面臨不少限制與矛盾，也反映出非制度性力量在偏鄉域中扮演的多重角色與其挑戰。

## 1. 吳雙喜理事長

沙崙湖文史關懷協會以往有提供社區知性推廣像是數位中心、電腦課程，也有提供社區孩童課後輔導，這些在民國 100 多年就結束，後來因為補習班開始越來越多，加上學校也提供了課後輔導。現在的沙崙湖文史關懷協會，主要服務對象為社區長者，平日的早上和下午，會有位長輩設計的活動（如唱歌、社區清潔等），中午時由吳雙喜理事長的太太負責準備午餐。

沙崙湖文史關懷協會吳雙喜理事長提供了豐富的觀察與反思。他提到當地曾發生兩次重大海難事件，深刻地影響了整個社區的集體記憶，長輩們常以此為戒，勸誡年輕人遠離漁業，這樣的「禁忌性」敘事某種程度上塑造了孩童對「海洋」的想像，使他們對於家鄉產生疏離感，或許也是讓他們萌生離開社區的原因之一。

針對孩童的教育狀況，理事長語帶無奈地表示：「孩子們學習不積極，也沒什麼壓力，往往得靠老師和家長去推動。」這樣的描述揭示出孩子們在教育過程中所展現出的被動狀態——他們缺乏主動學習的動機，但又不全然順從，反而展現出一種「叛逆性」與「自主性」的矛盾樣貌。這樣的性格特質，使他們對於社區提供的資源反應冷淡，即便協會長期提供免費課輔給外配、單親、隔代教養等弱勢家庭的孩童，參與成效仍有限，理事長形容這些活動如同「煙火」——美麗卻短暫，即使當下感受到刺激與感動，也可能很快就消散無蹤。

社會結構性的限制也深刻地影響著這些孩子的未來。貧困的家庭背景讓許多孩子在升學選擇上捉襟見肘，教育的延續成為奢望；而整體競爭力的不足，使得他們在外界的舞台上更加邊緣。儘管有些男孩夢想加入海巡署，因為那裡離家近、待遇不錯，但多數家長其實不希望孩子再重蹈自己從事農漁業的辛苦人生。

在這樣的處境下，學校成為少數能夠發光的場域，理事長說：「學校是那一盞明燈，社區只是補足而已。」這句話耐人尋味，既點出學校的中心地位，也透露出社區功能的侷限。社區雖努力提供協助，但在資源稀缺與動能有限的情況下，難以持續點燃孩子心中那道光。

我們看見孩童在學習與成長中的種種掙扎，也激發出許多值得追問的議題：當海難的陰影與警示故事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孩子是否會因此對海產生畏懼



與逃離之心？當活動如煙火一樣轉瞬即逝，教育的火苗該如何被持續點燃？這些都是我們在田野中不斷撞擊、思考與記錄的關鍵線索。

## 2. 朱德義先生

朱德義先生，來自台中，早年於台北生活並就讀於臺北工專（現今的臺北科技大學）。畢業後在大型企業任職，之後自行創業，從事產品研發與設計工作，當時曾與飛利浦與三洋兩大競爭品牌皆有合作。生命歷經多次重大轉折：離婚、再婚、破產、上市櫃公司的經驗、以及信仰的轉向，最終在一次心靈的領受中，他選擇來到雲林台西，落腳在西海岸的一隅。朱先生提到，當他最初抵達雲林時，曾深刻感受到：「我們這些算什麼失敗，這裡的孩子連開始都沒辦法開始。」這句話既是他自我經歷的對照，也反映他對地方孩子處境的憂心。

他們不是法人，也不是用教會名義，只是兩位夫妻在為當地孩童做事。這邊提供孩子們一個放學後的空間，有國小生和國中生，會帶著孩子們出去散散步、一起畫畫、聊天、讓他們寫作業等等，夫妻倆跟孩子們的關係就像朋友一樣。他們也積極爭取很多資源，像是邀請美國教會來學校舉辦英語營，讓孩子們接處及認識不同文化。



圖一、與朱德義夫婦及孩童們在雲彩 Bar 的晚餐時間  
(黃于瑄 攝)

田野期間拜訪了朱先生的家，一棟位於社區中的住所，一樓空間簡單整潔，白色長桌與數張椅子圍成半圓，我們圍坐於桌旁，朱先生則坐在內側，語調平穩緩慢地與我們對談，偶爾在談及較為激進的觀點時顯得激動，他分享自己在社區中觀察到的種種現象，特別是對教育與孩子成長環境的深刻反思。

民國六、七十年代兩次嚴重的海難事故，加上地理環境變化造成的泥沙淤積，使原本依賴漁業維生的當地經濟逐漸萎縮。這種結構性的沒落，不只影響到產業，更深層地影響了教育。他認為上一代所持有的教育觀念已無法回應現今社會與孩子的需要，但這些舊有價值仍在家庭中一代代延續，使得許多孩童無法跳脫困境。部分家長因「愛面子」而不願讓孩子參與特定活動，以免他人得知其為中低收入戶身分；這種避諱與壓抑，也讓孩子無法正常接觸原本應有的社會資源。更令人擔憂的是，有些家長甚至將社會補助灌輸為「社會欠我們的」，這樣的思維使得孩子對未來更加消極，缺乏自我努力的動力。

他也觀察到孩童普遍缺乏學習動機，學校提供的活動有限，孩子們接觸的世界狹窄，也缺乏互相學習的風氣，反倒容易在班級中出現「比爛」的消極心態。此外，孩子普遍缺乏「陪伴」，不論是情感支持或學習引導，大多數家長因經濟與生活壓力無法投入心力，而選擇以手機替代陪伴，3C 產品雖然擁有打開眼界的潛能，但在這裡，大多數孩子僅用來打遊戲與看影片，實質幫助有限。

朱先生選擇在此駐足，不僅是對信仰的回應，也是一種對地方的深切關懷與陪伴的實踐。

我們看到在地教育困境與家庭結構變遷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陪伴的缺乏」、資源心態的偏差、動機的失落，這些問題層層交織，成為當地孩子無法「開始」的多重障礙。

### 3. 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

博幼基金會為一非營利教育機構，成立於 1998 年，長期致力於協助台灣各地經濟弱勢家庭兒童，提供課後陪讀、生活輔導及品格教育等服務。雲林中心自 2003 年起運作，服務對象涵蓋斗六、土庫、崙背、台西等地區，並與當地學校密切合作，針對隔代教養、單親、新住民等家庭背景之孩童提供穩定的教育陪伴（博幼基金會 n.d.）。此次我們拜訪的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雲林中心地處海線鄉村，由基金會主任日常陪伴與課輔安排，學輔專員負責英數兩科教學，社工師則負責陪伴孩童。

社工首先談到三條崙地區孩童普遍面臨的家庭困境，包括隔代教養、單親、外配家庭等背景，許多孩子長期處於情感支持薄弱與文化刺激不足的環境中，導致他們在情緒表達與人際互動上出現明顯困難。社工指出：「有些孩子五年級了，說話還是很破碎，遇到情緒問題就用哭或發脾氣表達。」這些表現不僅反映出語言能力的發展遲滯，也顯示出家庭與社區系統在情緒教育上的缺位。主任也提到，學校約有三成學生來自弱勢背景，其中不少孩子無人輔導課業，回家後也少有照顧者陪伴，學習動機普遍偏低。他坦言：「孩子不是不想學，而是不知道學來幹嘛，家裡也沒人關心他們有沒有寫作業。」學輔專員則補充：「我們盡量做個別關懷，但人力真的有限，只能聚焦在問題比較嚴重的孩子。」這樣的描述揭示出孩子們在學校裡仍有被忽略的風險，即使學校與基金會嘗試合作提供支持，但長期而言仍難填補家庭教育的缺口。基金會的陪伴工作非常吃重，孩子在據點的行為模式與在學校有時差異極大，社工師說：「有些孩子在我們這裡很乖，但回到學校就常常出狀況。因為在這裡我們一對一比較有空照顧，但老師要顧全班，根本沒辦法。」

家長參與度是目前最大的瓶頸。主任提到，學校辦親職講座時，常常到場的只有極少數幾位家長，多數家長甚至連聯絡簿都不看。這樣的狀況使得學校與基金會在推動孩子發展時，如同在沙地上蓋房子，基礎鬆動，難以穩固。這樣的處境下，基金會與學校宛如並肩作戰的兩個堡壘，努力在風中點燈，主任說：「其實我們都很清楚，孩子在這樣的環境裡，是走一步算一步，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把每一步踩得穩一點。」這句話令人動容，也透露出教育現場工作者的無奈與韌性。

這一連串的訪談讓我們深刻體認到，三條崙地區孩童面臨的是情感、文化與教育資本的剝奪，在家庭支持薄弱、學習動機缺乏、社區資源有限的多重夾擊下，任何一個陪伴機構都無法獨力完成翻轉任務。我們也不禁思考：而當學校與基金會都在有限條件中奮力支撐，社區的角色是否能再被重新激活？這些都是我們在田野中反覆撞擊與反思的課題。

#### 四、 兩個家庭的故事

最終，影響孩童發展的根本因素仍回到家庭本身。在田野過程中，我們不僅看到資源所造成的限制，更觀察到代間價值觀的延續、陪伴的缺乏。這些複雜的家庭問題，使孩童難以產生自主學習的動能。在這次的田野中，我們訪談了兩位家長：來自三條崙的美玲媽媽，以及來自崙南地區的小傑爸爸。兩位家長對孩子

的教育態度、家庭環境與成長背景，展現出不同的社會經驗與文化資本，也提供了我們思考「文化不利」如何透過家庭與環境條件影響孩子未來發展的重要因素。

### (一) 美玲

美玲是三崙國小的一名學生，自去年十月在與同學遊戲時意外骨折後，她便在家中長期休養，直到四月仍透過線上方式參與課堂活動。訪談的一開始，我們邀請美玲畫出三種她未來會想要從事的三種職業，她不急不躁地花了將近四十分鐘，用一筆一筆慢慢勾勒出她的三個夢想角色：美髮師、畫家、設計師。問了她為什麼是這三種職業，美玲表示：「美髮師，是因為媽媽啊，也覺得很好玩。」而畫家則是出於對畫畫的純粹喜愛。她常常畫爸爸媽媽，也會自己上網找圖練習人物畫。設計師也是因為家裡有人從事相關職業。



圖二 美玲畫的三種職業

(黃于瑄 攝)

當我們聊到「知道哪些職業」時，她列出了「藥劑師、醫生、老師、老闆、消防員」——前三者是因頻繁出入醫院而熟悉的，這些經驗轉化為對職業的認識。她回憶起一年級曾參與過的類似活動，當時同學畫了警察、護理師、美髮師，這也為她的想像提供了一些想法。

談及家庭，她的語氣明顯輕快許多。她說家裡感情很好，經常一起出遊——海邊、台北、甚至出國到菲律賓。儘管台北十分繁華，她卻說自己「想在這附近

生活就好」，因為「離家近」。每個星期四，她會到媽媽工作的理髮店，看著母親替客人洗髮、剪髮、綁頭髮，可以看出美玲與家庭的羈絆很深。

在學校的學習經驗中，她提到最喜歡英文、數學與藝術三科，也說起每週固定去補習英文，原本是媽媽安排，但後來也開始喜歡去上課。在課本裡，她接觸過與職業相關的內容，例如英文課本裡的「給狗狗洗澡的人」、自然課本裡「做燈泡的人」，雖然她沒有把這些具體指認為職業，但也顯示出學科知識對孩子職業理解的影響。對於校外教學與品格營的活動，她的記憶較模糊，但提到有一次「去坐船」，覺得很新奇。

當我們問她未來幸福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她說：「要自由和有錢，因為不想被管，而且可以出去玩。」她提到想讀文生中學、上大學，並連結到可以和堂哥、堂姐、大阿姨見面。同時，她也說「想住在這附近」，再次顯現她與家庭之間的羈絆。當我問她是否想從事農業或漁業，她搖搖頭說「不要，很累，而且要早起」。

後來，我們便來到美玲媽媽自己開的美髮店。美玲媽媽綁著包包頭，充滿精神地迎接了我們，甚至從對面的早餐店帶了兩杯紅茶給我們。美玲媽媽的成長經歷包含了鄉村與都市的遷移。她從小在箔子寮長大，國中畢業後北上做美髮學徒，婚後返鄉開設理髮廳，至今已有十三年。都市與鄉村的生活差異，讓她對三條崙的環境有深刻觀察：「這裡的節奏很悠閒，但有些孩子會跟著大人學，然後在學校講一些有的沒的，很會講話但沒禮貌。」她指出當地的隔代教養、小賭與酒精文化，可能讓孩子提早進入成人世界的複雜場域，學會應對技巧，卻忽略基本品格的養成。

她在教養上的態度明確而積極，強調價值觀與技能並重。「我都會跟女兒說，你未來要會一技之長，不然以後可能會被 AI 取代。我也會鼓勵她學英文，將來出去看看世界。」對於升學，她並不執著於傳統的升學路徑，媽媽表示「她要讀書也可以，不讀也沒關係，但一定要有本事。」

## （二）小傑

在一個午後，小傑靜靜地坐在第一排的座位，身體微微前傾，一手拖著臉，一手轉著筆，思考著如何完成他的作文作業。與其他孩子相比，小傑顯得較為寡言。當我們問到「你平常會看到什麼職業的人？」和「你喜歡什麼運動？」這兩個問題時，他先是短暫地沉默，然後寫下了「警察」和「足球選手」。在隨後的

分享中，他坦言：「沒有特別的原因，就是想到就寫了。」語氣平淡。在互動中可以感受到，小傑對於「興趣」、「升學」或「職業」這類未來導向的問題，似乎尚未建立明確的概念。對於他而言，這些詞語彷彿還只是大人世界的語彙。然而，當談及「爸爸」時，從原本簡短的句子，變成較為詳細的描述。他描述爸爸的工作、日常的互動，還有一起出門的點滴回憶。

在某個平凡的星期四夜晚，我們拜訪了小傑家，想與小傑的爸爸聊聊。進到家裡後，左手邊是廚房，堆積著許多食品，客廳則是有兩個沙發、一個電視、一個茶几。我們坐在面向電視的沙發，小傑與小傑爸爸則坐在另一個沙發上。與美玲的媽媽相較之下，小傑爸爸的育兒風格則顯得較為消極與放任。他成長於崙南地區，國中畢業後只讀了一年高中就輟學外出工作。他的訪談時間短暫，頻繁中斷，語氣平淡甚至冷漠。當我們問到對孩子的期待時，他只是淡淡地說：「不要學壞就好，不會去逼他。」他坦言對孩子的教育並不參與太多，「他要玩手機我就給他玩，反正他自己會想清楚。」在學校活動方面，他也僅僅是「有就簽名，不太了解是什麼內容」。

不過，即便在這樣的消極態度中，仍可看見他內心對孩子未來的某種期望。他提到：「我不希望他像我一樣辛苦，所以有機會我會讓他去六輕，那邊工作穩定，薪水也不錯。」然而，他對教育制度的信任與理解有限，也沒有主動提供孩子更多選擇的資源與視野。他對鄉村與都市的對比充滿感慨：「都市太現實，人跟人很冷，這裡雖然封閉，但比較有溫度。」但這樣的鄉土認同未能轉化為積極的教養行動，反而形成一種對未來無力干預的姿態。

這兩位家長的差異，讓我們更清楚地看見「文化不利」並不只是貧窮或資源缺乏的問題，更是文化資本、家庭語言、人生觀與教育參與度的多方面差異。美玲媽媽主動連結外部資源，積極培養孩子的未來能力與價值觀，展現出跨地域、跨階層的教育想像。相對地，小傑爸爸則因自身經歷與結構困境，難以提供孩子有效的文化支持，使得孩子的選擇在表面自由的背後，其實被限制在狹窄的地方生活脈絡中。在家庭因素中，「文化不利」或許不在於孩子能否補習或升學，而在於家庭是否能提供足夠的文化語言與世界想像，支持孩子對未來進行有意義的選擇與追求。

## 五、 結論與展望

總結而言，這次田野讓我們深刻體認到，家庭教養不僅是個別家長的選擇或態度，更深刻地牽連於社會結構與文化資本的再製。美玲媽媽與小傑爸爸的對比，

凸顯出即使生活在同一地區，家庭所能提供的支持、視野與語言系統卻可能截然不同。教育並不是單靠學校便能改變命運的通道，它也需要家庭提供情感與文化的養分，讓孩子具備做選擇的能力與想像未來的勇氣。

這也提醒我們，當我們談論「文化不利」時，應避免簡化為資源的缺乏或父母的不努力，而是要看到整個家庭與社會脈絡如何形塑孩子的發展機會。我們必須承認，不是所有孩子都有機會「自己想清楚」，更不是所有家庭都知道該怎麼「陪伴孩子長大」。唯有當教育系統、社區與家庭能更緊密合作，將支持深入日常，讓更多家長如美玲媽媽那樣成為積極的教育參與者，也讓如小傑爸爸那樣感到無力的父母獲得理解與協助，我們才有可能真正為孩子們打開未來的多重可能。

## 參考資料

吳承紘

- 2017 〈孤懸之村三條崙II〉。「Medium」，<https://kelvinwu-anmut.medium.com/%E5%AD%A4%E6%87%B8%E4%B9%8B%E6%9D%91%E4%B8%89%E6%A2%9D%E5%B4%99-ii-8711ea3b07ce>，2017年11月03日上線。

李信政、吳雙喜

- 2013 《綠野沙崙：看見三崙人文地景全貌》。雲林縣：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麥寮戶政事務所

- 2025 〈四湖鄉村里鄰人口數〉。「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https://mailiao.household.yunlin.gov.tw/popul01/List.aspx?Parser=99,5,40.....1....18>，2025年05月04日取用。

陳心慈、黃孟凡和阮郁馨

2020 〈教育到不了的遠方 台灣偏鄉學校分布與孩童教學困境〉。「小世界」，2025 年 5 月 6 日取用。

陳淑娟、宋明順

N.d. 〈文化不利〉。「教育大辭書」，  
<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d52d3ec50df68b044f9f571d9fabb7ef/>，  
2025 年 5 月 6 日取得。

博幼基金會

2025 〈關於博幼〉，「財團法人博幼基金會」，  
<https://www.boyo.org.tw/boyoV2/index.php>，2025 年 05 月 12 取用。

雲林縣三崙國小

2025 〈113 學年度三崙國小學校課程計畫〉。「雲林縣四湖鄉三崙國民小學」，<https://sites.google.com/view/sanluantaiwanmyday/1-xing-zheng-yun-zuo>，2024 年 06 月 04 日上線。

華叡民、蔡嘉軒和江冠瑩

2024 〈何以擺脫無未來？海洋教育與社區發展的能與不能——以箔子寮和三條崙為例〉。刊於《風頭水尾——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人類學系編，頁 361-394。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劉曜華主編

2006 《四湖鄉志》。雲林縣：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整合傳播部

2024 〈【偏鄉教育專題】攀樹、造屋課程日常！偏鄉小校善用天然資源與數位工具，打開通往世界之窗〉。「換日線」，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9553>，2024 年 12 月 23 日上線。



Eden Academy

- 2025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ty in Early Childhood: Why Strong Connections Matter for Children, Families, and Providers. *Eden Academy*, <https://edenacademy.com.au/the-importance-of-community-in-early-childhood/>, accessed January 9, 2025.

Havighurst, R. J.

- 1965 Who are the Socially Disadvantaged? *Th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34(1): 39-46.

Lareau, Annette

- 2011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2nd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ylva, K.

- 1994 School influence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35(1), 135-170.

Wentzel, K. R.

- 1991a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competenc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early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62: 1066-1079.
- 1991b Social competence at school: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1:1-2.
- 1989 Adolescent classroom goal, standards for performanc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n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on primary preven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9: 830-841.



## 大是大非：抗爭中的道德與責任

胡景堯（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sup>1</sup>

### 摘要

吳連進先生是四湖反風吹自救會會長，目前也幫忙隔壁謝厝村的自救會。他為了更好的生活而離開家鄉，如今卻為了陸域風機與光電板的建設，撇下半輩子的成就回到家鄉抗爭。抗爭本身不是輕鬆事，要向外對抗，也要承擔攻擊。本報告專門瞭解吳會長，我以我的詮釋，說明會長眼中四湖面臨了甚麼問題，並試圖瞭解會長回鄉的決心背後是什麼在支撐。援引 James Laidlaw 的道德人類學視角，更加貼近吳會長這個人的生命，並從中瞭解吳會長、四湖、土地、家人、國家之間的社會關係以及會長在其中擔起的道德責任。

關鍵字：道德、責任、自我理解、社會關係、抗爭。

---

<sup>1</sup> 本文為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課程之期末報告。感謝黃老師郁茜、郭天祐、盧佳秀（依姓氏筆畫排序）兩位助教的教導、討論、幫忙、寬容、與鼓勵。感謝吳連進會長接受我的採訪，也謝謝會長田野期間對我和田野實習課程其他人的照顧。感謝箔子寮各位對我們的招待與協助。感謝蔡卓霖學長對本文的評論與建議。一切文責由我自負。

## 一、前言

### (一) 本文想說什麼？

田野期間，我的受訪者只有一位吳連進先生（下文皆以「吳會長」相稱）。他是四湖反風吹自救會會長，目前正幫忙幾個附近的自救會。他是抗爭的領頭者。

在寒假田野實習期間，我跟他聊了非常多<sup>2</sup>，時間跨度從童年、壯年、再到現在的抗爭。會長的爸爸是苗子寮人，入贅到溪尾村。這個農村家庭有八個孩子，會長是老么，生於 1968（民 57）。訪談中，我聽到了會長童年的苦。經濟條件不好，累人的農活，最後就只能求個溫飽。但個性上，會長是個雞婆人。隔壁村的來欺負自己村的，會長拳腳相迎。也是個調皮人，放牛放到牛尾巴斷掉、或是開拖拉機開到翻車。

在四湖的田裡奔跑，河邊釣魚，赤著腳、手堆土，就控窯了。十七歲之後，就隨著哥哥們去了北部打拼。因為待在這裡會餓死。

在北部打拼多年，接手哥哥的公司，娶妻生子。離開家鄉，看似有了好的回報。我想這也是會長他們離開四湖的原因。北部才有好的工作機會，更多的資源、更高的酬勞，更好的生活品質……。

在北部，會長也接了公廟領導層的職務。他花了快十年的時間，推動改革，讓那間公廟從沒落走向社會。發獎學金、辦活動、關心社會、發放物資。

就我來看，會長在北部有很好的生活，至少當初離鄉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人生中大半個根是紮在北部的。安逸、美好，但在 2020 年（民 109 年），會長開始接觸反抗，因為他得知，好幾支一百多公尺的風機將要插在四湖的土地上（林吉洋 2020）。

於是他成立自救會，在家庭事業與抗爭地點之間，來回奔波。但是，議題一直打不出去，響應的人少。所以會長在隔年過年期間，毅然決然地說，要離開北部，回到家鄉四湖定居，長期抗爭。

抗爭是一間辛苦事，要不斷充實自己的知識。好在有貴人幫助，教導會長在法律、政治、能源、以及科學上的知識。但幫助之外，還得靠自己奮鬥。必須要有勇氣，敢直接挑戰上位者、國家、廠商。站在他們面前，挺直腰板，大聲說出自己的訴求。也要堅持，堅持不受利益的誘惑、權勢的干擾。這些勇氣與堅持，

---

<sup>2</sup> 本段對吳會長的過往事蹟整理自田野期間上萬字、分散在數天的訪談稿。為保持閱讀順暢，不一一標明確切的日期出處，僅以標楷體加註作為區分。但內容皆出自訪談，絕無杜撰。

也是給鄉親看的。只有看到領頭的真有力量、值得信任，他們才會站出來加入抗爭。

一次次的廟口開講、宣誓大會、或是直接北上在政府面前開記者會，這都是勞心勞力的事。會長抗爭不光只事對外輸出，也要承擔攻擊。2021年，五名陌生男子闖入會長家，對其施暴（黃種瀛 楊宗穎 吳建宏 2021）。當初為了支持民進黨而成為黨員，如今因為抗爭，被除黨籍。北部的公司也在各方「扣錢」，乾脆收了。抗爭中最明顯的代價，就是沒有家庭時間了。會長的妻子與兩個女兒，都留在北部。雖有妻子的支持，獨攬親職，但分隔兩地依舊是事實。

抗爭的代價是很大的。當初為了更好的生活而離開北部，在北部也確實有了很好的生活，活了半輩子的地方，如今卻又暫時撇下，又再度回到那個曾經吃不飽、如今壟罩在能源議題下的家鄉。「毅然然而然」，會長是這麼說。但是應該如何瞭解這份決心？這是本文想說的。

會長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甚至可以說是雜亂，全部散在報告裏頭，也沒什麼重點，反而昏頭。所以，我聚焦在抗爭，透過抗爭中的行為，來表現會長的特質、展現會長的道德責任。希望在本文能讓人「體會會長這個人」，而不是只是單純閱覽他的事蹟。

## 二、研究觀點的脈絡回顧

主要回顧兩個文獻，其一是研究生蔡卓霖 2024 年的〈原野的呼聲——四湖鄉再生能源地景的論述與想像〉，其二是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James Laidlaw 2014 年的《以德為體——關於道德與自由的人類學》。前者的文章，是本文想對話與補充的對象；後者的著作，則是本文採用的理論框架。

選擇蔡卓霖一文，主要是因為他的研究對象包含了我的研究對象。四湖人對於能源議題有各自的論述，蔡卓霖研究這些豐富、甚至相互矛盾的論述，以及與這些眾多論述高度相關的風的存在，或說風的本體論。而我田野期間的研究對象則是眾多論述之中的一個，也就是四湖反風吹自救會吳連進會長的論述。蔡卓霖的文章中大量談及吳會長，而我的田野期間只訪問吳會長。既然蔡卓霖與我兩文的討論對象高度重合，故此，有必要說明一下兩文在詮釋同一對象上的視角差異。

我認為，蔡卓霖的研究，是從一個巨觀的視角來俯瞰吳會長。這個視角之大，涵蓋的範圍超越人類這個物種。風這種自然現象，以及以地球這顆行星，都是蔡卓霖的視角。於是，從蔡卓霖的研究視角下，行星運行下的風系，在全球暖化這

種超越個人與當地的災難以及為瞭解決這個災難的各種超越國家的協議之下，成為了某種解方，也就是風力發電。而在這個超越國家與個人的重擔，則被分配到了有「風頭」之稱的雲林縣四湖鄉。在四湖這個當地上，生活著各式各樣的人，他們一生中都與風生活，不論在他們的過去、現在、甚至到了未來，他們依舊要想著有風的生活。在過去，四湖的風還沒有解救全球的重擔，但在現今的全球氣候、以及政治的討論下，風已經不只是四湖人的風了。國家也關注到這個風。風機雖尚未建設，但消息已經傳出，計畫已經拍板，四湖人如何從他們的過去與現在的記憶與經驗，來想像未來的風與風機，這是蔡卓霖的研究。然而這些想像與論述是多重義涵的，這正是因為對風的存在（風的本體論），有不同的瞭解與經驗。而在這眾多論述者當中的其中一位，是吳連進會長。

所以可以看到，在蔡卓霖一文中，吳會長的存在，是透過巨大的行星、暖化、風、超越國家的協議、落到台灣政府政策、再到地方的四湖、四湖的眾人、最後是眾人之一的吳會長。從行星看人，從關係式本體論，一個超越生物人、涵蓋氣候這種無生命存在的本體所構築的關係來看待一個人，我認為這是大結構的、是巨觀的。

而我是微觀的，從會長這個人出發。從他的眼睛，他看到什麼問題、從他的生命經驗、他會如何理解這些問題、以及，從他如何選擇他的行動來面對這些問題之中，瞭解吳連進會長這個人。這些不光是我的關懷，也是我研究的視角。我希望從人的角度（或尺度）出發，以此瞭解他的生命。另外，我並不會從人的尺度，一路返還到行星的尺度。我的重點是吳會長這個人，不是其他。我想說好這個人，或說，表明這個人的特點。

所以，本報告的對話以及補充對象是蔡卓霖的文章。一個巨觀，一個微觀，這本身就是一種對話。而補充，則是說，我希望透過本文表達，吳會長這個人的生命，不光可以用多元本體論（人與非人與非生命的各個本體）所構築的關係的這種研究視角，還有其他的理解方式。而這是我接下來要回顧的 Laidlaw 的道德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ethics）。

在 James Laidlaw 2014 年出版，2022 年簡體中譯的《以德為體——關於道德與自由的人類學》（*The Subject of Virtue: An Anthropology of Ethics and Freedom*）的第一章的最開頭，他問出了幾個隨處可見但卻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應該怎麼活？」「什麼樣的人生是有價值的？」「我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Laidlaw 2014[2022]: 2）這幾個問題，他認為是道德人類學研究的起點，因為道德瀰漫在我們的生活之中。我們總是在做道德選擇。Laidlaw 認為，道德研究不該只是人類學的一個分支，而應該是人類學的基礎、發揮整合作用。有此宏圖，正是因為生活之中，道德考量是必不可少的（ibid: 2）。

看到生活中的道德選擇，這不光是道德人類學的基礎，也是對於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的發展的一種轉向，從「不自由的科學」中脫離 (ibid: 8) 人是不自由的，這種觀點有不小的學術慣性。從涂爾幹、馬克思、或是往後的 Bourdieu，都離不開「結構對人的巨大影響」這樣的思維。直接援引 Laidlaw 的精采原話：

無論社會科學工作者是否認可這一情況 (即社會科學是不自由的)，只要他們想提出有效的社會解釋，就必然都會選擇對人們的社會行為中的道德因素做簡化處理。只有在淡化處理了行為主體的個人自由選擇經歷，認定自由選擇的經歷都不過是一些遐想之後，那些所謂的「社會性」、「國家意識形態」、「全球體系」、「新自由主義」<sup>3</sup>、「殖民主義話語霸權」等理論框架才能直接地、順理成章地被用來解釋人們日常的行為決策過程。(ibid: 8)

分析大結構之後，對人的生命的理解就結束了。儘管有實踐論，如 Bourdieu 和 Ortner，這類以大結構的反命題來存在、關注個人能動性的理論的出現，但其實在 Laidlaw 眼中，仍有問題，還是不夠貼近人的道德選擇。Bourdieu 雖然給了人一點發揮空間，但到頭來也只是階級再生產 (class reproduction) 的結果 (ibid: 8)，還是回到大結構對人的塑造。又，所謂資本在場域間流轉，又讓善意的舉動成為文化、社會以及經濟資本考量下的投資。個人的實踐在這樣的學理下，不論怎麼實踐，背後都是「客觀經濟利益」(ibid: 9) 而對於 Ortner，Laidlaw 看到的問題是

實踐論 (即 Ortner) 下的能動性暗藏一種特定的價值觀。他假定創造力是從人類個體內而生，臆測個體與社會文化結構之間的零和遊戲，認為只有在個體戰勝結構的結果之中才能發現道德的存在。(ibid: 207)

Ortner 對於道德的關懷只限於反抗，而不是 Laidlaw 的生活中瀰漫著的道德考量。

值得稍微說明的是，會長正好就是 Ortner 所說的反抗 (resistance) (Ortner 2016: 61)，而且會長的抗爭恰如其分地符合了「實踐理論……最簡單地說，我們可以透過社會實踐來終止或重塑這個世界 (unmake and remake the world) (Ortner 2016: 63)」這個觀點。會長也是在透過抗爭來，某種意義來說，重塑世界。

但我不使用 Ortner 的研究觀點，理由大概也同 Laidlaw 對其的批評：認為只有在個體戰勝結構的結果之中才能發現道德的存在 (Laidlaw 2014[2022]: 207)

---

<sup>3</sup> James Laidlaw 在一篇回應 Ortner 的暗黑人類學 (Ortner 2016) 的文章中對此提出反對，他認為 Ortner 與很多人類學家把自己不喜歡的事都推給新自由主義；從更廣的因果關係來看，現今社會的問題並不全是新自由主義惹的禍，但新自由主義卻成為了一個「肉眼可見的卻又幻覺似的原因 (an optical illusion that results)」(Laidlaw 2016: 20)。

所以說，Ortner 雖然搭建了一個「以善對抗黑暗」的學術舞臺，但對於如何理解那個善，Ortner 的理解只限於對抗過程中。

我認為，Laidlaw 的優勢在於，他對於道德的理解更加深入且精闢，而且是日常生活的、是貼近生命本身的、並且不須以「對立於某某黑暗」作為道德存在的先決條件。這對於理解會長的抗爭來說，有比單純以對抗本身作為研究主題來順便凸顯道德，來得更加貼近會長這個人。本文的詮釋目標，是吳會長這個人。而他現在在做的抗爭，也只是這個人做出的行為。至少我認為，更好地瞭解這個人的特質，比在文章中灑滿他的行為來的有意義。

以上是在學理上，Laidlaw 的道德人類學的位置，以及這個位置所引發的效應。從不自由的人，回歸到自由的、可抉擇的、有道德考量的人。本文的研究視角與態度，也是回歸到人身上。至少我視吳會長為一個自由<sup>4</sup>的人，所以他才能在能源議題前做出他覺得正確的道德選擇。

回歸了自由的人之後，該如何理解人，這是 Laidlaw 的道德理論處裡的範圍。首先 Laidlaw 提倡，應該重新瞭解“agent”這個詞。更精確地說，是重新回到 agent 的原意。為了回歸原意，Laidlaw 批評了 Bruno Latour 的行動者網路理論(ANT)。在行動者網路理論當中，Latour 把 agent 界定成「非人存在也能展現其因果關係，並且以自身來影響人類」我們常以為的因果關係，不是只有人的意志相互碰撞，在人以外的非人、物質、現象，都可以展現他的 agency（能動性）。所以，有一張跨度甚廣的因果關係網，當中不論人、非人、物質，都是也能動性的 agent。然而 Laidlaw 認為，這樣的 agent 是令人費解的，而且這樣的因果關係網只是人類學家自己眼中看到的因果，人如何思考，變得不再是重點。

回想 Laidlaw 的關懷，人的思考（道德考量）當然是重點，所以他提議回歸 agent 的原意。這個原意是「代理人」的意思：好幾個人同時扮演同一個角色，一同成為擁有一致利益與目標的一個角色（ibid：211）如此理解 agent，在道德理論上大有幫助。

為了快速介紹 Laidlaw 的道德理論，我自編一個故事，並且以步驟式的形式來簡要說明這個理論。「我養了一條狗。這條狗咬了人，我應該為此向那個被咬的人道歉，甚至賠償。」狗不是我，我也不是狗，但我卻為了一個非我存在以及其行為而道歉，在 Laidlaw 的觀點裡，這當中就是道德。首先，是「我的擴散」：這條狗已經成為了我的一部分，或說成為我的代理人（agent）。再來，這條狗的

---

<sup>4</sup> 在這裡談到了自由，但往後的文卻不再提起了。因為此處提到自由，只是為了說明 Laidlaw 和我的觀點在整個知識體系中的位置。在文獻回顧中只需知道「我看到吳會長的自由，而不是結構產物」這一點就好。這只是研究的起點，或是研究的預設，不是後面正文中的討論對象，所以後面就不再、也不需要提到自由了。



狀態成為我的責任：狗咬了人，他傷害了人，但因為是我的代理人，所以就好像是我傷了人一樣。最後，擔起這個責任，成為我的道德表現：狗傷人就好像我傷人一樣，所以我必須為此道歉。

Laidlaw 的理論不停留於此，他更指出，這個道德表現是基於自我理解以及社會關係之上。回到自編故事，這條狗憑什麼成為我的一部分？這就要談到自我理解與社會關係了。這個社會關係不是那種大結構的塑造，而是我作為養狗的人，我自身如何界定自我（自我理解），以及自我在這個人狗關係中的位置，或說他如何理解人狗關係的內涵（社會關係）。例如，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我認為我是一個吃狗肉的人，或說我覺得吃狗肉沒什麼好奇怪的（自我理解）<sup>5</sup>，那麼這條狗跟我的關係，就是吃與被吃的圈養糧食關係（社會關係）。理所當然，在這個特殊情況下，這條狗不會成為我的一部分，因為狗就是食物，割捨它極為容易。它咬了人，就殺了一起吃。就算道歉，也不是為了那條狗。但是，在另一個情況下，我認為我是愛狗的人（自我理解），那麼我跟這條狗的關係可能就是家人關係（社會關係）。在我跟他的家人關係，在日常的互動與愛護之下，「我」就漸漸擴散到狗身上，那條狗已經成為我的一部分。那麼它咬人，我不會把它丟到一邊，而是，我要為他負責，擔起道德責任，去道歉。

所以說，要理解 Laidlaw 的道德考量，還得瞭解自我理解與社會關係（ibid：220）。或說，其實道德脫離不了自我理解與社會關係，三者相互作用。

Laidlaw 的理論是很貼近生活的，而且，人是自由的。人自己可以去認識自己，界定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當然，不是說人人都是沉思者，每天都在自我剖析，或說社會的大結構一點用都沒有，而是說人有可以去自我瞭解一切的可能。

此處的研究觀點脈絡回顧，說這麼多，只是為了說明我在田野的態度與視角「是」或「不是」、「貼近」或「遠離」哪一種研究觀點，並且快速說明一下我所理解的 Laidlaw 的道德理論。在正文的後半部，我會把 Laidlaw 的理論和會長的抗爭兩者交織，更好地說明抗爭中的道德責任。

### 三、會長這個人

在十二天的田野期間，扣除兩、三天休息，我都跟著四湖反風吹的吳會長。他正在為了雲林的能源議題而抗爭，至今已經抗爭五年了。在他的溫室裡，一張

---

<sup>5</sup> 我沒有提倡吃狗，也沒有批評吃狗，只是用兩個差異極大的鮮明例子來方便理解何謂自我理解與社會關係在不同內涵下的結果。

桌子，我們倆面對面，我發問，他回答；不過其實多半時候，是會長看著我給他的訪綱，自行演講。我認真地聽，努力想要怎麼繼續引導。會長很能講，講得頭頭是道，談話節奏掌握自如。受訪者居然比訪談者更懂得訪談。會長口在講，手眼也不閒著。抓茶葉、沖茶、倒茶、補茶，伺機而動。點根菸，就在煙霧中談笑。訪談過程中講得過癮了，還會用台灣國語說「你有什麼想問的？不要都我在講」我們的訪談時間不算短，一小時以上的情形不在少數，可能我也面露疲態，會長還會好心地說「好大概是這樣子，因為不能給你太多」。

跟著他聊天，從能源、政治，到會長本身的經歷。在談論能源與政治議題時，是理性；談到自身生命與雲林時，又是感性。桌邊兩側的訪談之餘，畢竟都在溫室了，多少幫忙著農活。舀水、整土、更換不良植株、拔掉消耗營養的雜草。幹農活的時候，也看到會長的另一面。叼根菸，滿手泥土，播著中英文流行歌，安靜地走在溫室裡。農活時不怎麼說話，但偶爾也向我這個都市小孩分享溫室的經驗，或是延續桌邊的能源、政治，以及他的抗爭。如果我有去他的溫室，我們都會一起吃午餐。兩菜一湯，一鍋飯，「盡量吃，吃的東西不要客氣」會長每次都如此提醒。傍晚要離開溫室，「我載你回去<sup>6</sup>」會長熱情地說。

這大概是田野中實際的「資料收集」過程。

與會長十天左右的交流、學習、與訪談，在田野的尾聲，我問了會長三個問題：第一，「您想要什麼<sup>7</sup>？以一個自救會來說，怎麼樣才是完成？」「把他的所有陸域風機擋下來我就完成了，一枝都不給他做就是完成了」會長的答案不出所料，很符合會長成立四湖反風吹自救會的宗旨。我繼續問第二個問題：「不以吳會長的身份來想，以吳先生的身份來想，您個人想要什麼？」我本來以為，經過這麼多天的談話，聊了許多會長自身生命歷程，又到了訪談的尾聲，接下來的回答會是他個人生命的觀照與期望，例如卸甲歸田之類的，回歸自我生活，或是與北部的家人團聚，但會長的答案出乎我意料：

吳連進在那個身份是我個人的身份，那回來之後這個身份是……做到最後，或是未來會不會成為……會不會成為……故鄉的一個公共財？我不知道。公共財，就是很簡單故鄉的事，就是你有你是一個可以去……發言或是你可以去做一個規劃，那未來不曉得。那就算成功之後當然我不會這麼說，成功之後當然自救會就自動解散，一定是自救自救自動解散。那除了自動解散之後，我會不會循著另外一種模式，真正的成立一個協會，來守護這

---

<sup>6</sup> 會長的溫室在溪尾村，我們田野實習課的住所在四湖鄉箔子寮。

<sup>7</sup> 這個問題是承接會長上一句的尾「這不是我要的」語境上大概是說，會長目前並不要透過參選或是其他體制內的政治活動來達成目標，原因有二，一、不想被認為是為了政治參選才投入抗爭，二、不想有所包袱（我推測是政黨或是金主的利益或是人情包袱）。

塊土地？我不曉得。那都是在我的腦海裡面的規劃，已經有看到那個東西出來，那已經看到我這邊成功之後，那邊到期之後怎麼辦，會有問題出來。

成功了還要面對其他的問題嗎？會。那下一階段的任務是什麼？就算全部 OK、沒有問題了，那你下一階段的任務是什麼？那又是轉換另外一個不同的身份。那我也會去接受我也會去樂意去成為另外一個身份。我相信在這段期間，我有能力去把另外一個身份扮演的很好，因為你都已經經過這麼多的困難重重一步一步把它打破，那如果真的成功之後你就這樣放棄嗎？不大會啦。

當然不是成為什麼角色，那你會不會去做另外一個更有意義的事？也有可能。號召這些有志之士，號召一些更年輕者，共同去關心這個西海岸，那正式的立案……也有可能。真正的平常就付諸行動，不是碰到事情才成立之自救會就已經把它定調在這邊，也有可能。

因為在這些抗議中我認識很多的朋友、認識很多的鄉親、認識很多的遭受受害的，很多人認同我們的理念，那如果到時真的抗爭成功的話，我們會不會去尋求另外一個比較合法性，不是這樣一個自己的自救？會不管成立什麼單位，那來帶領另外一群人對這塊土地的付出，或是守護，那也有可能阿。也有可能啊。我不知道，哈哈哈哈哈。(訪談錄音，吳連進，2025/01/15)

好多的「我不曉得」「有可能」，但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對未來的個人生命有很多看法。這些看法，如成立另一個協會、號召有志之士與年輕人、「吳連進成為公共財」，都是面向社會，而不是面向自己。不是卸甲歸田，而是成為公共財，在未來的人生，延續「吳連進」抗爭的符號，與更多人一起關心西海岸、守護土地、常態性地而非事件性地為社會付出行動。

瞭解了會長對未來的期望之後，我問了最後一個問題，作為田野訪談的收尾：「您滿意嗎？到目前來看。或是說，走到現在回看過去，您會怎麼評價」我自己覺得，這個問題是面向過去、對生命的反思，與上一個面向未來的問題有互補作用；會長生於 1968 (民國 57 年)，今年也快邁入花甲。回看一生，從雲林溪尾村農家出生與長大的老么、體會做農吃不飽的時代、國中畢業後北上三重工作、娶妻生子、經營公司、在宮廟內擔任職務、又做過議員無給職助理、五十二歲接觸四湖風電議題、成立自救會、南北奔波、隨後為了能源抗爭毅然地定居雲林、不斷學習、到處宣講、告官告商、遭受暴力、卻又奮力突破困境、直到今天有所成就與打下名聲、此刻接受我的訪談，在煙霧中喝茶談笑。我很好奇，會長會如何看待他至今的人生，大概很感性吧。但會長的回答卻更加出乎我意料：

我那天有放一首英文歌它叫永不滿足，那當然在我現在的生活上我是知足，那在抗爭上我是不滿足，因為這個政策沒有轉變，再生能源沒有臺灣的能源沒有做調整，我怎麼會滿足？那對廠商來講我當然是永不滿足啊，所以有兩個身份的差別啦。我自己的生活條件不好經濟條件不好 OK，這個我都可以自己去承受自己接受，那滿足現在生活方式嗎？很愜意。

那在抗爭這一塊我是永不滿足，因為整個臺灣的能源政策還是維持不變它沒有碰到它沒有調整說因為臺灣這麼多的抗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或實際的影響，沒有調整，而且是變本加厲。那到時候受害的是我生活在這塊土地的百姓共同生活在這裡的人所要承受的，那一旦沒有調整未來是哪裡抗爭？我們不曉得。所以我不滿足。那如果政府有調整能源配比或是選擇多樣性的能源不用造成這麼多偏鄉的人民去承受你的能源政策所造成的危害也好，當然調整後，我當然會滿足啊。那現在我是不滿足啊.....（以下省略）（訪談錄音，吳連進，2025/01/15）

我大概省略了以下七百多個字。在會長這番回答之前，訪談的氛圍還圍繞著會長的個人生命，頗為感性。會長這番「評價」，倒把話題全轉到了政治與能源議題上，理性之餘，也憤怒了。能源、賴總統、法源、核能、綠能、糧食安全、國防脆弱、國土破碎、國家領導者.....「我不滿足！」。全是社會面向的，一點不關乎自己的人生。我看苗頭不對，時間也晚了，考量雙方體力與精神，不打算再問一次，於是，「好！謝謝會長。」

雖說這兩個回答令我訝異，但仔細想一下，關於會長的回答，我認為有必要指出兩件重要的事。第一，會長的力量，而且這個力量是根植於對社會的問題、並且他的施力對象也是社會。不斷地說出未來的規劃，而且這些規畫都是勞身費心且耗神的：號召人馬、成立協會，一點都不輕鬆；對於台灣社會的批判，即便我不確定真偽，但資訊的堆疊、概念的串聯、以及個人鋒利的批評，聽得頭頭是道，頗有說服力。一個是內在心裡的力量，一個是腦中知識的力量。對我來說，會長是很有力量的人，不光是從這兩個回答來看，田野期間都是如此。第二，會長不單單只是個體，而是社會的人。「關心西海岸」「守護土地」「這個政策沒有轉變，再生能源沒有、臺灣的能源沒有做調整，我怎麼會滿足？」這些話是面向社會的，不能單純從個人的角度來思考。這是一種把個人的知覺放大到個人以外的空間（即社會），去感知、評價、並做出行動。簡單來說，會長非常關心社會，也不光只是說說，而是願意為了社會付出行動。若只有純粹的個人角度，不會從社會、政治這種超越個人的結構來思考、並改變之，反而是各種自我修行來化解苦難，即便他看不到苦難其實是結構性問題。所以我說，會長是社會的人。

會長的「力量」與「社會的人」，是我對會長的最大的兩個印象。在下一節中，我會說明從會長的眼睛所看到的問題。接下來，將探討本文的重點「抗爭中的道德責任」。希望到最後，讀者能在我的解釋之下體會吳會長的道德責任、和我對吳會長的兩個印象。

## 四、吳會長看到了什麼問題？

### (一) 公共事務缺乏討論

私法領域中有一個很大的類別是契約法<sup>8</sup>。契約，先不談法，本身是一種道德表現。契約是在法律之前就存在的現象，意味著契約不一定全是法益，由法律肯認、保障之下才能存在的益品。契約本質上更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性互動、道德的互動。契約有趣之處在於，兩個相對人光靠意志上的對話，就產生了履行的義務、要求的權利。有人說契約是一種道德的發明(moral invention)透過 speech act，意志由言語表達出意象性之後，雙方同意，就「發明」了道德上的義務。

國家公權力以法律的方式介入一個先於法律的制度，學說上多有討論，但重點是，國家以契約法來保障契約的進行。契約本身是有好處，但在沒有法律強制力的支撐之下，破壞所謂的道德發明、道德義務，並不是一件難事。國家的契約法應該保障什麼，同樣有爭論。如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就會說，目前契約的運作成為了有權勢之人獲取利益的工具，相對於契約另一方的無權無勢，權勢者總有方法讓契約導向他們的利益；契約應該在符合公平原則之下，達到機會均等。這走的是契約平等主義(contractual egalitarianism)。又如著資本論的馬克思，他會說現行資本主義下的契約是一種剝削(exploitation)契約雙方的締結者，一方的生產價值只因為表示同意，就讓另一方奪去了他的價值。馬克思會說，這些人都得到了他們不該得到的份額，該多拿的少拿了，不該拿的卻都拿了；他們實際獲得的一切並不是透過生產關係來分配，而僅僅透過意思表示的契約。馬克斯反對這樣的契約，反倒認為，契約應該先注意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

---

<sup>8</sup> 請特別注意，在「吳會長看到什麼問題？」這一節中，我所用到的概念很多出自於我以學生的身分在陳淳文教授的「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二」以及顏厥安教授的「『法律與哲學』導論」兩堂課程中的學習與思考、該課堂的自編講義(部分內容是轉載其他文獻，這些「其他文獻」也是轉載其他文獻……)、以及授課教授的口頭內容。可以說，這一節是我對這些課堂內容的綜合性理解。故此，在引用格式上，我只能盡力標明我確切知道的出處，其餘的部分，則是混雜著講義、教授口頭、與我個人的記憶和思考，難以區分。絕無抄襲之意圖，並且若對這些課堂的內容理解有誤，或是概念運用不當，責任一切在我，很歡迎批評指教。特此聲明。

不過通常契約法首要的保障項目通常不會是機會均等或是分配正義，那些是理想。契約法主要還是保障契約的品質，維護契約本質上的道德性：締約雙方都有足夠的資訊以做判斷、不受脅迫、欺騙、趁人之危、締約內容屬公序良俗；弱勢的雖然弱勢，但仍然在法律保障之下，在締約過程中仍然擁有一定的有效選項。這個有效選項，我認為是契約的基石，起碼弱勢一方能夠說不，拒絕締約。契約法的精神之一就是保障資訊對等，或至少雙方的斷裂程度不能大到令弱勢方在受騙之中，做出他不大可能會做出的意思表示。

會長曾在訪談中提到：過去民進黨的黨外活動是他的榜樣，我順著話題問有什麼啟發，會長說當初他們努力為民主、為權利抗爭，但到了現在民進黨執政，傷害他們最深的卻是當初他們最支持的黨。過去民進黨跨不過濁水溪以北，他們的支持力來自南部這些縣市的草根民眾。如今掌握大權了，卻沒有民主，沒收權利，不能說不，會長說他們對雲林做的事是「掠奪式霸凌」。

我是在地的居民，(我)在我的住家、在我的田園，我必須面對另外一種建案，也好它設置之後所產生的影響，我都沒有權利說不的。所以很多抗爭到最後都讓在地居民不能說不<sup>9</sup>，為什麼？？因為你政府讓廠商優先申請，讓你整個法源整個法規是在保護這個政策的推動，而不是落實要與在地居民共存共榮。那這個就是比較傷害到在地居民的權利了。所以抗爭之後我才開始去看到這些，我們所說他們很多人都說不公不義的事，就是因為你沒有辦法讓在地居民說不。(訪談錄音，吳連進，2025/01/10)

雖說這段話涉及公法領域，但我還是把話題維持在私法的契約上。所以說，在吳會長看來，風電的建立沒有對等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說，弱勢方並沒有其他有效的選項，彷彿只有接受風電的建案。契約的精神與本質的道德性並沒有體現在能源議題中的廠商國家與居民之間。

在蔡卓霖的報告也出現類似的紀錄與分析。第一，風電沒有政治彈性。風電的規劃與決策沒有民眾的參與，缺乏一個能讓官與民的想法相互交流碰撞的場域。第二，法規雖規定，廠商的施工許可申請書必須附上舉辦當地說明會的證明，但僅是要求形式上的證明，而不是督促實質上的說明品質。有當地居民表示，送米送醬油，包一台遊覽車載老人家去簽名，這就是廠商舉辦說明會的「證明」(蔡卓霖 2024：86)。

依照契約的精神<sup>10</sup>，對等的資訊、有效的意思表示、以及弱勢方仍可以選其他有效選項，這些精神貌似都沒有體現在風電建設前的決策過程之中。甚至契約

<sup>9</sup> 這個「不」指的是拒絕風機的 *speech act*，不是單純嘴巴開開表達不同意。這個「不」說出來了之後，是真的有政治效果，並且可以實質且直接地改變政策。

<sup>10</sup> 必須得說，說明會並不是契約性質的場合，簽名也不是同意把地租給能源公司蓋風機。此處

簽訂必要的雙方都不存在。從頭到尾只有政策掌握實際的話語權，而承擔政策外部成本的當地民眾，好比吳會長，卻不能說不。

把思考角度從純粹的私法契約擴張到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如果按照契約論的主張<sup>11</sup>，政府的存在是仰賴與人民的締約。就風電議題來看，政府並未展現契約最基本的精神：雙方知情，然後雙方同意。回想一下，契約是一種道德發明，會產生義務。在這個契約精神缺乏的狀況下，一方出讓土地與承受外部成本的義務是否合理？上下游記者林吉洋 2020 的報導〈風機吞噬四湖鄉〉，裏頭的其中一位受訪者是長期關注沿海生態議題的環球科大副教授陳泰安，他也提出一樣的問題：「這裡(雲林四湖鄉)的人不需要麼多電，為了供給工業區或都會區的用電利益，後果卻由鄉村區的人承擔，鄉村的人為何有這個義務？」(林吉洋 2020)

以上的討論可以歸類為「公共事務缺乏討論」。這是在田野中觀察到的問題，這也是吳會長與受風電影響的居民面對的問題。

## (二) 地方認識受到限制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地方認識受到限制。蔡卓霖對此有深刻的討論：四湖反抗的是規劃中的風機，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所有的危害與利益「尚未」真實地發生在四湖鄉，討論與爭辯都圍繞在居民各自對於風機的「想像」：「而風機『不存在』的時候也不代表他『不在』，反而正是因為它不在，使他的存在充滿可能性與能動性」(蔡卓霖 2024：104) 這話說得比較玄妙，我認為他的意思是，因為利益與危害尚未擺在眾人眼前，沒有人能親體會，所以只能對於風機建設的未來各說各話。所謂的認識受到限制也體現在此：各說各話，那誰說的對？

我在田野的觀察是，人的理性都受到限制。吳會長常常接到電話，有的是來問他如何種水果、劑量怎麼調之類的知識與技術性問題，但更多的是問會長「接下來的抗爭，我們該怎麼做？」對方經驗不足，知識不夠，沒有策略，所以來詢問。另外，田野第九天(1/14)，口湖鄉公所關於謝厝反變電站抗爭的調解會結束後，我與會長、謝厝村村長、謝厝反抗團體的正副會長、一位婆婆、另外幾個謝厝居民一同前往位於謝厝的國興機車行<sup>12</sup>，那是他們議事討論的場所。過程都是

---

想強調的是，一個充分討論的場域，並沒有被落實。

<sup>11</sup> Celeste Friend 整理了洛克的主張：「如果一個政府的行政權變成了暴君……等於說暴君把他自己(從國家狀態)推向了自然狀態……對於行政權力的證立(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executive component of government)取決於政府對於人民財產與福祉的保護(Friend 2010)。」

<sup>12</sup> 國興機車行是謝厝反抗團體羅召集人的店，這是他們議事的場所。當天調解會結束後，我隨

台語，雖然聽不大懂，但他們頻繁地問會長「那接下來呢」「後續呢」之類的策略問題。面對這些面向未來的問題，吳會長當然從容以對。請教本身可能也證明瞭他們對於抗爭規劃的不理解。

國興機車行的談話有兩個小插曲凸顯了有限的理性。第一，謝厝反抗團體的會長不清楚廠商收賄，吳會長又驚訝又激動「你居然不知道？」隨後給對方惡補一番。這是對於脈絡的不理解。第二，婆婆坐在我們旁邊，趁著話題輕鬆，說了一些話針對廟方在光電議題上持不同立場的看法，吳會長馬上嚴肅起來：「妳聽我說一句，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我們做這樣我們開心，不要在言語上有分裂。炮口一致對外！」（訪談錄音，吳連進，2025/01/15）

包括吳會長本身也曾經是有限的理性<sup>13</sup>：那當時（剛回來抗爭）我也是一樣，我就是抗爭陸域風機，我對太陽能是一竅不通的，太陽能板的製作過程、包括它裡面的重金屬、包括它的法源、包括農民的權利。（訪談錄音，吳連進，2025/01/16）

理性上的限制，多半是結構性的。飯桌上閒聊倒無所謂，但若要拿上檯面對撞廠商、政府與體制，抗爭和能源議題所需要的知識門檻並不低。從政治、社會、法律、統計、到科學、甚至宗教、人心……知道越多不一定有好處，但甚麼都不知道就是死路，抗爭根本走不下去。如果無法從單獨的個人跨越到社會的一份子，就無法理解這些知識，也無法意識這些知識的重要性。跨越結構是需要機緣的。吳會長在友人的協助下，超脫了原有結構對它理性上的限制，成功跳進入了更大的結構性思考。至少吳會長知道，「不要只是訴諸悲情」，這是他在國興機車行跟我講的話。我認為吳會長所謂的悲情就是代表個人的，或是代表一個範圍甚小的地區所迸發的強烈情緒，或也可以理解為只能說出「你在欺負我的家園」等情緒抒發。

節錄與吳會長訪談中的一小段做為地方認識受到限制的收尾：

（一般人會想：）「我只是一個百姓，我只是自己的村莊，你談到整個口湖、談到整個臺灣的能源問題」他還是一個頭兩個大。他還是一個頭兩個大。雖然他們（謝厝）是在抗爭升壓站，但是我說升壓站建制完整之後，它所影響的就是 120 公頃再上去，未來可能會更多。那 120 公頃的土地就是在你們口湖周遭，也可能是你們謝厝周遭的旁邊的土地，那嚴不嚴重？那你們只要抗爭升壓站，其他的人不管？（一般人一時）也沒辦法馬上接受：我自己都泥菩薩過江自生難保，我怎麼去保護到其他人？然後我再跟

---

吳會長的車，開著開著就到了國興機車行。進去之後，往裡頭走我坐在會長旁邊，對面是謝厝反抗團體的正副會長以及羅召集人的夫人，周圍還有謝厝村村長、幾個居民。調解會，以結果來說不算調解，而是謝厝單方面的訴求表現。調解會結束後，大家討論後續走向，例如會不會被告、接下來的策略、以及連絡彼此關係的談話。

<sup>13</sup> 這不是說吳會長此刻是全知全能，只是相較之下，曾經吳會長也處於非常有限的理性之中。



他們（一般人）講一些，風力發電跟太陽能板的一些東西之後，他們（一般人）才恍然大悟，他也是提出之後我才解釋給他聽。他才恍然大悟……。（訪談錄音，吳連進，2025/01/16）

除了討論缺失和知識障礙之外，會長在抗爭中看到的問題是地方權利嚴重受損。

### （三）地方權利嚴重受損

「那我認為人少也該死嗎？不應該，人少一樣享有權利」（訪談錄音，吳連進，2025/01/15）根據雲林縣戶政資訊網的統計資料，以雲林全縣來看，十年來家戶數目雖成長<sup>14</sup>，但總人口卻下滑<sup>15</sup>。吳會長所處的四湖鄉也是相同情況，十年內人口數少了將近三分之一<sup>16</sup>，死亡遠高於出生，幾乎年年遷出大於遷入。第一天到達田野地，當地人帶頭導覽，走到某國小旁，他也提到嚴重少子化的問題。該國小旁邊有不少房子，只有架構，沒有人跡。聽說是國小盛況時期蓋的房子（田野筆記，2025/1/6）。

權利，好比言論自由。釋字 509 號理由書：「言論自由有……溝通意見……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與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大法官解釋：行政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我認為，民主的內涵之中，有效、高品質的討論永遠不可省略。討論不是形式的簽名，也不是一包米與一罐醬油；而是利與弊的坦承，在道理上去碰撞、說服、或調和彼此。拒絕一個恣意的公部門意志，拒絕受他人意志的宰製，這至少是現代意義下人權的核心。政府與能源公司雖然沒有積極法規作為，堵住民眾嘴，但也透過一些小動作，如扣吳會長在北部公司的錢、高層開支票給會長叫他安靜離開、或是消極地不談論能源利弊只求法律形式要求上的「同意」而忽略實質討論的「知情」。

權利是對人的預設，認為不管人多人少，不論貴賤高低，都有權利？還是說，權利指是一種口號，煽動情緒的工具？當體制內的討論缺時或無效的時候，吳會

<sup>14</sup> 民國 92 年 210,39 成長至民國 113 年 253,114（雲林縣戶人口資訊網 2024）。

<sup>15</sup> 民國 92 年 740,501 跌落至民國 113 年 658,427。從民國 96 年開始，死亡人口超越出生人口。並從民國 92 年開始，幾乎年年遷出人口大於遷入人口。人口流失的現象不可忽略。（雲林縣戶人口資訊網 2024）。

<sup>16</sup> 民國 92 年 29,382，民國 113 年 20,698。（雲林縣戶人口資訊網 2024）。

長選擇以體制外的溝通方式。體制外的聲音也是聲音，也是權利的一部分。但這份權利在有權勢者面前會是什麼意義？

那當年（2022）的開工日，我們的總統蔡英文上班的第一天竟然跑到台西來，那她是一個屬於一個不公開的行程，而且是跟這家公司在一起。

那我就號召人了，我就要堵她了，堵不到啊，怎麼會堵得到？因為我們不是說一定要堵到她啦，我們原則上我們希望說，**你在選舉的時候每一隻手都要握到，希望大家支持你成為臺灣的總統，但是我現在要跟你陳情為什麼要離你那麼遠？而且我是被阻隔在三公里外。**

那你整個維安系統跟警務人員也是（原本）跟我協調好的，大概距離總統一百公尺，讓總統看得到你。後來因為某種政治力的介入，把我阻隔在三公里外。那場要去陳情的方式就全部亂了套。……因為他們是事先跟我協調好的，「那會長我們給你一個距離，大概在哪裡哪裡」，那這樣我可以接受。那結果到當天早上的現場是完全他把整個承諾毀掉，整個承諾毀掉了。所以我對他們還是蠻不滿的，後來他們的長官當然隨行長官有我一直跟我抱歉。我知道這個不是他能力能解決的，也不是他可以改變的。那我也不為難他們。那我知道因為是政治力的介入，很大的政治力介入在這一塊，不能讓這個自救會直接碰觸到。因為我抗爭的物件跟總統在那裡，我抗爭的廠商跟總統在一起，所以他不願意聽到不一樣的聲音。（訪談錄音，吳連進，2025/01/10，粗體為我所加）

選舉時的握手是個隱喻。重點是說，選舉時所在意的人是個抽象的選民，而不是實際活生生的人。

我認為，從這裡可以看到更大的問題：所謂的不可分離的人權，是保護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抽象的人；各類宣言上的不可分離，但實際上的作為卻是，缺乏自己的政府的保障，就沒有權威能夠保障最基本的人權。失去公民權，就是去了人權，即使他們身在一個人權憲法的國家（Arendt 1948[1995]：413）。當然，吳會長與四湖鄉所經歷的是還不到「沒有公民權」這番境地，但是會長有多次提到「沒有知情權」、「沒有說不的機會」，以及蔡卓霖文中提到：「法規要求說明會之下，也能透過一些手段來製造證明文件」（蔡卓霖 2024：86），再結合「選舉時每一隻手都要握到，陳情時卻相隔三公里」，很難不做聯想，也很難不認為其實四湖鄉（應該說能源政策下的在地反對者）的各位其實也被剝奪了某種顯著程度的公民權。所謂的人權與執政者的關心對象也只屬於「抽象」的選民，而非在土地上真正生活的人。

對於危害的解讀，例如以本文討論的能源議題中風機可能附帶的危害，其實有不同於傷害權利的解釋。站在經濟分析（economic analysis）的角度，最佳經濟配置財是一切的重點。聽起來理所當然，但卻在解讀危害上有巨大的「創見」。從權利或是人權的角度，施加危害、或任由危害發生，本身是有問題的、是可以質疑的。一個政府事前不做功課，導致品質低落的政策傷害人民的身體、財產、權益，這是在破壞人民被憲法所保障的權利，破壞國家與人民之間的正當關係。一個廠商不經過調查與研究所發行的產品傷害了顧客的權利，這是破壞憲法所保護的第三人權益，規範非公權力的人與人之間的正當互動。但站在經濟分析的角度來看危害，一切取決於怎麼分配資源才能達到最高效益。如果事前研究政策與產品安全性、或是事前提高安全性的成本高於事後因低安全性而引發的事故賠償成本，那麼事後賠償會是最佳途徑（Ripstein 2022：09）。即使政府與廠商早就知道政策與產品存在危險，危害不一定真的是會「被認知」為危害，如果民眾或使用者對這些危害無感、毫無察覺、或認為可以接受，對政府與廠商來說，或許就沒有事前檢查的必要。也可以說，讓使用者自己找出危害，比事前自己盤算來的高效。首要考量永遠是最佳資源配置，如果強大的訴訟團隊來處理賠償官司、或是米與醬油、或是直接收買，這樣的法律事業或手段是值得投資的話，在經濟分析的角度，廠商誰？就會這麼做。而所謂的賠償，在經濟分析來看不是悔改，而是買下危害發生的機會。如果考量權利的成本太高的話，首要考量的不會是活生生的人的權利。

那（吳會長在三重經營的）公司就真的扣，扣很多，從很多管道扣，扣很多。包括當時非常高層的院長，透過開始用金錢的利誘，然後開出條件要你離開了、離開四湖、離開雲林，回去臺北。那如果你們的利益沒有這麼大，為什麼要開這麼優厚的條件？錢隨便你開、工程隨便你寫？而且這些講這些話的人，從政治力都是……而且他相關的人員來接觸我都是非常有檯面上的人物。那如果沒有利益、沒有瑕疵，你們怎麼會願意這麼做？那我就覺得事情不對。既然事情沒辦法解決，而廠商的手段，除了這麼多之外還去動員到還是動到這麼高層的關係，那表示這件事情不簡單。那我能退嗎？我沒有退。後來真的毅然而然真的把公司結束。結束之後，真的沒辦法，事情……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那我必須在這邊還是要在這邊（雲林）。（訪談錄音，吳連進，2025/01/15，粗體為我所加）

顯然，吳會長選擇以一個社會的人，發會他的力量，留在雲林承擔挑戰與任務。他選擇站在活人這邊，持續掀起討論、分享知識、填補權利空缺，希望喚起家鄉人的意識。

那這個〈述亡國詩<sup>17</sup>〉就是引述到我當時的情景，我的故鄉面臨陸域風機的侵略，而且這種侵略，它是會造成你以後非常巨大的嚴重影響，而且是必須當地去承受苦難。那我把它引述到戰爭，就是說我已經跟你們（政府與廠商）在戰爭了，那你地方這些掌權者，就是好像是包括地方的村長、代表、社區理事長、鄉長、所有的人，怎麼跟當時花蕊夫人的境遇是一樣的？大家看到這家公司都是豎降旗，難道真的沒有一個是男的嗎？

所以我就把這首詩引述在我抗爭的心境，然後去告訴鄉親。我去告訴鄉親，你們要不要捍衛自己的家庭？你們真的是要投降？（訪談錄音，吳連進，2025/01/10）

## 五、抗爭中的道德責任

為什麼會吳長對家鄉有如此強烈的連結？如同前言所說，抗爭的代價很大。願意撇下人成就與家庭，回到家鄉對抗一個超越自身的結構與體制，這背後是什麼在支撐？我認為可能的結論是一種道德責任。家鄉已經成為他的責任，擔起責任是一種道德表現。

理論上的解釋框架，James Laidlaw 提供了一些洞見。從 agent 這個字所指涉的概念開始，Laidlaw 展開他的道德理論。本文第二節提到：Latour 的行動者網路理論，當中也出現 agent，無論生命非生命，都可以是 agent，都在展現各自的性質，並透過這些性質在空間的碰撞，彼此產生因果；這是一個去人中心的觀點，因果網路的連結與運作其實是超越人的思考之外的，不光意志與意志之間，人與非人、物質之間也相互影響。在 Latour 的理論中，agent 持續發揮其因果作用，與其他 agent 共同組成網絡；中文翻的很好，agent 是能動者，各物質不論人或非人，都是能動，能產生影響的與因果的。但 Laidlaw 反對這樣的 agent。他認為物不應該只是因果鍊條的一個環節，而且這樣的因果關係也只是人類學家自行看透的。

Laidlaw 提倡，應該拋棄「令人費解」的因果網絡，回到 agent 本身的字義。agent 的原本字義是代理人<sup>18</sup>：好幾個人同時扮演同一個角色，一同成為擁有一致

---

<sup>17</sup> 述亡國詩（五代，花蕊夫人）：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中華古詩文古書籍網 2017）

<sup>18</sup> 國內社會科學界常把 agent 翻譯為「行動者」。雖說我使用的書籍為簡體中文，但是此處的翻譯成「代理人」，我覺得並不是兩岸使用差異，而是 Laidlaw 本身就有意脫離學界對於 agent 的

利益與目標的一個角色 (Laidlaw 2014[2022]: 211)。這裡必須說明, Laidlaw 可能是為了還原 agent 的原意而在該頁上只提到了不同的人成為同一角色。但實際上, 在後續的文本中, 不光是不同的人, 連不同的事情與物品都可以成為 agent。所以我認為, 人、事、物, 在 Laidlaw 的理論中, 都可以成為 agent。

人跟土地是不可分割。那我在這邊(四湖鄉)的條件不好, 土地本身的條件不好, 那還是沒辦法分割。我們的土地可能一甲地在臺北買不到, 臺北.....臺北市買不到五坪的土地, 你一甲地買不到五坪。你可能這邊的一甲地可能五百萬, 那臺北有的土地就一坪就好幾百。(但是)那沒辦法比較, 土地的價值沒辦法用金錢去做衡量。完全沒辦, 完全沒辦法用金錢去做一個對比去做衡量。

那這一代的人, 我們這一代的人跟土地有感情。(訪談錄音, 吳連進, 2025/01/08)

在我的詮釋, 吳會長與他的家鄉已經是 Laidlaw 所謂的代理人關係了。家鄉的土地已經成為吳會長的一部份。

Laidlaw 把焦點從因果網絡, 轉移到人的身上, 同時又不過分忽略物質與非人的存在意義, 這是關鍵的一步。人與非人與物質是相關聯的, 同時人的重要性又被深刻地關注了: agent 的概念讓人超脫於原本的框架, 或是說, 「我」的存在不光只是皮膚下的我, 我以外的人、事、物都可能因為某些原因而成為我。可以說, 這個觀點讓「我」擴散了<sup>19</sup>。在「我」蔓延出去之後, Laidlaw 把討論從我的範圍拉到的更高的層次: 我以外的人、事、物如果成為了我的 agent, 我就要為此負責。

Laidlaw 所舉的例子, 多為「我的 agent 犯了錯, 不論故意或是過失, 我因此為我的 agent 負責」, 很明顯案例都是 agent 的積極行為。但我認為, 在 Laidlaw 對於 agent 的觀念裏頭, 負責的觀念不應該只限於對於 agent 的積極行為, 更應該包含在 agent 遭受的被動行為, 例如我的 agent 遭受不公的對待, 我應該要付責任來保護我的 agent, 就好像保護我自己一樣。(ibid: 216)

如果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也是要捍衛自己, 保護自己臺灣。那如果把它縮小版, 不管你現在是誰執政, 你侵犯到這個地區的生存權, 那你要

---

界定, 並回到 agent 本身的詞意, 也就是「代理人」。

<sup>19</sup> 這讓我想到了 John Locke 對於財產權的界定: 透過勞動獲得的物將成為你的一部分, 是你人格向外的投射, 該物成為你的一部分, 所以成為你的財產。不過 Locke 與 Laidlaw 還是有差別, 前者認為投射的前提是勞動、投射的結果是成為財產、而且投射的標的可能只限於物, 後者則沒有明說在何種機制下人事物會成為我的 agent、成為 agent 也不是成為個人財產, 而是我得延伸。最明顯的是, agent 可以是物以外的人與事。

不要叫這些人起來反抗？當你的國家遭受侵略的時候，你一定呼籲所有的國人反抗保衛自己的臺灣保衛自己的國家，但是當縮小之後，當你的家園遭受到掠奪，遭受到侵犯的時候，如果以這樣的比例原則來看，你要不要站出來？（訪談錄音，吳連進，2025/01/15）

Laidlaw 對於 agent 的觀點在責任的討論上有積極的意義。有趣的是，本文參考的篇章名稱正是〈認真看待責任〉(Taking responsibility seriously) (ibid: 201)，可見 Laidlaw 也有意把「我」、「道德」與「責任」三者並置討論。我們對於什麼是或不是屬於我的 agent，這樣的判定並不是 Latour 的行動者網路理論中的客觀因果關係，而是道德詞彙，如責任。

重新思考吳會長說的這幾句話，責任已經體現於其中。

那我能退嗎？我沒有退。後來真的毅然而然真的把公司結束。結束之後，真的沒辦法，事情……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那我必須在這邊還是要在這邊（雲林）。（訪談錄音，吳連進，2025/01/15）

「毅然而然」，只要吳會長談及抗爭初期的心境，大概都會聽到這四個字。除了顯現一種巨大的決心，在我看來，這是道德責任。收掉公司，離開家人，一肩扛起四湖反抗的領頭位置，面對暴力、漠視，對抗公權力與大資本，會長大可不必這麼做。但責任所在，在所難免。

關於吳會長擔起責任的分析，蔡卓霖的文章（2024）有所著墨。四湖居民對風電的冷感，多半是早期台電示範風場的形塑結果。示範風場多為國有土地，無人居住、土地惡劣的環境；雖看得到，但危害甚微，「只有幾個居民向我表示『看起來很奇怪。』」蔡卓霖如下精闢總結台電示範風場是「最有感、也最無感」的四湖鄉建設。民眾看得到卻體會不到，也就不會對風電有想法。四湖鄉長期公共意識低落，再加上台電示範風場的形塑，形成了吳會長所說的「自掃門前雪」的氛圍。而吳會長「雞婆」的個性，透過成為一個公共的人，不畏懼且全公開，成功將風電議題公眾化，改變四湖居民的冷感態度。（蔡卓霖 2024：71-74）

我贊同蔡卓霖的分析，會長也不斷提到，抗爭初期「議題沒辦法打出去」的問題。透過一次次的廟口宣講、宣誓大會，老人家從家裏走進了一個更大的社會。不過，不同於蔡卓霖以想像以及本體論的觀點，在我的報告中，吳會長的這份努力，成為我討論的標的。吳會長的付出是道德責任，「我的家園遭到掠奪」、「他們的寄託可能也會在你的身上，那你可以離他們而去嗎？」、「把議題打出去」這些話的背後是責任，若不這麼做，四湖、雲林，這些與會長有深刻且強烈連結的土地，這些成為吳會長生命中一部分的土地，將要逝去。

接下來可以問的是：這個責任怎麼來的？吳會長為何與四湖、雲林有那麼深的連結？除了生長之地以外，還有沒有其他更深層的原因來促成這樣的連結與自我投射？Laidlaw 的理論中，責任如何連結 agent 並回歸到「我」身上，其實是取決於「我」；這是一個「自我」的問題，一個人如何界定與理解自己的問題。Laidlaw 介紹了 Dan Cohen (2006) 的理論來作為補充：「雖說我們對個人道德行為的責任不僅源於行為的因果作用，也要求……出自於自己之手。」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便很一致地來劃定自我的邊界。我們在自我構成實踐中是參與者，而不是控制者。這些自我構成實踐包括道德和法律。自我的邊界不斷地在變化、不斷地在被重新劃定」(Dan Cohen 2006；轉引自 Laidlaw 2014[2022]：220)。Laidlaw 對此的總結更為精確：「所以，同一個過程在劃定自我邊界的同時，也確定了行為責任所屬」(Laidlaw 2014[2022]：220)。對此我的理解是，人事物如何成為我的 agent、成為我的一部分，關鍵在於人的自我界定。有了界定，有了 agent，才有討論責任歸屬的前提與空間。

在界定上，很明確已經有與土地的連結。但界定不光是空間上的，自我的界定與認識同等重要。自我邊界的界定過程，一個人的名譽、對自我的理解以及性格上也不斷變化。(ibid：221) 而自我界定、責任、和道德，這些展現的是社會關係。(ibid：222) 吳會長如何看待自己在社會關係的位置，這一點非常關鍵。

寫到這裡，我已經把我想講的都說了，接下來的就是超越知識的體會。體會吳會長的生命、「力量」、與「社會的人」。

因為我們已經走到一個，包括我的社會歷練、包括我整個人生，到現在。我雖然不是一個很成功的人……那過去是這樣子，然後英雄創造時勢嘛，那時勢可不可以創造英雄？過去我們會說時勢要創造英雄，那我要把它轉過來就是英雄要創造時勢。那你要有一個人要有機會碰到守護故鄉，那你為自己的故鄉去付出很難，可能一輩子碰不到一次機會。那既然這個機會在你的手上，你要怎麼去把它完成你的後半輩子的使命？

後半輩子的使命，那這個會成為你後半輩子，包括你離開人世間之後會不會成為留下一個名聲？那如果你半途而會造成什麼結果？你就是臭名。你就是一個臭名，簡單來講就臭名。就像引述到像、像過去的民進黨，很多人為了臺灣的自由，包括鄭南榕他犧牲他的性命在捍衛言論自由，那很多人為了臺灣的正義而犧牲他的青春，那如果轉換回來我們是不是一樣，我的故鄉面臨了危機的時候，那誰願意站出來捍衛你的家園？

那如果我願意站出來捍衛家園，那不管他的結果如何，只要我的原則跟我的初心不變，那這個到時候有一天我不在了，我回去了我要不要見我的家人？我要不要面對我的祖先？我要。

我不管你年輕的時候做了什麼事，那在你有生之年你可以去為地方捍衛，那你可以為了你的故鄉去付出，那就算你犧牲了生命，那你可以很光榮的去面對你的未來，以前的先人，包括你會把你所做的、包括你的堅持、包括你在這段人生的最後的旅程中的這個名字，留給你的小孩，留給你的家族。

我們不是成功人士，但是我們要的我們的家族有一個人，他是做了什麼事？那這個會牽扯到我整个人生的後半階段，這個絕對會影響，那如果我今天不這麼堅持，我不這麼霸氣，我不成為獅子，怎麼會有這麼多的不管是媒體或是一些人，想透過一些管道想去瞭解我？包括你們（文化田野課）也是一樣，那就是因為在這個故鄉有一個很特殊發生的事件讓大家去注重。那如果不是透過媒體社群報導，如果我是那隻羊、我是一個羊帶著這些獅子，那現在不會有今天的你們來訪問我。你們想探討我，那就是因為我要成為獅子，我要帶著這些羊，因為自己的……從頭到尾維持不變、維持不變，所以才能今天這麼光明正大，我四處可以去，我四處跑，而且是很公開的，把自己沒有秘密、掀開。這個很重要。（訪談錄音，吳連進，2025/01/10）

雲林、四湖不只是農業縣市、統計報刊上的嚴重外移、少子、老齡地區、一塊吹著強風適合蓋風機的平原、被國家忽視的地區、也不只是抽象選民組成的票倉，它同時也是養大吳會長的土地，上頭有從前已故家人們勤苦耕耘的回憶，這片土地也牽連著吳會長此刻的家人。所有的公開、光明正大、成為獅子、堅持與犧牲，「力量」、「社會的人」是都責任，而責任的意涵是對過去、現在、與為來的人有所交代，不管是留個名、或留個紀錄。多少有虛榮成份，但名譽之後，是建立一個完滿的社會關係。不論這個社會關係裡的主體是家人、鄰居、媒體、學者、廠商、國家、家園、還是自己，在我看來，吳會長的道德責任是認真對待每一個關係。不能隨便，不能馬虎，不能受利益誘惑，不能被授權勢擾動，該罵就罵，該愛就愛，該守護就守護，該抗爭就抗爭；只有「大是大非」。

個人名譽、自我理解、社會關係，再到「agent」、「道德」、「責任」，Laidlaw的這一套理論還是想回答一個終極問題，我也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什麼樣的人生是有價值的？（ibid：002）這個問題在《以德為體——關於道德與自由的人類學》此書的第一頁就被提出了，可見其重要性。



什麼樣的人生是有價值的，我也很好奇吳會長會如何回答，所以我在田野最後的訪談問了三個問題「您想要什麼？以一個自救會來說，怎麼樣才是完成？」、「不以吳會長的身份來想，以吳先生的身份來想，您個人想要什麼？」、「您滿意嗎？到目前來看。或是說，走到現在回看過去，您會怎麼評價」。

訪問的當下，吳會長的回應讓我覺得非常出乎意料。但行文至此，多少能感同身受。

「把他所有的陸域風機擋下來」、「吳連進……未來會不會成為……故鄉的公共財？」、「號召有志之士、年輕人，共同關心西海岸……正式立案？」、「成立真正的協會？」、「那來帶領另外一群人對這塊土地的付出，或是守護，那也有可能啊」、「那在抗爭上我是不滿足，因為這個政策沒有轉變，再生能源沒有臺灣的能源沒有做調整，我怎麼會滿足？那對廠商來講我當然是永不滿足啊！」、「……因為整個臺灣的能源政策還是維持不變，它沒有碰到、它沒有調整說，因為臺灣這麼多的抗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或實際的影響，沒有調整，而且是變本加厲。那到時候受害的是我生活在這塊土地的百姓、共同生活在這裡的人所要承受的……」

## 六、結論

如同我在第一節所說，從會長最後的回答可以體會到「力量」與「社會的人」兩個特質。如果放在道德責任的觀點來看，這樣的回答一點也不怪。

蔡卓霖的報告（2024）從想像的角度出發：「人們透過想像中的風機形成論述，這種想像同時是關於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蔡卓霖 2024：104）。力量和社會的人，在蔡卓霖的觀點來看，是基於想像的。

我的出發點，則是道德責任。在想像與論述之外，還有一個道德責任；而道德責任，展現的是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瞭解自己在社會關係之中的位置。

有力量，不一定要把這份力量用在社會之上。吳會長在北部有家庭、有事業，他大可不必回到雲林重新開始。所以，回來的決定、堅持不懈的努力、以及會長說的「毅然而然」，除了本身個性「雞婆」之外，我覺得是道德責任在支撐。雲林、或是四湖本身，在會長的生命之中，已經成為了會長的代理人、成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不可割捨。因為是自己的一部分，所以妥善地保護，變成了責任。而責任的履行，就是道德的展現。

會長履行責任的方式，我認為是認真對待每一份社會關係，不論這個關係中的對方是土地、家人、鄰居、媒體、學者、廠商、國家、還是自己。我們是同一陣線，是朋友；我們是戰爭狀態，是敵人。他不從利益的角度，而是以「人」的觀點來解釋、瞭解每一段關係。然後基於這樣的瞭解，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擔起道德責任，把力量用在由每一份社會關係所處成的社會上，好好地對待他碰到的所有人、事、物。

## 參考資料

Arendt, Hannah

1948[1995] 《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林驥華譯。台北：時報出版。

Friend, Celeste

2010 Social Contract Theory.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iep.utm.edu/soc-cont/#H6>, accessed 2025 May 16.

Laidlaw, James

2022[2014] 《以德为体---关于道德与自由的人类学》（*The Subject of Virtue: An Anthropology of Ethics and Freedom*）。吳迪、邱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Through a glass, darkly.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6 (2): 17-24

Ripstein, Arthur

2022 Theories of the Common Law.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tort-theories/>, accessed 2025 Jun 2.

Ortner, Sherry

- 2016 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theory since the eighties.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6 (1): 47-73.

不著撰人

- 2017 〈述亡國詩〉。「中華古詩文古書籍網」，  
[https://www.arteducation.com.tw/shiwenv\\_735cd68d3a80.html](https://www.arteducation.com.tw/shiwenv_735cd68d3a80.html)，2017  
年 10 月 8 號上線。

林吉洋

- 2020 〈風機吞噬四湖鄉 01〉26 座高塔佔據聚落，風頭水尾就得任人割？  
居民奮戰反風車〉。「上下游」，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43478/>，2020 年 12 月 24 號上  
線

蔡卓霖

- 2024 〈原野的呼聲----四湖鄉再生能源地景的論述與想像〉。刊於《風頭水  
尾----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  
頁 67-132。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雲林縣戶人口資訊網

- 2024 〈歷年人口數〉。「雲林縣戶政人口資訊網」，  
<https://household.yunlin.gov.tw/popul05/list.aspx?Parser=99,7,59,.....,....1,....18>，2025 年 6 月 3 號更新。

黃種瀛 楊宗穎 吳建宏

- 2021 〈5 煞夜闖民宅 反風吹自救會長姊弟遭施暴〉。「華視新聞」，  
<https://news.cts.com.tw/cts/local/202108/202108112052598.html>，2021  
年 8 月 11 日上線。



## 箔子寮海廢中的環境符應：再利用的垃圾人類學初探

黃則鳴（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sup>1</sup>

### 摘要

本文以台灣雲林縣四湖鄉箔子寮聚落普遍存在的廢棄物再利用為例，探討這些獲得新生的物件如何映照出當地居民對環境變遷與產業沒落的適應，形成環境與人的「符應」(correspondence)，乃至於廢棄物再利用得以成為社區記憶的一部分。自二十一世紀來，隨著沿海淤沙與海漂垃圾加劇、牡蠣養殖與漁業活動衰退，廢棄蚵棚竹條、大量塑膠與浮具殘留在沙灘上，形塑出獨特的「廢棄物景觀」。在田野調查中，我觀察到居民出於實用性或裝飾性的動機，將這些海廢物件再利用於圍籬、民宿裝飾與社區彩繪等用途。這些行動不僅回應了生活所需與資源可得性，也在某些情境下反映出活化地方景觀與社區連結的追求。透過結合「垃圾人類學」(waste anthropology)的理論視角，本文關注物件如何在被丟棄後仍具有類別轉換的可能性和社會意義。地方居民的再利用行為，既非單純出於環保意識，也非純粹響應國家治理，而是在物質條件與社會關係中逐漸形成的實踐型態。本文指出，面對環境治理的破碎化與行政權責分散，地方居民的主體行動與創造性實踐提供了觀察廢棄物社會生命的切入點。箔子寮的例子顯示，海廢不只是污染物，更是凝聚地景記憶、反映出當地人與環境相互共振的物質媒介。

關鍵詞：符應，垃圾人類學，環境變遷，社區記憶，治理破碎化

---

<sup>1</sup> 本文係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課程之期末報告，特別感謝黃郁茜老師與郭天祐、盧佳秀助教的指導與帶領。也謝謝箔子寮居民蔡茂源大哥、蔡茂昌大哥、箔東村村長蔡心娜女士、福建熱炒老闆與老闆娘、三條崙海清宮林彩雲女士、雲林縣近沿海作業漁船協進會總幹事黃正鎮船長、三色屋民宿老闆張景山大哥、漁民吳文華先生、蚵戶吳克敏先生、蔡忠誠先生、蔡吳金女士、蔡慶良先生、蔡秀華女士等人對我們熱情的招待和協助。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 一、前言

箔子寮的物質面貌或許在環境與基礎建設意義上較為豐富，前有眾多台灣西部沿海各地重工業區、生態保育、再生能源與鄉村人口邊緣化的研究、數不勝數，後有本課程上一屆田野計畫的兩篇論文，其一為水利治理與情感（郭天祐、劉曉語 2024），其二為再生能源與主體想像（蔡卓霖 2024）。這一地理區域北鄰麥寮鄉六輕離島式工業區，從簡單的現代性批判來看，工業開發的交換代價（*quid pro quo*）即是剪刀差剝削、人口結構失衡、環境污染。這些單獨面向皆有不少研究著文（王俊凱等 2023；李載鳴等 2008；陳柏謙 2017；鍾秀梅、鄭亘良 2017），唯相對缺乏當地人視角。上述二文映照出的是當地面對環境治理的情感（*affects*）和環境政治（*ecopolitics*）的情感，之所以認為六輕工業區是重要背景因素，主要來自本文的田野經驗和文獻脈絡建構：有相對充分的理由說明，箔子寮自二十一世紀後經歷的政治變化、不論是自國家機器外延到地方的成分或地方自發與國家治理體系的互動，皆是在許多層面上回應（*react*）工業區的存在（*presence*）。

本文的主題起於一條來自箔子寮當地的傳聞：「有居民使用海邊廢棄的蚵棚竹條來做圍籬」。垃圾／廢棄物人類學（*waste anthropology*）雖然是直覺上最合適的主題，但文獻回顧後卻發現「再利用」的研究案例為數甚少，且發現大多聚焦於各式廢棄物本身的研究皆進行在 2010 年代之後（Alexander & Reno 2012; Gordillo 2014; Harms 2016; Alexander & Sanchez 2018），這意味著來自人類世（*Anthropocene*）話題的各種新自由主義批判色彩已經是該領域的基調，這些研究確實相對缺乏描述當地人面對開發污染和環境變遷時，各種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自發的行為反應。

經數月後凝結田野材料與文獻，本文將脈絡聚焦在箔子寮的海洋廢棄物再利用如何與產業沒落、環境變遷、社群互動及治理問題交織，透過海洋廢棄物再利用的動機與模式來嘗試說明當地人在家鄉不斷變動之中，如何適應以及創造新的生活面貌，甚至：這些再利用行為如何映照出當地的變遷背景和當地人的適應反應。

為期不到兩週的微型田野，各個報導人都提供了一塊拼圖，我旨在將海沙淤積、漁業和養蚵業沒落、人口外流和社區營造的幾個因素串成一片關係網，最終說明廢棄物再利用如何以不同姿態映照出這些環境氛圍（*aura*）。

## 二、文獻回顧

### (一) 垃圾／廢棄物人類學

人類世 (Anthropocene) 最初是地質學中針對人類在近當代史中留下地層痕跡的斷代問題 (Zalasiewicz et al. 2015)，隨即在人類學界中引發又一波物質與能動性的討論。有關於人類世的研究當中，有許多圍繞著廢棄物的現象展開，不論是海洋塑膠垃圾的污染問題 (Rangel-Buitrago 2023)，或是全球南北方國家在垃圾處理上所展現的發展不平等 (Choi 2019) 皆此。可以說，廢棄物是又一能夠側面照映出全球化與現代化問題的物件，藉此展開了「垃圾／廢棄物人類學」(waste anthropology) 的討論。Alexander and O'Hare (2020) 回顧過往文獻，將垃圾人類學框定出三個理論面向：符號結構論 (symbolic-structuralism)、經濟物質主義 (economic-materialism) 和後人類意義上的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e post-human)。

文化人類學中最早直接討論有關「污染」概念的是 Mary Douglas 在 1968 所著的 *Purity and Danger*，他直接將髒污 (dirt) 定義成「錯位的物質」(matter out of place)，比如一條襪子本身並不盡然是髒的，但當一條襪子出現在一片塗滿奶油的吐司上面、跟著出現在衣櫃裡時，就會形成「污染」的意義 (Appleton 2021)。他採取了類似 Lévi-Strauss 的符號結構論觀點，以符號之間的關係來說明文化禁制。後繼於此的理論大多著重在被視作「不潔」的人與身體部位有關的物件上，如月經來潮的女性、印度低階種姓、撿骨師等 (Jewkes & Wood 1999)。Julia Kristeva (1982) 從精神分析論的角度分析，認為之所以髒污時常跟身體部位有關，可能暗示了人對於「身體界線變得模糊、內外顛倒、體液滲出」天然具有排斥心理。Valerio Valeri (2000) 在印尼東部一個狩獵採集社會的田野中發現，不一定所有的文化分類異常都是「污染」、而一定所有的「污染」也都是文化分類異常，藉此認為 Douglas 的結構論有所缺失。

Michael Thompson 於 1979 年所撰之 *Rubbish Theory* 則將焦點轉向廢棄物在經濟活動中扮演的作用。他提出了一個三分法，將在人際之間流通的商品 (goods) 區分為：隨時間而貶值的暫時性商品 (transient goods)、隨時間而升值的耐久性商品 (durable goods) 以及既不會升值也不會貶值、完全沒有價值意義的垃圾 (rubbish)。他以織畫 (Stevengraph) 在歷史上不同階段的市場流通性作為例子，說明同一種物件在不同的時代意義下可能經歷劇烈的價值類別轉換。在這個意義下，「垃圾」仍然是在有主人的情況下存在、仍然未被丟棄，只是失去了經濟價值。Zsuzsa Gille (2007) 提出了廢棄物政權 (waste regimes) 的概念，說明單一種廢棄物的處理方式可以側照出國家對於所有廢棄物的單一態度；Catherine

Alexander 和 Joshua Reno 合著的 *Economies of Recycling* (2012) 則討論循環經濟如何鬆動全球化市場對於流通物的概念；Gastón Gordillo (2014) 以土地開發產生的碎礫石作為社經環境變遷的切面來看區域發展不平等、Erik Harms (2016) 則關注「廢地」的轉變。這些面向都闡述了廢棄物的物質性與國家力量、市場活動、文化意義的交織。雖然 Catherine Alexander and Andrew Sanchez (2018) 認為仍然存在一種介於廢棄物與有價值之物之間的模糊空間 (indeterminacy)，物件在同一個社會環境下可能產生多元的價值類別，即英語諺語 *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這點與廢棄物本身的物質性密切相關，如同穀物處理廠所廢棄的穗殼可以進入循環體系產生其他用途。以上觀點也可作為垃圾本體論 (ontology of waste) 的啟發。

Schlehe & Yulianto (2020) 在印尼日惹的田調即探討了當地人與垃圾的日常關係和他們對於「環境」的態度。他們發現當地居民並不那麼在意政府的政策宣傳和自然環境的保護，而對身邊立即可感的社會環境有著較靈活的反應。垃圾不但是階級和性別的差異象徵，整潔也與個人操守聯繫到了一起，時常和垃圾打交道的人很有可能會被污名化、邊緣化。因此，雖然當地人並不那麼在乎自然環境，日常仍然以焚燒、隨意棄置的方式來處理塑膠垃圾，但他們不會在公眾場合做這件事。當地也有許多自下而上的行動實踐，是這些垃圾與爪哇當地文化產生互動的結果，例如符合互助精神 (gotong royong) 的社區大掃除、每年開齋節結算每戶回收垃圾總量，以此兌換回償金的垃圾銀行 (Bank Sampah)、以及創造地方認同和責任感，同時與傳統神話相關的回收物嘉年華。這些面向橫跨了社會、文化、經濟和道德實踐，顯示了垃圾在當地社會的緊密聯繫。

人與物件的互動常以 Bruno Latour 的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來解釋，Hawkins (2006) 就認為，家家戶戶都會做的資源回收，實際上是一種藉由垃圾來體現 (embodying) 在人身上的倫理實踐。身分政治與廢棄物也時常是國家機器施政控管之下交織，例如殖民政府以促進公共衛生之名隔離特定種族 (Anderson 1995; Bashford 2003)，或是以政治操作為目的，將特定階級與人群與骯髒物、骯髒的意象聯繫到一起 (Thorleifsson 2017)。在當代，這些國家力量時常引用巴塞爾公約<sup>2</sup>的標準規章與話術來實施廢棄物管理、環境保護、工業限制等政策，時常跨越國境成為新自由主義的附帶效應 (Reno 2015)。許多研究也關注與垃圾相關的勞動以及其在不同脈絡下的象徵意義、特別是與經濟不平等相關 (Furniss 2017; Fredericks 2018; Nguyen 2018; Millar 2018; O'Hare 2018)，例如拾荒者的生計模式本來就仰賴這些廢棄的「污染物」，但經過國家政策的定義後，他們就因原先的生計模式而被歸為是污染的主體 (polluted subject)、現代性所拋棄之物 (discards of modernity)、甚至是國際上用來衡量發展不均的指標

<sup>2</sup> 一份 1992 年在瑞士巴塞爾簽訂的廢棄物處理與管理公約，當前全球有 186 個國家為締約方。



(Reno 2009: 32)。這些研究展現的是人類在廢棄物面前的主體性，而像 Gregson et al. (2010) 就探討石綿在一場洩漏事故中如何同時是經濟活動的客體、又同時在清運流程發揮主體性。Hird (2013) 和 Reno (2014) 討論了廢棄物如何超越人類社會自身產生出來的意義，以多物種的視角來詮釋廢棄物的存在，甚至挑戰了「廢棄」本身的意義 (Hawkins 2006, 2015, 2018; Bennett 2010)。

## (二) 台灣廢棄物再利用與社區營造相關研究

陳秀卿 (2013) 以桃園市內壢里的案例，說明文化藝術如何成為在公共空間中，社區自下而上的凝聚媒介。文中的內壢社區以垃圾回收作為初步的動員機制，再利用這些回收集中的廢棄物製作裝置藝術 (陳秀卿 2013: 228-31)，主張藝術介入能創造人與整體環境的新關係。李宗鴻等 (2023) 則關注雲林縣大埤鄉三結社區以稻草作為主題、在發展觀光與循環經濟方面的成果。稻草本是農業廢棄物，大多焚燒作為肥料使用 (李宗鴻等: 4)，自 2011 年的農村再生計劃始，在結合地方觀光與永續經營方面頗有建樹，與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相關聯 (ibid: 7-9)。

上述二文是廢棄物再利用直接作為社區營造主軸的案例，若關注更廣泛的社區活化案例分析，則會發現他們大多都與循環利用、空間綠化、永續發展這三個主題之間形成一種聯繫趨勢、且都注重當地人的長期參與 (曾盈馨 2020; 王宏男 2023; 謝彩蘋 2023)。

## (三) 雲林縣四湖鄉沿海環境近況

現行探討雲林沿岸海洋廢棄物情況的，只有邱靖淳等人 (2024) 一篇文章。他們調查了雲嘉沿海地區刺網漁業作業中捕撈到的海洋廢棄物現況，統計了 2023 年 1-9 月的海洋廢棄物在捕魚活動中出現的頻率。研究發現來自口湖鄉沿海的廢棄物量較高，有 94% 的出海作業都會捕撈到海洋廢棄物 (邱靖淳等: 39)，種類以海浪從蚵棚上拍打下來的塑膠繩蚵條居多 (ibid: 44, 47)。研究採訪了參與研究計畫的漁民，他們認為海洋廢棄物的來源可能與 1) 颱風、2) 台塑六輕工業港清淤、3) 離岸風電工程船舶的海拋垃圾有關 (ibid: 48)。不過文內也提及當前尚缺乏較完整的海洋垃圾成因研究。除此之外，牡蠣養殖在台灣西南沿海——特別是台南市——存在養殖蚵棚的廢棄問題 (曾怡陵 2020)。行政院環境部在 2020 年因應海洋廢棄物影響海洋生態與漁業永續發展的問題，推行了「向海致敬」計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sup>3</sup> 2020)，而農委會<sup>4</sup>漁業署也相應該計畫，制定了刺網漁具實名制相關法規，用以管理漁具使用與廢棄漁具處理流程。其中就包含廢棄蚵棚的管理(張致盛、陳慧萍 2020)。

四湖鄉沿岸的淤沙成因存在地形因素和工業因素：與外傘頂洲連貫的濁水溪出海口沙洲有向西南遷移的趨勢(莊曜成等 2023)；而六輕工業區填海造陸、抽沙船所排放的沙流則形成濁水溪外海綿延數公里長的淤沙(張子見 2023)。最晚不遲於 1990 年代，沙洲的淤積情況已經影響到了箔子寮漁港的漁船出海(監察院 2013)。自 1978 年漁港啟用至今，曾數度提出攔沙堤擴建、改善淤積情況的計畫，但從近期的第一手經驗來看，並未改善淤積情況(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21：318)。當地居民也表達了外來技術官僚的知識與當地經驗不符，時常無法達成建設改善計畫中預期的效果，特別強調了「沙是活的」，意指海岸流沙的變動劇烈，很難透過單一種水土的技術知識就可掌握(郭天祐、劉曉語 2024：31；饒祐睿 2024：101)。

劉曜華等(2006)在《四湖鄉志》中將四湖鄉養殖、捕撈漁業人口下降、漁獲減少歸因在六輕工業區的興建上(劉曜華主編 2006：180)。同時，因當地長期缺乏工業建設、就業機會有限，造成當地人口外流(ibid.：242)。箔子寮在 1995 年後，出現了由返鄉鄉民和在地居民成立的諸多社區發展協會，其中以箔子、箔東二村為首發<sup>5</sup>，皆旨在活化、營造箔子寮社區的形象(蔡耀陞、何昀瑄 2024：151)，也帶領一些公眾教育活動(華叡民、蔡嘉軒、江冠瑩 2024：377-378)。

### 三、環境變遷與海廢的形成

箔子寮漁港啟用於 1976 年，曾經盛極一時為西海岸漁船吞吐量最大的幾個港口之一。自 1990 年代始六輕工業區興建後，大量的漂沙向西南延伸，以致造成漁港出航的航道受阻，如今只剩數十條看來無人維護的電動筏閒置在港內(田野筆記，2025/1/8)。我最開始嘗試從幾位漁民和養蚵戶的口中打聽任何一切有關海洋廢棄物的消息，後來反而逐漸意識到當地不只漁業，連牡蠣養殖都在因港口淤沙迅速外移中。而迅速累積在漁港提北的淤沙以及管理的不效，可能形成了當地居民能任意撿拾海邊物件的環境條件。

---

<sup>3</sup> 已於 2023 年升格成環境部。

<sup>4</sup> 同於 2023 年升格為農業部。

<sup>5</sup> 此資訊來自陳冠儒同學田野材料，茲感謝不吝分享。

四湖鄉曾是雲林沿海重要的牡蠣養殖基地，如今在港邊，沙灘早已擱滿廢棄竹條、港口剩下棄船殘骸、淤沙漸延伸上岸。政府數次的改善計劃工程、甚至是水工專業技術團隊曾在此開展過的固沙實驗，在當地人眼中常被視為外地人不懂「這裡的沙是活的」的徒勞（田野筆記，2025/1/8-1/10）。實際上走上箔子寮漁港北邊的沙灘，映入眼簾的是長片起伏的沙丘和鋪滿沙灘的廢棄養蚵竹條，每隔 3-5 公尺就有零散的塑膠垃圾堆（見圖一）。然而相對於台灣幾個著名的海水浴場觀光區而言，不知是否因為人煙稀少而顯得清幽乾淨。然而，從當地居民的一些當地生活的記憶片段中，我卻得知了「沙灘的出現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最早不超過五六年。由年輕返鄉夫婦經營的善水咖啡中，也在牆上掛上 2020-2022 年間在堤岸和沙灘活動時的攝影作品，照片中的海岸邊尚未有積得比人高的沙丘，而養蚵的竹條井然有序地插在海水中（田野筆記，2025/1/10）。



圖一，箔子寮漁港北邊海濱長廊沿岸沙灘近況  
（作者於田野期間自攝）

進入田野的契機來自於箔子村村長蔡心娜所提供的線索「有居民使用海邊廢棄的蚵棚竹條來做圍籬」。這暗示了兩件事情，一是「當地要麼曾經存在繁盛的蚵仔養殖、要麼養殖的規模之大，以至於多餘的廢料數量已經龐大到可供居民隨手撿拾」，二則是「居民除了蚵棚竹條外，很可能還存在其他廢棄物件的在利用」。我原先希望透過當地居民的生活經驗、和各種廢棄物——特別是海洋廢棄物在四湖鄉西南沿海的處理政策的管理鏈兩個面向，一上一下地來構成一個圖景。但實際的狀況貌似與這一開始的想像有所出入，在探尋了所謂的「垃圾管理鏈」後發現，由於各種不同性質的水土保持以及環境保護政策，針對不同廢棄物件和不同性質的地點與基礎設施的管理似乎存在分工繁雜所導致、在箔子村與漁港沿海、乃至四湖鄉沿岸的治理破碎化問題。

本節討論在地居民與這些廢棄物的第一手經驗，也討論箔子寮沿海在近幾年之內的環境變遷和管理政策之間的關聯。

### （一）與垃圾直接接觸的經驗

由於一開始將題目的兩個面向之一鎖定在漁民身上，苦於找不到報導人，我便向民宿老闆文進大哥傾訴。沒想到在第二天晚上，他旋即透過在三條崙的熟人林彩雲，打聽到了兩位現仍在固定出海的養蚵戶和漁民：吳克敏與吳文華分別是在三條崙北部溪仔崙近海的牡蠣養殖戶和在駐紮在箔子寮漁港的漁民，兩人皆已七十來歲。

克敏大哥一得知我與共訪的另外一位同學正在進行有關漁港和產業發展的研究時，還沒等到我們開口問太多，他就表達了溪仔崙的養蚵已經不怎麼發達了。自大約千禧年左右起，海邊的淤沙和垃圾就開始增多，牡蠣的品質和數量都在下降。同行大多轉移到台南或是嘉義東石，如今他留在當地也僅是將尚未成熟的蚵苗轉售到嘉義東石去<sup>6</sup>。當我詢問到他與濱海垃圾的第一手經驗時，他表示日常作業時，蚵棚的海域充滿著許多漂流竹木、塑膠袋、保麗龍時常阻礙養蚵船航行。而彩雲姐的叔叔文華大哥則長年進行流刺網捕撈，最常遇到塑膠袋卡到漁網，但海裡的垃圾也會遇到蚵寮木條、岸上釣客丟的保麗龍、玻璃罐塑膠罐等。上岸後他會花費最少兩個小時整理漁網，如果垃圾纏繞漁網繁多，則會多出 2-3 個小時都在清垃圾。可見確實有可能嚴重影響日常生計的進行。不過從這二位報導人，並未能得知垃圾的來源為何。（田野筆記，2025/1/7）

<sup>6</sup> 該資訊由共訪同學蘇穎欣問題時得到，感謝蘇穎欣提供共訪資訊。

過了兩日，訪問到雲林縣近沿海作業漁船協進會的總幹事黃正鎮船長後，也才捕捉到了比較清楚的面貌。黃船長說每次出海或多或少漁網上都會卡著垃圾，最多的是塑膠袋、另也有塑膠罐、竹木條、鐵鋁罐等。垃圾出現的頻率不定，但以東北季風盛行期間數量比較多（田野筆記，2025/1/8）。但 2019-2020 年開始建設風機後增多。黃船長認為是「維護風機的工作人員在海上活動而私自拋棄垃圾」與「親潮沿流的大型船隻私自拋棄垃圾」（田野筆記，2025/1/10）。雖然這一說法與邱靖淳等人（2024）在研究中所提到的來源大致相符，但可能比較難說明克敏大哥描述的情形（從二十一世紀開始）。不過兩邊都提到了垃圾增多與漁獲量和種類減少的情形。在文獻回顧中提到，《四湖鄉志》將此一現象歸咎在六輕工業區的興建（劉曜華主編：180），而進一步實證關係，尚有待環境科學方面的研究來證實。但至少從這些與海洋接觸的日常生計經驗來看，明顯人為的廢棄物對於他們而言具有強烈的在場性（presence）。

De Wolff (2017) 面對全球海洋高度與塑膠污染交融的現象，嘗試了一種「超物種」的多物種民族誌：他從宣傳符號、環境保育和自然科學三個面向討論塑膠物件——大至太平洋塑膠環流、微至浮游生物與塑膠微粒——作為海洋物種的可能性。他舉列了歐盟在地中海沿海地區的文宣如何將塑膠瓶詮釋成「需要提防的毒魚」、海洋環境學界描述動物與塑膠接觸互動的「塑膠世界」（plastisphere）、海洋生態實驗室和環保團體的公眾教育場域兩個田野地中對於「塑膠與海洋物種應當、不應當出現的場域」的討論作為主要論述材料，主張塑膠物件與自然生態的界線已無法單純用人為污染和應受保護的自然生態來區分。如同我們熟知寄居蟹以塑膠瓶為殼、海鷗在塑膠桶中築巢的刻板印象一般，若採取上述視角，也許可以將漁場中湧現的垃圾群視作一種與傳統漁獲物種「相互競爭生活空間」的生態關係。管理上而言，如同對待海洋生物生命週期一樣，若對「垃圾物種」的種類、棲息地或繁殖數量進行系統性分析，也許能得到新的監控或是收容視角。

## （二）沙的變化

牡蠣養殖是台西地區傳統的生計模式之一，最早成規模的產業可追溯回 1890 年代（林志德 2008）。每年在 10-12 月開始分苗養殖作業，以竹條架起牡蠣苗種附著的棚架。養至隔年 6-8 月採收季後，夏秋會有大量蚵棚竹條閒置在海邊。前所提到吳克敏、黃正鎮大哥口述，養蚵業因淤沙轉移到嘉義東石與台南。我在 1/9 號上了沙灘，當時看到整個漁港北邊、也就是現地圖上標記「箔子寮漁港涼亭」以南已是一片灰濛濛的沙灘，向外延伸至少 30 公尺。當時由箔子寮城鄉發展協會的前總幹事蔡茂源大哥帶我介紹沙灘近幾年的變化，他說沙灘這兩三

年間才出現，2020 年左右堤防腳下仍是一片瀉湖，海與瀉湖間則是高於潮汐線的沙丘（見圖二）。田野期間，圖中的瀉湖已消失。

蔡茂源大哥提供了一條關鍵訊息：海浪不斷把近海漂沙推往堤岸、等到這些淤沙累積到退無可退後，又會因颱風或西南季風造成洋流變向，而大量把淤沙捲走、重新形成瀉湖。整個循環約 4-5 年（田野筆記，2025/1/9）。有關同一片沙灘的變化，黃正鎮船長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觀察到淤沙的範圍持續擴張最開始是在漁港出海口，後從北堤外溢到海濱長廊的海岸，不存在瀉湖出現又消失的情形（田野筆記，2025/1/10）。養殖蚵戶的行動區域最晚不遲於 2020 年開始受限。據吳克敏和黃正鎮船長述，養殖戶在漁具管理方面十分鬆散，雖尚不清楚他們使用的竹條源頭為何，但至少可知這些竹條的使用週期長可至數年、短至一個季度就會因孔蟲蛀蝕或鹽水腐蝕而棄用。無法繼續使用的竹條就在原水域荒廢，直到淤沙不斷堆高、形成沙灘之後而隨處可見。從田野期間所見沙灘上一整片連續到近海的廢棄竹條，可窺探當地曾盛極一時的牡蠣養殖規模。



圖二，箔子寮漁港北岸稍早的淤沙情況，北方向左、右側為北堤。  
（衛星影像摘自於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2020 年影像）

漁港乃至於沙灘的長期淤積，並不是全然放任不管。早在 1980 年代中期和 1990 年代中期就已有疏濬和漁港北邊攔沙堤的延長工程（台灣漁業及海洋技術顧問社編 2003：22），然而從港口沒落和牡蠣養殖出走的情形來看，恐怕成效並不顯著。蔡茂源大哥提到，在 2016 年蔡英文總統第一任期時曾提出「海洋國家」的願景，希望台灣能將自己定位成打開大門的海洋國家，促進與其他海洋國家的商貿與觀光往來。這樣的願景催化中央政府整合行政院內部所有與海洋事務相關的部門，因黨派政治分歧而推遲至 2018 年才正式成立「海洋委員會」（黃筱歡 2018）。蔡茂源大哥表示，在海委會成立第二年（也就是 2019-2020 期間），曾經提出箔子寮漁港改善的具體計劃：除了希望投注資源來密集監管淤沙問題之外，也希望將箔子寮漁港改造成能往返於台澎之間的觀光港口。講到這裡時，蔡茂源

大哥還信誓旦旦地向著西邊指：「從這裡到最遠的那隻風機多一倍的距離，24 海哩就是澎湖。」作為台灣最西點，箔子寮漁港最遲在 1986 年 仍有固定往返於台澎之間的客輪（國家文化記憶庫 2020）。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和立法院的黨派分裂激化，這個改善計畫也被迫無限期延宕。蔡茂源大哥認為，即便中央政府有所規劃，但政策進入到雲林縣境內後，會因為行政方、執行方和地方勢力之間的利益不協調而產生各種執行障礙，最主要因素是「縣政府不想配合」。這樣的情形，據他所述自 2005 年來經歷蘇治芬（民進黨）、李進勇（民進黨）以至於現在的張麗善（國民黨）縣長治下皆沒有改變這種地方政治結構性的不協調（田野筆記，2025/1/9）。礙於本次田野無法深究鄉內行政與縣內政治的深層政治問題，故不多贅述。

台灣西南部沿海淤積的情形可謂時來久矣，除了行政院海委會以外，由於管轄範圍的緣故，經濟部水利署對此現象也曾經有所介入，在本節的第三部分中，我將詳細闡述整個沿岸地帶複雜的管轄狀況。自 1990 年代以來，我國政府開始在各個行政領域採用公私協力的管理模式以取代傳統家長式政府的權威安排、也彌合公單位行政無法深入社會脈絡的空隙（曾冠球 2017）。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早在 2023 年便與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合作，以公單位、技術單位、當地居民三方的合作模式展開「海岸公私協力計畫」。第一次的計畫同以牡蠣養殖盛行的嘉義沿海為試驗地點，利用養殖原地廢棄的蚵殼、串蚵塑膠繩和竹條為材料，築起具備固沙功能的裝置，旨在防止外傘頂洲的消散（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2023）。2024 年 9 月，成大水工所第二次以相同方法在箔子寮漁港北岸的海濱長廊展開試驗，這次的實作裝置不但具備固沙作用，甚至請活動於四湖、口湖鄉的在地藝術家陳玄茂設計裝置藝術的造型。箔子寮城鄉發展協會的執行長蔡茂源大哥即是計畫期間協助進行的當地人之一。實際上我在進入田野的第一天晚上就向他打聽到了這個資訊，故 1/9 號的走訪原先是希望能更了解這個計畫。

雲林海岸公私協力計畫執行有兩個成品，一是以竹條、塑膠繩和蚵殼築成的固沙裝置藝術、二是在海堤上設計的防浪裝置藝術（見圖三、四）。在兩週田野期間，我曾數次到海邊觀察這些物件，固沙裝置從去年底建好到現在，已經累積了相當程度的沙丘，明顯要高出沙灘其他部分、甚至已經跟人差不多高，可見固沙裝置作為防止沙丘流失的凝結核，還是有一定程度作用的。走近看，竹條結構上捆綁的蚵殼串在風吹之下相互碰撞會發出清脆的響聲，在腳邊有颼颼飛沙、身邊被強風鳴響包圍的場景下，形成一幅有點超現實的景觀。整個固沙裝置由高度 50-200cm 不等的竹條所製成，排列成雙峰的造型，在基部撐出一個長方的立體結構以維持站立，但因數個月的積沙而只剩不到 100cm 的高度裸露出來（田野筆記，2025/1/16）。即便單個裝置的固沙成效不錯，但綿延一公里以上的沙灘，僅有這麼一點防護，恐怕成效不彰。這也是為何蔡茂源大哥認為這個計畫只是一個小實驗，可能更多的作用是「政治表演」或是「消化經費」。他批評到：「水工

所還停留在陸地思維，不知道沙會隨著水而流動」(田野筆記，2025/1/9)。有趣的是，隔日訪問黃正鎮船長時，他對此也表示了「沙是活的」一個說法，似乎當地與水有緊密關係的人們都不約而同地對地形變化有著相同的看法(郭天祐、劉曉語 2024：31)。蔡茂源大哥對於海堤上的防浪裝置藝術有著更強烈的批評，從他口述，該裝置藝術的設計目的是「防止漲潮時的海浪或是海風侵蝕岸堤」。他認為用泥漿糊上岸堤的竹條、蚵殼這些材料不可能堅固過已經屹立在這十幾年的混凝土堤防，認為水工所的土木理論與現實脫節。



圖三，成大水工所於 2024 年下旬與當地人合作築起的固沙裝置  
(作者於田野期間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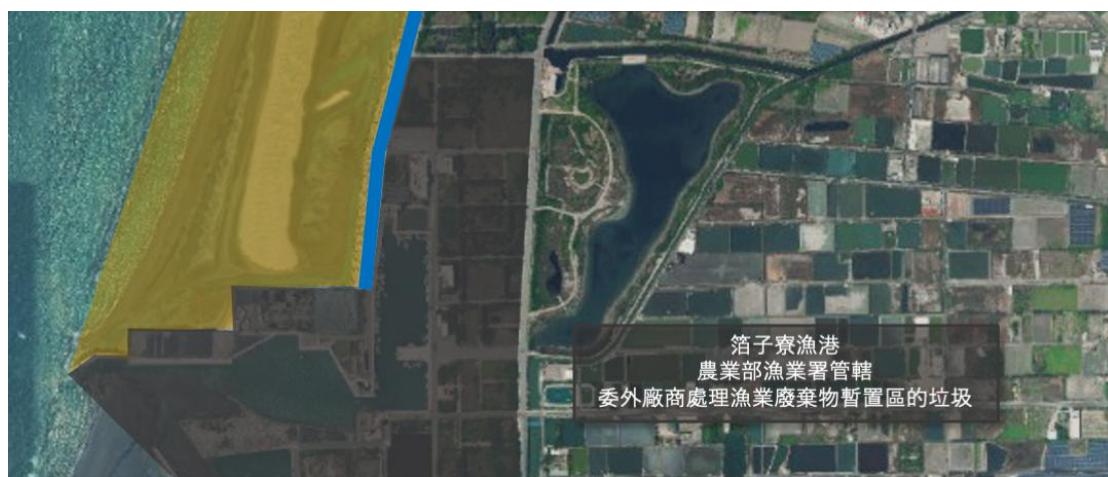


圖四，同為 2024 年雲林海岸公私協力計劃的裝置藝術之二，長度約 20 多米，  
(作者於田野期間自攝)



### (三) 沿岸地區的治理破碎化

自田調第一天起，為了開展海洋垃圾管理的這條線索，我便試圖聯絡過四湖鄉公所清潔隊、口湖鄉公所清潔隊、雲林縣環保局、甚至是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1/13 號之前所了解到的情況較不完整，口湖鄉公所清潔隊表示他們並沒有承辦海邊垃圾的清運業務，婉拒了我的訪談請求、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則表示實際上的執行單位是雲林縣政府環保局、雲林縣環保局則表示不同的分區有不同的負責人，以箔子寮為例子的話便是四湖鄉公所清潔隊。最終我與四湖鄉公所清潔隊的負責人吳秀珍隊長於 1/13 號會面訪談，吳隊長告知：依照岸邊不同性質的區域和不同物件、由不同的單位管轄，他們只負責一般垃圾的清運、或是淨灘團體已經收集整理成堆的岸邊廢棄物。1/7 號晚上林彩雲大姐載著我與另一組同學前往溪仔崙和三條崙海邊時曾經過四湖鄉清潔隊垃圾掩埋場，吳隊長表示，大部分來自岸邊的垃圾，如若特殊的回收品，則最終都會來到此處掩埋。



圖五：箔子寮沿岸區域垃圾管轄單位分治情形地圖

(底圖為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2023 年航照正射影圖，色塊與地標為作者修圖)

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20 年所推行的「向海致敬計畫」中，詳細地闡述了針對台灣沿海與近海區域的垃圾管理模式，其中將「海洋廢棄物」定義為「遭棄置或經潮汐沖刷進入海岸或海洋環境之廢棄物」(cf.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海洋廢棄物循環產品標章推動作業要點)，將垃圾區分為「一般垃圾」和「非資源類垃圾」，下有針對沿岸生計模式的「廢棄漁具」一類。基本上，依照廢棄物出現的地點，不同的管轄單位會自行委派地方政府或是處理廠商來處理不同的廢棄物(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20)。

<sup>7</sup> 漁港北堤的淤積沙灘據吳秀珍隊長所述，屬於未登記領土，可能由漁業署和國有財產署共同管轄。

……依國有財產法規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權管國有非公用土地，惟實務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常未經依法撥用或洽國產署同意，即逕行於國有非公用土地設置相關設施（如海堤、港口等），致常有權責不清爭議，需逐案協調耗時費力，影響清理效率。另未登記土地清理權責問題，過去亦未有明確劃分，部分係由地方政府逕行清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20：11）

例如前所提到在沙灘出現的蚵棚竹條，若以出現地點來分類，應屬國有財產署事務；然而以性質上來說卻又屬「廢棄漁具」，應屬農業部漁業署管理（ibid：17）。漁業署確實根據計劃內容，在台灣西部沿海各地漁港設立漁具具名及廢棄漁具回收獎勵機制（雲林縣政府漁業科 2021）。就雲林縣而言，僅有口湖和台西二鄉的漁港有廢棄漁具暫置區和回收獎勵機制，與吳秀珍隊長確認後，也得知四湖鄉暫無。單透過蚵棚竹條的例子，也許能說明物件地點與性質的管轄相衝突。然而面對相似的海岸垃圾問題時，縣鄉級單位與地方公務人員、地方居民之間所配合的處理模式，仍需要考慮港口使用率、漁業密集程度、鄉鎮人口規模和行政資源配置等一系列相互牽制的因素。它們共同影響地方事務或是計劃執行的優先順序，儘管制度上存在管轄權重疊，實際執行時仍以彈性的資源分配而有著較為靈活的分工。

自二十一世紀來，海委會、環保署和雲林縣政府數次在雲林縣沿海開展地方代表和各個利益團體的研討會，多次針對箔子寮漁港的淤積或是綠電與土地問題挹注預算（雲林縣政府公共關係科 2015；林上祚 2019），惟因各種行政的、利益團體的、環保的、黨派問題而無法迅速落實。這些治理議題所牽涉的後勤（logistics）系統不單只由政策制定、行政分工所決定，而與不同社區、單位之間的權益平衡、資源協調深度綁定，並非純粹講求機械式管理的線性體系。

箔子寮漁港一帶的環境變遷——特別是淤沙堆積與港口功能衰退——不僅改變了當地的漁業與牡蠣養殖生計型態，也為海洋廢棄物的堆積與再利用創造了條件。從廢棄蚵棚竹條的隨處可見與居民的就地取材，到漁民面對塑膠、保麗龍在漁撈作業中高頻出現等現象，顯示「垃圾」早已不是單純的外來污染物，而是深度嵌入在地方生產與生活之中的物質存在。若援引 De Wolff（2017）的觀點，我們或許能將這些海廢視為一種「物種化」的存在，使得傳統漁業在這些現象中重構出新的生態。也因此，若要進一步理解地方居民如何與這些海洋廢棄物互動、乃至賦予其新的社會意義，必須回到這些物件在地方社會生活中的流動與再利用實踐上，這將是下一節討論的重心。

## 四、海廢再利用的社區性

若說環境變遷的因素提供了當地居民能夠自行撿拾海邊物件回來使用的物質條件，另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是，既然廢棄物再利用並非孤立的異常現象，那是否存在類似於 Schlehe & Yulianto (2020) 所描述的那種「圍繞著廢棄物而展開的社區生活」呢？原先看到來自箔子寮漁港的合作淨港作業，我預設當地居民存在自發性的環境維護，可能存在定期的淨灘淨港活動，藉此成為當地人社區生活的重要部分。實際上根據蔡茂源大哥和善水咖啡夫婦所述，當地的淨灘活動大部分都是由外地人、特別是環保團體與青年志工團舉辦。實際上當地人大部分對此沒有太多想法（田野筆記，2025/1/9-1/10）。蔡茂源和黃正鎮船長甚至表示，類似於海岸公私協力計畫這一類性質的活動，村長為了召集足夠的人數協助計畫實行，時常會自掏腰包購置參與獎勵品，比如麵包、紀念獎杯等等，以這些東西來吸引當地居民參與。

除了在前一節中所提到，當地居民自行撿拾海邊的蚵棚竹條私用之外，實際上在社區的各個角落還存在經彩繪加工過後的竹條和漁網浮球，明顯經過了有意識的美感加工，與遍及村子各處的彩繪壁畫形成較為一致的風格。田野第一天帶我們熟悉環境的普天宮總幹事蔡瑞泉大哥提及了箔子寮城鄉發展協會與社區發展協會曾經在此帶領過的各種社區營造工作與這些彩繪藝術之間的關係（田野筆記，2025/1/6）。而 1/10 號訪問黃正鎮船長之前，在善水咖啡與助教攀談後得知，整個廣義上屬於箔子寮的聚落居然有足足四個與社區發展相關的組織。隱約之中還是能感受到，這些社區性的線索或許仍然和廢棄物再利用之間存在一定的關係。如陳秀卿（2013）的研究案例，廢棄物再利用、特別是經由藝術加工之後的再利用，是有可能串起社區成為主軸的。

本節透過社區營造計畫留下的痕跡、和數個社區營造計畫對當地居民施加的影響兩個面向來探討廢棄物再利用如何藉此成為凝聚社區意識的物質體現（embodiment）。

### （一）回收物的社區性：社區營造計畫的痕跡

田野的第一天中，蔡瑞泉大哥便向我們介紹了遍及在村內各處，由藝術家曾進城所創作的彩繪壁畫（田野筆記，2025/1/6）。像這樣子邀請外來藝術家或是社區發展的例子，其實在箔子寮村內不算少見。我們所留居的民宿斜對面就有一間由廢棄房舍所改造的景點「老屋樂活居」。該老屋的院子就是由廢棄竹條所搭起，

而且搭建工法比其他住宅圍欄還要更為整齊，在院內也有廢棄木板搭建的舞台、在幾顆棕櫚樹上也掛有彩繪蚵殼、彩繪浮球等物件（田野筆記，2025/1/16）。老屋樂活居是雲林科技大學的學生參與雲林縣 105 年度社區規劃師操作型輔導計畫所舉辦的第八屆社區 PK 賽期間的作品，由箔東社區發展協會協助執行。2021 年，箔子寮城鄉發展協會也舉辦了「漁村職人生活體驗營」，以體驗搭建傳統生計模式的烏倉寮、體驗地方風味飲食為主軸，讓附近鄉鎮的學生能夠體會傳統漁人的生活模式（張朝欣 2021）。在箔東村南部、雲 131 縣道準備進入箔子寮前往北，能夠看到曾經用於夏令營的「社區產業育成館」，一旁還有由彩繪竹條所搭建的「漁村體驗坊」。

上述兩個例子基本都與城鄉發展協會的蔡茂源大哥有較為緊密的關係，他自從 2016 年返鄉照顧母親後，便積極參與社區發展事務。其中也包含了 2018 年展開的「喔熊藝術村」計畫。這些遍佈在巷弄和民宅間、隨處可見的彩繪物件十分顯眼。1/11 號在民宿整理筆記時，曾遇到來自外地的小學郊遊團在午後騎行經過箔子寮，幾十人在彩繪藝術前合影留念，可見這些物件對於初來乍到的觀光客而言確實是能夠留下印象的重要標誌。

箔子寮在 1990 年代漁港開始沒落之後，面臨到嚴重的人口流失問題，青年離鄉到外地讀書工作後基本很難再回來。村落各地都有因屋主離鄉而荒廢的老屋。我並未能在訪談中問出蔡茂源大哥一開始積極參與社區發展事務的直接動機，然而透過這些廢棄物再利用的痕跡，我們也許能試圖窺見在過去十年內的各種嘗試。透過下一個小節所將提及的兩位報導人，我將進一步說明廢棄物再利用如何成為串起地方居民的重要媒介。

## （二）廢棄物再利用如何成為社區連結的媒介

在田野的第三天，我訪問了箔子村西邊小有名氣的三色屋民宿老闆張景山大哥，現年約六旬。他原先在嘉義作冷凍魚貨批發，五六年前返鄉後萌生了經營民宿，以提供其他返鄉親戚駐足之地的念頭。三色屋民宿以其鮮豔明亮的彩繪裝置藝術為特色，建物本體是由數個貨櫃和多種彩繪物件裝飾組織而成，包含但不限於：塑膠浮球、竹條、蚵殼、一條小船等。民宿兩側有成堆的、七彩的海上浮球；而前院的樹上也串起彩繪浮球的裝飾。訪談之中，張大哥透露了剛返鄉時發現沙灘上有許多竹條、塑膠袋、寶特瓶、浮球、鐵鋁罐等垃圾，他看到之後認為「環境很髒亂」，「垃圾會讓洄游的海豚受傷」等，於是試圖撿拾這些漂流廢棄物（田野筆記，2025/1/8）。然而後來逐漸意識到竹條過於笨重，且許多一般垃圾處理起來十分費工、要自己分類之後才能轉介給清潔隊處理。後來則撿拾海邊的塑膠浮

球居多，大多經由張大哥讀國小的孫子彩繪而成為裝飾品（見圖六）。隔日（1/9 號）訪問蔡茂源大哥時，他在經過三色屋民宿時便表示了這些浮球、乃至於民宿周遭的裝飾藝術，都是經由他啟發後，張景山大哥才跟進的。雖然田野後半他因故而暫時離開雲林而無法向他證實這條資訊，但從蔡茂源大哥自宅院子內的浮球裝飾類型和散落在村子內各處、乃至於三色屋民宿的浮球裝飾風格基本一致，我們確實可以間接認為浮球裝飾的出現與他有比較緊密的關聯。而三色屋民宿也確實因其彩繪裝置的特色而成為箔子寮較為知名的景點（王曉貞 2021）。



圖六：三色屋民宿前院中的竹條、蚵串、浮球裝置藝術。  
（作者田野期間自攝）

駐足於善水咖啡時，我注意到咖啡店隔壁戶門口有一塊由蚵殼製成的地圖牌，和兩頭木製的小鹿雕像（見圖七）。經前面各種藝術加工的廢棄物再利用例子來

看，這明顯與社區發展有關聯。咖啡店經營者夫婦也表示隔壁住戶是一位「很有藝術氣息」的大叔（田野筆記，2025/1/10）。我直到 1/14 號才有機會訪問這位住戶，也就是住在咖啡店隔壁的蔡忠誠大哥，年約五十來歲。他早年在台北光華商場經營音響生意、因長期使用重低音耳機導致聽力受損，約 2010 年時返鄉，而當時善水咖啡仍是老闆柏惟的父親開的豬飼料店。從蔡忠誠的訪談中得到了關鍵資訊——箔子寮社區工作室執行長蔡茂昌大哥在 2014、2015 年帶領的社區營造計畫。忠誠大哥表示，原先箔子寮因人口外流，為了帶起觀光而有了社區營造計畫。每一個計畫長約五年，須向縣政府申請預算後才能執行。然而預算只有五萬，要做出成果後政府才能撥下更多預算，所以執行責任就落到居民頭上，必須考量極為有限的成本因素執行。這個脈絡之下，才有喔熊藝術村的彩繪壁畫、乃至於其他的裝置藝術（田野筆記，2025/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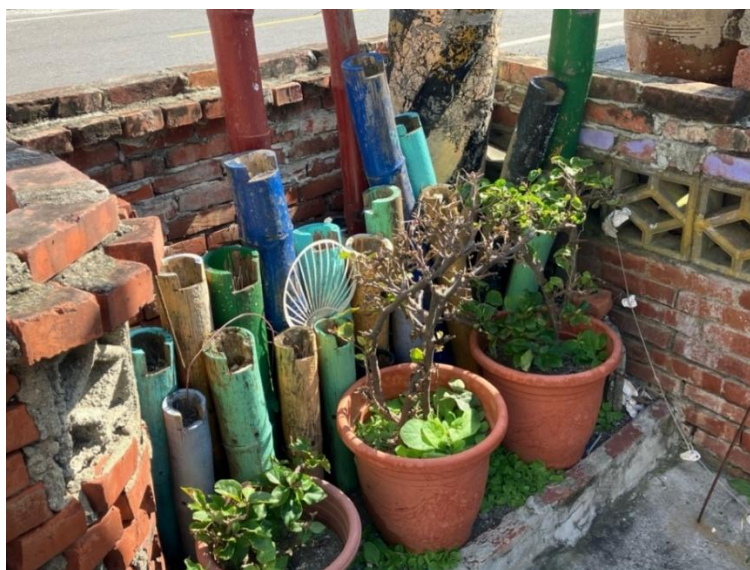
圖七：蔡忠誠大哥前院小鹿雕像。  
（作者田野期間自攝）

蔡忠誠大哥還提到，約 2019、2020 年時蔡茂昌大哥帶領村民參與社區營造比賽。查閱線上資料後發現，可能與「第 11 屆社區 PK 賽」有關係（雲林縣政府

新聞處 2019)。為了參賽，他把許多廢棄物：竹條、蚵殼、浮球、浮塊等物改造成各種裝置藝術，包含前面提到的道路牌、以及用竹條段製成的花圃、廢棄漁網和竹條搭建的涼亭等。張景山大哥的民宿彩繪藝術也屬於比賽的一部分(見圖八、九)。但他卻表達了對「第 11 屆社區 PK 賽」結束後再無下文的不滿。從蔡忠誠大哥的對話當中能感受到他對「參與社區活動、促成社區改變」有所期待，否則不可能花費那麼時間製作裝置藝術。



圖八：三色屋民宿彩繪裝飾。  
(照片截自三色屋民宿臉書粉絲專頁 2022 年照片)



圖九：蔡忠誠大哥前院使用竹條改造而成的花圃裝飾  
(作者田野期間自攝)。

這些具有社區性的廢棄物再利用並非單純出於居民對環境的自發關懷，也非完全由上而下的政策導入成果，而是在多個社區營造計畫、地方組織與個人實踐者，如蔡茂源、蔡茂昌兄弟等人的交錯影響下，逐漸形塑出一種具備地方風格的行動。這些經由藝術加工的再利用物件，不僅成為視覺上的地點標記，也在無形中串聯起社區發展計畫與個別居民的日常行動，形成一種雖非高度凝聚、卻具有某種社區感的物質實踐。這說明了即使在社群意識相對鬆散、人口流動頻繁的沿海聚落中，廢棄物經由再利用與美感轉化，仍有可能作為社區連結的媒介，承載某種程度上的地方記憶與集體經驗。

### (三) 蚵棚竹條的再利用

田野第二天時，最初接觸的兩位報導人是撿拾這些蚵棚竹條用作自家圍欄的蔡秀華、蔡吳金阿媽，分別住在箔子村 171 號和 190 號，兩位長者皆已過八旬。蔡秀華阿媽有位女婿蔡慶良大哥（約莫六旬）住在 191 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台北工作、假日才會返鄉探望岳母（*tiūnn-m̄* 丈姆，但蔡慶良大哥說我可以稱他岳母為 *a-m̄* 阿姆），惟田野期間兩週他都剛好在村內。當天早上便是在蔡心娜村長介紹下，經由普天宮前泡茶聊天的幾位阿姨介紹才接觸到蔡慶良大哥的。蔡秀華女士目前獨居在村子南邊一排三幢透天的其中一幢，臨近下崙排水之一水道。原先他與幾位親戚同居在一間大三合院，約三十年前幾位親戚分家，拆除古厝之後另起了三幢新的混凝土透天，因此左右鄰居也都是自家親戚。三幢透天共用一個前院，在面向村內最南巷子的那一面，有一面以各種廢棄竹條和零散鋼骨築起的一面圍欄，他稱之為「*lī-pa-á*（籬笆仔）」（田野筆記，2025/1/7）。

據他和蔡慶良大哥所述，大約在 2007 年左右，他孫子尚未去當兵前，看到海邊有許多廢棄的竹條覺得十分可惜，剛好古厝留下來的牆基也需要找尋替代材料築起圍欄，所以就用摩托車拉著一台鐵拖車，一批一批地將海邊的廢棄竹條、木條和串蚵繩拉回自宅，利用這些材料重新組起一片長幾十米的圍欄（見圖十、十一）（田野筆記，2025/1/14）。





圖十：蔡秀華阿媽住宅前院果園近況  
(作者田野期間自攝)



圖十一：蔡秀華阿媽住宅前院圍牆近況  
(作者田野期間自攝)

蔡吳金阿媽則是獨居在 190 號的三合院，剛好就在蔡慶良大哥宅斜對面，正好由於臨近，蔡慶良大哥建議我可以去向他打聽看看情況。1/7 日訪問時，三合

院只剩下正身跟一間廂房，南邊的廂房早已因親戚分家離鄉而荒廢。在三合院的正對面有一片約 50 多平米、用各式竹木條、門窗板隔起來的園地。蔡吳金阿媽自五年前丈夫過世後便獨居於此，平日撿拾社區的各種回收品作為活絡筋骨的日常活動，且在外有一個約二十來歲的孫子就讀交通大學，只有假日會返鄉探望。在訪談中阿媽透露，家對面所圍起來的地塊是一個菜園，目前種有冬瓜和蘿蔔，未來可能還會進一步整理成適合種香蕉的園地（見圖十二、十三）。

這片菜園的圍欄其實是丈夫十多年前仍在世時，騎摩托車從海邊一條一條拉回村內所築起的。當時海邊尚未積起沙丘，他並不敢自己下灘頭。不過看到海邊這麼多竹條，他覺得如果放著荒廢的話十分可惜（田野筆記，2025/1/7, 1/14），於是跟著丈夫一起築起了這片菜園。他還表示，曾經有開發商想要收購這片小菜園，不過後面因我尚且無法得知的原因不了了之。如今蔡吳金女士已在此獨居數年，據民宿老闆娘蔡招伶女士所述，他因為長期獨自生活，較不習慣跟左鄰右舍往來（田野筆記，2025/1/17），我猜測可能是因為不願意自己與已故丈夫的生活痕跡被抹消，於是最終決定不出售這片菜園吧。



圖十二：蔡吳金阿媽住宅對面菜園圍欄近況  
（作者田野期間自攝）



圖十三：蔡吳金阿媽住宅對面菜園內近況  
（作者田野期間自攝）

兩位長者在描述撿拾這些材料築成圍欄的動機時，皆提到了摘選材料的「便利」，即低成本以及隨處可得。實際上除了海邊的養殖竹條之外，二位住家的圍欄也參雜了許多來自周遭廢棄房屋的支柱木條、門板等，顯現出了某種臨機性（makeshift），並沒有特殊的選擇標準。蔡秀華阿媽提到了祖厝老牆基如果要再以紅磚組砌，恐怕會十分昂貴。將岸邊竹條用作籬笆的並非只有這兩戶的案例，走遍村內後發現至少有其他三戶人家以明顯是海岸邊的廢棄竹條作為圍籬、曬衣桿等各種用途；也存在各種經由彩繪加工、人工設計之後作為圍欄的數個例子，

顯示當地可能在過去的某一時段曾經較為密集地、或是長期而零散地出現到岸邊撿拾竹條回來私用的情形。

## 五、結論：廢棄物共存與環境的符應

從上述已經梳理的田野材料來看，主要可以將海洋廢棄物再利用的狀況分類成兩種：居民因個人用途而臨機撿拾廢棄物、和社區發展脈絡底下所出現的各式裝置藝術。可以「實用性」和「裝飾性」兩種類別代之。形成這種現象的各種先前條件最後都能回歸到「沙的淤積」身上。最一開始在文獻回顧中梳理了淤沙形成的自然環境和人為因素，後又闡述了淤沙如何造成漁港、乃至於當地牡蠣養殖產業的沒落。其實原先還考慮將 2018-2022 年期間興起的風力發電納入上述討論的部分內，但礙於主題的相關性，在本文中並未著述於此。

《四湖鄉志》和當地人的生活經驗顯示出，不論是六輕工業區或是海上風場的興建，似乎都與海漂垃圾衝擊漁業和沿岸養殖業有所關聯。漁港淤積沒落後，當地的經濟建設陷入了長期低迷，茆子寮的青壯年人口紛紛向外地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留下來的長者看著環境變遷、與因淤沙而被留在沙灘上的竹條同為「慢慢被時間淹沒」的相互映照。他們撿拾竹條來使用，側照出兩種邊緣化重新塑造彼此的情況：一個是本該自然腐敗的廢棄物獲得新生、另一個則是環境變化的時間切面成為了他們生命記憶的一部分。雖然發展機會受阻，但仍然有社區發展的動力試圖給茆子寮營造新的樣貌，特別是利用不同廢棄物、進行藝術加工來改造地方景觀的嘗試，也串起了社群內不同的人，不論是對外或是對內都形成了一定的凝聚力。

在田野中除了張景山大哥和數位漁民養蚵戶之外，並沒有表達出太多對於這些廢棄物的「排斥感」——即「把廢棄物當成造成污染的垃圾」。從這點我們能夠觀察到政策制定與地方生活經驗的差距。環保署將養蚵竹條定義為需要管理收容的廢棄漁具，而當地人大多將養殖廢棄的竹條視作海邊長久以來景觀的一部分。若以文化分類來看，那些在陸地上也會被視作為生活垃圾的物件、如塑膠瓶、塑膠袋、保麗龍與鐵鋁罐等物在海中也會被視作污染物。而廢棄的竹條反而可能因可降解性和褪色的竹子容易與漂流木搞混，而被視作為海邊景觀的一部分。從 Thompson (1979) 的分類來看，這些竹條或是用作彩繪的浮球原本是生計工具，而並非理論中強調的「商品」(goods)。從物質的流通價值來看，這些竹條本該隨著時間流逝而失去生計工作的用途、然而在經歷了價值轉換後，雖然失去了流通

價值而成為「垃圾」(rubbish)，但反而融入到當地居民的生命經驗和地景(landscape)之中。

我的主題受呂欣怡(2021)一定程度的啟發，該篇從 Tim Ingold 的「寓居視角」(dwelling perspective)理解高雄後勁地區的盆栽社群如何映照出當地的實體環境變遷與經濟環境變遷。這條理論主張從環境中「人與非人」的交互作用來隱喻人在環境中感應、適應變化的過程。呂欣怡在文中詳盡討論了人與物、人與人、及人與環境三種交互作用，亦即這些廢棄物重新以當地日常姿態出現的「符應」(correspondence)。礙於本次田野的範圍限制，難以如此精密闡述廢棄物再利用、當地居民和整個環境之間的關係。不過我們仍能建構出淤沙所造成各種的現象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邏輯關係，構成一片相互串聯的圖景。

這些再利用的廢棄物，除了映照出環境變遷的歷史蹤跡，也在箔子寮當地人的生命軌跡中留下痕跡。好比呂欣怡(2021)在工業擾動的失調環境中探尋當地人如何找到安居的姿態(呂欣怡 2021: 30)，這些一度「被遺留、被棄置」的物件以新的姿態登場之後，也許也能預示一個沿海村落獲得新生的未來。

## 參考文獻

王宏男

- 2002 〈社區發展協會之個案調查研究：以金門縣為例〉。《科學與人文究》10(4): 86-119。

王俊凱、傅凱若、謝儲鍵

- 2023 〈農村民主進一步－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的民主現場〉。《台灣民主季刊》20(2): 113-122。

王曉貞

- 2023 〈三色屋-雲林縣貨櫃民宿、雲林包棟民宿推薦〉。「好視新聞」，<https://newsday.tw/news/54200>。上線於 2023 年 2 月 21 號。

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 2023 〈公私協力計畫〉。「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https://th1.web2.ncku.edu.tw/p/404-1185-212841.php?Lang=zh-tw>，上線於 2023 年 12 月 4 號。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2020 《向海致敬-海岸清潔維護計畫（109 年~112 年）》。「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https://www.oca.gov.tw/ch/home.jsp?id=670&parentpath=0,294,329>，2025 年 3 月 30 號訪問。

呂欣怡

- 2021 〈工業隙縫裡的盆栽景觀：人與樹在失調環境中的符應與共生〉。  
《考古人類學刊》95: 1-44。

李宗鴻、黃怡菁、詹芬樺

- 2023 〈社區永續觀光的 SDGs 實踐－以雲林縣大埤鄉三結社區為例〉。  
《社區永續觀光研究》7(2): 1-12。

李載鳴、高慶珍、張晃銘

- 2008 〈雲林縣濱海鄉鎮土地利用變遷分析〉。《臺灣地理資訊學刊》6:  
1-11。

林上祚

- 2019 〈「改種綠電」年收入僅 1.1 億元！雲林離島工業區成本破百億，  
回收卻遙遙無期〉。「新新聞」<https://www.storm.mg/article/2044443>，上線於 2019 年 12 月 11 號。

林志德

- 2008 《嘉義縣沿海牡蠣養殖與社會的變遷》。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碩士  
論文。

邱靖淳、柳琬玲、吳斐竣、郭庭君

- 2024 〈雲嘉沿海刺網漁業作業捕撈海洋廢棄物現況調查〉。《海大漁  
推》。54: 39-54。

莊曜成、林宏仁、徐立昌、甘芳亘

- 2023 〈自然解方於外傘頂洲防護應用〉。《工程》。2(96): 106-120。

華叡民、蔡嘉軒、江冠瑩

- 2024 〈何以擺脫無未來？海洋教育與社區發展的能與不能——以箔子寮和三條崙為例〉，刊於《風頭水尾—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台大人類學系出版: 361-395。

黃筱歡

- 2018 〈經歷兩次政黨輪替、三任總統，台灣第一個專管海洋的「海委會」成立〉。「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4562>，2025 年 4 月 25 號訪問。

台灣漁業及海洋技術顧問社編

- 2003 《雲林縣漁港》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郭天祐、劉曉語

- 2024 〈All Actions are Re-actions: 箔子寮人們對水的感知、互動與關係〉，刊於《風頭水尾—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台大人類學系出版: 1-45。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 2022 〈雲林田野記事〉。《師大台灣史學報》12(14): 281-328。

國家文化記憶庫

- 2020 〈澎湖與箔子寮客輪〉。「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565011](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565011)，訪問於 2025 年 4 月 30 號。

雲林縣政府公共關係科

- 2015 〈打開漁民生路 縣府打造箔子寮漁港成為西海岸的新明珠〉。「雲林縣政府水利處」[https://water.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408&s=212349](https://water.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408&s=212349)，上線於 2015 年 4 月 7 日。
- 2019 〈第二階段競賽登場 雲林縣 20 社區 PK〉。「雲林縣政府新聞處」[https://www.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1244&s=268041](https://www.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1244&s=268041)，上線於 2019 年 11 月 2 日。

- 2020 〈翻轉雲林漁港環境印象 箔子寮漁港清潔上場〉。「雲林縣政府農業處」[https://agriculture.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693&s=280187](https://agriculture.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693&s=280187)，上線於 2020 年 1 月 21 日。
- 2021 〈雲林縣-廢棄網具(刺網)回收獎勵方案〉。「雲林縣政府農業處」[https://agriculture.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2445&s=341678](https://agriculture.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2445&s=341678)，上線於 2021 年 7 月 5 日。雲林縣政府漁業科撰寫。

陳柏謙

- 2017 〈仍在探尋團結基礎的台灣紅綠運動以及始終無法迴避的「資本主義」課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7: 241-246。

陳秀卿

- 2013 〈社區治理與藝術介入閒置空間的活化: 以內壠里藝術社區營造為例〉。《國家與社會》17: 205-238。

曾怡陵

- 2020 〈【養殖漁業篇】終止牡蠣養殖廢棄物橫行 南市府和漁民準備好了嗎? 探尋新方向, 盼解決養殖漁廢難題〉。《豐年雜誌》70(12): 50-56。

曾怡馨

- 2020 《新北市里環境認證計畫執行之研究-以中和區為例》。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公共行政學系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子見

- 2023 〈六輕迷糊帳還有多少? 兼評環評監督制度〉。《生態台灣》81: 76-79。

張致盛、陳慧萍

- 2018 〈客座總編輯—落實刺網漁具實名制 不要讓垃圾比魚多〉。《豐年雜誌》12: 18-21。

張朝欣

- 2021 〈漁村職人生活體驗營「烏倉寮」記錄捕烏魚文化〉。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1003002770-260405?chdtv>，上線於 2021 年 10 月 3 號。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 1998 《雲林鄉土史料》。南投市：省文獻會出版。

劉曜華主編

- 2006 《四湖鄉志》雲林：四湖鄉公所。

蔡耀陞、何昀瑄

- 2024 〈「也要神，也要人」：神人的地域關係與民間信仰變遷後宮廟再中心化的神人想像——以箔子寮普天宮祭祀圈為例〉，刊於《風頭水尾—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台大人類學系出版：113-164。

曾冠球

- 2018 〈良善協力治理下的公共服務民間夥伴關係〉。《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5(1): 67-79

監察院

- 2011 《監察院 102 內調 0001 調查報告：雲林縣箔子寮漁港航道淤砂案》。「監察院全球資訊網」<https://cybsbox.cy.gov.tw/CYBSBoxSSL/edoc/download/3579>，2025 年 3 月 30 號訪問。

鍾秀梅、鄭巨良

- 2017 〈環境正義與資本主義危機中的紅綠團結—專題導言〉。《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7: 233-239。

謝彩蘋

- 2023 《漂留-琉球嶼海歸青年環境守護敘說》。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饒祐睿

- 2024 《「自由」的時間：一個對當代靠海生活技藝的民族誌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Alexander, C. and O'Hare, P.

- 2020 Waste and its Disguises: Technologies of (Un)Knowing. *Ethnos*, 88(3), 419-443.

Alexander, C. and Reno, J.

- 2012 Economies of recycling: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Materials, Values and Social Relations. Zed Books.

Alexander, C. and Sanchez, A.

- 2018 Indeterminacy: Waste, Value, and the Imagination. Berghahn Books.

Anderson, W.

- 1995 Excremental colonialism: Public Health and the poetics of pollution. *Critical Inquiry*, 21(3), 640-669.

Anderson, W. and Bashford, A.

- 2004 Imperial Hygiene: A Critical history of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public health. *Health and History*, 6(2), 111.

Appleton, M.

- 2021 Douglas, Dirt, and Matter Out of Place. Maggie Appleton.

Bennett, J.

- 2010 Vibrant matter. Duke University Press

Choi, T.

- 2019 Ship carrying waste arrives back in Canada from the Philippines. Reuters.

De Wolff, K.

- 2017 Plastic Naturecultures: Multispecies Ethnography and the Dangers of Separating Living from Nonliving Bodies. *Body & Society*, 23(3), 23-47.

Fredericks, R.

- 2018 Garbage Citizenship: Vital Infrastructures of Labor in Dakar, Senegal. *Work and Occupations*, 47(4), 520-522.

Furniss, J.

- 2017 What type of problem is waste in Egypt? *Social Anthropology*, 25(3), 301-317.

Gille, Z.

- 2007 From the cult of waste to the trash heap of history: The Politics of Waste in Socialist and Postsocialist Hunga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Gordillo, G. R.

- 2014 Rubble. Duke University.

Gregson, N., Watkins, H., & Calestani, M.

- 2010 Inextinguishable fibres: demolition and the vital materialisms of asbesto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42(5), 1065-1083.

Hare, P. O.

- 2018 'The landfill has always borne fruit': precarity, formalisation and dispossession among Uruguay's waste pickers.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43(1), 31-44.

Harms, E.

- 2016 Luxury and Rubble: Civility and Dispossession in the New Saig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wkins, G.

- 2006 The ethics of waste: How We Relate to Rubbish. Rowman & Littlefield.
- 2018 Plastic and present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rchaeology*, 5(1), 91-102.

Hawkins, G., Potter, E., & Race, K.

- 2015 Plastic water. The MIT Press.

Hird, N.

- 2013 Waste, landfills, and an environmental ethic of vulnerability. *Ethics & the Environment*, 18(1), 105.

Jewkes, R. K., & Wood, K.

- 1999 Problematizing pollution: Dirty wombs, ritual pollution, and pathological processes. *Medical Anthropology*, 18(2), 163-186.

Kristeva, J.

- 1982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Issue 3/4, p. 14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illar, K. M.

- 2018 *Reclaiming the discarded*. In Duke University Press eBooks.

Nguyen, M. T. N.

- 2018 Waste and wealth: An Ethnography of Labor, Value, and Morality in a Vietnamese Recycling Economy. *Issues of Globalization: Case*.

Rangel-Buitrago, N., Neal, W. J., & Galgani, F.

- 2023 Plastics in the Anthropocene: A multifaceted approach to marine pollution management.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194, 115359.

Reno, J.

- 2009 Your trash is someone's treasure.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14(1), 29-46.
- 2014 Toward a New Theory of Waste: From 'Matter out of Place' to Signs of Lif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1(6), 3-27.
- 2015 Waste and waste management.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4(1), 557-572.

Schlehe, J., & Yulianto, V. I.

- 2019 An anthropology of waste.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World*, 48(140), 40-59.

Thompson, M.

2017 [ 1979 ] Rubbish theory. Pluto Press.

Thorsheim, P.

2015 Waste into Weapons.

Valeri, V.

2000 The Forest of Taboo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Zalasiewicz, J., & Waters, C.

2015 The Anthropocene.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自海而食：箔子寮人如何透過飲食與交換回應在地環境<sup>1</sup>

陳弘祐（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四年級）

劉湛湛（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四年級）

## 摘要

以雲林四湖鄉箔子寮為田野，居民如何憑藉地方環境知識（Loc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LEK）在不穩定的濱海生態與人口外移的雙重壓力下，形塑具韌性的飲食實踐與交換網絡。本文首先描繪濁水溪沙洲、東北季風與潮汐交織而成的動態地景。其次，聚焦野生捕撈與沿岸養殖之間選擇與調適的複雜關係、風吹而非曝曬的烏魚子風乾工如何體現身體敏銳感、冷凍保存與遠距宅配策略，將自然時間轉化為可調度的「時間資本」，並延伸親屬照顧與地方味覺記憶。最後，田野揭示以廟口茶會的食物互惠結構：蔬果與熟食在「送來送去」的互惠中鞏固鄰里情誼，烏魚子則在贈禮與商品的雙重軌道上穿梭村內外，為情感與地方認同的物質維度創造意義。

本研究說明：箔子寮的飲食世界並非「傳統／現代」二分，而是透過感官韌性（LEK的即時調度）、技術韌性（野生、養殖、冷凍習慣的混合）與關係韌性（食物流動的禮物經濟）三重迴路，探討食物可作為連結環境、勞動與社會關係的關鍵介面，展現臺灣沿海社群中的箔子寮的生計策略與文化樣貌。

關鍵字：箔子寮、地方環境知識、風土、烏魚子、食物交換

---

<sup>1</sup> 本篇報告的完成必須感謝箔子寮村民的大方協助。首先我們特別感謝吳媽媽夫婦為我們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經驗，特別感謝琴芳阿姨以及母天宮前的阿嬤們，也特別感謝蔡茂昌大哥、蔡茂源大哥、蔡心娜村長的照顧，以及春天民宿的文進老闆夫婦、福建熱炒的福建老闆夫婦、普天宮的灣灣高淳斐大姐、王隆智先生與阿雪姨以及善水咖啡在田野期間的照顧，再次非常感謝各位村民協助我們完成這份田野調查報告。此外，我們也特別感謝自始至終都一直幫助著我們的兩位助教郭天祐和盧佳秀還有最重要的黃郁茜老師，也非常感謝評論人田勛學長。

## 一、導論

對於長期定居在都市的我們，已非常習慣於垂手可得各式各樣的食物。然而在臺灣最西邊的一隅，雲林的箔子寮有著與我們經驗迥然不同的現象——在那裡，沒有便利商店，也找不到固定的菜市場。清晨短短幾個小時，是村內食物流通最為活躍的時刻：幾個流動攤販、幾籃當日漁獲、偶爾出現的肉販，隨著時間推移迅速消散……。在面對全球食物體系日益商品化與標準化的今天，「在地性」作為一種回應現代化衝擊的文化策略，越來越受到關注。特別是在生產與消費被大型供應鏈抽離地方脈絡的情況下，村落社會中持續存在的食物自產、自用與互贈系統，不僅挑戰主流經濟邏輯，更揭示了另一套關於食物、勞動與社會關係的價值體系。本民族誌即根植於此問題意識，試圖理解臺灣雲林沿海村落——箔子寮——如何透過在地飲食實踐與食物交換網絡，維繫一種非市場導向的生活模式。

本研究的分析主軸為地方環境知識 (Loc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LEK)，即居民在與土地、氣候與物產長期互動中累積的感知與技藝。Berkes 等人 (2000) 指出，LEK 不僅是關於物種與環境的知識體系，更是一種因應不確定性與回饋機制的適應性管理方式 (adaptive management)。在箔子寮，這些知識體現在各種看似尋常的日常活動之中：如風乾烏魚子時不以日照為主，而是細緻判讀東北季風的強度與方向；又如好幾位報導人利用自家空地栽種蔬果，並告訴我們捕撈與曝曬都必須依據氣候與潮汐安排。這些與環境互動的實作，正如 Ingold (2000) 所論述的，是透過勞動與感知不斷累積與調整的知識場域，知識並非預先存在於腦中，而是在與環境的共同生成中逐步浮現。

進一步地，我們引入「風土」(terroir) 這一概念，強調食材的味道不僅來自地理與氣候，更是由地方知識、文化實踐與技術條件共同構成的。箔子寮的風乾魚產之所以別具風味，不僅在於物質環境，更在於村民對風、濕度與時間的精準感知與技術調度。這些食物的生成過程，不僅是對自然的調適，更是地方性知識的物質展演。

然而，這些食物並未全然進入市場流通體系。反之，我們觀察到村內的食物交換制度——從廟口茶會中的點心分享、親屬間的魚貨寄送，到鄰里間的熟食與農作物互換——多建立於關係性而非價格機制。Mintz (1985) 曾指出，食物的社會生命不應僅以商品角度理解，因為它同時也牽涉到階序、親屬、情感與歷史的糾纏。在箔子寮，「隨便吃」雖作為一種對日常飲食的自我描述，實則展現了食物如何透過地方網絡中的贈與與互惠，被轉化為一種富足而穩定的生活感。

綜上所述，本研究欲透過田野觀察與訪談資料，探討 LEK 如何支撐風土的形成，以及這種風土如何在日常的食物生產與交換中被實踐。箔子寮的例子不僅

是生態知識的展示，更是一種對現代經濟邏輯的文化回應。透過對勞動、照顧與贈與的民族誌描繪，我們希望揭示，在臺灣的邊陲地帶之中，一種非市場主導，以感知與互惠為核心的生活模式，如何持續被實踐、維繫與再生產。



圖一：我們實際造訪的地點。中間密集處為本次田野集中範圍，右下角則是距離村子最近的市場，下崙黃昏市場。

(資料來源： Google Maps 2025)

## 二、文獻回顧

### (一) 理論文獻回顧

飲食作為重要的人類學議題，探討了飲食行為如何超越生理需求，成為文化、社會和象徵意義的核心場域。Mintz and Du Bois (2002) 列舉了過去人類學針對飲食所做出的田野研究，提供了過去人類學針對飲食文化的重要脈絡，並且指出人類學家越來越關注廣泛的社會變遷對飲食模式的影響。在過去數十年中，全球化與國際人口流動已對各地飲食文化帶來不同的影響，進而產生文化間的交換與協商，而此等交融往來來自跨文化的共食現象所導致。這一過程不僅改變了飲食模式，也重塑了飲食行為的社會與文化意涵，尤其體現在飲食與環境的協商與地方性飲食實踐中所創造的文化象徵與社會動態。

人類的飲食很大程度地受到環境所影響，因此在理解飲食行為與文化如何交織之際，地方環境知識 (Loc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LEK) 成為切入食物生產與文化實踐的重要概念。LEK 通常指涉特定社群在特定地景中，長期透過與之互動，透過感官參與、實踐與經驗所累積的知識體系。這些知識不僅關於如何

辨識、取得與處理自然資源，更體現於社群如何因應環境變化與氣候風險，並在世代之間透過實作、故事與身體經驗進行傳遞（Berkes et al., 2000）。Ingold（2000）則更進一步指出，環境知識不應被視為封閉的資訊集合，而是一種透過日常勞動所生成的「體現性知識」（embodied knowledge），在持續與土地、風向、天氣、物種的互動中發展，換言之，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此外這種知識大部分無法單純以語言或文字完全轉譯，而必須透過行動與感官實踐予以學習與延續。

在箔子寮的田野調查中，我們觀察到 LEK 體現在居民對於東北季風的熟悉與掌握上，我們透過吳媽媽學習到烏魚子必須善用強勁的東北季風將其風乾，同時避開陽光曝曬以免裂開，並且透過壓上重物使得烏魚子變得紮實而帶有彈性。這種技藝隱含著居民對天氣節奏的精密觀察與風險評估能力，若當日氣候不穩或濕度升高，居民會迅速調整曝曬方式，甚至提前收起乾貨，以免損壞。另外，我們在箔子寮觀察到居民大多以身體直接地感受天氣，不論是下雨、颶風還是氣溫，有別於我們在台北時，許多時候緊閉的門窗、窗簾和冷暖氣全天遮蔽了室外的天氣，即使想知道現在天氣如何也時常慣性拿起手機查看手機上的天氣。這些應變策略正是長年累積的 LEK 所展現出的地方智慧，也是居民在面對環境不確定性時的一種生存與適應策略，同時也是難以文字傳承的技術而需仰賴身體實踐與日常模仿的傳承方式。

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由東北季風風乾而成的烏魚子似乎在某些箔子寮人心中形成了一個家鄉的印象，正如福建老闆夫婦告訴我們，烏魚子是年輕人返鄉一定會想吃的東西，藉此，我們將透過 David Sutton（2001）在其研究希臘卡利梅羅島，說明食物不僅是營養攝取的手段，而是一種「召喚記憶的媒介」（mnemonic device），人們透過感官的體驗，能夠喚起特定時間、空間與情感經驗的交錯場域。烏魚子因此不只是箔子寮沿海食物鏈的一環，而是一種「記憶的物質形態」，它召喚家鄉的風味以及家人的情感。在這樣的脈絡中，「風土」便不再只是物理地景或生態條件的總和，而是地方知識、勞動、感官實作與集體記憶交織之下，形塑地方價值與文化延續的重要基礎（Trubek 2008）。

在如此的氣候與聚落規模之下，箔子寮人因應不穩定的食物供應而發展出一套有別於都市化食物供應體系的儲存機制與交換體系。村民卻透過蔬菜與漁獲的分享、熟食的互贈、與親屬的食材寄送等行動，形成一套活絡的交換網絡，正如 Mauss（1925）在《禮物》一書中指出，交換不只是經濟行為，更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實踐，在箔子寮，食物不只是物質資源，而是一種關係的媒介，透過寄送、交換、共享來維繫社群的互動與親屬關係。同時，這些交換常伴隨著延遲回報與情感義務，如同 Sahlins（1972）所言，是維繫社群互惠關係的延宕交換（delayed reciprocity）。從廟口茶會到家庭晚餐，食物流動不僅滿足基本營養需求，更在無形中鞏固了人際網絡，讓食物成為社會記憶與關係的媒介。這種非市場機制的互



惠經濟，展現了地方社群如何透過食物流動來強化彼此的信任與義務。在這樣的交換關係中，食物不僅是一種物質資源，更透過日常流動與互贈行為，持續生成與鞏固地方社群的親屬與社交網絡。

## （二）區域文獻回顧

在開始之前，我們必須認知到箔子寮這個小村莊的特別之處。回顧黃郁茜（2024）在《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四湖鄉·箔子寮）》前言中指出，這是一個人口外移非常嚴重的沿海小村子，過去曾因漁業而享有一段輝煌的歷史。箔子寮港曾是雲林唯一不會淤沙的港口，舟船雲集，繁華一時（西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2024）。1970 年代開港以後，它一度是全縣最具規模的二類漁港，甚至在 1980 年代的交易量與熱絡程度上超越嘉義布袋，是當時西部沿海的重要樞紐。

然而，隨著漁港逐漸淤積，漁獲量逐年遞減，加上 1990 年代濁水溪整治與離岸沙洲地形變動的影響，曾經讓箔子寮自豪的港口逐步封閉。再加上離島工業區的開發失敗與閒置，使原本有望轉型的地區產業發展停滯。劉曜華於 2006 年所編的《四湖鄉志》中記載，1996 年漁會與市場大樓的一場大火，彷彿象徵著整個港市繁榮的終結。至今，曾可容納數百艘漁船的漁港，只停泊著幾艘膠筏，船隻只能在滿潮時才勉強出港（黃郁茜 2024：iii）。

現今的箔子寮即使仍然可見魚塭，但因為過去工業用地的編定，養殖業也十分受限。儘管如此，過去繁華的痕跡仍隨處可見：港邊廢棄的漁市場、滿是鏽蝕痕跡的鋼構建築、寫著「魚貨直銷中心」卻早已人去樓空的大樓，無聲地述說著這座村莊的興衰（郭天祐、劉曉語 2024）。

從人口數據觀察，根據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提供的資料，截至 2025 年 4 月 1 日，大陸與外籍配偶以女性為主體，其中大陸配偶女性有 436 人，其他外籍配偶女性有 393 人；男性僅分別為大陸地區 7 人與其他外籍配偶 11 人。港澳地區配偶則為男性 1 人、女性 6 人，總計男性配偶僅 19 人，女性高達 835 人，顯示跨國婚姻中女性配偶佔壓倒性多數。以箔子寮所在的箔子村為例，同日資料顯示男性人口為 471 人，女性為 386 人，男性多出近百人。整體而言，113 年度四湖鄉人口年為 -319 人，相較於前一年的 -565 略為趨緩，但整體而言仍然呈現持續負成長趨勢（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 2025）

### 三、關於環境

#### (一) 地理位置

箔子寮，這個隱身於臺灣西部沿海的漁村，看似靜謐平凡，實則在自然與人為力量交織下，演繹著一場又一場微妙而堅韌的生存戲碼。這裡的地理，不是靜止的背景，而是村民日常生活中最具動態性的成員。從沙洲漂移到人群流動，地景與生活方式的變遷無不銘刻著自然與文化的緊密互動。

箔子寮的自然地理特徵，是典型的濱海沙洲地貌，由濁水溪帶來的泥沙沉積，長年受東北季風與海潮推動，不斷形塑著沙洲的形狀與位置。地勢低平，土壤鹽化，水資源貧瘠，這些自然條件不僅影響了生產活動，更深深植入居民的生活節奏與感知之中。因地勢低窪，居民口中的「地」從來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流動、需要因應的。沙洲每年南移，漁港功能逐漸衰退，使得原本依賴近海捕撈的小漁村，不得不轉型發展蚵仔養殖與其他副業。

這種不斷調整與遷徙的空間經驗，呼應了 Ingold (2000) 所言，人類與環境的關係並非建立於客體化的利用上，而是透過不斷的「行走」、「居住」與「調適」而生成的生態互動。走進箔子寮，很難不注意到那些零散分布的大片空地。這些空地，是烏魚子、劍蝦乾、蚵殼曬場的天然舞台，也是人與自然協作的結晶。見到長者們在家門口穿串蚵仔殼，一串一綑，堆積成比人還高的小山。即使串蚵殼是個存在已久的兼業，也不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但曝曬桌、蚵殼堆、簡易棚架構成了村落中常見的地景符號。這些曝曬空間不只是生產用途，它們同時也象徵著地方經濟型態的轉變，從過去依靠漁撈捕撈，轉向以烏魚子、劍蝦乾等加工為主的小規模生產。



圖二：堆得比人還高的蚵殼  
(陳弘祐 攝)



圖三：放置在路邊的劍蝦乾  
(陳弘祐 攝)

此外，冬季強烈的東北季風使得箔子寮即使緯度比臺北低了許多，卻有著不輸臺北的冷勁，伴隨著些許夾帶雨水的強風，即使穿著厚重的羽絨衣，踏出戶外仍然把人凍得鼻水直流。而箔子寮的強風也是不容小覷，我們在雲 131 線道上騎著機車，風的呼嘯聲常常使我們聽不見彼此講話的聲音，且時常把機車吹得搖搖晃晃，即使是站在地板地面上，也經常被風吹得重心不穩，由此可見箔子寮居民平常所面臨的地理現象為何。

然而，這些看似充滿活力的空間，也折射出一個更隱晦的人口流失事實。隨著年輕人外移至都市尋找工作，村內主要留下的是中高齡人口。許多曝曬場長時間閒置，只有季節性活動時才重新喚醒生機。而曝曬的節奏日出推曬、午時收回、午後再曝、傍晚覆蓋成為了僅存居民與自然之間默契的節奏 (Ingold 2000)。每一次搬動桌椅、調整蚵架，都是對天候、季節與生活條件敏銳感知的體現。根據我們的訪談，曾任普天宮的廟公王隆智先生告訴我們

「以前箔子寮曾經因為漁業發達，為了讓工人一大早就有東西可以吃，所以有非常多的早餐店，然而因為年輕人外移、漁業式微加上物價上漲，所以漸漸變得很少。」(2025/01/07，王隆智先生)

現在僅存的兩間早餐店其中之一的無名早餐店的前身就是一台發財車而已，後來生意做得不錯才在箔子寮落地生根，開了店面，是廟公先生從小就一直吃到

現在的早餐店。藉由廟公先生的說法，使我們可以一窺箔子寮在人文地理上的興衰。

隨著聚落人口密度下降與居民活動範圍變廣，箔子寮逐漸發展出一套高度彈性的物流系統。田野筆記中，每日上午或下午時分，都有小貨車載滿蔬果、海產、日用品，在普天宮前廣場或停靠，形成流動市集這種移動式送貨方式，是對村落低密度人口分布的即時回應。它打破了傳統固定市場的時空限制，也讓年長或行動並不特別方便的居民能夠在家門口完成日常購物。

Scott(1998)指出，在小型社會中，這種依靠社會網絡維繫的經濟流動方式，往往比中央規劃的正式制度更為靈活有效。箔子寮的送貨車隊，就是一個由底層社會實踐自然生長出來的適應機制。地景作為社會記憶與生存韌性的場域，視角回到箔子寮的地理位置，不是靜止的地圖座標，而是一個動態的、與居民生命經驗交織生成的場所。從沙洲的漂移到曝曬場的日常調度，從流動送貨車到漁港的衰退，每一個空間變化，都書寫著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史詩。

箔子寮人在這個不穩定地景中生存，不是因為擁有征服自然的技術，而是因為擁有與環境持續對話、微調、協商的生活技藝。這種技藝，是箔子寮真正意義上的與環境應對的智慧。「海」在箔子寮並非遠方的景觀，而是從清晨第一陣潮水湧上岸邊開始，就滲透於人們呼吸之中的存在。海不僅提供了漁獲、養殖資源，更形塑了村民的時間節奏、社會關係與情感結構。海洋資源利用之於箔子寮人，不是單向度的索取，而是一種綿延於身體、勞動與知識體系中的共生實踐。

## (二) 海洋資源

過去，箔子寮的經濟重心仰賴野生漁撈活動。每年冬至前後，是烏魚子生產的黃金時期，居民們凌晨出門，與外海漁船協作，搶購新鮮烏魚卵，回家製作成價值不菲的烏魚子烏魚卵的處理工序極為繁瑣：剖取、清洗、鹽醃、壓形、曝曬，每一個步驟都需要精準的手感與氣候判斷。吳媽媽呵護的烏魚子們是以「早上推出去曬，中午收進來，下午再推出去，一天要動三四次，太陽太大還要蓋紗布。」這種曬烏魚子的節奏製作的，緊緊貼合天氣變化與海風節奏，體現了箔子寮人與自然環境高度協作的生產模式。

然而，隨著近海漁獲量減少與捕撈成本上升，養殖業逐漸取代了野生捕撈，成為村內常見的漁貨來源。即便養殖漸漸地多過了捕撈，在沿岸的沙洲也看見過去遺留下養蚵的痕跡，像是曾經的養殖浮筏棚架仍有著許多的竹子一根根的留在

了沙洲，然而，這是過去蚵仔養殖的留下的痕跡，現在已無養殖蚵仔之生業，曾經的箔子寮擁有的捕漁業、養殖業如今都已式微。

天氣的變化，影響了曝曬烏魚子、劍蝦乾的安排。這種日常與自然節律同步的身體感知，是透過長年累積的勞動經驗所內化的地方性知識（Berkes 2000）。這種知識體系，不僅表現在捕撈技術上，更滲透到生活細節之中。

關於海洋生產系統中，性別與年齡扮演了重要的分工角色。男性多負責出海捕撈，女性則專注於串蚵殼、處理蚵仔、曬製烏魚子等細緻的加工工作。例如，老人家們在自家門前，用打洞器將蚵殼打洞、以塑膠繩將打好洞的蚵殼串起，每十串一捆，販售給蚵農做為蚵苗附著基礎。這種勞動，不僅提供了微薄的收入，也讓年長者在勞動體系中保持存在感與社會價值。正如 Ortner (1974) 所指出的，在多數小型社群中，性別與年齡不是社會邊緣化的標記，而是組織勞動與生產系統的重要軸線。箔子寮的海洋勞動分工，就是一個典型例證。

也許，對箔子寮人來說，海不是資源，不只是生計依賴，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從身體感知、生產的季節節奏、加工的勞動分工，每一個層面都深刻地繫結於這片海洋之中。

### （三）氣候條件

在箔子寮，氣候不僅是一個背景條件，而是一個時時刻刻參與於日常生活、勞動決策與社會關係建構的「隱形共生者」。東北季風、颱風、季節性降雨這些自然力量不斷地塑形著村落的節奏、資源運用與社會互動。

箔子寮居民的生活節奏，幾乎完全以氣候為主導，冬季強烈的冷風成為居民日常考量的一部分，是否出門、該穿戴什麼衣物，或是該怎麼掌控烏魚子熟成節奏。每年 11 月至翌年 3 月，強勁而乾冷的東北季風從中國大陸吹向臺灣西岸，成為箔子寮冬季最重要的氣候特徵。這股季風的到來，直接啟動了村落內最關鍵的生產活動：烏魚子與劍蝦乾的製作。

吳媽媽一家凌晨四點推出烏魚子曝曬，中午高溫時收回，下午再度曝曬，日落前以重物覆蓋防止水分回滲這種與季風同步的生活節奏，並非憑空而來，而是透過多年經驗累積、身體實踐內化而成的地方性知識（Berkes 2000）。

東北季風帶來的乾燥空氣，有助於快速脫水與防止霉變，使得烏魚子質地緊緻、風味濃郁。因此，每年的東北季風表現，成為箔子寮人經濟收成與生活信心的重要指標。這種對氣候微差異的細膩感知，體現了 Ingold (2000) 提出的「環

境感知」理論：人與自然不是二元對立，而是透過感官與行動相互生成的存在關係。

## 四、應對環境的飲食實踐

### (一) 野生與養殖之於箔子寮人

走在箔子寮村的小巷間，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籃籃高過成人胸口的蚵仔殼。老人們屈膝坐在小板凳上，黝黑雙手動作熟練精準地用竹籤穿刺著蚵殼，十串一網，四十五元的微薄收入，承載著日復一日的身體記憶。這些串好的蚵仔殼將被運往外海，讓新生的蚵苗附著成長，再收回淺海。

養蚵，既是生計，也是技藝。蔡瑞泉先生在導覽時提及，隨著年輕人外流，這項仰賴經驗累積的工作逐漸成為老人家的日常，也成為文化傳承上的斷層危機。田野觀察中，村裡許多女性勞動者穿梭在蚵棚架之間，串蚵、剝蚵、整理蚵仔殼，構築了箔子寮特有的海邊村落勞動風景。每年冬至前後，村裡又進入了另一種因野生烏魚季而生的緊張節奏。在吳媽媽家的烏魚子曬場上，我們看見長桌上密密排列著金黃透亮的烏魚子，戴著斗笠、防曬袖套的女性輕柔地翻動著，每一次翻動都是對天氣的細緻回應。

吳媽媽與吳伯伯堅持只使用野生烏魚子，並自豪地指出：「我們沒在做『窟子(khut-á)』的！」(指養殖烏魚子)。從外海捕撈的野生烏魚，不僅肉質緊實、油脂豐厚，更承載著一代漁民對海洋變化的細膩感知。這些野生資源，短短一個多月內醃漬、風乾、真空包裝，之後靠宅配賣到臺北、新竹、桃園、高雄等地，讓箔子寮的風味穿越都市邊界。吳媽媽夫妻倆堅定地說，他們的烏魚子，從不取自養殖。

「我們的烏魚子，一定是野生的，味道差很多。」(2025/01/07，吳伯伯)

吳伯伯用台語重複強調。每年冬至前後的三十天，他們向外海捕撈的漁船購得野生烏魚卵，在家中手工醃漬、風乾、真空包裝。忙碌的身影穿梭在堆滿烏魚子與劍蝦的家屋內外，從未因歲月改變手藝，也未因市場起伏妥協標準。

箔子寮人明白，野生與養殖之間不只是價錢的差異，更是關於「味」與「身體」的記憶。丁阿嬪在茶敘間語重心長地說

「烏魚啊，還是野生的才會有那個味。」(2025/01/07，母天宮前丁阿嬪)

即便養殖技術日益純熟，卻無法複製海水回流、風浪拍打中生長的緊實與鮮香。

冬日天氣變化無常，若連日陰雨，未能及時風乾的烏魚子容易腐壞。因此，不少家庭開始運用冷凍技術，將尚未完全乾燥的烏魚子暫時保存，等待天晴再度曬製。冷凍技術與養殖資源，成了村民們在自然不確定性前的雙重保險。這種折衷並非單純的現代性入侵，而是一種深諳「與天協商」的智慧。風、濕度、溫度，甚至潮汐，都成為生活中必須密切感知的變數；在大自然與人為技術之間，箔子寮人摸索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半野生、半養殖」之路。在箔子寮人眼中，野生與養殖絕不僅是經濟選項，更是關乎價值的認同。

「野生的比較 Q，吃了不會鬆鬆的。」（2025/01/07，吳媽媽）

吳媽媽一面整理烏魚子，一面這樣說。這不只是一種味覺描述，而是種對生命力的直覺體認：真正經過海流沖刷、自然生長的生命體，帶著無可複製的韌性與風味。

野生，則依舊是精神與身體深處的原鄉，是一種被記憶和味覺共同認證過的真實。即使居民對養殖魚有些嫌棄，但養殖並非毫無價值，但在在地人的語境中，總帶著一絲不得已與妥協的色彩。野生，特別是野生烏魚子成了家庭、節日的贈禮、成了連結親情的媒介。在箔子寮，野生與養殖、傳統與現代、自然與技術，不是簡單的對立，而是流動的、彼此滲透的。

蚵仔殼堆、烏魚子曬場、冷凍倉庫，每一個場景都訴說著這個村莊如何在變動中尋找支點。箔子寮人以身體為尺，以味覺為標，丈量著這片海口的風土，也用自己的方式，持續編織出一套既傳統又現代的生存漁網。

我們在星期五晚上決定冒昧地問看看吳媽媽什麼時候還會做烏魚子，能不能加入，她告訴我們隔天早上四點就會開始工作，我們聽到後倒抽了兩口氣，硬著頭皮答應了。

## （二）風乾和曝曬

星期六凌晨四點，天空仍然灰暗，我們揪了助教佳秀依照前一天和吳媽媽約定，冒著大風來到吳媽媽家門口。吳媽媽走出門看到我們三人臉上顯著有些驚喜，沒想到我們真的會來，但因為外面飄著細雨，又顯得十分焦躁。吳媽媽心急地請我們用手機幫她查詢什麼時候會雨停，因為正在風乾的烏魚子只要一碰到水，就很容易發霉，但若一天沒有讓烏魚子風乾，一方面出貨進度會拖遲，一方面也將

影響烏魚子的品質，與此同時吳媽媽必須時常確認擺放烏魚子的木板和布條有沒有發霉斑點。我們隨著吳媽媽走到隔壁的倉庫，在室內將層層堆疊、以水泥磚壓在上面的烏魚子一片一片翻開放在陳架上，等待天氣放晴（圖四、五）。

烏魚子熟成的過程需要仰賴非常多的時間與心力。烏魚汛期間，吳媽媽必須四點就開始工作，且凌晨的工作皆為她一人作業。吳媽媽將烏魚子一台一台地推出倉庫，至中午十二點時為了要避開太強烈的陽光，必須將烏魚子一台一台地推回倉庫，否則烏魚子將受熱膨脹、裂開，接著下午再重複同樣的動作，直到晚上六、七點時才能將烏魚子一片批片地疊起壓上重物，使其在夜間藉由重力擠壓出多餘水分。而在風乾的過程中，吳媽媽和丈夫必須輪班鎮守，隨時緊盯烏魚子以避免有貓狗來偷吃，也要隨時注意天氣狀況，因此倉庫內擺放了好幾張塑膠椅，還有一瓶用寶特瓶裝的花生與茶盤，提供值班的人打發時間用，也讓前來的朋友一起坐著「抬槓」（圖七）。這段等待的時間，我們發現吳媽媽一下和我們對看聊天，一下望向外面的天空，好像正在觀察著天色的任何一點變化。

好不容易等到雨停，我們四人合力將兩台陳列架推出倉庫（圖六）。風乾的過程中必須時常翻面，剛開始烏魚子還保有較多水分，觸感濕軟呈鮮艷橘紅色，從木板上拿起時還呈現柔軟的質地且會稍微沾黏在木板上，這時吳媽媽吩咐我們每 30 分鐘要翻一次面；待水分蒸散較多時，烏魚子會摸起來較紮實、乾燥，烏魚子表面被油脂包覆，呈褐色，從木板上拿起時變得非常輕鬆而不沾黏，這時的翻面頻率就延長到 60 分鐘翻一次就好。

陳架推出倉庫後，馬上要面對的是強勁到足以把人吹得重心不穩的強風，因此將陳架推到定位後，吳媽媽便拿繩子，與木板垂直的方向將每一片木板牢牢地固定在鐵架上。我們在幫烏魚子翻面時，突然一陣狂風襲來，就連體重將近 70 公斤的弘祐都踉蹌了幾步，可想吳媽媽平時沒有人幫忙時，是在什麼樣艱困的環境完成這些工作。

隨著凌晨的例行工作差不多告一個段落，吳媽媽像我們提起希望我們幫她顧一下，好讓他去刷牙、拜菩薩，我們這才知道做烏魚子這份工作已經完全鑲嵌於吳媽媽的生活中，舉凡梳洗、拜拜、煮飯吃飯等每天的例行公事，在烏魚汛期間都必須與工作協調。

藉由一個清晨的工作，我們發現製作烏魚子這份工作，著實也是一份靠天吃飯的工事，並且十足靈活地運用了一天 24 小時的時間。在箔子寮，風乾烏魚子的過程不僅展現了居民高度依賴天氣條件的在地環境知識（LEK），更具體體現了「風乾與曝曬」作為一種與自然協商的飲食實踐形式，此小節命名為風乾與曝曬，即是表達烏魚子生產者「要風吹使其乾燥，但避免曝曬」。面對東北季風與隨時可能出現夾帶著雨水的的不確定性，吳媽媽發展出一套極為細緻的應對策略—



—從凌晨即開始的作業流程、反覆翻面的頻率掌握，到對濕氣與觸覺的微小察覺，無不彰顯出她們如何以身體經驗與時間勞動來調節與自然之間的關係，而且以非常細緻的感官覺察，細緻地掌握每一片烏魚子的現況。風不是單純的自然條件，而是被精準計算與動員的生產要素；而風乾也不是我們過去所想像的，單純靜置於日光下，而是一套巧妙地以日照節奏、時辰作息與空氣流動為尺度的勞動節奏安排。這些實踐反映出茆子寮居民對於天氣與物質變化深厚的感知力與操作經驗，也讓風乾的烏魚子成為一種在地風土條件與人力勞動交織的具體結晶。



圖四：一行人把疊起的烏魚子打開  
(陳弘祐 攝)



圖五：此時外面還下著小雨。烏魚子在倉庫內每 30 分鐘翻面一次  
(陳弘祐 攝)



圖六：將烏魚子推到室外後，以繩索固定，避免棧板被吹翻  
(陳弘祐 攝)



圖七：等待時和吳媽媽一起坐在倉庫抬槓  
(陳弘祐 攝)

### (三) 以冷凍魚貨回應環境

清晨一陣忙碌後，陽光開始慢慢升到頭頂。隨著清晨的工作告一段落，我們回到民宿稍作休息，稍晚我們再次踏入吳媽媽的家中。這次來除了要幫吳媽媽將放在院子的烏魚子推回倉庫，更重要的是想一探她平日張羅餐桌的模樣。

進到吳媽媽的廚房，我們很驚訝地看到兩台冰箱，分別冰滿了不同類別的食物，一個塞滿了烹飪用的食材，另一個則是其他的食物。吳媽媽打開儲存食材的冰箱，冷凍庫中塞滿了一包一包以塑膠袋包裹好的魚。吳媽媽從中抽出一包，放在流理台退冰，我們隨即詢問那是什麼魚，吳媽媽一邊回覆「午仔」(ngóo-á)，一邊俐落地清除魚的腸子。那一餐，吳媽媽準備了一盤清炒綠花椰菜、一盤炸蝦子、一條煎午仔魚、先滷好的一鍋肉，還有她自己吃的鯽魚，總共五菜一湯，即使是他口中的隨便煮煮也有十分豐富的菜色。



圖八：精心準備的一餐  
(陳弘祐 攝)

隨著田野進行，我們也陸續聽到許多村民會將買來的魚冷凍保存。一天中午到福建熱炒吃午餐，順便與蔡福建老闆聊聊他對箔子寮飲食的看法。福建老闆特別提到，箔子寮這邊從很久以前就一直是那二到三輛貨車來賣魚，以前是老年夫妻在賣、現在是年輕人負責居多，可能算是第二代，廟正對面那間的（阿伯）是下崙來擺的，搭配王隆智先生的說法，這種現象可能是過去幾時年，自從箔子寮開始面臨人口流失時開始。因為並不是每天都能夠在村內買到新鮮漁獲，村內許多老人會一次一袋一袋地買，或者冰起來自己吃或者冷凍寄到外地給小孩、親戚。

這番說法在蔡心娜村長的口中得到應證，她告訴我們將新鮮的魚冷凍可能不只是為了要寄送到外縣市分送給親戚，還有可能是考慮到季節的因素，而且也不是所有的魚都適合這樣冰凍保存。村長說舉例道：

「...現在這個季節啊，只有白帶魚、午仔魚可以放很久，只要有打包好或真空冰在冰箱，那個肉的甜味就不會不見，啊也不會不新鮮。.....過完年之後的魚是最難吃的，.....烏魚期夾帶的其他魚是最新鮮的。.....（但是）能夠放那麼久的魚不多，而且現在剛好是魚最好吃的時候，所以會特別送給親戚或是留著自己留起來吃。」（2025/01/16，蔡心娜村長）

針對冷凍漁獲，我們遇到的幾位受訪者都有一致的說法。

冷凍魚的保存，不只是家務技巧，更是一種深植於地方知識與生活節奏的環境適應策略。在箔子寮這個靠海的村子裡，考量到季節性的漁獲流通以及高齡化、人口外移的現實，為了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新鮮好吃的魚肉，居民善用了冷凍保存的技術，進而形成一種習慣。這樣的作法不僅是為了自己能在非捕撈季也吃到符合村民口味偏好的海魚，也是為了讓在外的親人仍能嚐到故鄉的味道。這種保存與分享行為，不僅回應自然條件的限制，也透過食物流動，延續了村內與村外的親密連結。針對食物流動與寄送漁獲的情感連結，我們將於下個章節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 五、飲食習慣中的交換行為

### （一）烏魚子的角色

烏魚子在交換行為中，最直觀的作用是作為「禮物」。由於價格昂貴、加工講究，烏魚子常被視為「最能代表漁村特色的伴手禮」。在過年、婚喪喜慶或走訪親友時，送上一份烏魚子往往能體現贈禮者的經濟能力、情感誠意，也透顯出當地人對「體面」與「情意」的重視。烏魚子在這其中作為金錢或實物的買賣其

實是退到第二層意義的，反而在流動的過程是更象徵人情與社會地位的流動，維繫著當地特有的社會。

對漁村加工戶來說，烏魚子同時擁有商品與「家常美味」的雙重意涵。從訪談得知，忙完一整季的曬製後，農曆新年便是家族圍爐、分享烏魚子的時刻。這些自產自銷的烏魚子，不僅能讓家人嘗到最新鮮的海味，也成為子女返鄉時的一道「家鄉記憶」。在內部家族中，烏魚子不一定被視為日常餐桌上的必備，但只要親友聚會或過節，往往會「切幾片」招待大家，把平時辛苦的成果作為家人情感交流的窗口。

儘管烏魚子在村內的日常膳食未必天天登場，對外卻往往被賦予高價值與地方象徵。部分當地老人因腸胃或食習慣，反而對烏魚子興致不高；但一遇上外地客人，或是要向親戚朋友展現「漁村特色」時，烏魚子又成為令外地人驚艷的珍饈，也因此提升村落的名氣及獨特性。在這樣的「內外有別」中，烏魚子兼具「地方特產」與「商品」的雙重形象。

烏魚子背後潛藏著一層人情債的互動。誰家有加工技術、或能拿到第一手漁獲之間不一定是絕對或單一的關係，資源與人脈便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吳媽媽：這批是廟拜託我做的，是因為我上一批剛好做完還有時間做。

（2025/01/11，吳媽媽）

村長：吳媽媽那塊地是廟的，所以他幫廟做烏魚子也算是合理。

（2025/01/16，蔡心娜村長）

透過上述對於吳媽媽正在製作的烏魚子，箔子寮人做出的評論，且吳媽媽和村長同時有著親戚關係。我們得以窺得，在烏魚子的加工流程之之中，加工戶若有償或無償的提供勞務服務，或因為親戚關係而疊加其他層面的供給因素，同時是對箔子寮村莊中的關係強化。換言之，這些交換絕非單純的商業行為，而是一種交織著情誼、互惠與人際的過程。

此外，烏魚子也透過村民子女的跨區移動，進入到更遠距離的交換網絡中。吳媽媽的小孩在外地工作，如新竹科學園區、臺北的學校等等，便成為連結箔子寮和外地的節點。這些年輕一代透過人際網絡，將家鄉的烏魚子帶到職場或朋友之間銷售，一方面協助家中產品拓展銷售路徑，一方面也藉由贈送、代售烏魚子強化了自身與原鄉、家庭之間的情感連結。吳媽媽和我們聊天時語帶驕傲地和我們分享自己的孩子幫忙把烏魚子賣到外地的經驗，特別是講到他們經營臉書粉絲專頁，以及先前曾經一起去市集擺攤的經驗時。

## (二) 漁獲、農作物的分享、分送

我們在吳媽媽的家中聊天時，得知吳媽媽平常若不是烏魚汛期，則會在田裡忙，吳伯伯說吳媽媽就是一個閒不下來的人，總會找點事給自己做。後來吃飯時，我們問起他們平常吃的菜有哪些，吳媽媽說都是他種的菜，有白花椰菜和綠花椰、小白菜、大白菜、菠菜、黑黎子菜，會以季節區分收成，像最近才有白綠花椰菜，夏天就比較多黑甜子菜。她補充道：「早上就掛（kuà，台語的採）了三顆，兩顆給鄰居，一顆拿來炒這盤花椰菜，平常如果炒花椰菜也就是會炒整顆。」他和吳伯伯都會整顆吃完。

在田野來到尾聲時，我們帶著感謝狀跟事先準備的小禮物來到吳媽媽的家門口，正好撞見吳媽媽騎著機車從遠方靠近，機車踏板上放著幾袋血淋淋的肉。吳媽媽看到我們在門口，車子都還沒停好就著急地問我們是不是今天要回臺北，接著拿了塑膠袋分送給原本坐在門口的兩位友人。吳媽媽的兩位友人告訴我們那些是去毛的鴨肉和豬睪丸，是吳媽媽剛剛去大市場買的。同一天弘祐的爸媽也來到田野，也一起去看了吳媽媽，吳媽媽十分熱情地問弘祐的爸媽要不要拿一些菜回家吃，說臺北的菜都很貴，而且沒有那麼新鮮，這些都是吳媽媽自己種的，都是有機無毒、自己也都在吃的菜，還說道：

「反正還有很多，我自己也吃不完。」（2025/01/17，吳媽媽）

希望我們收下這些菜。

無獨有偶，我們在母天宮前的阿嬤口中也聽到了類似的現象。其中一位阿嬤告訴我們會依照自己的喜好來種植蔬菜，像是他因為媳婦喜歡吃辣，所以種了辣椒，也因為覺得白菜適合拿來煮麵吃，所以種了白菜，也不用擔心每天都吃一樣的菜，因為他們鄰居之間都會「送來送去」（sàng-lâi-sàng-khì）。然而我們在當天晚上回到民宿整理田野筆記時突然想到，魚明明常常在箔子寮人的一頓飯裡扮演核心菜餚的地位，某一位阿嬤也說吃飯一定要吃魚，只要有魚就可以吃飯了。但為什麼他們好像不曾提到村民之間會送漁獲呢？

此外，我們在與蔡心娜村長聊天時，他也提到村民常常會拿家裡的菜來送他。身為村長，她會收下村民送的禮物，但若自己也吃不完就會再轉手送給其他親朋好友，因此就算自己沒有種那麼多種菜，仍然可以吃到非常多樣的種類。接著，村長為我們解決了缺乏漁獲交換的困惑。

「魚就比較少這樣交換了。」

村長說：

「一方面魚比較貴，一方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所以不太會送魚……。」（2025/01/16，蔡心娜村長）

我們推測大概是因為箔子寮人對魚的品味特別講究，因此不太會為對方挑選、購買冷凍的漁獲，從母天公阿嬤們的言談間經常有關於漁貨價格的討論，可以道出對新鮮漁獲的敏銳程度，同時，也會將新鮮的漁獲殺好、處理乾淨，冷凍在冰櫃保持肉質的鮮甜以利後續寄送給在外的遊子。村民之間除了已經烹調好的魚以外，其實並無看見或聽聞互相贈送或交換冷凍漁獲之情形，然而蔬菜的贈與卻大有不同，如前述的吳媽媽、蔡心娜村長都提及的蔬菜交換，我們也在母天宮前茶會看見了花椰菜的贈與和分送。箔子寮對於生鮮食材，在漁獲與蔬菜上是有著截然不同的交換模式，居民雖然對漁獲的價格和新鮮程度掌握度高，但除資訊以外較少彼此交換漁獲，反而是購買後的保存、冷凍、並寄送給親戚和孫兒輩；至於自己能夠種植的作物雖然有限，但在箔子寮，因為村民關係緊密、加上作物種類人人種植的品相各異，因此面對蔬菜的交換模式則形成了密切的蔬菜交換網絡，因此比起魚類，蔬菜是村子裡面更長被交換的食物。此外，我們將在下一段討論到另一種特別的魚，作為大量製作的菜餚出現於村內的交換網絡中。這類的食物雖然是比較少被交換的魚類，但它們對村民來說擁有與新鮮魚貨全然不同的意義。

兩類包含著贈與的交換展現了面對同樣是生鮮品類的漁獲和蔬菜，來自喜好、對價值的認定、供給的來源、保存的方法，具體而言，每個人對自己喜歡吃的魚各有偏好，蔬菜則是差異較小、漁獲價格較高但蔬菜相對低廉、漁獲要各自到下崙市場或普天宮廟口購買而蔬菜則是自家菜圃種植、漁獲需要冷凍蔬菜保存期限較短。綜合此些面向，進而發展出了送往箔子寮村外的漁獲以及留在箔子寮內部流動的蔬菜，兩條迥異的食材流通模式。

這種以「贈與」為基礎的食物流動行為，使每位村民即使耕作種類有限，也能透過交換獲得多樣食材。吳媽媽、母天宮前阿嬤、村長蔡心娜等的例子亦揭示了這套網絡的延伸性——身為村中的一員，很容易收到的他人致贈的食材，並且可能再轉送親友，讓食物的價值在村內多次流轉。這樣的交換網絡超越市場機制，更強化了社群內部的互賴關係與情感連結，展現出箔子寮居民如何透過地方環境知識與人際互助，實踐一套屬於自己的、韌性的非市場經濟體系。

### （三）大量製作的菜餚

在前述村內食材流動的網絡中，蔬菜水果等生食材多以新鮮生品的形式進行交換與轉贈；而在箔子寮，食物的交換形式遠遠不止於生食的交換，更在於其烹煮後賦予了更豐富的價值，於村民之間流動。在此脈絡下，烹飪不僅是技術性的

操作行為，更可視為一種社會實踐：人們透過加熱、調味、儲存與分送，重新配置食材的物質性，為這些食材賦予了歷史的價值、家鄉的風味以及深厚的情感，也重新定義其社會性與食用的節奏。我們田野調查期間，時常在老一輩村民的口中聽到「燻ㄟ (khó-e)」的做法，比如我們亂入母天宮前阿嬤們的早餐茶會時，就聽到一位阿嬤告訴我們，他們習慣把魚用煎的、「燻ㄟ」，然後配飯吃就是一頓飯了。然而因為不曾聽過這樣的料理方式，在網路上也查不到相關的說法，於是打算繼續在村民之中打聽這種料理方式為何。

今天又聽到「燻」的料理方式。當我們和吳媽媽共餐時，隨口問了吳媽媽知不知道「燻ㄟ」是什麼，她便指著鯽魚說

「這就是用燻的 (iōng-khó-e)」

我們總算是看到了這種料理方法，深深的醬色加上一些長蔥段，一看就像是小菜館裡面會出現的「蔥燻鯽魚」。關於鯽魚，看到吳媽媽一次買就是一袋，一次煮的量大概二十幾條，會分裝在數盤之中。在吳媽媽煮飯的過程中，有一位騎腳踏車的阿姨前來，吳媽媽變拿了一盤（大約 7 條）用盤子裝、外面簡單的套塑膠袋讓阿姨放在腳踏車籃中。吳媽媽貼心地叫我們不要吃鯽魚這道料理，因為刺比較多怕我們不太會吃，如果不小心讓魚刺卡在喉嚨就不好了。吳媽媽一個人就吃了三條鯽魚，他告訴我們他常常吃鯽魚（即圖八左上角一盤數條的深色小魚）。

後來村長也告訴我們，過去因為保存比較不容易，所以村里有「燻」的烹調方法，為了要掩蓋掉魚不新鮮的味道，她說：「就是要吃那個醬的味道啦……。」但是因為鯽魚很小隻，一定要一次用多一點，不然會燒焦。而因為一次會燻出比較多的份量，大家都會互相分享，而即使現在的保存方法已經相當進步，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新鮮貨保存良好的食材，這樣的烹調方法仍然存在於老一輩村民的風味記憶中。我們從吳媽媽的例子得知，一次好幾十條的蔥燻鯽魚雖然同樣是魚類，但因為每次都必須處理一定的份量，加上烹煮後濃郁的醬味，有別於其他新鮮魚貨的食物，鯽魚對村民而言更是多了一層品味與生活風格上的特別意義，也是連結村民與村民之間的物質媒介。

星期一上午，我們透過蔡茂源大哥聯絡到緬甸籍的琴芳阿姨，下午再一次接到琴芳阿姨的電話時已經接近傍晚，她十分熱情地邀請我們一起去和他吃飯，說他正準備要煮晚餐，於是我們兩人在整理一整天的筆記之後，雖然大腦很疲憊，但想到可以吃緬甸料理，便興奮地來到琴芳阿姨家。

我們抵達琴芳阿姨家時，她熱情地招呼我們，首先遞上三顆粽子請我們吃，介紹說是泰式的粽子，但我們隨著阿姨的一陣忙碌，也忘了吃。那天，她剛從臺北華新街回來，順道帶了些特別的食材。她一邊將一片一片的紫米粿直接放入鍋中乾煎，一邊將辣椒、蒜頭、香菜、九層塔（或打拋葉）以及鮮味炒手和其他調



味料加入搗鉢中，用力搗著辣椒醬料。搗鉢是放在地上的，用的力道之大，瞬間覺得力量傳導到整個房子都在振動共鳴，一下一下的碰撞聲迴盪在廚房中。阿姨告訴我們這個粿是米做的，就跟我們（臺灣的）吃的粿一樣，後來和其他緬甸朋友詢問後確認臺灣的叫法是紫米粿粿。琴芳阿姨給我們吃的紫米粿粿是無糖無鹽的，只帶有米香，質地與口感都接近烤年糕，外皮被熱鍋煎得脆脆的，內層軟軟黏黏，咬一咬會釋放出紫米特有的香氣。辣椒的製作是琴芳阿姨每天的飲食例行公事。琴芳阿姨說她無辣不歡，而且這個辣椒不只是沾料，而是她每日三餐的靈魂，可以直接隨著白飯送入口中、也可融入各道菜餚，而最重要的是，這個辣椒的風味也是她對於原鄉飲食的思念。

隨後，她掀開一個放在瓦斯爐上的鍋子，裡面是一鍋泡著湯汁、呈現醃漬蔬菜常有的帶有棕色的身抹茶綠的蔬菜跟一些豬肉。琴芳阿姨向介紹這是「酸巴菜」，但因為這個名詞對我們兩人而言都是新的單字，第一次聽到阿姨講的時候還下意識地給了出來，也誤以為阿姨說的是「酸白菜」，是在反覆確認加上晚上回民宿查資料後才知道「酸巴菜」這道料理。這個帶有大量湯汁的醃菜是阿姨從緬甸帶來的味道，湯底以酸子和番茄熬煮，加上豬肉與葉菜（阿姨告訴我們所有的葉菜都可以，但大部分時候用刈菜），酸爽又濃郁。每次舀起酸巴菜，她都要再添一匙自製辣椒進到碗裡攪和，彷彿不辣便少了靈魂。然而因為我們兩人都不太吃辣，這樣的辣度已經讓我們受不了，但看琴芳阿姨一口接著一口地吃，好像辣椒根本不存在一樣。

接著，阿姨從冰箱取出一袋香腸，配上新鮮薑片與蒜苗拌炒，炒得乾香。她說香腸由她特別請店家灌製，帶有濃厚的香料氣息，非常下飯。阿姨甚至會單吃那帶有焦香的乾煸薑片，不顯猶豫。當天的餐桌逐漸鋪展開來，從冰箱端出來由她小姑製作的韓式泡菜、當天從臺北帶回緬甸泡菜還有滷雞爪成為清爽的冷盤。緬甸泡菜尤為辛辣，顯示出琴芳阿姨真的很喜歡吃辣。

我們與琴芳阿姨邊吃邊聊天，她告訴我們，緬甸料理總是少不了香料與辣味。她笑說，即使吃到胃痛、屁股痛，也還是要吃辣。她與我們共食時，我們注意到她將長條的酸巴菜細細捲起、夾入飯一同送入口中。這樣的搭配，她一吃就是兩大鍋白飯——總共五碗的量，可見這些菜餚真的非常下飯。

由吳媽媽和琴芳阿姨的例子來看，除了體現當地以食為禮的各色，大量製作的熟食不僅延長了食物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可流通性，更在社會層面上，提供了一種低門檻、日常化、卻深具情感力量的連結方式。儘管吳媽媽和琴芳阿姨擁有截然不同的背景與社交圈，兩人的熟食的大方分享與共食，成為茆子寮這個異鄉場域中，持續編織在地社群關係的重要策略之一。



圖九：琴芳阿姨正在地上將辣椒和其他食材搗碎  
(陳弘祐 攝)



圖十：帶有豬肉的酸巴菜  
(陳弘祐 攝)



圖十一：琴芳阿姨招待我們的一桌菜  
(陳弘祐 攝)

#### (四) 廟口茶會的共食樣態

箔子寮母天宮前的小空地，微光透過斑駁的舊招牌綁在一起交疊的防風牆間隙灑下。空氣中還殘留著海潮味與潮濕的早晨氣息，阿嬤們已經逐漸集結。沒有誰發出邀請，沒有任何正式的開場，有靠背的塑膠椅和無倚靠的小木凳象棋矮桌便自然地搬出，塑膠杯、鐵茶具及透明玻璃壺依序擺上。泡茶的節奏如同呼吸一樣自然，在這個空間裡，茶與食物構成了日常共生的舞台。

這「廟口茶會」是箔子寮阿嬤社群長年累積而成，並不由宗教儀式催生，也非正式的社區活動安排，而是圍繞著共同生活節奏自然生成的一種公共聚會型態。正如 Turner 所指出，「共融」(communitas) 往往在儀式之外、日常之中不經意地顯現。箔子寮的廟口茶會正是這種共融感最日常、最樸素的展現。(Turner 1969)

在這場茶會中當一盤炸南瓜、一盆法式吐司、一袋義美夾心酥、一包沙琪瑪被放上桌時，沒有人會特別關心了小食的來源。這些食物從個人的生產與購買過程中抽離，進入到集體的流動當中。參與者們也鮮少詢問食物從哪裡來，只是自然地遞送、分食、再續一杯茶。

這種去個人化的食物流動，映射出箔子寮社群內部深層的互信結構。不同於市場交換中的明確對價關係，廟口茶會的食物交換是一種基於「分享即社會義務」(Mauss 1925) 的無條件施與。正是這種不需明言的倫理，使得社群得以日復一日地在無聲中自我維繫。

箔子寮的茶會並無固定時間表，卻又有一種身體記憶上的準確節奏。大多數參與者在早餐後（通常以泡燕麥或配方奶為主），便自然而然地移動到廟口前廣場。茶壺一開，座位一圈，話題與食物便緩緩展開。這種時間性的共食安排，既呼應了身體需求，也回應了村落生活的節奏既有緩慢安穩的一面，也有對風與溫度的變動而生之敏感。

天氣成為共食節奏的重要變項。冷鋒來襲時，人數便自然減少；陽光燦爛時，茶會則熱絡至需滿滿一圈座位才能容納所有人。這種對環境的即時調適，顯示出箔子寮社群對自然節奏的高度敏銳與靈活應對能力。

茶會不僅是飲食共享的場域，更是資訊流通與互助關係的節點。阿嬤們在閒聊中交換買菜情報，哪個市場今天有便宜魚貨、健康狀況、誰血糖控制得好、誰最近要去長庚抽血、家族動態、誰家的孫子就讀著建陽國小，等資訊。這些流動的資訊和話語，成為了村落內部調節社會關係、協調支援行動的重要基礎。箔子寮的廟口茶會，超越了單純社交聚會的層次，它構成了一種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日常實踐。地方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透過持續的身體經驗與情感投入所「生

成」的。每一場茶會，透過分享的食物、共同討論的話題、互助的身體行動，不斷地再生產茆子寮作為一個可被認同、被形塑的地方。

當都市化與人口外流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構性力量，廟口茶會提供了一種對比之下的微型機制：以日常的共食與共話，穩固彼此間對土地、對社群的歸屬感。即使年輕人逐漸離開，即使外來者的面孔變多，只要還有一壺茶在母天宮前熱著，只要還有人願意帶來一袋餅乾或一盆炸南瓜，茆子寮阿嬤的社會世界便未曾斷裂。



圖十二：人還沒那麼多時，只有兩位阿嬤隨意拿了椅子坐在棚子底下  
(陳弘祐 攝)



圖十三：母天宮前聚會。比起稍早多了一張桌上，還有一盆炸南瓜和一壺茶  
(陳弘祐 攝)

## 六、綜合討論

### (一) 隨便吃並不隨便

Mintz and Du Bois (2002) 在 “The Anthropology of Food and Eating” 中指出，食物不只是維生的工具，也是一種強烈文化與社會性質的媒介。透過吃，人與人建立起連結，也展現出階序、情感與歷史等複雜背景的相互糾纏。這樣的觀點對我們理解箔子寮的飲食實踐提供了重要視角。從表面看，雖然初步詢問時居民常以「隨便吃」、「有什麼吃什麼」來形容自己自己的日常飲食，然而透過我們的觀察與進一步的參與，便揭示了這些「隨便」背後的細緻安排與豐富意涵，即三菜一湯是普遍的家庭晚餐標準、不可或缺的海鮮，以及三餐與居民一整天生活節奏的對應——許多人因為中午工作而簡單吃，但晚上與家人團聚，所以相比午餐吃得更豐盛。箔子寮居民即使食材取得較不方便，依然展現出一種小村落獨有的飲食富足。

另外，Mintz (1985) 在 *Sweetness and Power* 中曾強調，我們必須從歷史與政治經濟的視角理解飲食制度的形成。這在箔子寮的食物交換中有深刻體現。在村內，許多熟食、農作物與漁獲的流通，並不經由貨幣中介，而是建立於長期的信任與互惠關係上。阿嬤們每天在母天宮廟口泡茶分享點心，雖然不是強制參加，所有成員也可以依照自己當日的狀況或天氣調整出席，但這對於阿嬤們已不僅是飲食習慣，而是已經形成一個每日的例行公事，更是一個日常情感的延續。這些非市場的交換系統與 Mintz 所謂的「食物的社會生命」高度契合，讓我們看見食物如何作為一種媒介，維繫地方關係。

### (二) 以環境知識體系對抗全球化浪潮

Mintz (1985) 也關注食物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架構中被重新組織與標準化，進而納入國家與市場的治理機制。在這樣的宏觀視角下，他強調地方社會如何透過具彈性的飲食實踐來應對來自外部的壓力與不確定性，而箔子寮的例子正說明了這種抵抗的可能性。當漁港淤積、魚市沒落等等使箔子寮看似與全球體系脫離的因素之下，村民並未全然臣服於市場邏輯的改造，而是持續動員他們的地方環境知識 (Loc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LEK) 將具有風土特色的烏魚子作為對抗全球化飲食的手段，來重建生活節奏與食物穩定性。

Trubek (2008) 所提出的風土 (terroir)，不僅是地理條件與氣候環境的總和，它同時也包含了人們如何透過技術實踐與味覺偏好，賦予特定食物以地方性價值與社會意義。在箔子寮的語境中，風土並不是一個抽象的品牌語言，而是具體表現在烏魚子的製作過程與其在村落——特別是村外流動的方式。此外，Trubek 也強調味覺並非純粹生理性的，而是包含創造感官體驗的物理和社會環境 (Trubek 2008: 47)，箔子寮人自海而食，長期的培養之下產生對於海魚的品味，對於魚肉的口感和香氣特別挑剔，也對於養殖魚的土臭味特別敏感排斥。

風土 (terroir) 和風土滋味 (goût du terroir) 不僅僅是詞語，它們是構建感知和實踐的範疇——一種世界觀，或者我們應該說是一種食物觀。風土的農業根源最好地解釋了這種食物觀的起源和持續存在。

另一方面，Berkes 等人 (2000) 則將 LEK 定義為一種跨世代累積、透過文化實踐傳承的「知識—實踐—信念」體系，它不僅是對環境的感知工具，更是一種回應生態不確定性的「適應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在箔子寮，我們看到吳媽媽以風乾而非曝曬的方式處理烏魚子。在都市中我們也許會因為手機上的天氣預報而決定要不要出門，但在這裡，居民們親自感受戶外的空氣，以長年累積、與東北季風共處的身體感知來「感受天氣」。就像是吳媽媽出門時看到戶外正飄著小雨，雖然面色焦躁地請我們查詢這場雨預計會下到何時，仍然帶著我們到倉庫，指示我們把烏魚子排列到陳架上，因為從經驗來看，這場雨雖然確實為烏魚子的熟成帶來妨害，但很快就停了，因此要先在倉庫準備好，等待雨停第一時間就要把烏魚子推出室外。

類似地，冷凍魚貨的保存、季節性的捕撈與種植、以及以空地為基礎的蔬果栽培系統，無不體現出對自然時間的精細調度與再組裝。因為魚季的循環、箔子寮大片大片的空地，使得居民能夠在社區的空隙間發展出因應的策略。居民因為靠海而長期培養對於海魚非常嚴格的品味，使得居民對於不著時的漁獲有所排斥。另一方面，居民因為購買蔬菜遙遠的路程，加上村內大片的空地，使得村內幾乎每一家都有個庭院可以自己種植一些蔬菜。這些策略讓地方社群得以在脆弱的沿海地景中，發展出具韌性的飲食生計與交換系統。

因此，若說 Mintz (1985) 為我們揭示了食物在全球體系中如何被制度化與標準化，那麼 Berkes 等人 (2000) 則補充了地方社群如何透過實踐性知識來持續回應環境變化。箔子寮的田野例子，呈現出居民在面對自然條件與基礎建設限制下，持續運用與調整既有的地方環境知識：如風乾烏魚子的時機選擇、根據潮汐與氣候安排捕撈與曝曬、甚至因應天氣轉變而調整農作與曝曬策略。這些行動未必來自書寫式的知識系統，而是透過感官判斷與長期觀察所積累的實作經驗。

Berkes 等人 (2000) 所提出的「適應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 概念，在此案例中並非作為一種政策語言出現，而較能被用來理解這些微調與應變背後所隱含的知識形式。這些知識雖未必被居民顯性地標示為「LEK」，但其持續被實踐於食物處理與生產的日常中，提供了另一種理解環境與維持生計的方式。

此外，Ingold 在 2000 年的著作中挑戰了過去將環境知識視為靜態知識的看法。他提出「文化形式將被編碼在景觀中」(Ingold 2000: 2)，認為環境知識並非儲存在頭腦中的封閉資訊，也不是透過傳遞信念和命題來學習感知世界的方式，而是在生活中不斷地接觸、勞動所累積經驗而形成，指出了解世界不是透過在腦中表徵它，而是透過在他們的環境中移動、觀察、聆聽和感受，主動尋找世界顯現的跡象。因此環境知識是一個持續不斷的生成過程，而非單純的應用或表達既有的知識體系 (Ingold 2000: 144-5)。

以吳媽媽為例，她並不是依靠儀器或既定的數值來決定曬烏魚子的時機與方式，而是透過對天氣、濕度與風向的細微判斷來做出即時的調整。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這種知識不是被清楚表述出來的規則，也不具有一致的操作流程，而是一種動態的實踐——什麼時後該推回屋內、濕度較高時翻面的頻率需否加快、甚至是根據當時的氣候狀況來「判斷」今日的風乾條件是否合適。這些經驗只能透過與物質世界長時間的接觸與互動才能內化於身體感知中，與 Ingold 所說「技能是透過實踐長出來的 (skills are grown)」觀點有所雷同 (Ingold 2000: 1)，技能既非天生，亦非後天習得，而是在環境中透過實踐與訓練，生長並融入人體。

此外，Ingold (2000) 也指出技能無法簡化為口述的命令或教學文本，它只能在共同勞動中逐步體會與習得。在田野經驗中，吳媽媽透過觸摸、輕輕按壓烏魚子來確認熟成的程度。這些微妙的感官判斷之間——壓下去的彈性、摸起來的乾濕變化、色澤的視覺判斷、氣味與殘留在手指上的油脂之間交織——吳媽媽從這些指標判斷烏魚子是否還需要翻面或壓製。這些判斷標準是無法透過語言完整傳達的，只能在反覆勞動與經驗中體會。想當然，我們也無法透過這短短的早晨勞動中掌握箇中奧妙。

總結而言，箔子寮居民面對自然條件與市場體系的不確定性，並非只是依賴既有的技術或傳統，而是透過與風、雨、魚體之間持續的互動，發展出動態且具感知性的知識體系。這樣的 LEK 並非封閉的資訊集合，而是如 Ingold (2000) 所言，是一種「在移動與接觸中生成的技能」，深深根植於日常勞動與地方生活之中。這不僅為我們理解地方知識的活力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也提醒我們：在全球化與現代化邏輯主導下，那些看似邊陲的地方，仍以自身的節奏與方式，在風土之中持續思考與實作生活的可能性。

### (三) 烏魚子作為一種召喚記憶的媒介

如 David Sutton 在他 2001 年的著作所指出，食物不僅僅是養分的載體，更是一種「物質化的記憶」(materialized memory)。它在製作、分享與品嚐的過程中，召喚出與他人共享的時間與情感歷史。對箔子寮的烏魚子生產者而言，烏魚子既是生計的來源，也是一道通往親情與家族記憶的門徑。吳媽媽親手製作出的每一片烏魚子，不僅只是一個產品，還是一個親子間的情感連結，是遠在他鄉的子女將其帶往外地分享的那份驕傲與連結

Sutton 強調食物作為一種生活節奏標記，標記出日常生活的流動與特殊的社會時刻 (Sutton 2001: 16-17)，烏魚子的時間性不僅體現在風乾期的氣候掌握，也呈現在節慶、訪客到來與親戚返鄉等時刻所承載的關係意義。烏魚子的分送與展示，重啟的是與土地、與家人、與過往經驗之間的連結，也與 Sutton 所敘述社群價值 (gemeinschaft) 的象徵有所雷同 (Sutton 2001: 53-54)，使得食物不再只是靜態的地方特產，而是流動於人際與情感之間的物質載體。福建老闆曾告訴我們：

「……烏魚子是那種出去的人回來一定會想吃的東西。」(2025/01/09，福建老闆)

這種陳述不僅道出烏魚子的地方風味，更點明了它作為「召喚性食物」的象徵功能——它召喚的，是一種離鄉經驗中的身體記憶與歸屬感，是對於原鄉的感官印記與情感連結。

在每一次烏魚子的切片、上桌與贈送中，都蘊含著對土地與親屬關係的再活化。這些物質動作超越了單純的營養功能，而成為情感與義理的流動機制，使得烏魚子不只是靜態的地方特產，而是一種會「呼喚人」回來的食物，一種在人際與感知之間流動的象徵性媒介。在這個情境下，食物不只是被消費的對象，更是聯繫社會關係與召回情感記憶的有力物件。

### (四) 共享食物

當我們與琴芳阿姨共餐時，她補充道，如果這些菜餚煮得太多，就會與村內的鄰居或是其他好友分享，特別是同樣來自東南亞的移民，雖然未必是來自同個國家，但這樣的緬甸口味已經是相對接近、他們比較能夠適應的口味了。進一步地，琴芳阿姨家中大量製作並分享的熟食，不僅是實踐地方性飲食技藝的展現，也呼應了 Mintz (1985) 在 *Sweetness and Power* 中提出的觀點——食物作為一種



「物質媒介」，承載著社會關係的建立與鞏固功能。透過烹煮、分送與共食，食物不僅滿足生理需求，更成為個人與社群之間情感交流與社會認同的橋樑。在琴芳阿姨的日常生活中，緬甸風味的熟食承載著對故鄉的味覺記憶，同時也在異地編織起新的情感網絡。

吳媽媽所烹調的蔥燻鯽魚也同樣展現了此一意義，從並非只估量家庭食量的烹煮數目、裝盤並打包分送給鄰居、雖然擔心魚刺多使我們不習慣仍邀請我們和她一同享用，都是對於關係的建立與維繫。母天宮阿嬤們在茶會共享的一杯杯茶、零食、茶點，更匍匐地從共享食物之中彰顯了這些「作伙」吃東西的經驗，是如何構築著群體的羈絆。

同時，這種熟食分享的行為也可從 Mauss (1925) 在 *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中提出的觀點來理解：分享食物不僅是出於慷慨，更是一種社會義務，透過「給予—接受—回贈」的循環，持續構築彼此之間的關係網絡。即使在陌生或疏離的異鄉環境中，透過食物的贈與，琴芳阿姨與周圍東南亞移民、乃至於像我們這樣的田野研究者，皆能暫時納入同一個共享的社會場域中。

從交換的角度細看，Sahlins (1972) 在 *Stone Age Economics* 中所描述的「廣義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 尤為貼切：這種食物分享並不期待立即回報，而是建基於親密、信任與長期互動的基礎之上。琴芳阿姨的分享，正展現了這種無條件、不計較等價交換的社會邏輯，以大量製作、可分送的熟食作為持續經營關係的重要策略。

此外，Bloch (1999) 在討論共食 (commensality) 時指出，分享餐食行為具有建構共同體、鞏固人際關係的強大力量。在琴芳阿姨的家中，紫米粿粿、酸巴菜與緬甸泡菜等料理，以及吳媽媽的燻鯽魚並非僅供個人食用，而是自然地鋪展為一場邀請我們共襄盛舉的臨時餐宴。藉由與我們共食，阿姨將原本屬於家庭、族群內部的味覺記憶延伸至跨族群的交流，使我們得以暫時成為她「飲食世界」的一部分。即便文化背景、味覺慣性不同，通過餐桌上共時的飲食節奏與身體經驗，一種不以語言為主體的親密感仍悄然生成。母天公廟口茶會中，阿嬤們分享的炸南瓜、沙其馬、法式吐司，也正是此種共融感 (communitas) 的日常展現。

## 七、結論

箔子寮以以身體感官編碼的大地知識，編織出一張足以抵禦不確定性的「生活之網」。村民在與東北季風和太陽照射的日常對話中，透過「曬、翻、收、壓」的節奏，使烏魚子在風而非陽的撫觸下熟成，任何氣候細縫從雨絲、霧氣、風向微移，都反映在翻面、覆布、收曬的動作上。這種高度具身的環境感知，不是可被口訣迅速複製的技藝，而是歲月累積於身體記憶中肌肉作為天線的地方環境知識（LEK）並非靜態或傳統，而是在「瞬時氣象」與「歷時節令」交疊的多重時間裡不斷重寫。

箔子寮人的生計不是「傳統對現代」的二元，而是將野生捕撈、沿岸養殖、冷凍保存縫合為多層風險配置：野生烏魚在短汛期提供現金流與社會象徵；養殖蚵架在淡季補位；讓時間而非市場主導產品時序。將自然不確定性轉化為可調度的時間與空間資本，也在身體與科技的疊合中顯示地方韌性的動態生成。而食物流動織就的贈與網絡，使食物穿梭在廟口茶會、親族餐桌與跨縣市職場之間；其價值不單以價格標籤衡量，而在於一再延宕的禮尚往來、情感債與身份面子。在這裡，「隨便吃」既是謙詞，也是價值展現。它宣告村民以互惠而非市場邏輯重分配資源、再生產歸屬感。

綜觀之，箔子寮人透過精準感知自然、面對環境因應而生的生活與生存之道、持續編織食物流動，展示了「以海為家、以食為禮」的多重韌性。這種韌性不是靜態的文化遺產，而是在風、鹽與人的交織中不斷被重寫的行動實踐。這些是埋藏在不起眼的清晨翻面、午後覆紗與黃昏分送之中，那些以身體、以禮物為橋樑而持續發生的日常行動，才是地方社群在巨浪前保持漂浮、甚至逆流而行的根本力量。

## 參考資料

Berkes, Fikret, Johan Colding, and Carl Folke

- 2000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s Adaptive Management.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10(5): 1251–1262.

Google Maps

- 2025 〈箔子寮實際訪談地點〉。「Google Maps」，  
<https://maps.app.goo.gl/JdW13Vd2jgUXkbD46>, accessed May 13, 2025.

Ingold, Tim

- 2000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Routledge.

Mauss, Marcel

- 1925 *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Mintz, Sidney W.

- 1985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Viking.

Mintz, Sidney W., and Christine M. Du Bois

- 2002 The Anthropology of Food and Eating.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1: 99–119.

Ortner, Sherry B.

- 1974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In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edited by Michelle Rosaldo and Louise Lamphe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31

Sahlins, Marshall

- 1972 *Stone Age Economics*. Chicago: Aldine-Atherton.

Scott, James C.

-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utton, David

- 2001 *Remembrance of Repasts: An Anthropology of Food and Memory*. Oxford: Berg.

Trubek, Amy B.

- 2008 *The Taste of Place: A Cultural Journey into Terroi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urner, Victor

-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劉曜華主編

- 2006 《四湖鄉志》。雲林：雲林縣政府。

郭天祐、劉曉語

- 2024 〈All Actions are Re-actions：箔子寮人們對水的感知、互動與關係〉。刊於《風頭水尾——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四湖鄉·箔子寮）》。頁 1-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黃郁茜

- 2024 〈前言〉。刊於《風頭水尾——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四湖鄉·箔子寮）》。頁 i-iv。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

- 2024 〈人口統計資料〉。「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取自 <https://mailiao.household.yunlin.gov.tw/popul01/List.aspx?Parser=99,5,40,,,,,,,,,,,,,1,,,,,18>（2025 年 4 月 1 日取用）。

## 明天有明天的風吹：

### 刮著大風的道路上，箔子寮居民如何生活<sup>1</sup>

吳佩珍（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陳禹翔（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楊依婕（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 摘要

本文試圖探討臺灣雲林縣四湖鄉箔子寮的居民如何在持續刮風的路上生活。我們從原初對地方用路行為的實作差異，逐漸轉向居民如何感知與應對風與道路的具體經驗，並展現出一種在地節奏下的調節與再詮釋。同時，我們借用 Tim Ingold 所提出的「踐行 (wayfaring)」概念，強調知識是在移動與感知中生成的過程。我們嘗試呈現風如何作為一個透過關係被感知的行動者，透過基礎設施的物質痕跡、以及我們和當地人的身體感官被間接感知。本文除了記錄風、道路與地方的共構，也試圖思考：當風成為日常生活的背景，居民如何在風中穿行、走出自己的路徑與生活方式。

關鍵詞：基礎設施、風、道路、踐行 (wayfaring)、線網 (meshwork)

---

<sup>1</sup> 此篇報告的作者排序依姓名筆畫排序，並在此感謝每段能具名與不能具名的緣分。感謝蔡心娜村長、蔡茂源大哥、蔡瑞泉大哥、四湖鄉建設課吳昂謹課長、四湖鄉公所維修大哥們、蔡宗豪律師、吳媽媽烏魚子、一口烏魚子員工、飛沙派出所警員、春天民宿蔡文進大哥與周招伶大姊、游清琇阿姨、阿雪、善水咖啡的兩位老闆，以及和我們相遇聊天的居民們。感謝蔡卓霖前輩給予評論。感謝系上前輩們和朋友們給予的鼓勵支持。感謝黃郁茜老師、盧佳秀助教、郭天祐助教，無論在水源 201 教室與箔子寮都一路相伴的同學們。感謝阿黃。

在踏上茆子寮的土地之前，我們三人在文化田野的課堂上成為一個小組：帶著相異的十幾年經驗、身體與身分。

巧妙的是，三人最初填寫的研究興趣截然不同，卻在「基礎設施」產生興趣的交集。一起爬梳茆子寮相關的臉書社團後，發現許多道路（以及其相關設施）損壞與修復的貼文。一開始，我們推想主題或許會和安全感、國家政策比較相關，但在爬梳資料後，佩珍先提出：也許我們關注的不完整設施狀態，並非當地人在意的重點。三人再次調整方向，在上學期末以「當地人如何感／應道路？基礎設施的存在和實際功能之間存在什麼落差？」作為暫時的問題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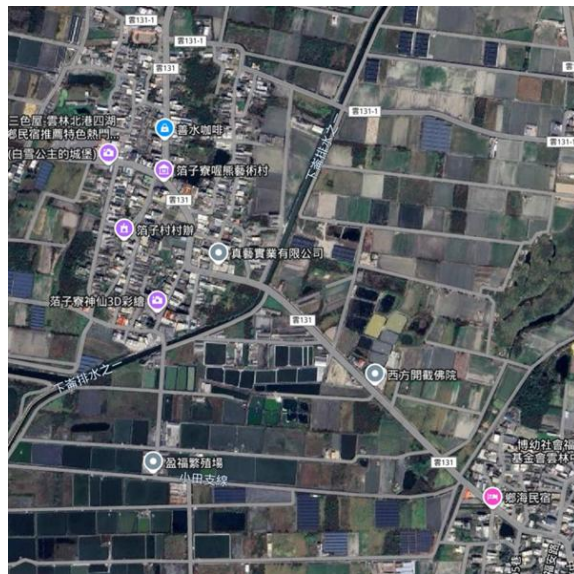
年初來到雲林後，我們彼此之間的差異更具體地浮現。禹翔是組內臺語最流利的人；而依婕卻連聽懂簡單的對話都有些吃力。三人都在臺北讀大學，對當地人來說，我們或許都是「都市來的孩子」，但我們對都市環境的適應程度並非均等。依婕和佩珍都有鄉下生活的經驗，這些經驗在茆子寮被不斷召喚——佩珍想起他姑姑描述花蓮市的大家也都不太知道路名；堆疊的指示牌和凹凸不平路面讓依婕有回到花蓮家鄉的感受。連接到茆子寮幾天後，依婕和佩珍已經習慣路上幾乎無車，隨興地走在馬路中間；禹翔卻仍小心翼翼地靠在路的邊緣。

我們三人在不同的位置上行走，用相異交錯的方式嘗試和田野對話。

## 一、遙望茆子寮

早晨的陽光照進距離茆子寮兩百多公里的台北盆地，新店溪畔的台大水源校區教室裡，教授正提醒著課堂事項。那是一個對繁忙台北而言稀鬆平常的日子，然而當我們要從遙遠的他處試圖理解某個地方，事情就變得再也不同。

我們開啟衛星地圖，按住游標向南移動，尋找到雲林虎尾之後，再向西搜尋，看見棋盤一般密密麻麻的道路和水渠，跨過台 61 線快速道路，來到了這裡。田園之間出現了叢集的村落，一條分岔路悄悄繞進村內，這將會是我們的田野地——茆子寮。



圖一、俯瞰箔子寮的衛星地圖。  
（組員佩珍於 2025/4/20 截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s 2024）

### （一） 地方概述

箔子寮位於雲林縣，是四湖鄉境內南側的小村落，鄰近口湖鄉界。全村皆坐落於省道台 17 線與快速道路台 61 線以西，地理位置非常靠海，從地圖上看起來，就像狹長土地上浪花捎來的細沙。南北貫穿箔子寮的是一條平坦的公路，編號雲 131，這條公路起自南方的頂口湖，止於北方的三條崙，全長約七公里。在箔子寮中央的普天宮前，由雲 131 朝西岔出一條道路，編號雲 131-2，是村子通往海邊、四湖海濱長廊和箔子寮漁港的寬敞大道。

《四湖鄉志》中描述，四湖鄉的整體道路輪廓，在日治時期才逐漸確立。日治時期雲林位於台南州轄下，四湖屬於濱海公路的一環，向南可通往嘉義東石，往內陸則有通向北港的道路。日治時期修築道路可粗略分為兩階段，前期以軍隊為修築主力，經費併入國防開支；後期則以拓寬既有道路為主，並同時動用保甲、鄰里的獻金支應。到了戰後時期，四湖鄉的道路仍以北港、斗南為中心放射狀經過境內（劉曜華主編 2006：203-204）。

以雲 131 主要幹道為界，箔子寮被劃分為箔東村與箔子村，當地人也會稱呼兩者為「東村」與「西村」。箔子寮地區並沒有為道路特別命名，我們找不到諸如中正路、中山路等名稱，當地透天厝和三合院的門牌上通常僅寫著「箔子寮幾號」，道路系統和其他中小規模的城鎮就已經有很大差異。

但切勿因此就以為茆子寮的道路很簡單。當地仍有許多縱橫彎繞的道路存在，它們圈起了村內的住家、廟宇、半鹹水湖和田園。從時有車流的大馬路，漸漸過渡到寧靜宛如家中的小巷，那些越加狹窄、蜿蜒、沒入泥土的道路，同樣擔負著茆子寮生活的基礎功能，而且隱沒在日常之中不容易被外人察覺。

然而就外人看來，四湖鄉的道路時常被以「狀況不佳」形容，關鍵字查詢的新聞幾乎都是政府預計修繕的規劃（劉春生 2017；可萱 2021）。所謂的狀況不佳，包括路面不平、下雨淹水、路面龜裂等。而閱覽這些新聞，也會提及整修道路的目的不僅是為鄉親，也是為「觀光旅客」（洪佳伶 2023）。在這些資料中，可推知淹水和路面狀況高度相關。除了道路路面不平整的因素外，新聞中也提及排水設施不佳、路面人孔蓋數量眾多等等。在水利署的「茆子村水災防災地圖」（經濟部水利署 2014）中，雲 131 和雲 131-2 交界處、近普天宮的路段更是被列為易淹水路段。

《四湖鄉志》中將四湖鄉的「自然災害」分類成颱風和超抽地下水所造成的地層下陷兩大類，且經濟部水資源局將四湖鄉劃為嚴重地層下陷區（劉曜華主編 2006：81）；蔡茂昌大哥也曾在課後告訴我們東北季風與淹水所造成的狀況亦不容小覷。

## （二） 觀察導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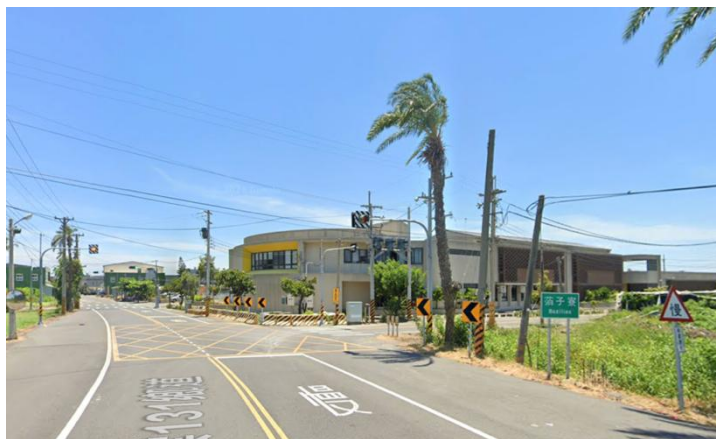
Google 衛星地圖存檔了過去一年內茆子寮的最新街景，我們將地圖放大，按下街景小人，被記錄過的路此時都浮現出藍色記號。無論在地球的哪一個地方，都能夠立即觀看，同時，我們亦可調閱不同時間街景車拍攝的畫面，回顧近十多年的風景差異。附圖是我們即將瀏覽的路線，就讓我們從茆子寮和廣溝之間的雲 131 大路開始。

當你由廣溝沿著雲 131 南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路旁整齊列隊的中東海棗。足以容納四線道的道路，卻只劃設對向各一車道，以至於留下寬敞的路肩。倘若在市區那裡一定停滿機車，但此地路肩堆放著的是灰白色蚵殼，用墨綠色的繩索串綁覆蓋。有時候蚵殼也會整串掛在中東海棗向外翻折的樹皮上，就如時髦的項鍊。望向遠方，周遭皆是平坦的田畝與灌木林，陸域風機靜靜佇立，中東海棗的葉子總垂向一方，和電線桿交錯並排。我們繼續前行，靠近茆子寮時偶爾會出現車輛，有座鐵皮工廠出現在我們身旁，然後是長長的圍牆。

當我們緩緩地進入茆子寮，接近建陽國小，就有一面綠色的村牌提醒我們此村地名，更有紅光三角「慢」字警示、黃版黑箭頭警示羅列。閃黃號誌燈、四組



紅綠燈架設於在人行道邊，還有一盞行人號誌加掛在燈桿上，這是村中唯一一盞給行人使用的燈號。而路面上同樣有著繁複的標線，從老遠就規律橫躺的減速漆線、「慢」字警語，還有提醒注意路口的黃色網格線，進而，三道斑馬線將建陽國小正門前圈出一個方形缺口，而那裡留有顯眼的車輪過彎印痕，整齊像弧形的篋畫紋（圖二）。



圖二、箔子寮建陽國小、雲 131 街景圖。  
（組員禹翔於 2025/6/16 截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s 2024）

電線線路緊緊跟隨路面鋪設，於建陽國小前銜接到另一條上路，整體呈 T 字型。過了建陽國小後，電桿木如衛兵般列隊迎我們走入箔子寮鬧區。那頭大抵也是筆直的道路，不同的是，周遭民宅往道路極速靠緊，視野比起剛剛更顯狹窄。但因房屋本身不夠高大，即便路肩已內縮，也未有窒息感。

邊矗立的電線桿上通常裝有兩類用來絕緣、固定電線的礙子：一類位於最高處，以橫向木桿為基座，此種裝置由台電管理；一種則類似褲勾，以直向的木桿豎在電線桿上，是地方自己牽的線路。在廣袤的鄉間地區，當遠方視線被樹木和草叢覆蓋，起伏的電線就成了認路的方式，因為電線的下方，幾乎都有或大或小的路徑通過，即使是那些少有人行經的地帶亦同。

另外一種會與電線桿共伴出現的道路基礎設施是路燈。箔子寮的路燈也有兩種類型：大盞的路燈是獨立運作的，有獨立、拔地而起的立桿；小盞的則是附著在電線桿上，就比例來看宛如豆芽菜——只有根折彎的支架連結著對它而言巨大的燈罩。

再往前走幾步我們才發現，道路分岔口處，時常佞身躲藏著反光鏡。因為反光鏡的特質，讓它的圓鏡幾乎成為一種視覺上的破洞，有時反射藍天、有時照映綠樹，它的位置一眼難以察覺。

整路看下來，村中的反光鏡其實相當多。它們釘立於道路沿途各個路口，有些立桿直接鑿進土裡，有些則附加了石質基座，像是從他處拔起安放在此。為了將反光鏡牢牢固定，有人會將它的立桿以鐵絲或線繩捆綁在臨近的電線桿或任何可支撐的物體上（圖三）。鏡面時有鏽蝕、損傷、凹陷、剝落、髒污的狀況，許多反光鏡的反射方位已經偏離，無法使來車準確看見岔路的景象。

箔子寮的村落景致是層次分明的，因為房屋都不夠高，很容易就能望見後街林立的其他房舍。街景服務的時間座標是七月盛夏，畫面中光芒刺眼，整面牆上漆成墨綠與螢黃的屋子被照得白亮亮。路邊也有退縮至深處的房子，留下前庭一大片水泥空地。我們直走經過鐵皮屋和老式磁磚屋，生鏽的欄杆及生鏽的鐵門，紅磚堆在薄薄的鐵皮屋頂。我們晃過四湖鄉農會箔子寮辦事處和善水咖啡，還有正卸貨的祥利雜貨店。

普天宮已在眼前。普天宮前方有一若大的廣場，以柏油路鋪成，廣場上橫七八豎地停著幾輛私家轎車與藍色貨車。十來條電線橫過天際，從雲 131 順向牽至普天宮前庭，繼續往每條岔路延伸，就像蜘蛛網一樣。在這裡，號誌燈也變得複雜，共有三支閃爍的號誌燈，但沒有紅綠燈。多方向車輛行駛的重疊區域亦繪有網格線（圖四）。



圖三、被網綁的反光鏡街景圖。  
（組員禹翔於 2025/6/16 截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s 2024）



圖四、普天宮前網格線與電線街景圖。  
（組員禹翔於 2025/6/16 截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s 2024）

讓我們繞過大路，往小巷前進。因為要認識箔子寮，只走大路是不夠的。箔子寮的小巷多數也已建置了衛星街景，現在這條就是，它位於鴨肉羹攤隔壁，入口處有一棟稍稍下沉的房屋，地板比路面低，牆上畫著「盤古開天」壁畫。像這

樣的小路上，基礎設施略顯稀缺，電線桿仍舊跟隨著我們，並和小盞路燈共生在一起。路面繪製著許多方向不一的箭頭，用來指名箔子寮彩繪的拍照方向(圖五)。

建築物之間的距離比起剛才更加疏遠，常常整片地就這麼騰出來，錯落著荒草和碎石。周邊磚牆上有黑熊、地面上有鯨魚，屬於箔子寮彩繪村的圖案開始頻繁出現。矮牆彎彎繞繞，繞過雄偉的米黃色大宅、日日串蚵殼的婦人，這時候我們看到西天寺周邊的高聳白色建築已從路旁矮厝屋頂探出頭來，那裡屆時將會是我們的民宿。

看見民宿意味著我們已經臨近箔子寮邊緣，南側的景緻一如預期廣袤，電線竿像牙籤一樣左歪右斜地探向地平線彼端。眼前是七月時已休耕的蒜頭田，有面朝著錯誤方向的反光鏡，和一隻背著反光鏡，似乎在和它賭氣的臺灣黑熊模型。

現在讓我們左轉，前往西天寺。矮牆後是雜亂的回收場，西天寺的建築華麗顯眼，對面有著應是箔子寮最寬廣的庭院，也是彩繪創作的聚集地。但聯外的小徑和建築物規模如此不成比例，我們邊看邊憂心到時候遊覽車應該如何開進去。這條小徑一路帶著我們重回雲 131，該地有三盞閃光燈號，這時如果不回頭，就會再走入一段遼闊平坦的大道，抵達下崙。

但我們必須回頭，我們從大路回到普天宮前，並留意這條道路是箔子寮內「東村」及「西村」的分界線。是時候前往東村看看了，還未到達普天宮之前，電線牽連在東邊靠房屋的那一側，西面則又是一片灰土田園。拐彎處有棟白瓷磚、絢麗的鏤空陽台別墅，側邊出其不意地展開一條龜裂、褪色的碎柏油小徑，不仔細注意必然會錯過。這條路的盡頭，景象卻煥然一新，在紅磚三合院背面，竟是氣派的獨棟透天厝。這些寧靜的民宅環繞著一座沉靜低調的大湖，沿湖闢建的鄉村路使用了和台灣中高海拔山路同款的道路欄杆，一時有種時空錯置的感覺(圖六)。



圖五、地面塗有彩繪的箔子寮巷弄。  
(組員禹翔於 2025/6/16 截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s 2024)



圖六、普天宮後的大湖與小盞路燈街景圖。  
(組員禹翔於 2025/6/16 截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s 2024)

繼續踏上這條小路，此刻電線桿換到西邊了，而路燈依舊是小盞的豆芽菜燈泡，也依舊繫在電桿木上頭。接著我們遇見了一條烏黑油亮、有著全新白線、雙黃線的嶄新寬敞道路，地圖上標記為雲 131-1，回首觀望，彷彿我們剛剛徒步而來的小徑狹窄的彷彿闌尾一般。我們的斜對角是獨立的一座福德廟，沿此路走去，便完全置身鄉野了。

水溝旁又見中東海棗列隊，下陷而龜裂的農田產業道路垂交錯。深深的水溝，沒有護欄或石擋，叢草隨著街景車攝影時間的錯落不定而反覆變得茂密或荒蕪，這裡已是田園，街景服務的時差跨度較大。天空中仍見雜亂的電線。我們前進再前進，路面一下平整，一下殘破；天空一下晴朗，一下陰雨，每前進一步可能就相隔數年。茆子寮的房屋榻縮成細細一線，屋簷的起伏難以察覺，我們知道自己身處茆東村，但與來時路已有好長的距離。



圖七、茆子寮觀察導覽路線示意圖。

(組員佩珍於 2025/4/20 截圖，紅線為組員禹翔所標註)

(資料來源：Google Maps 2024)

關閉頁面，我們回到台北的教室裡。下一次再看見那幅景緻，已經是出田野的冬日了。

## 一、 在文獻中來回走動

Brian Larkin(2013: 327-343)在“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中，以導言形式，為現時下的人類學基礎設施研究做了定錨：典型的基礎設施是作為「使其他物質運行的媒介」而存在，它既是物件，同時也構成物件之間的關係，因為常被視為散佈在底層的基礎，而總是隱沒在其所傳輸的物質中，受到邊緣化。基礎設施也被看作「網絡」，是節點亦是系統，彼此相互牽絆，互相提供物質基

礎或運作的前題，例如電力和電腦之間的關係。Larkin 建議，不妨以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來辨認各個行動者如何構成系統，並且試圖用拆解的方式做分析，思考哪些物件必須涵括在內，哪些則應排除在外。

細究此定義中基礎設施的具體項目，道路、橋樑、鐵路、機場、通訊、能源，這一切可以被辨認出的物質基礎，構成社會生活的背景，屬於硬體基礎設施；但是硬體設施要能順利運作，背後必然存在一套使建設和工程實行的法規、政策、制度或觀念，稱之為軟體基礎設施（林文玲 2017）。

兩者的共作，讓我們的生活有持續的可能，而基礎設施研究經典的命題，也就和指引我們生活的技術政治、系統思維、行政官僚、社會不平等有關，目的在於釐清物件行動者如何串連成網絡，又如何啟動、操控、匯合一或多個基礎設施體系（Anand 2011）。基礎設施同時也具備超越物質性的影響，它帶來的國家想像、對未來的渴望、挫敗與傷害，除了彰顯基礎設施作為進步的隱喻，也顯現基礎設施的「不能」不僅只是物理上的損害而已。（Harvey 2005；Reeves 2017；Harvey & Knox 2012）。

也有許多基礎設施並不如預期地被使用，反而成為高度象徵和懸置的個體。它們雖無法肩負預設的物質功能，卻在情感、制度、官僚體制上持續發揮作用。Larkin 提出，基礎設施的「詩學」指涉的是形式和功能的分離。這種雙重性，在基礎設施中，使其象徵超越了具體功能。而基礎設施本身的結構、材料與質感，如黑色的柏油、灰塵的道路、光線、溫度，亦會在人心中植入某種現代的感關經驗及氛圍體驗（Larkin 2013）。

失靈與修復也是基礎設施研究中的重要子題。在它們順利運行的時候，大多數人察覺不到它們的存在，而一旦失靈，各種不便就立刻讓人們有感，正如同「人們往往在基礎設施崩壞時才意識到它的存在——當橋樑坍塌、道路出現坑洞、電話無法運作時。」（Elyachar 2010：455）。我們的田野地箔子寮也出現過因為自然或人為影響而功能失常的路燈、反光鏡（秋黎李 2018；蔡奇亨 2024），而這些設施的不正常運作，因為有了貼文的證據，證明這確實會對當地某些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不便。既然有所影響，也就會伴隨著修復。

基於前文基礎設施的描述，亦可推知所謂修復必然也和物質技術、情感基礎，甚至政治實踐有關。近年基礎設施修復的相關研究，著重在主體、社會關係和權力的可見化，並且將修復當作物質技術層面和情感層面的辯證及銜接橋樑（Ramakrishnan & Budds 2020）。研究者關心哪些基礎設施會被修復？何時修復？由誰主導修復？在修復過程中，什麼樣的社會關係連帶浮現出來？

儘管這樣的假設是將基礎設施當作處於變動之中的過程，一端是物質狀態，一段則是修復所勾連出的身份、權力、社會關係，而當設施隨著時間崩壞，也就

持續影響著關係。然而此類研究聚焦於政治不平等、勞動壓迫等範疇，這類的研究場域多發生在都市，在層次上攸關重大，彷彿一定要從修繕行動立即連結至更高的維度，利用的媒介則是針對一項毀損基礎設施的作為。換言之，基礎設施作為過程是它的前提而非問題。

但回到日常，我們更希望關心基礎設施的損害與修繕在箔子寮真正呈現出什麼圖像。

這種不將「過程」當作前提，而是把「基礎設施如何處於生成之中」仔細檢證的思考進路，來自 Matthäus Rest 和 Alessandro Rippa (2019) 的“Road animism: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infrastructures”。這份研究不依循典型基礎設施研究使用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傾向，其主張我們要改變用看待主體的方式看待基礎設施的思維方式，尤其是道路。Rest 和 Rippa 呼籲不必再將道路看成一個獨立存在的物件，其並非只是參與在社會關係網絡中的行動者，它自身即是關係的生成形式之一，內在於這個世界，並且是種不斷「成為」的過程，與人、物質、環境、關係、情感並行交織。

假若扭轉了這種思考方式，不再將物質與關係分離再重新注入行動力，而是打從一開始就將其置於開放、流動、持續生成的中介狀態 (Rest & Rippa 2019)，我們就能跳脫基礎設施失靈與否的問題，將人、物質、環境、關係、情感全部含納進「逐漸誕生成基礎設施」的狀態。專注看待這個尚不穩定、頻頻協商的過程，即是一種基礎設施的進行式，不再把它只當作既成物件對待。

因此本文預計專注在觀察外人所認定的「設施失靈」、「設施無效」之認定是否適用於箔子寮，並將基礎設施重置在開放的生成情境之中，討論儘管基礎設施形式上存在於當地，但它應和地方節奏、自然條件、人們的實踐一同成形，於浮動中被重新定義。

亦即我們要探問的是，箔子寮也許不應簡單理解為基礎設施失靈的地方，而應是人與自然情境重構設施意義的地方。為此，我們須先進入當地走動，看基礎設施究竟如何形成於箔子寮之中。

## 二、我們在風中穿行：以踐行（wayfaring）認識箔子寮

坐在遊覽車上，我們靜靜地等候抵達田野地。從虎尾鎮、土庫鎮、臺西鄉再到四湖鄉，一路經過的是平坦遼闊的農田地景，而就在這樣極其敞開的地貌中，我們細細地注意到風的存在。

前往田野的那天晴朗非常，天空清澈明亮，轉頭凝視窗外，可以見到一處處水田與乾草在強風吹拂下折射出亮晃晃的波紋，道旁的樹木皆向同一個方向傾斜；往遠方望去，地平線上佇立著葉片高速旋轉的風機。我們隨手將這些瑣碎的風痕材料寫進田野筆記，不作多想。

直到抵遊覽車停靠在春天民宿、踏出車門的那一瞬間，我們才感受到這陣突然作起的大風。很難向人精準地描述一場他們未曾經歷的風：大衣衣襪瞬間立即失控翻飛，頭髮猛烈地在空中凌亂飛散，眼睛則本能地眯了起來——明明在車上早已觀察到外部的風景，我們卻直到身體被這股超乎想像的強勁力道推擠時，才真正走進箔子寮這個大風吹拂的世界。



圖八、一月六日的箔子寮，我們正在聽蔡茂源大哥導覽。  
（資料來源：組員佩珍於 2025/1/6 拍攝。）

在抵達箔子寮以前，我們從各個途徑獲得了關於當地環境的知識。當地因風勢強勁、又位處沿海，因此有「風頭水尾」之稱——上一屆前輩的文化田野文章作

品集封面上就印著這四個大字；蔡茂昌大哥來課堂演講時，我們簡單請教了有關當地災害如何影響道路的問題，了解到當地有「颱風」也有「東北季風」，而後者會乾乾地刮，對農作物的影響較大……。

這些事前獲得的知識更像是 Tim Ingold 所描述的知識「運輸」(transport)：即知識如同一種封裝完成、預先整合的資訊，被視為可以從一個人傳遞到另一個人、或從一個地方搬運到另一個地方的存在，無需經過實際經驗的參與(2011:161-163)。在這個模型中，知識先於行動而存在，個體只需「接收」這些知識，便能在世界中操作與判斷；如同我們透過 Google Map 的衛星地圖／街景服務、課堂與文獻中的資訊來推展自身對於茆子寮的認識。在這種「運輸」的知識模式中，我們攤平整座小鎮，依靠地圖上已經有的路徑，順暢地操作並想像自己能導航於世界之中。

然而，當我們實際身處茆子寮、身體面對風所造成的巨大阻力時，腦袋中抽象的資訊立刻顯得陌生匱乏——我們發現，「風」不僅僅是地名或氣象現象，而是我們實際感知並回應環境時的重要參考——它會影響我們選擇的身體朝向、決定在哪個路口拐彎，甚至影響我們如何觀察與使用眼前的道路空間。

運輸 (transport) 將知識相連，形成一張網絡 (network)；與此互相對立，Ingold 提出了另一種知識模式——線狀地織成線網 (meshwork) 的「踐行」(wayfaring)，更能幫助我們理解茆子寮當地的環境知識如何生成。「踐行」不僅單單指涉「走動 (walking)」這一動作，更強調身體與世界一起生成經驗與理解——在這一過程中，知識並不來自抽象的外在輸入，而是透過具身且持續的行動，逐漸在經驗中累積與協商而來；人們透過不斷地走動、感知與調整，在經驗中逐漸長成知識，與世界實際協商出一條可行路徑的知識獲取途徑。換句話說，不論是抵達茆子寮田野的我們、或是當地居民，都並非只是被動地接收道路基礎設施與氣象資訊，而是透過日常的身體移動與感知，不斷地重新理解和形塑他們所處的空間與環境經驗。

### (一) 茆子寮的風

關於茆子寮當地的風，蔡卓霖 (2024) 以論述與想像的面向切入，聚焦四湖鄉當地反對再生能源建設的「反風吹自救會」之抗爭論述，指認當地吹著大風的再生能源地景如何構成當地居民的主體性想像。儘管論文中亦帶到我們在田野中注意到的大風細節——如當地的海口腔特質可能是因為強風中的說話環境、海風的鹽分特性塑造了當地農作物的種植選擇 (蔡卓霖 2024: 56)；然在實際分析時，著重處理風做為當地性格的隱喻，並無專注在當地居民應對風的環境知識細節，



以及風在日常物質層面的作用方式。亦有數篇海洋工程與防災研究論文（黃弈豪 2015；彭新雅等 2019）專注於沿海地區的海風如何造成當地的洪水風險與沙岸變遷，然尚無研究關注茆子寮的風如何影響當地道路基礎設施、及居民的實際用路經驗。而我們的文章則會以日常用路與風的互動為核心，探討居民如何透過與風的具體互動，呈現出一種調和且獨特的地方用路經驗。

初抵田野的那日晚上，我們全班一起在福建熱炒享用晚餐，一群人圍坐了兩個大圓桌。我們組坐在店內靠內側的那一桌，除了班上同學外，也與下午負責導覽的蔡茂源大哥共進晚餐。席間，同學們紛紛與茂源大哥攀談起當地的資訊，他卻在一連串的閒談敘述中突然輕描淡寫地說出一句：「還好啊，今天沒什麼風。」（田野筆記，蔡茂源，2025/01/06）

霎時，大家面露震驚神色，面面相覷——我們初次經歷的那股強勁、幾乎要把人吹倒的風，竟然只是茆子寮日常的「無風狀態」。以茂源大哥輕描淡寫的一句話作為線頭，我們逐漸發現當地居民在判斷、感受與描述風上有一套在地的環境知識。

## （二）也許沒那麼重要的風：訪談中的管理視角

開始訪問之前有一小段時間，我們在四湖鄉建設課會議室裡坐立不安，忙著張望四周，記下周遭的環境。木製牆壁上掛著六張地圖吸引了我們的注意，仔細一看，都是和災害相關的分布圖。避難收容所分布圖、毒化災害、淹水相關，甚至有數張不同雨量的地圖。我們一邊默默記下海報內容，靜待課長回來會議室。

「我講的是道路本身，它會受到風的影響不大。」（田野筆記，吳課長，2025/01/13）

課長知悉我們以風為主題，劈頭就先說明他認為強風只在沿海地區有較大影響；其次，風更多影響的是道路的附屬設施，比方說，電線。固定電線的設備時常鏽蝕，使電線脫落；風沙的鹽分附著在礙子設備上會造成「相拍電」（短路）；小雨或露水會黏著沙塵和鹽分，也可能影響礙子的絕緣，進而導致大規模停電。諸如此類風沙的影響在冬季尤其明顯。

然而，話鋒一轉，課長說明建設課花更多心力在應對颱風，而非我們這幾天頻頻關注的東北季風。「我講真的，一般的強風頂多把反光鏡吹歪，」平時東北季風雖然強勁，卻不會有致災性的後果：「但如果是颱風的話，會把大樹、標示牌吹落，甚至說一些廣告看板、一些號誌，不能說吹斷、可是就是把電線吹落。」

(田野筆記，吳課長，2025/01/13)。颱風甚至會引進西南氣流造成淹水，又因為茆子寮是「水尾」，排水不利，經常造成相當規模的災害。

我們試圖把話題導回原來要追問的東北季風，追問是否有針對風的防治措施，課長強調東北季風最大的季節一年不過兩、三個月，其中風最大的可能只有三十天。他們不會為了某個短暫期間發生的因素去打造防範措施：「每個東西都有他的 SOP，影響不大的就不會特別處理。」(田野筆記，吳課長，2025/01/13)

課長隸屬於四湖鄉公所，而我們活動的範圍僅是他管轄之一的茆子寮，視角上的差異似乎無可避免。不過，「影響不大」背後蘊含的意思有很多，首先是如何定義對話中不斷出現的「災害」。課長衡量風的標準以基礎設施為準，如上述對話中吹歪—吹落的對比，凸顯東北季風—颱風造成的災害差異。這和我們試圖解釋東北季風時常用的「出行經驗」例子有所區別。顯示基礎設施的損壞是災害框架中重要的判斷線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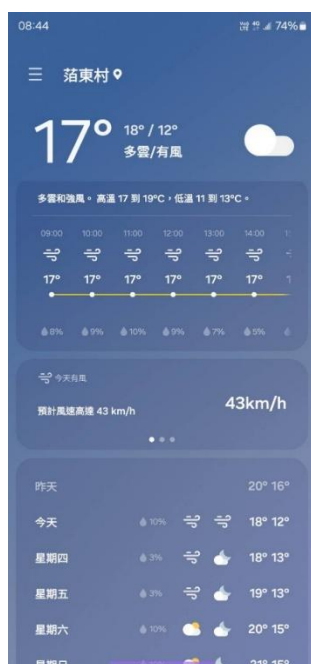
視角的第二個差異體現在「風僅在沿岸地區有影響」。就外地的我們看來，整個四湖鄉都「靠海」，卻在實際來到鄉公所附近時發現體感上的風迅速減弱。事後回顧課長提到的風災，也多著重在風夾帶的沙塵鹽分，而不是我們在田野地不斷被衝擊的——風本身的強勁。過後幾天，再次訪問村長時也確認了「市區沒有這種風。因為這裡海就在前面，所以風會特別大。」(田野筆記，蔡心娜，2025/01/15)。風在吹進陸地之後，會隨著距離和建物影響而逐漸減弱，正因為「風頭」是風吹起來的地方，茆子寮的風，既是沿岸地區特有的強勁；反過來看，也因為只有沿岸地區，成為了在整個大行政範圍內相對「不大的災害」。

另一個分歧的點，是對我們來說無所不在的風，卻被課長認為是「頂多三十天的短暫因素」，村長也自然地說起今年東北季風特別多，一周大概「五天」有風。

他們以「天」為單位計算。依婕當時以為這是建設課獨有的災害判斷框架，和我們熟知的降雨量、天氣預報的單位相似，也方便做數量的計算統計。起初我們只擔心「天」的單位揭露了我們短期田野的短板，事後卻意外想起，在普天宮幫忙的阿雪阿姨，曾經在我們問起風的時間時解釋過：這邊的風都是一陣一陣的。「關於風和騎機車的事情，阿雪有強調這邊的風很「不一定」，甚至不能用季節去預測。比如今天就沒什麼風，但有時會有陣風。」(田野筆記，阿雪，2025/01/08)

風在一天中並不是均質的吹動。有時是突然襲來的一陣強風；有時是騎上單車才發現的風。那段時間我們打開手機，天氣預報清一色都被風的圖案佔領（在台北時，還是雲或雨的圖案），有趣的是，即使我們知道了隔天有風、或是接收到強風警報，我們仍無從預測風實際吹起來的樣子。不像其他氣象資訊，比如雨，雨量是累積計算、且雨是可見的——風只能被間接看見，透過我們的身體被感知，

且不斷流動，就導致我們雖可知道風速或風級，卻無法藉此映射出我們隔天實際體會到的風。



圖九、組員依婕的氣象預報截圖，一整天都是風的圖示。

（資料來源：組員依婕於 2025/1/15 手機截圖。）

風這種不斷變化的特性，或許正是造就我們和課長在視角上差異的關鍵。風是一種相當仰賴「在場」的氣象資訊，我們在詢問當地人、或是我們自己要解釋「風有多大」時，往往不會用上氣象單位，而是一件件具體的經驗：騎車騎到搖搖晃晃、雨像針一樣打在身上。這些相當貼近個人的影響，與建設課管理的框架有所不合適。

這讓我們聯想到 Choi (2022) 形容風有一種糾纏物質性 (entangling materiality)，其擁有和他者連結、對他者產生作用的能力，同時也是一種必須作用在他者身上的特性。這使風成為一種不同於其他氣象的行動者——必須透過他者備感知的存在。

和水一樣有流動性，但我們卻無法摸到風——只能透過其他管道去感覺風(張怡婷、簡旭伸 2021)。在田野裡，我們確實只能透過間接方式和風連結：從我們的身體、和他人的言談、設施上的痕跡，甚至是手機氣象的數字。這些感知或近或遠，卻沒有一個能像直接採集雨水那樣捕捉到風。這也是因為人生活在風中，這讓我們無法外於風不只是物質，更是一種介質 (medium)，人生活在其中。

有趣的是，當我們詢問課長關於「風對於用路人實際的影響」時，雖然他才剛說完東北季風影響並不大，卻能立刻舉出他同事的例子。側面顯示了東北季風並非不易察覺，而是感知的途徑不同。

「一個一百多公斤的同事，他騎一台一二五、在魚塢中間那一條路，他差一點就被吹到裡面去了。一百公斤喔，我那個同事超過一百公斤。(中略)他是把車停下來，不然他就真的掉下去了。」(田野筆記，吳課長，2025/01/13)

訪談結束後，我們搭天祐助教的車子回到箔子寮。腦子還在處裡剛剛得到的資訊，視線不約而同地停留在車窗上、因為接近夕陽而變得明顯的點點污垢。佩珍開玩笑地詢問助教，怎麼沒有在清潔車子？天祐助教急忙澄清，車子來這邊前是乾淨的。我們恍然大悟，這就是方才課長講的塵汗。比起電線設備，我們在出行之間更能接觸車子，而這似乎又一次的體現課長和我們之間的視角差異。

### (三) 風的物質性：風如何作用於道路基礎設施

我們生活在風中，風和我們互相接近的方式受到彼此的位置所影響。而行走箔子寮中，我們第一個察覺到風的地方——便是第一天走路導覽時，和我們並肩的道路基礎設施。

#### 1. 在風中搖晃的路燈

來到田野第二天，我們正好遇上每兩週一次的路燈維修檢查。每天晚上村長在巡邏的時候，都會注意村內各處路燈的運作情況是否良好，如果有路燈應該亮起卻故障，村長就會將它記錄下來並觀望一陣子。待他判斷這座路燈的確需要修理，就會在燈桿或附近電線桿上綁起紅色塑膠線段，使維修人員來到村裡時能快速辨認哪盞路燈需要維修（見圖十）。



圖十、電線桿上的塑膠紅線，每次抵達開始維修就會拆下此線。  
(資料來源：組員佩珍於 2025/1/7 拍攝。)

當天早上，我們騎著機車跟隨巡視。工人站在高度及胸的白色桶狀載臺，操縱機械手臂升至可徒手觸碰燈罩的高度，然後他打開裝有安定器的鐵箱檢查，確認後俐落地將燈罩掀開，若需要替換燈泡，就從載臺內取出工具進行。整套流程非常快速，不到五分鐘就能修理好一座路燈。這個時候司機會和工人分工，司機紀錄地址或門牌號碼、填寫維修表格。流程走完以後就往下一座路燈前進。司機告訴我們，四湖鄉全境共有二十一村，都是由鄉公所負責路燈的修繕。修繕時主要確認的有三點：燈泡、安定器（變電仔）與燈座。大哥緩慢地補充，這裡通常不會有什麼難處理的狀況，該有的工具維修車上都有。



圖十一、維修現場。  
(資料來源：組員依婕於 2025/1/7 拍攝。)

但維修作業往往是在白天進行，很多時候維修的手段不能即時確認效果。萬一是燈座的問題卻只換了燈泡該怎麼辦？工人並沒有很明確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推論，在這種時間週期穩定的修繕工作中，能不能一次準確解決所有問題不是最重要的。畢竟，工人會不斷不斷地前來，如果路燈不亮，仍會有人發現，只要發現，就能夠在下一個週期中等待解決。

這是我們意味著在規律的時間中，不一定能得到有效率的結果，而維修的時程在這種管理機制下被可能地延長，且從維修工人和村長的態度來看，這樣的延長並不緊急。事後回想起來，我們關注效率的方向、對緊急與否的時間感知就已經和工人們出現分歧。

到維修的後段，依婕和佩珍發現有幾盞路燈沒有燈罩。「有些蓋子蓋上去、風大的時候就被吹走了」大哥回答：「這邊屬於海風，最近又剛好是東北風，方向剛好，都被吹走了。」（田野筆記，維修工人，2025/01/07）

大哥接著補充：

這邊風很大，燈罩一旦鬆掉，就算用電線繞圈固定還是很容易再次鬆脫。如果讓燈罩就這樣鬆鬆的掛著，風一吹，震動很容易就連帶傳到燈泡底座，讓燈泡也跟著容易掉落，不如乾脆不要裝燈罩。

話題中突然出現的「風」把依婕召喚回修路中途，彼時維修大哥正在拆卸燈罩，看到依婕站在燈下，便出聲警告：「盡量不要抬頭。」（田野筆記，維修工人，2025/01/07）。維修大哥等依婕退後才拿起燈罩往柱子上敲了敲，細碎的粉塵漸漸飄下。維修結束後我們上前詢問，大哥說他在把燈罩裡的灰塵、小蟲子敲掉，而依婕剛剛站的那個位置是下風處，所以才叫他離開那邊。

這件事被我們特別記得。不同於第一天直衝而來的強風，那天早上是個晴朗的好天氣，我們三人當下並沒有特別注意到風。與此同時，和我們在同一時空下的大哥卻理所當然地指出風的方位；並指出東北季風對路燈設施的影響。

原以為我們初到此處，會對風比較敏感（例如把第一天蔡茂源大哥認為還好的風認成大風），這個維修的故事卻顛覆了認知：我們才是對風不敏感的那個。

## 2. 反光鏡照見的風

又是一陣風，金屬摩擦發出《一——《又丿——的聲音，風不只是在路上吹，持續吹拂的東北季風逐漸鑲嵌在道路設施裡。

抵達茆子寮的第一天，依婕和禹翔就注意到道路相關設施，尤其是那些在路旁的電線杆、反光鏡，已經被風給吹「歪」了。我們細看幾座反光鏡，發現上面鏽蝕的痕跡，在小路上，基座以螺絲試圖固定在凹凸不平的地面。路燈、電線、號誌、反光鏡，茆子寮的道路組成有許多拔地而起的設施。反光鏡不斷進入我們的視野中，因為反光鏡是這些之中最仰賴角度的設施，必須被特定角度安置才能發揮功用。果不其然，第二天下午我們更仔細觀察設施，禹翔立刻就發現好幾座「偏」掉的鏡子。

偏掉了怎麼辦？幾天後我們詢問村長發現：這種偏移其實很常發生——「歪掉需要需要建設課來處理；如果只是髒掉，可以用毛巾擦一下。」(田野筆記，蔡心娜，2025/01/15)，四湖鄉建設課課長則表示「有通報就會去處理」(田野筆記，吳課長，2025/01/13)，並向我們說明有一種改良過的反光鏡，把遮陽板部分作成簍空，以分散風對反光鏡的影響。



圖十二、改良版反光鏡示意圖。

(資料來源：組員禹翔於 2025/1/13 繪製。)

不過，相對於我們對反光鏡的強烈關注、以及想要去思考如何應對，村長和課長似乎並不算特別在意。就像雖然有改良過的反光鏡樣式，似乎也沒有積極替換的急迫性，我們在茆子寮也只親眼見過一個。這並非是因為建設課怠慢反光鏡設施，而是東北季風跟其他「影響大」的事件相比，風吹歪反光鏡並不是優先處理事項，況且（會用路的）當地人都已經習慣了。

事後，回憶起建設課的訪問。從我們抵達田野開始，風就一直斷斷續續地吹著，似乎也沒有攪亂到造成永久性的傷害。風融入我們的生活中，成為一種「日常持續協調」的一部分，在不斷的修補互動中逐漸成為背景。

不只是空氣的衝擊力，沿岸的茆子寮的風一併吹來了沙塵和鹽分。同樣在反光鏡上，我們發現的鏡面髒汙也是其「失靈」的其中一個要件。沙塵附著在鏡面

上造成反射功能損壞；而鹽分會鏽蝕鏡面本身與其他金屬零件。這就是造成我們在第一天看到反光鏡時，下意識感覺「很破舊」的原因之一。

當地人經常使用的機車上，也時常注意到後照鏡佈滿風沙。影響從鄰近派出所的名稱「飛沙」可見一斑，他們也說監視器需要定期噴水、巡邏車一兩個小時上面就會有一層砂。為了避免影響，有些人家會把機車停在室內、或蓋上布以防生鏽。我們在當地的早餐店用餐時，就曾經詢問過阿姨為什麼把機車停在店裡。那時阿姨就有提到這邊的風是會讓車子生鏽的海風。

我們以為大家會因為熟知海風，而都衍伸出像早餐店阿姨這樣積極的防護措施。然而過幾天，我們看到村長的機車就這麼停在外面，沒有蓋上布、也沒有可見的防護措施。我們詢問村長萬一生鏽怎麼辦？村長很直覺地回答：就做防鏽。比起怕機車生鏽而每次都停在室內，其實路上有更多就停在戶外的機車，任憑後照鏡被弄髒、金屬鏽蝕，也許這就是開車前擦一擦、偶爾做防鏽措施就能繼續生活的事情——海風並不是一種要盡量去避免的干擾因素，而是要與之共存的日常。

#### （四）路他自己沒有（效）了：箔子寮的道路基礎設施功能落差

不只是海風，我們也和行走中的路共生。

田野第四天時，我們在清晨四點起床，打算觀察清晨箔子寮的活動，順道看看普天宮以北這條大路的情況。那時候天還透著靛藍色的光暈，已經不是完全黑暗，但卻覺得那是比黑夜還要更深、更寂靜的色澤。一整排的路燈燈桿全數撤隱了，只有頂端的燈泡點著專屬於四湖鄉的黃光，一路綿延到盡頭。風強勁地吹著我們，看著盡頭盞閃爍的黃燈，光點非常微小，在黑夜裡村落的大致範圍，反而以更明確的形式被標記出來。

箔子寮的紅綠燈在早晨七點時停止閃爍，換回普通的交通燈號功能。大路上的路燈則在七點零五分時熄滅。我（禹翔）沿著道路邊緣向北行走，目的地是建陽國小，那時候多數的學童還沒有抵達。我跨過路肩的雜草和水溝蓋，那時我發覺自己這幾天在箔子寮通行時總會有種難以名狀的焦慮感。焦慮的來源主要是因為，依照都市中身體的慣性，此刻我必定會假設背後不斷有車輛經過，且因為我的位置十分靠近馬路，車輛會距我非常近，我會聽見喇叭、叫罵聲，甚至發生意外。

這種預設，直到我來箔子寮都沒有消除。但是當我頻頻回首，發現沒有半輛車經過。不只是清晨，即使在中午，如此提心吊膽最後多是杞人憂天。於是我慢



慢地，嘗試將身體移動到馬路中央，就像和組員討論時他們所提議的那樣，嘗試適應這裡的道路使用習慣。

幾天下來，我仍很難放心走在路中央，只要偏離路肩一點，城市的慣性就又会讓我感到緊張。

那日清晨，站在建陽國小這處「繁忙」的交通要道一段時間後，開始看見許多老年人騎著機車，載著小朋友來上學。即使是在這村中比較嚴格的交通節點，他們還是時常違反地面標線劃設的規則，直接從對向車道橫跨雙黃線，停妥在學校門口。細究路面標線規則，該路段出現的虛線表示可以跨越，接近路口是明令禁止跨越的雙黃線，不過在茆子寮，道路違規的取締相對不嚴密，當時我從旁觀察的確沒有車輛接近，沒有任何發生危害的可能性。因此，標線彷彿就這麼隱形了。

當基礎設施本身承載的行動變得不頻繁或細微，設施本身往往更走向懸置與被遺忘。這些設施本體並沒有受到損害，就功能而言能夠如常運作，且該設施本身並不與任何大型國家計劃聯繫，僅僅是普通、具有一致標準的一般設施，此時當使用量低，更顯得設施的不被注意。

相較之下，號誌燈這種基礎設施對當地人的制約就相對高。以紅綠燈為例，在建陽國小前的燈號密集區，大台車輛都會依號誌行駛，反而是部分摩托車及腳踏車會無視燈號，即使有導護老師站在路口。

對於都市人而言，這一切的發生很難切身理解。從我對於背後「總將闖出車輛」的既定預設，牽制著我的行動，到當地對於標線的不在意，我們都發覺茆子寮人與基礎設施的互動，是在不存在危險的情境中解放開來的。這種意義上，基礎設施時常被隱蔽起來。

亦如 Larkin (2013) 所言，茆子寮有些基礎設施，則是以不標準的方式被使用的。就如同在前往建陽國小的路上感受到的，生活在都市中對道路規則的認識和預設，與茆子寮相當不同。在這裡，我們觀察到的是人可以任意橫越馬路、行走在道路中央，並且不流露擔憂來車的姿態。

照理來說道路的使用應當界線分明，道路的空間專屬於卡車、汽車、機車，而腳踏車和行人被期待能使用道路邊緣或路肩。若路人跨越車道，進入快車的範圍，會發生很恐怖的後果，輕則被按喇叭嚇阻，重則出意外。而同時我們也被灌輸一套使用道路交通工具的正確方式，例如騎機車時雙腳放在踏板上，過彎時打方向燈，要帶安全帽，並保持在速限區間中，不應在路中央隨意停車。可是，茆子寮當地人展現出的卻是閒散隨意地移動模式，讓道路空間不再是一個被限制的區隔空間，而變成生活能夠滲入、家庭私密空間能夠延伸的地方。

冰茶園早餐店外，來買早餐的當到居民聚集在前庭大廣場，正對著普天宮，清早時候還沒什麼車，僅有魚販將漁獲卸下卡車，以及一台販賣衣服的車輛停放著。我們看見一名婦人將塑膠袋掛在機車上，接著跨坐上去，雙腳蹬地讓車滑行並一邊和別人聊天，不理睬道路的使用規則。

同樣地我們也在路上行走的時候，遇到當地人駕車駕車停在路中央關心我們的去處。以及在吃飯時目睹沙灘卡車緩慢地行進在路上，並在任何地方隨意停止，和人聊起天來。

如此種種隨性而自由的行動方式，自標線到任意停車，似乎「道路」本身就這樣消融在生活之中了，當人的移動可以藉由自己的感官、日常節奏來駕馭，普遍規則與基礎設施的運作預設就面臨變動和瓦解，基礎設施時常被忽略，進而隱形起來。

有趣的是，這些基礎設施則可能在別處，以別種方式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

那是同一天早上，前往建陽國小以前，我們在通往三色屋的大馬路邊遇見全村最早起的吳媽媽正讓烏魚子吹自然風。那些烏魚子從昨夜八點就拿出來退冰，太陽還沒升起就端出來吹風，依照每天的風勢，約莫早上七、八點收進去，如此連續一星期左右就能曬好。他一邊說手裡一邊綁著還未壓扁、還未曬的烏魚子在處理，他把白色繩索綁在烏魚子的「頭」，然後丟在一個大不鏽鋼盆裡。

吳媽媽關心起我們這群人究竟住哪裡？回答西天寺以後，他發出恍然大悟的應諾聲，並且伸手指向西邊，說那邊也有一棟用貨櫃疊起來的民宿。我們追問那大概在哪裡，這時吳媽媽說：

「彼𠵼(hit pîng, 那邊)過去一兩百公尺。」(田野筆記, 吳媽媽, 2025/01/09)

2

因為想知道當地人該如何指路，我們請吳媽媽再為我們說明一次位置。這時吳媽媽便改口：

「電火柱(tiān-hué-thiāu, 電燈桿)一縫一縫(phān, 縫隙)的有無? 大概四、五縫。一縫五十公尺。」(田野筆記, 吳媽媽, 2025/01/09)

當時昏黃的路燈星星點點沿路連接過去，在漆黑的樹影、田園、房屋之間特別明顯，即使是最遠處，我們也能看見路燈光源的方位。於是在清晨的箔子寮，用路燈作為量尺來標明距離是最直覺也最有效的方式，因為光線是共同的視覺現象，外地人也能明瞭。我們一方面訝異於這種指路方式的準確，亦有感於那條路

---

<sup>2</sup> 當地人多以台語文為日常交談用語，本篇文章直接引用的呈現以台語正字為主，適時以括號補充台羅拼音與華語翻譯，僅供參考，歡迎指正。

上的路燈，能夠服務的用路人相比之下並不多，可是透過視覺效果，卻能勾勒出人在鄉村之間的具體空間感。

但在白天就不是這麼一回事。那條路就和茆子寮聯外道路一樣，種植著一棵棵孤獨挺拔的中東海棗，電線桿錯落在中東海棗之間，橫向的電線擋在樹頭上。白天充足的陽光使得辨認周圍的景象越加困難，路的盡頭只見樹木和電線桿間隔重疊在一起，尤其路燈、電線桿的顏色會融入白天的背景，舉目望去，除了樹還真不知該用什麼來指明位置。路燈作為在夜晚發揮功能的基礎設施，因為其本身產生的氛圍與視覺特性，使它在用路的預設功能之外以距離標記的形式被看見。

正常運作的基礎設施本身不容易進入大眾的視野，那是因為它提供的物質功能協助國家、地方穩定運輸、能源、生活用途。但在茆子寮，這裡的道路並沒有大型國家治理計劃的干預，這裡的燈號都還能閃爍，標線也還清晰，如此一來我們所觀察到的用路行為差異，並非是因故障而生。正好相反，是因為這些政府列為正確而普遍的規範，在當地沒有準確對應需求。無論是在安全性、車流密集度，生活節奏方面，當國家標準的設施進入一個無需以該標準生活的地方時，就面臨了漠視。

同時，這些由「規範」與「硬體」共構的設施，反而成為流動開放的空間，人與人的交際可以在道路中央發生，人對於村落空間的指認，也能善用忽隱忽現的夜晚路燈指名，基礎設施的氛圍特性，在原先預期之外加入了當地人的社會生活和行動之中。如上，茆子寮的基礎設施作為當地人鄉里生活場域的重要元素，這樣的現象尤為顯著。

接近九點左右，我們結束早晨的觀察，收隊走回民宿。沿著雲 131 向南行時，感受到風的強勁，風從背後吹來讓我們腳步不穩地被推著向前。

仔細一想，這風已持續了好幾天，當我們縱走觀察基礎設施時，一陣又一陣的風都會從背景竄出，直達我們身邊。雖然在進入田野前就已經得知這個季節的茆子寮盛行東北季風，可是我們從未如此切身地沉浸在這樣的情境裡，體感是那樣地具體強烈。

風就這樣吹了起來。

## （五）、在風中生活：居民如何應對風

「會搖ㄟ！騎的時候還會搖ㄟ！」（田野筆記，阿雪，2025/01/06）

風不只會透過設施被人感知，事實上更多時候，我們直接感受到風、去談論風對人的衝擊。這也是我們在建設課訪談時覺察到的：風時常透過個人經驗中被感知。

回想第一天剛到箔子寮時，茂源大哥有帶我們走到雲 131 上，彼時正吹起了風，不習慣強風的我們被吹得又冷又凍。茂源大哥看我們一直吹風，便在拐進巷子時告訴我們「那邊朝南比較不會有風」（田野筆記，蔡茂源，2025/01/06）。當時我們除了對大哥的方位概念感到驚訝，也發現雖然這裡是「風頭」，風的強度卻並不是均質地在每個角落吹動。風不像雨量可以用氣象資料一言以蔽之，我們發現風更容易受到觀測者自身狀態的影響。比如：空間方位，又比如：移動方式。

## 1. 哪裡有風吹

阿雪曾經和我們提過「沒有屋子的路會感覺（風）比較大」（田野筆記，阿雪，2025/01/08）。在我們活動的主要範圍裡，常被提到的兩條「大路」分別是雲 131、以及通往下崙的那一條。它們分別都有相當的路寬：除了雙向單線道之外兩側還多出非車道的路肩；且它們的兩側都鮮少有家屋。

除了路寬外，方向也是相當重要的判斷點。比如進入田野的首日，負責導覽當地的蔡茂源大哥特別在拐進巷子時告訴我們「那邊朝南，比較不會有風」（田野筆記，2025/01/06）。

這點依婕也有感受到：在氣象顯示強風特報的前一天，我用借來的機車去一趟海邊，尋找箔子寮的氣象觀測站。途中因為路不熟迷路調頭數次，原先的路段都騎得很順利，某次迴轉後突然面向強烈的逆風，騎車時啪啦啪啦地佔據所有的聽覺，一停車卻又消失無蹤。隔天遇到同學，才發現這不是自己獨有的經驗。

早上在大廳遇到一大早去漁港的建志，去說今天風吹到去頭暈，騎單車根本騎不動——大概是往前一格倒退兩格的情況，只好想辦法繞路前進。（田野筆記，楊依婕，2025/01/15）

箔子寮的風有明顯的季節性，田野期間恰逢冬天的東北季風最盛期。雖然風向不會真的完全不變，但待了幾天的我們也會漸漸記住哪條路、往哪方向走會逆風。我們冒出了新的疑問：既然風大到可能會讓居民「用不了路」，那，怎麼辦？

「其實影響不算大」民宿夫婦回應，自己不是做農做漁的，風對他們不太有影響，就是風大風小的區別：「來回一趟順風一趟逆風，所以也沒差」（田野筆記，民宿夫婦，2025/01/14）。似乎是在說，要去的地方還是得去，若不是遇上像建志

那種必須繞路的情況，頂多在逆風方向時稍微撐過去就好。也因為箔子寮「要去哪裡不會只有一條路」，用路人可以去選擇使用的路段。民宿夫婦提到路上的臭味、是否會積水等等都會影響他們常走的路。真的要出門、卻又碰上迎面而來的強風時，就會像建志一樣，要想辦法繞路前進。

## 2. 行於風中

田野初期，我們就被老師頻頻提醒要留意村內的交通方式，大概可以粗略地分為四種：汽車、機車、單車以及步行。我們詢問村裡的人天氣與選擇的出行方式之間的關聯性，答案似乎很明顯：若有要出村外才會用汽車，村內多以後三者為主。然而，距離不只是唯一一個選擇的因素，在訪問村長時，他提到如果開車巡邏會被笑「才這樣就怕冷喔」（田野筆記，蔡心娜，2025/01/15）；或是游阿姨說明自己運動情況時表示：「風大時不騎腳踏車，因為太難騎了，搖搖晃晃」（田野筆記，游阿姨，2025/01/14）。

肇因設備因素，三位組員幾乎都以步行、單車為主，但也有搭乘同學的機車、助教的汽車等經驗。佩珍在搭乘阿雪的機車時，相較於前幾天我們都用步行單車，他很明顯地感受到「特別冷，比起騎腳踏車，風很大」雖然「今天沒什麼風」。這看似是一個前後矛盾的語句，卻揭示了觀測者本身狀態之於風感知的重要性。「今天沒什麼風」指的是我們白天一起步行時並沒有感受到風特別強勁；然而在坐上機車、帶著速度迎向風之後，衝擊力的感受會出現相當差距。

這並不是我們第一次聽聞風如何直接衝擊用路人。如同建設課課長雖然並不認為風對路本身有太大影響，卻也和我們分享他聽聞同事的經驗：同事騎在魚塢中間的路，差一點就被吹到路的外面了，最後是被迫停下才能免於跌倒。這個例子恰好呼應了風—用路人狀態的互相影響：同事必須要停下才能減緩風的力量。

行走在風中的居民們也會在車子與自己身上裝備「防風用品」。從衣著開始，在這邊比起安全帽，更常看到兩側有耳罩並固定在巴處的鴨舌帽、防曬斗笠布帽、在帽子上加裝下巴繩；若不戴帽子，大概就是用頭巾包起來，走在路上有時候「很遠都分不出他是誰」（田野筆記，林煌智，2025/01/14），彷彿已經發展出一套迎面強風的身體。除了身體，出行設備也會被改裝。機車作為速度偏快、又是常用的交通工具，裝在車子前方的「防風擋板」是一塊裝在機車把手處的塑膠板，其的高度大約可以擋住駕駛人的頭部。文進老闆說這個「夏天擋蚊子，冬天擋風。在南部就很好用」。一開始也會想說為什麼要裝，但後來因為風大到眼睛有可能睜不開，才發現這個的方便之處。

我們不斷感受到身為外來者和當地的視角差異：總覺得自己在問一些奇怪的問題——似乎我們是第一個問路問風的人，又或是這些早已嵌入他們的日常，而我們才剛剛要開始適應。就像我們會想：天啊，海風會讓機車生鏽，那怎麼辦？但他們似乎已經慣於做防鏽、停家裡，或是因為「避免不了」就習慣性地清潔後照鏡。這樣子，生活似乎在一種逐漸無形的協調中持續下去。

正因為要長期和風共存，而風又是一種頑固且不能被輕易應對/處理的現象，比起我們想像中的積極反抗，更常看見居民們和風一來一往互相協調，培養出對風的感知敏銳與調節自身的應對。風的強勢更體現在民宿老闆娘面對依婕「風對你們來說是什麼存在？」的回答之中——「風是我們這邊的特色。但東北季風真的有影響到地方發展。因為大家都不喜歡風太大，風一大起來連出去都不想出去。」（田野筆記，民宿夫婦，2025/01/14）。比起無法抵抗或積極抵抗風，我們在其中發現一種感覺風、與風協調、與風共存的生活節奏。

## （六）罔行：與游阿姨的午後行走

然而，對於踐行者（wayfarer）而言，世界並不是一張等待被橫越的平面。在他的移動之中，他穿行（threads）於這個世界，而不是從一點到另一點地直通這個世界。當然，踐行者是個陸地上的存在者，不可避免地要履過大地。（Ingold 2011:151，佩珍自行翻譯）

一月七日的下午，我（佩珍）坐在春天民宿門口發呆，狗狗阿黃<sup>3</sup>蹭過來躺在我的腳邊。文進老闆站在門口與朋友閒聊，我無所事事地在聽著，看見一輛輛汽車和機車陸續停在路邊，有些人乾脆下車、加入聊天；也有些人只是經過，斟酌過後點個頭、丟下一句話就走。有位騎士笑著對文進老闆說自己是特別下來看老朋友的，也有一位婦人快步經過，邊甩著手、邊回應老闆的招呼，說自己是在「罔行（bóng kiánn）」。

---

<sup>3</sup> 阿黃是茆子寮當地的狗狗，連續兩年都會和文化田野的同學一起玩。



圖十三、一月七日的午後，春天民宿門口。  
(資料來源：組員佩珍於 2025/1/7 拍攝。)

我對「罔行」這個詞彙印象深刻，它以格外輕盈隨意的語調在描述自己如何「出門走走、運動一下」；於是在田野筆記上記下這個詞彙，當晚搜尋了確切定義——「罔 (bóng)」有姑且、將就之意 (教育部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 2025)，「行 (kiänn)」是走路，拼在一起，合起來彷彿是「有空就出來走一走」的意思。但現場那句話裡，它又不那麼單純：那種行走不是為了抵達特定目的地，也不是要達成什麼鍛鍊身體的明確指標性目的，而是一種「出來活動一下」、讓身體不閒著的日常節奏。不是漢語白話說的「運動」，也不是觀光客口中的「散步」，它比較像是在地生活的一種韻律。罔行的罔，是暫時、是容許、也是維持——在能走的情況下，持續地走著。

梁宸維與王安珩 (2025: 221-225) 也同樣在箔子寮觀察到長輩們行走運動的習慣與節奏，並將現象以長輩們常掛口中的「動了才會健康」交織地進行延伸討論，梳理出當地的健康觀念與「動」之間的密不可分。無論是行走；串蚵殼、剝蝦殼、早起搬貨、甩手、講話、乃至賭博，都是讓身體保持活動的方式。這些行動是一套在地自我養生、照護的方式，呈現出當地獨特的身體節奏；而「罔行」一詞，也正把如此身體節奏輕輕地包覆進語言中。

那天之後，我開始特別留意路上走動的身影。凌晨五點多的大縱走，天還沒全亮，就已經有老人家提著袋子、慢慢地從某個巷口出來；到了午後或傍晚，又是人出現沿著通往海邊的路走個來回。這些走動不像「運動」那麼明確有儀式性，也不總是規律可循，而更像是生活本身的延續。在走動的過程中，他們維持著身體的節奏，也和地方維持著某種連結。

我逐漸發現：在箔子寮，走路不是移動的手段，而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它與風、地勢、路況、社交、身體狀態一起構成一種「在地活著」的方式。我開始

好奇：這些走動中，藏著怎樣的風的知識？哪些判斷來自迎面的風感、皮膚的冷熱、太陽斜射的角度？又有哪些，是我站著看、坐著寫田野筆記時難以發現的？

於是在一週後的午後，我通過阿雪與當地的居民游清琇阿姨搭上線，跟著她走了一趟她每日慣常行走的路線。



圖十四、一月十四日的午後道路模樣。  
(資料來源：組員佩珍於 2025/1/14 拍攝。)

一月十四日是我們進到田野的第九日。那天午後馬路空曠、天氣晴朗，藍天上的雲被風吹成細長的條紋，太陽照下來，影子斜斜地躺在地面。從春天民宿前往普天宮的路段開闊無遮，電線在頭頂交錯，屋簷低矮，風穿過這裡的速度似乎特別快。

三位組員在那天下午分開行動，依婕騎車前往海邊探查氣象站，禹翔離開箔子寮去訪談，而我（佩珍）跟游清琇阿姨則約在普天宮門口碰面。先前僅有短暫地聊過幾句，我本以為阿姨只是比較習慣使用台語，真正交談起來才發現她其實並不說華語。組內台語講得最流利的禹翔不在，我緊張地整理情緒，手忙腳亂地按開手機的錄音鍵，掏出寫字板準備一邊走一邊速記。與我的慌亂相對，游阿姨則非常自然地邁開步伐，從普天宮門口走向對面那條繪有喔熊藝術村導覽入口標示的巷子走去。

這是游阿姨平常會走的兩條路線之一：從普天宮出發，沿著藝術村導覽的方向繞一圈返回普天宮；另一條則是直直地往下崙方向走，過橋之後折返回來。游阿姨說這些是她自己的路線，也有人選擇朝海邊、或者廣溝方向走。如同首日導覽時，茂源大哥講到「箔子寮沒有路名」（田野筆記，蔡茂源，2025/01/06）——這裡沒有標示清楚的路名，村裡人說路往往說不出方向與特定命名，而是用一種「自己知道怎麼走」的方式在記憶裡勾勒空間。



我花了好幾個來回提問才大致拼湊出這些路線的模樣。這樣的模糊或許正是地方對空間熟悉的一種形式：不透過地圖上的線與點來辨識，而在日復一日的腳步中，路徑與方向早已沉入身體。從這層意義上說，這樣的路線並不是被「記」下來的，而是「做」出來的——走出來、走熟了，就成了自己的路線。正因為太熟了反倒難以用言語交代清楚。

剛走了一小段，游阿姨便在空檔向我主動開口，問道：「你無掛口罩，袂(bē, 不會)冷喔？」(田野筆記，游阿姨，2025/01/14)那時我還在慌忙地在寫字板上用力寫下上一個問題的答覆，整個人縮在大衣中，抬眼，對上游阿姨的眼神，騰出手來摸摸臉頰，才發現這幾天也真的被東北風刮得有些乾癢疼痛。游阿姨那天穿著一件條紋的長袖上衣、黑色長褲、灰色的布鞋，並戴著亮綠色的口罩與一頂漁夫帽，帽子的下巴繩鬆鬆地抵著。

那時我還不熟悉與阿姨的互動節奏，猜測阿姨那句話可能只是想打開話題、暖場聊天；但回頭看，這其實是一個身體感知所生成的即時判斷。風吹過來，她的臉感受到溫度變化、也許夾帶些鹹鹹的乾燥體感；第一個反應是看我穿了什麼、戴沒戴口罩。風在此不是抽象背景，而是她判斷要不要出門、怎麼穿衣走路的重要依據。而我當時還沉浸在速記筆記的焦慮節奏中，沒意識到自己已經開始用身體參與這場風中的對話。

游阿姨在這樣的大風日中會形容今天很「寒人」(kuânn-lâng)。速記下這樣用詞的同時我也深感自己非常喜歡這樣的形容——一般而言我們會說「風很大」、「天氣很冷」，很直白地從自身身體出發、去描述冷意，游阿姨卻把「迎著風的自己」放進語言裡，描述：寒意包圍我們，滲進我們裡面。

我們沿著藝術村的導覽路線持續向南行走，路旁是連綿低矮的平房與幾間倉庫樣的鐵皮屋，偶爾有其他居民迎面走來，阿姨總會點點頭、舉手揮一揮，笑著說幾句「行喔」、「閣出來喔」。在這些打招呼的交會中，她的腳步沒有特別停下也沒有加快，呈現出平穩熟稔的節奏。

行至半路，我們遇見了一對年邁的夫妻。丈夫自我介紹叫做蔡金造，在閒聊幾句之後，他邀請我與游阿姨進屋坐坐。我們推開兩道鐵門，換上室內拖鞋走進屋內，他們一邊與我們閒話，一邊卸下外出時防風的裝備——針織毛帽，兩到三件厚厚的外套。游阿姨也取下自己的帽子與口罩。門闔上之後，風的聲音立刻小了，整個室內瞬間靜了下來。我聽見游阿姨感嘆了一句：「恁遮足燒欵(Lín tsia tsio--eh)。」(田野筆記，游阿姨，2025/01/14)

那棟房子裡確實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穩定與安定感。前庭與家門之間有兩道厚重的鐵門，把巷口吹進來的大風徹底隔絕在外。也許是方位的關係，也許是房屋本身的格局，屋內體感異常地溫暖。如同當日田野筆記中的記錄：「空氣確實更

凝滯溫暖（但不悶），感覺沒有寒氣滲進來」（田野筆記，吳佩珍，2025/01/14）——這形似游阿姨口中「燒」的意思：沒有風，溫度適宜，是一種舒適得難以翻譯的感覺經驗。

進入蔡金造大哥家之後，原本一對一的訪談節奏自然地變成了三人之間的台語對話。當我問起三人運動時是否有哪幾段路特別容易感受到風，他們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若面北行，風就會較大。因此，蔡家夫婦在風大的日子都盡量往南走。

我對「北」這樣的方位形容露出困惑的表情，儘管在田野數日、早已知道當地人習慣用東西南北來指稱方位，我也大致可以用雲 131 鄉道作為基準來辨別方位，但在一番曲折的小巷拐彎行走、又坐進這樣一個四面牆都長得差不多的家屋裡，我的方向感早已模糊。見我困惑，他們於是熱心地開始在空間中辨認，指向一面面牆壁，用手指比劃，示範給我看東西南北分別在哪——這種指認根據方位與風來辨向，是從生活中累積起來的地方知覺。

沿著前述問題，我進一步確認：所以風很大的時候就都會改道、往南邊去運動囉？蔡家夫婦則回覆說要看情形，要是真的不適合走路，那就不會出門了。柏油路損壞或是電線掉落亦然，面對我的提問，他們一起想了許久，表示幾乎不會遇到這樣無法通行的嚴重損壞狀況，但即使遇到，也不過就是改道或是不出門。

需要改變行動的時刻很難稱得上是什麼重大事件，也很少在記憶裡留下痕跡——正因如此他們論及自身經驗的語氣都非常平淡順口，但這不是在否認風的效力，也不代表這裡的路總是穩妥無虞。「改不改道」、「出不出門」這些決定並非來自一套穩定不變而精細的知識，而是那天風怎麼吹、腳力怎麼樣、心情如何或身體當下怎麼感覺——風大就不走，或者轉走另一條路。這種難以被召喚的即時應對，恰恰是地方生活熟悉的節奏，也是「罔行」的一種側面：不目標導向地走，而是身體自己知道怎麼走，什麼時候走，往哪裡走。

從蔡家出來時，雲層堆積天色泛灰，午後的暖意褪去，風也跟著變得比較銳利。我們順著原路慢慢走回普天宮，途中游阿姨指著一棟建築物介紹「這阮兜啦（Tse gún tau--lah，這我們家啦）」。那是一棟兩層樓高的透天厝，門口是一層薄薄的紗窗鐵門。

走回普天宮前的空地時，我們遇見了出來張望的阿雪。她笑著打招呼，也問了我們幾句走得怎麼樣，三人站在普天宮門口聊了一下天。我跟游阿姨都有些猶豫，抓不住結束的時機，直到阿雪離開去處理普天宮的宮務時，游阿姨才轉頭邀請我去家裡坐一下。

我們又沿著運動的路線折返，走到游阿姨家。

游阿姨家的地板是涼意更強的磨石子材質，光線也昏暗一些；沒有蔡家那種「燒」的封閉感，空氣也沒那麼厚實。一進門就看見阿姨停放在室內的腳踏車，她也簡單地回覆停在室內就比較不會生銹（senn-sian，生鏽）；門外的機車是剛好今天早上有騎出去、還沒停進來，否則平時也會牽到室內放。

阿姨邀請我坐在客廳，我們打開電視一面看、一面聊天，她分享許多自己家裡的事情。電視頻道一台台地切換著，一下是台語歌唱節目，一下又切到公視台語台新聞——游阿姨橫躺在沙發上，頭枕著抱枕，向我說明：她每天都會看這個，來知道明天會不會起風、下雨。問起村裡其他人明天的天氣，茂源大哥或路上遇到的長輩們也都自然地跟我們說，就靠氣象預報了。

對於回到春天民宿集合時間，游阿姨顯得比我還要緊張，見時間快到了就領著我走出家門，想要陪我走一小段路回春天民宿；我笑笑地說那個時間沒關係，我傳訊息說一聲就可以了。

我們最後停在一處拐個彎就可以抵達春天民宿的岔路口，一旁有塊水泥空地，上頭鋪著一塊塑膠布，邊緣用磚頭壓住，布上攤著一層厚厚的番薯籤。那是游阿姨放在那邊曬的，雖然是別人家的地方，但彼此互相認識，這樣曬沒問題。

她湊上去捏了一把番薯籤，說還有點濕濕的，要再曬一會兒；我們兩人又退回路邊聊天。風從北邊的馬路方向吹來，穿越岔路直直地推向我們。阿姨忽然中斷話題，指著牆邊說：「你來倚（khia，站）這啦。」我抬頭，她往側邊挪了一兩步，身體倚靠在屋角的遮蔽牆邊，回頭看我：「這風較細（sè，小）啦。」

我走過去，站在她旁邊。果然剛才還直直打在臉上的風驟然微弱下來，只剩比較靠外側的那側身體有風滑過。



圖十五、我們避風的牆邊。

（資料來源：組員佩珍於 2025/1/14 拍攝。）

「按呢(án-ne, 這樣)風是毋是有較細？」躲到牆邊後，游阿姨用一種得意又確信的語氣向我確認。我笑著點點頭說：有，阿姨真正足厲害呢。

那一刻我沒有急著追問、也不惦記著要記下任何筆記，我只是站在那面牆邊，和游阿姨一起感受風是怎麼被擋下來，讓身體短暫地對齊她日常中的一種空間判斷。

我們走動(walking)，我們踐行(wayfaring)。

不為了抵達什麼特定地點，而是罔行，在行走中敞開地迎向不期而遇的當地人與風景；並非目的導向地用訪談一問一答獲取材料，而是透過一步步的前進，把自己拋進一段關係之中……游阿姨帶著我繞行小鎮，比我更在意我的回程時間、又時時刻刻怕我吹風著涼，我們之間隨之生成一段被行走織就的關係。正如Ingold(2011)所言，踐行者並非一個被從這裡搬到那裡的對象，而是其移動本身——其行動就是紮根在世界中的存在。

Ingold 明確地區分運輸構成的網絡(network)與踐行織成的線網(meshwork)——前者是以「點與點連接」方式運作的複合體；後者則以線為本，是一張由交錯或打結的繩索所編成的開放性織物(2011: 151-154)。在我們的走動中，不斷與人相遇、與場景交織而成的即是後者——我們進入田野地，拜訪不同的報導人，踏足當地人日常徘徊的場所，生成關係以及身體記憶。在這樣的移動與牽連中，我們進入了一張地方的線網，在一場場線狀的行走中沿向整合(alongly integrated)出關於當地的筆記與知識。

我再次想起田野頭幾日記下的那個詞：罔行。不像我們進入田野前仰賴著衛星地圖，錨定地圖系統中各個被命名的據點(普天宮、春天民宿……)並在點與點之間移動，罔行標誌一種「能走就走」的生活方式、一種仍在發生的生命活動。走著、罔行著，也就是讓身體與世界持續保持關係，在線網裡輕輕織出彼此的故事。

每一條線是一種生命的方式(way of life)，每一個結是一處地方(place)(Ingold 2011: 151)。現在回顧這一段文化田野經歷，會發現我們遇見的是各種不同的生命的方式——這些方式彼此交錯、彼此牽連，於是逐漸打結密織，交纏成一座地方。我們想那地方就是這座吹著大風的小鎮。



圖十六、游阿姨與她的番薯籤。  
(資料來源：組員佩珍於 2025/1/14 拍攝。)

#### 四、明天有明天的風吹：在吹著大風的道路上——綜合討論與結論

「今天的日子或許不盡如意，但明天將有好運帶來給您。」——林之助  
(巡藝 2025)

在田野中進行訪談的時候，我們很喜歡提問：「大家都說這裡叫做『風頭水尾』，風頭水尾是什麼意思？」我們想要知道當地人對於「風頭水尾」一稱的詮釋、得到肯定又多樣的形容，並立刻把實用的語言資料記進田野筆記裡面。可是我們常常收穫的卻是浮現困惑與遲疑的臉容——許多當地人會推託回覆，揮揮手、搖搖頭，說自己也不太會講。

身在田野的第十日下午，我們組前往檳榔攤補訪心娜村長。檳榔攤坐落在雲 131 與 131-2 鄉道相交的岔路口。訪談中途有許多村長的親朋好友也來到檳榔攤聊天，小小的空間裡滿溢嘈雜的談話聲與笑聲。那時我們又趁人多時提問：什麼是風頭水尾？大家面面相覷，互相指著對方讓對方回答，嘴上碎念「你比較會講，你講啦」，推推搡搡著還想把這個任務交給常常出海捕魚、熟悉海風的黃船長。

此時村長的阿姨風塵僕僕地抵達，把摩托車停靠在檳榔攤旁。眾人見她來訪，用一種快要笑出來的語氣說：這些學生問什麼叫做「風頭水尾」啦。

阿姨大笑。

「這是風頭！」她轉頭，誇張地動用整個身體，伸出手指著背後的雲 131 鄉道。

「這是水尾！」轉過身，她又指著雲 131-2 鄉道。

那天的田野筆記記下了這個場景，最後加了一句註記：「非常瞬間，當地的風與水融貫地與在地的道路、方向連成一片。」(田野筆記, 吳佩珍, 2025/01/15) 從檳榔攤看過去，阿姨所指的雲 131 鄉道無盡地向北方蔓延，那就是風的來向，即所謂風頭；而另一條雲 131-2 鄉道則是通往海邊的道路，只須步行個十分鐘就能抵達海邊。

這樣的場景提醒我們：地方的「知識」不總是以語言明確呈現，也不必然來自懂得回答的人口中；它可能是在嘈雜的空間中，在一場指向、一句笑語或一個身體轉身的過程裡顯現出來。我們發現如果只是等待一個解釋「風頭水尾」的完整答案、等待語言的自我說明，許多時候我們將錯過知識實際被生成與傳遞的節點。

也正是因此，我們在研究設計上選擇採用 Ingold 提出的「踐行」取徑。與其說它是一套固定的方法，不如說它是一種態度，一種允許我們將焦點從「定義是什麼」轉移到「如何一起走、一起看、一起認出」的姿態。當我們將田野理解為一場與地方居民共走的實踐，我們才逐步得以看見：箔子寮不是一組清楚列出的知識，而是一張線網。在這張網裡，我們拜訪報導人、進入他們的家中、沿路行走與對話的過程，不是從一點到另一點的知識運輸，而是將我們的路徑與他們的日常互相纏繞、牽結的踐行。

我們從這些線的交織中，一點一滴辨認出地方知識的織法：不總是直接回答，不總是可譯為詞彙，但總是在彼此的相遇裡被做出、被指向、被分享。我們所遇見的是作為一張網結的箔子寮地方本身。

過去不少與我們主題相關的研究——比如前述文章提及的 Harvey 和 Knox (2012) 與 Reeves (2017) 之基礎設施研究，或黃弈豪 (2015) 與彭新雅等 (2019) 針對雲林沿海地區風與其後影響的探討——多從較宏觀、由上至下的視角出發，揭示了結構性的不平等、國家治理的盲點，或以數據呈現海風對當地地貌的影響。

踐行的方法論則幫助我們停留在這些節奏中，容許我們從地方的身體語言、走動方式與交談斷裂中，看見地方知識如何在行動中被指認與重組。

這樣的方法論讓我們在箔子寮當地看見什麼？

在田野前期，我們將焦點放在這些基礎設施「存在」與「實際功能」之間的落差——路燈的鏽蝕、反光鏡的歪斜與飛砂……我們以為自己會看見一個設施不堪風力而「失靈」的地方。但當我們實際踏上那些道路，以踐行的姿態穿行在鄉道小巷、與當地人相遇並對話，我們得以捕捉當地更動態的圖像，逐漸發現：所謂的「失靈」在當地並不總是構成強烈而可感的不便，人們反而在日常生活裡展

現出一種對環境細膩的感知與應對方式。這樣的經驗促使我們發展出核心假設：即便設施形式上存在，其功能與使用方式仍需透過地方的生活節奏、自然條件與身體實踐重新定義。茆子寮不是一處因環境自然條件而「設施失靈」的地方，而是一個人與風共存、重構設施意義的場域。

基礎設施理論告訴我們：對人們來說，基礎設施總是在損壞失靈時才從背景跳出 (Elyachar 2010: 455)。但在茆子寮，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種情形：那些我們以為失靈的設施，實際上仍在一種地方的實踐節奏中發揮作用——熟知海風與飛砂的鹽分會腐蝕金屬，因此把機車停放在屋內；行走於冬季吹著大風的道路上時，知道該鑽進哪條朝南的小巷、站在怎樣的地方——這些行動是對設施意義的實作性重構。於是，回到 Rest 和 Rippa (2019) 的討論裡，我們在茆子寮看見的實際現象，其實更符合其推想。設施不是因為失靈了而突然被注意，然後急切地被修復回歸正軌、再度隱形，彷彿一個封閉的週期。基礎設施是無論失靈與否，都屬於地方實踐節奏的一部分。「因為置身於生活之中，道路才會擁有自己的生命。」 (Rest & Rippa 2019: 386)。而所謂的生活，在茆子寮指的就是和人與大風共同活出的情境。

也因為這樣的方法論，我們才能從大氣科學和以能源為中心的思考中挪開目光，去專注思考：在日常的風是什麼？

這似乎正是 Ingold 說的人與天氣交混 (commingling) 的天氣世界——人是「浸潤」在天氣世界中的。我們使用一種身體的、具有方向性的知識：常民量體流動思維 (fluid volume thinking)。我們並非站在旁觀的角度思考大氣 (thinking about the atmosphere)，而是「與大氣一同思考 (thinking with the atmosphere)」 (張怡婷、簡旭伸 2021: 179)。這不只代表是文字上的邏輯變化，也是我們作為研究者、重新去思考自己與大氣之間的關係，進而對我們的經驗做出其他詮釋的空間。

風透過關係被感知的特性，讓研究者必須去尋找和風產生連結的人事物。這份關係不只看見風造成的「困擾」，風同時也是當地的「特色」，是他們之間感知彼此、感知地方的方式。如同民宿阿姨雖然承認風造成地方發展的阻礙，卻還是回答：

「風是我們這邊的特色。」 (田野筆記，民宿夫婦，2025/01/14)

我們將風的人類學理論與茆子寮的田野經驗連結，並非是意圖將茆子寮歸納進風的理論中；與之相對，反而身處於茆子寮的特定時空中，我們試圖與茆子寮、與風一起思考，試圖重新理解文本、接近一種截然不同的知識與生活態度。

在第一節〈遙望茆子寮〉對茆子寮當地進行一次遠望與速寫後，接著〈文獻中來回走動〉回顧學術脈絡中，基礎設施從存在的獨立物件，逐漸成為一種開放

流動的過程。我們嘗試走在茆子寮中，探究基礎設施究竟是如何「成為」一種關係。

第三節〈我們在風中穿行：以踐行（wayfaring）認識茆子寮〉中分有多個小節記述風的蹤影：第一小節〈茆子寮的風〉簡要回顧過去研究；第二小節〈也許沒那麼重要的風：訪談中的管理視角〉中我們暫離茆子寮，依循四湖鄉建設課吳課長的視角，發現地方內外視角的落差；第三小節〈風的物質性：風如何作用於道路基礎設施〉則又返回當地的身體，從路燈與反光鏡兩項道路基礎設施出發，辨明風如何物質地作用於設施，同時也了解到路燈維修工人與村長悠然的應付節奏——設施失能也不必緊張，靜待維修週期或有相關需求反應，在自己的節奏中動身前往處理。

第四節〈路他自己沒有（效）了：茆子寮的道路基礎設施功能落差〉就以基礎設施為起點，紀錄到茆子寮當地用路人不受交通號誌、標線與規則所限，自由閒散地在流動敞開的道路上漫遊聊天；我們或見到當地人坐在摩托車上踱步滑行，或見到原先作為路口提醒之用的閃黃燈翻轉為指認路線的依據，那是我們第一次體會到當地獨特的用路方法與時間感，是為具身地認識當地的線頭，像第一日的田野筆記中這樣記下：

在道路上，即使是騎著車、與交通工具融為一體的，卻彷彿自由流動地覺得自己可以隨時停下來；在茆子寮，不會因為身在「道路上」、「馬路中央」，就必須低頭快步走過，相遇跟交談好像比起我平日生活的地方更加容易發生。這讓我覺得：茆子寮的「平坦」與「一望無際」不僅止是非常物質層面地形容當地地景而已。（田野筆記，吳佩珍，2025/01/06）

循線而去我們摸索到糾纏的繩結，發現大風正在這流動而敞開的地方吹拂。

第五小節〈在風中生活：居民如何應對風〉與第六小節〈罔行：與游阿姨的午後行走〉更明確地記錄了當地居民面對風的舉措：從日常防風用品到避風的方法，從改道、不騎腳踏車乃至不出門的風中態度。

「命運，有時像風，說變就變／所以明天自然會有明天的風吹／說不定，就吹出了另一種方向」（林之助紀念館 2016）





圖十三、明天有明天的風吹。  
(資料來源：巡藝 2025。2025/5/13 取得。)

離開田野以後，我們偶然認識林之助的膠彩作品《明天有明天的風吹》，那些在箔子寮所遇見的事物都在忽然之間被輕輕總結。像是我們在田野裡一次又一次經歷到的、帶著身體走入地方之後才慢慢浮現出來的理解：在路上，在風中，在吹著大風的道路上，箔子寮的人們以一種隨興而從容的姿態回應著環境的變化，在每日的行走與應對之中，實踐迎風的方法。

在這片被風揉捏過的土地上，應變與悠然態度並共存。我們逐漸明白，這正是箔子寮的風——不只吹過道路，也吹進了人的身體與生活的節奏之中。箔子寮的人們不急不徐地活在風裡，也讓我們學會：有些答案，不需要急著說出來，也不需要說得那麼清楚；有時候說不定只是換個方向走，就已經是另一種理解。明天的風自有明天的吹法。

## 參考資料

Allen, Jamie

- 2021 Infrastructural Unres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Politics of the Machines - Rogue Research, Berlin, September 14-17

Anand, Nikhil

- 2011 PRESSURE: The PoliTechnics of Water Supply in Mumbai. *Cultural Anthropology* 26(4): 542-564.

Chappells, Heather

- 2017 Infrastructure and everyday life.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Douglas Richardson, Noel Castree, Michael F. Goodchild, Audrey Kobayashi, Weidong Liu, and Richard A. Marston eds. Pp.1-7.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Ltd.

Choi, Bada

- 2022 Challenging wind power as a source of wealth in Penghu, Taiwa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ind's entangling materiality. *Asian Anthropology*, 21(2): 81–99.

Elyachar, Julia

- 2010 Phatic Labor, Infrastructure, and the Question of Empowerment in Cairo. *American Ethnologist* 37(3): 452-464.

Harvey, Penelope

- 2005 The materiality of state effects: An ethnography of a road in the Peruvian Andes. *In State Formation: Anthropological Explorations*, eds. Christian Krohn-Hansen and Knut G. Nustad, Pp. 216- 47. Cambridge: Pluto Press.

Harvey, Penny and Hannah Knox

- 2012 The enchantments of infrastructure. *Mobilities* 7(4): 521-36.

Ingold, Tim

- 2011 *Being Alive: Essays on Movement, Knowledge and Descrip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Larkin, Brian

-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 327-43.

Rest, Matthäus and Alessandro Rippa

- 2019 Road animism: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infrastructures.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9(2): 373–389.

Ramakrishnan, O'Reilly and Jessica Budds

- 2020 Between decay and repair: Embodied experiences of infrastructure's material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E: Nature and Space* 4(3): 1-5.

Reeves, Madeleine

- 2017 Infrastructural hope: Anticipating 'Independent Roads'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in Southern Kyrgyzstan. *Ethnos* 82(4): 711-37

王可萱

- 2021 〈四湖道路年久失修狀況差 縣府斥資 4 千萬投入改善〉。「台灣生活新聞」，<https://reurl.cc/WALQOZ>，2021 年 9 月 13 日上線。

巡藝

- 2025 〈明天有明天的風吹 林之助 複製畫〉。「巡藝」，[https://www.taiwanarttogo.com/zh-hant/products/the-wind-still-blow-tomorrow%EF%BD%9Cclin-chih-chu%EF%BD%9Cart-print?fbclid=IwZXh0bgNhZW0CMTEAAR4hKYRYBLgRq-kyJny6TWpUwVx4AzSgtCkT-fwsEPl6tHF\\_8ql19Mlwe1PU6g\\_aem\\_ljc3jxW2Tn3ZC9YTIjx32A](https://www.taiwanarttogo.com/zh-hant/products/the-wind-still-blow-tomorrow%EF%BD%9Cclin-chih-chu%EF%BD%9Cart-print?fbclid=IwZXh0bgNhZW0CMTEAAR4hKYRYBLgRq-kyJny6TWpUwVx4AzSgtCkT-fwsEPl6tHF_8ql19Mlwe1PU6g_aem_ljc3jxW2Tn3ZC9YTIjx32A)，2025/5/13 取得。

林之助紀念館

- 2016 〈【展覽現場 | 明天有明天的風吹—明日之風】〉。「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AQpVtCeZV/>，2016 年 2 月 2 號上線。

林文玲

- 2017 〈基礎設施研究：前言〉。《臺灣人類學刊》15(2): 1-6。

洪佳玲

- 2023 〈打造口湖觀光廊道舒適交通 雲縣府斥資近 7 千萬改善口湖老舊道路〉。「觀傳媒」<https://reurl.cc/1X4AkX>，2023 年 12 月 19 日上線。

秋黎李

- 2018 〈風大沒路燈，雨大沒路燈，何時才能改善，實在很危險〉。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50961884915346/permalink/2273919222619598/>，2018年12月11日上線。

張怡婷、簡旭伸

- 2021 〈量體流動與風的時空政治—以大林蒲的空氣污染為例〉。《臺灣人類學刊》19(2)：147-188。

梁宸維、王安珩

- 2024 〈何謂「健康」？如何「照護」？雲林茆子寮高齡者的照護實踐〉。刊於《風頭水尾——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頁 215-238。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彭新雅、曾國欣、錢樺、陳彥杖

- 2019 〈運用多時期衛星影像探討外傘頂洲變遷〉。《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7(2)：103-119。

黃羿豪

- 2015 《考量降雨及潮位不確定性之區域排水防洪風險分析研究》。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所碩士論文。

經濟部水利署

- 2014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轄區介紹-雲林縣四湖鄉茆子村〉。「經濟部水利署全民防汛資訊網」，<https://reurl.cc/eG8lkM>，2014年8月7日上線。

蔡其亨

- 2024 〈茆東村 T 字路口反射鏡〉。「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50961884915346/permalink/8997639413580845/>，2024年10月13日上線。

蔡卓霖

- 2024 〈原野的呼聲——四湖鄉再生能源地景的論述與想像〉。刊於《風頭水尾——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頁 47-111。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劉曜華主編

- 2006 《四湖鄉志》。雲林：四湖鄉公所。



## 風頭水尾中，田野的田野

### ——記 2025 年寒假文化田野課程實習

涂峻清（臺大社會系碩士，Rutgers University 社會系博士生）

2025 年 1 月，我有幸跟著台大人類系文化田野實習課程進入箔子寮，展開十二天的寒假田野。我身為同行的「學長」，既不是修課學生，有課程的進度要完成，也不是助教需要照顧同學的狀況，因此有了許多空間可以在當地沒有壓力的探索，同時也側面觀察田野課的運作。本文將觀察田野地與田野課程中的時間與空間，以及田野課程和田野地的互動，並反思文化田野課程的意義。

田野成員的核心是老師跟助教，老師負責評估並規劃田野地、找到門路，規劃課程的進行，助教除了課程行政，還有協助同學狀況，以及協助老師跟同學溝通。同學們則是課程的主要參與者，透過 12 天的田野與訪談，加上事前的聯繫與閱讀查詢資料、事後的補訪等方式，最後完成報告。學生分成幾個類型。學生的組成大多數是人類系大三生，有幾個人類系大四生，還有幾個外系雙主修人類系的學生。這些人的生活狀態受到是進田野前的延續，有人做充足的準備、有人隨機應變、有人準備相對較少所以很焦慮，也有人像是來出門旅行。如果用「準備程度」與「自在程度」劃出一個光譜，有「高度準備且順利進入田野」的人、「做很多準備但田野工作不盡順利所以焦慮緊張者」，還有「準備得並不充分但在田野中非常自在」，以及「準備不足又不順利者」。

### 田野中的時間

文化田野課程不同於人類學家找尋田野地、建立關係與尋求被當地人接納的過程，而是呈現時間高度壓縮，且經事前規劃的日常節奏。田野課程的每天有一些固定行程，包括每天出外訪談或觀察或是後期的整理資料，還有共同晚餐和開會。在此之外，還有很多非正式、存在於縫隙之間的時間與空間使用。

首先實體的「進入田野地」。第一天大家抵達時，先進行了社區導覽，社區人士帶大家走了彩繪地景、普天宮、建陽國小在村子裡繞一繞，也遇到整理蚵殼、曬烏魚子、農耕的當地居民。回到民宿，老闆介紹環境、分鑰匙，讓大家整理一下，還有借用腳踏車，然後六點在熱炒店吃飯。雖然餐費有限，但還有村長與老闆等人幫大家加菜，吃完之後就回到民宿，開第一天的會。

往後幾天，開會前大家會回到民宿一起吃便當，通常大家也會在這個時段統整整天的進度，準備等下開會要報告的內容，老師跟助教開始在吃飯時間了解各組當天狀況，有時也會跟一些組別簡單談談。七點開會的基本流程，是老師跟助教先宣布行政事項，包括真的非常行政的餐費退錢、民宿熱水狀況等，也有具有儀式性質的宣示，例如老師說明田野的紀律和對同學的要求，還有助教的心靈喊話，這些開場不只是行政功能，還有定性當天會議氣氛的功能，每天會在不同的氣氛中展開會議。

接著會議進行到各組報告，每組會先說明當天的行程，例如去了哪裡觀察、跟誰訪談，或是整理資料、準備訪談等，接著報告當天重要的發現，這時老師跟助教通常會給一些回饋，覺得有價值或可以延伸之處等等，然後組別再講目前遇到的困難，由老師跟助教提供建議，然後告知明天的規劃，最後完成這組的報告，進行到下一組。各組在報告時，其他組不一定有在很認真聽，因為十點半要交當天的田野筆記，加上一些分析或整理，同學們相當忙碌，對別組報告多是簡單聽一下，知道有什麼訪談可以跟，或是一些新情報。各組都報告完之後，老師跟助教會進行當天的總結，再給一些批評或是心靈雞湯，跟開場的功能類似，最後結束會議。

寫隔天行程的白板是使會議能夠進行的重要的物件。最初的規劃似乎是要用麻將紙貼在上面，每天可以掛一張新的上去，但後來改成直接寫在白板上。第一天晚上開會時，各組先報告完隔天行程，獲得認可後才到前面寫白板，而事前準備比較不足的組別，要讓給準備比較充分的組別寫完之後，最後才能寫。第一天過後，助教們似乎是覺得動線跟開會的流程有點不順，便改為請大家在吃完飯的空檔先去白板寫自己明天的行程規劃，然後在開會的時候報告，如有變動，最後在會議結束後再去更新最新版。會議結束後，助教會去拍下最新版的行程白板，然後作為 **line** 群組中做為明日打卡鐘的配圖。每組在當天早上出門時，要在打卡鐘留下時間與行程，例如「0900 去漁港/訪談某人」。

正式的會議結束之後，助教跟老師會先留在現場，跟有需要立即討論的組別簡短開會，包括明天的規劃、目前的研究方向與分析的困難等。接著老師跟助教會移師去開會。

同學這邊，在每日例行會議結束後，終於到了每天可以自由運用的時間，這段時間兼具生產與再生產的功能，首先大家要先趕十點半死線交當天田野筆記，有些組別在吃飯時間有比較多的整理，在這段時間壓力較小，但也有組別剩下很多要趕，開會結束後就會看到大家在會議室裡面或大客廳或其他地方（像是有插頭的牆壁邊）趕筆記，走到附近感受氣場就知道這組筆記寫好了沒。因為老師跟助教要求十點半無論寫到哪裡都要上傳，因此十點半後仍有些筆記還沒完成的會繼續寫，或是補前幾天為完成的筆記，或是後面幾天比較開



始有人在整理訪談的逐字稿。田野前幾天，大家還充滿各種大量的觀察與訪談行程，約了許多時間或是要去特定地點，但過了三分之一到一半時，老師開始提醒大家要整理與檢視資料，整理過後反省自己的研究問題，做一些再來幾天田野重點和時間運用的調整，因此後面幾天大家開始出現許多整天的「整理資料」行程，留在民宿或是去善水咖啡整理資料、討論或補之前缺的田野筆記。這時可以看出除了正式的課程學生以及分組，還有許多非正式的網絡，各組開小窗整理筆記與資料，或是與老師和助教討論，還有老師和助教的會議，再加上更晚大家回到樓上後，會有一些同學跨房跨組聚在一起聊天還有抒發情緒，以及交換各種田野中的各種消息。

接著是在寒冷的冬天、冷風颯颯的田野中重要的事項：洗澡。春天民宿的熱水容量高度影響晚上的時間配置。民宿老闆所熱水是一次燒一整爐，所以第一個洗的要等一陣子水才會熱，接著會有一批熱水，這批熱水洗光了之後，煮下一鍋的空檔會有一陣子沒有熱水，而且同一鍋水的不同使用波段，水的冷熱也會不同，有時候超燙，有時候要熱不熱。一月的海邊，真的是沒辦法洗冷水，於是「搶熱水」成為一個重要的時間標示。大家大都是有時間就上去準備洗澡，或是聽到現在有熱水就趕快去，雖然自己洗到的水到底熱不熱，有不少運氣的成分，大家會回報現在有熱水或是水不熱，助教會去跟老闆娘說，然後跟老闆娘就上去看熱水爐，看上面的數字，表示現在的煮水進度或溫度然後預估還剩多少或還要多久；另外大家也會找空檔洗衣服。

## 田野中的空間

田野課程的空間分布，包括箔子寮與周遭村落（箔子、箔東村、還有新厝、廣溝、三條崙），而其中重要的聚點是春天民宿（分成大會議室、門口客廳、各房等）、善水咖啡，還有普天宮，其他包括村長家、烏魚子工廠、船長家、以及鴨肉羹、早餐店等都是同學們會出沒的地方，再延伸到報導人的家戶中。另外還有一些比較遠的區域，像下崙是大家騎車可達的範圍，會去夜市或採買，四湖市區則比較遠，但也有一些組別的研究會去到。在這個不同於都市空間充滿大眾運輸與步行的基礎設施，同學們主要依靠借用的腳踏車移動，也有部分組別有自備機車或汽車，其餘一些比較遠的行程，則仰賴老師或助教開車載送，每天的會議中，某個地點如何抵達，也是報告的事項之一，顯示出田野空間中移動所仰賴的成本與規劃的勞動。

首先是民宿內部空間的尺度。晚上的會議結束前後是觀察空間再結構的時間點，雖然開會時大家就已經有習慣的位置以及比較好的會坐一起，但開完會的移動是更明顯的一次空間再選擇，有人留在會議室內，有人去客廳茶水區，有人去茶水區的對面，還有少數人回房間。有時茶水區會有民宿老闆跟他們的

朋友來泡茶聊天，大家也會在那邊吃老闆提供的海量水果餅乾，或是跟客人們閒聊。這個空間與人群動態是每天浮動的，例如有時候特定組別會後被老師助教約談，或是主動想找老師助教討論，就會留在會議室裡面，而會議室裡面通常氣氛比較沉重。但會議室偶爾也是有被顛覆的可能，在一些老師跟助教都不在的時候，大家會在其中聊比較輕鬆的話題，又或者在最後幾天，大家晚上聚在會議室中寫卡片給報導人，還有聊著如何離別，讓會議室的氣氛不同以往。

善水咖啡也是田野課程中的重要空間。有組別直接以善水咖啡為研究對象，也有組別的研究涉及對善水老闆夫婦的訪談，還有更多同學時常到善水討論、休息與聊天，善水成為同學們重要的再生產空間。有時老師跟助教也會來到善水，跟老闆聊天或是跟大家討論，善水的吧台甚至在許多時刻由同學自由進出、自助服務，還有跟老闆夫婦的小孩玩耍。在休息日那天，善水老闆夫婦幫大家準備了一場派對，提供大家豐富的食物，還有大家一起唱歌，同時也給予同學許多鼓勵，善水成為同學在田野中的避風港，同時善水也主動地打造了課程同學、善水咖啡與地方的關係，並且在後續發表會中繼續提供食物，並且規劃淨灘活動讓同學與地方人士參與。

還有一個重要的空間，是線上的虛擬社群。例如前述熱水的回報，其中一個管道就是文田課程的 Line 群，這個 Line 群是田野日常中的重要溝通工具，貫穿了每天的田野日程。在每天的會開完之後，助教就會拍大家寫隔天行程白板，然後存成一個的記事本，在這個記事本中，隔天早上大家起床時要在下面留言起床出門還有去哪，或是行程更動用的，因此每天都充滿「第幾組 幾點出門 上午某處 下午某事」這些內容。除了固定的回報，還有一些機動的功能，例如通知特定報導人出現在某處，請相關的組別方便的話可以前往。群組還有公布行政事項，和其他管理的意義，例如宣導外出跟離遠田野地要回報，以及安全注意事項等等。群組有時也是社群建構和照護的重要基礎設施，包括日常一些玩笑或是關懷，還有分享各種照片，讓大家紓解每日忙碌行程的緊繃，而能有共同感以及內梗或集體記憶，群組扮演了重要但隱形的支持力量。

結束田野課後，大家回鄉過年，並且在春天開始的第二學期，開始繼續分析寒假收集到的資料，並書寫民族誌。這段時間，台大的課堂，或許又是田野的再延伸，伴隨著這批資料的分析與詮釋，延續了寒假的田野實作。五月底在台大人類系的發表會，我再度回到「田野現場」，繼續觀察文田課程學生們（的成果），也在六月一起回到田野地參與發表會，看見課程與田野地互動關係的持續。在這個過程中，文田課程也在當地繼續現身。寒假田野期間，去年的田野論文集就時常出現在報導人的家中與言談中，對當地人而言，能被大學生觀察、訪談，許多人留下深刻的記憶，以及生命經驗被理解的肯認。今年的田野期間，也聽到許多在地人問起今年的發表會，或是論文集，可見田野課程

也成為了當地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六月的發表會，除了學生的報告，老師也安排了許多田野的報導人回應和發表感想，場面感人，這個多重交互的田野現場能對在地與學生都留下影響，所有的行動者和時間空間都不可或缺。

## 田野的意義

一起參與人類學系學生重要的通過儀式後，我認為田野課程有深刻的意義。田野課作為人類系的必修課與方法課，用許多時間讓大家讀文獻、琢磨研究問題、思考理論意義，這些是學科重要的訓練。我覺得同等重要的，是對許多（且是課程中的大多數）不會繼續讀人類學研究所並以田野工作的學術工作為業的學生們而言，田野課可以留下什麼？這堂課有學生想做設計，想做永續工作，做商業工作、做社造，想讀其他學科研究所，或想離開人類學，那麼田野課程的訓練留下什麼？

我認為這才是人類學最可以發揮影響力且留下意義的地方，就是透過實作的訓練，在心性跟方法上，讓人類學的精神帶到其他領域中，這遠比理論意義、文獻熟悉、好的研究問題與解釋來得重要。具體而言，我認為對設計的人來說，能透過田野觀察和訪談，來理解使用者的感受與經驗，進而為使用者而設計，就能擴散田野的精神；或是永續工作中，重視在地人的感受，同時也具有轉換位置、去熟悉化情境、訪談與收集資料的能力，就讓人類學田野工作的訓練是有留下影響的。希望這些實作或應用層面的訓練，可以在人類系的田野課程中被跟高度學術性的訓練並置甚至受到同樣的肯認，讓同學們更意識到這部分的練習，以及想像未來的工作有哪些是可以受益於人類學訓練的，讓人類學可以對這個世界更有助益。



電子版論文連結：<https://ntuyunlin.org/>



- 書名：**風頭水尾·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與實習方法成果專輯
- 出版日期：**2025 年 10 月
- 出版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 聯絡方式：**[anthro@ntu.edu.tw](mailto:anthro@ntu.edu.tw)
- 作者：**蘇穎欣、林建志、王莉晴、陳冠儒、張瑜真、方宇祥、周哲瑋、陳思捷、鄭靜蓉、溫顯宜、洪浥青、胡善翔、林庭如、黃于瑄、胡景堯、黃則鳴、陳弘祐、劉湛湛、吳佩珍、陳禹翔、楊依婕、吳連進、吳文貴、涂峻清
- 授課教師：**黃郁茜
- 助教：**盧佳秀、郭天祐
- 封面設計：**鄭靜蓉
- 內頁排版：**郭天祐
- 印刷：**經典數位印刷·臺灣大學店
- 經費來源：**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高教深耕計畫(「新世紀臺灣人文學研究」·子計畫一：從文化多樣性、島嶼世界到諸多世界)

